

格罗伊斯·科勒克
著 应云卫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FROM SHOCK TO THERAPY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遼東文庫·當代經濟發展研究譯叢

主 編: 吳敬琏

副主編: 黃范章 肖 夢

編 委: 趙人偉 晏志杰 李 波 蔡洪濱

湯 敏 林毅夫 錢穎一 許成鋼

崔之元 茅于軾 張春霖 謝 平

費方城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著
刘晓勇 应存子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 (波兰)科勒
德克著;刘晓勇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吴敬琏主编)

书名原文:From Shock to Therapy

ISBN 7-80613-983-4

I.从... II.①科...②刘... III.①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东欧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独联体

IV.F15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257 号

译丛总序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是一套旨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土加肥，增添养料的译著丛书。

改革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二十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在反思、审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了解、观察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解放过程，尝试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到体制内攻坚的整体改革推进战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改革未有穷期，尚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方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充满了机遇。这个机遇就在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可能利用后发性优势，从先行国家经历过的诸种问题中获得启发，

慎重地吸取经验,避免曲折,从而降低学习成本,减少摸索时间,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走过的路程。因此,善于学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编辑出版“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不同于一般丛书的是,这套译丛的选题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者专业,而是以我国的现实需要为导向,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只要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有借鉴意义的著作,都是我们的选择对象;既包括最新的探索性成果,也包括各学科过去的经典之作。之所以包括后者,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封闭,我们的学者甚至对国外各门类的经典著作也一无所知,所以有必要加以介绍,以便于我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尽可能利用我们与国外前列学者的交往,为中国的读者介绍更多更好的国外研究成果及经验性文献,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二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和世界接轨,要想不落落后于时代,拥有与世界的对话能力,从而改革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就必须洞悉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才能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然而由于资讯网络尚不足够发达,加之语言的隔阂,使我们失去了一些了解和学习的机会。翻译出版正是一座桥梁,可以使更多的人共享这些智慧资源。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并非本译丛中所有著作的所有观点都为我们所认同。在我们看来,只要它们具有某种代表性,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就有积极的意义。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将采用滚动开发、陆续出版的方式,不断丰富书目,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思想火花和实践借鉴。

吴敬琏

出版者言

20世纪刚刚结束,在这段人类既历经磨难同时又充满了成就、进步和梦想、希望的历史中,转轨经济的历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转轨由市场、政府、制度、政策和利益集团、国际组织牵引,从1989年到1998年乃至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并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

本书作者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1994—1997年),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现任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1997年夏天,中国改革基金会曾邀请作者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改革会议,并提供关于波兰转轨前(80年代末以前)经济改革失败的论文。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作者1998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完成的,重点论述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的历程,并将这一进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进行了比较。

从以下几点看,本书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

1. 作者十分重视政策设计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决定)作用。作者将独联体和东欧各国90年代的改革历程称作“后社会主义”,作者认为,这些国家市场化转轨中许多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高质量的增长必定基于高质量的战略和政策之上,如果转轨被看成一个制度重新设计过程的话,有必要对转轨政策和发展政策进行区分,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能力,而发展的政策应当能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制度怎样,好的政策总有作为的余地,就像政策失误一样。”“转轨还应当被看成是长期发展政策的一个工具,而不应将其本身视为一个目标。”这可以看作本书的基本观点,全书围绕这一基本观点,探讨了市场化转轨进程中的政策得失,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意见和丰富的资料,这些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2. 作者在本书中详尽地分析了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激进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只能造成体制真空,既无计划也无市场,导致经济大衰退,这一点正是前苏联和东欧市场化转轨起步最大的政策失误。作者因此对西方有关论点和政策进行了分析批判,对中国和越南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持肯定态度。作者指出:“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

3.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期西方国家学者竭力扩散的思潮,从长期看,作者也是主张经济自由化的。但作者深入研究了经济转轨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认为成功的向市场经济的

转轨需要政府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参与。“转轨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自由市场的盲目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完全成熟,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它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它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自由。只要这一点是错误的——它确实是错误的——即自由市场能最好地为自由社会服务,那么政府就必须干预市场的运作,使之服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尽管独联体和东欧经济转轨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取向根本不同,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却是一致的。从本书看,这些国家关于经济转轨的思考,特别是对休克疗法的反思,已逐步理性化,仔细研究它们的思想成果,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教训、经验,对我国深化改革是有益处的,而这正是我们决定引进出版此书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由于这些国家转轨的资本主义取向,作者无法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抽象出来,把一些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显得苍白无力,也不适合我国国情,请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与把握。

致 谢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于 1997—1998 年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国际学院 (UNU/WIDER) 担任杰出的 SASAKAWA 教授和发展政策研究教授以及 1998 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

我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获益良多,特别是从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国际学院院长吉约万尼·安德雷·科尼亚 (Giovanni Andrea Cornia) 的中肯评论与有用建议中受益匪浅。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很难完成。

我还要感谢巴黎大学的玛丽·拉维尼 (Marie Lavigne)、西雅图大学的卡兹·波兹南斯基 (Kaz Poznanski) 和 Kaiseralautern 大学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Vladimir Popov) 的评论和建议。

最后,我要最衷心地感谢著名经济学家和真诚的朋友、伦敦经济学院和罗马大学“La Sapienza”的

从休克到治疗。

D·马里奥·纳提教授(D. Mario Nuti)的一贯支持。在我于1994年至1997年担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期间,他曾是我信赖的顾问,也是本书写作进程的要求很严的见证人。现在,本书已经完成,得失该由读者来评判。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1998年7月4日

于华盛顿特区

我知道谬误后面总有真理，
只要值得探求，人们坚定信念就能找到。

——约翰·洛克
(1632—1704年)

导言

21 世纪的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①转轨过程。在欧洲和亚洲一共有 30 多个国家——其人口多达 15 亿或占全人类的 1/4,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它不仅事关这些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及其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性的尝试并非是告别共产主义的过程,而是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即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和过去的中国,党的领导谈到“共产主义”时大多是指一个目标或者最终目的地,而决非指业已存在的现实。东欧国家在 1956 年后非斯大林化所引发的变革浪潮中就已经放弃了

^① 作者所谓的“后社会主义”是特指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译者

这种梦想。在那之后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此,目前的变革浪潮——这是试图实行社会主义体制以来最主要的变革,应当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实际上,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

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一些改进而非根本制度的变化来对现存制度进行完善,与此相反,转轨则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不再是仅仅通过改进运行方式来完善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

可以说,一些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经历这种转轨,而其他部分国家则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革和重建。它们已经走出了传统的中央控制经济阶段,但同时却尚未从社会主义进入转轨阶段。当然,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表明,它们的制度、结构、政策以及行为都在发生变化。从总体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转轨都同时在进行之中。

根据上述定义,后社会主义的转轨始于1989年后,这里有两个事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一是1989年2—4月的波兰“圆桌会议”辩论(作者曾经参加),其二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推倒柏林墙的决定。显然,如果波兰没能达成历史性的妥协,转轨还不会开始,至少还要推迟一段时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纯属政治性的(尽管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话,波兰的变化则确实是长期渐进式经济自由化进程的一个重大突破。

因此,在讨论改革与转变(即转轨)时,人们必然要回顾一

下是什么使得整个制度发生了改变以及导致变化的原因。但同样必要的是,人们应当预测今后若干年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如何控制发展的进程从而使未来比过去更美好。因此,书中大量篇幅集中于对过去 10 年的讨论,时期主要是 1989—1998 年,但一旦必要,讨论也会从对过去的追根溯源引申至对未来目标的展望。由此,在寻找“是什么引发了转轨”这一问题的答案时,人们必须追溯至 1950 年,而在探索长期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人们又必须前瞻至 2020 年左右。

至于本书所讨论的国家,东欧经济、前苏联、中国、蒙古、亚洲东南部诸国以及朝鲜和古巴都在讨论之列,但比较分析并没有花费同样的笔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没有进行国别研究,而仅限于对后社会主义转轨的一般讨论。不过,大家在此仍可以看到许多例子和国别研究案例——从东欧到中亚到西太平洋,但只是为了给一般讨论和结论提供一些背景。要想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路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们对于什么是或不是转轨仍然心存疑惑,因此,相关的文献中涉及的主题并非总是相同的。为此,本书就此给出了明确定义:后社会主义转轨就是以市场经济替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过程。

从这一角度来看,有些情况还要走着瞧。譬如,中国和越南(也包括市场化改革滞后的一些前苏联共和国)是已经走上转轨道路还是仍然限于对旧体制的改良?一方面考虑到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机制,另一方面再考察一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人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正处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然而,这种转变的过程还不是很确定。

无疑,这两个国家与当初引入社会主义制度时相比,其经济机制和发展政策工具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然而,它们进

行改变的进展还比不上大多数的东欧国家。

不过,一些国家转轨成功的榜样确实会对其他国家的指导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包括所有的后苏维埃新兴市场国家和改革中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示范性影响在传播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像朝鲜和古巴这些国家也将走上转轨之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转轨最初只见于部分国家——主要是迫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日益低下的效率和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缺乏竞争力,但在这种示范效应的作用下转轨最后也会扩展到整个地区。

后社会主义转轨包括一系列的变化,也会触及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相互作用: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经济在新环境下的运行方式与社会对此作出反应的方式之间;人们的工作行为方式与政府的管理方式之间;最后,国际舞台上伙伴们采用的手段与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之间。说得更严重一点,如果不对转轨的非经济方面给予足够的注意,人们对转轨的经济方面也难以理解并作出正确的解释。

因此,应当对向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给予适当的关注。由于政治斗争随转轨而来,这种关注就更为必要。市场化进程同时伴随着民主化,从长远来讲,这使整个转变过程更加顺利,但从短期来看,它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政治障碍。改进分配效率和提高竞争力的努力往往与争取收入和财富新的再分配方式相伴随。

转向市场并非只是简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因为它伴随着复杂的结构与制度调整以及社会与政治变化。因此,在争取被认为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经济秩序(如果存在的话)的斗争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他们自己在新的经济配置中谋得尽可能有利的位置。这场争斗会有胜利

者,但他们也都是输家。最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应当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有关转轨的一个最有趣的方面就是衰退与增长的过程。不管怎么说,转轨的初衷是迫于提高经济增长能力的需要。然而,最初的结果是事与愿违,整个地区的经济大幅度下降,后来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恢复元气,重返增长之路。迟至1998年,在转轨近10年之后,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共同体(CIS)^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不到1989年——这一年通常被用作比较的基准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

所有这些提出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转轨期的衰退程度会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会如此之长?是人们当初所抱的期望过于乐观,还是所实施的战略和政策有错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产出下降时间持续达8年之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一半以上?甚至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采用合适的发展战略来恢复生产并保持高速增长?这是获得政治支持从而使得这种巨大变革能够继续下去的必要前提,也是人们对美好前途抱有期望的基础。否则人们会问,他们忍受这么多艰难困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些带头转轨的国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形,即:生产在大幅度下降并

^① 按照这种分类,独联体国家包括除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12个前苏联共和国,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所称的中东欧国家包括15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但是,如果按“前苏联”和“东欧”划线的话,则前者有15个国家,而后者是12个。虽然也会不时地提到前东德,但这里没有计入。如果详列的话,其他国家也会考虑进来。它们是:蒙古(它属于转轨经济范畴)、中国和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古巴和朝鲜。因此,包括前东德在内,共有35个国家。

伴随社会压力(由于贫困增加而不是减少)之后开始享受高增长率。当初是否可能恢复更早、增长更快一些呢?还有一个对未来发展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刚走出转轨衰退谷底中的那些国家还有机会取得显著的进步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高质量的增长必定基于高质量的战略和政策之上。如果转轨被看成一个制度重新设计过程的话,有必要对转轨政策和发展政策进行区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能力,而发展政策应当能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的优越性。每个制度下都是如此,不独复杂的转轨时期是如此。换句话说,无论制度怎样,好的政策总是有作为的余地,就像政策失误一样。健全的发展战略,加上国家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经济成功处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自己国家和国际社会双增长的愿望。

转轨还应当被看成是长期发展政策的一个工具,而不应将其本身视为一个孤立的目标。只有当生产率增长、竞争力与效率提高,从而生活水准——包括消费、社会资本质量和自然环境方面——必然也提高时,才能说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合理的。然而,政策目标往往是彼此冲突的。通常,政策会因为迎合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而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转轨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带有政治特性。

转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过去10年的转轨经验清楚地表明,主要的困难不在于处理问题的理论知识不够,而在于政府没有能力根据这种知识和经济的基本原理来实施政策——而人们正是设想新的后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按照这种原理来运作的。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政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却往往行不通。这就是政策设计者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境。

更好地了解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有助于实施适当的政策，就是说可以使转轨不会操之过急从而更有成效。但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有正确的了解。正如 1993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所指出的：在我们的理论中，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还处于很粗浅的阶段，但是，如果想要政策按我们的意愿得以实施的话，它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North, 1997, p. 16)。这一点对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尤为真切，因为好的政策的确关系到转轨的成功或失误。

为此，在转向市场和民主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进程中，从政治经济角度对衰退、复苏、增长和发展的全过程作一观察就特别有意义。政治经济重视冲突及冲突的解决(这是市场所不擅长的)，并且——按定义——关注与政治讨论及政治解决方案有关的问题。制度和经济领域的变化的确影响到转轨国家的生活质量，并且还会对目前和将来新的全球经济交易产生很大的冲击。

建立市场经济和文明社会国家的福祉依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能以损害他国的利益为代价。生产增长、贸易扩大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当能为区域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并有助于睦邻友好。唯有那些能达到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国家才可望在将来赶上最发达国家。然而，这是一个远景，需要在明智的政府领导下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从社会主义早期改革和 10 年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经验来看，显然成功转轨的关键在于要有良好的宏观管理。从目前来看，随转轨而出现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大萧条和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其中最紧要的是政府的作用被忽视了。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而不是被抛弃。政府不应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而是应当转换角色，在适度管

理、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转轨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应当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

自由化、稳定发展和私有化固然重要,健全的基础也必不可少,但如果没有制度支撑的话,它们自身都不可能起作用。良好的财政状况、预算与经常账户的平衡、低通货膨胀、有利于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制度——所有这些都促进增长,但唯有在适当的组织、良好的制度与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下才能做到。能够明智地驾驭这些变化的国家,最终总会日趋进步,其社会也能享受到生活水准的逐步提高。

后社会主义转轨尚未完结,这一过程还在进行并将持续若干年。既会有新的成功范例,也会有新的失败者,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过程。各国的历史背景不同,地理政治位置各异,转轨的进度不一,这都是影响现状和前景的重要因素。然而,改革的进程、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及社会资本的改善,关键还在于政策。尽管我们的知识不断增长,但还有许多紧迫和困难的问题尚未找到答案。所幸在寻求答案和尝试制定转轨和发展的战略时已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努力最后会取得成功。

目 录

| | |
|----------|---------------------------------------|
| 出版者言 | 1 |
| 致谢 | 1 |
| 导言 | 1 |
| I | 踏上征程 1 |
| 1 |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3 |
| | 1.1 转轨的动因 3 |
| | 1.2 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化改革的条件 7 |
| | 1.3 “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 弗里德曼主义” 12 |
| | 1.4 最后的实验：80年代的波兰改革 16 |
| | 1.5 “越糟越好”的政治含义 27 |
| | 1.6 从寻找市场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复归 30 |
| | 1.7 转轨目标：幻想与错觉 43 |

| | | |
|------------|------------------------|------------|
| 2 | 不同的起点 | 49 |
| | 2.1 地缘政治:出发点和目的地 | 49 |
| | 2.2 经济体制和结构 | 56 |
| | 2.3 金融动荡和短缺膨胀综合征 | 62 |
| | 2.4 社会主义经济最后阶段的增长周期和停滞 | 66 |
| II | 分道扬镳 | 73 |
| 3 | 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 75 |
| | 3.1 经济改革和增长:中国和越南 | 75 |
| | 3.2 转轨与紧缩:东欧和前苏联 | 81 |
| | 3.3 后社会主义遗产的弊和利 | 91 |
| 4 | 转轨衰退:预期、现实和解释 | 95 |
| | 4.1 自由化、稳定性和 90 年代的大衰退 | 95 |
| | 4.2 政策失误 | 110 |
| | 4.3 “休克疗法”和“创造性毁灭”的失败 | 117 |
| | 4.4 制度真空:既无计划也无市场 | 130 |
| | 4.5 产权革命和生产下滑 | 134 |
| 5 | 重新审视“华盛顿共识” | 141 |
| | 5.1 不带来增长的政策:被遗漏的因素 | 141 |
| | 5.2 达成新的共识 | 148 |
| | 5.3 经济政策的手段和目标 | 157 |
| III | 漫漫长路 | 165 |
| 6 | 转轨政策和发展战略 | 167 |
| | 6.1 转轨是一个体制推陈出新的过程 | 167 |

| | | |
|-----------|------------------------|-----|
| | 6.2 转轨是一种发展战略工具 | 172 |
| | 6.3 制度建设:从休克失败到渐进疗法 | 175 |
| 7 | 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概念和实施 | 181 |
| | 7.1 私有化、新兴私营部门和公司治理结构 | 181 |
| | 7.2 利益集团和为增长服务的游说团体的形成 | 188 |
| | 7.3 非正式组织: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 | 192 |
| 8 | 财政金融改革和政策 | 204 |
| | 8.1 新的财政体制 | 204 |
| | 8.2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储蓄与增长 | 211 |
| | 8.3 汇率制度 | 220 |
| | 8.4 金融部门的发展 | 225 |
| 9 | 转轨成本和收益的再分配 | 230 |
| | 9.1 私有化:财富再分配的斗争 | 230 |
| | 9.2 公平和平等:预期和结果 | 237 |
| | 9.3 分配机制 | 248 |
| | 9.4 政策制定中的公正问题 | 254 |
| | 9.5 新的富人和新的穷人 | 262 |
| | 9.6 收入分配和增长 | 272 |
| IV | 到达彼岸 | 277 |
| 10 | 市场化和民主化 | 279 |
| | 10.1 市场和民主的相容性 | 279 |
| | 10.2 有关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反馈 | 283 |

| | | |
|-----------|-----------------------------|------------|
| 11 | 从复苏到持续增长 | 298 |
| | 11.1 市场不完善和危机 | 298 |
| | 11.2 复苏和政府的新职能 | 305 |
| | 11.3 政府的规模、公平和增长 | 317 |
| 12 | 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化 | 323 |
| | 12.1 转轨和全球化:协调问题 | 323 |
| | 12.2 国际组织的作用 | 328 |
| | 1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特殊使命 | 333 |
| | 12.4 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 342 |
| | 12.5 新兴市场的两面 | 355 |
| | 12.6 经济援助、直接投资和外国资本 | 362 |
| | 12.7 开放、资本流动和四个政策难题 | 373 |
| V | 展望未来 | 385 |
| 13 | 长远的前景 | 387 |
| | 13.1 可选择的路径:停滞、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 387 |
| | 13.2 乐观预测、黯淡前景和明智的政策 | 400 |
| | 13.3 转轨经济的死胡同和分化 | 413 |
| | 13.4 后社会主义转轨会成功吗 | 419 |
| 14 | 疑问和结论 | 427 |
| 附录 | 1.1990—1998 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 437 |
| | 2.1999—2002 年的预测 | 529 |
| 文献 | | 557 |

I

踏上征程

1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1.1 转轨的动因

转轨进程的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当然,人们对此一直有并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一个被特别强调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至少还有 15 年左右不会出现衰退的美好前景。虽然不能期望有显著的经济增长,但至少不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因为不会像波兰那样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苏联的政治制度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观点认为,在 80 年代中期的一些其他国家,譬如捷

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Popov Shmelev, 1990)。

在某个具体的经济体制及其制度设计中,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总有多种政策选择,这涉及到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产生成果的分配,但不管怎样,进步的取得只能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由于金融、经济、社会失衡的日益严重以致最终政治失衡,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增长的能力和潜力。根源于体制问题和宏观管理不善的持续通货膨胀压力使得物品大量匮乏,进而加重了微观经济的低效率,无力满足社会的需要。由于投资减少,生产力下降,增长越来越慢。撇开严格的政治因素不谈,人们不仅对经济政策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也对制度本身失去了信心。

这一制度在最终崩溃之前,也曾作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其目的在于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历史上,“改革”一词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含义。无论其具体特性如何,这些改革的共同特点是试图通过增加效益、改善生活来改进和维系这个制度。50年代末期、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早期的改革结果都是经济成长有所改观,但却好景不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改革尝试有所升华,制度变化出现了积极的结果,并最终采取了“新的”或“适当的”改革步骤。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的改革都未能解决关键的问题,即保证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总体经济状况最初都有所好转,随后经济增长放慢,接着又陷入新一轮经济失衡的恶性循环之中(Kolodko, 1986b)。短缺问题反复出现,被压抑的通货膨胀压力一再显现,并且都伴随着低效率(Kornai, 1980)。失衡状况越严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短缺程度越深,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越宽。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这却是1950年至80

年代末所有东欧国家的共同情形。

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一个很典型的改革试验及其在欧洲的最终失败恰好发生在波兰。因此,作为一个特别案例,波兰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启示。在波兰,虽然改革传统苏联式经济的尝试显得更为强有力一些,但变化的途径与其他国家都是类似的。经过了50年代末的改革后,人们试图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予以分权,而让工人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于是60年代的改革又开始了。但是,改革因过于简单化并且没有得到政治领导人的充分支持而未能继续下去。在1970年的又一次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70年代的制度改革就变得强有力了。这次改革承诺要建立一些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集团,从而使得制造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更加开放以便与世界经济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在持续几年(特别是1971—1974年)得以显著改善之后,经济又陷入更严重的失衡状态,外债也失去了控制。由于政策失误,原想用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反而导致了债务的不断加重,并进而束缚了整个经济。这最终又引发了再一次严重危机。其结果是又启动了80年代的改革,而这次改革的任务比先前的任何一次都更为艰巨。因为这次改革所面临的严重扭曲的金融关系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还关系到外部经济。

尽管有很多不足,市场化改革的确提高了增长速度和竞争力——虽然程度有限,时间不长。一系列改革中形成的新制度安排使经济实体(特别是国有企业)多少有了一些灵活性,并且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积极的反应。但是,由于明显缺乏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其他组织机构与制度,改革导致了各种矛盾和紧张关系。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紧张——虽然会有时滞,但却不可避免——影响到了社会领域并

最终影响到了政治关系。

其他国家在着手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之前,也与波兰一样作出过类似的尝试,并且时间也很久远^①。在 1956—1958 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的努力就开始了。当时的改革是针对已受到损害的正统斯大林制度的。当初,这一制度使东欧经济在二战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主要通过快速的工业化为进一步发展建立基础,特别是建立重工业基础,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结构由于过度工业化而服务业发展缓慢,日益显得缺乏活力和僵化。它们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社会需要。需要改革取得更大成就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政治领导者缺乏进行真正改革的决心,那段时期的一些努力都失败了。与此同时,人们期望有所改变的结构和制度却被证明是相当顽固的。几年过去了,改革被搁置一边。毫不奇怪,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自 60 年代后期开始,匈牙利从早期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并因此而有所成就。匈牙利式的“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曾被视为各种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的典范。在波兰 80 年代的改革中,这个国家还常常被称为值得学习的样板。因此,人们开始从实践中学习,包括从自己和别人的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国都注意到一直游离于苏联集团之外的南斯拉夫所进行的自治与分权社会主义试验。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曾尝试改变其经济制度的某些要素和机制,但这些改革从未像匈牙利、波兰及南斯拉夫的改革那么全面。

^① 此点可参见其他文献,特别是 Brus(1988), Kolodko(1989), Kornai(1986), Nove(1992), Poznanski(1996), Wilczynski(1972)及 Wiles(1977)。

1.2 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化改革的条件

经济改革的历史——无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都表明:任何改革成功必须至少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社会必须有改革的意愿并愿意承担因此带来的损失。第二,政治当局必须有将改革推向前进的坚定承诺和决心。第三,必须有为新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所必要的知识准备。第四,改革必须有必不可少的资源以支持所进行的变革。问题在于人们很难找到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例子。

市场改革对于社会公众来讲是很艰难的历程。关于不进行改革将付出更高代价的论点人们听不进去或被误解。改革实施的不同时期和所在社会阶层代表的不同利益,使得人们对改革的支持也有所不同。例如,在80年代的波兰,人们对于经济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支持——虽然尚不如早期,特别是不如1956—1958年和1971—1974年——但却也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制度和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如果说匈牙利人在80年代初期还热心于加速改革进程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末,人们就已经热情不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最初对于1968年春天的改革抱有热情,但在尝到苏联领头进行的军事入侵的苦果之后,情况走向反面,人们对于改革已经变得冷漠了。

上述状况表明期望与现实相距甚远。在社会公众急于接受改革框架内的新方案的同时,他们也会很快被动地——有时甚至是积极地反对改革方案的实施。当改革的具体实施首先带来的不是利益而是需要付出代价时,社会的反应就是通常所说的情形:既想占有一块饼,同时又想享用它。在80年代的波兰改革中,民意测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涉

及价格调整和收入政策时就更是如此。公众不断申明他们赞成价格水平及其关系建立在市场范畴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将价格与市场水平相一致,但是,在当局意欲使价格有明显提高时,他们却进行强烈抗议,包括进行一系列的罢工。

关于政治领导人实施系统改革的决心这一问题,答案就更复杂了。无论给外界的印象如何,领导人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虽然从不公开表现出来^①,社会政治精英们同样也陷入存在于各社会团体之间的那种矛盾冲突之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形,即:对统治阶层中某一部分人有利的东西,就会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工业-军事集团的代言人所赞成的事情,农业-商业集团的代言人就不会支持,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在不同观点、不同利益之间进行政治仲裁的明确机制,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很难达成工作上的共识。当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权力当局及其代言人对待改革的方式并不总是一样的。

在80年代,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及东德等国甚至出现了“制度停滞”。更有甚者,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更是走向了改革的反面。它们试图使经济进一步集权化,比以前更加封闭。在苏联,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宣扬“开放”和“重建”而有所作为,但由于缺乏进行改革的配套措施,加上又输掉了阿富汗战争,因此使得他的改革难有起色。不过也有些国家在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爱沙尼亚继续其部分自由化的试验,虽然是在国家所有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严格限定范围之内。在其他离市场经济更遥远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

^① 也有例外,如1956年在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0—1971年和1980—1981年再次在波兰所出现的公开政治危机的情形。

古巴、蒙古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存在依旧,同时还从苏联和中国接受大量援助。不过,由于受到戈尔巴乔夫“重建”口号的鼓舞,越南倒是开始了被称之为“doi moi”的改革。在欧洲,只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坚持继续其渐进式的分权化和自由化改革,但它们也失去了改革的势头。

相反,直到转轨开始,80年代的波兰领导人则前所未有地真心希望推进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决心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过去的痛苦经历让他们确信,不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就和进步。不幸的是,真心改革的领导者们这回却没能得到一些重要社会力量的坚定支持,改革比以前更艰难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政治斗争,加上经济金融形势恶化,一些先前的改革力量也转而反对政府实施一些本来已不可逆转的改革措施了^①。

要想改革取得成功,当局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必须一致。应当建立一个其运作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坚定联盟。这种协调可以成为形成推进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在80年代的波兰就未能达成这种效果,其原因更多地在于政治方面而非单纯经济原因。更有甚者,由于发生了政治斗争,特别是在1981年底实施了军管之后,反对派采取了“越糟越好”的破坏性策略。据认为,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会使政局按照国内外反对派的意愿发生彻底的改变。由于这种奇怪的政治斗争方式的副作用,在1983—1985年取得改善之后,经济形势又再度恶化。按照上述斗争方式的逻辑,这被认为是“好事”。政府

^① 事实是需要进行大量的结构调整,但在转轨之前一直受到阻挠,当时的这些领导人一上台就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不幸的是,80年代末期对价格进行适当调整的改革受到反对,结果使得物价在1989年下半年上涨了200%(以年为基础计算)。直到1990年底,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仍然比年初上涨了640%。

就引进民主制度和实践做法作了一些尝试,但由于缺乏深层次的政治改革,政府进一步改革经济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实践证明,只作经济文章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人们当时的认识与今天的有所不同。在转轨之前,人们无疑把事情看得过于温和了,认为不过是效仿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做法,尽量朝着自由化与私有化方向走就是了。人们现在对如何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所知道的是越来越多了,但目标制度应当是怎样的却一直不太明确,总有一些新的事件影响到改革进程并使之复杂化。而且这种影响大多是负面的,从而使未来的改革变得更具有挑战性。当困难的时刻真正到来时,理论问题与实际政策问题的增加是呈几何级数的,而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能够应付问题的能力却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因此,问题与解答之间的鸿沟在扩大。即便有足够的智慧能了解到改善制度、提高效率的方法,人们却还是缺乏团结一致推行政策所必需的成熟心智和政治共识——无论是莫斯科或者布拉格,华沙或者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或者东柏林。

谈到第四个因素——它也可以给改革提供成功的机会,譬如说财力与物质资源,但没有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达到资源足够丰富的程度,即便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苏联也是如此。所需资本到底是多少,这只是到后来已经进入后社会主义转轨阶段并全力应付国际社会的时候才清楚的。就算是匈牙利和波兰确实在准备进行真正的改革,从这一角度来看,当时也不是处于最有利的時候。沉重的外债使形势更加艰难,波兰就是如此(表1)。

虽然债务是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过程中开放经济以便与西方世界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结果,但到该年代结束时,这些外债已经成为束缚经济的沉重负担。债务严重地制约了经济改革成功实施所必需的自由度与机动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

表 1 1971—1988 年波兰的外债

(10 亿美元)

| 年 份 | 外债总额(年末) |
|------|----------|
| 1971 | 1.3 |
| 1972 | 1.7 |
| 1973 | 3.1 |
| 1974 | 5.3 |
| 1975 | 8.4 |
| 1976 | 12.1 |
| 1977 | 15.4 |
| 1978 | 18.5 |
| 1979 | 21.9 |
| 1980 | 25.0 |
| 1981 | 25.5 |
| 1982 | 25.2 |
| 1983 | 26.4 |
| 1984 | 26.8 |
| 1985 | 29.3 |
| 1986 | 33.5 |
| 1987 | 39.2 |
| 1988 | 40.1 |

资料来源：Rocznik Statystyczny Handlu Zagranicznego 1988(《1989 年外贸年鉴》)。华沙：中央统计局(GLS)。

移,机动的余地越窄,改革成功的机会越少。问题就在于这段时间是进行改革的最有利时期,当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即波兰 70 年代的上半期),有能力提供资源以弥补调整所造成的

损失。矛盾在于这时很难说服人们应当进行改革：既然经济状况很好，何必还要去改变它呢？

在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整个地区20年集中改革进程的推移，官僚主义计划的时代已经渐渐走到了尽头。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集权管理已经无力应付劳动和资本的有效分配问题。这种无力使得经济、商业、金融和技术关系更加复杂化，并最终使情况更加恶化。其结果是经济的失调导致社会与政治的紧张，由此使得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由于那个时期——特别是在1972—1974年的能源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高成长经济国家取得的显著成就，使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因此，在改革已经比较充分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又采取了新的改革措施，以便更全面地引入市场范畴，但这仍然是在原来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其出发点是对经济和金融机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但在产权方面则进展甚微。

1.3 “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弗里德曼主义”

这种方式的范例是80年代的波兰改革，当时的改革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引入市场关系。在此之前也有市场范畴的影子——有时候浓一些，有时候淡一些，但人们仅限于以完成中央计划为目标来使用这一范畴。这一时期，虽然这些工具仍然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于现实的趋势是向分权化方向发展，因此，这些工具的使用多少有些自由度了。之后，货币、价格、信贷、利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逐步而明显地得到加强。一些市场机构及其制度上的关系也是如此，如银行、商品交易所、贸易促进会、反托拉斯团体等。从下

面几个前提可以得出结论,即上述方向的变革是必需的。

首先,人们认为市场可以限制过度的扩张冲动而使金融变得有秩序,对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管理来讲尤其如此。这种冲动曾一度导致过度投资,其结果是效益差,特别是失衡加剧,生产率下降。在早期,货币只是被动地作为配角,配合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反,在计划管理的所有工厂中,最庞大的部门都是计划与采购部门,市场部门则总是最小的。不存在产品的销售问题,问题只在于采购。因此,改革的设计是要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即让产品生产过程从属于金融关系。促使投入和产出平衡,并且通过增加竞争和强制平衡来提高效益。

其次,市场工具和强有力的货币政策要从多方面为实现公司和家庭的需求约束创造条件。以前,只有家庭才真正懂得所谓预算硬约束的含义。所有将之应用于国有企业的努力所以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市场和货币的作用过于消极。无法建立这种约束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失败,进行改良也无济于事。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给予经济实体以自主权来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为了保持稳定,这种竞争必须建立在预算硬约束的基础上,而不是保证一旦出现损失就由国家来进行弥补。

第三,人们相信,有管理的市场应当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即生产结构(从短期来讲)和投资结构(从长期来看)应当能够自我调节以适应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结构的变化。改革的设计者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战略性的基础项目仍由政府决策外,中央计划已不再有能力决定产出的总量和结构并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流量的平衡了。即便计划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也还是如此。在消费品市场和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包括消费种类,计划的无效尤其明显。这些

领域的情况恶化会给改革的社会环境及政治支持方面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会失去支持。

实践证明,市场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方式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中最根本性问题。许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决不是巧合,改革的实践或早或迟都会走到这一步(Brus和Laski,1989)。在讨论这类改革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时,人们应当记住一点: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基于自由市场力量之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或反面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动力在于利润的最大化,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在市场经济中,激烈的竞争被视为质量改善的手段,而在计划经济中,则以所谓的合作来取而代之。在自由市场中,价格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则认为价格由政府来确定更好。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生产手段的分配由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自发地进行调节,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则是由官僚权力当局来进行管理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不同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产权私有基础之上的,而计划经济则以国家与集体所有制为基础。

不过,改革的目标并非对早期改革方式作一些简单转变,而是力图有所“超前”,即在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同时,就现代市场的制度安排作一些展望。因此,社会主义下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换句话讲,当初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时,资本主义被抛弃,经济管理和运行中的一切都走向反面,或至少与资本主义的有所不同。之后,所有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引入开始面临挑战。不过,这些不同因素不再是已经被抛弃的旧东西了,因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自身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受到了社会主义示范效应的很大影响(Cassidy,1997)。

因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一点,即所有的改革尝试,包括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匈牙利的“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80年代波兰的市场社会主义,越南的 doi moi,或者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在实施中都是将有限的市场因素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然,那时改革者并非想用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即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想这样做。无论作何变革,只能以此为限。变革只是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允许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中国和越南现在似乎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当时有两个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其一,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机制的限度在何处?其二,当时(现在的中国和越南也是如此)在改革社会主义与抛弃社会主义之间到底相距有多远?

对这些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对此以极端的态度加以描述的是 J·科尔奈(Janos Kornai, 1986),他将深入引进市场工具的改革目标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弗里德曼主义”。他所设想的是在激进的改革计划得到充分实现后的匈牙利和波兰经济制度,而事实是未能实现。对于制度变化有限,且国家在经济事务特别是资源配置中起着积极作用的改革体系,他使用了“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来加以描述。科尔奈当时的观察来自匈牙利的经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关。其中的例外是波兰,那时波兰已处于 80 年代后半期,其关于制度改革的激进观点甚至比匈牙利的走得还快。

波兰当时的辩论展示了人们观点发生演变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最为有趣的事实是,在理论观点变化之后,经过一段自然时滞,政治家们的观点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最终是对制度变化政策的调整。先前,改革主要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应用一些市场因素,之后才决定市场影响的范围应该扩大,以后又开始讨论中央战略计划的主导角色,市场则起着补充和调

整作用。随后,市场的作用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挥。这一点从市场范畴领域的不断扩大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从消费市场一枝独秀再扩展到生产资料市场,具体反映在价格控制的松动。再下一步就是越来越多地谈论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也谈到建立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还有议论讲到市场机制的范围和力量必须深化、强化和进一步向前推进,但仍然限制在社会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范围之内。

至此,市场制度安排不再仅仅作为一种附属的、补充的东西来讨论了,而被视为中央计划的“平等伙伴”。经济过程不再仅仅由中央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指导,同时——并且其程度在逐步加深——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到80年代末,人们已经可以预计到下一步其位置将调换过来,市场模式的基础作用会得到强调,其次才是中央计划模式。实际上,有若干年的情形是中央计划处于从属地位,越来越广泛的经济范围已经交由市场力量来调节了。到了80年代,波兰已经决定要引入全方位的市场经济。唯一并且确实十分关键的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何时及如何予以实施。

全新的实质性变革已经越来越近。直到那时,市场还只是被用来纠正中央计划的缺点和不协调。在新的方式下——这是改革成功与失败两者的产物——中央计划仅仅用来纠正强大的市场机器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从计划转到正在新兴的市场了。

1.4 最后的实验:80年代的波兰改革

可以说80年代波兰正处于从“计划市场型社会主义”的模式向“市场计划型经济”模式转变。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都遵循这一发展方向。在1989年初,当时非常强大的计划委员

会(Planning Commission)已经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更能与市场管理相适应的中央计划署(Central Planning Agency)。该机构主要借鉴日本或法国的经验,建立在指导性计划基础之上,而非早先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①。这种演变的逻辑看起来是非常清晰的。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工具和新的制度^②。不过,80年代所建立的制度是旧制度遗产和新因素的混合物。在市场配置方式中,仍然混杂着集权、官僚分配手段这些低效率的东西。甚至一些战时经济所采用的做法(如对某些肉类供应分发给票),还与自由市场机制(如外汇竞价交易)同时并存。因此,不难看出,由改革而导致的某些工具的差异和不协调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显然,这对实际操作过程有负面影响,并会在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金融稳定政策中导致很多不健康的思想行为。

中央计划的逐步放权为准备建立资本市场和真正的劳务市场以及银行体系的商业化提供了空间。在资本市场必不可少这一思想刚刚成熟时,银行业的改革就开始了。然而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系下银行改革很难有所作为,它并没有带来任何益处。但是,随着1987—1989年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波兰于其时形成了商业银行的框架^③。反过来,银行体系的商业化为进一步市场化——特别是为以市

① 值得一提的是,迟至1996年这一准部级机构被解散并由国家战略研究中心(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Centre)所取代。该中心并非另一个官僚机构,而是没有管理权的思想库。

② 类似的情况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也是如此。例如,关于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论述,可参见Ellman(1986),Feuchtwang和Hussain(1983),Fan(1997),Harding和Hewett(1988),Kosta(1987),Perkins(1988),Quaisser(1987)及Zhang(1989)。

③ 关于80年代的波兰结构改革和制度安排,参见Kolodko(1989)。

场为基础配置资本以及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提供了重要手段。它意在通过对国有与集体所有公司形成预算硬约束来提高生产与投资效益。然而,两级银行体制的形成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在已经由市场力量而非中央计划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对货币与市场的作用从制度上予以认可。在这种银行体系中,货币就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对生产和分配过程施加影响。这些改革之后,也就有必要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在此之前货币政策只是从属于实体部门的计划而已。

微观管理方面的变化则表现为:实体部门投入-产出计划与资金计划的分离,发展到1989年“物资与资金计划”配套系统的建立。所谓物资与资金配套计划旨在加速从指令性计划向市场型计划的转换。当时显得激进的这些制度改变,与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实施方案(《1988年方案》)一样,是总体经济改革过程的必然步骤。

问题在于,在这同一期间实施本来正确的这些改革措施时,生产却缓慢下降。情况明摆着,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改革就无法继续下去。改革方案实施之前进行的全民公决结果反映了波兰制度改革的其他基本特性,这就是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在党的正式文件、研究报告、新闻媒体中,都已接受一个观点,即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政治民主化,以市场力量来表现的经济民主化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不只是根源于民主本身具有价值这一事实。因为众所周知,市场不像集权统制经济那样易于向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屈服,还有一点也变得很明显,即政治民主化是与特殊集团利益相抗衡的基本手段。否则,这些特殊集团就不会依正常方式行事。

在实行市场规则和自由化经济政策与适当推进政治自由化的承诺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因此,波兰市场化改革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改革措施之间的不一致和不协调。改

革缺乏综合性、对抛弃中央计划迟疑不决、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不匹配,都削弱而不是强化了新制度。旧制度不能再发挥作用,而新制度又尚未准备好以修补正在增加的经济无效和社会困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的成果在真正诞生之前就已经夭折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波兰仅有一次渡过衰退。1979—1982年,经济明显收缩,改革开始时正处于1982年生产的低点。然而,这并非80年代改革产生的社会不满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显然,那段时间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不满增加的原因得从别处去找。两种心理因素的作用在此尤为重要。第一,社会期望与其满足程度之间总存在着周期性增长的鸿沟。人们总是相信状况在恶化,而不管消费期望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差距是否扩大了,即使消费的绝对水平增加了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也被称之为“消费水平越高,满足程度越低矛盾律”(Kolodko, 1987),可以在1983—1989年期间的波兰找到,尽管当时的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增加的(表2)。民众还是抱怨他们的状况越来越糟,而政治家们则徒劳地试图让民众相信情况正在改善。因此,市场改

表2 波兰1983—1988年的经济增长(%)

| | 1983年 | 1984年 | 1985年 | 1986年 | 1987年 | 1988年 |
|--------|-------|-------|-------|-------|-------|-------|
| 净国民收入 | 6.0 | 5.6 | 3.4 | 4.9 | 1.7 | 3.8 |
| 国民收入分配 | 5.6 | 5.0 | 3.8 | 5.0 | 1.6 | 3.3 |
| 投资 | 9.5 | 12.3 | 4.9 | 5.9 | 5.1 | 4.1 |
| 消费 | 5.8 | 4.4 | 2.9 | 4.8 | 2.9 | 2.9 |
| 工业产值 | 6.0 | 5.6 | 4.1 | 4.4 | 3.5 | 4.0 |
| 出口 | 10.3 | 9.5 | 1.3 | 4.9 | 4.8 | 5.5 |
| 进口 | 5.5 | 8.6 | 7.9 | 4.9 | 4.5 | 4.0 |

资料来源:Rocznik Statystyczny 1988(《1989年统计年鉴》)。华沙:中央统计局。

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期望与满足期望的能力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对市场化改革支持的减少与通货膨胀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Kolodko, 1989a)。波兰就是一个很引人瞩目的例子。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只是在某些行业而不是总体上存在通货膨胀和短缺。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存在公开的通货膨胀,但非常有限,且实质上是短缺。而波兰则相反,在经过不稳定改革后的计划经济中,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相当典型的方式,即公开的(价格)通货膨胀和被抑制的通货膨胀^①。面对高通货膨胀,公众就倾向于以可支配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以反映经济实际增长的指标来衡量当前的经济状况。通货膨胀总是导致贬值,而在像80年代的波兰这样的国家,货币疲软又不可自由兑换,也就会导致大幅度的汇率下降(表3)。由于通货膨胀不断,公众对经济改革持怀

表3 1981—1988年期间波兰兹罗提通货膨胀、贬值情况(%)

| | 1981年 | 1982年 | 1983年 | 1984年 | 1985年 | 1986年 | 1987年 | 1988年 |
|----------------------|-------|-------|-------|-------|-------|-------|-------|-------|
| 通货膨胀 (消费品价格指数) | 24.4 | 101.5 | 23.0 | 15.0 | 15.1 | 17.7 | 25.7 | 60.0 |
| 贬值 (购买力下降) | 17.5 | 51.1 | 17.6 | 12.9 | 13.1 | 15.0 | 20.5 | 37.5 |
| 名义贬值 (兹罗提对美元价值降低) | 23.7 | -55.0 | 13.8 | 28.3 | 17.2 | 33.6 | 59.7 | 61.6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并经作者计算加工。

^①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指以下列形式表现的通货膨胀:持续的短缺、各种配给计划、强迫替代与双轨制、黑市。这些都不同于表现为公开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应当重视被抑制的通货膨胀的后果,由于消费品短缺,它导致居民的非自愿储蓄,而不一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Portes, 1981和1984; Kolodko, 1986a和Nuti, 1989)。

疑甚至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在这些改革与相应的稳定措施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些改革措施根本不再被接受,而且,这时的公众态度已经带有敌意了。

通货膨胀成了实施新安排的最大障碍。当初,放开通货膨胀的过程——在严重短缺的环境下实行价格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改革得以实施的一个主要条件。问题在于要通过强化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来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减少短缺、尽快改变价格扭曲的状况对于提高效率至关重要。然而,通货膨胀是由深层的结构与制度因素引起的,同时一些新采用的金融机制看来也具有通货膨胀性。作为改革得以实施之先决条件的放开通货膨胀成了进一步改革的严重障碍。新制度安排被归结为用市场价格机制平衡经济,因为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81—1988年间,波兰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5%)可以扼杀所有的经济和金融激励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指望改革能取得成功。况且,问题还不只是高通货膨胀率,更糟的是它还在加速攀升^①。

因此,持续或偶然增加的不均衡会形成一些根本性的障碍,从而阻碍与这些改革联系的所谓“3S”公式的应用。三个“S”是指国有企业的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自我独立(self-dependence)和自己融资(self-financing)。尽管承诺要实行这三条原则,结构扭曲的负担仍然不断形成将资源从效益好

^① 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形下,例如80年代的土耳其,或甚至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中,可以找到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证据。不过,警戒线——就是说在此线以上就必然会在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产生负作用,是在35%以上。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已容忍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只要它不超过20%—25%,正在下降并且价格正在出清市场(《世界银行1996》)。

的部门向盈利性差的部门转移的压力。对于非盈利性生产仍然给予大量的补贴,同时还有财政的一剂重药,就是沉重的企业税收负担^①。尽管进行了改革,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非盈利产品,从而成为国家预算的沉重负担。多年来它都导致形成财政赤字,数量虽然有限,但因税收收入不足以抵补日益增长的国家支出而形成。作为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重要因素的预算赤字占总支出的3%—5%,或者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Kolodko, 1992c)。

然而,假若政府不发公债,公共债务不能通过公开市场解决,那么,这个缺口就只能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来填补了,而这无疑是通货膨胀因素。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不可能解决政府支出的融资问题。其结果是,总需求的增长一直高于总供给的增长,从而形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试图放开价格的努力最终形成了高价格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加剧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们对改革的政治支持。即便是在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②环境下,尽管居民的消费在增加,公众仍然不接受实施改革方案所带来的变化,并转而反对这些改革。

改革中实施的稳定政策包含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价格管理,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价格上涨速度和工资膨胀。在通货膨胀经过3年的下降之后——从1982年的101.5%降至1985年的15.0%,消费品价格指数在1988年又上升到60.0%,1989年上半年更是攀升至160%。1988年,改革者很想放开价格,可政府却无法通过合法程序予以实施。价格政策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敏感,在公开型通货膨胀和

① 这种税收不断加码,因为当时直接加于居民家庭的税收还很少。

② 1983—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增长了3.8。

抑制型通货膨胀结伴而来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这正是波兰人在 80 年代所面临的情形,形势变得非常糟糕,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不用排队或无需配给票证就能买到的商品屈指可数。公开型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的并存,即所谓的短缺型通货膨胀(shortage-inflation)(Kolodko 和 McMahon, 1987)。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征深深地侵蚀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效率并使之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就是波兰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对之加以改革的努力失败的第三个关键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力图对相关价格进行调整,使其与成本结构及市场需求相协调,但却未能如愿。价格的结构与产品的成本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也不可能就具体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情况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信息。这也使得部分投入无法按效益要求进行分配,因为在缺乏市场出清机制(market clearing mechanism)的情况下,投入分配只能通过某种行政手段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比较低,如食品、衣物、房租、公共交通、医疗服务,等等。要想提高其价格以减少补贴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罢工,结果就会自动地对生活费用的上涨给予补助。

例如 1988 年就是这种情形,当时通货膨胀水平又急剧上升。上半年时消费品物价指数大约是 49%,而由于政局非常紧张而管理又不协调,给平均名义工资标定的指数是大约 53%。与此同时,国家预算还增加了补助和其他社会转移支付。由于支出增长与收入方不匹配,从而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这些变化及相对的价格比较温和,但收入的再分配却很明显。与政策的初衷相反,通货膨胀加剧了。更糟糕的是,短缺情况比以前都更紧张。到了 80 年代末期,从波兰国内来看已经很清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容易的办法是玩弄通货膨

胀游戏。于是，也就这么玩了。政府试图对制度继续进行改革的努力已经注定要失败，因为到那时这个制度实际上已经崩溃了。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失衡的情况下，价格的上涨不会自动地和完全等同于降低消费水平。在1987年的波兰，如果平均实际工资降低3.7%，按固定价格计算的消费水平会上升2.0%。这是家庭的流动性受到过分抑制或者短缺缓解造成的结果。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官方统计数显示实际收入水平（按货币形式计算）下降了，而消费水平事实上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统计表明实际收入增加了，但同期的实际消费水平却因为消费品市场的供给不足而没有增加。

至于说到社会共识和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有必要强调一点，即人们对持续的结构性危机和实施改革的方式两者都已经厌倦了。因此，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固然不好，但不进行改革则更糟。在实施改革的经济体中，像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老百姓是通过他们最感痛苦的东西——主要是持续的价格上涨，来认识改革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家庭宁愿对肉类实行配给供应而不喜欢实行弹性价格，用政治语言来讲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些改革措施以及政府试图强加于他们的那些政策。只要政治敏感性强的群体不愿接受这种再分配，就总会阻碍必须进行的变革。希望的制度是否可行，调整方案是否有可操作性，不是取决于其合理性或者理论是否完善，而是取决于对某项改革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政治力量的实际平衡情况。在80年代的波兰，这种平衡开始变得有利于改革的一方了。

有鉴于此，关于外部调整的能力问题也应提上议事日程。1979—1982年的危机之后，已经很清楚，波兰将无力偿还其所

欠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全部债务。到了 80 年代末,情况就更清楚了。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楚,如果不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外债务的减少、重组或展期就都不会有显著的进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波兰失控的外债余额负担确实成了市场改革惨败的原因,这也是改革失败的第四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匈牙利的情形也是如此。两国的外债余额都被作为一种杠杆,一种政治主张的工具,以推动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市场化,再进而成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有点荒谬的是,这两个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的改革力度最大,受到的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债权人的金融债务压力影响的程度也最深。债务负担阻碍了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阻碍了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可兑换的早期达成。它同时还增加了预算负担和通货膨胀因素。波兰与匈牙利的情况不同,其大部分外债来自外国政府,因此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在“铁幕”后面进行一些制度变革。实际上,当时的铁幕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一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至少在这两个改革国家中是如此。因此,为了能够应付金融债务,进一步自由化的要求非常强烈。

正因为如此,波兰在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非常注意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作,并早在 1986 年又再次成为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成员^①。这是与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政治领导人要有实施适当的制度改革的强烈愿望。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一方面可以在准备必要的调整措施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融资救助。到了 80 年代末期,已经众所周知,除非援助得到

^① 波兰在 40 年代末就已经是布雷顿森林组织的成员了,但在当历史的车轮走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在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后不久,波兰退出了这些组织。

保证,否则再有雄心大志,改革方案再好也无法施展。当然,这种援助没有得到。因为很清楚,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容易的方法是玩外债游戏。于是,也就这么玩了。

因此,市场改革的失败有一系列的原因。缺乏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的综合方法,忽视了支持经济改革的政治措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期望与实际发展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加上难以承受的外债负担——这些都是波兰市场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也都具有国际意义。到了80年代末,就不单是经济染上了所谓增长疲软症(Poznanski, 1996)。自然,还有其他特征,这就开始了解体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找到更好的理由来为这种转变作解释了。

社会生产者感到失望,他们越来越确信,由于政策失误导致了产生停滞和缺乏竞争力,从而使他们的一些努力付诸东流。消费者感到不高兴,因为分配系统的效率越来越低,他们为购物所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民众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无力影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意愿。只有这三种动力的合力才足以决定和推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变。

因此,在波兰,已经并不令人惊奇,不仅社会公众已经厌倦了一再重复且没有成果的改革尝试,而且政治领导人也已经准备放弃这种努力了。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终结的真正开始。代之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是,使其转变为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启动于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当然,如果没有早期的市场改革,没有其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和不足,也就不会有这种历史的转折。当时的改革走得越远,到后来发生根本性改变时,驾驭

起来就越容易。至少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当时的改革是否及时或是太迟,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现在再重新考虑过去的改革取得成功与否可能是不恰当的。人们可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它就应当已经成功了,可实际情况并非这样(Nuti,1992a)。由此,在社会主义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国家中,波兰率先以坚定而义无反顾的方式,从改革旧制度的行列中转入了建立新制度的进程。

1.5 “越糟越好”的政治含义

经济政策的目标、进度以及改革的成本与结果总是人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稳定、传统的民主制度下,按照人们通常的思维,糟糕的结果一定是由于理智与政治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而导致恶果的政策则应当受到适当的批评并能迅速得到纠正。没有人会提议改变整个制度,因为人们坚信对政策作一些修正和完善就可以了。然而,只要对政治环境稍加考虑就会发现,一些国家的情况并不都是这样。

根据上述情况,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危机出现的征兆会不时地受到欢迎并被视为是比繁荣更好的东西,或者为什么受欢迎的是难题而不是处理难题的能力。这正是欧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外国支持者们常有的信念。最近,还有人持有类似的观念:尽管增长率很高,但中国和越南经济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的征兆。这种认识的后面有一个观点,即这些不利的特性会引发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比目前已经实行的改革深刻得多,而非危机的出现,这种变化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危机对于改革来讲是一种机遇。它使人们看到不能再维持现状了(Grant,1997)。因此,人们的信念仍然是坏事会变成好事。一些人的忧虑和痛苦正好就是

另一些人的希望和快乐。

这至少是 80 年代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类似做法,形势的恶化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反对派领导人视为有利因素。尽管听起来怪异,但事实是“越糟越好”的信念被广泛利用,特别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反对派,为了上述目的不断利用了这一信念。当时,各种活动和手段都用上了,例如大罢工、持续的通货膨胀—工资指数压力、要求对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补贴、甚至鼓励国外的金融制裁等,都被作为手段来制造这种恶化形势,这种恶化被视为“缓和”。

这就是一种推定,认为如果人民群众没有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从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的转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这种有些荒谬的信念的逻辑是,社会形势与政治气候的好转会妨碍进一步改革的机会。结论很简单: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越强烈,改革与最终转轨的结果就越好。据称,现状越难忍受,人民要求改变制度的愿望就越强。因此,最好是先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使人们无法忍受。当然,这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相反,如果旧制度下的形势在好转,那对未来就是“更糟糕”的事。换句话说,当从政治角度来看时,经济绩效的“好”与“坏”其实是相对的概念。对某些党派来讲,良好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意味着恶劣的政治形势,反之亦然。的确,这种策略的结果使得经济范围的危机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也缩短了转轨启动的过程。

政府实施改革的真正趋动力在于希望借此提高效率和生活水平。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改革毫无疑问是用来作为保护并维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因此,政治反对派从相反的意义来加以运用,这就是要推翻他们所不喜欢的制度。这种目标的取得越容易,政府政策制定者们所无法控制的事情

就越多。由此,被政府当局视为延长社会主义制度生命的工具,就会被反对派看作结束该制度的有效手段。这就如同医学中一些被视为治疗的良药也可能被证明是毒药一样,治疗的医生们互相争辩,而他们也明白,对什么是健康其实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对这一事实的警觉导致了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试图进一步推进改革,将它视为应付社会动荡风险的万灵丹,如匈牙利、波兰或者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则从自由化的尝试后退,与政治自由化的企图相反,当局对政治的控制反而强化了。中国与越南领导人后来似乎从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决定将经济体制的改革置于优先地位,而暂时对政治变革持正统的态度。有点矛盾的是,经济意愿越强,社会受的教育越多,以及国家与外界的接触越积极和越广泛,就越难抑制政治反对派利用这种“越糟越好”的政治策略的诱惑。

一二十年前在东欧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最近在古巴可以清楚地看到。无疑,古巴在已经解体的“经互会(Comecon)^①”中的旧关系崩溃之后所经历的困境被人们从政治方面加以夸大了。不仅国内的反对派这样看,国外的流亡者们也这样看。后者无疑正在利用这种难得的机遇不遗余力地使经济困难加剧,他们相信这会使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总体环境变得更好。因此,这又是一种“越糟越好”的策略。

美国领导的富国联盟以及按其意愿行事的国际组织不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其意识形态基础和重要政治论据也正是与此同出一辙。撇开政治制度不谈,不幸的是,像

^① 在1990年解体之前,经互会国家包括苏联、越南、蒙古、古巴,及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译者

长久以来对古巴和朝鲜所实施的这种政策,总是给普通百姓增加困苦,无论是过去的苏联或是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如此。80年代,波兰也受到这类制裁的严重影响,并使当时的经济形势明显恶化,按照这种思路,使最终爆发所需要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改善^①。

越南曾一直处于这种压力之下,特别是直到最近还受到美国的限制。源于不同的政治动机,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在处于后社会主义时期时就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至于中国,即便到了1997—1998年,还有人支持要对之实行经济制裁——特别是在中美高峰会谈前夕的美国。不过,尽管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尚未被抛弃,但这种“糟”并非对每个人都意味着“好”的观念已经占了上风。现时的政治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大乱达到大治”的策略之所失远远大于所得。

1.6 从寻找市场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复归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旧制度,这一制度已经不能应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挑战。与此同时,它们已经选择了转向市场经济,当然,它们设想这种转变将使国家走向富裕,并且转变得越快越好。在当时政局许可的情况下,从社会主义转轨已经不可避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先前的制度下,已经没有空间来适应新的环境,实施新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是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也

^① 但是,在已经走上转轨之路后,这个国家又从国外的援助中受益匪浅,首先是国外的债务减免,将近一半的外债余额被冲销。不过,要想将早期制裁的后果与后来为停滞、衰退及恢复和增长所提供的援助准确地作一比较评估是很困难的,结果可能是负面的。

需要采取新的、截然不同的措施,而旧制度却无法提供。因此,从先前的制度向新制度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于新的制度应当是市场经济没有多少疑义,但是在如何控制转轨的进程以及应当走向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问题上却颇费踌躇。

如果说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同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走出旧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的话,在转轨开始时,人们并不那么肯定未来的出路在于恢复资本主义。当然现在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在1989年底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以及1990—1992年的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在内,一种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当时应当探索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有些情形下则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变革的目标(尽管事后有人声称这只是一种策略,但当时却并非如此)。1989年9月波兰的第一届后社会主义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对此明确地加以强调。当时的政府对此的确是认真的,只是到后来才越来越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应当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其社会形态如何。这其中有几个方面很关键。

第一,几乎从转轨一开始,政治精英们当然也包括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深信,引入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产品市场,而且需要健全的劳务市场和资本市场。而后者只有通过发展私营部门,让私有产权发挥基本作用才能成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到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但私人资本的扩张从一开始就势头很猛,即便那些选择了缓慢地、渐进式私有化道路的国家也是如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如资本市场,其最初的发展纯属偶然而非事先设计,主要是以无序而非有组织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然而,具有影响力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和那些可以从这些发展中受益的社会集团很快就开始鼓吹进一步的私有化了。的确,非国有化的受益者中,有许多是工人,在某些情况下他

们几乎是在为私有化而斗争。波兰私有化实现的方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后社会主义转轨中通过将股份免费、半免费或给予优惠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实现私有化。因此,可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包括工人中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都真心赞成加强市场关系,但当时他们确实没有存心要恢复资本主义。

一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相信,乌托邦式的、前所未有的“人民资本主义”的设想可以通过将国家财产进行无偿分配的方式来实现。波兰的团结工会及其领导人,后来成为波兰总统的瓦文萨就是这样想的。只是到后来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再也无法逆转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他们所支持并为之奋斗的是资本主义的恢复而非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1980—1981年诞生的团结工会的宗旨是改良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它。当时的口号是:“要社会主义,但不要变形!”稍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早期的叶利钦,以及其他前苏联各共和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其中有些国家,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人们为之奋斗的仍然是改革旧制度,而不是全盘转向资本主义。

第二,在转轨开始时人们就已经很清楚,在当代世界的大环境下引入市场制度的实现需要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因此,对于新的统治阶层来讲,开放和自由化不是一种偏好,而是一种需要。他们的许多代言人从反对过快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迅速转变为其热心鼓吹者。这些经济体的相对迅速开放并融入世界经济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在全力加速早期改革并进一步向市场转轨(无论当时是否意在恢复资本主义)之后,先行一步的国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响应。与某些国家如乌克兰或蒙古相比,有些国家如

波罗的海国家或吉尔吉斯斯坦起而效法的时间要短一些。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只是在危机中再现危机,也就是90年代中期发生金融危机后才开始实实在在地转向恢复资本主义。虽然国内要求对制度进行某种改变的压力不断加大,但在向恢复资本主义的转变中有两个因素起了催化作用。一方面,一些邻国快速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变化产生了强烈示范效应。令人鼓舞的例子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匈牙利,而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并不比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和一些前苏联国家快多少,因此,进行类似改革的愿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发达世界——首先是布雷顿森林机构和西方政府,支持变革的方向是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当初从国家社会主义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的结果,有关国家在国内外的压力推动下进一步走向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第四,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经济改革中,无论那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心里是怎样想的,如果没有富裕国家的积极支持,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西方国家却毫不犹豫地一心只想着这些国家全盘转向资本主义。只有所带来的变革保证转轨的最后能出现自由市场经济(譬如资本主义)时,西方国家才会提供政治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由此,出现了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二波浪潮,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人们很快发现资本主义在此有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种可能性自那时起已经被充分利用了。年复一年,国际性政策逐步被控制着朝向有利于促进和加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的过程,而不管这些转轨国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因此,不仅资本主义的恢复问题,而且有关达到这一目标的措施也很快摆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关于市场改革的性质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都存在许多含混不清的问题。自从我们开

始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一历史性进程以来,就有与此变化有关的许多问题尚未澄清。它们有时表现为经济问题,有时则呈现出政治背景。既可能以渐进的方式提出来,也可能采取激进的方式。有人还在谈论着只是对旧制度进行改革,而另一些人在谈论同一问题时想的却是转向一种全新的制度。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因此,对某些概念及其解释加以澄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工具。

其一,应当将市场化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轨区别开来。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只要目的在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并通过使之完善而得以维系而不是完全抛弃该制度,那就是在对它进行改革。而转轨则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在1989年之前所进行的是一系列改革,而改革显然从1990年起就停止了,整个地区已经开始了替换而不是改革旧制度的过程。

的确如此,因为转轨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与经济改革相对应的政治变革。从严格的经济背景分析,经济因素就决定了改革和转轨的性质。然而,问题比这还要复杂。经济活动对于政治发展及其制度架构的依赖程度常常比人们愿意承认的要严重得多。由此,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在政治制度没有相应转轨的情况下,将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否可行呢?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即有可能在没有多少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情况下使经济获得强劲增长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包括自由化和与世界经济建立紧密联系的对外开放。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逻辑却是这样的,即如果政治方面的改革进程不够深入,则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并且速度会越

来越慢。有证据表明,无论政体如何,在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时,市场能运作良好并获得持续的增长,但持续时间不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这取决于发展的整体水平,技术进步的特征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进一步的增长和发展就与政治自由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政治制度或早或迟地都将成为经济进步的桎梏或者催化剂。人们可以证明,90年代的发展水平和技术关联已经迫使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出现了政治自由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似乎不可能持续长远。从相当长远的时间(譬如说几代人之后)来讲,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必会有民主政治制度相伴。

再回到出发点:转轨与改革相比较,前者总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变革相联系,而后者只是与单一的经济变革相联系。不过,在前苏联和东欧早期的经济变革中,人们并未对广泛的政治改革抱有期望。更进一步而言,如果在一段时期内经济改革能够带来使生活标准有所提高、社会福利有所改善的积极结果,政治改革的压力便会得以消除,早期的民主化运动也被弃之不顾了。相反,向市场制度转轨的过程则被认为是与向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变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有些国家的情形并非如此,问题又出现了:到底仅仅是市场改革,还是转轨已经启动了?

另一种困惑来自对于下述选择的解释:渐进或是激进式的改革以及渐进或是激进式的转轨。有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那里不可能说清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再者,这也是一个定义问题,因为某个人认为是渐进的转轨,或许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就是激进的改革。中国有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声称他们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式的转轨,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东欧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或者所谓的休克疗法(樊纲,1997)。而这里至少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从长

远来看,中国的变化过程是否与东欧的一样完全属于同类转轨呢?其二,既然已经论证过,与意在维护旧制度的改革相反,转轨的目标是要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那么,是否可以将东欧地区的变化称之为激进式改革?

这些问题只能是事后回答,因为其判断的依据是变化后的最终结果,而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无法先验知道的。如果只是考虑东欧,以及其他大多数情形(并不包括所有前苏联各共和国),似乎很清楚这些国家正在从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以及越南、柬埔寨、老挝却并非如此。以后将看得更清楚:我们是在90年代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果的改革?

激进与渐进方式的问题曾经从另一个角度来检验过。向市场转轨的过程是一个涉及经济与政治关系方方面面的复杂过程。如果仅限于考虑经济方面,就有必要讨论以下三个不同但却相互关联并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第一是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二是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第三是产业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

显而易见,经济自由化是向市场转轨的核心。同时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要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以及对所谓通货膨胀威胁进行中和,经济自由化最初都会带来不稳定。因此,经济自由化必须辅之以有力的稳定经济的措施,特别是要约束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开始时就会明显加剧,在某些情形下还会发展到恶性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整个转轨中的这一部分确实有一个是以激进方式还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问题。选择哪一种方式,其实就是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性优于稳定性及转轨前的价格与贸易控制范围的问题。转轨之前的经济控制程度越高,金融不稳定性越大,则选择激进方

式以达成经济自由化和稳定化就越合理。

至于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结构改革和制度安排,包括私有化和公司治理结构,则总是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除了前东德的情况比较独特之外,这些改革的特性总是持续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很高。形成适当的制度安排并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各组成部分的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改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因此,结构改革和制度改变实施的效率可以或高或低,进度可以或快或慢,但决不采取激进的方式。

关于转轨的第三个方面,现存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必须是渐进式的。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前东德也没有例外。诸如新的投资、关闭旧工厂、劳动力的重新调配和再培训、提高行业竞争力、吸收流动资本等等,既需要时间又要花费大量财力。并且,即便国家有这种财力,花费起来也需要时间。这类结构重组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并实行明智的产业政策。为了抵御重组带来的社会压力,需要政治上达成共识,还需要大量资本。实际上,如果两者都足够的话,它们可以达到互相替换的程度。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仅仅在前东德出现了。

综上所述,情况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说可以在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权衡式的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复杂的转轨过程中,所谓的休克疗法并不总是可行的,并且不能以激进的方式来驾驭。激进政策最多只能用于自由化和宏观稳定方面。只要政治和金融状况许可,制度安排和结构改革的某些方面可以采取激进的方式,否则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变革最多只能为将来创造初始条件,而渐进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取而代之。因此,实际的政策问题是在转轨时应当选择有组织的还是无序的政策措施?换句话说,转轨的实施是有意的设计

还是偶然所为？如果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最常为人们所引用（也是最错误的）的“休克疗法”——也就是波兰在 1989—1992 年实行的政策，就会发现，以激进的方式推进自由化加速了早期已经改革的进程。于是它先是因一些偶然因素引起无序发展，只是到后来，特别是 1993—1997 年，它才被有组织、有意识设计的方式所取代。

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就这种转变所作的结论非常有趣^①。他说：“您已经尝试对具体政策构件进行更精细设计，而不是以笼统的慢速度（‘渐进主义’）来定义大的改革（big bangery）所采取的方式，我对此感到特别高兴。关于您所界定的所有上述具体术语，当然包括保护和私有化，我表示赞同。回想起来，我实际上当时就已经赞同您了……不过说实在的，我得承认，如果我处于巴尔塞罗维兹（Balcerowicz，1989—1991 年期间任波兰财政部长）的位置，我可能不会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为波兰所需要的那些重要的配套方案组合在一起，而这些方案为您任职期间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许有必要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使您的同盟者们能够承认世道已经变了，给您纠正他们过度行为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使他们接受新的模式？它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国家的情形：我更倾向于布莱尔而不是撒切尔夫人，但我确信，没有撒切尔夫人就没有布莱尔。”因此，为 90 年代初采取的一系列不成功的激进政策进行辩护的一些重要论据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非经济意义上的。不过，在关于激进措施的范围和成本的评价问题上，人们还有分歧。仅仅是像有些人至今仍然相信的那样只是“有一点过激”，还是像别人（Kolodko，1991；Rosati，1994；Poznanski，1996）所证明的走得太远了？

^① 引自与作者的私人交流。

关于术语和政策选择还有许多混淆之处。沃尔夫(Wolf, 1997)曾就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些条件和判断标准及其对转轨战略选择的影响进行过思考——从开始中央集权计划的年份到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从与最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距离到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即使是波兰在1989—1990年采用的也是渐进的方式,激进的方式到1991年才开始。其他采取激进方式的国家是1992年后的阿尔巴尼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以及1993年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按照这种分类,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激进的道路再回到渐进的道路,也没有国家从渐进的道路回到滞后等待,其中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反之,科尼亚(Cornia)和波波夫(Popov, 1998)则把越南视为休克方式的典型,主要是指其快速放松价格管制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们因此而将俄罗斯和乌克兰计入实施“非连续休克(inconsistent shock)”战略的国家之列,也就是迅速放开价格,但却未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所有这些辩论并非无关紧要。在某些人看来,所谓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①是一个很好的文字游戏,因为“休克”这个概念已经与“疗法”这个概念结合了,要想让它们分开可不太容易。但是,当一个开始转轨的国家休克过猛时,是几乎没有什么疗法可言的,波兰在1989—1992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人们应当引入一个新的表达式,即“休克失效(shock failure)”。按照推理的方式,如果有“休克疗法”的话,对称地也应当有“休克失效”。更进一步,如果有“休克疗法”和“休克

① 与“非连续休克”不同,“非连续休克”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

失效”的话,也就有可能碰到“渐进疗法”和“渐进失效”(表4)。

表4 市场改革与向市场转轨:
渐进主义、激进主义及其成功与失效

| 市场改革 | 向市场转轨 |
|---|---|
| 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 | |
| 有意设计(有组织)与偶然所为(无序的) | |
| 渐进的 (从50年代至1990年的南斯拉夫,70年代和80年代匈牙利和波兰;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 | 1. 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 渐进的(90年代的独联体国家,所有东、中欧国家,但波兰是1989—1991年) 或激进的(休克)(1989—1991年的波兰,1996—1997年的俄罗斯,1997年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2. 制度改变 渐进的(除了前东德) 3. 生产力的微观重组 渐进的(所有国家) |
| 经济和政治变革 | |
| 有限的经济变化/ 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 (70年代和80年代的东、中欧国家以及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 | 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 (90年代的东、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以及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如波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除外) |
| 成功(治疗)或失效 | |
| 渐进式改革成功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与越南) | 渐进式成功(90年代的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斯洛文尼亚、吉尔吉斯斯坦) 渐进式失效(90年代的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
| 渐进式改革失效 (80年代的东、中欧) | 激进式失效(1996—1997年的阿尔巴尼亚) |

利用这种分类和术语进行划分,再加上早期改革和转轨前10年所表现出的特性,就可以对描述过程中的具体情形进行指认。例如,俄罗斯(当时它还是前苏联的核心)在80年代

的情形就是市场化,然而程度有限,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没有根本性变化。它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最终证明彻底失败了。后来,也就是1990年之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且转轨的全部三个方面——也就是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以及产业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都以渐进的方式实施,尽管有人称之为“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所进行的激进式改革”(Nelson 和 Kuzes)。不过,考虑到90年代的经济表现非常差劲,这一转轨也应当被看作是失败的,至少从中期的观点来看是如此。

中国的情形是在过去的20年中朝着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同时伴随着不容忽视但非常有限的政治自由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不能被看成90年代后苏维埃和东欧国家意义上的转轨。这些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上已经是最为成功的了,特别是与前苏联和经互会其他国家早期所进行的改革结果比较起来就更是如此。无疑,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越南也是如此——得益于这些改革。同样清楚的是,90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的崩溃则与对转轨进程的管理失误有关。因此,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轨失败的典型例子。

就波兰的情况来看,虽然早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的确有助于后来转轨的成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革最终还是失败的。由于先前改革旧制度努力的失败,就在这个国家,向市场的转轨终究已经启动了。随之,就有了1989—1992年刺激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激进式措施,这些措施至少部分是失败的,在将预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3%与1989年中期至1992年中期实际20%的严重衰退相比较

时,就更能发现这种失败^①。

后来,由于实施著名的“波兰战略”计划(Kolodko, 1996),经济自由化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已经转为渐进主义并取得成功,通货膨胀水平在1994—1997年间下降了2/3,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28%。至于制度变化,从转轨开始时就是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的。当然,这些变化应当被看作是80年代改革中变化的深化。因此,在经历了90年代早期的一些动荡和管理失误后,转轨在1993年之后就变得相当成功了,这主要反映为市场制度安排的进展以及在转轨经济和整个欧洲国家中所拥有的最高中期增长率。

还有其他形式的变革。例如,罗马尼亚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市场化的改革,并且,由于政治改革滞后,早期转轨也再次失败。困难重重使人们越来越相信应当加速变革,从1997年才开始尝试激进的转轨措施。在某些难以明确界定的更具体的情形中,可以看到另一些特性。虽然苏联不复存在,但在某些国家中旧制度的残余仍然较新制度的特性更占上风。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就是如此,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1996和1997a)的转轨计分牌,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些年中很少变化。在白俄罗斯,经济变革已经放慢和推迟,经济管理有点类似于先前苏联政策的方式。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私营部门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因此,其市场化变革需要再大大向前推进才能认为这些国家是真正的转轨经济。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今天似乎是成功的典范,

^① 在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下,政府的预期是:只出现时间持续1年的温和缩减,随后出现快速恢复和增长。错得更严重的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实际通货膨胀比官方预计的要高好几倍。

明天也可能转为失败,而现在看来还不能确定为是转轨,说不定将来就是的。所幸反之则不然。以提高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效率为目的的早期改革进程发展到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和越南就处于这个阶段。以此为背景,在一个极端是后苏维埃和东欧经济,它们不同程度地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另一个极端的国家已所剩无几,仅有古巴和朝鲜,它们甚至连有限的市场改革也还在推迟。因此,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正在经历着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到恢复资本主义的挑战性历程。但走向何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则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

1.7 转轨目标:幻想与错觉

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历的转轨期只是短短的瞬间。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在变化之中。对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后果的早期设想的演变也是如此。与人们非常熟悉的转轨启动不同,人们对转轨的目标并不清楚。从心理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似乎社会各方面只是热切地希望摆脱旧制度的束缚,并天真地设想未来将会更好。人们抛弃了已知的“坏处”,而接受了未知的“好处”。人们相信,未知的将来迟早会比平庸的过去要好得多,并设想市场经济的建立会使这种信念成为现实。然而,对于这种设想从来没有细节的描述,通常只是简单地指称市场经济,或者再加上一点西方国家的特征。

社会市场经济、人民资本主义、公民权、民众私有化、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快速增长、更高的生活标准等口号,代替了将会在转轨过程中显现的新制度的整体蓝图。关于目标的种种设想更多的是从别人的经验(首先是当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

的特征)而不是从自己的能力和约束条件中推演而来。邻国在预期的形成方面也有着特别的影响。因此,具体的示范效应影响着转轨国家及其统治阶层的心态。对目标连贯设想的缺乏——加之对工业化国家历史演变的忽视——被代之以错觉,这种错觉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和成熟公民社会的经验而非切合实际的测算和现实的情景描绘。

转轨所需时间跨度的缩短对于预计的实现转轨目标的途径有决定性影响。这在心理上是理解的,在科学的基础上看则是不能接受的,在政治上更具有风险性。转轨初期的危机带给人们的痛苦经历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并导致人们重新审视最初的设想。政治性争论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学术上的辩论,这一情况持续了好几年。这种争论的气氛不利于冷静、系统和理智的思考,因为大量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决非偶然的是,如此众多的教授、作家和著名律师涉足政坛并成为部长甚至国家首脑,在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马其顿和罗马尼亚都是如此。1994—1997年的波兰政府中的教授数量比80年代军管政府中的将军数量还多。人们对第一次的制度变革越失望,这种意识就越强。对未来几年设想的不现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生产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当然,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预期新的现实条件会更健康,并相信将很快取得快速增长。然而,这种设想即便是在情况最好的国家里也会很快导致政治上的挫折。过高的预期不是建立在实力和相应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在某些情形下这些只是幻想,在其他情形下就可能直接导致骚乱,而对于未来的设想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改革的国家中人们对加速变革所抱的预期还比较合理的话,那么在那些有着令人吃惊的转轨推动力的国家中,则更有革命的气氛。问题的关键

在于,人们只是想尽快摆脱旧制度,然后才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与解体能使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这种预期被新的政治精英们有意识地加以强化。他们将这种夸张的预期作为赢得支持变革的道义力量的一种手段。不幸的是,尽管在早期已有了对这种天真想法的一些警告,但错觉仍然广泛流传。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学术和政界人士也普遍相信这一点,并对他们推动转轨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1989年,关于跳跃式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式错误建议就开始在波兰流行了。90年代初期,德国当权者中也已经有人对增长过于乐观。他们期望以远比实际代价要低得多的成本来迅速改变前东德的5个地区。对增长的过分乐观还可从9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组织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会重新复苏经济增长的预期中略见一斑。1997—1998年,在有了休克疗法的失败教训之后,对缩减调整和增长复苏时间过于乐观的毛病再度复发,这一次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仅是两国政府,而且国际组织和自由金融报刊也都对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激进计划头脑发热,尽管他们的设想——特别是关于私有化和稳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在整个地区,从各类政治纲领中都可以看到不切实际的预期和承诺。不仅人民党,而且务实的党派也总想比他们所能提供的承诺得更多些,即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是如此。

第二个原因与想象有关。这就是关于预测经济制度和水平会很快与发达国家看齐的错误想象。这种错觉似乎很流行,至少在东欧是如此,在与西欧一体化中受益的幻想与日俱增。转轨没有被看作是建立一个有着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机制和收入分配方式的新制度的困难过程,而被简单地看作是迅速变成一个富裕国家。没有关于变革将既费时成本

又高的警告,有的只是可以快速转轨并且转轨可以使人们迅速致富的幻想。人们下定了要消除工业化国家与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差距的决心,但却又没有根据地认为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只有到后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富人是少数而穷人是大多数的情况在转轨期中要比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在人们看清这一点后,上述的早期天真才收敛了,虽然并未完全消失。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讲,金融扭曲可以通过在价格快速自由化的同时实施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最后消除短缺膨胀综合征来得以纠正,并且设想不会出现严重的紧缩。在提出与自由化和稳定化措施相一致的政策措施之后,政府或支持其政策的国际组织和私人智囊团在预测衰退的范围方面还从未成功过一例。不幸的是,人们首先迎来的是萧条膨胀,而不是从短缺膨胀过渡到动态平衡和市场出清价格,随后,在开始恢复和增长之后,又转变为停滞膨胀。通货膨胀和短缺的痛苦指数被代之以更高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指数。因此,转轨早期的结果是从短缺膨胀到停滞膨胀。

深度收缩的同时伴之以大规模的失业是所有转轨经济都曾有的痛苦经历。不过,对其中许多国家来讲,这种负面休克(定义为没有治疗作用)还要更强烈一些,因为其中至少有两代人从不知道公开通货膨胀,也从未碰到过失业问题。因此,公众认为他们从一种危机走向另一种危机的想法是合理的。扭曲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典型痼疾转变为扭曲的市场经济疾病,或者说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联的失衡被代之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非均衡。

第三个主要原因与一系列错误的转轨政策有关。这些政策的执行使社会不得不为调整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穷困化和生活水平恶化就是这些错误政策的直接后

果。尽管这一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但已经发生了。产出总量减少,消费水平下降,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增加,并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当大部分转轨国家最终走上恢复之路而某些领头转轨的国家已经步入持续发展轨道^①的时候,还有另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教训是否已经被吸取了?如果回答是正面的,那就还有一些乐观的余地。确实,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可以永远相信这一点,但其残余的影响还存在。

要想在以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为纲要的舞台上解决遗留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架构内实际上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样。从市场制度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到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中国和越南,再到市场力量只是对中央集权的安排和政府主导的政策起辅助作用的国家如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限制现在正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挑战的唯一办法是一方面约束过高的预期,另一方面逐渐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生活水平。只有由恰当制定的长期政策来管理并经过精心规划的转轨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平衡。假以时日,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这一设想就能够成为现实。

设想从危机中的传统社会主义迅速转轨到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是转轨早期最大的错觉。虽然为这些错觉所交学费的大部分已经付出,但还有其他的坏消息。尽管在结构调整和稳定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可恢复和增长仍然乏力,稳定

^① 这里,“持续”概念的含义是指稳定而持久的增长,不过这类增长应当与更广泛意义的增长相一致,例如自然环境标准的提高和非再生性资源的保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b)。

也并未实现。因此,对转轨的社会支持还很脆弱,并且可能不会持久。如果转轨要取得成功——有大量迹象表明这可能成为事实——就必须让经济走向持续增长。唯有如此,更高的生活水平才有保证。

平和地处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是有可能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特别是波黑和南斯拉夫联盟,以及在不同时期的前苏联各国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是一些例外。不过,这种地区冲突是由非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应当强调的是,后社会主义转轨前10年的平稳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原来关于整个地区出现爆炸性局面并导致流血冲突的预计并未成为现实。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挑战,就是局面失控,传统社会主义解体的代价可能甚至比已经付出的还要高得多。但就经济方面而言,考虑到将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不同的起点

2.1 地缘政治：出发点和目的地

还有一些东西引起了许多后社会主义观察家们的注意，这就是所在的次区域和国家集团在向市场转轨中的作用。这些特性不仅是指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留下的结构与制度遗产，而且也指它们的地缘政治位置。到 1997—1998 年，虽然转轨经济的总体状况要比头几年好得多，但关键的挑战性问题仍然依旧。这其中许多问题就与转轨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并涉及范围广泛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

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7 年的年会前夕——这个组织是为促进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专门成立的,有人强调指出:“尽管人们感到失望,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欧洲大陆正在慢慢地变得更安全、更富裕和更有希望。即便像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举步维艰的国家也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向前推进。波罗的海地区不再那么脆弱,高加索山脉不再那么喧嚣,巴尔干半岛也少了一些血腥味(《经济学家》,1997b)。”显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东欧成员国看来都要比以前更加开放并更加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因此,尽管困难重重,但形势的确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尽管情形多种多样,仍有很多人尝试把这些国家划分成几个集团。就转轨而言,这种分类不那么容易。如果不只考虑粗线条的划分,而想更细致地描述的话,这种分类就更困难了。即便所有方面都相同——不过事实决非如此——地缘政治情形在此方面也明显存在问题。与殖民时期、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诞生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相比,由于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商品自由贸易、创纪录的资本流动、劳动力的大量迁移、技术的快速转让、世界电视网、全球网络村等等,世界版图上的经济地域已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从地方、区域和全球经济及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的地缘政治位置是影响其重要特征的固有因素。尤其是如果从投资联系、贸易方式、在区域组织中的成员关系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最终目标就不仅取决于它们已经做了什么和将做什么,而且还取决于它们处于什么位置。

有些作者相信地理位置与增长关系重大,并试图用这一因素来解释发展能力(Gallup 和 Sachs, 1998)。既然政策不能改变地理,因此若干处于相对不利位置的国家就注定要比别

的国家差劲一些。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阿尔巴尼亚就该兴旺而吉尔吉斯斯坦就该衰落,古巴应当繁荣而蒙古应当停滞。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不应夸大地域化的意义,在当今世界尤其如此。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其政治上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的例证当属波罗的海三小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都更多地利用其在政治意义的地位而非严格地理意义上其所处的地域。

当然,当一个国家更靠近发达国家市场时,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也更为合理,例如匈牙利或捷克共和国就属这种情形,它们比像哈萨克斯坦或老挝这样的国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理位置^①。

在某些情况下,多少世纪以来给经济带来许多问题和挑战的不利地理位置如今反而成了积极因素;如波兰,它现在有很大机会利用它处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位置,又如斯洛文尼亚,它正明智地利用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比邻优势。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使形势恶化了,例如欧洲的马其顿或亚洲的塔吉克斯坦。

然而,这种约束不能作为缺乏全面结构改革和推迟制度变革的借口。它应当促使一个国家更加努力地开放经济从而与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这正是蒙古的情形,与中亚其他一些国家(如土库曼斯坦)一样,它的地理位置也不太有吸引力,但与这些国家的情况相反,蒙古早已实行了自由化政策。

^① 过去也曾处于有利的位置,今天可能已经毫无意义。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曾位于跨大陆的丝绸之路,而罗马尼亚曾处于欧洲丝绸与琥珀之路的交叉点。从地理位置看,两国在各自大陆中都处于中心位置,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现在都处于边缘地区。因此,问题在于将来的丝绸和琥珀是什么。

不具优势的地理位置可以由健全市场改革和推进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坚定决心和更有效的努力来弥补。正如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一样,不好的地缘政治形态可以配之以更好的政策设计。相反,如果政策错了,即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也可能成为绊脚石。斯洛伐克就是这样,它没有像捷克共和国那样被邀参加与欧盟的协商,或者更典型的是白俄罗斯,尽管国家要大得多,但是得到的外援却非常少,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比其北方邻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要少 2/3。

自然,与邻国的一体化比与远地的伙伴扩大联系要容易一些。一般说来,近邻应当密切经济联系,但事实上并非总能实现。激进的、面向西方的贸易方式的转变有时是由政治偏好而非比较优势所推动的,因此而导致东欧及前苏联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崩溃。例如,白俄罗斯与波兰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但后者向前者的出口份额仅有少得可怜的 1%—2%。多年来,前苏联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也被打乱了。在生产紧缩时期,传统市场反而让给了外国竞争者。以后要想再恢复贸易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就很困难了——即使还有可能的话。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与远地的国家建立比与直接的邻国更为密切的联系也许是可行的。例如,经互会时期苏联与古巴之间的联系(Roca, 1988),日本与巴西之间的贸易及对该国的投资,中国在南非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或者在美洲自由贸易协定(AFTA)下,随着自由贸易制度的进展,美国与智利之间正在推进的一体化等等,都属这种情形。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类交往活动(不仅是贸易,也有直接投资),尽管它们不属同一区域。东南亚国家在东欧国家的扩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东欧的解体及其政治后果导致了苏维埃式国际合作的终结。另一方面,这一真空不仅

被来自西方邻国的资本(现在也是政治朋友),而且也被来自远方国家的资本所填充。它们足够富裕,能够用闲置资本进行投资,并将转轨的挑战视为扩展其业务的新机遇。但是,尽管全球化得到很大发展,转轨国家不断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有一些制约和限制的作用。考虑到上述两个方面,当前的全球趋势、后社会主义变化的特性及转轨的地缘政治都在先前联系的根本性重构以及为新联系的打下基础方面起着作用。它既是转轨进度的催化剂,又影响着它的结果。因此,它将最终影响着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特性的多样化。

在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内,有一种强制(不过在长时期内非常有效)机制可以达成某种结构统一,它形成了类同的经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古巴与越南,蒙古与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区别,因为历史、文化和地理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它们就是不同的。但是,作为几十年政策导向变化的后果,统一制度安排的倾向和协调发展政策的努力终于产生了效果。长期的努力导致了经济结构的雷同。因此,由于在经互会组织中的合作机制和贸易联系,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其工业领域的实际经济结构不是支持和互补型的,它们由于常常生产类似的商品而变得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这些结构不是相互替代,而是彼此冲突。

由于持续的短缺减轻了消费者追求更高标准产品带来的压力,因此,与市场经济不同,这种类型的竞争并未导致产品质量的改善。中央计划未能像其鼓吹者所宣称的那样使实际经济结构实现多样化。到了后期,专业化生产非但没有得到深入发展,结构统一化的过程仍在继续,其与外部经济及经互会伙伴进行竞争的能力在总体上处于衰退之中。因此,这曾

经被大加称赞的国际合作,尤其在工业化早期及随后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在转轨开始启动时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构性负担。

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开始寻求发展的多种途径,而且开始探索在奔向美好未来过程中寻找新的伙伴。几个东欧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即中东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①,同时,也开始积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在东欧,很自然的首先是与本洲西部的国家联系,与此同时也努力实现自己内部的一体化。就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来讲,明智的做法是谋求与其近邻的新联盟,包括中东,而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来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日本,当然还有中国都是关节点。如果说某些国家要建立密切的联盟只需跨出国界的话,如奥地利之于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芬兰之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或者泰国之于越南和老挝,那么,一些独联体国家就注定在初期就要与俄罗斯或在相互之间打交道了——虽然是在新的规则之下。所有的独联体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就是这种情形。在建立新型的贸易联系方面,它们的确比别的国家经历了更长的艰难探索历程。东欧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过,从独联体国家相互关系的角度以及这个群体与外部远方国家联系的角度来看,它们克服上述困难要走的路的确要更艰难一些。

在前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与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的贸易联系都是通过国家进行的,并由莫斯科的中央政府管理,因此,后社会主义经济新兴市场之间联系的建立常常必须

^① 中东欧自由贸易协定最初的创立者是所谓 Vishegrad 集团,即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分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后来,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自 1996 年后加入,保加利亚在 1998 年加入。立陶宛也在谋求加入该集团。

从零开始。前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还有一些直接的经济合作,而例如摩尔多瓦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就没有。如果说蒙古和罗马尼亚之间还有一些直接贸易,那土库曼斯坦与罗马尼亚之间就没有。

除俄罗斯之外的独联体国家共同体成员国所陷入的困境就像一个刚刚离婚男人的处境。他终于自由了,但同时还不得不与他长期共享寓所的原配妻子同处一个屋檐下。他有心另娶新欢,但她却地处遥远,而他暂时还无力开支。即便他确实非常诚实,并完全信守新的制度安排,而传统的习惯、遗留的结构,特别是过去的地址却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但是,将独联体国家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放在一边,自由化和私有化已经为与邻国的各种金融、投资、贸易和技术联系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和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对所有的新兴市场有一种自然渗透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土库曼斯坦的大量外国投资来自土耳其,拉脱维亚之从瑞典,越南之从澳大利亚,匈牙利之从奥地利,马其顿之从希腊,或者斯洛文尼亚之从意大利也都是这样。对于波兰和克罗地亚来讲,要想从北美或日本、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英国或西班牙引入资本和技术,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小国家如马其顿和摩尔多瓦面临类似的困难,和大一些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但是,将芬兰的资金和技术引入爱沙尼亚较之引入阿尔巴尼亚,出口伊朗商品到亚美尼亚较之到波黑,或者将奥地利的投资引入斯洛文尼亚的旅游业界之引入吉尔吉斯斯坦,都要容易得多。

上述状况看来十分明显,但还应当明白并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会对转轨的方向和结果有影响,而且观念与文化的交流也如此。在此,地理位置又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捷克共

和国就比乌克兰更易于跟欧盟一体化,这不只是因为前者与西欧之间的产出差别比后者的要小,而且还因为这个国家与德国和奥地利比邻,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只是因为地理原因,越南就比自由化程度高得多的蒙古更容易加入东盟,因为前者就在东南亚,而后者位处该地区的最中部(这也意味着最遥远)。结果,由于地理因素而非仅仅出于政策选择,越南就可以利用这种成员关系。

某些国家的选择不一定也是其他国家的机会。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像古巴、吉尔吉斯斯坦、波兰和越南这几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过去同属于经互会成员国,现在却都将分别成为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独联体、欧盟和东盟这些不同组织的成员。因此,从转轨的最终结果及对其发展的意义来讲,地缘政治因素即便不被看成是决定性的,也应当说是非常重要的。蒙古勉强可以申请加入东盟,但却不可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保加利亚以后可以再尝试进入欧盟,但不会考虑成为独联体的成员。这就是转轨的地缘政治。

2.2 经济体制和结构

尽管人们不断努力想用同一模式来规整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现实却走了不同的路。将这些国家规范在共同标准下的政治诱惑被谋求发展一些具体特性的实际过程所抵消——这一过程因为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对其社会主义前途的不同设想以及政治领导人追求的目标等方面的因素而得到了强化。在指令性经济和一党专政下,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在推进统一化的政治力量之后,还有理论和理智上的考虑。东方和西方都试图将社会主义国家归结为一个集团,或者最多两个阵营。一个是苏联领导的联盟,另一个则以中国

为首。在东方,这种分类强调的当然是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指的是它的落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在东方被作为好的事物,在西方则被视为恶魔,却全然不顾这些国家彼此不同的复杂特性。

在东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70 年代由苏联主导出台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这一想法是要加快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并加深经互会成员特别是东欧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除了罗马尼亚之外,所有这些国家都急于遵循这一设想,甚至相互之间展开竞赛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当然,这种政治野心可以反映在政策之中,并极大地影响了制度设计和结构形成的方式。换句话讲,与多样化的自然倾向相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仅被作为强化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而且被作为统一制度(例如其组织、结构和政策)的工具。

一般来讲,在广义上人们可以指出有许多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表 5),但在谈到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点问题时,注意力则主要放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义上,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西方常称之为“共产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转轨指的就是从国家所有制占支配(或垄断)地位、且中央计划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央集权经济的转轨。从这个角度来讲,进一步考虑的经济模式就仅限于在苏联式经济、东欧经互会成员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以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必要时,也提到古巴(经互会成员)和朝鲜(非经互会成员)的情况。当然,分类的依据是基于制度特征而不是地理位置,虽然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特定阶段及因之而产生的冷战时期也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古巴之间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多于阿尔巴尼亚与其邻国南斯

表 5 社会主义的类型与程度

| 公有制 主导 | 平等/ 社会消费 | 参与 和经济民主 | 对经济过程 的社会控制 (计划) | 例 |
|-----------|-------------|-------------|------------------------|---|
| 是 | 是 | 是 | 是 | 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想 |
| 是 | 是 | 是 | 否 | 完全的共产主义理想:集体所有制,“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国家“消亡” |
| 是 | 否 | 是 | 是 | 南斯拉夫理论:“社会”所有制,地区与企业间的不平等,自我管理和协会,宏观控制 |
| 是 | 否 | 否 | 是 | 苏联式计划经济:国家、地方和合作所有制,非“uzavnikovka”(收入水平),“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
| 是 | 否 | 是 | 否 | 南斯拉夫实践,即缺乏宏观控制;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 |
| 是 | 否 | 否 | 否 | 1989—1992 年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剩余国有行业;不平等;非经济民主;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和深度衰退 |
| 否 | 是 | 是 | 是 | 社会民主理想:私有制和企业,平均主义,风险集体化,经济民主,高而稳定的就业 |
| 否 | 否 | 是 | 是 | 奥地利式的新企业主义:私有制和企业,不关心平等,利益集团代表,收入政策和凯恩斯宏观政策 |
| 否 | 是 | 是 | 否 | 社会民主模式的淡化版本,对经济放松管制和温和的国家干预 |
| 否 | 是 | 否 | 否 | 福利国家,自 80 年代末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名义参与,大规模失业的出现 |
| 否 | 否 | 是 | 否 | 德国式的共同决定,如工人在某些行业的少数参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竞争 |
| 否 | 否 | 否 | 是 | 法国式的指导性计划;基于对准合同的实施达成共识、透明度、刺激性条件之上的一般公共政策加上国家经济预测 |
| 否 | 否 | 否 | 否 | 完全的资本主义[包括经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和混合经济] |

资料来源:Noti, 1992。

拉夫的共同点,也更多于朝鲜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共同点。尽管它们处于三个不同的大陆。在此,紧要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取向。

由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国从社会主义转轨的起点是不同的(Cornia, 1997)。发展水平、制度构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政治制度、文化及变革的气氛等情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贸易方式的扭曲^①。虽然社会主义已在同一方法下被反复分析过,但其差别是很大的。实际上,是政治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才得以将所有这些国家归于同一阵营之中。在转轨前夕,人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群体的观念仍然依旧,虽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与阿尔巴尼亚或蒙古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相比,匈牙利和波兰更像阿根廷或马来西亚式的市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东欧,一方面,有着匈牙利和波兰的经济改革以及南斯拉夫自治和分权的特色制度;另一方面,也有着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虽然后者与西德有着特殊联系。苏联式的经济体也已经不再单一。中亚共和国和蒙古有指令经济和欠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而波罗的海国家则更发达一些。在亚洲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将中国与其中最贫穷的国家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相比,其制度和发展水平也不相同(Dodsworth, Chopra, Pham 和 Shisido, 1996)。

因此,由以前制度的结构、制度和政治特性所形成的负担并不相同,遗留下来的好的方面如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收入平等也不一样,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有差异。

^① 波波夫(Popov, 1998b)指出,转轨经济的不同表现有 2/3 以上可用这两个因素进行解释。

矛盾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些被认为是有利于市场化过程的东西反而被证明不利于它的成功实施。例如,波兰就与其他国家不一样,集体化从未成功过,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农业一直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1989年,约有80%的农地为私人所拥有。但在转轨开始后不久,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其他国家出现了相对较好的情况。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强制集体化不仅导致国有和集体农场占主导地位,而且使农地得以集中,因而效率更高。对于效率和劳动生产力来讲,农场的规模、结构、资本投入以及管理方式比之所有制形式更为重要^①。

就积极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金融与经济机制。重要的是细节,是确定分配决策的中央计划机制所采用的具体办法。这种机制从来就不是统一的,市场化改革越深入,它就越多样化。在某些国家,它们走得很远——尽管实践证明走得还不够远。1998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配置,其市场改革比前苏联曾进行过的也更加深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说,例如在10年前(转轨前),马其顿(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离资本主义的希腊比离其另一个近邻——正统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距离更近一些。

与南美或北非的一些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相比,80年代末的波兰与齐奥塞斯库政权后期的罗马尼亚之间的差异更大。波兰实际上是一个私营业份额不断增长的混合型经济,而罗马尼亚的国家所有制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前者有50%以上的价格在1989年就已经放开了,而后者的所有价格都由中

^① 这些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迟至90年代中期,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除结构和制度方面外其情况类似,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几乎相同(分别为6.0%和6.6%),但后者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几乎比前者高两倍。

中央政府来制定；前者已经建立了反托拉斯组织并实行竞争政策，而后者则为严格的国家垄断所支配。如果说波兰在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某些行业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话，罗马尼亚经济对于与外界的这种联系是严格封闭的。如果说在 1989 年年初前者已经实施了首次汇率自由化，其外汇黑市也已不复存在，后者则对所有的货币交易实行严格和严厉的控制。以上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多样化的实质范围进行更广泛观察的若干例子。可见，人们不可用过于简单的方式将它们混为一谈，它们绝非如此。

某些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或南斯拉夫，在 80 年代就已经建立了两级银行体制，而在其他国家仍然是大一统银行独领风骚。到 90 年代初才建立与中央银行分离的商业银行体系。转轨开始后，在改革最为深入的国家，货币制度的弹性制度引入较早，其他国家则较迟一些。然而，存在的最大不同是国有行业的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那些改革最为深入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在这一程度上讲还有保加利亚和东德），公司更加独立于国家政府的影响，并可自己管理其业务经营。从转轨的经济与政治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越分权化和自由化，转轨初期的管理和政策实施就越容易，向全盘市场化制度转轨的起始位置就越有利。

导致这种结论的思路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而言，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显然注定将不复存在。如果说这种观点在霍查政权下的阿尔巴尼亚比较普遍，或者直到 1989 年春天这种观点还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是比较荒谬的话，在匈牙利却的确如此，波兰也绝对是这样。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包括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有改

革心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准备让这一面临改变的制度“安全着陆”,并尽可能顺利地起飞以奔向未来的市场制度。

即使没有公开承认,一些改革主义者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也意在出现这种结局。他们在转轨初期做了大量工作,没有这种努力,大量的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在匈牙利和波兰,精英们为转轨开始所作的准备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优于别国。无论如何,概括而言,早期改革与近期转轨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Kolodko, 1989b; Csaba, 1995; Poznanski, 1997)。应当清楚地注意到,连续性越多,国家转轨时的绩效就越好。因此,为转轨的政策和管理所准备的知识和政治基础越多,后来制度变化的整个过程就越顺利。这不仅是从过去改革先锋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也是为目前还滞后于转轨的国家所提供的政策建议。有些国家如中国和越南已经表明它们能够及时吸取教训^①。有些国家如古巴和朝鲜到目前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另外还有些国家如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仍有机会从中学到很多。

2.3 金融动荡和短缺膨胀综合征

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中,金融系统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直接分配机制中比较典型的是指令性分配机制至上,金融安排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它——反之则不然。但即便在这个方面,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在市场化改革更为深入的国家,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不只是被动地起着计划程序工具的作用,对于实业领域的影响也在加大。因为财政和货币过程更

^① 这些国家也从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学习,尽管该地区最近发生了危机,还有更多的政策结论有待总结(Stiglitz, 1996)。

趋向自动调节,而金融的均衡被置于政策目标的较高地位,一些国家引入了意在对国有部门实行有限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信贷再分配以及现金流动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还是在中央计划的范围内,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些改革被认为可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些过程开始失去控制。

与政府的愿望和预期相反,按这种方式运行的金融机制有一种导向非均衡的顽固趋力。这反映在遍布于整个经济的各种不平衡之中。在明确了中央计划已无力治疗这种制度痼疾后,部分的和受到控制的自由化就开始出现了。起初,由于适应市场信号和外部冲击的灵活性与能力在增强,效率有所提高。这些都有益于更好地分配资源及中期的经济发展。

后来,由于政策失误以及指令与市场工具之间的不协调,非均衡又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加大。这不仅仅因为消费品和服务供应短缺,而且还因为资本物品、劳动力和外汇的缺乏。这一病症对国内市场和出口行业都有影响。财政赤字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独联体和东欧在1990年的赤字(中央政府平衡表)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公债(包括外债)也在上升。整个集团的外债总额从1989年的154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700亿美元。还本付息额从220亿美元增加到340亿美元,其比率从10.9%上升至18.1%。外债总额占出口总值的比率从77.0%上升到89.8%。由于出口严重收缩,1991年,这一比率又从89.8%跃升至122.3%,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波兰就已经濒临这种情形。

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后期,国家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组。一组是严格的、传统的指令型经济,其货币流服务于商品流。由于不平衡的积累以及短缺的增加,价格僵化。第二组以建

立市场机制为目标,但仍然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并日益为公开的通货膨胀所困扰。长期以来,政府试图以一些主动的供给措施求得平衡,如增加产量。在这一措施未能奏效而价格下降导致短缺加剧后,升调物价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供给没有增加,而是通过减少实际收入(特别是居民家庭收入)抑制了有效需求。

于是对价格进行大幅度的向上调整。这是作为一劳永逸的措施而有意为之的,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循环又开始了。这主要是因为非均衡的结构根源依旧,主要是过度需求——这与市场经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由此,市场化的政策设计者们决定消除这种价格格局以利于市场型调整。然而,随后采取的办法非常有限而温和,因此,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变得更顽固了。这压力不断波动,但不会停止。经济越改革(这些改革的关键部分都是集中于价格的进一步自由化),公开价格通货膨胀就越加剧(表6)。

表6 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公开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

| 1974—1983年 | 1984年 | 1985年 | 1986年 | 1987年 | 1988年 | 1989年 | 1990年 |
|------------|-------|-------|-------|-------|-------|-------|-------|
| 中央计划经济 | | | | | | | |
| 3.0 | 3.5 | 4.4 | 5.4 | 5.8 | 7.3 | 18.3 | 21.2 |
| 苏联* | | | | | | | |
| 0.8 | -0.1 | 0.7 | 2.1 | 1.5 | 0.3 | 2.3 | 5.4 |
| 东中欧 | | | | | | | |
| 10.0 | 14.6 | 16.1 | 16.9 | 23.6 | 41.8 | 103.6 | 142.2 |

资料来源:《1992年世界经济展望》,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

* 1989年后为独联体。

在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前夕,各国的形势是不同的。其中一些属于第一组,价格相对僵化,却也因抑制型通货膨胀而引

起大量不断加剧的短缺问题。另一组已经开始转向公开通货膨胀。当然,两组内部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像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东德等国就较少受抑制型通货膨胀的影响,其短缺不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或苏联等国家那样严重或具有对生产力的破坏性。在第二组国家,由于部分放开的价格,也存在着两种情况: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通过用于公开通货膨胀的典型市场手段并上调价格而取得了供求平衡,从而明显地抑制了短缺;而由于政局日趋紧张,波兰则宏观管理失误,导致大量短缺,同时价格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比较来看,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是十分成功的,持续时间也长得多。两国的政策都能约束价格膨胀而不产生短缺,消费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均衡的。通货膨胀似乎因此而得到了控制。相反,东欧的短缺综合征则侵蚀了效率,并由于排队费时、强制替代和令人烦恼的配给计划而勾销了消费实际增长的积极成果。有些国家的价格膨胀相对较高,可短缺却有限。80年代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及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和越南就是如此。但也有的国家短缺严重,公开通货膨胀却很小,如80年代的苏联和罗马尼亚及90年代的朝鲜和古巴。另外还有国家如波兰,严重短缺和高而不断加剧的价格膨胀并存,也就是存在严重的短缺膨胀综合征。

波兰在80年代后期走过的路在一定程度上为独联体在90年代初所重复。在前苏联,强制储蓄自1985年起以加速度增加。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估计当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711亿卢布^①,强制储蓄仅有41亿卢布,也就是

^① 卢布后来在1998年缩水1000倍。

从休克到治疗。

只有总储蓄的 1.1% (EC, 1990)^①。到 1990 年,这一比率跃升到 20.4%,因为前者已经有 5625 亿卢布而后者为 1145 亿卢布。由于这些数据为后来著名的 500 天进入市场经济的计划打下了基础,这些评估就显得更为重要。1989 年底,波兰的通货膨胀延伸量估计是居民货币余额的 25%—35%,或者是其可支配年收入的 10%—12% (Gorski 和 Jaszczynski, 1991; Kolodko, 1991)。

市场出清价格对于运行良好的中央计划而言本来就很重要,对于改革的制度来讲就更加必不可少。事后看来,即便是部分价格的自由化也应当视为推动转轨的积极因素。如果经济在转轨初期处于深度非均衡,平衡起来就更困难了。反之,如果在转轨之前制度已经自由化到这个程度,推进结构改革和市场出清机制的形成就更容易了。有时,如在波兰和匈牙利,两者同时进行,两者的结果对于未来的发展,包括经济恢复所需时间的相对缩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有适度价格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讲(但同时价格调整僵化),形势就不那么有利了,因为它阻碍和进一步推迟了结构改革。因此,它也使恢复和增长被延迟了。

2.4 社会主义经济最后阶段的增长周期和停滞

与最近流行但错误的观点相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曾经历过一段长期的强劲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早期,增长率比其他经济要相对高一些。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扩

^① 强制储蓄被定义为一种通货膨胀延伸存量,计算方法是用实际储蓄总量减本来应有的储蓄量(流量),具体可应用 1970—1984 年的平均储蓄率(欧委会,1990 和 Shatalin, 1990)。

张来实现,不过,投资冲动会周期性地与消费增长的需要发生冲突。由于对劳动力吸收的持续增加,因而与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充分就业是过度需求和低劳动生产力的副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就业人员过于饱和的原因,确切地讲是一种混合的福利。所谓的外延型的增长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注重的是以量来衡量高速增长,而较少关注质量、效益和合理投入-产出关系。

因此,从长期来看,这些有助于加速生产的生长的因素,同样也导致竞争力的逐步恶化及满足社会需求能力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后期的增长常常被看作是徒劳的,因为总投入的增加甚至比同期总产出的增长还要快。这种不协调可以反映为负债增长快于生产增长。负债的形式是外债,或者在缺乏债券市场的情况下表现为强制居民储蓄,或两者兼而有之。结果,随着无效率和非均衡的加深,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逐渐减少。不过,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从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一直是持续的增长。

对投资和生产手段进行集中配置的观念所设想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能更好地为达到增长的目的服务,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这种增长应该快而且顺利。持这一观点者认为,再生产能力会在市场经济特有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丧失。在理论阐述与官方文件中都设想增长率应当比较高——在相同条件下绝对要高于市场经济。同时他们还深信这种较高的增长率应当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出现明显的上下波动。那么,宏观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产出的稳定、快速增长,并因此而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投资支出被作为达成为促进这一目标实现所设计的战略的主要手段。投资的绝对水平及其增长率的波动不仅是容许的,而且被用作稳定增长率的缓冲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波动幅度最大,消费增长速度

变化不大,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更小。

如果速度下降——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加速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后很快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就被指称是因为偶然因素所致,或者由新的领导人承认是由于已经下台的前任的一些政策错误所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和政治上的考虑,与增长率波动的一般方式有关的概念,如周期性变化,是首先被否定的^①。如果经济是中央计划的,它就不可能违背政府的意愿而按周期性方式发展。因此,由政策引起投资交替扩张与收缩而形成的内生机制导致增长率出现规律性波动是不为官方所接受的。

然而,社会主义下的增长途径遵循了交替上升与下降的准规律性周期方式(Bauer, 1978; Gruszczynski, Kolodko, 1976; Kolodko, 1976、1987)。与国民收入不同的是,投资收缩会出现几次,虽然主要是投资增长的交替加速与减速。至于国内生产总值,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从中长期来看,始终是增长的。实际波动的是速率,而不是绝对量,后者一直是稳步上升的。一些增长时期的相对规律性交替——大多持续4年左右,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表7)。

过去,每当出现偏离社会主义的风险(或者是机会?)的时候——如1956年后的匈牙利,1968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或1981年后的波兰,都不是单单靠使用强力来处理的。这只是暂时抑制冲突后果的短期工具,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式是准备长期迎接挑战以提高生活水平。而这一点又唯有通过快速增长才能取得。事实上,在每

^① 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有些荒谬,可作者于1976年在--一个重要刊物上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首篇论文时(它碰巧被称为“Gospodarka Planowa”,即“计划经济”),官方审查时就将标题中的“增长周期”改成了“增长阶段”(Kolodko, 1979)。

表7 中央计划经济的增长周期(1950—1989年)

| 国家 | 周期 NMP增长率(%) | | | | | | | | | | | |
|-------------|-----------------|----------------|----------------|----------------|----------------|----------------|----------------|----------------|----------------|-------|---|---|
| | 1953— 1956年 | 1957— 1959年 | 1960— 1963年 | 1964— 1967年 | 1968— 1971年 | 1972— 1975年 | 1976— 1980年 | 1981— 1985年 | 1986— 1988年 | 1989年 | | |
| 保加利亚 | 6.5 | 14.0 | 6.0 | 9.1 | 7.4 | 8.3 | 6.4 | 3.5 | 5.2 | 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捷克斯 斯洛伐克 | 1953— 1956年 | 1957— 1961年 | 1962— 1965年 | 1966— 1969年 | 1970— 1975年 | 1976— 1978年 | 1979— 1984年 | 1985— 1988年 | | | | |
| | 10.0 | 7.4 | 0.8 | 7.2 | 5.3 | 4.7 | 1.8 | 2.4 | |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德 | 1953— 1956年 | 1957— 1959年 | 1960— 1963年 | 1964— 1969年 | 1970— 1975年 | 1976— 1986年 | 1987— 1988年 | | | | | |
| | 18.0 | 8.7 | 2.2 | 5.0 | 5.7 | 4.4 | 3.3 | | | 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匈牙利 | 1954— 1956年 | 1957— 1960年 | 1961— 1965年 | 1966— 1969年 | 1970— 1974年 | 1975— 1978年 | 1979— 1985年 | 1986— 1988年 | | | | |
| | 9.3 | 11.0 | 5.4 | 7.2 | 6.2 | 5.0 | 0.9 | 1.6 | | 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波兰 | 1954— 1957年 | 1958— 1963年 | 1964— 1968年 | 1969— 1970年 | 1971— 1975年 | 1976— 1978年 | 1979— 1982年 | 1983— 1985年 | 1986— 1988年 | | | |
| | 9.8 | 9.1 | 5.4 | 3.7 | 9.8 | 4.9 | -6.5 | 4.9 | 3.9 | -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

(续表)

| 国家 | 周期 NMP增长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马尼亚 | 1951— 1953年 | 17.0 | 1954— 1956年 | 5.0 | 1957— 1959年 | 10.6 | 1960— 1962年 | 7.6 | 1963— 1966年 | 10.5 | 1967— 1970年 | 7.0 | 1971— 1976年 | 11.5 | 1977— 1979年 | 7.7 | 1980— 1984年 | 4.0 | 1985— 1988年 | 5.4 | 1989年 |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联 | 1950— 1951年 | 16.0 | 1952— 1953年 | 8.2 | 1954— 1956年 | 11.6 | 1957— 1963年 | 6.0 | 1964— 1968年 | 8.2 | 1969— 1973年 | 6.5 | 1974— 1978年 | 5.0 | 1979— 1988年 | 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MP: 物质产品净值

...: 缺有关数据

+: 加速

-: 下降

资料来源: 各年份《统计年鉴》, 华沙: 中央统计局。

次出现这种政局后,总能看到经济明显的加速增长。

长期增长的另一个特征是增速减慢的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在上升,但长期增长速度在下降。显然,在增长周期与维持高速增长的能力之间很少具有相关性。这种机制侵蚀了扩张能力,对持续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央计划经济逐渐失去了增长动力。1989—1990年期间,已经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在经互会的7个欧洲成员国中,1989年的国民收入速度都减慢了,其中以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甚。更重要的是,这次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再次加速增长了。旧制度已经到了尽头,它启动了转轨,并探索一种新的制度以求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快速增长。

如果没有启动转轨,就不可能出现90年代初期那样的严重衰退。如果没有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的政治决定——无论其调整成本有多高,或者说如果不是某些具体情形由于政治原因而使当局对其失去控制的话,80年代后期疲软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许多年。那就不会有机会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而只可能用宏观管理的旧方式将现状再向前推进一点点。因此,也有机会维持增长,不过是持续的低速度。然而,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一起——两者缺一都不足以启动向新制度的转轨,的确导致了增长连续性(特别是旧制度的)的中断。旧制度已经死亡,新制度已经开始显现。

朝鲜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1990—1997年下降了1/3)和90年代的古巴危机表明,类似的情形也会在其他经济中出现——只要它们继续类似的制度和政策。但朝鲜和古巴的衰退较少根源于其经济制度特性,更多的是由于其闭关自守以及与世界经济的隔绝,前者是自我封闭,后者是被强制隔离。不过,人们也可以说情况正好相反,它们的经济之所以停滞正是因为它们融入了世界经济,例如由于经互会崩溃、由于

取消补贴及转为世界价格导致与前苏联的旧贸易安排解体而受到了外部冲击。

就当前的转轨经济体而论,如果它们在90年代开始时没有抛弃先前制度的话,其产出就不可能有大的增长,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如果它们继续走老路的话,停滞的时间或短期衰退的范围就取决于改革的广泛性和所选择的政策。如果改革全面实施的话,产出可能猛增,就像1968年后的匈牙利和1971年后的波兰一样,或者还可以说近期的中国和越南也是如此。如果不进行改革,产出就会紧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思考纯属揣测。事实是我们已经到了转轨的起点。

II

分道扬镳



3

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3.1 经济改革和增长：中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长期的高增长率是有可能的。只要能及时对经济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并且发展政策合理，快速增长可以持续好几年。这两个条件都要具备，缺一不可。一方面，必须对制度进行正确及时的改革，另一方面，在既有制度的局限与可能性之下，实施适当的发展政策是必须的。好的制度本身不能替代健全的发展政策，反之亦然，好的发展政策不能顶替不好的制度。这是同一问题——也就是长期发展能力——的两个方面。与东欧和前苏联转

型前的经历相反,中国和越南似乎都没有忽略这些事实。

这两个国家增长和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和政策操作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相混合的限度内,到何种程度才能获得持续的高增长率呢?中国和越南目前仍然处在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市场改革阶段,还是它们已经像东欧和某些独联体国家那样开始从改革向后社会主义转型过渡呢?然而,得出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樊纲,1997)。因此,如果“转型”这个概念偶尔被用作描述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变革的话(中国就是如此),其含义与那些毅然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不同的。

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上发展政策与制度改革协调配合的最佳范例。国家当权者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或者将其作为选择之一的计划,人们对于在稍长一些的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情形也不应抱有期望。相反,国家领导人对于保留这个制度抱有坚定的决心,并且社会的大多数似乎也支持这一目标。但是,从过去的所有经验来看,人们相信,旧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的僵化现在已经不可能带来健康的经济增长了。

人们充分认识到,要想达到目标,必须进行巨大变革,并应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环境作出重大调整,同时还必须改变本国民众的预期和需要。因此,维护社会主义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其运行方式,不偏离制度的基础,但在国家集权经济的范围内允许进一步的分权和经济自由化。

显然,快速增长的亚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府也吸取了其他经验教训。只有经济快速发展,才有机会维系制度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支持,至少可以对活跃的反对方力量予以中和。如果欧洲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能在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中国和越南这样可观的增长率,是否还会出现我们目前所进行的

转型,就令人置疑了。制度的演变并非因为其为知识分子所需要,为新闻媒体所促进,为国外投资者所欢迎,为国际组织所推动,或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所坚持。所有这些因素只能作为放大主流过程的催化剂,但前提必须是变化已经开始了。因此,真正的变革如果想平和地进行的话,唯一可行的就是它出于领导阶层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只要在旧制度发展的框架内其预期能够达到,社会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就不会急于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按照他们的逻辑就是没有这种需要。再者,根据对其他国家情况的观察,制度更替非但解决不了旧问题,可能还会引发新问题。

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前苏联和东欧的痛苦经历的确是令人丧气的。注意到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半,而中国和越南的加倍,这就很难得出结论说前者的经历比后者的更有助于发展和进步的目的。现在有了相反的示范效应,即消除了向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全方位转型的愿望。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还没有受到“增长疲软”的损害。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实施了积极的国家政策,其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强劲,远未衰竭。但是,如果形势恶化——这种情况可能因外部冲击而发生,则这种对深化制度转型持有的保守态度就会很快变化。转向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甚至向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转型,可以由金融不稳定和增长减速推动。1997—1998年的东南亚危机对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就越南的情形而论,对其现状的讨论不外乎以下几种:……改革有代价,但不改革也要付出代价,由于东南亚危机的恶化,不改革的代价将更高(……)。在强调越南未来的困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政府正在着手启动改革,但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越南经济受到

各方面的冲击。援助者敦促政府制定对银行业、国有企业和外贸进行改革的2—3年计划,并且每年要有重大进展^①。的确,就亚洲社会主义经济的转轨而言,东南亚危机对于其改革进程及增长道路的冲击要大于东欧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影响。

就改革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而言,还有另外三个主要问题。考虑到中国和越南生活着超过13亿的人口,比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共同体27个国家的人口多4倍多,这几个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在没有全方位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否有其极限?回答是在社会主义下获得持续长期的高增长是可能的。达成这一目标的条件是改革被看作改善整个经济和金融制度的连续过程,而不仅是作为对眼前已发生事件的偶尔反应。在技术、贸易和金融相互关联的当代,增长不可能在传统的指令型经济中取得,但却可与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兼容,这一点在中国和越南的例子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只要政府的发展政策得当,获得长期的快速增长是可行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政策必须不被作为制度重新设计的替代品,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半自由化的经济制度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兼容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加困难。东欧改革和前苏联“开放”和“重建”计划的失败表明,这种兼容性是不存在的。在某一点之上(但这个点不易准确界定),如果没有政治变革的话,进一步的经济扩张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长久。如今,对国际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技术与金融联系、信息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大量的劳务移民等重

^① 引自《河内在改革代价上陷入窘境》,《发展新闻》,世界银行,1998年6月16日。

要因素都呼唤着稳步推进政治变革。在开放经济的时代,资本及其国际联系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缺乏民主与其的相反面比较,在后者的框架内利用资本显然更有效益。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特别是在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较为贫穷的国家中,在强大的集权制度下以中央计划来组织储蓄和劳动较为容易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在民主制度下更能取得经济进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尽管采取了一种非常渐进但不算太慢的方式。近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情况,而且其政治制度和社会都较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在党的十五大后改革进程加速并深化了,但变化仍在渐进之中。如果这些变化因此不像后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十分突出的话,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变化可能更有效率。

在中国,经济改革引导着变革进程,而在俄罗斯或一些先行的国家中,经济改革仍滞后于以革命式速度发生的政治变革。换句话讲,欧洲国家的民主化领先于市场化,而亚洲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

接着应当提出第三个问题:除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过去其他国家有过这种选择,这对于今天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当然,任何第三条道路,不管它是怎样的,对于东欧经济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对于如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这样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像白俄罗斯和南斯拉夫联盟这样的落后者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融入已成为该区域特征的后社会主义主流之中。然而,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仍有教训可以吸取。

在独联体国家共同体中,转轨进程相对较慢的几个中亚国家从中国和越南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资本主义的先进知识或者从俄罗斯的后社会主义进程中学到的更多

(Simonia, 1997)。由于种种原因,后两个参照系在此并不适用。但中国和越南改革的一些特征如新制度安排、宏观经济稳定的非正统政策、逐步的贸易自由化、有限的货币控制、资本流动的明显放松、渐进私有化、开放有指导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管理的分权化、支持合资企业、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等等,都是有关政策的良好例子,这些政策比一些制度更为成熟的东欧转轨国家的经验更恰当。

关于转型的一个怪事是,有时,后发要比早到更好。对诸如古巴和朝鲜之类的国家来讲,至关重要的是要同时从独联体国家共同体的后社会主义转型管理以及亚洲高速增长的社会经济成功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90年代中期的古巴尚处于正统的社会主义阶段,仅有很少的改革尝试,明智的做法是同时了解什么行之有效及其原因和什么行之无效及其原因。这里的问题是从别人的经历中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现在,对于落后的古巴和朝鲜而言,有一些例子值得认真考虑:好的值得仿效,坏的应当避免。

古巴和朝鲜在90年代受到了严重紧缩的影响。但是,在后社会主义的衰退和未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者,产量下降源于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而导致的需求约束。在后者,紧缩是由于供给约束和短缺现象。因此,如果古巴和朝鲜在将来的转型中遵循中国或者更适合于它们的越南的模式,它们就可能成功转型而不会出现进一步的紧缩。如果这种紧缩要发生的话,也应当是比较温和的,并且这回是因为需求约束而非供给危机所致。因此,考虑到它们转轨的起点和政策选择,这些经济并非注定要出现进一步的衰退。这是一个选择政策的问题。

不过,如果对政治和地理因素加以考虑,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就古巴来看(Pastor,

1997),可以预期会先出现混乱和不稳定,随后是来自北美古巴人的资本流入,接着会与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一样出现恢复和增长。就朝鲜来看,会以有控制的渐进方式向亚洲式市场经济转轨(Lee,1997)。这一过程会相当缓慢,因而会比德国统一花费更多的时间。为此,地缘政治因素将起决定性作用。

3.2 转轨与紧缩:东欧和前苏联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察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尽管会有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心理的和行为的,结构的和制度的,经济的和金融的——与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市场化改革时不同的是,其主要特性是制度变化和发展过程之连续性的中断。但是,正如人一样,只要还活着,这种连续性就不可能完全中断。连续总是存在的,连续性越强,正在退出的旧制度和即将形成的新制度安排之间的共同特征就越多。显然,对于那些在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轨前少有变革的国家来讲,连续性被破坏得更厉害一些。这时对于它而言的确是一种休克,但不一定有什么疗法。

相反,在已经过改革的经济中,这两个过程是同时推进的:先前的改革得以继续并加速,而新的事物同时也出现了。因此,对于少有变革的国家而言,后社会主义变革的整个过程比后来表明的有更大的变化。最为紧要的是对连续与非连续此消彼长的状况有合理的关注。使政策与此相协调显然比简单地放弃而让其处于自发的失控状态要更为明智。有意为之的非连续比偶然发生的非连续成本要低。这里,出于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原因而由政府旧制度遗产的处理

进行干预的做法必须摒弃。

这些变革还有另一方面。在某些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市场改革和之后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变革都行之不远,而相应的衰退却比较温和,或者说随后的恢复势头较为强劲。在这些国家中,如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就属于前者,而吉尔吉斯斯坦和拉脱维亚则属于后者。我们这里考虑的连续性不是改革的连续性,而是其延期的连续性。乌兹别克斯坦在所有后苏联各共和国中受到衰退的影响是最轻微的(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是1989年的86%),而其改革力度最大、转轨进度最深入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只恢复到转轨前产出的59%^①。

但是,前者1996—1997年的增长率只有2.0%,而后者在经历了1991—1995年的严重紧缩之后,平均增长率高达8.0%。白俄罗斯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已经达到1989年水平的71%,而其转轨程度深入得多的邻国立陶宛的同一水平仅达43%。这并非说不进行改革或者转轨进程慢更加好,而是说像立陶宛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国家受转轨进程非连续性的影响更深。换句话讲,制度变化力度越大,给生产活动和产量带来的暂时不良后果就更严重。

白俄罗斯总被认为是在制度改革方面最为落后的国家,但它在实质领域却比一些最激进的改革国家更有成就。不过,很难就此证明这种模式比其他模式(譬如捷克模式)更可取。1997年,捷克增长率仅有1%,而白俄罗斯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高达10%,在整个地区中最高。当然,一年的成就还不能证明白俄罗斯干得不错,就像早先该国的增长出现萎缩也不能说明问题一样。然而,眼下也很难让白俄罗

① 本节所有数据均引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

斯人相信别人 1% 的增长率比他们自己 10% 的增长率还要好。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长期趋势如何^①。

当然也有令人沮丧的例子。乌克兰 1997 年的产量仅为其 198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8%，土库曼斯坦的是 43%。与摩尔多瓦或波黑不同，这两个国家自 1989 年之后就再未发生国内战争或卷入地区冲突。这一点说明一个事实，即：如果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连续性，但却未努力进行真正的改革，同时政策的执行又表现出变化莫测和不一致性，那么，生产就真会大幅度地下降。

先行的转轨经济国家的中期增长率趋于上升，而滞后的转轨经济国家中这一比率是下降的。因此，对于已经受到连续性中断的冲击并因此付出代价（尽管代价常常很高）、同时又能引入适当的改革方案并妥善实施发展政策的国家来讲，其增长的前景显然要更为光明。展望未来，从长期来看，在结构和制度改革落后的后社会主义经济最终转向全方位市场化之后，这种状况就会发生变化（De Melo 等，1996）。然而，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并非总是可以视为对过去衰退和政策失误的弥补，尤其是如果本来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而从长远来看能够达到更快的增长率的话。换句话讲，如果过去的深度衰退是未来高增长之必要条件的话，那就真的存在经济与政治的两难困境了。但是，如果像许多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早期的严重衰退于后来的恢复和增长并无裨益的话，那就纯属政策失误了。

当然，如果巨大的衰退紧随而来强劲的增长——例如波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两国 1998 年的增长率预测均为 2%（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PlanEcon（1997c 和 1997d）已经预测白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 1998—2001 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0.7%、4.7%（参见统计附录）。

兰 90 年代初的产量下降了 20% 而 1994—199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 28% 以上,那么,有人会出于政治动机说是因为有了前者才有了后一结果。但这并非事实,因为早期的紧缩主要是由于政策失误所致,而后来的成功则是基于完全相反(除了某些特例之外)的政策。这种顺序关系——如在先衰退一段时间后紧随着强劲的增长,还会反复出现于其他国家,包括那些仍处于衰退或早期恢复阶段的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经济最终会出现转机并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

但说实在的,很难用先前的严重政策失误来解释将来的高速增长(这是人们所期盼的)。正如试图用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4—1996 年下降大约 20% 来假设其在 2000—2003 年的增长约 30% 显得怪诞一样,就波兰的现实作类似的论证同样是荒谬的。经济增长史中没有在有时滞的增长与衰退之间存在这类因果关系的例子,特别是在一组因素导致生产下降而另一组因素导致上升的情形中。因此,后社会主义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是对将来的某种“投资”,而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在早期能采取类似于波兰自 1993 年之后所实行的政策,许多国家就有可能只出现温和得多的紧缩。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对于恢复与增长来讲,重要的不仅是转轨紧缩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在此之前的情形也很重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实现的改革提供了更加灵活的结构、组织和制度。由于早期已经引入了市场型的分配机制和私有经济,因此,在产量下降之后转入供给增长和经济恢复的早期阶段就更容易一些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越广泛,转轨衰退的程度就越轻,时间就越短。如果这种设想是对的——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事后应当受到称道的是进行市

场化改革的努力,而非“越糟越好”的政策。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爱沙尼亚的经验已经证明,对先前制度的改革是有回报的,它不仅有助于新制度的尽快建立,而且可以使衰退较为温和并很快出现恢复。

特别是在波兰,转轨紧缩“只”持续了三年,即1989年年中——当时“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上台——到1992年年中。一方面,如果不是先前的改革,紧缩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就像许多不热心于改革的国家所出现的情形那样。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在1993年之后对发展政策和制度变革政策进行根本转变的话,产量下降也会持续更长时间。应当再次承认,只有这两方面政策的适当配合才能解决转轨和增长中的问题。即使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它们必须联系于具有一致性的持续发展战略之中。

因此,缺乏健全的调整 and 改革,加上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就必然导致严重和长期的衰退。衰退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转轨过程之前——而不仅仅是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解释。例如,有些作者(Blasi, Kroumowa, Kruse, 1997)就指责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于俄罗斯的严重危机至少要负部分责任。他们指出,与其他一些国家相反,他没有引入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因此,他……使国家失去了像波兰、匈牙利和中国那样更易于转轨的至关重要的最初机遇(Freeland, 1997b)。这一点并非仅仅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若干后社会主义(主要是后苏联国家)经济中,仍然还有加速某些改革的空间——这种改革不能替代转轨,但却是与之相关联的。这正是一个控制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此消彼长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却是可能和可行的,这已经在其他一些国家得到了证明——主要是欧洲的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及亚洲的

表 8 1990—1998 年转轨国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 | 1990年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1997年 (1989年 =100) | 1998年 (1989年 =100) |
|--------|-------|-------|-------|-------|-------|-------|-------|-------|-------|--------------------------|--------------------------|
| 阿尔巴尼亚 | -10.0 | -27.7 | -7.2 | 9.6 | 9.4 | 8.9 | 9.1 | -8.0 | 10.2 | 79.1 | 87.2 |
| 亚美尼亚 | -7.4 | -10.8 | -52.6 | -14.8 | 5.4 | 6.9 | 5.8 | 3.3 | 6.6 | 41.1 | 43.8 |
| 阿塞拜疆 | -11.7 | -0.7 | -22.6 | -23.1 | -18.1 | -11.0 | 1.3 | 5.0 | 7.1 | 40.5 | 43.3 |
| 白俄罗斯 | -3.0 | -1.2 | -9.6 | -7.6 | -12.6 | -10.4 | 2.6 | 10.0 | -7.1 | 70.8 | 65.7 |
| 保加利亚 | -9.1 | -11.7 | -7.3 | -1.5 | 1.8 | 2.1 | -10.9 | -7.4 | 3.5 | 62.8 | 65.0 |
| 克罗地亚 | -6.9 | -20.0 | -11.7 | -0.9 | 0.6 | 1.6 | 4.3 | 5.5 | 5.5 | 73.3 | 77.3 |
| 捷克共和国 | -0.4 | -14.2 | -3.3 | 0.6 | 3.2 | 6.4 | 3.9 | 1.0 | 1.4 | 95.8 | 97.1 |
| 爱沙尼亚 | -8.1 | -7.9 | -14.2 | -8.5 | -1.8 | 4.3 | 4.0 | 10.0 | 6.4 | 77.9 | 82.8 |
| 格鲁吉亚 | -12.4 | -13.8 | -44.8 | -25.4 | -11.4 | 2.4 | 10.5 | 10.0 | 10.2 | 34.3 | 37.8 |
| 匈牙利 | -3.5 | -11.9 | -3.1 | -0.6 | 2.9 | 1.5 | 1.3 | 4.3 | 5.4 | 90.4 | 95.2 |
| 哈萨克斯坦 | -0.4 | -13.0 | -2.9 | -10.4 | -17.8 | -8.9 | 1.1 | 1.8 | 3.8 | 58.1 | 60.3 |
| 吉尔吉斯斯坦 | 3.0 | -5.0 | -19.0 | -16.0 | -20.0 | -5.4 | 5.6 | 10.4 | 6.8 | 58.7 | 62.7 |
| 拉脱维亚 | 2.9 | -8.3 | -34.9 | -14.9 | 0.6 | -0.8 | 2.8 | 6.0 | 6.0 | 56.8 | 60.3 |
| 立陶宛 | -5.0 | -13.4 | -37.7 | -17.1 | -11.3 | 2.3 | 5.1 | 5.7 | 5.0 | 42.8 | 45.0 |
| 马其顿 | -9.9 | -12.1 | -21.1 | -8.4 | -4.0 | -1.4 | 1.1 | 1.0 | 2.8 | 55.3 | 56.9 |
| 摩尔多瓦 | -2.4 | -17.5 | -29.1 | -1.2 | -31.2 | -3.0 | -8.0 | 1.3 | 1.2 | 35.1 | 35.5 |
| 波兰 | -11.6 | -7.0 | 2.6 | 3.8 | 5.2 | 7.0 | 6.1 | 6.9 | 6.5 | 111.8 | 119.0 |
| 罗马尼亚 | -5.6 | -12.9 | -8.7 | 1.5 | 3.9 | 7.1 | 4.1 | -6.6 | -2.1 | 82.4 | 80.7 |

(续表)

| | 1990年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1997年 (1989年 =100) | 1998年 (1989年 =100) |
|-------------------|-------|-------|-------|-------|-------|-------|-------|-------|-------|--------------------------|--------------------------|
| 俄罗斯 | -4 | -13.0 | -14.5 | -8.7 | -12.6 | -4.0 | -4.9 | 0.4 | -0.4 | 52.2 | 52.0 |
| 斯洛伐克 | -2.5 | -14.6 | -6.5 | -3.7 | 4.9 | 6.8 | 6.9 | 6.5 | 4.0 | 95.6 | 99.5 |
| 斯洛文尼亚 | -4.7 | -8.1 | -5.5 | 2.8 | 5.3 | 4.1 | 3.1 | 3.3 | 4.1 | 99.3 | 103.4 |
| 塔吉克斯坦 | -1.6 | -7.1 | -29.0 | -11.0 | -18.9 | -12.5 | -4.4 | 2.2 | 4.5 | 40.0 | 41.9 |
| 土库曼斯坦 | 2.0 | -4.7 | -5.3 | -10.0 | -18.8 | -8.2 | -8.0 | -15.0 | 4.7 | 48.3 | 50.6 |
| 乌克兰 | -3.4 | -9.0 | -13.7 | -14.2 | -23.0 | -12.2 | -10.0 | -3.2 | 1.2 | 38.3 | 38.8 |
| 乌兹别克斯坦 | 1.6 | -0.5 | -11.1 | -2.3 | -4.2 | -0.9 | 1.6 | 2.4 | 5.8 | 86.7 | 91.8 |
| (国内生产总值 加权平均)* | | | | | | | | | | | |
| 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 25 国 | -5.0 | -11.5 | -10.5 | -5.5 | -7.1 | -1.1 | -1.3 | 1.6 | 2.5 | 71 | 73 |
| 东中欧 | -6.8 | -11.0 | -4.1 | 0.7 | 3.5 | 5.3 | 4.2 | 3.5 | 3.9 | 95 | 99 |
| 独联体 | -3.7 | -12.0 | -14.3 | -9.3 | -13.5 | -4.9 | -4.6 | 0.5 | 1.7 | 56 | 57 |

* 权重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于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名义美元额的估计数得到。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PlanEcon(1998a 和 1998b)对 1998 年的预测。

中国和越南。

1998年,在历经了9年的痛苦衰退之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加权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只达到转轨之前的67%。东欧13个国家^①的这一指标已经达到98%。因此,东欧国家恢复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用了9年时间。对于独联体的12个成员国来讲,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其1998年的产量水平仅为转轨前的53%^②(表8)。因此,对这些组别的国家而言,要将生产恢复到苏联解体之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将大衰退与恢复时间加在一起的话则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然而,对于产出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同时还有质量。同样的数量,如果它的构成更多地是由国家官僚机构而不是由消费者需要所决定的,那么,从质量上来讲,它就不同于根据市场信号所提供的产出(Pinto, Belka, Krajewski, 1992)。因此,在就生产的变化来考察退步还是进步时,有必要区别不同的转轨经济。由于消除短缺带来的影响(Kornai, 1993),市场对于提高质量的压力很大,但是至少有部分这类令人振奋的成果没有在官方的产出统计中加以考虑。与仍然停滞在恢复和转轨中的国家相反,在那些先行一步并进入增长阶段的国家中,不仅生产已经开始增长,而且目前的产量结构与以前也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不同(Estrin 和 Urga, 1997)。从质量的观点来看,同样的产量在不同的时间和制度下是有所不同的。

例如,罗马尼亚可望在1998年将国内生产总值恢复至

① 波黑和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在此列。三个后苏联的被罗的海国家,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则包括在内。

②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提供的数据略有差异:东欧是99%,独联体是57%,25个转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73%。

1989年水平的86%，而拉脱维亚仅能恢复到58%。然而，由于在转轨进程中先行一步，后者的产量结构更有竞争性，因而商品与服务的质量更好，而这些并非总是能够在官方的国家统计中得到完整的反映。作为第一个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波兰在1996年已经恢复到转轨前的生产水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统计上达到了1989年的水平。但事实上，这相同水平的产量（就相等的产量而言）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因为先前的生产与后来的生产，以及先前投放市场的东西和现在投入市场的东西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质量和结构变化。这些改变不仅反映在生产的物理构成的改善上——例如市场出现了新模式、新产品、新设计、新式样，等等，而且还反映在新技术、新工艺，贸易方向的地理转变和其他重要的结构变化上，更不用说产权的变化了（表9）。

表9 1989—1996年波兰的结构变化

| | 1989年 | 1990年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估计) |
|--------------------------|-------|-------|-------|-------|-------|-------|-------|-------------------|
| 私有部门份额 | | | | | | | | |
| 国内生产总值 ^① | 28.6 | 30.9 | 41.7 | 47.2 | 51.9 | 52.2 | 58.0 | 65.0 |
| 就业 ^② | 44.3 | 45.1 | 50.2 | 53.7 | 56.8 | 59.4 | 61.9 | 64.0 ^③ |
| 工业产量 ^④ | 16.2 | 18.3 | 24.8 | 28.2 | 34.6 | 39.4 | 44.5 | 48.6 ^⑤ |
| 企业利润率^⑥ | | | | | | | | |
| 合计 | — | 22.0 | 4.6 | 2.2 | 2.8 | 4.1 | 4.2 | 3.9 ^⑦ |
| 公有 | — | — | — | 3.0 | 3.7 | 5.2 | 4.8 | 3.9 ^⑧ |
| 私有 | — | — | — | 0.0 | 1.1 | 2.1 | 3.3 | 3.9 ^⑨ |
| 贸易方向^⑩ | | | | | | | | |
| 经互会国家 | 34.8 | 23.2 | 16.8 | 15.4 | 13.3 | 14.5 | 17.3 | 20.1 ^⑪ |
| 欧盟 | 32.1 | 44.3 | 55.6 | 58.0 | 63.2 | 62.7 | 70.0 | 67.1 ^⑫ |

(续表)

| | 1989年 | 1990年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估计) |
|-------------------------------|-------|-------|-------|-------|-------|-------|-------|-------------------|
| 其他 | 33.1 | 32.5 | 27.6 | 26.6 | 23.5 | 22.8 | 12.7 | 12.8 ^⑦ |
|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② | 5.8 | 9.2 | 13.3 | 13.3 | 13.6 | 16.0 | 18.0 | 18.4 |
| 平均税率 ^③ | 18.3 | 5.5 | 18.4 | 18.4 | 19.0 | 19.0 | 9.0 | 8.0 |
| 消费品价格指数篮子管理价格的份额 ^④ | 19.0 | 11.0 | 11.0 | 11.0 | 10.6 | 12.0 | 12.0 | 11.6 |
| 私有银行的份额 | | | | | | | | |
| 资产 | — | — | — | — | 13.0 | 18.6 | 26.9 | 27.9 ^⑤ |
| 资本 | — | — | — | — | 26.4 | 27.7 | 32.2 | 38.2 ^⑤ |
| 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⑥ | 7.1 | 8.1 | 12.2 | 14.7 | 14.9 | 15.7 | 15.5 | 15.4 |
| 私营企业数量 (单位:千) | 830 | 1171 | 1473 | 1698 | 1865 | 1970 | 2137 | 2246 ^⑧ |

① 自1992年起,私营部门在总价值的份额增加。

② 年平均就业率;包括农业。

③ 1996年1月至9月。

④ 销售工业产量;自1993年(不包括增值税)。

⑤ 利润率定义为总利润占总收入的比率(1992年为总利润与总成本的比率)。

⑥ 对国家集团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关税统计(按装船计算)。

⑦ 1996年1月至6月。

⑧ 估算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的数据进行,1989—1995年的份额按1996年的实际有效汇率重新计算。

⑨ 包括自由贸易协定。

⑩ 价格直接由政府控制;年底权重。

⑪ 包括正式人员和农民的养老金。

资料来源:中央统计局,财政部,CUP,波兰国家银行及作者自己的估计。

3.3 后社会主义遗产的弊和利

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国家中,某些政治、社会和制度因素对于恢复和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转轨前结构改革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放开部分价格,引入二级银行体制,反托拉斯法及其政策,破产管理和外汇有限自由化。虽然当时的初衷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市场制度的逻辑和价值观。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须从这些安排后退,相反,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

第二,一些经济主体——如银行和金融中介、财政当局、自治企业、地方政府、贸易联盟和贸易商会等等,适应新的市场规则的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因而也有助于更快地出现积极的供给反应。尽管还很弱小,这些以改进旧制度为目标进行设计的市场化机构后来成为在真正市场环境下必不可少的机构的先驱。国有部门管理的分权、精减地方政府的权力、强化国有银行的财务约束,所有这些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经济过程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提高了持续增长的能力。

第三,让职业圈子——包括经理、官员、司法系统、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介,更好地了解市场运作可以使得整个调整过程即便没有更顺利也肯定会更为有效。只有在其工作人员已经为承担市场制度下的职责作好准备时,机构和制度及其相关联部分的发展才能有效地运转。比较起来,经济改革国家中的职业人士迎接挑战的准备更为充分。实践证明,不仅关于市场经济原理和规则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关在转轨设计和管

理中运用这些知识的政治技巧和务实能力都是有利于转轨进程的关键因素。这似乎又是一个关于改革和转轨的矛盾之处,即:由于未完成的改革和政策错误导致的不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在一些具体过程中探索更好的道路从而获取许多必要的经验。只有当政治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时,这种知识才可以得到充分地运用。

第四,私营业和农业中较为灵活的部门可以为了防止严重的产量下降提供另外的缓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被国有化和集体化。然而,在有些国家中,这些行业的制度就不那么僵化,治理结构也不那么官僚化。考虑到欠发达的转轨经济中农业在就业和产量两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可以知道农业的分量了。它的绩效对于城市居民的食品开支和消费从而对于生活标准都至关重要。与工业化国家不同,欧洲转轨国家的居民平均食品开支份额在35%—55%之间波动。因此,食品产量的下降事关重大。总的来看,在农业中私有份额较大、国家政策的分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食品产量的下降也较为温和^①。

第五,中小型私营业——特别是非农业部门中基层公司的发展,是导致后来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企业家精神已经存在,资源的市场配置就能更好地促进增长。改革后期的私营业活动范围越广,转轨早期市场化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强。在像70年代和80年代的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及9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中,虽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和各种限制下,私营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1989年的波兰,正处于转轨前夕,私营业的产量已经占到国

^① 这一点与早先重组波兰农业的结论并不矛盾,由于波兰农业一直高度私有化,重组的困难比已经集体化的匈牙利或捷克更加困难。

内生产总值的 20%，其中一半来自非农业的中小型企业。后来，它们推动了新的私营业的繁荣兴旺。

第六，最初的国外直接投资为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开辟了道路，从而提高了增长能力。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最近的情况不同，从价值量来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的国外直接投资的确微不足道，但却推进了某些制度安排，使得各种管理措施更具有灵活性。尽管十分有限，在实现外汇制度自由化和投资地方化步骤的非集权化方面的让步，不仅有利于外资流入，而且也对国内企业有利。优先权和特殊办法首先适用于国外投资者，然后逐渐扩展，从而有助于其他部门的自由化。虽然匈牙利和波兰的试验从未达到著名的中国经济特区那样的规模，但也确实为转轨起步时供给快速反应的实现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七，早期加入国际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助于结构调整计划的制定，并由这些机构和其他机构——特别是投资和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一些东欧国家，其中有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转轨开始之前就已经成为布雷顿森林组织的成员并有机会利用这些关系。只要当局及时制定必要的政策，同时这些机构不被工业化国家用作实施其制裁和限制政策的工具^①，它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机会。

与 90 年代从中欧到西太平洋沿岸广大地区发生的产量

^① 在 80 年代，这种政策曾针对波兰实施过几年，但甚至到 90 年代还在用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致也作过努力，但关系非常困难。给罗马尼亚的援助被暂停或冻结过几次，不过它已经在 1991 年 3 月首次得到补偿和紧急融资便利 (CCFF, Compensatory and Contingency Financing Facility)，在 1991 年 4 月首次得到备用安排 (SBA, Stand-by Arrangement)。某些前南联盟共和国如克罗地亚在短期内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在长期内都属于这类情形。

大崩溃同社会主义的转轨密切相关一样,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大增长也与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些发展中看不出清晰的模式。总体上讲,转轨不应当因实际经济中发生的事件受到责备或颂扬,改革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在两种制度下都有好政策和坏政策的例子,因此两种制度下也都有增长和衰退的例子。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和后社会主义转轨中都出现过。

经验和历史证据都表明,事情可以做好或做坏,仅靠制度分析是不能解释一切的。如果将好事物放在一起,那么在精心设计的市场经济制度指导下的良好的发展政策要比在未经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的错误政策好得多。但是,如果将好坏组合的事物进行比较,情况就不那么明朗了。错误的政策伴随着人们使制度变得更好的动机——例如转向市场经济,其产生的结果有时却可能比在旧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施良好政策的结果还要糟,而这一制度也并非所有制度内最好的。

然而,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显然正在因为持续3年至8年的严重产量滑坡而受到谴责。但同样成立的是,就是这同样的转轨因为最近该地区增长的加快——并且以后的表现有希望会越来越越好,而应受到称赞。的确,并非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全面而精心设计的改革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强劲增长的功臣。同样,也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不能及时改革的政治无能应当因妨碍了一些国家的生长能力而受到指责——这些国家都选择了对制度进行彻底转轨作为确保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手段。

4

转轨衰退：预期、现实和解释

4.1 自由化、稳定性和 90 年代的大衰退

转轨启动时，短缺综合征越是严重，金融不稳定性也越强。虽然在均衡和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的条件下实施经济自由化要容易得多，但实际上很难达到这种条件。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情况，因为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的平衡状况，比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平衡状况要更好一些，虽然在后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非均衡状况。在匈牙利，非均衡主要是公开表现出来的，而在罗马尼亚则表现为抑制型通货膨胀。在其他国家——最典型的例子首先是波

兰,其次是俄罗斯——两种类型的不均衡都有,公开与抑制型通货膨胀同时存在。

尽管遇到如此极端不利的环境,全面的自由化显得尤为迫切。不管怎样,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健康运行的市场。对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初级阶段,深入的自由化是其基本要素之一,其他的基本要素是私有化和新的市场制度架构。然而,问题在于对这种自由化应当加以控制的方式及其对于实际经济领域——特别是对于产量、就业、投资和消费方面的影响。尽管说从常理上讲,长远来看,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这些变化必定会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发展能力,而早期的挑战是对于短期和中期的政策指导。如此看来,考虑到抑制型通货膨胀的重负及其在放开价格后的潜在爆发性,可以想见自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加剧。

显而易见,不仅抑制型通货膨胀,而且公开型的通货膨胀也会妨碍效率的提高。在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改善资源配置和促进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望达到长期效益,扭曲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自由化必须由同时进行的稳定化来加以中和。否则,只不过是一种疾病被另一种疾病所代替:抑制型通货膨胀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开的价格—工资膨胀,因此,低效依旧,只是其机制改变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价格信号都是被扭曲的,并会误导投资者和制造商。在这两种类型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受损者和受益者的构成是不同的,但这种变化不会对总体的储蓄倾向有积极的影响。与过去同短缺相伴的抑制型通货膨胀相比,通货膨胀刚开始公开化时的储蓄率甚至会更低一些。

因此,首先要实行价格自由化,之后再加以稳定。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选择激进主义或是渐进主义才是合理的。私有化和制度安排必定会持续许多年,但只要政治形势许可,自由

化措施和稳定化政策就可以在短期内实施。政策选择事关金融不稳定先于稳定化的重大问题，应当建立在政府执行不为社会公众所欢迎的政策之可行性的基础之上。不稳定性越强，采用激进的稳定措施就越合理，同时稳定政策越激进，随后的收缩就越严重。进一步讲，采取激进的稳定措施不仅合理，而且从心理上和政治上讲也更合适。当然，时间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可能性不会持续太长，在首次稳定化尝试失败后，社会对这种政策任何的重复会产生逆反心理并会有所加强。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使得整个转轨过程更加困难。

宏观稳定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过度的总需求。如果稳定措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实际需求的收缩也同样会如此。虽然总体上开始走向自由化，但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使家庭的实际收入受到抑制。在某些情况下，标准的工资基数纳税机制会被用作控制工资的手段，特别是对工资约束比私营部门宽松的国有部门。但是，从长远来讲，控制工资增长的唯一手段是建立对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国有与私营企业都一样。如果说对后者来讲，对刚刚私有化的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性改变是主要手段的话，对前者采用的就不仅是收入政策指导手段，而且还要采用中介财政与货币手段。

因此，在自由化时期对总需求的限制要求实施严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税被用作消除公司和居民手中过高货币流动性的手段。使用很高的实际贷款利率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收缩之后，需求的收缩才宣告结束。此时，以前在中央计划制度下从未发生的事情现在也会出现。过去，除了货币之外，总是什么都缺：资本、劳力、外汇、原材料、消费品等等。现在看起来什么都充足，唯一缺少东西很

独特,就是缺少货币。这种关键性变化的后果是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衰退。对以前过度需求的抑制越强,衰退的程度就越深。

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稳定化和自由化必定导致转轨衰退,但并没有回答产量收缩的幅度为何会如此巨大的问题。反过来,它的出现是由于稳定化政策执行过度。基于这种判断,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不出现与自由化管理失误相联系的严重政策错误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及其顺序的失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讲转轨收缩是可以避免的。支持这一结论的最有力证据是通货膨胀本身。每个国家的通货膨胀都比预期的要高,持续的时间都比设想和宣称的要长。通货膨胀率的计算误差比收缩程度的低估误差还要大。通货膨胀还没有过去,因为从消费物价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通货膨胀还具有很强的惯性(表 10)。

表 10 转轨经济的通货膨胀(%)
(按照年末的零售/消费物价水平变化统计)

|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
| 阿尔巴尼亚 | 104.0 | 236.6 | 30.9 | 15.8 | 6.0 | 17.4 | 42.0 | 14.0 |
| 亚美尼亚 | 25.0 | 1341.0 | 10896.0 | 1885.0 | 32.0 | 5.8 | 21.9 | 13.0 |
| 阿塞拜疆 | 126.0 | 1395.0 | 1293.8 | 1788.0 | 84.5 | 6.7 | 0.5 | 4.5 |
| 白俄罗斯 | 93.0 | 1159.0 | 1996.0 | 1960.0 | 244.0 | 39.2 | 63.1 | 84.0 |
| 保加利亚 | 339.0 | 79.4 | 63.8 | 121.9 | 32.8 | 310.8 | 578.6 | 17.0 |
| 克罗地亚 | 250.0 | 938.2 | 1149.0 | -3.0 | 3.8 | 3.4 | 3.8 | 5.0 |
| 捷克共和国 | 52.0 | 12.7 | 18.2 | 9.7 | 7.9 | 8.6 | 10.0 | 11.5 |
| 爱沙尼亚 | 304.0 | 953.5 | 35.6 | 42.0 | 29.0 | 15.0 | 12.0 | 11.0 |
| 格鲁吉亚 | 131.0 | 1177.0 | 7488.0 | 6474.4 | 57.4 | 13.8 | 8.1 | 8.0 |
| 匈牙利 | 32.0 | 21.6 | 21.1 | 21.2 | 28.3 | 19.8 | 18.4 | 14.0 |

(续表)

|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
| 哈萨克斯坦 | 137.0 | 2984.1 | 2169.0 | 1160.0 | 60.4 | 28.6 | 11.3 | 8.5 |
| 吉尔吉斯斯坦 | 170.0 | 1259.0 | 1363.0 | 95.7 | 31.9 | 35.0 | 14.8 | 12.1 |
| 拉脱维亚 | 262.0 | 959.0 | 35.0 | 26.0 | 23.0 | 13.1 | 7.0 | 5.0 |
| 立陶宛 | 345.0 | 1161.1 | 188.8 | 45.0 | 35.5 | 13.1 | 8.5 | 6.8 |
| 马其顿 | 230.0 | 1925.2 | 229.6 | 55.4 | 9.3 | 0.2 | 4.6 | 5.0 |
| 摩尔多瓦 | 151.0 | 2198.0 | 837.0 | 116.0 | 23.8 | 15.1 | 11.2 | 10.0 |
| 波兰 | 60.0 | 44.3 | 37.6 | 29.4 | 21.6 | 18.5 | 13.2 | 10.0 |
| 罗马尼亚 | 223.0 | 199.2 | 295.5 | 61.7 | 27.8 | 56.9 | 151.6 | 47.0 |
| 俄罗斯 | 144.0 | 2508.8 | 840.1 | 204.7 | 131.3 | 21.8 | 11.1 | 10.0 |
| 斯洛伐克 | 58.0 | 9.1 | 25.1 | 11.7 | 7.2 | 5.4 | 6.4 | 7.0 |
| 斯洛文尼亚 | 247.0 | 92.9 | 22.9 | 18.3 | 8.6 | 8.8 | 9.4 | 8.0 |
| 塔吉克斯坦 | 204.0 | 1364.0 | 7344.0 | 1.1 | 2133.0 | 40.5 | 165.0 | 19.3 |
| 土库曼斯坦 | 155.0 | 644.0 | 9750.0 | 1328.0 | 1262.0 | 446.0 | 21.5 | 50.0 |
| 乌克兰 | 161.0 | 2730.0 | 10155.0 | 401.0 | 182.0 | 39.7 | 10.1 | 19.0 |
| 乌兹别克斯坦 | 169.0 | 910.0 | 885.0 | 1281.0 | 117.0 | 64.0 | 28.0 | 35.0 |

资料来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8。1990—1996年的数据为国家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lan Econ及国际金融机构出版物中的最新官方估计结果。1997年的数据是初步的, 主要是政府的官方估计数据。1998年的数据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预测数。

因此, 生产下降的根源与宏观经济的稳定化政策有关。这种政策以消除短缺和引入市场出清价格为目的, 会因为对需求进行约束而带来收缩这一副产品。为达到均衡, 这种约束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采用, 在转轨的起步环境不利时尤其如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因为在这些国家

不可避免地要将总需求降到与已经收缩的供给相当的水平。不过,其特殊之处在于起初的名义与实际需求应当比自由市场经济的类似情况作更大的削减。就后者而言,由于市场出清价格的存在,其主要的挑战根源在于流量的失衡。这就是说,在不稳定的市场中,不会有强迫储蓄存量(例如非自愿持有货币达成的平衡)的冲击。相反,在中央计划制度下,这种情形却总是存在的,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其结果也会出现过度的流动性。

因此,有两种类型的非均衡:流量和存量。相应的,有效需求减少的数量要与流量(当前的名义收入)和存量(通货膨胀或货币的超额部分)这两种因素形成的过度流动性的清除相适应。从这一点来看,可能会出现(实际上经常是这样)对需求过度限制的倾向。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正统经济界倾向于建议并推动实施此类旨在消除过度需求,甚至可能消除更多需求的政策。因此,出现了稳定化措施和目标有些过头的情况,其副产品是总需求的过度收缩并因而导致产量的过度收缩(Kolodko, Gotz, Koziarkiewicz 和 Skrzyszewska Paczek, 1992)。在这方面,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Bruno, 1992; Blejer 和 Skreb, 1997)。就 1990 年波兰的稳定化计划来看,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不仅汇率过度贬值,而且出现了总需求过度收缩和财政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情况。另外,有些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初预算余额似乎超过了一定范围(表 11)。

在结构调整的最初阶段,过紧的财政政策导致不必要的预算盈余和产量的同时减少(Kolodko, 1992a)。不幸的是,到后来损害已成既成事实才承认(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是因为对国有企业的金融压制过于严厉才导致生产不必要的下降。199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在改革进程的早期,一些东欧国家有不少的预算和现金账户盈余,事后看来,它说明本应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1 1990—1998 年转轨经济国家的政府总体预算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 1990 年 | 1991 年 | 1992 年 | 1993 年 | 1994 年 | 1995 年 | 1996 年 | 1997 年 | 1998 年 |
|--------|--------|--------|--------|--------|--------|--------|--------|--------|--------|
| 阿尔巴尼亚 | -15.0 | -31.0 | -20.3 | -14.4 | -12.4 | -10.4 | -11.4 | -17.0 | -14.8 |
| 亚美尼亚 | — | -1.8 | -8.1 | -56.1 | -10.1 | -12.0 | -9.3 | -6.7 | -5.6 |
| 阿塞拜疆 | — | — | 2.8 | -12.7 | -11.4 | -4.2 | -2.6 | -2.8 | -3.0 |
| 白俄罗斯 | — | — | 0.0 | -1.9 | -2.5 | -1.9 | -1.6 | -2.7 | -3.3 |
| 保加利亚 | — | — | -5.2 | -10.9 | -5.8 | -6.4 | -13.4 | -2.7 | -1.6 |
| 克罗地亚 | — | — | -4.0 | -0.8 | 1.7 | -0.9 | -0.5 | 1.4 | 2.1 |
| 捷克共和国 | — | — | -3.1 | 0.5 | -1.2 | -1.8 | -1.2 | -2.1 | -0.9 |
| 爱沙尼亚 | — | 5.2 | -0.3 | -0.7 | 1.3 | -1.2 | -1.5 | 2.3 | 1.7 |
| 格鲁吉亚 | — | -3.0 | -25.4 | -26.2 | -7.4 | -4.5 | -4.4 | -3.8 | -3.0 |
| 匈牙利 | 0.4 | -2.2 | -6.8 | -5.5 | -8.4 | -6.7 | -3.5 | -4.6 | -4.9 |
| 哈萨克斯坦 | 1.4 | -7.9 | -7.3 | -1.3 | -7.2 | -2.0 | -2.5 | -3.4 | -4.5 |
| 吉尔吉斯斯坦 | 0.3 | 4.6 | -17.4 | -14.2 | -11.6 | -17.2 | -9.6 | -9.2 | 9.0 |
| 摩尔多瓦 | — | 0.0 | -26.2 | -7.4 | -8.7 | -5.7 | -6.7 | -7.5 | -7.5 |
| 拉脱维亚 | — | — | -0.8 | 0.6 | -4.1 | -3.5 | -1.4 | 1.3 | -0.4 |
| 立陶宛 | 5.4 | 2.7 | 0.5 | -4.3 | -5.4 | -4.5 | -4.0 | -2.4 | -3.0 |
| 马其顿 | — | — | -9.6 | -13.6 | -3.2 | -1.3 | -0.4 | -0.6 | -0.8 |
| 波兰 | 3.1 | -6.7 | -6.6 | -3.4 | -2.8 | -3.6 | -3.1 | -3.0 | -3.0 |
| 罗马尼亚 | 1.0 | 3.3 | -4.6 | -0.4 | -1.9 | -2.6 | -3.9 | -4.5 | -5.0 |
| 俄罗斯 | — | — | -21.6 | -7.4 | -10.4 | -5.7 | -8.2 | -7.5 | -6.0 |
| 斯洛伐克 | — | — | — | -7.0 | -1.3 | 0.2 | -1.9 | -3.4 | -2.1 |

(续表)

| | 1990年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
| 斯洛文尼亚 | -0.3 | 2.6 | 0.2 | 0.3 | -0.2 | 0.0 | 0.3 | -1.5 | -1.0 |
| 塔吉克斯坦 | - | -16.4 | -28.4 | -23.6 | -10.2 | -11.2 | -5.8 | -3.5 | 3.0 |
| 土库曼斯坦 | 1.2 | 2.5 | 13.2 | -0.5 | -1.4 | -1.6 | -0.2 | -0.5 | -5.0 |
| 乌克兰 | - | - | -25.4 | -16.2 | -7.8 | -4.8 | -3.2 | -5.8 | -4.0 |
| 乌兹别克斯坦 | -1.1 | -3.6 | -18.4 | -10.4 | -6.1 | -4.1 | -7.3 | -2.3 | 3.0 |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a和1998。1990—1996年的数据为国家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lanEcon及国际金融机构出版物中的最新官方估计结果。1997年的数据是初步的，主要是政府的官方估计数据。1998年内的数据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预测数。政府总体包括国家、地方和预算外资金。除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外均为现金平衡报告。阿尔巴尼亚为联合政府的数据，克罗地亚为中央政府的数据，乌兹别克斯坦为地方政府的数据和预算外资金。

实行限制不那么严厉的宏观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p.46)。这一结论本不应事后得出,因为事先已有大量的警告,但遗憾的是未能及时受到重视^①。

与一些学术与金融界通常的看法相反,认为后社会主义和欠发达市场经济中的财政赤字之间没有差别是不对的。虽然已经有了相关的警告,不幸的是并没有引起重视。在稳定化政策的初始阶段,运作的机制可能导致与原来设想相反的结果;税收收入未能提高,相反却使其进一步减少。由于采取了所谓的逆向财政调整机制(Kolodko,1992b),财政状况在短暂的改善之后,再次出现了财政赤字。额外的收入——这些收入通过公司减少存货和卖掉升值的多余外汇而积累的额外收入的税收获得,使得预算平衡甚至暂时盈余。但很快,当收缩导致收入比支出下降更快时,赤字就再次迅速上升了。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例如,波兰的赤字在经过短暂改善之后于1992年又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6%。然后又实施了有利于通货膨胀、加强贸易保护和6%的进口附加费等措施以提高额外收入,以防止进一步的财政不稳定的威胁。这种进口税在1995—1997年期间逐步取消了。

将政策实施过头放在一边不谈(如果说有时这也有一定的必要性),稳定化目标——作为导致生产下降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贸易自由化联系在一起(Rodrik,1990)。虽然从长远来看,自由化的确会促进增长,但短期和中期则并非如此。由于总需求收缩而导致产量不合理的更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国内生产已广泛地由进口所替代,而这些进口往往能得到外国制造商的贴补——这些制造商一直在寻找新的发

^① 主要参见 Kolodko,1989b 和 1990;Frydman, Kolodko, Wellisz, 1990; Laski, 1990; Nuti, 1990; Van Brabant, 1990; Caselli, Pastrello, 1991 及 Rosati, 1991a。

展机会,并在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找到了。于是,由于国内公司尚未作好应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挑战而暴露在外国竞争之下,国内产量甚至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然而,人们应当对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数量障碍的清除与它们引起的关税减少和过度贬值的组合情况加以区别。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则出现了过度的情况以至于很快就出现了反复并重新实行了关税和进口附加费用。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已经失去了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所享有的进入本国和其他国家国内市场的通道了。即便是最密切的邻国——它们正在经历类似的转轨,也被更发达的竞争者从它们的传统市场中挤出去。进口替代国内产量超过了合理的经济限度,使一些国家陷入更严重的衰退。为突然的开放所趋动,并伴随着外汇贬值的贸易自由化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含义并导致了贸易状况的恶化。贸易休克越激进,收缩幅度就越大,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Roland, Verdier, 1997)。

中央计划经济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由于垄断结构形成的长期持续的短缺症,“所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卖,却又很难买“所有的东西”。因此,这些经济还没有作好准备以应对由于对外开放由世界竞争所带来的挑战。从消除短缺和平衡市场的观点来看,让国内企业很快与外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想法是正确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的确有助于短期稳定化,但它也是使得产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部分国内产量被迅速增加的进口所替代。如果这一问题能够以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来处理的话,那么,在几年后,这一政策就可以冲抵产量下降的威胁。然而,如果该政策未能充分促进出口发展,那就会出现新的问题,特别是在贸易和经常账户平衡方面(Roubini, Wachtel, 1997; Tanzi, 1997a;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7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b)。陷入剧烈衰退多年的俄

表 12 1996—1997 年转轨经济的经常账户和贸易平衡表

| | 现金账户 余额 1997 年 | 货物贸易 余额 1997 年 | 现金账户 余额 1997 年 | 货物贸易 余额 1997 年 | 现金账户 余额的变化 1996— 1997 年 | 货物贸易 余额的变化 1996— 1997 年 |
|--------|----------------------|----------------------|----------------------|----------------------|----------------------------------|----------------------------------|
| | (百万美元) | | 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 | | 占国内生产总值份 额的百分比变化 | |
| 阿尔巴尼亚 | -195 | -415 | -8.5 | -18.0 | 0.8 | -7.8 |
| 亚美尼亚 | -428 | -559 | -23.4 | -13.8 | -0.4 | -6.1 |
| 阿塞拜疆 | -961 | -569 | -23.6 | -8.0 | 0.2 | -5.8 |
| 白俄罗斯 | -995 | -1497 | -7.5 | -11.2 | -0.7 | -1.3 |
| 保加利亚 | 184 | 311 | 1.8 | 3.0 | 0.5 | 0.8 |
| 克罗地亚 | -1900 | -4800 | -10.3 | -26.1 | -5.6 | -6.7 |
| 捷克共和国 | -3156 | -4600 | -6.1 | -8.8 | 1.5 | 1.7 |
| 爱沙尼亚 | -610 | -1188 | -13.1 | -25.6 | -3.4 | -1.6 |
| 格鲁吉亚 | -318 | -366 | -6.2 | -7.1 | -1.3 | 0.8 |
| 匈牙利 | -987 | -1700 | -2.2 | -3.8 | 1.6 | 2.2 |
| 哈萨克斯坦 | -1000 | -500 | -4.8 | -2.4 | -1.4 | -0.9 |
| 吉尔吉斯斯坦 | -187 | -134 | -11.5 | -8.2 | 12.5 | 12.6 |
| 摩尔多瓦 | -310 | -275 | -14.9 | -13.2 | -1.4 | 0.2 |
| 拉脱维亚 | -350 | -887 | -6.4 | -16.3 | -0.5 | -0.4 |
| 马其顿 | -254 | -343 | -8.1 | -10.9 | -0.8 | -2.3 |
| 立陶宛 | -945 | -1115 | -10.3 | -12.2 | -1.0 | -0.6 |
| 波兰 | -4300 | -11300 | -3.2 | -8.4 | -2.2 | -2.4 |
| 罗马尼亚 | -1900 | 1414 | -5.5 | 4.1 | 1.8 | 8.8 |
| 斯洛伐克 | -1500 | -1500 | -7.9 | -7.9 | 3.2 | 4.3 |
| 斯洛文尼亚 | 70 | -770 | 0.4 | -4.3 | 0.2 | 0.4 |
| 俄罗斯 | 3900 | 16600 | 0.8 | 3.5 | 0.3 | -0.4 |
| 塔吉克斯坦 | -15 | -5 | -1.3 | -0.4 | 5.8 | 3.2 |
| 土库曼斯坦 | -596 | -245 | -26.1 | -10.7 | -28.0 | -17.5 |
| 乌克兰 | -1500 | -4800 | -3.1 | -9.9 | 0.3 | 0.2 |
| 乌兹别克斯坦 | -754 | -254 | -5.2 | -1.8 | 2.7 | 5.1 |

数据为国家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lanEcon 及国际金融机构出版物中的最新官方估计结果。1996—1997 年期间经常账户与商品贸易余额的变化代表在各年中经常账户与商品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差异。

亚美尼亚的经常账户不包括转移支付。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

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出现了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而更成功的经济体如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财政赤字却在增长(表 12)。

对于这种挑战的最好应对是更强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以及国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流入。这种吸收国外储蓄的方式最适合于弥补国内储蓄与整个投资之间的缺口。唯一的问题是在转轨的早期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扩大出口需要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反过来又要求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及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非但未能深化上述政策,反而因为经常账户困难持续增加而可能带来相反的政策,也就是说重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延迟相应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如果出现这一情形,虽然暂时可以将经常账户赤字控制住,但可以想见增长率会再次下降。这种此消彼长正好是一种明确的发展政策选择。这种政策对于相对开放的经济来讲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们已经决定放开经常账户并放松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转轨过程中,在自由化的积极成果(如竞争力提高,进入国外市场及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带来新的技术、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显现之前,占主导的是这些改革的负面影响(即产量下降,失业增加)。

通常,当真正的结果与曾许诺的相去甚远时,人们总试图为失败的政策进行辩解。生产的下降可以用一切事情来解释,可就是不提政府、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的错误。此次,人们试图将外部冲击与转轨衰退联系在一起。当然,外部冲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如果说在艰难的时候它们更易于带来麻烦的话,在国家转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就更是如此了。然而,被频繁指称为导致后社会主义经济大衰退之主要推力的外部冲击是非常有特性的。暂且不谈影响力常常被人们夸大

的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它正巧发生在转轨开始启动之时，最重要的是前经互会内部运作的旧贸易体制的崩溃——这事关东欧各国、蒙古、越南和古巴，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影响到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贸易。

无疑，对于所有这些国家中的许多行业来讲，这些都是强烈的冲击，应当指出经互会的解体应被视为一种自我冲击。经互会的解体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当局一手造成的（国际组织也为之唱赞歌），它们不考虑选择可能的过渡方式，而这本来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旧贸易制度被消除后所造成的恶果的（Van Brabant, 1990）。在彼此之间按世界价格并以可兑换货币进行贸易之前，独联体国家之间贸易的过渡性计划已经被制定出来并仍在起作用。因此，缺乏适当的贸易制度是导致前苏联生产能力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造成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更大贸易收缩（有时高达 90%）的原因是国内价格的进一步扭曲。自 70 年代起，经互会的内部价格是以近 5 年世界平均价格为基础计算的，而苏联内部的价格是按照中央政府的决定确定的，通常并不考虑世界的实际价格如何。于是，就相同的原材料和商品而言，亚美尼亚与立陶宛之间的贸易价格就不同于亚美尼亚与匈牙利或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的贸易价格，尽管它们都在经互会区域内。

虽然程度稍轻一些，同样的病症也影响了东欧国家的潜在产量及其绝对量。它们在开放其经济方面更为迅速、更具灵活性、更有能力并富有成果。一些前苏联成员国如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出口贸易的 90% 是与其余的成员国进行的，而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其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是卖给社会主义经济之外的国家的。在此，地缘政治因素也发挥

了积极作用^①。经互会解体带来的冲击越小,转轨之前与外部世界伙伴的贸易份额就越高。

在其他国家——也就是经互会成员中的非欧洲国家,对它们来说,这一贸易团体的解体并非是自愿的——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差别很大。最糟的是古巴。它根本就谈不上健全的贸易自由化。只是到后来,其主要是内向型的政策才稍有调整,特别是在其所急需的国外投资方面,主要用于促进盈利性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然而,由于政治原因,这种合理的尝试却总是被以美国为主的强加于古巴的制裁所阻碍。

与之相反的是蒙古。它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而是在自由派新西兰专家热心的技术援助下,取消了所有关税和贸易障碍,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因此,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这个遥远的亚洲国家比其他热衷于此的后社会主义经济更进了一步。

反应较折衷的例子是越南。经互会解体对它也是一个有害的外部冲击。之后,它一直在逐步而坚定地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入。这种方式证明是十分成功的,它与其他结构改革一起为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作出了贡献。

因此,结论是两方面的。其一,贸易体制的自由化越激进,最初的冲击就越大,随后的衰退也越深。但是,其二,新贸易体制越深入,引入的支持这些变革的政策越具实质性,那么在转轨后期的恢复能力就越强。换句话讲,我们面临着选择:

^① 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各省贸易情况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贸易情况的对比。两者进出口的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但前者有一半以上的商品是卖给加拿大境外的,而后者仅有十分之一是卖到前苏联之外。并且,这少量的贸易中还有一部分是与经互会成员国及与前苏联关系密切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Pomfret, 1997)。

是为后来(即近几年)的良好绩效而以激烈的方式使贸易方式自由化来得必要呢?还是启动出口导向型增长而不引发后来确实发生的生产严重下降更为可行呢?正确的答案是后者,因为以更加渐进的方式取得贸易扩张和随后的增长的确是可能的,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的出口。

此时,有关国家能够从实际过程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即使不是立即得出但也不会太迟。在经过最初过激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后,有些国家已经转而采取更渐进的政策而不是更激进和完全自发的自由化。除非有精心设计的产业和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支持,没有一个转轨经济的早期贸易发展能够持久。最初,面向新市场的贸易结构进行了重大转变,国内需求抑制又形成了强大的出口推动力,但后来,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了。这里,只有有力的政策支持加上(而不是替代)逐步的自由化和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微观经济努力,才能再次加快出口增长。

初期的大衰退^①还根源于负值产量的清偿。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典型的价格控制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产品被买到国外,其价格定位比生产投入的世界价格还低(McKinnon, 1991)。有时还会以补贴价格将原材料卖给制造商,然后用于制造出口商品。这种交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似乎是盈利的,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就并非如此——尽管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出口。因此,在调整价格并取消补贴后,这种生产就萎缩了。

^① 在转轨的头3年(即1990—1992年)中,整个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收缩了约24%,其中,前者约为21%,后者超过了27%(参见表8)。

4.2 政策失误

虽然转轨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产量大幅度滑坡的真正原因并非外部冲击，也不是由过去遗留的问题造成的，更不是由其他客观环境作用形成的。90年代大衰退的实际原因是政策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基于对经济情况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诊断的错误政策。前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与通常所称的二战后的西欧形势并不类同，转轨国家也不同于80年代被扭曲的拉美经济。因此，适用于自由化、私有化、结构调整和新制度安排的政策不能过多地依赖于那些经验。

然而，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如果情急之下有某种模式、标准或者切入点可为思考和政策所用，那么，行动起来就容易一些。不过，事情并非总是这样，有时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后社会主义转轨就肯定属于这种情形。由于转轨带来的重大变化缺乏同一性，因而必须进行某些类比。这一点尤其为准备作出反应的某些外国政府、组织和专家所需要。一方面，他们缺乏对中央计划事务的实际遗留问题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又声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崩溃意味着冷战的终结，这就导致按照二战的结局来进行类比（Eichengreen, Uzan, 1992; Kiyono, 1992; Wolf, 1992）。

甚至连新的区域性银行——它是在法国上一任总统密特朗的倡议下为了提供金融援助而迅速创立的，从其名称来看也是不仅强调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强调“重建”的必要性。现有多个区域性银行：在华盛顿有美洲开发银行，在马尼拉有亚洲开发银行，在阿比让有非洲开发银行（分别是 IADB, ADB 及 AfDB），但在伦敦，我们的银行不仅是为了“开发”，而且是为

了“重建”。意思就是说有许多事物先前被摧毁，现在需要重建。因此，它有点类似战后重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银行的正式名称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为此，我们就有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

然而，与战后时期的类比纯属误导并且是很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破产。的确，由于无效率增加和生产下降使其无力与外部世界竞争，无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然而，与战后不同的是，这里还有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只要劳务市场更具有灵活性、分配制度更具创新性，这些人力资本很快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加以利用。还有其他生产性存量，虽然早期的运用方式不太有效（也由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但在引入新的规则之后，它们很快就变得非常有用并且能生产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大量以前被认为无用的资产，在开始私有化之后，很快就有大量需求——包括外国买主。还有基础设施：道路、电网、铁路、港口、通讯网等等。这些国家落后于发达世界的标准和国内需求，但并没有像战后国家那样被毁掉。产业能力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能力由于价格扭曲而未能被充分利用。劳力并不缺乏，问题在于隐性失业或过度就业。

然而在有些国家，有大量短缺和准市场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这使人们想起战时或传统的社会主义指令经济时期的价格控制^②。不过，后者（或许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除外）已经进行了重大改革，并

① 值得一提的是，转轨国家对于该银行决策过程的影响力是很微小的，在此方面，它们充其量是新闻制造者，而不是决策者。

② 在波兰，甚至按照1981年12月军管法实施的特殊制度被称为“战时状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无法引用宪法来实施“紧急状态”。虽然字面上有战争的意思，可即便转轨是从那时启动，把它比拟为战后重建也许是荒谬的。

且,80年代后期的经济机制已经与源自苏联早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或者甚至与斯大林时代实施的僵硬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整个经济机制既与战时经济机制(Charlesworth, 1955)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西欧的战后重建同样的也没有^①。因此,以二战时期后的军管计划作为参考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这种类比,同样,二战后的经济后果与冷战的后果之间并不相同。因此,在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初始阶段参照这些经验的政策是错误的建议,这些政策预期的结果也是不现实的。

转轨启动时的条件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扭曲经济的特性,因此,适用的药方也应当不同(Edwards, 1992)。然而,许多情况下的政策建议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忽视后社会主义的现实(Sachs, 1989)。没有严肃地考虑这些国家的具体形势,而是将政策与建议过多地基于传统的经济思想,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瞄准新兴市场准备制造一种新车型之前,该公司招聘了一批来自波兰、土耳其和巴西等国的工程师以便能设计出最能适合这些国家恶劣的道路状况的款式。但西方在制定其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政策时,却没有这样一批人员。这听起来有些奇怪,这些国家蓝图的设计者是局外人,在他们充分熟悉实际情况之前,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的建议。不是试图去更好地了解这些被扭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情况,而是倾

^① 这种误导的分类也被用于德国统一(Akerlof, Rose, Yellin等, 1991)的情况。实践很快证明,在此特例中所引入激进方式的制度改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将东德的5个省并入统一的德国不同于这个国家西部的战后重建。毫不奇怪,前东德的生产下降幅度比预期的要高、恢复来得更迟,统一的成本比计划的要大得多。

向于甚至是固执地认为没有别的方案可以选择。不是去向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了解实际情况和具体特性，而是将自己错误的理论强加于人。毫不奇怪，按照这种路线设计的汽车在坎坷不平的转轨道路上是无法平稳行驶的。

在经历了艰难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几年后，东欧和南美或东南亚之间的差别才消失。在此之前，另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是波兰的失业率从零上升到 17%，而考虑到在欠发达但已市场化的国家如阿根廷，失业率从 12% 升至 17%。因此，同样的失业率并不意味着同样问题。就前者而言，失业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好几代人没有听说过了，对后者而言只不过是失业率又上升的问题——虽然不受人欢迎，却已司空见惯。再一个要面对的挑战就是私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增加的问题。捷克共和国是从零增加到 80% 左右，而秘鲁不过是从 60% 增加到 80% 而已。私营业已经存在，其发展是一个问题，而私营业必须从零开始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于早期政策已经逐渐产生积极结果（包括恢复与增长）的有力论据并不能回避这个事实，即：将来和现在在变化了的的环境下起作用的政策在 9 年、6 年或者 3 年前也不是错误的。看来已经很清楚了，若干年前所建议的政策现在开始起作用了，但到达这一点并不一定非要经历大衰退不可。如果转轨管理的方式更加恰当，如果转轨的成本不那么高昂，它们本可以干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历史不能重复，学费不得不缴并且已经缴了。它是由转轨的国家缴付的，而且政策的后果总是由人民来承担的。不管怎样，这是自己政府政策的后果。学费已经付了，他们的政府听谁和为什么听，这与那些人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在转轨的最初阶段，有几个特别的政策错误。最重要的

是国有部门的无效管理。可以想见,由于国有部门对相关价格变化反应迟钝,因而起初对于过快过深的自由化难以形成积极的供给反应,因为它首先意味着进一步的不稳定以及对于流量和存量的加速通货膨胀型的再分配。紧缩措施和全面自由化必定导致负面反应——表现为已经萧条的经济进一步下降,而不是生产能力的重建以及从内部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一些正统自由派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产业政策不能全部放弃,但其结果是将实体经济带入了困境。

加在国有企业之上的歧视性财政紧缩、通过货币政策在盈利企业 and 非盈利企业之间进行的金融再分配、对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即未能改变绩效的评判标准以及未能形成面向增长的管理评估制度,的确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资产流失和产量下降。这里特别相关的是公用企业的商业化被推迟。例如,后者在波兰只到 1996 年才被迫实施,有些转轨经济国家还根本没有实行。如果说在金融挤压的同时及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之前引入这些改革还不太可行的话,至少应当尽快推进这些目标。

有几个失误与政策措施的顺序错误有关。既然不可能同时做所有的事情,那么就面临着先做某件事后做别的事的问题。转轨措施的顺序问题与这些措施设计和实施的方式同样重要。有时,依照错误的顺序采取行动甚至比不行动更糟。

第一,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应当在转轨一开始时就进行,也就是要先于私有化。在推行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的同时实施公司化和非垄断化可以促进微观重组、加快竞争力的提高。这些改革的延迟无疑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增长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也会削弱增长能力。过快的私有化也会保留既有的垄断,因为通常国家财产在非垄断化和重组之前就已经被

卖掉了^①。应当以不同的顺序来处理，因为私人垄断并不比国有垄断更好。事实上，它们更糟。

第二，资本市场的监管应当先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银行监管体系和存款保险制度应当在银行被分散化和私有化之前就建立起来。不幸的是，在许多国家中，一方面要求加快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压力持续不断，另一方面，天真的人们对于新兴资本市场的预期不断上升，这就给金融业的重构造成了严重困难。那些设想会有助于储蓄增加和资本形成，有时却导致老百姓的货币收入减少、信心受损。尽管非常困难，恢复货币收入还相对容易，但要再得到人民的信任就难了。

第三，财政改革和调整的顺序应当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这其中有些变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对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的税收效益并增加间接税收收入（例如增值税），应当先于或至少应当与宏观稳定化措施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主要由国有企业的直接公司收入税造成的收入下降问题^②。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坚持，俄罗斯迟至1998年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改革，改革是在大衰退和成果已经被进行重大的再分配之后进行的。不仅私营业逃税，连大型国有企业也不照章纳税了。在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下降一半之后，财务纪律和文化的缺乏导致濒临财务危机。这反过来又导致持续的财政赤字，同时，由于对大量公务员支付薪水而使得人力资本恶化，公用行业服务的支出费用也被延误。

第四，货币政策的组合顺序也有错误，例如利率的调整和

^① 在错误的顺序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捷克的电力自由化是在私有化之后进行的。

^② 需要提起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没有任何个人收入税，它只是在后来已经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才引入的。

汇率的管理方式。企图在稳定化政策一开始就形成正的实际利率导致了信用紧缩(Calvo, Coricelli, 1992),这又使许多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企业三角债和大量的欠款中。同时,有些情况下,实际的存款利率是负的。这种借款和存款利率无力打破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汇率的管理与利率政策常常不一致,正如在1994—1995年期间及在1997—1998年期间,具有独立性的波兰中央银行(NBP)对利率与汇率调整的协调失误导致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随后,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给通货膨胀压力火上浇油,这又反过来削弱了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①。

在有些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处于不同环境下的中国和越南,在私有化之前先在稳定化方面作出努力并不是错误的。说它正确是因为其他方法并不简单可行。因此,声称最初的大衰退是由于私有化被延误而引起的是不对的,这意味着其间还存在私有化和稳定化顺序的其他选择。私有化——无论其速度如何、也无论政府是否承诺要将其快速、全面地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比稳定花更多的时间。当然,私有化进程实施得更快一些,推进的程度比实际达到的更深一些,则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多一些(Frydman, Rapaczynski, Earle等,1992),但这于整体状况无益。从短期来讲,正式的私有化——这意味着从法律上将产权转移到私有实体——虽然可能有助于某些公司,

^① 说实在的,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它是不同于财政政策的。——引起而不是阻止通货膨胀,这是很奇怪的事。只是迟至1998年5月,波兰中央银行才间接承认其先前的政策有误。尽管通货膨胀率没有下降(这在转轨开始后是第一次,该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比前一年12月份的要高),这回波兰中央银行正确地决定利率还有下降的空间,以阻止通货膨胀性的外汇储备增加。对这种货币政策失误的批评在早期却被忽视了(PlanEcon, 1998b)。

但它不能保证宏观形势有所好转、总供给得到改善以及金融均衡。

4.3 “休克疗法”和“创造性毁灭”的失败

现在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与早先想象的相反，到目前为止转轨过程中最大的失败是缺乏有力而积极的供给反应以及一定的经济增长。与想象、预期和许诺的相反，基本的制度和政治变革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无论怎样努力去玩弄统计数字游戏从而扭曲实际情况，以减小产量下降的实际幅度(Winiiecki, 1991)，后社会主义衰退非常严重仍然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无论解释产量崩溃原因的真实程度如何，单单用这些因素还是无法完全解释生产下降的实际规模(Gavrilenkov, Koen, 1994)。D·马里奥·纳提(D. Mario Nuti, 1992b)明确地指出：……事情到这种地步决非转轨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休克疗法”的结果——它本来是可以更渐进主义的方式来加以缓和的，而完全是政策失败造成的不必要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失败是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与禁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迷恋大规模私有化和迅速的自由贸易，而对国有部门和任何改善与重组的尝试都抱有偏见。

因此，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动机可以用来解释大衰退，毫不奇怪，他们试图将错误的经济理论和错误政策的灾难性后果的实际程度最小化。不同过程的复杂性与带来的困惑——如短缺清除效果、负增值产量的清偿、未登记的经济活动，有时的确会产生怪异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如下的辩解来解释变化的复杂性：收缩比增长更好，实际收入减少比增长更好，对于消费来讲价格高比价格低更合适，等等。

譬如,尽管出现了大衰退,简·温尼奇(Jan Winiecki)还是试图用以下荒谬的方式来重复他早期关于生活标准改善和总体经济形势的错误论断:有一个爱沙尼亚人在1991年用1美元买了一包西方制造的(因而质量可以信赖)避孕套,花去他月收入的3%。现在(在国内生产总值收缩1/3后)他花了不到月收入的0.5%,因此,对他来讲,这些高质量的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大大下降,也就是他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是许多衡量标准都会忽视的^①。当然,如果收入与价格都以美元表示,那花的钱是相对少一些,但是,如果是用本币表示的——而本币恰恰是以法币的形式一直在流通的,实际上花的钱就更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对于一个转轨10年后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来讲,还仍然认为只有西方产品是值得依赖的,那么,进行这种转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许多理由使人们成为真正狂热的转轨支持者,并且,人们的确无须用虚假的申明和微不足道并且含糊的论据来证明这一点。虽然,确有部分产品的质量低劣,在极端的情形下,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还是负的,这种产量不大,但在停止流通过后也不会很快为其他产品所替代。例如,不管被誉为“珍品”的著名的东德汽车业(如trabant轿车)的实际质量如何,即便其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是负的,在缺乏崭新的宝马(BMW)汽车时,它过去的位置也是不会被取代的。

有人可能反驳说去掉负的附加值应当提高而不是减少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只是在价格放开之后,许多生产过程中的负值性才表露出来。与不停止生产比较而言,停止负的附加值生产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与早期在国内价格从机会成本转向国际价格时所达到的水平相比较而言,它也会导致

^① 引自“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经济学家》,1997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在转轨收缩之后，大量的产品产出以激进的方式被消除了，而短期内又没有被其他产品所代替。最多是下降的产量为出口的增长所弥补。一些公司由于信贷紧缩——尤其是不仅加于新贷款而且加于旧债务的抑制性实际高利率而被挤出了市场（考虑到金融紧缩是出于稳定政策的成功之所需，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

夸大产量的另一种虚妄企图存在于未注册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活动越受到压抑，转轨开始后其扩张就越快。为此，在转轨初期，影子经济的相对比重上升。例如，在立陶宛就高于匈牙利，或在罗马尼亚高于克罗地亚。随后，这部分经济的相对意义就开始下降，由于制度更健全、规章更完善，因此，转轨进程越深入，这种下降的速度就越快。早期扩张的不同速度以及影子经济的相对下降使其范围比以前要小。然而，即便未注册的生产占到官方国民收入的 1/3，甚至一半，也可以肯定在当前的转轨阶段其增长速度会放慢，不会比官方产出增长更快。

从定义上来讲，未注册经济是无法精确测量的（Kaufmann, Kaliberda, 1995）。只能以粗略的估计作为替代，因此，这类生产不能低估，也不应像目前这样被高估（《经济学家》，1997f）^①。一方面有些生产没有登记在官方的国内生产

①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这部分经济估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5%—50%。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影子经济的范围在欧盟大约是 15%，美国在 10% 以下。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最令人猜测。俄罗斯税收政策第一副指导瓦西里·沃尔科夫斯基（Vasily Volkovsky）称，俄罗斯有 1/3 的企业不缴税，税收中有 50% 的随意性很大。沃尔科夫斯基说，在未来几年中，政府将严厉抑制灰色经济，使其活动水平不再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据他讲，1996 年的灰色经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5%。引自“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的 1998 年经济项目”，《晨报》，1998 年 4 月 1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强调是另加的）。

总值中,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企图将并不存在的产品和服务计入实际产量中。此外,如果国内生产总值中未登记的部分真如人们所声称的那么大,那就应当包括在基数或分母中——后来的收缩和增长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换句话讲,虽然影子经济扩大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并不必然导致它的增长率提高。转轨也应当被视为一个非正式经济逐步制度化的过程。就此而言,随着市场的发展,其相对规模是下降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过程越深入,影子经济的规模就越小。

不过,要想精确计算其对于实际国民生产的贡献是不可能的。关于影子经济在转轨国家中的份额有多大,有一些有趣的估计:考夫曼(Kaufmann, 1997a)估计,1994年的情况各异,从乌兹别克斯坦的10%及波兰的15%到俄罗斯的40%及格鲁吉亚的64%不等。按照这种估计,平均起来(未加权)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0%。整个地区在转轨开始时经历了最初的增长之后,最近开始下降了——可能像俄罗斯^①和乌克兰这样的非一体化和非自由化经济是例外,另外,卷入内部冲突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黑以及塔吉克斯坦也是例外。

由于另外的原因,在古巴经济中影子经济的成分在上升。在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双轨经济是短缺综合征的副产品。

^① 在俄罗斯,由于一些公司为逃税目的而行贿,腐败的政府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有更大的欺骗性。不过黑暗中还有一线光明,有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丑闻也是好消息。实际上,官员们被指责因为获取钱财而低估俄罗斯企业的生产量,因而帮助公司尽量减少纳税义务。这就表明俄罗斯的经济比政府统计的要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私下估计俄罗斯的经济产量比官方估计的大约要多20%(*纽约时报*,1998,p.3)。因此,在俄罗斯,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私下的,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非正式经济份额的观点也是如此。

同时，由于最近卡斯特罗政府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试图限制自由化，这也允许灰色经济有所发展。将其置于控制之下的努力没能奏效，因此，一些活动继续存在于双轨经济中，不受政府监督和记录，当然也不会为其收入纳税。类似的现象在80年代的一些东欧国家也有发生。古巴将会重复众所周知的自由化顺序，先是双轨经济份额的增长，随后则是由于未注册经济的逐步制度化而使其份额下降。

在中国和亚洲东南部一些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近年来，双轨经济比生产总量的增长要快。其原因一是由于经济自由化的深入，二是由于财政管理不力。据说，中国的影子经济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0%——虽然有些估计高达50%，但很不可信。例如，经济学家吉姆·沃克(Jim Walker)估计，地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韩国和马来西亚是20%—30%，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30%—50%^①。不管怎样，将这种活动称之为“地下经济”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们将完全“在地上”——就在街头，而且是合法的，只是出于逃税目的而不包括在官方统计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所谓官方乐观主义多有批评。奇怪的是，在后社会主义的早些年中，这种乐观主义甚至比以前更有甚者。如果这种新的“官方乐观主义”得以实现，现在的产量就至少比实际产量高一半。不幸的是，年复一年，现实证明比预期的要糟。直到1998年，还没有在某一年中有哪个主要的国际组织或者权威智囊团能够就实际的收缩作出预测，或在已经出现增长的地区中倾向于夸大增长的范围。而在1991年春天，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东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是1991年为-1.5%，1992

^① 引自《亚洲接受救济》(《经济学家》，1998年4月25日)。

年为 2.8%，在 1992 年秋天的《展望》中则分别测算为 -13.7% 和 -9.2%。因此，与早期预期这两年的累计率为 1.3% 不同，对这一关于产量下降过度乐观的预测进行的修正高达 -22%。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错误计算（或者是概念错误？），并且 1991 年的实际收缩率为 -11%，关于 1993 年的预测再次达到了 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1 和 1992）。虽然实际表明这是东欧正增长的第一年，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有 0.4%，这仅为预期的 1/6。

然而，不仅对未来的预测发生了变化（这似乎很明显），就连对已发生事情的报道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也许会说，在转轨时期，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其实，能正确认识过去也很不容易。人们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进行解释并接受它，但也仅此而已了。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a）对经济衰退的估算，1991 年和 1992 年东欧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 -11.0% 及 -4.3%，或简单加总为 -14.8%，但在随后的报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b）中，对这些比率的估算值又分别被 -10.6% 和 -4.2% 代替，累计值就变为 -14.4%。至于 1993 年的经济增长率，则从下降 0.7% 调整为下降 0.4%。这些数据上的细微差异，可能是计算方法与技术因素造成的，因而可以谅解。

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这些数据有时是被事后篡改的。在这种情形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看起来还不坏的景象，并由此给人一种印象：困难并没有像那些转轨政策的批评者们敢于指出的那么严重。而实际上困难是很严重的。例如，波兰在转轨初期，曾数次试图掩饰产出下降的真实规模和实际生活水平恶化的程度（Balcerowicz, 1992; Gomułka, 1996）。这类事情的一个很好例子（确切地说是一个坏例子）是对波兰整个转轨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值的估算，

这一数值从 1990 年的 -11.6% 及 1991 年的 -7.0%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7b), 也就是说 1990—1991 年共下降的 -17.8%, 被调整为更为“流行”的 -7.0%。于是, 1990 年的灾难性后果——仅有“休克”而无“疗法”——就从产出数据上被神奇地抹去了。

根据本人的研究, 198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被高估了, 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 (年均通货膨胀率达 549%), 当期存货名义价值的增加被当作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笔者在此也介绍一种新的估算方法, 来评价不同因素对 1989—1991 年期间工业总产出变化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有七项因素: 经互会效应、其他出口变化、进口效应、经互会解散的国内溢出效应 (根据 1990 年国家统计办公室对 32 个分支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评估)、其他净出口效应的国内溢出和稳定效应 (这两项都是通过投入 - 产出法进行分析的), 最后一项就是尚不能解释的残差——被定义为“结构效应”, 虽然数量结构方面的变化是完全能分析说明的。这一“结构效应”在 1990 年比起“稳定效应”来具有更强的负面影响, 而“稳定效应”在 1991 年对平均工业产出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上面这些争论, 有些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而有些则被过分扩大了。现在, 人们对工作的寻找已经替代了过去对商品的寻找, 买商品的长龙已为寻找工作的失业长龙所替代, 而在业工人的福利, 由于工作的不稳定, 更是大大地恶化了。更进一步讲, 所建立的国民收入体系中并未包括消费者直接进入市场及消费选择面扩大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还有一种论点 (Berg, Sachs, 1992) 认为, 1990 年尽管实际工资下降了约 25%, 实际消费只下降了约 4%。当然, 由于商品短缺导致的“取消效应”, 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幅度要小于官方在册统计的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幅度。然而, 上述断言

是错误的,实际消费水平下降幅度与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幅度相差无几。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在失业率大幅上升、居民消费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只是轻微地恶化。这种观点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是非常武断的。事实上,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失业人数由零增加到几百万,而且实际福利水平急剧下降。

按当前政策的主张,衰退持续的时间很短,复苏很快就会到来,预计增长速度将变得很快。然而,所有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因为,实际情况要比以前预料的糟得多。衰退持续的时间要比预计长2—3倍,产出水平的下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所谓的复苏——当它终于来临时——却又如此的乏力。当脱离实际的幻想破灭时,那些未能使未来变得更美好的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顾问们,就试图把过去粉饰得更好。回溯过去,那些应受指责的,似乎不是依据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制定的错误政策假设,以及建立在错误假设基础上的错误预测,而是不可预料的不利环境。当人们对这些政策进行批评时,并非批评得过火了,而是批评得很不够。事实上,正确地分析与解释上述“不利环境”并不难,对执行这些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预测也不困难(Kolodko, 1992a 及 1993b; Nuti, 1990; Laski, 1990; Poznanski, 1993)。

确实,对各种假定条件的预测要比对各种可能条件下产出结果的预测容易得多,如果认真严肃地考虑过各种政策运用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么,很容易预测出将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里只是智力能力与政治决心的问题。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即使这些政治领导人或执政党知道他们的行为将要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敢宣称,在他们统治的两年时间里,产量下降了25%或50%。如果他们真敢这么做,那么,在这种新兴民主政体下,他们也将生存不了多久。无论哪一个国家,如

果公众事先知道推行一种“结构调整”方案将带来致命的衰退与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这种方案肯定得不到推行的机会。事先声称将可能产生的不利局面，即使是暂时的、短暂的，也很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事先不把真相说出来，事后，这一严峻局面又变得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形下倒有可能推行这一政策方案，而又没有政治上的风险。

这是一场在政府计划与社会预期之间、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忍受紧缩调整方案的能力之间、在公开争论的真理与谎言之间以及在政坛上厮杀的善意与恶意之间的一场特殊的心理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不仅仅发生在转轨经济中。问题不在于智力是否足以得出正确结论，而在于统治精英们没有政治义务去这样做。有时，对政治精英们来说，不知道这些真理比知道这些“邪恶”的真理对他们更合适。也就是说，统治精英们并不总是热切地想知道他们所支持的政策真实后果的，因为真理会使他们的自信变得不那么舒服。这不是智力方面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的利益将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考虑其他的利益团体。

例如，1990年波兰就采纳了所谓只有-3.1%的温和衰退的错误陈述。这部分归咎于建立在错误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短视的政府政策，部分归咎于政府宣传机构为使人们对不得人心的政策至少保持中立（如果不是支持的话），而对公众舆论的错误引导。尽管很容易吸取上述经验教训，然而，即使到了1997年，保加利亚仍在鼓吹它那明显将导致经济深度衰退的紧缩方案，“仅有”4%的产量下降。实际结果是，波兰衰退幅度是预计的4倍（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为政府所否认），保加利亚则比预计数多2倍。这不是什么经济计量方面的错误，而仅仅是政治交易伎俩而已。

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的思维方式、政治与心理情感似乎也与之类似。它们对“布雷顿森林机构”所支持方案的过度乐观,有一种特殊的偏爱。理由很简单:前景越是看起来那么诱人,目前就越需要勒紧裤腰带。当果实最终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每人都能得到它们),尽管没有先前保证的那么甜、那么丰富,然而,腰带已经勒紧了。因此,不仅仅争论本身是带有偏差的,实际政策和它的“真实”后果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虽然,这种偏差并不必然代表整个社会,但它肯定是与统治阶层、支持它们的媒体以及某些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当怀着“明天更美好”的强烈愿望的社会大多数,正倍感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些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们却迅速地使他们自己的境遇变得更好起来。

这里也有一种强烈的心理需要,去相信这些假设与预测,否则,又有谁愿意让他们承担创造新世界的义务呢?通常,人们很难就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争论,同样的,对那些与其说是知道不如说“信仰”有关经济问题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不顾事实与所付出的成本,那些信仰者认为“新世界”是变得更美好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仅仅比较成本与收益是不够的,关键是在于一部分人支付了成本,而另一部分人获取了收益。即使赌场本身是盈利的,里面也总是有赢家和输家,而且总是赢的少输的多。这样,转轨经济中就难免有过于乐观地预计未来和带来过高期望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不仅仅在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的分析基础之上,而且也是有意在一种有偏差的未来预期上运行。政府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确实是由错误的幻想、不良的政策、虚假的承诺和不够精确的预测共同造成的。

因此,问题在于市场(据认为应当优于计划)失灵和错误的制度和发展政策。似乎在任何政体下,这种错误都难免发

生，尤其是在这种充满政治斗争、只有做了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转轨时期，错误更是难免。就像计划经济的后期——现实比计划的还差，因为作为政策工具的计划本身是错误的，那就注定现实只会越来越糟。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现实也比预料的还坏，因为用来重新设计体制的政策是错误的，所执行的结果必然也是每况愈下。

当然，目前的“诊断”结果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了，因为情况已得到了控制，对未来的预期已经变得更加现实了。然而，比起发达经济来，转轨经济的预期与实际结果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1997年春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最新转轨报告》中预计，其所涉及的25个国家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3.0%，预计东欧增长3.9%、独联体增长1.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a）。而仅仅过了半年，1997年秋季预测值就被重新调整了，增长率大大调低了：整个集团增长率仅为1.7%、东欧3.1%、独联体仅为0.8%（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b）。

转轨经济的大滑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人人都意识到了，然而，那些带来如此不幸、应该受到谴责的机构、政党和个人却仍在试图掩盖事情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如此史无前例的生产崩溃，这次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是历史上和平年代中最严重的一次了。尽管经过几年的衰退，有些国家已开始复苏，但要恢复到转轨前的生产水平，仍有一段漫长和崎岖的道路。只有半数的转轨国家1994—1997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即使到了1997年仍有5个国家还处在衰退之中，有4个国家在经济正增长后，产量又开始下降，有1个国家经济一直未走出困境，经济已连续下降了8年。情况在1998年并未好转，在一些国家增长减缓，而其中最大的转轨国家俄罗斯则面临进一步的衰退。

从休克到治疗。

在现代社会里,即使受到自然灾害、当地军事冲突的打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产量像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那样下降得如此剧烈。整个地区在转轨的前7年已整整丧失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另一个7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20世纪后半期最坏的情况:乍得在1960—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而俄罗斯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同一记录,1990—1996年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在同一期间,与扎伊尔相似,每一年衰退8%。俄罗斯还不是最坏的例子,因为还有另外8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降幅超过50%(表13)。目前,俄罗斯在1998年夏的金融危机后又步入了第二轮的衰退,在其他国家已迈向增长之路时,俄罗斯仍将面临几年的衰退期。

表13 转轨经济的衰退与增长(1990—1997)

| 国 家 |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年数 | 复苏后国内生产总值又下降了吗? | 1990— | 1994— | 1990— | 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89年=100) | 排名 |
|--------|------------|-----------------|-------|-------|-------|--------------------------|----|
| | | | 1993年 | 1997年 | 1997年 | | |
| 波兰 | 2 | 没有 | -3.1 | 6.3 | 1.6 | 111.8 | 1 |
| 斯洛文尼亚 | 3 | 没有 | -3.9 | 4.0 | 0.0 | 99.3 | 2 |
| 捷克共和国 | 3 | 没有 | -4.3 | 3.6 | -0.4 | 95.8 | 3 |
| 斯洛伐克 | 4 | 没有 | -6.8 | 6.3 | -0.3 | 95.6 | 4 |
| 匈牙利 | 4 | 没有 | -4.8 | 2.5 | -1.1 | 90.4 | 5 |
| 乌兹别克斯坦 | 5 | 没有 | -3.1 | -0.3 | -1.7 | 86.7 | 6 |
| 罗马尼亚 | 4 | 是的 | -6.4 | 2.1 | -2.2 | 82.4 | 7 |
| 阿尔巴尼亚 | 4 | 是的 | -8.8 | 3.9 | -2.0 | 79.1 | 8 |
| 爱沙尼亚 | 5 | 没有 | -9.7 | 4.1 | -2.8 | 77.9 | 9 |
| 克罗地亚 | 4 | 没有 | -9.9 | 3.0 | -3.4 | 73.3 | 10 |
| 白俄罗斯 | 6 | 没有 | -5.4 | -2.6 | -4.0 | 70.8 | 11 |
| 保加利亚 | 6 | 是的 | -7.4 | -3.6 | -5.5 | 62.8 | 12 |
| 吉尔吉斯斯坦 | 5 | 没有 | -9.3 | -2.4 | -5.8 | 63.7 | 13 |
| 哈萨克斯坦 | 6 | 没有 | -6.7 | -6.0 | -6.3 | 64.1 | 14 |

(续表)

| 国 家 |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年数 | 复苏后国内生产总值又下降了吗? | 1990— | 1994— | 1990— | 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89年=100) | 排名 |
|-------|------------|-----------------|-----------------|-------|-------|------------------------------|----|
| | | | 1993年 | 1997年 | 1997年 | | |
| | | | 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 | | |
| 拉脱维亚 | 4 | 是的 | -13.8 | 2.2 | -5.8 | 56.8 | 15 |
| 马其顿 | 6 | 没有 | -12.9 | -0.8 | -6.9 | 55.3 | 16 |
| 俄罗斯 | 7 | 没有 | -10.1 | -5.3 | -7.7 | 52.2 | 17 |
| 土库曼斯坦 | 7 | 没有 | -4.5 | -12.5 | -8.5 | 48.3 | 18 |
| 立陶宛 | 5 | 没有 | -18.3 | 0.5 | -8.9 | 42.8 | 19 |
| 亚美尼亚 | 4 | 没有 | -21.4 | 5.4 | -8.0 | 41.1 | 20 |
| 阿塞拜疆 | 6 | 没有 | -14.5 | -5.7 | -10.1 | 40.5 | 21 |
| 塔吉克斯坦 | 7 | 没有 | -12.2 | -8.4 | -10.3 | 40.0 | 22 |
| 乌克兰 | 8 | 未复苏 | -10.1 | -12.1 | -11.1 | 38.3 | 23 |
| 摩尔多瓦 | 7 | 没有 | -12.6 | -10.2 | -11.4 | 35.1 | 24 |
| 格鲁吉亚 | 5 | 没有 | -24.1 | 2.9 | -10.6 | 34.3 | 25 |

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转轨国家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比如前苏联的一些小共和国,如东欧的爱沙尼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及前苏联之外的匈牙利、波兰或前经互会之外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经济上有相对较好的表现,这并不能得出过去实行的政策是适当的这一结论。尤其不能把一些成功的现象(包括表现最突出的波兰)与所谓的“休克疗法”联系起来。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休克”而无疗法的所谓“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换句话说,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即休克失败)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

滥用所谓“创造性毁灭”概念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半个多世纪前约瑟夫·熊彼特对这一概念的有针对性表述,在转

轨初期被误用了(Gomulka, 1991)。熊彼特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增长是靠一种永久的义务来驱动的,这种永久的义务根植于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而不是如正统的新古典模型所宣称的会自然生成。这种永久的义务就是积累与投资,就是创造更好的商业机会——而绝不是去毁坏这些机会(Cassidy, 1997)。熊彼特学派的“创造性毁灭”所需要的投资与创新——转轨过程中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受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建议——确实带来了剧烈的振荡,却没有任何疗效;确实带来了许多毁灭,却没有丝毫创造性。这不仅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持续的跌胀(slumpflation)。

只有通过制度的逐步建立,以及在一种渐进的而非“休克”的制度安排下,“创造性毁灭”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要新旧体制间有制度缺位,就需要创造新制度来支持新体制以抛弃(或毁坏?)旧体制。清除这些旧体制确实可以用毁灭性的方式,然而采取何种方式必须预先设计好,否则就会陷入混乱。

然而,无论意识形态上如何解释这种冒险,实体经济的任何毁坏,总是要直接引起产量的下降。这毫不奇怪。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错误做法在转轨早期占据了统治地位——成本如此巨大,却又毫无建树。

4.4 制度真空:既无计划也无市场

转轨过程中发生如此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只能用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制度真空来解释。这种制度真空状况持续时间之久,大大超出了当初“休克疗法”的支持者及赞成“休克疗法”的利益团体的设想。在一些国家,衰退就是在这两类支持

者的合作下发生的。如果不是某些“利益集团”遵从所谓将大量资产从一方手里转移给其他人这种严厉的激进政策(为何不冠以“疗法”?),如果不是这种有害的无法让人信赖的政策有其滋生的土壤,那就不会有运用这种政策的机会,也就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衰退。结果,这种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制度真空,成了几个国家的典型特征。历史的遗留问题加上转轨过程中的管理失误,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综合体,为未来制造了无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①。

这种体制真空在第二大的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乌克兰,表现得极为明显,它的生产下降持续了8年。而在这8年当中,它们甚至连一部合适的民法都没有及时制定。只是到了1997年中期,“与政府经常对抗的议会……才通过了这个国家的民法草案……”。改革家们认为,民法的制定,将为乌克兰初具雏形的市场经济建立相应的法律基础。西方法律专家认为,这部民法的设立,是乌克兰抛弃过时的前苏联法律,迈向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西方法律制度的重要一步(Freeland, 1997a)。但是,采取适当的法律制度,建立适当的法律体系,仅仅是已经延误的一系列必要的机构改革,以及持续地通过实践进行学习的市场化行为的开始。事实证明,引进与采用新的民法,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而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按照新的规则,将发展政策进行具体实施,则更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制度真空现象,而最先出现这种现

^① 人们评论说,俄罗斯有其独特的非洲式生存经济、巴基斯坦式腐败、巴西式顽固的国会、意大利式黑手党和其本身的共产党(《经济学家》,1997c)。除了从其过去继承的遗产外,据说其综合了所有其他后共产党社会的最不好的方面:保加利亚的停滞、罗马尼亚的财政政策、波兰的货币政策、斯洛伐克的重建方式、匈牙利的债务管理、南斯拉夫之共和国间的关系和阿尔巴尼亚的银行监管(Nuti, 1997b)。

象的,是那些采用激进方法来清除旧体制的国家。那些对转轨第一阶段效果不满意的国家,像波兰、匈牙利、立陶宛以及后期的捷克,纷纷转向更为成功的政策。90年代中期的波兰采取旨在进行渐进结构调整和社会参与的政策,使波兰经济有了改变(Hausner,1997)。如果说转轨经济的早期,是处在衰退之中的话,那么1994—1997年则都出现上升势头。在这一情况下,早期受“休克疗法”的影响所产生的管理失误,以及所造成的制度真空和“创造性毁灭”,就为后期的创造性建设及渐进疗法所替代。

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及政治角度,利用“创造性毁灭”概念来摧毁旧制度,那么这对建立、发展新制度并不太有利。所谓的制度真空,也就是在尚未建立相应的新制度之前,过于激进地摧毁了旧制度。可以说,对经济增长的过分乐观的预期,是与对迅速建立市场制度的盲目预期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对经济复苏、经济快速增长的预期的幻灭,对新制度很快出现的热望,也烟消云散。按原先的设想,经济复苏与制度创新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然而,不幸的是,它们之间却成了一种负相关关系:人为的“休克疗法”,这种所谓的“创造性”力量,并未带来经济增长的奇迹。一方面,制度真空状况加剧了经济的紧缩;另一方面,持续的紧缩,又使得这种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综合后遗症,更加难以治愈。旧的分配体制,连同它的低效,被断然间砸碎了,然而,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仍未建立。这就是布兰查德(Blanchard)(1997)所称的“制度缺位”现象。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化之间的自然过程,被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割裂了。如果随着社会意识的觉醒,致力于遏制外部消极因素和“市场失败”的管理政策,不能将新制度迅速建立起来,那么市场中的“恶”的因素,将主导经济运行,将会出现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收入分配不公等消极现

象。同时,不仅不会出现什么“新兴市场”——“体制真空”将浮出水面——而此时,只有少数特殊利益团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状况为其牟利。

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最好(也许是最坏)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政府等公共服务领域由于缺乏纪律、效率低下,加上贪婪、无竞争力和没有经验,造成持续时间如此之久、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仅仅因为产权结构的任何调整,绝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任何企业,无论它们愿意诚实地做生意的决心有多大、能力有多强,此时都被极大地削弱了。在“新俄罗斯”,最容易的生存之道,就是欺骗税务人员,向勒索者交纳“保护金”,贿赂当地政府官员,与供应商进行易货贸易,如果可能的话,晚几个月支付工人的工资等等。在这一体制下,不仅仅是是否允许上述事情发生的问题,而是企业为了生存,必须这样做(Cottrell, 1997)。现在回顾起这些状况,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不能让这类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因为它们对现在和未来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当“休克疗法”及“创造性毁灭”这种激进政策所宣扬的缩短转轨衰退时间、经济迅速复苏等梦想破产后^①,经济何时复苏,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特征(当然,改革越彻底越好),还取决于制度真空所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经济复苏、启动得越快,它越能尽快恢复到转轨前的生产水平。因为衰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生产的平均下降程度,还取

^① 即使是最好的政策,转轨过程中的衰退仍难以避免。问题是衰退的深度和必要程度。波波夫(Popov, 1998b)认为,衰退对任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这些国家具有极其典型的严重的结构扭曲现象。

决于衰退持续时间的长短。

因此,自由化震荡过后,只有采取恰当的政策方法(特别是在结构调整及工、农业政策方面),才有可能使经济运行转到增长的轨道上来。虽然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在自由化,但由于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等一等,看一看”的想法,衰退仍在继续,供给反应仍旧非常疲软。像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等国,衰退又重新抬头。而捷克共和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后,经济增速重新又降了下来。如果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衰退将会再一次来临。

4.5 产权革命和生产下滑

转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自由化,而没有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那就不成其为转轨,至多称其为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发生了自由化及非中央化现象,甚至正在发生一些更根本的变化。然而,尽管这些国家的管理在逐步向自由化方向发展,但资产的所有者,以及经济规则的主导者仍是国家。与之相反,转轨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因此,毫不奇怪,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的非国家化进程将带来无数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政策创新,也将带来众多的成就与失望(Frydman, Rapaczynski, 1991; Lavigne, 1995; Uvalic, Vaughan - Whitehead, 1997)。

这里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假设,那就是,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且越快越好。沿着这条思路,私有化,加上彻底的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将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 1996)。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即使转轨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也未走向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然,将通过和平的

方式完成的如此深度的私有化，与带来的进步（亦或没有进步？）及经济增长（或衰退）的速度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

按照上述的思路，人们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白俄罗斯 1998 年预计可恢复到转轨前国内生产总值的 72.6%，而拉脱维亚则只能恢复 58.4%，人们就会以为白俄罗斯在转轨中所采取的方式优于拉脱维亚；或者说，因为乌兹别克与匈牙利预计 1998 年分别达到 198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88.1% 和 91.5% 这一相近水平，我们就不再过问它们的转轨情况特征有多么的不同——虽然无论是转轨前或是转轨后，它们从来就未走过相同之路。波兰与捷克比较，虽然私有化的方式不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程度接近，但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波兰表现要好一些：1998 年这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了转轨前的 119% 和 99%。令那些倡导急进私有化的人们惊异的是，产量增幅较高的，不是那些非国有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如捷克），而是那些进程较慢的国家（如波兰）。这样，很明显，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私有化的速度，而在于是否采取了竞争性政策及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点，无论是对已私有化的资产，或是即将私有化资产都适用。

在转轨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中，事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改变、调整和发展。新兴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资产的出售，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化差别极大，它们对分配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极不相同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匈牙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其电信业所提供的服务、资产的物理特征与所使用的技术，甚至管理等方面都很相似。然而这种相似性，也仅此而已。如果说，它们技术上存在相似性的话，那么它们在私有化的社会与政治方面，则差异极大。匈牙利转轨初期的状况，与处于非国有化浪潮中的阿根廷，并没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不能将这两个国家等同看待。

为了能有效地进行私有化,就更应该注意这些不同点。

根本问题在于,与其他经济体制不同,后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然而,却没有带来相应的资本家。这当然不是指欠发达国家 90 年代所经历的私有化和结构调整,这些国家不仅仅有一些加速资产非国有化的机构,如股票交易所和投资银行,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存在。至于转轨国家,则不仅缺乏私有化所需的资本,连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们的市场经济之社会结构完全不同。

支持私有化的第一个观点,在于私有化带来了效率与增长,因此必须将资源从国家部门(被认为是低效的)转移到更有效的私人部门手中。根据这种假设,私有化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经济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错误!这种观点根植于这种假设:借助于短缺的解除效应,生产能力将得到完全的释放,此时,即使没有新增投资,经济也将得到快速增长。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只有在有完备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另一方面,由于转轨初期所带来的混乱,在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几年里,资源的配置效率甚至要低于私有化之前的配置效率。从扩张的角度来看,大量新兴的企业家,可能会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原因在于法律、制度、行为、环境的匮乏以及缺乏适当的经济政策,使他们难以竞争性地对资源进行配置。个别资源可能会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运用,而大部分的利用效率比以前更低,甚至被浪费掉。当出现有组织的犯罪及资本逃逸时,就可能发生将资源偷运出国的现象。在欠发达国家,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尼日利亚就是出现这类弊端的一个很好例子。它的私营部门很强大,而政府弱小、政策糟糕,

这就不可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转轨早期，尤其是那些政府弱、政策坏的国家，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综合征。

支持私有化的第二个论点是激进的贸易自由化，能促进供应的增加、产量的增长(Sachs, 1989)。错误！遗憾的是，我们是在供应减少、经济衰退的大萧条过后，在寻找它的原因的时候，才对贸易自由化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竞争力的缺乏，加上又无力面对开放经济，只能导致供给的消极反映。如果将僵化的结构与缺乏营利能力等因素考虑进去，则很容易预期到这种结果的出现。那种认为计划消失后市场会立即出现的荒唐想法，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与预期贸易自由化后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相反，经济衰退了——从中长期来看，采取渐进的、坚定的、稳定的自由化进程，是比较明智的。

支持私有化的第三个论点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尤其是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提高储蓄倾向和投资效率、促进竞争，并首先对私人部门发挥作用。所有这些改良措施，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真的，虽然令人满意的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从来没有实现。那么，可以说这一论点又是错的。早期稳定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就是储蓄的大幅下滑，而非储蓄的增加。的确，每一个国家稳定的初期，必会出现衰退，储蓄水平自然下降。只有在稳定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即只有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之后，储蓄才有可能大量增加。

虽然储蓄开始从国有部门向私有部门转移，但这既没有自动地增加投资倾向，也没有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为转轨国家缺乏适当的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个健康的银行部门，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以便发挥积极的作用。转轨期间，政治场景的动荡甚至比经济的波动还要剧烈。经常变化的政治气候，必然会导致频繁更迭经济政策工具，也会极大地影响

人们的心理预期和商业气氛。

尽管从长期看,私有化会带来资本的成倍增长,但中短期内,私人储蓄的积累和竞争性资源配置方式的出现却不太可能。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私人储蓄资本应当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否则,就可能出现错误的配置这些临时增加的储蓄资源的现象。如果出现了资本逃逸的话,这些资本就会流向其他国家。换句话说,自由化、私有化的秩序和方法,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就有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可支配资本。如果在转轨的早期阶段,同时出现了资本逃逸和制度混乱现象,那么私有化、自由化的后果,将是更大的衰退,而非增长。稀缺资本的错误配制,是与落后的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体制分不开的。应当在私有化前,而非私有化后,对这些银行部门进行彻底的检查。

考虑到上述各种机制的运作,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转轨的现阶段,我们仍不能在转轨制度的完善成熟与通过增长(或衰退)来表现的经济活动水平之间,寻找出一条清晰的、直接的联系。无论运用何种分类标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6),那些在制度学派看来,转轨已进入高级阶段的国家,经济上可能陷入停滞,或增长缓慢,比如1997—1998年的捷克。同时,也有像白俄罗斯、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转轨程度虽然还很低,但经济增长水平却很高(表14)。如果说捷克近两年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1.5%的话,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则分别达到了6%和10%。由此可见,各国的制度安排差异很大,而发展政策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这种场景,在未来也将如此。着眼于今后的经济增长,不仅仅需要考虑私有化的范围与自由化的程度,更需要考虑那些由此而带来的新的政策。毕竟,私有化、自由化仅是一个工具,而非发展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从长期来看,那些经济

成长表现良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国家,必定是那些转轨比较彻底的国家(Ellman,1997)。这里,私有部门的快速扩张,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的进步,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自于系统性转轨的同步发展。这两者发展得越快,转轨后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会成熟得越快。

表 14 转轨中的制度变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 国家 | 欧盟政治 发展程度 指标 ^① | 世行 分类 ^② | 1995年国 内生产总 值中私人 所占比例 (%) | 1989— 1995年私 人部门占 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 的变化率 (%) | 1990— 1997年国 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 (%) | 1997年国 内生产总 值排名 |
|--------|---------------------------------|-----------------------|---------------------------------------|--|--|-----------------------|
| 波兰 | 3.3 | 4 | 60 | 31 | 1.6 | 1 |
| 斯洛文尼亚 | 3.5 | 4 | 45 | 37 | 0.0 | 2 |
| 捷克共和国 | 3.5 | 4 | 70 | 59 | -1.1 | 3 |
| 斯洛伐克 | 2.5 | 4 | 60 | 50 | -0.4 | 4 |
| 匈牙利 | 3.5 | 4 | 60 | 45 | -1.7 | 5 |
| 乌兹别克斯坦 | 1.3 | 1 | 30 | 25 | -2.0 | 6 |
| 罗马尼亚 | 2.0 | 3 | 40 | 27 | -2.2 | 7 |
| 阿尔巴尼亚 | 2.0 | 3 | 60 | 55 | -2.8 | 8 |
| 爱沙尼亚 | 2.9 | 3 | 65 | 55 | -3.4 | 9 |
| 克罗地亚 | 1.9 | 0 | 45 | 30 | -0.3 | 10 |
| 白俄罗斯 | 1.3 | 1 | 15 | 10 | -5.5 | 11 |
| 保加利亚 | 2.2 | 3 | 45 | 30 | -4.0 | 12 |
| 吉尔吉斯斯坦 | 1.7 | 2 | 40 | 35 | -5.8 | 13 |
| 哈萨克斯坦 | 1.6 | 2 | 25 | 10 | -8.9 | 14 |
| 拉脱维亚 | 2.6 | 3 | 60 | 50 | -6.9 | 15 |
| 马其顿 | 2.2 | 0 | 40 | 30 | -6.3 | 16 |
| 俄罗斯 | 2.1 | 2 | 55 | 50 | -7.7 | 17 |
| 立陶宛 | 2.5 | 3 | 55 | 45 | -9.8 | 18 |
| 土库曼斯坦 | 1.3 | 1 | 15 | 10 | -5.8 | 19 |
| 亚美尼亚 | 1.9 | 0 | 45 | 37 | -8.0 | 20 |
| 阿塞拜疆 | 1.5 | 0 | 25 | 20 | -10.3 | 21 |
| 塔吉克斯坦 | 1.2 | 0 | 15 | 10 | -11.4 | 22 |

(续表)

| 国家 | 欧盟政治 发展程度 指标 ^① | 世行 分类 ^② | 1995年国 内生产总 值中私人 所占比例 (%) | 1989— 1995年私 人部门占 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 的变化率 (%) | 1990— 1997年国 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 (%) | 1997年国 内生产总 值排名 |
|------|---------------------------------|-----------------------|---------------------------------------|--|--|-----------------------|
| 乌克兰 | 1.9 | 1 | 35 | 30 | -10.1 | 23 |
| 摩尔多瓦 | 2.1 | 2 | 30 | 25 | -11.1 | 24 |
| 格鲁吉亚 | 1.8 | 0 | 30 | 12 | -10.6 | 25 |
| 波黑 | 1.4 | 0 | — | — | — | 26 |
| 东中欧 | 3.3 | — | 63 | 46 | — | — |
| 独联体 | 1.7 | — | 30 | 22 | — | — |

注：地区平均值未按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分类级别是1—4.5

②世行进行的分类：

4 = 改革领先 3 = 改革高级阶段

2 = 改革中级阶段 1 = 改革进展缓慢

0 = 受区域冲突影响的国家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6, 1998; PlanEcon, 1996 和 1997, 及作者的计算。

5

重新审视“华盛顿共识”

5.1 不带来增长的政策：被遗漏的因素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成了从稳定走向增长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它认为，严厉的财政政策，加上放松管制与贸易自由化，就足以摆脱“停滞”状态，从而启动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这一效果将更加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发展部高级副总裁，在强调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补充时清楚地指出，这一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之间形成的“华盛顿共识”，

是在 80 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 (Stiglitz, 1998a)。由于这一原因, 处于不同困难状况的其他国家, 对它们所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 从没有从“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理论暗示, 对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 只要他们能充分地适当修复财政基础, 将大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随后即可达到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惜这一允诺的前景, 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此, 有必要对“华盛顿共识”重新检讨。

人们总是要问: 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成功地运用过“华盛顿共识”的例子? 或者说, 这一“共识”仅仅是一个具有某种动机的纯理论设想? 答案无疑是后者。因为这一共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定义, 不同的实践者对它总是断章取义、任意发挥。事实上, 华盛顿从来也没有形成什么一致的理论(更不用说华盛顿之外的地方)(Stiglitz, 1986, p. 58)^①。然而, 过去有一段时间, 舆论方面一致的范围似乎要比最近几年大。这很容易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 1993 及 199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6 及 1998a)发行的几个重要刊物及这些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后社会主义经济)所建议或支持的政策中看出来。

一旦涉及到东南亚 1997—1998 年危机的根源、后果及政

^① 看来他是正确的。在去莫斯科前夕, 各大报纸都在评论混乱的俄国金融市场。世行引用了这些评论: “……俄罗斯高级官员昨天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俄政府, 如果它还想要几十亿美元贷款的话, 就需要削减预算赤字, 进行税收体制的彻底检查。在已承诺给俄的 92 亿美元贷款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又在为新的贷款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此复杂, 以至于世行考虑, 除非收到俄政府的正式邀请, 世行将阻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往莫斯科提供咨询。评论还说: “俄秘密地借了两亿美元; 七国答应给予支持, 但未明确。”(《发展新闻》, 世界银行 1998 年 6 月 11 日)。

策反应等方面的争论时,人们就会提出各种差异极大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这似乎很奇怪,但是转轨国家运用这些政策,十多年来所遭受的困难与失败,也比不上东南亚国家发生才一年的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震动大。看来,对这两个地区、两种危机的注意力的多少,不是与这些地区所面临的挑战程度,而是与它们的投资额的多少成正比例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东南亚这一地区,1998年的增长率预计将降到-2%—15%、1999年的增长率预计更糟,据估计,从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到1998年中期,东南亚5个主要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已经有1150亿美元资本流失了。这相当于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同一时间内,银行信用减少了88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上述两个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东欧危机对西方工业国家的扩张能力没有任何伤害,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它们则影响很大。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所带来的灾难反应滞后。东欧和前苏联,旧制度的遗产成了带来所有不幸的政治家们的替罪羊,而在东南亚地区,却很难找到对等的一位。对前者来说——这些新政治精英们正在急切地指责社会主义传统的所有“罪恶”——尽管这些“罪恶”待他们不薄,而后者却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东南亚的统治阶层在位甚久,他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对过去和最近所发生事情应负的责任。这些政治精英们(与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是不同意“非白即黑”的说的,他们愿意与其他机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海外私人投资者及过度放松管制的全球资本市场)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布雷顿森林机构及美国政府应起的作用,这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公众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些问题都集中在华盛顿,华

盛顿成了必须达成共识的地方——它将面对 80 年代拉美的结构性危机,90 年代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1997—1998 年东南亚危机及其国际后果,以及 90 年代后期及 2000 年早期削减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债务计划等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看来除了发达国家之外,世界上只有中国,较少受华盛顿导向的影响。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发展,而其他的转轨国家却都没有。

“华盛顿共识”运用于转轨国家所带来的失败,部分归咎于这一“共识”忽视了经济起飞时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即使总体来说,整个经济基础是有序的)。这就解释了当初为什么这么多西方学者没有真正了解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尽管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缓慢的,然而它们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却非常巨大。那种认为只要私有化到位了,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认识,是极其幼稚的。就像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里埃特(Laureate)所言,……当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排除了制度这一因素,它将无助于对经济运行基本问题的分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新古典理论关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配制效率,但只有个别的西方经济学家明白,创建这些有效市场所必需的制度要求。只有这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带来交易的低成本与适当的信用环境,才能使得要素与产品市场变得更有效率,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North, 1997, p.2)。问题在于,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可以不那么关注制度建设问题,而对转轨经济,则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市场经济所需的有关制度,即使不能自动形成,也可以在完成自由化与稳定化后自动完成。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十分沮丧。由于处在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真空状态,连转轨前

的生产能力都达不到,投资、储蓄都在缩减,经济在急剧下降。缺乏制度建设这一关键问题,使依据“华盛顿共识”而推行的转轨政策失去了根基。在市场结构组织混乱的情况下,自由化与私有化所带来的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深度的经济衰退。这不是过去的遗留问题,而是执行现行政策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华盛顿共识”的思维方式,是与处理受扭曲的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相关的^①。与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的是,在这些欠发达经济中,一些市场机构是一直存在的,而前者从来就缺乏市场运作所必需的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应当在转轨的初期就发展起来。因为它们在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的(Pohl, Jedrzejczak 及 Anderson, 1995)。因此,即使自由化、私有化进展很快,供给方面也不会有积极的反映。资源与投资的错误配置仍在继续,尽管发生错误的原因与以前不同了。

转轨初期,只有商品贸易网络这一市场基础设施相对发达一些。资本市场在大多数转轨国家基本不存在,或者最多处于婴儿期。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的功能,在转轨前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来执行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源配置,是通过由国家合作银行管制下的、有限的不具流动性的准市场及灰色外汇市场进行的。金融中介组织的缺乏,以及没有合理、

^① 早期“共识”之所以在华盛顿达成也是由于债务问题。引起拉美经济争论和政策调整的原因,不是由于这里不公平情况加剧、贫困程度增加等,而是由于债务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不断游说采取行动的,也不是出于对拉美人民的同情,而是能收回它们的债权的愿望。10年后,国际组织并没有试图彻底检修非洲经济,因为这一地区并不像80年代的南美那样存在如此多的债务。至于东欧,与拉美情况显然不同,既无大量外债(除波兰),也没有猖獗的通货膨胀(除波兰、南斯拉夫)。关于拉美债务问题见 Larrain 及 Selowsky, 1991。

健康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使储蓄的积累与配置缺乏效率。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对新兴的资本市场缺乏适当的管制,又无投资银行、互助基金、股票交易所、证券监督委员会等关键组织,导致了市场行为的严重扭曲(即使自由化、私有化带来了积极因素,也不能抵消其严重后果)。

这些组织机构的行为与有关制度的吻合,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考虑到与过去传统的巨大差异,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人士,也应有个重新培训的过程,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将需要多年的努力。因此,使自由化、私有化的步调与人力资本的改进过程一致起来,将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否则,新兴的市场力量,将不足以引导整个经济的正常运作,也不会很快带来市场的竞争与发展。事实上,那些采取激进方式转轨的国家,自由化进程与新制度的建设步伐极不协调,旧的体制在急剧地崩溃,而新的组织机构却迟迟没有建立,更谈不上与新制度之间的吻合。所谓“创造性毁灭”并未拯救这些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全员就业的社会,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保护失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没有这种需要,仅有的例外是南斯拉夫。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只能从零开始^①。同时,转轨前这些国家不仅资本配置扭曲严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极度扭曲。因此,就缺乏一个宽松的构架,以便采取灵活的措施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旧体制中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僵硬的政治约束,也不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劳动力状况以适应市场需求。这不仅仅是由于军事贸易同盟

^① 从这一角度,中国90年代后期,走的是一条与东欧早期不同的改革路线。中国现在公开承认失业问题,据认为1998年失业率已超过4%。

的存在,更主要的是由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①。

另外,住房的短缺也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发达国家,失业人数中只有不到10%的人员在超过一年的时间内还未找到工作,而转轨国家,失业人数中有50%的人员处于这种状况。转轨国家不同地区的失业率通常都超过了20%,这部分归咎于一些地区夕阳产业的过度集中,部分归咎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这表明,为了创造一种能长期增长的适当环境,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来逐步建立相应的制度设施和劳动力市场,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并加强对劳动力的再培训。

“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对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或者说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最初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与转轨国家毫无关系,然而,这一“共识”对东欧、前苏联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思维及行动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依此而制定的政策各不相同,却注定了它们失败的命运。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布雷顿森林组织在关注市场操作行为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市场结构的组织方式。因为转轨经济和欠发达经济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是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这一点,连华盛顿和伦敦也意识到了。市场与经济增长两者都需要自由化与机构组织建设。人们从转轨所带来的衰退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痛苦经历中得出目前似乎人人都认识到的教训,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

^① 转轨经济中,除了前苏联的大多数共和国,贸易联盟成员数低于欧洲联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属于贸易联盟的劳动力人数,其占比例从匈牙利的20%到白俄罗斯的90%不等。但这并未说明全部问题,从薪金谈判等方面来讲,这些贸易联盟比欧洲联盟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的制度安排和明智的政策,即使经济基础良好,如预算、经常项目平衡、低通货膨胀、币值稳定、存在大量私营部门,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也达成了—个共识,那就是要修改调整“华盛顿共识”,以适应实际情况(Williamson, 1997; Stiglitz, 1998a)。这需要在新的共识中增加曾经丢失掉的要素。

5.2 达成新的共识

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遵从主要参与方所达成的共识,而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共识和对最终成功必不可少的新的参与者^①。就像人们在终身寻找人生幸福的秘方—样,人们可能离这个秘方很近或者很远,但永远不可能真正找到它或拥有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有关知识也随之而变。一些新的文件、新的方案、所强调重点的变化等等,以—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走向前台。这方面的—个典型案例,是199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关于《全球持续增长的伙伴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的声明。

这—声明可以看作是对早期“华盛顿共识”的修正。其中11条中至少有6条是与转轨经济有关的。第一条强调货币、财政与结构政策的辅助性,它们之间也会发生相互作用;第三条声称需要为私人储蓄创造—个适当的环境;第七条则强调

^① 要求达成真正的“华盛顿共识”的呼声—直很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在1998年5月8—9日举办—次关于“经济政策与产权”的会议,并出版了相关刊物。参与这—努力的,不仅有布雷顿森林组织及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制定者们,还包括世界各国政治家、研究人员、贸易组织及神职人员。然而,就像作者曾在讲座中声称的,如果华盛顿将产权问题与梵蒂冈的效率问题贯通起来,那最好还是回到老路上去……除了产权外,还有梵蒂冈的投资伦理问题(BrotherTy, Buckley及Tierney, 1998)。

预算政策须着眼于中期平衡及削减公共债务,而第九条则认为,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对劳动力市场予以持续的关注;第十条强调了好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第十一条则关注公共部门的腐败以及银行部门的洗黑钱的问题,要求对这些部门加强监管^①。

这确实是 90 年代前 5 年后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建议。然而这类建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方案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更糟糕的是,虽然后来这些建议提出来了,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倾听的。

当人们开始详细阐述,运用渐进的战略和方法推进转轨国家政府的制度重建时(Laski, 1990; Nuti, 1990; Kolodko, 1989b 及 Poznanski, 1993),当这一方法最终用于波兰时(Kolodko, 1993a 及 1996; Poznanski, 1993),比起“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激进疗法”(尽管毫无疗法可言)来,这一渐进方法是非正统的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并不是用渐进的方法进行改变的问题,而是事情的本质让它们认识到,改变过程是非常耗费时间的。

在 1997 年和 1998 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达成新的共识的迹象,这一共识,完全是基于运用于 1994—1997 年波兰的政策而产生的。这一新的观念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早期的“华盛顿共识”主流相抗衡的,只是后来成了“华盛顿共识”的修订版。由于采用了多种方法,据说波兰避免了其他转轨经济像捷克和俄罗斯的恶运,它们结束了使银行、公司老板

^① 其他对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方面包括:汇率稳定、无通货膨胀、顶住贸易保护的压
力、增加资本自由流动性方面的进展、通过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来保持财政平衡及
确保对基础设施的适当投资等。

胡作非为、股东权益受损的^① 混乱的、裙带关系体系。华沙完全偿还了它欠华盛顿(西方)的债务。

在衰退的早期,鲍勃·芒德尔(Bob Mundell)发表了庄严、权威的声明,……对转轨早期衰退正在发生这一事实的否认,证明是错误的,而且总体上这些衰退应归咎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拙劣经济政策(Mundell, 1995)。一个对波兰 1989—1991 年一揽子政策的支持者承认:大多数转轨国家产量下降的幅度……,即使经过官方的合理调整,仍是极其严重的。关于相对于私人部门“机体”的发育,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件事,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1995—1996 年,一些国家复苏的不同经历表明,最重要的因素在供给方面,即新兴私人部门最初的大小及它们随后的发展……(Gomulka, 1996)。其他几个研究也表明,就业机会大部分是由新兴私人部门创造的,虽然它们只占当前就业市场的一小部分。这一点上,波兰学习了中国和越南的经验。为什么当初匆匆“创造性地毁灭”国有部门,而今天又放弃这一做法呢?

90 年代一系列的经济、金融事件也使得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最终改变了他的早期观点,承认必须重新考虑对“休克疗法”的认识。东欧的经历,尤其是 1989—1991 年波兰“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和俄罗斯持续的经济灾难,以及 1997—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萨克斯这一次得出了正确结论:依我看来,贸易政策改革应迅速进行,这将带来有力的竞争和市场力量。放松金融管制的进程应当放缓。如果金融市场的改革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并能持续几年,这将是适当的^②。

① 《经济学家》,1997 年 2 月 15 日。

② 根据 Ravi, 1998。

这一言论间接表明,与贸易体制可以迅速自由化的情况相反,激进自由化政策对金融市场是不适用的。因此,金融自由化必须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且重要的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运用这种方式的方向和决心。那么,为什么早期,一夜之间什么都要自由化、私有化时,就没有注意到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呢?

早期和晚期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使人们怀疑它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来源。新自由周刊《经济学家》一直是支持转轨国家进行激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支持自由市场政策,赞扬克劳斯(Vaclav Klaus)在捷克采取的政策,然而,当这位前捷克总理注定走向失败时,《经济学家》改变了调子。只在这时,《经济学家》才注意到:克劳斯本人应受到指责……,他的匆忙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使普通的捷克人成为大多数企业的正式所有者,而将控制权交给了对改善企业毫无兴趣的国有银行,这导致了去年5月份的危机及货币的极度贬值。现在,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都在上升,而实际收入在下降:1997年经济仅增长了1%,1998年至多达2%(《经济学家》,1998b, p. 50)。为什么早期捷克中右派政府如此强烈地支持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呢?

东南亚危机的严重后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国际金融界有影响的领导者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如俄罗斯)所提供政策方案正确性的怀疑,虽然已经太迟了,但毕竟开始了。人们已得到教训,而非共识。现在他们承认,短期国际借贷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它们并未带来新技术,它们并未提高国内机构的管理水平,它们也并未提供对经常性贸易赤字的融资。在那些储蓄率比较高的国家,也导致了过高的投资率。……东南亚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对资本化弱、监管不适当的金融体系放松管制,只会带来灾难性

后果(Wolf,1998)。这确实是一个很正确的结论。然而,即使及时得出了这一政策结论,比如波兰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的艰苦谈判中,已经有了这一认识,这一结论及由此而制定的政策,仍难以得到支持。转轨国家新兴市场的问题在于,它们比亚洲、拉美的市场还脆弱,更容易受短期投机资本流入流出的左右。然而,那些与国际金融界联系密切的各大报纸刊物,为什么总是鼓吹充满风险、并不成熟的转轨国家进行资本市场的开放呢?

布雷顿森林组织从来就主张对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0%还是增长了10%,总有来自它们的压力,要求将赤字降下来,将利率升上去。即使是预算赤字小于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实际利率高到公共债务的偿还成本急剧上升,已不能保持相应的赤字水平^①,还是有持续的要求,继续收缩财政与货币。短期的利率差异,当然有利于精明的投资者,但却给财政预算带来极大的成本。无论是俄罗斯经济的零增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6%之间,还是波兰达到了7%的增长率,而赤字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1.5%,总有来自于它们的压力。由此可见,这一要求已成了一个教条。考虑到东南亚危机的情景,既不是财政赤字,也不是公共债务导致了危机,而是这些国家的私人银行及外国私人机构对私营部门的过度借贷带来了危机。一个巴掌拍不响,金融危机也是一样。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和投资基金确实是在借出资金,东南亚的私人银行与企业也确实是在借人。金融恐慌已经引起和正在引起巨大的损失,而这些国家

^① 这就是说,成本高并不是因为名义利率高了,而是因为偿还债务的实际利率变高了。

由于其内在的缺陷,短期内难以进行自我调整(Wolf, 1998)^①。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它的结果就像打击毒品走私:交易的两方都必须终止,也就是说,必须监控、消除过度的供给和过度的需求。在东南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世行的态度较过去、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了很大的转变。其东亚事务副总裁琼-米歇尔·塞维里诺(Jean-Michel Severino)说到:政府应当对基础设施及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投资,以减轻贫困,应当允许扩大财政赤字,如果可能的话,应降低利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建议,也会发生同样的转变,这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事态的发展让人们最终了解到,我们不应当削减国家的力量。政府应当在资源配置、提供融资方面积极介入,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然而,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内,总是那么固执地坚持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利率呢?

通过建立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提高效率,这既需要时间及有效的政府政策,也需要国家的功能发生新的变化。没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带来效率,这一观念仍没有为每一个人所认识,让人难以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在谈到俄罗斯时也强调这一点:伴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整个国家也在解体,没有人能够检测出整个行政管理构架毁坏到了什么程度^②。而伊特维尔(Eatwell, 1995)等及波兹南斯基(Poznanski, 1996),科勒德克(Kolodko)和纳提(Nuti, 1997)对这

^① 这一恐慌如果发生在东欧,就不会出现东南亚那么多的损失。其不同在于: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中,像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最大的市场中,国际投机资本的份额很小。

^② 引自《金融时报》,1997年1月10日。

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建议,无论以何种代价,都应当保持一个小而好的政府。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说到: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的政府越来越没有力量了,但理性告诉我们,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掌握着社会的命运。好的政策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而错误的政策将会迅速受到惩罚。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之所以声称政府失去了力量,其合理性在于,那些需要政府出面处理的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了(Summers, 1998, p.5)。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制度的建设需要时间。金融与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银行的运作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像会计、信用分析等,这需要客户关系的建立、业务记录的保存及相应的工作方法等等。法律体系必须首先建立起来,并能得到执行。对《1995年转轨报告》的分析(第6章)表明,比起法律框架的设立来,法律的执行与运用方面则显得更弱。在竞争政策、国家作用的变化等方面亦面临同样的问题(Stern, 1996, p.7)。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最新转轨报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7a)中强调:借助于政府、私人机构行为的转变,加强现存制度的完善和政策发展,是持续改善当地投资环境的关键。在这种新的看问题的方式的影响下,目前,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些重要机构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

相对于产权制度的变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已经被包括早期迅速大规模私有化的支持者如 Frydam 及 Rapaczynski(1991 及 1994)等人所认识。埃斯特林(Estrin, 1996)的报告指出,在捷克、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并没有明显的事例表明,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其表现要优

于尚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他进一步指出,建立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需要时间的。斯特恩(1996, p. 8)指出,重建过程,……其本身的一个重要基础工作,就涉及到投资、对困难问题的决策及与原有制度的脱离。如果经济正在增长,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那么重建所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轻一些。科宁斯(Konings)、莱曼(Lehmann)和沙夫尔(Schaffer)(1996)认为: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至少和私有化、彻底的自由化一样,对经济复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转轨早期的极端放任政策之后,人们已经重新发现了合作与团结的价值。1997年1月,甚至连亿万富翁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虽然我在金融市场赚了钱^①,但我很担心,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不加约束,任市场观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那就很可能危及到我们这个开放而民主的社会……。过度的竞争与缺乏合作,将会带来极度的不平等和不稳定(Soros, 1997)。致力于转轨的世行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尤其强调达成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形成社会共识对转轨的长期成功十分重要——国际分析家认为:如果社会收入或资产分配极端不公,将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将带来较低的投资率和增长率(世界银行,1996)。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易受结构刚性影响的经济,像正式或非正式的指标控制、供给反应疲软等,一旦通货膨胀率降到40%以下,这时,任何想加速降低通货膨胀的行为都会付出巨大的也许难以承受的代价。无论何种情况下,其成本都将会高于那些在通货膨胀适中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所带来

① 当然,指的是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

的成本(例如波兰等转轨国家),尤其是在显著持续地降低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反弹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降低,不仅能提高政府、提高货币管理当局的威望,还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可预测性,并能在国际上创造出一种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氛围^①。

转轨早期被认为不正确的、有害的正实际利率的政策,现在被认为是有利于国民退休保险政策和财政政策的^②。比特尔(Buiter)、拉戈(Lago)及斯特恩(1996)都忽视了实际利率的意义,他们强调永久性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设的重要性。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得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储户对高利率没有积极的反映。实际上,正实际利率将使得以牺牲眼前消费来换取未来支取的储蓄成为可能。随着东欧许多国家老龄化的逐步到来,人们储蓄以防老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当实际收入增加、通货膨胀进一步下降时,吸引储蓄的实际利率将会逐步降下来。

提高储蓄率(例如其增速快于收入的增加)的先决条件是实际收入的增加、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乐观的预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储蓄率才可能持续地上升。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储蓄问题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1996年《转轨报告》中,强调了通过彻底改革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储蓄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寿保险的发展等方面,来提高政府储蓄水平的重要性。从这一点来看,早期(包括后期)的关于

①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金融、投资界对1998年的波兰是充满信心的,这主要归功于1994—1997年间取得的成就,而1989—1993年则由于通胀和不稳定,形成一种相反的情况。

② 正实际利率的教条政策,耗费了波兰纳税人大量的钱财,尤其是在1996年及1998年,实际利率持续攀升。虽然这一政策在1998年中期已经取消了,但大量成本已经付出。当然,纳税人和国民收入的损失,肯定成了某些人,尤其是短期投机者的收益。

高实际利率的呼声是不恰当的。新兴市场经济,尤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央银行的财政及准财政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Fry, 1993)。尤其是由于利率差异过大,或者相对的过度贬值所引起的生产窒息,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例如经合组织对捷克共和国的研究(经合组织, 1996a),该研究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捷克和波兰两国的央行,由于采取了这种窒息生产的政策,至少浪费了1%的国内生产总值^①(Nuti, 1996)。

最近以来,上述的观察与认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似乎表明,在关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与政策方面,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对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来讲,波兰抛弃了依据早期“华盛顿共识”而采取的激进、不稳定政策,其所取得的积极经验,是各国都应当吸取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所带来的新的共识,虽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可以称作“新华盛顿共识”吧^②。如果这一次这种新共识能够有助于基于持续增长的适当政策的建立——不会忽视像制度建设及国家的积极作用这些关键因素——至少可以说转轨的部分成本没有白白付出。

5.3 经济政策的手段和目标

早期“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失败,可以说也是由于政策目标的混乱引起的。健康的财政状况、低通货膨胀、汇率稳定

^① 对外界来说,这似乎是对波兰国民银行独立性的挑战,事实上,波兰政府及其财政都对政策目标(是通货膨胀或是失业?)及其工具(利率或汇率)是有不同的认识的。

^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a)称之为“后华盛顿共识”。

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这仅是经济政策的工具,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像私有化、自由化这类重大变革,也仅仅是工具而非目标。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这些工具成了经济政策的核心(如果不是最终目标的话)。这极像社会主义制度下,“完美的中央计划”成了政策的目的(而非工具),而改革也成了“为改革而改革”。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在那些能带来效率与竞争的各种假说上,而没有真正关注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偏颇导致了政策的扭曲:工具成了目的,而其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简单化——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反映了知识界的一种过度简单化的倾向:只要是在某种环境下,给定几个条件,事情就能自动地运作起来,不需要再考虑如何去管理它们。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最好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这类现象^①。然而,在经济研究、建议及制定政策过程中,目的与工具的区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清楚的,目的与工具之间的混乱,是不能用经济学家、政治家的懒惰与天真来解释的,事实上,他们工作很努力。知识界的这种误解,根本原因在于在运用不同的理论概念与科学解释时,所引起的政治上的敌对与利益上的冲突。

当然,这类政策错误的发生,也有仅仅是因为知识的缺乏、错误的经济方案等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政策混乱来自于特殊利益团体,来自于某些恰好成为利益团体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同盟的“理论学派”。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左派或右派的医生与工程师,但却有左派或右派的经济学家及经济

^① 这就是波兰实施“休克疗法”时,波兰政府、波兰工业与贸易部部长的声明(不如说是交易)。因此,毫不奇怪,那两年工业产值下降了约40%。

政策制定者。否则,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错误已极其明显时,他们却还在执行这一政策。例如,波兰 1989—1992 年间制定的自由化与稳定政策,捷克 1993—1996 年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忽视,涉及有组织犯罪的 1994—1998 年俄罗斯私有化,以及 1995—1997 年阿尔巴尼亚金融中介诈骗案,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纵容,直至最终整个经济发生崩溃。

这些事件都是经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相混的一个表现。经济政策的好坏,不应当由私有化进程的快慢来衡量,而应该首先体现在所带来的竞争程度和预算收入的增加程度,以及对国民收入增加所带来的贡献上。那些强烈要求加快私有化步伐的,不过是一些想使得国有资产卖得更便宜一些的利益集团和它们的政治同盟。如果谁愿意将资产变现得快一些,那他就只能卖个低价钱。而同时收购这些资产的人就能低价买入。这样,本来应增加的预算收入,却成了整个社会的损失。只是某些少数人得益罢了。

对这些不明智政策的警告、批评以及知识界和政治圈里的反对之声,从来就不绝于耳,然而,这些政策仍能执行下去。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好的经济思想,也不缺少合理的政策方案。关键是由于有来自支持方和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换句话说,在涉及到政策方案时,仅有正确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行。情况经常是获得支持最多的,不是在真理与合乎逻辑的一方,而是在金钱与权力的一方。

因此,对于涉及改善全体人民(而非少数利益团体)的利益的真正改革,特别是在涉及到长期目标,例如持续经济增长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仔细考虑上述情况。否则就会出现人为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虚假“繁荣”现象。如果私有部门的份额在增加,或者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加深,或者资本转移的管

制放松程度在加大,而与此同时,经济衰退程度加深、增长乏力、生活水平下降,那么整体状况肯定是恶化了,而不是有什么改善。然而,问题在于,整体经济状况的好坏,常常是通过少数利益团体以及它们的政党同盟的角度来反映的。因此,在实际评估经济运行状况及经济政策好坏时,人们不仅要考虑其评估的内容和方法的正确性,还要考虑其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对穆迪评估公司的评价与对俄罗斯贸易联盟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这就像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利益与西伯利亚矿工的利益不同一样。

对任何一个国家,评价其制度变革的效果,应当看它是否增强了商业部门的竞争力,是否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地,在提高竞争力、控制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时,长时间地降低实际工资水平的做法,是荒唐可笑的,就像波兰 1990—1991 年工资水平下降了约 25%、匈牙利 1995—1996 年下降了 18%^①。如果认为工资水平下降了,就说明所采取的政策好,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长久地保持竞争力,工资水平暂时下降可能是一种必须的手段,例如波兰 90 年代初、匈牙利 1995—1996 年的工资下降,然而,这却不能作为所执行经济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志。

实际工资水平保持长期增长,这是经济运行良好的显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只要国际竞争力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就更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毕竟,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远离了相对落后状态,正处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看到,基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会出现实际工

^① 波兰的工资水平从 1990 年开始下降,1991—1993 年又下降了 6%,1994 年才开始回升。匈牙利自 1995—1996 年的下降后,1997 年回升了约 6% (PlanEcon, 1997d)。

资水平逐步上升的景象。当人们能够正确理解实际政策目标与为达到此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的不同时,人们也就能够了解良好的经济状态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而非更多的破产,意味着较高的实际收入水平而非工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充分就业而非失业人数的增加,意味着高效率的私有化进程而非迅速把国有资产卖掉。良好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能够带来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而绝不是那些只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政策。

对经济政策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存在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对转轨本身的混淆,实际上,转轨涉及到制度变革以及宏观经济重建等各个方面,而稳定化与自由化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转轨政策与发展政策之间也存在混淆。只是在最近,才把稳定化、自由化政策与关注制度与行为变革的转轨政策区别开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a)。这样,人们就不会错误地把稳定及其相关特征当成就是经济转轨,也不会把稳定化排除在整个制度转轨之外。

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能保证高的产出水平,但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才能与生活质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相比,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经济活动水平的高低)的提高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指标。这似乎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人类社会的相对进步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世行,1997a及 Ravallion,1997)。总的来说,长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人类发展指数是正相关的。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考虑了人类的基本能力,像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等。因此,在考虑发展政策的终极目标时,把这一指标作为评估的标准,是

比较合适的^①。

毫不奇怪,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一指标,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发达国家(与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不同)。从这方面来讲,这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良好的教育水平、完善的文化建设以及大范围的健康保障。结果,在相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转轨国家的人均寿命要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 PPP,即购买力平价换算)排名差额,从西班牙的 19,芬兰、新西兰的 15,到日本的 0、丹麦的 - 8、瑞士的 - 12 不等。而同样的差额,在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老挝、蒙古是负值外)则是从捷克、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的 3,到波兰的 14,以及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超过 30 不等(表 15)。

表 15 转轨国家 1994 年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

| 国 家 | 人类发展指数 |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 1994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之差 ^① |
|-------|--------|----------|-----------------------------|------------------------------------|
| 斯洛文尼亚 | 0.886 | 35 | 10404 | 3 |
| 捷克 | 0.882 | 39 | 9201 | 3 |
| 斯洛伐克 | 0.873 | 42 | 6389 | 12 |
| 匈牙利 | 0.857 | 48 | 6437 | 5 |
| 波兰 | 0.834 | 58 | 5002 | 14 |
| 白俄罗斯 | 0.806 | 62 | 4713 | 13 |
| 俄罗斯 | 0.792 | 67 | 4828 | 7 |
| 保加利亚 | 0.780 | 69 | 4533 | 9 |
| 爱沙尼亚 | 0.776 | 71 | 4294 | 8 |

^① 这一指标表述如下:每一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数值的大小,表明了其距设定目标(平均寿命 85 岁、所有的人都能受教育及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的远近。人类发展指数是通过测定这三方面各距其设定目标的远近计算出来的。这一指数的大小在 1—0 之间,每一国家都在其中的一点上。指数越大表明其距设定目标越近。

(续表)

| 国 家 | 人类发展指数 |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 199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排名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之差 ^① |
|--------|--------|----------|----------------------------|--------------------------------------|
| 立陶宛 | 0.762 | 76 | 4011 | 8 |
| 克罗地亚 | 0.760 | 77 | 3960 | 10 |
| 罗马尼亚 | 0.748 | 79 | 4037 | 3 |
| 马其顿 | 0.748 | 80 | 3965 | 5 |
| 土库曼斯坦 | 0.723 | 85 | 3469 | 12 |
| 拉脱维亚 | 0.711 | 92 | 3332 | 6 |
| 哈萨克斯坦 | 0.709 | 93 | 3284 | 6 |
| 乌克兰 | 0.689 | 95 | 2718 | 14 |
| 乌兹别克斯坦 | 0.662 | 100 | 2438 | 14 |
| 阿尔巴尼亚 | 0.655 | 102 | 2788 | 4 |
| 亚美尼亚 | 0.651 | 103 | 1737 | 24 |
| 格鲁吉亚 | 0.637 | 105 | 1585 | 31 |
| 阿塞拜疆 | 0.636 | 106 | 1670 | 25 |
| 吉尔吉斯斯坦 | 0.635 | 107 | 1930 | 18 |
| 摩尔多瓦 | 0.612 | 110 | 1576 | 28 |
| 塔吉克斯坦 | 0.580 | 115 | 1117 | 35 |
| 蒙古 | 0.661 | 101 | 3766 | -10 |
| 中国 | 0.626 | 108 | 2604 | 3 |
| 越南 | 0.557 | 121 | 1208 | 26 |
| 老挝 | 0.459 | 136 | 2484 | -23 |
| 柬埔寨 | 0.348 | 153 | 1084 | 1 |
| 朝鲜 | 0.765 | 75 | 3965 | 10 |
| 古巴 | 0.723 | 86 | 3000 | 17 |

① 差额为正,表明其排名优于按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负,则相反。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所谓发展政策的目标,其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而且,对这一目标的理解,也随时在发生变化,甚至连“华盛顿共识”的早期参与者,包括世界银行,对这一目标的理解,也是这样。政策上应严重关注的,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平衡稳定、持续

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涉及到收入的分配、自然环境保护,以及民主本身等等。我们对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关工具的认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对发展所包含的其他目标(像可持续发展,人人平等,民主发展等)也有了更广泛的认识(Stiglitz,1998,p.1)。确实,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比起来,世界银行更关注社会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发展。当然,世界银行不仅对转轨国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就提高生活水平和减轻贫困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现在,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加入到关注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果实的行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执行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公平性问题,他提出:为什么基金组织要考虑公平问题?第一,从社会公正角度讲,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应当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虽然人们对如何做到收入的公平分配这一问题还有争论,但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关于实现公平的手段方面也是有争论的:调整政策应当是公平的,公平的增长更应当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应对减轻贫困的方案,也应对关注收入分配的方案予以支持(Fischer,1998b,p.1)。这一次,政策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确实没有混淆。

毫无疑问,变革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后社会主义经济从衰退到增长的痛苦经历,以及并未跟随早期“华盛顿共识”而保持持续增长的亚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促使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就像80年代拉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一样。然而,从新的共识的出现,到采取恰当的政策行动,这之间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

III

漫漫长途

6

转轨政策和发展战略

6.1 转轨是一个体制推陈出新的过程

转轨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机会在于一个恰当的
制度设计(设置)的有效运行,而这必须是从一开始
就着手培育完善的。这种设计在前苏联的各个共和
国内比在东欧要困难得多,因为前者甚至缺少像国
家中央银行或自己的独立货币这类基本制度,而生
产方式中的私有特征更是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过
度自由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度放权的国家,这种
本质上具有渐进特征的制度重建却会更加困难,而
在亚洲改革了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其运行则较为稳

健。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些采取了渐进的(在有些情况下是太慢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尽管伴随其后的是相对温和的收缩,但它也导致了关键的结构性改革的滞后。如果把这些时间用来进行正确的制度建设,则益在长远;如果从制度改革的角度而言,渐进式的自由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那么长期的扩张机会就微乎其微了。其他国家选择了激进改革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初阶段会经历更加严重的收缩,但它们在后来的制度重建的步伐却会加快。从长远的观点看,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两种类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将终于认识到:离开政府制定的明智的发展政策和设计合理的制度设置,市场经济不可能扩张,这使它们都有机会在向市场经济的努力中取得成功。

国家对于制度重建的管理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确实,这一——而不是自由化——才是转轨的实质和核心(North, 1997)。换句话说,没有对制度安排的足够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效益。有人指出,“当自由化和私有化同时被实施时,在市场自由化之后,私有化可能会实际上阻碍转轨进程并削弱整个社会的福利。……与成熟经济中运作规范的市场相比,转轨经济中的市场以市场环境(包括价格与产量在自由市场状态下的均衡水平)更大的不确定性为特征。市场参与者必须通过参与市场活动来了解这些环境。在深入分析这些环境后,私有化的最佳水平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单调地下降了”(Goodhue, Rausser 和 Simon, 1996)。因此,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合理的制度设置,就会出现市场失败和不规范的制度化(Stein, 1993)。

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们的话来

说,代之以一个健康的市场的的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要识别运作良好的制度安排是很容易的:每个主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并少有冲突,经济发展平稳迅速。而在一个运转不灵的制度安排中则是“强盗资本主义”盛行,欺诈与腐败屡见不鲜,变革则总被官僚制度所遏制(Stern和Stiglitz,1997,p.20)。这种制度性病理可能产生于随机性转轨,而不是规划性转轨中。在几个案例中,不够精确的转轨政策也导致了这种逆境。一个“只有傻子才缴税”,或不按协议执行合同,或不按时付款的体系几乎不能被称为市场经济,而更类似于一种产生于制度性不调和的混乱。在早期的转轨经济中,由于缺少完善的自由经济框架中能够使各类主体各司其职的组织和机制,这种混乱是很常见的通病。

如果没有对实现新体制的明确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变就无从谈起。转轨会被拖得很长:成本比所需要的更高,效果却比可能达到的要小,整个过程被不必要地拖延。而且,正如规划性转轨的倡导者们所强调的那样:衰退持续得更长而复苏则来得更迟,产出增长非常缓慢。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在转轨的过程中成功地完成制度设计,但这个任务因制度的不连续性而显得更加困难:老的制度设置(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分部)已不再起作用,而新的制度配置(如投资银行部门或股票交易市场)却尚未到位。

市场资本主义的根本不仅在于私有产权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于竞争的企业部门,功能齐全的市场及对市场配置规则的尊重。运作良好的金融中介对于促进贸易及投资交易必不可少,并对促进储蓄至关重要。然而除此之外,市场还需要适宜的法律环境,以支持市场规则的执行,并保护企业、家庭、组织以及政府等经济主体的合法行为及合同的强制实施。在制度配置最为先进的国家里,对政府部门来说,有时最大的麻烦

恰恰来自于最高法院,它能推翻由于政府中多数意见的坚持而在议会中通过不久的不恰当的法律。短期内这虽然不能使政策的制定变得容易,但从长期来看一定会促进法制进程。

好的制度建设对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一般的说法是市场组织构建越完善,公共服务对这些组织活动的适应性越高,经济与社会越会良性发展。世界银行在它的一份世界发展报告的特刊中,在强调政府在当代经济中的作用、指出区分手段(制度与政府的作用)与目标(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当其角色与其能力相适应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但它的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政府希望进一步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社会福利,这种能力还能够并且必须进一步提高。三套互相关联的机制能够帮助创造促使政府加强其职能的激励机制,它们是:

- 加强社会及政府的规章建设;
- 促进政府内部及外部的竞争压力;
- 广开政府内部及外部的舆论渠道并促进其合作关系(世界银行,1997B)。

这对于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适用的,不因其经济活动的范围、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及机构设置的先进与否而有不同,对于转轨经济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在那些经济规则长期以来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理想状态相去甚远的国家里,新规则的确立与经济主体的新行为规范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政府坚定的支持与决心。不幸的是,这些政府的能力不仅比计划经济时要弱得多,与社会文明成熟、制度运转良好的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它们也相形见绌。当然,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权力是被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有意削弱的,并时常受到发达工业国家和受其控制的国际组织的官方支持。由于自由化政策及其实

施的方式已经允许所有的一切摆脱旧政府的控制,那么目前的困难则是要把一切重新置于新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在 1997—1998 年关于俄政府一再拖延备用贷款的分期偿还义务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法征收税款是财政制度瘫痪的结果,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的切实提高预算收入也无甚成效。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俄政府缺乏打击逃税避税行为的决心,而是除此之外的系列错误的转轨政策——其中不乏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认可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后患仍在。结果是,新规则的实施(如纳税及其他付款义务)将变得十分艰巨而持久。早期实行的错误的“休克”越多,后期建立并实施新规则的任务就越困难。

在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常常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政策,短缺综合症又消除了对真正竞争的需要,而在转轨时期由于原有垄断结构的遗留影响,竞争也非常虚弱。为公平竞争创造新的组织和制度框架需要时间,需要无数的文明组织的发展壮大。但即使已经建立起竞争结构和促进其运行的法律体系,政策的制定也必须强调对生产者行为的规范。卖方、分销人与经纪人都必须知道:市场是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地方,而不是他们互相欺骗和骗人的地方——无论骗的是顾客、竞争对手还是财政部。基于以上原因,反垄断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建立,运转良好的支付体系的组织和对谨慎的财政政策的遵循是十分重要的。

谈到市场参加者间的伙伴关系,这恰恰是渐进的制度建设的要旨所在。它能从长远上提高社会的生长能力,但在初始阶段,所发生的变革会使经济活动各个参加者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旧的联系已不存在,新的联系却尚在形成之中。市场关系常常会与因各种游说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包括

有组织的犯罪甚至极端情况下的黑手党)的活动而导致的非常事件相联系,政府介入因此显得愈发重要。

6.2 转轨是一种发展战略工具

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的基础上。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当然,还有一个由谁来执行和怎样执行这个任务的问题。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课堂上谁是学生,课程表是什么,但仍旧存在谁来做老师的问题。新兴市场的经历是一个好的教员,但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学习的进程将会很慢。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可不像摩西(Moses)那样,有40年的时间来引导他们的人民。能加速这个进程并降低制度和文化的调整带来的成本当然很好,但这需要对当局者、政治和文化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进行特殊训练与教育。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家中的很多机构也正在为这种加速过程作出贡献。当它们最初几年参与了帮助转轨活动却收效甚微之后,终于悟出有时候提供技能与知识比单纯提供贷款更有帮助,于是它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转轨国家的技术帮助和职业培训。

对那些原来就相对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学习过程就快得多;如果原来就存在私有部门和国有公司的非集权管理,学习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顺利得多;如果二级银行体系业已存在,向真正商业银行的转变就比较容易;而原有的在短缺经济下不起什么作用的反垄断制度,在一个卖方市场上

却大有可为。

对那些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末的国家来说,学习的过程则比较缓慢。这一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虽为邻国,其经济表现却相去甚远。较快的制度重建进程会改善经济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会加快整个进程,虽然如果管理不善,将会适得其反。但这种潜在的风险不能成为政府削弱管理的托辞,相反,它对提高政府指导水平和合理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更长远的目标说,转轨应该被视作发展战略的执行工具,不能导致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变革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变革的促成更多地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并受到某些团体的欢迎,却不深入考虑其对整个社会的实用意义。在发生革命性变动的时代,这种变革的动机尤其强烈,决不容忽视。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恰恰具有如此的时代特征,不管它们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政治动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不同利益的特殊团体,而顶住它们的压力推行长期发展导向型的方针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存在着各种方式的游说以维护特殊团体的既得利益,就不会有同样坚定有力的游说来捍卫长期的发展和政策目标。

不管如何清楚地强调体系性的转轨只是实现更加重要的目标的工具而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在很多问题上仍旧模糊不清:首先在关于制度变革与真正经济扩张的相互关系上,当经济增长不如人意时能说体系本身是完美的吗?或者能在经济扩张能力很虚弱的时候对这种体系表示赞美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事实却往往如此:甚至国际组织的文件和专业人士也常常不顾实际效果地对改革大加赞赏,仅仅因为它们是“改革”。因此东欧与前苏联国家的剧烈经济衰退一方面是

由于忽略了发展政策并过分夸大了转轨的作用,一方面则是由于将转轨与自由化、私有化混为一谈。这种政策主要强调稳定性、贸易自由化及私有化,而不去注意真实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生产、消费、投资、失业,等等。这种做法改变了经济的初始状况(尽管一直没有好转),导致了经济的收缩而不是增长。

与此相反,注重发展政策并将市场导向型的改革作为成功发展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发展(Montes, 1997)。就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的确是很有趣的,因为从未有过如此的繁荣。在东欧失败了的改革在亚洲却很奏效。在亚洲,我们可以区分体系设计与政策指导,它们能够利用自身体制的优势,并为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时刻准备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挑战。这是一种利用体制本身及其改良形式作为发展手段的能力,而不是目的。

因此在每一种政治体系中都有一定选择的空间,进行不同的政策尝试,并且体制本身不能与好的政策互为替代。有时候——历史上大多数情况如此——我们只需对现有政策加以修正而无需将之全部推倒重来。转轨时期当然也不例外地有一定的空间来实施好的或坏的经济政策,明智的或不那么明智的政府行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以长期的观点来看,体制的设计对经济扩张及发展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一届政府下台后,下一届会接替它们的位置;一个政策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其他政策又将登场,因此体制的设计应足够灵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考虑到它现在的角色及常常难以预见的新角色,这种体制已在过去改变了多次并将在未来改变更多次。因此,尽管转轨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整个转轨过程应被看成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如果处理得当,它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6.3 制度建设：从休克失败到渐进疗法

对市场表现与管理的不同经验与知识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产生模式：随历史发展渐进生成与在后社会主义转轨中的直接引进。与过去不同，我们如今已确实了解了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置。如果我们将这些知识与后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有可能实现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但这种飞跃也不是不需要时间的。

我们需要建立制度设置，但更需要了解制度设置，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制度及其形成的过程影响着经济绩效。制度设置通过决定生产与交易的成本（与所使用的技术一道）来影响经济表现。它们是由正式的法规、非正式的约定及其不同的执行方式构成的。正式的法规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改变，改变非正式的约定则相当缓慢。但它们最终是由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这些主观认识决定了人们对正式法规的选择与非正式约束的形成。制度与组织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游戏规则，后者则是由共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集合（如经济组织有企业、公司及工会等，而政治组织则有政党及立法制度等）（North, 1997 p. 1）。然而从正式的观点看，即使是制度设置也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或者更精确地说，为了推倒原有制度安排的种种法规，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这个夜晚最终来临之前完成。

“休克疗法”失败后，尤其是由于旧体系制度设置彻底解体带来的体制真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以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进行，其进度较为缓慢，措施也更为谨慎。事实证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以结构、制度及行为的渐进转变推进。转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极

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决不能急于求成。它需要时间并要从经济上和财政上付出代价,它极具风险并受制于社会政治气氛。在这个多层次的转轨过程中,只有与稳定政策相结合的自由化可以以激进的方式推行——如果当时的政治条件允许的话。是否这样做通常不是转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一方面取决于货币与财政不平衡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容忍程度。

结构调整、制度改革和行为变迁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持续数年。举例来说,东欧国家使用盗版计算机软件的比例大约为 77%,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为 20%,为转轨国家的 1/3 左右。更有效的法制与市场体制只能部分地解释这种现象。虽然大致说来,一个较弱的制度安排与一个成熟的安排下的不同市场文化导致了上述不同的比例,但即使在市场制度健全、市场文化发达的美国,行为变迁的过程也仍在延续,在每 5 个被使用的软件中就有 1 个是偷来的,因为这正是盗版的含义所在。

虽然在社会民众和政治家们看来转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考虑到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和复杂,它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很短的历史瞬间。历史上不同环境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都比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与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转轨要漫长得多。10 年对于改变一种经济制度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因此,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还是应该被看作一个较为迅速的结构、制度和行为变迁的历史进程。

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困难并不在于对市场运作知识的匮乏,而在于如何克服目前严重的体制和结构危机,从后社会主义的特殊时期到真正的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新的制度和组织的目标设计,而恰恰是对达到这些目标的具

体转轨过程的设计。因此,要回答的最困难的问题不是这个体制在最后看来怎样或将如何运行,而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何达到理想的目标。在转轨初期就大讲特讲华尔街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并没多大用处,因为那时最需要的是关于资本市场的基础知识而不是资本运作的高深理论;在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归国有的情况下倡导英国式的私有化则是误导;而以激进的方式推行房租自由化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太快的价格增长会使人们的真实收入很快下降到社会可承受的水平之下。

听起来奇怪,西方虽然对大灾难带来的后果有很多研究,但却很少研究社会主义解体带来的后果。在国防部的资助下,曾有人研究过热核战争(Hirshleifer, 1987)后经济复苏的前景,但没有人研究过转轨后的经济复苏问题,然而很多人相信,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收缩将是很严重的。

大量的西方理论知识与技术,尤其是关于稳定政策与结构改革的,在完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被运用到另一种经济体制中并被执行。在稳定化的早期就有人对此提出过警告,但被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样评论道:“显而易见,(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财政体制及其发展轨迹了解得非常有限。这将导致政策顾问们的意见出现偏差。制度设置对政策变革的限制可能被忽略,并创造出对政策执行速度的不切实际的预期。事实上,早期关于‘大变革’的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忽视实际情况的结果。财政政策根本不可能有‘大变革’的解决方式,因为在新的政策被引入之前,新的制度尚需时间和努力才能建立”(Tanzi, 1991)。因此,“大变革”的观点在几年以前就被认为是忽视实际情况的结果,只是当时没有被认真地对待。

因此,由于部分很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和重要国际机构

对前中央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缺乏了解，他们出人意料地陷入了新的人文与政治挑战之中，这迫使他们为此积累新的知识并最大程度地运用这些知识。这确实是一种“休克”，但却未能随即带来相应的治疗。我们可以认定：考虑到它所有的优点以及与转轨特征、目标的不调和性，“休克疗法”是缺乏合理的政策反馈的直接结果。它是经济思想的又一个幻觉，而不是真实的视觉(Heibroner 和 Milberg, 1995)。

专业人士对转轨政策的选择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而由于局部的政治自由化和早期的市场改革，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则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这为大量转轨理论概念的实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有些国家的转轨更多的是因为偶然因素的存在，也有一些国家的转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尽管设计本身也是多方面的。确实，对一些圈内人士来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颇具乐趣的实验学科，在此之前，还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实践。

所谓的“苏维埃政策研究”(包括它广泛的经济研究)，也全然没有预料到转轨开始后带来的巨大变化而有些束手无策。其研究只集中于对旧体制的描述，对其低效及脆弱的一面(甚至还研究了使其进一步削弱的方法)非常重视却不怎么真正关心其最终解体带来的灾难。令人迷惑的是，几十年来它们的主要宗旨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斗争，但当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真正解体时，苏维埃研究者们和其支持者却既无法提供可以操作的蓝图，也不知该怎样对付由深层的体制危机向美好的未来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这些却都应该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议题。

当然，“休克疗法”和“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如果不是由转轨国家中的当局者来执行的话是不会产生任何危害的。造成目前这种危机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来

承担,因为在一直存在另一种可以更好地缓和社会矛盾并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时,他们总是选择了相反的手段。真是不幸,那种后来发展成为“波兰模式”(Hausner, 1997; Kolodko 和 Nuti, 1997)的提倡渐进的但又综合而坚定的改革,同时包含了对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和新的制度安排,(Kolodko, 1989 和 1992; Laski, 1990; Nuti, 1990)从一开始就遭到冷遇,或充其量只是部分地得到执行。

同时,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也开始了。东方和西方先前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方式都得到了大的发展。转轨国家中的专家们已经熟悉了市场表现的知识,规模相当的政治与思想争论、国内外的培训及实践经验的丰富,都大大推进了改革的进程及大量称职的研究人员、企业家及政治精英的产生。发达国家的专家们,包括政府中的转轨问题专家、国际组织及商业团体中的专家,已经习惯了转轨国家的具体国情。他们能了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不同特点,并也开始理解应该用一种与过去显著不同的甚至是非正统的方法来迎接挑战。最后,能促进持续增长的制度建设对转轨的重要性终于被大家接受,正确的方针政策似乎很快就会出台了。

不幸的是,对东方国家而不是对西方精英和纳税人而言,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代价是很高的。将来的发展并不能弥补已经发生的经济衰退。同时,转轨国家的经济收缩甚至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如果我们能更多地对转轨的可能途径有一些了解,或者对西方经济学说和政策建议的调整能早一点出现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一定会出现,至少能部分地加以避免。早期对后社会主义综合征开出的药方都没有找到具体的病根,即使从医生的角度看处方是正确的,它也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个特定的病人。

随后,建设一个渐进的、市场导向型的制度设置的努力终

于出现了。制度建设不仅意味着各种组织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意味着在经济舞台上各个参与者的正确行为规范。这样,随着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合作与协助的出现,转轨政策向着正确的方向调整。市场组织建立起来了,新的法律文件出台并被采纳了,新的技能也得到了传播。然而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事实上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其程度较小)在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至少从制度设置的角度而不是从它们切实取得的成就看是如此,但转轨引起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现在它们的代价不会那么高了。

7

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概念和实施

7.1 私有化、新兴私营部门和公司治理结构

确信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相反，能带来较高的效率、产出增长及较高生活水平是推动体制转轨的主要动力。在关于社会主义、转轨及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中，私有产权较之国有产权的优越性及私人管理较之国有管理失效的优越性总是一个焦点。姑且不论那种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运行完美的一般观点，转轨的整个概念是建立在向私有部门转移资产能够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这一正确假设之上的。激活私有部门有两种方式：一，如

果市场业已存在,私人部门具有扩张现有业务并兴办新公司的自然倾向;二,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产权从国有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正统的自由经济理论往往强调后者对成功转轨和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即“快速私有化”所宣称的国有资产非国有化。

与中国和越南的市场改革和发展政策不同,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在改革的早期对新兴私有部门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而过分强调了非国有化的作用。只是到了后期,新兴私有部门才被认可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尤其在阿尔巴尼亚(1997—1998年的危机以前)、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1996年之后)、蒙古(1995年之后)、波兰及斯洛文尼亚,新兴私有部门对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独联体国家,新兴私有部门——主要是服务业的中小公司——为经济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而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的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政策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带动了最近的复苏。

这样,全面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实业界的自由进入及强行退出政策以及鼓励建立和扩展各种经济活动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供给方的积极性。得益于自动的资本积累、增长的储蓄倾向及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新兴私有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中小企业的扩张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例如1998年,波兰的私营中小企业贡献了大约1/3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为非农业提供了大约60%的就业机会。1994—1997年在100万再就业的人群中,大部分是被新兴私有部门雇用的。

因此不是“非国有化”,而是基层私人部门的蓬勃发展和所谓的“有机”的私有化决定了后社会主义的复苏与增长。持续的资本积累与积聚也导致了大型私有企业的产生,它们一

方面能与国外对手竞争，一方面可以与国有企业相抗衡。随着贸易与资本转移自由化及有利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大量的外资私营企业开始运作。它们或者是外商独资企业，或者是与当地的国有或私有机构合资而成。

虽然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出资人大部分来自于发达国家，但也有许多是来自于其他转轨国家的。只要有政策支持，包含来自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的合资企业数就会上升。例如在俄罗斯，1998年与波兰私人部门合资的企业已达到2500家，而在乌克兰，这个数字为800。这些数字的意义远比单纯从它们对贸易收入和全部产出所作的贡献判断要大得多，因为现在它们是为在增长的国际竞争中进入新兴的后社会主义市场而服务的。因此，这些企业与管理人員重新进入后社会主义市场，虽然是同一个场合，内容却完全不同，例如，捷克的企业再也不能像10年前那样与哈萨克斯坦做生意了，虽然还是那群生意人，但他们现在必须迅速地学会新的技巧：同样的人，行为方式却大不一样了。

跨国界的交易刺激了邻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毫无疑问，以企业家精神著名的波兰人能向立陶宛、白俄罗斯、斯洛伐克及乌克兰等邻国传递一些他们特有的技能和市场文化。匈牙利人则无疑对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所帮助。马其顿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帮助也有一点。在亚洲东南部，越南人加强了柬埔寨与老挝的商业气氛，而中国对蒙古、塔吉克斯坦及几个其他国家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存在地理上和距离上的障碍，自由化的积极影响和自主经营的强大动力使这种企业家精神在整个地区迅速蔓延：在一些边远的地区如里海海岸的巴库和波兰南部的热舒夫(Rzeszow)很快就出现了用包机往返运输商品与商人，而在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和中亚的塔什干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以前的

体制下是决不可能出现的。

私有经济扩张的第二种主要方式是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它建立在非国有化可能很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带动供给水平与经济增长的正统假设之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情形并未出现。当然,尽管非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方式本身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滑坡如此严重以及为什么恢复到转轨前的生产水平和重构企业的生产能力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后来还是出现了很多评论,试图将经济收缩和持续衰退的责任归咎为中央计划经济的后遗症。

正如我们说私有企业从长远看优于国有企业是正确的一样,我们说在转轨初期由于近乎狂热的产权转移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严重的扭曲也是同样正确的。用政治手段强制执行及时间要求紧迫常常造成私有化的准备不足,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进一步恶化。然而随着非国有化的深入,经过过渡时期的混乱之后,配置效率将逐渐改善。但同时,全部的资本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本的不充分利用使生产能力进一步萎缩。在原有的资本不能充分利用的同时,由市场配置的、来自于新的投资的资本能力却又未能到位。这一切都是由于产权革命带来的动荡比预期的要长得多的缘故。

因此,考虑到真实经济的内在结构,执行一个合适的产业政策并将私有化看作贯彻这种政策的工具是有益并实用的。当然,如果制定了错误的产业政策体系,政府将无法正确管理其经济功能,自由市场经济者所鼓吹的无为而治从来不是万灵药。产业政策不应以挑选并支持胜利者为基础,而应以促进贸易与传播技术进步为己任。这种政策还应通过保证贸易融资等一些安排和向国外直接投资来部分化解企业家的风险。通过促进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来促进技术进步的溢出

效应和竞争的成功范例不胜枚举，然而使人进退两难的是，在转轨经济中新的产业政策必须由老的官僚体系来完成，而它们对新的经济环境并无很好的准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国际组织加强对官僚体系及私有、公共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的综合再培训就显得更加重要。

转轨早期常常有两种风险（其实在任何时期都是这样）：或者是产业政策被自由市场的狂热派和政府干预的反对者所忽视，像克劳斯政府下的捷克转轨；或者是政府官僚主义过分执行产业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例如在 1997 年政策调整以前的罗马尼亚及现在的白俄罗斯，人们对一些老体制下的典型做法仍带有某种怀旧情绪。但在市场机制尚处于幼儿期时，政府的干预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干预应旨在加强与支持市场力量的建设，而不是要替代它们。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对缓解经济收缩和促进复苏至关重要。它的完成必须与公司化相结合，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必须在合理的私有化之前迅速适应市场竞争的压力，并在没有正式的产权转移的条件下将自身置于规范的竞争规则中。这需要硬预算约束并改变法律体系，即在国家仍保有对资产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将国有单位转变为股份公司。大量的转轨经验和统计数字表明，国有部门的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发展就越迅速（Konings, Lehmann 和 Schaffer, 1996）。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与正确的产业政策相结合并配以国有资产渐进的非国有化，复苏的步伐将会更加迅速，以后的发展也将更加强劲。

将波兰早期惊人的转轨经历（1990—1991 年工业产值骤然下降了约 40%）和 1996—1997 年经济增长率 20% 以上的显著增长相比，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最初的两年不仅缺少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甚至还存在着对国有企业的歧视。单

纯对国有企业采取一些特殊的财政措施和额外的信贷限制(即使是最有竞争力和盈利的国有企业在向国际金融组织借贷上也存在限制)。在1996—1997年,两个部门都被平等地对待了。这样,不仅新兴私有化部门为飙升的产值作出了贡献,国有部门效率的提高与竞争能力的加强也扮演了活跃的角色,它们不仅没有成为财政的负担,还为就业与出口及国民收入作出了正面贡献。

因此,公司化必须被作为私有化的补充政策,而不是其对立面或是作为替代品。公司化作为涉及范围更广的商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也强调利润导向和改变管理动机。“私有化政策在提高公共目标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如竞争性市场在帕累托最优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例如,在缺少竞争的情况下私有化和无约束的垄断对消费者来说只会引起更高的价格。……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的区别是很模糊的,并且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安排。例如,公司化使政府在保有对资产的所有权的同时使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并产生自我融资的能力,业绩导向型的政府组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激励机制。这表明,在私有化出现以前,私有化带来的好处就通过建立有效的个人与组织激励机制体现出来了。”(Stiglitz, 1998, p. 21)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部门的商业化带来的,而不是由私有化带来的。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显然是吸取了这个经验,它们都尽力将商业化政策作为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

有些国家在转轨以前就进行了一些商业化的尝试。尽管后来就此出现了很多政治争论甚至是基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斗争,它还是被坚持下来了。这场斗争的焦点更多地是基于对经济控制权的考虑而不是对效率与增长的考虑。从促

进增长的角度看,在一些情况下商业化政策甚至比私有化更有效。波兰在1993年后改革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商业化政策,而不是非国有化。后者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只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乌兹别克斯坦出现的相对较温和的经济收缩也要归功于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和预算硬约束的施行。随着私营部门的快速增长,国有部门的商业化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较之非国有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

这样,在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情况下,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而不是用歧视化的财政金融政策将其置于死地就显得十分明智了(Nuti, 1997a)。从规范的观点看,即使是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著名的认股权证换股权的私有化也花了3年的时间,而公司治理结构和效率却随后未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相反,由于私有化带来的混乱使整体效率反而下降了。那种认为忽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推迟微观经济结构的重建能够加速私有化进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也许通过行政性破产的办法消除国有资产相对容易一些,但这种政策也毫无疑问将导致衰退的加深而不是避免衰退,最终使复苏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简言之,国有部门的管理失误越多,转轨中的衰退就越严重。反之,对国有部门的改革越慎重,复苏与增长开始得越早。这些经历中的教训——哪些政策行之有效及其原因、哪些失败及其原因——仍有待研究和实践,因为从长期看,私有化与公司治理结构仍是两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7.2 利益集团和为增长服务的游说团体的形成

一个支持增长政策的游说团体的形成关键在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发展。考虑到社会主义体制下游说团体的根源、特点及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与新体制扩张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不能采取观望的态度旁观在混乱的转轨过程中有何种利益集团会产生,而应该配合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培育适合新的有影响力的政策游说团体。我们不能假设支持经济增长的游说团体会自动地从一些社会阶层中产生,这种消极的政策是不起作用的,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政策导向。

虽然随着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深入自动出现了一些活动,维护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的创造还是要靠事先设计。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官僚集团都不能靠自身的力量演变为维护增长的游说团体的中间力量。一个提倡发展的领导集团必须通过深化社会改革和推翻旧体制发展起来,并有必要对这种集团的形成予以干预,因为它们本身也处于转轨中。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与利益集团的演变有很强的互动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是新兴的增长游说团体取得胜利,就是从老体制演变而来的新官僚领导经济事务。最坏的情况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他们经常与政治新贵们有密切的联系——在非正式的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地位从而左右政策的制定。

也许有人认为由于完全的自由化和结构改革而形成的新兴中产阶级会演变为维护增长政策的游说团体。但如果自由化和改革的进程得以促进并加速,就必须有更强有力和更坚定的政治领导。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转轨社会中应首先由企业家、投资者、经理以及改革导向型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组

成,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包括其制度、行为和文化领域)则是主要的阻碍力量,因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与计划经济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这种游说团体的形成是一个值得特别努力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由于这种过程伴随着旧有势力的衰落和新兴精英的兴起,它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首先,旧的统治力量力图保住原有地位并成为新的统治力量;其次,这个过程将致力于敏感的私有化和金融体制改革,这将引起关于社会目标最佳实现方式的激烈争论;第三,它同时与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符合民主秩序的制度的出现相联系,这些都影响到经济游说团体的产生过程。换句话说,个人、团体和党派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与新游说团体形成后对经济的作用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企业家精神主要关注于资本积累、投资、出口扩张、扩大就业及公平竞争,就会产生强大的支持增长的游说团体;如果这种精神主要关注于现有资本的再分配、合并与兼并、逃税避税、剥削劳工及不平等竞争,这是一种“民粹资本主义”,这样的游说团体则基本上是反对增长的。

在各有关团体中,无论他们是企业家还是经理,是银行家还是投资者,是政治家还是工会领导,是公务员还是经济学家,是律师还是记者,其中既有真正支持增长政策的团体,但也确实存在为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经济增长甚至牺牲全社会利益的团体。对政治领袖们的挑战在于在加强新兴的维护增长政策的团体的同时,协调宏观政策使主张经济增长的团体在势力上压倒民粹主义的政策偏离并削弱保守的官僚势力。协调转轨与发展政策致力于协调平民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斗争,前者过分关注收入分配和消费不太重视效率,后者则太强调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公平。因此,高明政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协调好强调社会公平的消费政策

与强调为将来的增长而加强储蓄和投资的政策。

占据原来的党派积极分子、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厂长们的空缺的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是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并不仅为自己的决策负责还要为决策带给别人的后果负责的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以前是政府，现在是市场——的做法不再有效。但企业家精神和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性格与技能有关，换句话与个人的气质和知识水平有关。虽然性格是天生的，其他能力却是需要别人传授和学习的，更与政府旨在商业圈中加强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的政策有关。即使企业家们自认为知道如何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企业家精神问题、市场问题、风险评估问题及管理问题，政府也不能因此停止使这些宝贵的能力得以增强的努力：这些能力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新兴企业家都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团体中的一员。在一个较弱的制度建设环境里，确有一些人与我们的期望恰恰相反。同样在那些我们认为支持增长的核心力量的人群中也有些团体是能危害经济扩张的。例如，有些企业家违反法律，不遵守市场规则甚至偷税漏税，从而削弱了政府的财政地位，间接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当然他们为自己辩护时也显得很有逻辑：缴税越少，他们越有能力储蓄与投资，从而扩大自己的再生产。但实际上，这同时减少了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公共开支资金。

多年来，在原有职工退休并被新一代替代之前，私营公司和商业化公司的大多数领导是从前国有企业的厂长们中挑选的。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转变到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方式中去，因为这毕竟与先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将一个长期习惯于封闭的国有经济的厂长转变为一个竞争性市场机制下的私有企业经理就像将一个计划经济的热衷者转

变为一个市场经济的狂热派一样困难，而实际上后者的转变还稍微容易一些。前者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当激励机制设置恰当的时候），但决不是普遍现象。将旧时代的政治家转变为新时代的领导比将旧型厂长转变为新型经理要容易一些。

在指令性经济和短缺经济中，国有工厂中的最大部门是采购部门。但在转轨经济中，对已经私有化和商业化的企业来说，重要的不是原材料采购，而是如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将产品卖出去。即使经理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来掌握新的技能——情况常常是这样——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微观管理上的错误也会对整体产出产生消极影响。激进的自由化在这儿不是万灵药，而恰恰相反。这种后社会主义的经理在新兴市场的压力下很容易不知所措，而最终对企业的效率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经理们表现的变化是很不同的；有些很快投身到致力于经济扩张的努力中去并乐意接受开放的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挑战；另一些则退回到坚持计划经济那种他们最熟悉的模式。尽管代表进步的势力准备接受风险并确实形成了游说集团，其他人却十分保守并为要求补贴和救济而不是为竞争和消除管制游说。虽然保守的游说表现方式不一，实质却相同，因为他们都试图通过游说来影响收入再分配，使某些市场信号失灵，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当然，从长期看，经济中的管制越少，主张增长和利润导向型的经理的游说集团就越大。然而行动过头的风险也总是存在的，政府对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微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或错误干预都会削弱增长导向型游说团体的力量。

7.3 非正式组织：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

一方面,政府对发展性政策与体系性变革的关系协调得越好,增长导向型的游说的力量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当制度建设的发展还不健全时,政府越是偏离这种政策,非正式的利益集团(包括官僚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活动空间越大。虽然在经济发展与腐败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某种联系,但目前并不清楚究竟是何种联系。有些经济学家撇开道德问题而认为腐败能提高效率,他们举例说当进口许可证被官员们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争者时,能比将其随机地给予某个人更能提高产出:虽然前者无疑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由于该生产者(竞争者)能更好地使用进口商品,从而提高了效率。然而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打击腐败不仅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因为它将从长期上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Johnston, 1997; Kaufmann, 1997; Mauro, 1997; Rose-Ackerman, 1997)。上述研究是数家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为消除腐败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转轨经济产生的威胁而作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转轨国家似乎比与其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腐败程度稍轻,并且也不比某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更高的国家(包括一些经合组织和欧盟成员国)更腐败。国际反腐败组织曾对50个国家(地区)进行了研究,并专门设计了一套所谓的“腐败透视指标”,根据各国的法制透明性、制度建设的成熟程度等各种事实及民间流传的证据等各种因素来综合分析腐败程度。全面自由化水平、经济活动规则、许可证制度、市场进入政策、法律部门的效率、官僚体系的水平、财政制度的效率及透明性、税收体系、海关的效率及管理,这些都被视为考虑因

表 16 部分国家(地区)的腐败透视指数
(黑体字的国家为转轨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 国别 (地区) | 腐败 透视指数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美元) PPP* | 国别 (地区) | 腐败 透视指数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美元) PPP* |
|------------|------------|------------------------------|--------------|-------------|------------------------------|
| 丹麦 | 9.94 | 21230 | 比利时 | 5.25 | 21660 |
| 芬兰 | 9.48 | 17760 | 捷克共和国 | 5.20 | 9770 |
| 瑞典 | 9.35 | 18540 | 匈牙利 | 5.18 | 6410 |
| 新西兰 | 9.23 | 16360 | 波兰 | 5.08 | 5400 |
| 加拿大 | 9.10 | 21130 | 意大利 | 5.03 | 19870 |
| 荷兰 | 9.03 | 19950 | 马来西亚 | 5.01 | 9020 |
| 挪威 | 8.92 | 21940 | 南非 | 4.95 | 5030 |
| 澳大利亚 | 8.86 | 18940 | 韩国 | 4.29 | 11450 |
| 新加坡 | 8.66 | 22770 | 乌拉圭 | 4.14 | 6630 |
| 卢森堡 | 8.61 | 37930 | 巴西 | 3.56 | 5400 |
| 瑞士 | 8.61 | 25860 | 罗马尼亚 | 3.44 | 4360 |
| 爱尔兰 | 8.28 | 15680 | 土耳其 | 3.21 | 5580 |
| 德国 | 8.23 | 20070 | 泰国 | 3.06 | 7540 |
| 英国 | 8.22 | 19260 | 菲律宾 | 3.05 | 2850 |
| 以色列 | 7.97 | 16490 | 阿根廷 | 2.81 | 8310 |
| 美国 | 7.61 | 26980 | 委内瑞拉 | 2.77 | 7900 |
| 奥地利 | 7.61 | 21250 | 印度 | 2.75 | 1400 |
| 香港地区 | 7.28 | 22950 | 印度尼西亚 | 2.72 | 3800 |
| 葡萄牙 | 6.97 | 12670 | 墨西哥 | 2.66 | 6400 |
| 法国 | 6.66 | 21030 | 巴基斯坦 | 2.53 | 2230 |
| 日本 | 6.57 | 22110 | 俄罗斯 | 2.27 | 4480 |
| 哥斯达黎加 | 6.45 | 5850 | 哥伦比亚 | 2.23 | 6130 |
| 智利 | 6.05 | 9520 | 波利维亚 | 2.05 | 2540 |
| 西班牙 | 5.90 | 14520 | 尼日利亚 | 1.76 | 1220 |
| 希腊 | 5.35 | 11710 | | | |

* PPP: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译者

资料来源:世界反腐败组织和世界银行。

素并按常规的方法加权,最后得出整体结果。腐败程度越轻,则在0—10之间的数值越大(表16)。

从这个角度来说,转轨国家的腐败水平介于欧盟的最高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之间。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与西班牙、希腊、比利时及意大利等国水平相当是一件让人十分吃惊的事。然而罗马尼亚的情形就差得多(介于巴西与土耳其之间),俄罗斯简直就是倒数几名(在巴基斯坦与哥伦比亚之间)。当然,由于评估的方法问题,这个排名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与真实情况大致相近的情形,但不管怎么说它也提供了一些值得信赖的结论。因此,腐败究竟是怎样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增长与发展,一个国家持续发展政策与增长速度又是怎样为腐败创造了条件?有人说,一个国家越是腐败,这个国家便越是贫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又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腐败盛行的国家是不是发展都很缓慢;第二,缓慢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刺激了腐败的产生?

腐败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制约作用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腐败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腐败被看成是一种收入分配的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源并不是按市场规律分配的。它们的分配既不是对公共财富作出贡献的补偿,也不是对投资获得的最高回报率。它们根据非市场信号传递,并依赖于腐败的决策者的政治地位和管理权力。资本分配被扭曲了,并且在既定的储蓄倾向下,投资不像在透明的市场配置下更富效率。坦兹(Tanzi)和达沃迪(Davoodi, 1997)指出,腐败以损害生产率为代价引致公共投资的增加。所以,即使社会投资相对地增加,投资的效率也会由于腐败导致的扭曲而下降。

第二,腐败使社会储蓄倾向下降。非市场信号导致了稀

缺资本的配置被扭曲,使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相对下降,从而平均收入下降。这又从负面影响了社会储蓄倾向。另外,来源于非法活动和行贿受贿的收入不能用于官方用途,它们常常采取隐蔽和外逃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使东道国的储蓄率下降,这种形式的资本逃逸却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储蓄增加,也就是那些吸收这些储蓄并提供了兑换和洗钱服务的国家。也有人认为行贿受贿虽来路肮脏但促进了有效的资本集中,因而实际上提高了储蓄倾向;在拥有较多可支配收入的人群中储蓄倾向较高,通过腐败导致的资本积累与集中将使储蓄增加从而使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上述情形确会存在,因为部分新贵是从前国家官僚和非国有化了的工厂厂长转变而来,如果将在自由化和私有化期间因腐败而收取的贿赂用于最初的资本投入,他们就有可能进入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这种经历虽然不令人愉快,却也是转轨的一部分。一段时间后这些最初肮脏的贿款会变成新兴市场上的优良资产,因此问题是两种矛盾的情形并存。即使在转轨开始阶段腐败能提高储蓄倾向,长期来看其影响仍是负面的,储蓄倾向也随之下降。

第三,腐败消磨人的动力并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部分收入能自受贿等非法活动取得,人们依靠自己的健康努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就会削弱。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腐败获得收益而不愿再努力工作,同时无视法律的存在(包括必须遵守的劳动力市场规则)并不愿纳税,这使一些活动成为影子经济。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制度将产生更具破坏性的作用,因为这使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投资的意愿降低并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在腐败的国家,这方面的投资并不意味着会在将来获得更好的回报,因此腐败削弱了人们参加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热情。

第四,腐败使人们的预期下降。缺乏社会的统一和政治力量的制约确实使人们的预期倾向悲观。这将导致储蓄倾向下降,经济的整体效率变低。由于对未来的预期和经济的走势没有确定感,投资决策往往有失偏颇从而使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走向衰退。转轨经济也不例外。正如某些制度建设脆弱、市场文化淡漠的新兴市场一样,它们的一些经济特征也为行贿受贿创造了条件。就像跳探戈需要舞伴一样,腐败也要有两个参与者。如果有人接受贿赂,肯定有人提供贿赂。

第五,腐败导致政治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增加。毫无疑问,腐败将削弱社会联系并使社会的统一遭到破坏。如果国家机构的部分代表和政府官员受贿或索贿,则很难保证整个社会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态度会长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一旦人们相信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或处处存在以公谋私,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就会下降,有时甚至会公开反对政府,这也并不令人惊奇。

就贫困和腐败的关系而言,答案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偶然的联系。一个国家可能因为腐败而导致贫穷,反之则不成立。穷人不会向政府行贿,因为他们太穷。千真万确,穷人穷得行不起贿,然而在很多国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向低级政府官员或警察行贿,仅仅是为换取从事影子经济的权力或在灰色领域(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经商的权力。这种情形在埃及、印度或墨西哥等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十分常见的,它目前在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尤其是在巴尔干、高加索及中亚等收入较低同时制度建设较差的地区更是如此。

国外援助和贷款也面临这个问题。世界银行(1997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动地采取了特殊行动,更为积极地致力于反腐败的斗争。这种信念和行动出自于这个事实:虽然国

外援助和商业贷款理应用来促进结构改革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有时却被用于其他的目的,主要流入了某些腐败官员的私人腰包。上述情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常见,尤其在非洲。因此对流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部分援助也要密切关注。当然,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后社会主义国家已出现这种情形,但它们薄弱的制度建设、动荡的政治环境及某些坏榜样都可能使情况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更有必要在事前进行预防,以防患于未然。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转轨经济的一些具体特征更易使腐败发展,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私有化、放松管制与新闻媒体。就私有化而言,它确实具有腐败倾向,大范围的非国有化进程很难真正透明,许多半合法或不合法的作法掺杂其中,政府推行快速私有化的坚定决心和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更为腐败创造了机会。常有人说,当没有什么可以被私有化时才能更好地与腐败作斗争。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正确的是在没有真正取得私有产权以前,必须对私有化进程进行有效管理。因此,这里又存在着一些矛盾。私有化进程越激进,其卷入腐败的危险性就越大。但私有化完成得越快,官僚制度与非国有化进程的联系割断得越快,控制腐败就越容易。

就放松管制而言,转轨经济的特点是大量的规则作为前中央计划经济下过度管制的一部分遗产被保留了下来。过度管制的经济当然具有腐败倾向。这种观点本身就说明了自由化应以较快的方式进行。但从另外的角度说,自由化应以渐进的、精心设计的而不是随机的方式进行,放松原管制和重建新管制确实要持续很长时间。同时,在管制逐步取消的过程中也有有机可乘:如果一位官员决定对某种经济活动予以允许或让步,其他人就有可能给他贿赂。随着转轨的进一步深入

这种情况会减少,因为经济活动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由某几个官员说了算。但要彻底消除这种情况则取决于放松管制和重建正确的规则,使制度安排透明化,并坚定立法决心。后者与自由化本身一样重要。

随着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所有的争论都将公之于众,使得同腐败的斗争更具有挑战性。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所谓的独立性实际上与宣称自己具有“独立性”的政策一样,由于它们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中,媒体与政治已密不可分。虽然这种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情,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媒体易被腐蚀。为数众多的大电视台或有影响力的报纸在一定程度上都为赞成放松经济管制、兼并国有资产的利益集团所控制或拥有。当然这种现象不是转轨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有些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综合征。^①

如果将腐败理解为与金钱的交换,那么至少有一部分新闻媒体的职员与政府官僚一样也受到腐败的侵蚀。作为向政府和决策者施加“道义劝告”的工具,新闻媒体腐败是一个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因为腐败的商业圈总是利用媒体的力量指责其他团体腐败或至少对其错误做法予以指责。虽然这种黑手党式的行为不乏其例,但要将它们置于公众的裁判之下却是十分困难的,这恰恰是由于新闻媒体作为利益集团本身的介入。当然,它们是独立于政府的,但它们却不可能不受政治集团、非正式利益集团和金融游说团体的操纵和影响。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媒体甚至跳上政治舞台直接操纵各种集团。

^① 例如《经济学家》(1997e)指出,在欧盟某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里,一些媒体与工业及金融集团存在暧昧的联系。从道德的角度看,这即使不是腐败,也至少是一种可疑的疏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疏通行为和隐蔽的腐败行为之间的界线便不那么分明,形成一个好坏难辨的灰色区域。波兰的情形就是一个证明。当地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日报公开支持自由市场体制的改革,但在1994—1997年间当左翼政府推行改革的时候却转而反对改革。后来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这家报纸成为反对派最大的赞助商。在阿尔巴尼亚,腐败的新闻媒体是金融欺诈团伙的中坚力量。新闻界大肆煽动公众不合理的预期,使大量的居民存款涌入已经破产的金融机构手中。在很多国家,新闻机构为换取间接的金钱利益,对股票市场不断增长的泡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引人瞩目的是1997年9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俄国银行界,要求他们停止利用媒体诋毁政府中改革派经济学家的活动,而这些媒体有些是由这些银行家拥有的。这种“灰色腐败”(即媒体用以换取金钱补偿的行为)事关利益及道德,它们总是极其隐蔽且很难追查。同样,去除这种腐败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没有健康良好的民主进程,真正的文明社会和公共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制度薄弱,市场文化贫乏而不足以支持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有组织犯罪。虽然我们可以将其出现归因于转轨时期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真空状态,但问题是在有些发达国家有组织犯罪的水平更高。症结在于当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组织,如反垄断机构、有效的税收及海关管理机构、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及立法执法机构,或当放松管制的同时没有配合以促进私有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建设,就会给有组织犯罪的蔓延提供机会。

天真地认为并期望市场力量本身就能在变化着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结构建设、特权阶层及经济社会政治的联系中规范经济活动将会导致失望。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天真将

不得不导致国际社会的干预,因为国家已濒临崩溃的边缘。1997年阿尔巴尼亚在不合法的存款体系崩溃后带来的灾难就是例子。当有组织的犯罪得到腐败的新闻媒体的纵容并缺少国家打击和国际社会的正确行动时,就会变得超乎寻常地强大。国际组织直到最后才亡羊补牢地下决心采取行动,直至进行军事打击,但这比适时地采取政治或经济措施代价要高得多(Kolodko, 1997)。

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经济。根据有关估测,俄国40%的经济活动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这一估测报告被世界银行公开发表后,其现实意义得到了加强。其时,世界银行在詹姆斯·沃尔芬森的领导下特别注重与腐败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这份报告(Shelly, 1997)明确提出,俄国的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实际上都处于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控制之下,这使问题的处理更加困难。^① 尽管对这个估计存在争议,但它表明有组织犯罪已不仅仅是一种病理表现,或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整个经济的核心问题。它们的活动领域集中在银行、贸易及流通领域,对利润丰厚的能源部门也有染指。黑手党式的管理在很多私有化进程中非常常见,因为大范围的自发的资产非国有化为利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非法交易和投机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大家承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一些用国际通行的标准看来在三四年前还是犯罪或准犯罪领域的个人或公司,却在公关专家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了文明公司的雇主或工业社会的好公民。^②

① 难怪俄副总理纳米耶索夫(Boris Nemtsov)在他就任的头一天就发表演说表示:俄国必须在强盗资本主义和人道资本主义间进行选择。

② 美国调查公司克罗尔公司(Kroll)的副经理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ior)先生于1997年4月14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有组织犯罪的收入已达到9亿美元。”

根据列宁的理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是帝国主义的基础特征。前苏联解体后，这种情况虽然在俄国仍被认为非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默许。后来这种情况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财富已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就是转轨中的洗钱。这远比一般意义上的洗钱重要得多，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后社会主义中占很重要比重的一部分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对这种洗钱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虽然在美国的坚持下俄罗斯关闭了几家远离莫斯科的离岸金融市场的银行（如在开曼群岛等），然而国际社会在及时阻止这种行为方面仍做得不够，以至更坏的情形还呈蔓延之势。无论如何，有组织犯罪不是哪个国家单独的事情，而是一种国际现象。

由于司法薄弱，缺少正确的法规和执法体系，有组织犯罪得以猖獗。频繁更迭的政府——即使它们有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坚定决心，事实也大多如此——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技术能力去对付这种犯罪，尤其是当政府没有得到新闻媒体的坚决支持或在国际组织对此举棋不定时（这在转轨初期是很常见的）更是如此。只是在后来随着制度建设的推进、国际社会更加积极的介入及更加先进的反洗钱过程，有组织的犯罪才能被扼制住，尽管不是根除。

有组织犯罪的情况在越南和中国就十分不同。一方面，它们并没有出现转轨经济中具有腐败倾向的私有化等运动，另一方面，它们惩治腐败的法律极为严厉，尤其是在中国。转轨经济的大部分国家并没出现像俄罗斯及某些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严重的腐败，尤其是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东欧各国，这主要得益于它们相对较成熟的市场文化和行为规范以及在转轨一开始便对制度建设比较重视。地缘关系也很重要：由于与

欧盟为邻，东欧各国受到欧盟坚持法制建设的敦促和影响，并在国际事务中协同合作施行严厉的反腐败的措施，这些都发挥了重要的正面作用。

有组织的犯罪并不仅仅是一种肮脏的事物，它还能解释为什么东欧国家的衰退比前苏联各共和国稍轻及为什么前者的经济收缩不如后者持续时间长久。这是因为，有组织犯罪同腐败一样，导致了市场信号的失灵和扭曲。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和分配都不是由能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的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一部分特殊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为了达到自身财富与利润的最大化而从事肮脏交易的结果，它们从不注意这是否会引起外部不经济。

然而，与行贿受贿相似，非法交易甚至有组织犯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哥伦比亚、牙买加这样严重依赖毒品走私的欠发达国家就存在这种情况。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当将道德考虑抛在一边（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这种不幸曾多次重演）时，资本积累有时会采取不诚实的手段，但其后这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事实能部分地解释北美在19世纪的扩张。现在转轨经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类似现象，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寻找到相似之处。因此，尽管非法交易很不道德，却也可以为后社会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作出贡献；不管这些资本最初是通过怎样的手段获得的，只要投资得当，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考虑到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对经济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它们最终将导致经济滑坡和效率低下。毫无疑问，它们对持续衰退起到推动的作用。它们都导致了分配不公，如果没有它们，情况会好得多。它们是制度改革的天敌，从任何意义上都会阻碍改革的速度和进程。因此决策者们必须意识到有时候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会为腐败和有组

织的犯罪创造条件。这些特点使反腐败的斗争更加复杂和困难。这需要政府的决心、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真正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帮助。虽然这种进程在哪里都将是漫长的，转轨国家却存在着迎头赶上的机会。

8

财政金融改革和政策

8.1 新的财政体制

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需要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还需要较高的储蓄倾向。由于非国有化运动和放松管制忽略了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储蓄也下降的事实，“经济增长”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提高储蓄率，即提高资本积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需要很多先决条件。居民真实收入的提高、有效的税收体系、可靠的财政政策、良好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股票市场和投资基金）、适度的金融市场监管和对市场规律及其绩效的理解——这些都是储蓄增

长的重要因素,但它们都不会自动地出现。相反,转轨初期情况会更加恶化,因为原有中央计划体制下强制储蓄和资本分配的机制不存在了,而市场体制中服务于此的新组织还要从头开始发展。

虽然居民的真实消费水平在急剧下降,它们仍比不上总产出的下降速度,因为投资收缩的速度远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速度要快。换句话说,资本积累的下降快于产出的下降,而消费水平的下降则慢于产出的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调整阻碍规律”(Pohorille, 1992)。转轨时期的收缩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巨大的投资滑坡都不能使消费水平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在绝对消费水平下降之前,边际储蓄倾向下降导致了储蓄的下降快于实际收入的下降速度。真实收入不断下降、消费倾向递减及投资能力萎缩的“死亡螺旋”开始启动。当后来经济最终走出低谷时相反的情况出现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消费能力虽然也随之增强,但增速趋缓,储蓄比率因此呈上升状态。只要满足另外的一些条件,随着真实收入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也会提高。

即使中央银行努力保持较高的实际利率,只要居民的真实收入是在下降的,就很难期望储蓄会增加,哪怕是将来孩子的教育、更好的居住条件、添置新车或为明年夏天在美丽的克罗地亚海岸度假而存钱。只有当正的实际利率能够刺激人们不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作当前的消费时,才能增加额外的储蓄。而这种情况往往只在实际收入高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长期的产出下降和生活水平恶化使得单靠操纵利率来提高储蓄率几乎成为不可能。首先,居民必须能挣到钱,然后才能储蓄;第二,他们要有储蓄动机;第三,实际利率必须为正。如果实际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需要(设想一下在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中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即使利率很高,整体储蓄

倾向也不会上升。人们存钱并不是因为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而是因为他们有钱可存并且需要为今后一定的目标存钱。

当然,穷国也可以用金融幻觉来增加储蓄,就像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形储蓄那种灾难性情况或类似的而没那么严重的短期金融诈骗中介商在其他国家也有。但不久就证明这些活动实际上削弱了储蓄力量而不是增加资本积累。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助长了股票市场的飙升,而最终掉进了泡沫经济的陷阱里,而泡沫是一定会破灭的,到那时候,很多居民就将成为输家而不是赢家。这种情况会引起剧烈的收入再分配,使资产和财富大多流向幸运的投机者和一些著名的金融机构手中,这无疑将降低长期储蓄倾向。

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看,只有当购买力上升即当名义收入的增长快于物价增长的速度时,居民的储蓄才能持续增长。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并不能保证储蓄的流入,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让居民自愿推迟当期的消费而为未来储蓄。如果一方面可以取得正的实际收益,一方面市场供应充足的话,进行储蓄的决定就会在将来带来报酬。这依赖于个人对未来的预防动机、为获得所需求的物品而积累消费能力的愿望及金融机构运行的良好程度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可信程度。

从旧的储蓄体系过渡到新体制运行所需要的储蓄体制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虽然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储蓄率曾相对较高——比转轨时期都要高,但我们要记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积累率是非自愿的。这既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也不是传统或社会习惯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所在。那时的高储蓄率一定程度上是由持续的短缺经济造成的,因此那时的储蓄文化与市场经济下的储蓄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并且其吸收机制也大不相同(Kolodko, 1986a 和 1986b, Kornai, 1980)。这对转轨经济有深刻的含义。

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一个特殊的税收体系。政府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税收和向居民征收的间接税收。因此转轨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改革原有的财政体系(Tanzi, 1992)。然而更困难的问题是在引入新体系的同时,改革必须促进资本积累的增长。这里面临的挑战很多:税收管理薄弱,金融文化淡漠,同时新兴中产阶级不愿纳税、其他纳税人对税收感到不习惯使得财政政策面临纳税不足的风险,等等。这样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引入并确立正常的税收体系,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转轨国家达到这个目标。仅仅是引进一部税收法典还用了几年的时间,更不要说改变收税者和纳税人的认识了。

健康的公共金融体系需要良好的政策,而良好政策的执行又要有良好的制度和各经济主体良好的规范行为。它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标准,这需要财政官员长时间的不懈努力,而他们本身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Blejer 和 Ter-Minassian, 1997a 和 1997b)。法律体系的调整过程和财政官员学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过程是充满矛盾的。由于它重新设计了特定社会集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态度,利益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这会引发紧张情绪甚至政治斗争。即使最引人注目的体育比赛也没像税收问题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不同的是,体育比赛的结果不能由民主选举的议会决定,而税率则能,甚至一届议会可以数次改变税率。

政府及其税收官员常被有些新闻媒体和政治集团视作从企业家和居民的正当收入中攫取不义之财的敌人,政府及其财政部长更是经常被称作“人民第一公敌”。人们不愿纳税的心理常被政客利用作为肮脏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著名的例子是俄罗斯在 1997—1998 年间关于改变税法的争论及其最终被接纳的过程。在野党常常指责当局税率太高,然而一旦党

派易位,原执政党又会提出相同的指责。因此,税率总是太高而同时公共支出总是太低,当然,财政赤字也总是太大。

税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市场经济和转轨经济中都是存在的,但在转轨经济中问题更难对付。最佳税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政治家们总是倾向提高税率以增加政府预算收入及支出,但如果政府的税收政策执行过度,就会带来与政策本来目标相反的效应,过高的税率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反从长期来看可能抑制投资和增长。从另一个角度看,税率过低则迫使政府通过赤字或公债来支付必需的开支,从而扰乱财政的稳定性。这也将危害扩张能力。

考虑到现金流量的复杂性,公共支出中由税收支付的比例越低,挤出效应越大。由于公共财政赤字必须以不引起通胀的方式弥补,即政府从市场上进行借贷,所以私人企业就被从货币市场上驱逐了出去,因为利率过高导致借贷成本过高。实际上,不论政府是通过税收或市场借贷,还是通过货币扩张,政府开支都潜在地削弱了私人企业的支出。其后的通货膨胀又减少了私人部门资产的实际价值。

因此,最佳税率是在经济考虑与政治考虑间的一个权衡。然而,这个论断本身还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佳税率不止一个,其范围不仅依赖于一系列结构、制度因素,还与发展程度有关。换句话说,从经济理论上说,匈牙利与亚美尼亚应采用不同的税率,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制度建设更先进;但它也同样因为后者没有前者发达而要求两者采用不同的税率。因此,税率为经济服务从来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政治考虑则依赖于社会压力与矛盾、社会政治结构、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民主的成熟程度及公共辩论机制等一系列因素。传统习惯、谈判文化、工会及职业团体与政府之间讨价还

价的能力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这些都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谈判,政府只不过充当特殊中间人的角色。办好这件事并不容易,但必须办好。民主化的进程越快,政治上的阻力便越小。在波兰,建立了一个特殊的三方常任委员会,并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确认。它由工会、雇主及政府的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直接管理白领阶层的工资增长并通过一系列的工资指导间接地管理蓝领阶层的工资增长。尽管困难重重(持续的非指数化和通货紧缩),但它还是开始发挥作用了。

以下观点并不正确:即当国家比较发达或经济增长较快时,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相互的妥协也较易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焦点由如何分配可支配收入变为如何增加效用的政治争论。这两者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因为如果收入不增长,公共支出也不会增加。那么第二年的公共支出结构充其量也只能与前一年的一样。而当收入增加时,所有的方面都会为分一勺羹而斗争。欧洲联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在联盟成立伊始就曾为此而激烈争论,美国也曾为如何处置财政盈余而辩论不休,更不用说日本支持日元的一揽子财政计划成为政治冲突的根源。因此,这些话题成为新兴民主国家激烈政治争论的主题也是毫不令人吃惊的了。

转轨后期——只有当出现了产出增长的强劲势头之后——才有降低税率的空间。最好是先减轻企业部门的税务负担,如有可能再降低居民的税赋。波兰就是一个例子,在“2000年一揽子计划”(Kolodko, 1996)中,企业部门和居民的税收都大幅度下降了。1996年以前,所有的企业还都要一次性缴纳40%的企业所得税,1997年之后每年下调2%,到2000年及以后降为32%。这将刺激投资,从长远看也将提高国际竞争力。个人所得税则分两步降低。首先,在议会中的政治立场取得一致后,于1997年将三档税率各下调1%,使它们各

自达到 20%、32% 与 44%，到 1998 年再将这三档税率分别调至 19%、30% 和 40%。

这些变革的引入再一次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党内部和在野党都对已提出的改革计划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就企业所得税而言，政府中的反对意见认为应该进一步深化目前旨在刺激新投资的税收减免，而不应该对所有企业都实行减税政策。而在野党的意见则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完全放弃投资优惠政策并进一步降低税率。

就个人所得税和收入调节而言，它的运转机制是只有最上层的 1/10 人口至少会在几个月内按照最高的两档税率纳税，即自 1998 年后的 30% 和 40%。^① 这样他们的净收入增长得比其余 90% 纳税人增长得要快。从这个角度上，支持政府的团体认为这项改革有利于有钱人，将他们的名义税率降低了大约 5%，而对绝大多数纳税人的税率只降低了 1%。但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之前提高税率时两档税率也大约提高了相同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由派在野党的态度就有些怪异。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宣扬自己的产业导向，但他们的领导人就是不愿由左翼党领导的政府来实行这项减税计划。在他们看来，执政党中应推行“税收与消费”的政策。最终，最低一档的税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并在其他方面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包括提高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样，改革计划最终得以实施。

就这类减税计划的执行而言，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削减高档税率比削减低档税率成本要小得多（从相应的预算收

^① 1996 年超过 7% 的纳税人按 33% 的税率付税，只有 2% 的纳税人按 45% 的税率纳税。但这一档税率并不是适用于全年，而只适用于几个月，因其依累进税率中增长的收入部分而定。

人的角度看),而其政治上的困难也正来源于此。然而,这样做会很快提高储蓄倾向并使储蓄上升,为更多的投资提供源泉,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该地区的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纷纷效仿这一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基础较好的话,这将有利于国内资本的积累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性,即对国外储蓄的吸收。但这只有当税收体系稳定、财政政策透明时才能实现。财政政策工具和目标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种较高的税率与过早地降低税率、过后又提高税率相比要好得多。

这一特定改革计划背后的依据是提高储蓄倾向从而积累高速增长所需的资本。它假定降低税率会提高财政收入,这不仅依赖于税收管理的加强和税基的扩大,更主要的是依赖税收供给弹性机制。正如拉弗曲线所揭示的那样,开始财政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上升,但在经过几个关键的时点之后,总收入开始下降。因此反之也是可能成立的:即随着税率的降低,总收入会上升。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否则,减税不仅不能促进资本积累,反而会危害资本积累和可持续增长。

8.2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储蓄与增长

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人口中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政府养老金,这种情况下的“养老金”在市场经济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积累和重新分配居民储蓄的有效工具。养老金完全由公共财政体系承担,如果社会保障账户出现赤字,国家预算会自动地出面解救。赤字一般在社会主义后期出现,因为那时老龄人口增长加快,使政府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快于政府弥补预算外养老金开支的能力的增加。老龄社会和人均

寿命的延长使这个制度变得脆弱,并加重了公共财政的压力,社会保障体系的赤字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赤字。

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对老的“退休付款”(Pay-as-you-go,简称PAYG)制度的升级换代并不成功。它主要通过削减福利、增加税赋及一些对收入和支出的小的改动来进行。实际上,这更加恶化了形势,使原来虽然较低但还算稳定的社会保障遭到了破坏。另外一个缺点在于它需要额外的财政收入,这使企业部门的负担更加沉重。其他的弊端还有存入养老金时与收到养老金金额之间的不透明关系、不严格的资格标准及退休年龄太低(Andrews和Rashid,1996)。一方面不断增长的拖欠退休金(如1996—1998年间的俄罗斯)和另一方面过高的收入税(乌克兰的税率为52%)证明了这种制度的局限性。

由于老龄化问题、过早的退休年龄及对残疾人福利的宽松规定使总人口中依靠政府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拨款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在转轨的早些年里这些数字呈跳跃性增长,因此问题变得愈加困难。在前苏联的各共和国中,1990年最高的依赖率(指拿养老金的人数与总雇用人口的比率)是乌克兰的51.4%和立陶宛的47.4%。到了1996年,前者的数字就上升到了65.3%,后者则为53.8%。在东欧,在那个时期最大的增长幅度是保加利亚从55%上升到74.4%,匈牙利从47.0%上升到76.9%。经过5年多的转轨时间,目前这个比率还较为令人满意的国家只有土库曼斯坦(25.3%)、塔吉克斯坦(27.0%)和乌兹别克斯坦(29.2%)。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有较低的比率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某些社会保障措施,而不是因为它们的制度较为健康。从任何角度上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被称为制度健全(Branco,1998)。

从中期看,只有一个办法能控制住社会保障对公共财政带

来的沉重负担,即削减养老金。所谓的“替代率”(指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之比)已经在很多国家有所下降了。1990到1993年间,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的替代率平均下降了10%,但在之后的几年里它们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克罗地亚继续保持快速下降势头,从1993年的62.0%下降到1995年的35.4%,而罗马尼亚的数字却重又上升,从26.0%上升到29.7%。1990—1996年间,只有5个转轨国家的比率上升了,即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波兰和土库曼斯坦,而捷克的数字则未变。有趣的是,1996年各国的比率差别仍旧很大,从保加利亚的31.4%到两倍于它的波兰的61.3%不等。而在前苏联各共和国,这个比率的差别就更大了,从塔吉克斯坦的23.7%到土库曼斯坦的53.3%不等(表17)。

表 17 转轨国家的公共养老金体系(1990—1996年) (%)

| | 体系依赖率 ^① | | | 平均替代率 ^② | | |
|--------|--------------------|-------|-------------------|--------------------|-------|-------|
| | 1990年 | 1993年 | 1996年 | 1990年 | 1993年 | 1996年 |
| 亚美尼亚 | 33.8 | 43.7 | 44.1 | 44.6 | 30.7 | 24.3 |
| 阿塞拜疆 | 38.8 | 42.9 | 41.6 | 42.3 | 21.2 | 29.2 |
| 白俄罗斯 | 46.1 | 54.0 | 71.0 | 40.1 | 38.0 | 40.9 |
| 保加利亚 | 55.0 | 80.0 | 74.4 | 42.8 | 40.2 | 31.4 |
| 克罗地亚 | 31.0 | 43.0 | 54.3 | 73.0 | 62.0 | 35.4 |
| 捷克共和国 | 42.0 | 51.0 | 61.0 ^③ | 47.6 | 43.4 | 47.8 |
| 爱沙尼亚 | 45.3 | 47.9 | 55.9 | — | — | 29.4 |
| 格鲁吉亚 | 34.6 | 37.3 | 54.9 | — | — | 36.4 |
| 匈牙利 | 47.0 | 66.0 | 76.9 | 49.7 | 47.3 | 41.4 |
| 哈萨克斯坦 | 31.9 | 43.7 | 57.1 | 38.5 | 39.3 | 34.0 |
| 吉尔吉斯斯坦 | 34.6 | 38.0 | 34.0 | 44.8 | 38.4 | 48.5 |
| 拉脱维亚 | 42.7 | 53.1 | 54.9 | 31.2 | 33.3 | 38.6 |
| 立陶宛 | 47.4 | 50.2 | 53.8 | 36.3 | 28.4 | 30.8 |
| 摩尔多瓦 | 34.6 | 46.9 | 50.2 | 38.6 | 32.1 | 40.1 |
| 波兰 | 40.0 | 53.0 | 61.3 | 59.0 | 76.8 | 61.3 |
| 罗马尼亚 | 34.0 | 49.0 | 52.3 ^④ | 41.9 | 26.0 | 29.7 |

从休克到治疗。

(续表)

| | 体系依赖率 ^① | | | 平均替代率 ^② | | |
|--------|--------------------|-------|-------|--------------------|-------|-------|
| | 1990年 | 1993年 | 1996年 | 1990年 | 1993年 | 1996年 |
| 俄罗斯 | 44.9 | 52.4 | 57.0 | 38.0 | 24.5 | 28.4 |
| 斯洛伐克 | 39.0 | 53.0 | 46.1 | 48.3 | 44.0 | 42.0 |
| 塔吉克斯坦 | 27.3 | 32.9 | 27.0 | 47.8 | 45.9 | 23.7 |
| 土库曼斯坦 | 25.4 | 28.0 | 25.3 | 41.1 | 47.5 | 53.3 |
| 乌克兰 | 51.4 | 60.5 | 65.3 | 41.6 | 26.9 | 32.7 |
| 乌兹别克斯坦 | 29.9 | 33.1 | 29.2 | 45.1 | 29.9 | 40.9 |

① 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与雇用人口的比率。

② 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率。

③ 捷克共和国与罗马尼亚的体系依赖率为1995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a。

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其依赖率的增长幅度较大。这是因为它是退休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比率而不是与所有劳动力包括闲置劳动力的比率，这样，在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分子和分母都发生了改变：分子变大，分母变小。然而失业的财政含义与因领养老金的人数剧增带来的财政压力间存在替代效应。在一些失业率较低（有的部门甚至存在过度雇佣）的国家如捷克，其依赖率本应低于那些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如斯洛伐克。事实上前者1996年的失业率为3.5%，依赖率为61.0%；而后者的比率则分别是12.6%和46.1%^①。这种区别反映了两个在1991年还是一个主体的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改革战略。在原社会主义体制下，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部分的差别还不是很大，到了转轨阶段，捷克的政策允许部门过度就业，从而使分母增大（即雇佣人数）；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

① 1997年和1998年捷克的失业率上升而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下降。

战略,允许高失业率的增大,使分母下降得很快,尽管如此,由于斯洛伐克靠年金生活的人员增加不是很多(分子的增长较慢),其依赖率的增长并不是很大。这就导致了捷克在7年中依赖率上升了19个百分点而斯洛伐克只上升了7.1个百分点。

另一个例子是波兰,在那里,最坏的情况都碰到了一块。由于转轨早期的管理失误和接下来调整政策的失败,依赖率跃升了一半,从1990年的40.0%上升到1993年的53.0%,1996年又上升到61.3%。这是因为1990—1993年间,数十万人被要求提前退休,以抑制——实际上并未实现——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但到1993年年底失业率还是达到了16.4%。雇佣工人减少的同时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和残疾人^①的人数却骤增。因此,依赖率中分子的增大和分母的减小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失误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所致。只有当新的改革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并使失业率下降了1/3时,这种状况才开始好转。

这些观察对其他转轨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如果它们利用提前退休和放松残疾标准的措施以扼制快速增长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足够快的情况下,这一下降的失业率会缓解对财政的压力,因为那时在“退休付款”制度下缴款也会较快地增加。若干年后——这次是由于人口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提前退休人员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他们只能出现一次,而这部分人的剩余生命又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在整个退休人口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是下降的。

基于以下原因,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在不断增加,它并不

^① 实际上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很多人仍是有工作能力的。

植根于以前的旧制度,而是伴随着转轨而产生的。首先,长期持续的严重衰退使保障制度收取的缴款减少而成本增加。第二,由于缺乏正确的制度安排,政府对采取其他任何替代措施无能为力,所以老年人口大量增加的这一老龄化社会只有依靠这个逐步恶化的制度。第三,由于当局者们对调整现存制度以适应经济和金融现状缺乏承诺,产生了永久性的通货膨胀压力。第四,薄弱的税收体系使税收收入缺乏保障。

毫不奇怪,从微观经济上看,个体的养老金领取者拿到的钱甚至不足以维生,而宏观上政府财政却已大超预算了。公共养老金支出已成为公共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并产生了不断增长的赤字。政府力图提供能满足需要的养老金,却又与其他更加紧迫的支出相矛盾,如文教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样资金缺口只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或在资本市场上借贷来解决。这不是引起通货膨胀,就是会强化挤出效应,两者都与效率和增长的原则相违背,因此使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境况更糟(见表 18)。

表 18 转轨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支出(1993—1996年)
(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

| | 1993年 | 1996年 |
|-------|-------|-------|
| 阿尔巴尼亚 | 6.5 | 6.8 |
| 亚美尼亚 | 2.5 | 3.1 |
| 阿塞拜疆 | 6.7 | 2.5 |
| 白俄罗斯 | 7.6 | 8.4 |
| 保加利亚 | 14.1 | 9.5 |
| 克罗地亚 | 6.2 | 10.2 |
| 捷克共和国 | 7.3 | 8.4 |
| 爱沙尼亚 | 6.4 | 7.6 |
| 格鲁吉亚 | — | 1.7 |
| 匈牙利 | 10.6 | 9.7 |
| 哈萨克斯坦 | 4.4 | 5.3 |

(续表)

| | 1993 年 | 1996 年 |
|--------|--------|--------|
| 吉尔吉斯斯坦 | — | 7.7 |
| 拉脱维亚 | 9.5 | 10.8 |
| 立陶宛 | 4.8 | 6.2 |
| 马其顿 | 15.6 | 11.2 |
| 摩尔多瓦 | — | 14.4 |
| 波兰 | 13.4 | 14.4 |
| 罗马尼亚 | 6.2 | 5.8 |
| 俄罗斯 | 6.1 | 4.5 |
| 斯洛伐克 | 9.4 | 8.3 |
| 塔吉克斯坦 | 6.9 | 3.0 |
| 土库曼斯坦 | 2.3 | … |
| 乌克兰 | 8.3 | 8.7 |
| 乌兹别克斯坦 | 10.0 | 6.4 |

—:指缺乏资料。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a。

“退休付款”体系的危机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从其政治含义来看,随着依赖率的上升,选民中退休人员与残疾人员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甚至比经济因素和财政因素对改革带来的挑战更大。改革必须通过全面的法律上的变革来推行,因此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然而这些议题对于它们的选民来说却是十分敏感的。更糟的是,在几个国家的议会中退休人员甚至拥有自己的势力强大的游说力量和组织良好的会议团体。有时候,议会中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甚至要依赖他们的直接支持。因此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政府必须允许他们参与意见。改革应是未来导向型的,因此其

收效也将在未来表现出来^①。然而当前的养老金申领者只在乎他们当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他们当前养老金的实际提高,如果说改革在没有这些人支持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话,那么要进行一场与他们对着干的改革更是不可能的。

如果依赖率在 1/2 到 1/3 之间,那么在“退休付款”制度下就意味着在职工人不但要挣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其中每 4 个工人还要额外工作以保证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这种制度当然是脆弱的。实际上,已经有几个国家的“退休付款”制度不灵了,它们再也无力支付如此沉重的负担。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或摩尔多瓦等国则更为严重:所得税的征收十分困难而养老金的实际上缴率还不到名义上缴率的 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a)。

因此,转轨时期必须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进一步改善“退休付款”制度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一些国家已在尝试彻底改革这种制度,这一实践具有深刻的意义。由于这种改革一般借助于私人养老基金的引入,这就要求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和稽核体系。而这又需要完善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因为政府必须对整个体系的有效运转负责。这一切还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否则就无法吸收和积累大量的储蓄。另外,宏观经济基础必须稳定并应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因此,这个过程十分明确:简言之,规章制度必须透明,之后私有基金才可能得以发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

因此,要用所谓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来代替传统低效且具有内在矛盾性的“退休付款”制度。在世界银行的技术

^① 正如凯恩斯 75 年前在其著名的《货币改革的轨迹》中宣称的那样:“未来对目前的事务具有误导作用,那时我们早就都死了。”

和金融援助下,目前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和波兰正处于执行这一体系的不同阶段。而阿塞拜疆、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马其顿、罗马尼亚、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也正在制定类似的执行计划,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为私有养老金基金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

多层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原有的“退休付款”体系仍然存在,虽然其规模已大大缩小。它主要为已经习惯于这种制度的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因此在将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它仍按其原有的方式运行以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第二,建立私有的强制储蓄体系,主要用来吸引为将来的退休而储蓄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通过投资于资本市场而增值。第三,在两种方式之上,建立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私有基金计划。

东欧改革的先行者匈牙利、拉脱维亚和波兰采取了较为渐进的步骤,允许现行劳动者自己选择适合的方式,而哈萨克斯坦则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步骤,类似于智利的做法,现行工人都必须参加私人管理的基金计划,只有在1998年新制度制定前就退休了的老工人可以适用原有的“退休付款”制度。

在匈牙利,只有刚刚加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必须参加强制储蓄计划,其他人则可以自由的选择。这样20岁以下的青年将在私有基金体系下为自己退休而储蓄,其他在职人员——无论参加工作多久,几年也好,快退休了也好——都可以自主地决定是留在原“退休付款”制度下,还是参加新型的私有基金计划。而更年长的人则可不受改革的影响,继续享受“退休付款”制度。

尽管拉脱维亚的“退休付款”制度已被新型的国民储蓄计划(所谓的NDC计划)所替代,争论却仍在继续。在新计划下,养老金的数量完全由一生中储蓄的养老金金额除以退休

年龄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来决定。估计男性的预期约为 12 年，女性约为 17 年。

在波兰，只有 30 岁至 50 岁的人可以选择参加何种制度，30 岁以下的工人则必须参加强制储蓄计划，50 岁以上的人则留在“退休付款”体系中 (Security, 1997; Gora 和 Rutkowski, 1998)，当然，这也适用于现在的养老金申领者。顺便提一下，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引起了不小的误导，因为长期以来整个讨论都集中在当前一代的养老金申领者，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现在却要把努力集中在其他人、即未来的养老金申领者身上呢，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或甚至还没有工作呢。

像第二个层次一样，第三层次的内容也应该能够促进储蓄从而促进经济的扩张能力。关键问题是，这项改革一方面直接与金融部门的发展联系，一方面与促进居民储蓄倾向的政策相联系。居民可以自己决策使这项政策与以前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现在政府不能决定人们退休后能得多少养老金了，而他们自己却能够。这应能促进储蓄倾向的提高，并且专业化的私人基金管理能保证储蓄投资的利润，从而这种管理也对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8.3 汇率制度

转轨经济的独特特征似乎为各种货币理论的实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汇率管理和货币可兑换性的引入在不同的国家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例如，波兰在 1990 年初货币贬值过度，企图用汇率作为稳定经济的工具的努力落空了。1990 年底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50%。尽管政府不切实际地宣称通货膨胀率会以每月 1% 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降低 12%，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在将波兰兹罗提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

1:9500 的 16 个月之后,下一个贬值又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价格指数持续以每月 3%—5% 的速度攀升,而产出则大幅度下降。同期,前南斯拉夫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后,各国出现了不同的汇率安排和管理过程。

在市场经济中,汇率安排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经济目标,因此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会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货币管理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货币政策和汇率安排的远期目标是价格的稳定,我们也不能忽视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性。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应是支持可持续增长,这也包含了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汇率有时被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有时被作为中期目标。近年来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大起大落,从 1:80 到 1:140 不等,而美元与德国马克的汇率也在 1:1.4 到 1:1.85 之间来回波动,这很难说是稳定的表现。

就转轨经济而言,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原有的在经互会贸易区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国有专业外贸公司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因此必须建立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制度,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参加,同时这些转轨经济国家重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活动也应着手进行。这个改革涉及贸易流向的重新构建和重新定位,不但需要打破外贸的国企垄断,也就是说国有组织和非国有组织都可以参与外贸活动,还要求可以在市场上获得开展进口贸易的外汇来源及自由处置出口得到的外汇收入。

换句话说,要从贸易上获得好处就必须实现内部可兑换性,即居民可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地兑换外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协议的第八条款论述了其最完整的内容。这不仅意味着货币与产品的自由兑换,虽然这在以前的经济制

度中常常也是缺乏的。这更意味着货币与国外产品的自由兑换，这更强的可兑换性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简单结果。在老体制下，货币不能自由地买到本国产品，更不用说外国货币了，外汇和物资产品一样其价值也是被低估的。这是由计划定价造成的普遍短缺及经济短缺与通货膨胀共存(短缺通胀)情况造成的。这样本国货币的价值被人为高估，并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而按照中央计划直接分配给经严格授权的使用者。

从其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内部可兑换性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使外汇黑市交易合法化来实现，就像波兰在1989年2月转轨开始以前就着手的那样，或像俄罗斯1992年初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汇率是根据市场自由浮动决定的，因此就没有必要用国家外汇储备来维持预先制定的固定汇率，外贸的竞争性也可通过货币的自动贬值来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就能很快确立起来。由于同时实行的价格自由化会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从购买力和长期均衡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的主要问题是本国货币的过度贬值。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然而，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在自由化和稳定化时期，纠正性的通货膨胀正好可以作为结构性调整的工具。

如果用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来推进货币的自由兑换进程，一旦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趋缓并且中央外汇储备充足的话，也可采取一定范围内的固定汇率，其潜在好处是带来价格的稳定。即当单位工资成本增长超过生产力增长速度或毫无节制时，这一做法的风险在于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遭到削弱，除非单位工资成本可以通过生产能力增长或(和)工资限制进行控制。因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是否应该实现货币的内部可兑换——因为它本来就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在于采

取何种汇率安排和汇率水平。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争论大体上就是反对通货膨胀派和反对失业派两者的争论,其间也不乏两者之间妥协的政策安排。

汇率安排和汇率水平的选择各国存在很大差异:从俄罗斯的浮动汇率(从1992年1月到1995年)到1990年1月—1991年5月的波兰的固定汇率(1991年5月和11月间曾两次贬值);从理论上的永久固定汇率(1992年后的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及1997年后的保加利亚)到介于两者之间的爬行钉住(1991年11月至1995年5月的波兰);从爬行浮动区域(1995年5月后的波兰)到固定浮动区域(1996年后的俄罗斯)。捷克和匈牙利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和新的政策选择,最终它们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1997年夏天捷克被迫将自己的货币克朗贬值10%,并同时降低了自己所钉住的货币篮子中的美元的比重。

不管转轨国家的汇率政策有何不同,它们大致都遵循了相同的模式。最初的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提高竞争力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贸易项下出现盈余,紧接着由于通货膨胀差异而取得本国货币的实际升值,但随后而来的是贸易余额的恶化。像波兰那样,竞争力的提高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高于工资的增长幅度,或实际货币升值由于名义贬值而受到了抑制。在考虑货币贬值能促进贸易的快速重新定位和吸引外资的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有人甚至认为适当的非歧视性和暂时性的关税壁垒可能会降低实现货币自由兑换所需要的贬值程度,并且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和财政危机。(Tanzi, 1997a)

转轨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也要求经常项目下的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然而,正如捷克1997年6月爆发的克朗危机

和其后亚洲爆发的更为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提示的那样,开放经常账户会使投机性资金尤其是对冲基金趁虚而入。这说明,只有当稳定性政策取得成效,政府政策获得国际间广泛的信任及企业重组取得广泛的成功时,才能实行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这个结论已获得了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转轨经济中最发达的国家也尚未将货币的完全兑换(包括资本项目)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而是要等它们加入欧盟后再作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目标的实现也不是太远的事情。

不同的汇率政策和汇率安排对整体经济活动和实际产出规模产生的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如果政策得当且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并伴随着正确的制度建设,那就会加快贸易发展并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而盲目的外汇体制自由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能力。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如乌兹别克斯坦上马—停止—再上马—再停止的政策,这种不连贯的汇率安排极大地影响了外贸的发展并使出口减少。经过早期的汇率部分自由化和汇率统一,1997年乌兹别克斯坦货币重又引入了多重汇率制,这毫无疑问地阻碍了进口及外资的流入(Kolodko, 1997d),最终使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因此对汇率机制和政策的评价必须考虑它们对实体经济和资本流入的影响。就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对转轨国家而言极其重要的是利率差异和汇率走势。虽然长期资本(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主要追逐长期的利润回报和市场份额,短期资本的流动则主要决定于各国间的利率差别和对汇率走势的预期。如果这些因素有利于国外资本,转轨经济就显然能够吸引到国外投资,就像1994—1998年间很多国家的情形一样(UNECE, 1998),尤其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当然也有俄罗斯——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机资本。

本国与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差异是这种投资的主要动力。但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这些地区比别处更为脆弱的新汇率体制。因此汇率政策问题仍是转轨进程和发展政策中最为迫切和重要的议题。

8.4 金融部门的发展

建立新型银行体制并提高它们有效服务于企业和居民的能力在任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在转轨国家就更是如此。在短缺经济下,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吸收居民手中多余的流动资产,另一方面则在于在中央计划的配置机制下满足生产部门的资金要求。只有到了后来,改革后的东欧国家和中国、越南才将银行作为政府贯彻各企业财政预算硬约束的核心机构工具。银行的重新设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良好的商业银行体系是实现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政策的配合,私有化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没有牢固的银行体系,公平竞争也是不可能的。

成功的银行体系重建仅靠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是不够的。尽管将国有资产卖给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或放松国外银行在本国经营的限制会有一些帮助,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银行注资不足的问题。由于经济收缩,银行部门的很大一部分资产被剥夺了,当实体经济严重收缩,银行部门的亏损就是不可避免的。银行间的合并和重新注资肯定是很昂贵的,因此必须同财政体系的改革一起解决。然而挑战还不止这些,因为必须在经济仍在滑坡或刚开始复苏时进行这些改革;储蓄还很少,资本充足率非常低,资本不足且分散。因此,没有充足资本支持的重新注资是转轨经济中必须克服的另一个危险。

90年代中期,俄罗斯大约有2500家银行,但没有几家是值得信赖的。然而最近银行间的合并开始加快,尤其以较大的以莫斯科为基地的银行为甚。特别破产法已由议会通过,肯定已有不少银行符合破产的条件。尽管开始得较晚,但银行重组的进程毕竟开始启动了(Bernstan和Rabushka, 1998)。^①

波兰在90年代早期也曾有大量不合格的银行,后来由于政府1993年采取了特殊的合并运动,使银行的数量下降而服务质量提高。渐进的私有化和有秩序地向国外银行开放市场使得银行和借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得以加强和改善。

捷克的银行体系则由于对大规模私有化的管理不当和缺乏正确制度而濒于危机。银行不是将资金进行商业借贷并关注私有企业的重建和竞争力,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投机性的收购兼并上。这非但没有提高效率、增加产出,反倒使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停滞不前。直到1998年,一部针对金融部门的法律才通过了。

1996—1997年间保加利亚的银行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致整个的转轨政策不得不改变,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是向好的方向转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坚持下,几家银行被关闭,并引入了货币委员会。1998年1月,为了增加透明性,公布了不良债务人的名单。

重新调整现有的债务结构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现有的坏账并不是原计划经济的遗产,而是转轨的副产品。为使经济稳定而采取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坏账进一步增加。如果高昂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c)的“俄罗斯报告”对俄罗斯的银行业曾有精彩的评述。

的利率不仅适用于新增贷款而且也适用于原有贷款的话,那么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企业很快就面临破产的威胁也就不足为怪了。之后它们就用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的办法来进行自救(Selowsky 和 Vogel, 1995)。很多企业受到了从流动资产充足到流动资产不足的冲击,这对企业的生产能力、就业和产出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重新注资有多种形式。波兰模式要求银行必须对债务人采取或免债、或再贷款、或使其破产的措施。而捷克模式则是将亏损企业置于一特殊的“医院”里,即将其交由专门负责回收坏账的机构处理。1997 年中期捷克发生的货币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滑坡证明了波兰模式运作得较好。虽然波兰的银行业远算不上完美,但它的确已从死亡的边缘复苏了。而在捷克,不仅银行部门,整个资本市场都被拖入了危机,“住院”的企业名单在不断加长。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情形则更困难。匈牙利的情况稍好一点,虽然主要的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拥有,它们的资金注入有利于解决重新注资的问题,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性过大。银行部门的这种依赖性比非金融机构要敏感得多。

要解决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资金问题和单个银行的资本充足度问题而同时又不引发通货膨胀是非常困难并少有成功的。渐进的私有化政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新的资本注入(包括外国资本)及在财政部门帮助下的债权股权转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重建银行部门的困难和重建企业部门的困难一样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矛盾在于只有在有足够的资本支持时,才能对银行重新注资和解除企业间的三角债,而除非有外部融资来源,这种资本只有在经济已经增长时才能获得。到目前为止,国外援助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① 不过,外国资金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转轨国家,而银行部门(与电信和能源部门一道)仍被国外投资家看作是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之一。

当合并进程加快、经济开始扩张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就能真正地吸收增长的存款了。当银行开始向风险企业放贷或投资于其他金融机构时,存款的有效分配就开始了,即存款转化成资本。但是银行部门的彻底改革只是金融部门改革的一部分,资本市场的建设也很重要。

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选择了一个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股票交易的意义相对不大,虽然它确实也重要。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股票交易的资本也很少。像匈牙利和波兰,虽然私人部门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 3/4,股票交易的资本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0%。尽管如此,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8 年以后的调查,这些国家股票交易中外资的比例却相当高,如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其比例已高达 20%—30%(当然是在牛市时)。

在爱沙尼亚和克罗地亚,股票交易的结构很有倾向性。由于银行在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上市公司中银行竟占到了 1/3 左右。虽然格鲁吉亚的金融中介仍很有限,但俄罗斯为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已制定了银行审慎监管条例。保加利亚于 1997 年才私有化了第一家银行,其股票交易也于同年 10 月才开放;而匈牙利那时已有半数银行掌握在外国资

^① 对比一下布雷顿森林国家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银行重组和重新注资而提供少量资金)提供的贷款和两年前为解决亚洲金融危机而提供的巨额援助将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批提供给俄罗斯的附有苛刻条件的 100 亿美元贷款在给韩国的 580 亿美元和给泰国的 430 亿美元援助面前就相形见绌了。

本手中,股票市场也已兴旺了好几年了;波兰的大部分银行是盈利的且资本充足,土库曼斯坦的银行却坏账累累;摩尔多瓦1997年就制定了关于银行最低资本率的要求,而塔吉克斯坦的资产流动性的恶化还在继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b)。所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的银行监管既不像埃塞俄比亚那样落后,也不像瑞士那样健全,因为它们仍在转轨中。

股票交易所不只是金融中介的重要形式,更是许多私有化计划的有力工具。它不仅具有技术上的重要性——即通过公开发行出售国有资产——更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人们可以在那儿了解市场运作及资金运作。也许关于市场和资金的学习需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学习的。巨大的价格波动——比任何发达国家和非后社会主义的新兴市场都巨大——将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卷入其中,又将其抛弃。大户——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大量投机活动使市场变得更加脆弱。如果将剧烈波动的散户投资者的预期考虑在内,可以更加容易地看出这一金融市场是多么敏感。然而,它仍有助于储蓄倾向的提高、资本进一步积累和配置效率的提高。随着银行部门的合并与重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已初步形成了。

9

转轨成本和收益的再分配

9.1 私有化：财富再分配的斗争

威胁私有化成功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成为尽量多出售国有资产的主要动机，然而过快的私有化进程往往意味着售价过低并导致旨在获得眼前利益的私有化而不是旨在提高企业长期公司治理结构的私有化。因为想尽快将国有企业出手，政府就面临不得不低价出售的压力。这样就为内部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寻租行为盛行，腐败滋生。如果同时考虑到个人行为与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寻租行为

(Aslund, 1996)。寻租行为不过是在非完全竞争环境下寻求利润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坏的行为造成的,不如说是一种坏的制度造成的。换句话说,寻租行为是与容忍它并为它提供可能性的制度建设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并不是在市场出清的价格下完成的。尽管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愿望很强,但奇怪的是那些最坚决的自由市场倡导者却坚持以低于产品(那些能生产其他产品从而带来利润的具体产品)真实价格即市场出清的价格来出售它们。

第二个威胁在于因为害怕私有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而对是否采取私有化犹豫不决(Pitelis 和 Clarke, 1993)。所以存在以缓和重组带来的社会困难为名减慢私有化进程的倾向。就业减少、失业增加、再培训与再发展、管理方法及原有技术的改变、争夺新市场及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都是私有化带来的真正挑战。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从长期看私有化有利于提高效率,但短期内私有化确实困难重重并极有可能被推迟到实现重组以后。因此明智的政策是在这两种威胁之间游刃有余,既能促进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又能同时提高预算收入。前者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潜力,后者则可以加强宏观经济的稳定,两者相加则有益于可持续增长。

尽管两种威胁都对转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看起来似乎第二种威胁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对更快速私有化的一再坚持——不管它是俄罗斯的能源企业,还是捷克的汽车工业,或是匈牙利的电信行业,波兰的烟草业,阿塞拜疆的天然气,还是保加利亚的商业银行——已不仅仅是对付私有化进程太慢的措施,更是寻求低价出售最有利可图的国有资产的游说方法。1994—1997年在位的几年间,波兰财政部长从未被任何一个外国投资者及本国的游说人要求过出售任何煤矿、铁矿、船厂或拖拉机厂,却持续地受到各种团体和集团的

压力,要求加快对银行、电信业和其他能源部门的私有化进程。如果我们通过新闻媒体中的争论对形势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得出人们更关心烟草业的私有化而不是失业问题,或人们更关心出售电信业而不是消除贫困的结论。失业者和穷人没有能力进行游说或以金钱换取媒体的关心和支持,而财大气粗的实业界却可以。

因此,对那些从快速私有化中获益的游说团体来说,主要关心的不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热衷于如何通过私有化低价攫取国有资产。尽管这种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资产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次它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讨价还价问题,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斗争问题。市场制度建设越不成熟,私有化的政策越不透明,这种行为就越有机可乘。如果某些集团靠这种方法大发其财,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扭曲及压力。这必然引起财政部(一般认为他们代表公众利益)与潜在投资者的矛盾冲突。解决矛盾的明智之举是尽量将非国有化的步骤公开,并将其置于公众意见的不间断的监督之下。这个原则的唯一例外是前东德的私有化,它确实非常之快。然而既然并不存在一个西罗马尼亚,也没有一个西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私有化就必须有一个过程。

然而如果迫于政治压力,国有资产的出售是以一种“什么都得卖”的方式进行的话,不但私人部分的比重会上升,公共债务也会上升,更加重了政治压力。不是政府,而是国家拥有两者:资产和债务。私有化必须能使国家在失去一部分资产的同时,丢掉一部分债务。从历史上看,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脱离社会主义时也应如此。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飞快地失去国家财产的同时却更快地背上了债务包袱,这是很可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债务应与公共资产一

起被私有化,因为国家资产的积累是在债务形成的同时获得的。

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性及体制真空,不劳而获是可能的。私有化不仅是财产转移给新主人(人们一般认为他们是能真正更有效地管理资产的人)的过程,更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因此会出现资产重新分配的激烈斗争。转轨经济中的新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些挣钱最多的人,而是那些在私有化中攫取最多的人。私有化的进度越快越激进,他们也越容易暴富,即使在国民收入正在经历巨大滑坡时也是如此。财富的快速积累有时不是因为承担了投资风险、用自己的资本向风险产业进行投资、努力工作、技术创新或类似原因而实现的,而是得益于内部交易、精于算计或非国有化时错误管理导致的任人唯亲。因此在从事不透明交易的企业家中,有些人是利用了激进私有化的漏洞。他们很快地致富,却不是通过诚实和公平的途径。

尽管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只有在迫于政治压力时,社会才会公开承认它的错误性。例如捷克,只要转轨政策没有带来公开的危机,社会上就只有关于“成功的改革”的报道,而没有对错误的私有化政策进行任何批评。很显然,它的那种管理方法,即不重视私有化过程中公司治理的提高并缺乏适当的产业政策,最终肯定会导致经济的崩溃。这种危机是可以被预见到的,就像其邻国可以避免这种危机一样。不同的政策是造成危机在一国出现而在另一国可以避免的原因。然而,事后的批评家在及早发现导致危机的政策方面却能力有限——不论是墨西哥危机、捷克危机,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或者还是以后巴西、俄罗斯、印度的危机都一样。再次说明,这种有限不是由于智慧不足,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在是否要及时地提醒潜在的危机威胁并敦促相应的政策改变

方面,那些有影响的金融集团和政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要比其他团体的理性思维强烈得多。前者在危机即将蔓延的时刻就已占有统治地位,而后者只有当危机已成事实时才站住脚。

由于俄罗斯的私有化一向是有利于老牌的有影响力的国内利益集团和与外国金融实力集团关系密切的集团,所以并未遇到太多的批评,尽管不时也会出现“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的论点,但国际上主要是带着同情的口吻。不仅如此,还鼓励进一步投机,并往往无视社会真实情况,以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和诱人交易后的真实资产。在俄罗斯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甚至并不真正关心他们买的股票的名称及其公司的位置,只要它们是属于热门部门如电信、电力就行。正如一位美国的基金管理者在访问莫斯科时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我不讲它们,我就买它们”(Freeland, 1998)。这样,推迟能源部门的私有化比养老金和工资的逾期不付更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前者被认为是财富的再分配斗争中的关键所在,而后者只不过是有关当前现金流的一个次要技术问题罢了。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公共资产由于低价出售而不断减少时,政府的债务却在不断增加。这听起来奇怪,却是事实。

最终,当不得不实施其他政策时,政策调整的代价已经相当高了。虽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高于处于东亚危机中的那些国家,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现在必须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不然它们必将引起另外本可避免的社会动荡。捷克危机的灾难后有人评论道:评论家认为只有当紧缩政策与政府所许诺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实施时,人们对紧缩政策的抵触情绪才会缓和。最关键的方面是重建法律体系并打击白领犯罪,后者在股权证换股权的私有化过程中以损害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成为少数富人(Boland,

1997)。但这些评论家们在事发前去哪里了？他们那时又说了些什么？那时大众媒体对这些评论的态度又会怎样呢？

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为什么这些最终导致危机的措施在先前却得到了国际组织和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为什么一些事前的警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Komarek, 1992）^①？再次说明，这些问题事关经济利益而不仅仅事关经济理论。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都与制度建设不力（首先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制度重建而不是放松管制）有关。长期以来受到国际企业和金融界强烈支持的受到盲目欢迎的新自由经济政策也难咎其责。这种政策非常符合某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却对收入公平、社会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这种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错误，其代价是减缓的增长速度和恶化的生活水平。

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如果人们能在很短时间里积累数倍的财富，这至少也是应引起怀疑的，就像白水事件一样。而根据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描述，俄罗斯则是一个能一夜暴富的地方。他说，如果你想用 10 万美元赚 1000 万美元，那你可带 10 万美元去俄罗斯……如果你有 1000 万美元而想赚两倍的钱，那你仍可带上 10 万美元去俄罗斯（Strauss, 1997）。这种运作看起来是符合现行法律的，或至少不与法律相违背。体制真空——主要是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与新自由政策环境一起，使得这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资本短期内惊人地数倍增值只有在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下进行私有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在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已成为事实。然而，上述描述也强调了投资于这种市场的巨大风险。当已经取得了

^① 1987 年曾预测捷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少为 4%，但后来这个数字几经修改，最后几乎为零。经济非但没有加速增长，反而经历了停滞。

相当的利润后,聪明的办法是只拿出其中很小一部分用于再投资,而保存其他大部分,这仍旧是一个好买卖。

因为政策中缺乏对付这种资产转移的对策,要钻这种随意——如果不是混乱的话——私有化的空子是很容易的。只有当情况到了十分明显甚至到了最引人关注的时候才会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在俄罗斯,我们观察到……在当地市场上购买股票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只有卖给外国投资者价格的1/3左右。然而有趣的是,这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国内市场是对国外投资者关闭的,但外国人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灰色资金买到了股票,这是国外基金管理人利用当地管理中的漏洞建立的渠道(Freeland和Corzine,1997)。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内外新闻媒体和高收入阶层对激进而快速的私有化情有独钟,以及为什么所谓的灰色基金会一直被容忍。只要它们继续服务于这些人的利益,它们就会继续被容忍下去,直到私有化完成。

因此,私有化必须从财富再分配的角度加以分析,而不能只认为它是一个提高微观效率的途径。不幸的是,后者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如果不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人们想要寻找理解私有化过程中的政治含义及转轨经济中的财富再分配的线索的话,阿尔巴尼亚金融金字塔丑闻、捷克私有化中已披露的不良认股权证——股权投资基金以及波兰以市场出清几分之一价格出售著名银行^①,这些都是值得一提的例子。

^① 当本文作者在1993年问及波兰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为什么要以低于市场出清几倍的价格出售Slaski银行时,他回答说答案很简单:使买主获得足够的资本,这样他们便能很快地兼并下一家银行。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当Slaski银行的股票在几个月后于华沙股票交易所上市时,交易价格比财政部要求的初级市场价格高了13倍。财政损失惨重而少数投资家获利颇丰。

9.2 公平和平等：预期和结果

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比市场经济公平得多，也比现在公平得多。不过，不同的国家公平程度不同，根据基尼系数的不同，我们可将这些国家分为若干类别。尽管基尼系数不是描述社会公平程度的完美工具，但它仍旧是我们用来分析的最好方法（Sen, 1992）。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亦然。如果基尼系数为 1，则说明社会绝对公平，所有人都得到了同样一份蛋糕。如果系数为 100，则说明只有一个人得到了社会的全部财富，而其他一无所有。

在 80 年代后期，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分布在 23 到 24 之间，最低的为斯洛伐克，为 20，最高为乌兹别克斯坦的 28。如果将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转轨国家平均要比西欧国家低 6 个点左右（在前南斯拉夫则情况有所不同）。转轨前的收入分配是很公平的，与芬兰、瑞典、西德、荷兰和挪威相似。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阿特金森（Atkinson）、雷恩沃特（Rainwater）和斯米汀（Smeeding, 1995）建议将所有国家分为 4 类：收入高度不平等国家（基尼系数在 33—35 之间）、平均水平国家（29—31）、低不平等国家（24—26）和较平等国家（表 19），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后两类。

中央计划经济在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不公平性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个角度上说，名义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转轨经济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就收入的初次分配而言，首先，生产方式的公有制形式削弱了资本利得、利润、租金及红利等收入的意义。尽管这类个人收入只占到极少的一部分。只有在如匈牙利、波兰和南斯

从休克到治疗。

表 19 东西欧的收入分配公平指数(1986—1987 年)

| | 总收入 | | 净可支配收入 | |
|--------|------|-----------|--------|-----------|
| | 基尼系数 | DECILE 比率 | 基尼系数 | DECILE 比率 |
| 捷克斯洛伐克 | 19.7 | 2.5 | 19.9 | 2.4 |
| 匈牙利 | 22.1 | 2.6 | 20.9 | 2.6 |
| 波兰 | 24.2 | 2.8 | 25.3 | 3.0 |
| 苏联 | 27.6 | 3.3 | 25.6 | 3.3 |
| 英国 | 26.7 | 3.2 | 29.7 | 3.9 |
| 美国 | | | 31.7* | |
| 德国 | | | 25.2** | |
| 澳大利亚 | | | 28.7** | |

* :1987 年; ** :1988 年。

资料来源:Atkinson, Micklewright (1992) 和 Milanovic (1998)。

拉夫等个别私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分配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影响不大。由于银行体制较为薄弱并缺少其他金融中介,利率的作用不大。这样,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工资和养老金。

第二,工资的分配是相当集中的,只有在几个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才有一定的分散性。要求公平分配的呼声很高,并和追求公平的理论体系一起成为实现更高公平的强大驱动力。这对劳动力的分配和生产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国家的养老金体系严格地与工资结构相联系,这样养老金的比例与积累的工资比例相近。当然,平均来说养老金是低于工资的,但社会各阶层收入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与公平的工资政策有关。

就收入再分配而言,第一,各种各样的补贴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尽管它们主要是向较穷的人群分配,但只在一定程度

^① 波兰在 1980 年的补贴已占到国民收入的 10%。

上为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作出了贡献。补贴主要用于收入弹性较小的产品和服务,如房租、电力、供水、供暖、公共交通及药品等。这样,虽然这些补贴名义上是为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但它们也提高了较为富裕的家庭的福利。例如,住较大房子的人得到的补贴也较多,越是经常出差的人,得到的补贴也越多。

第二,税收总体上所起的作用不大,而直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起的作用也不大。就整个社会而言,总体报酬与净补偿的水平相当。

第三,由于有时得到实物产品比得到相对较高的货币收入有更实际的意义,短缺经济对实际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不可能仅用货币收入的资料来评价真实收入的分配情况。

在社会主义中,对分配公平性的要求特别强烈,随着真实收入(包括实物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加剧和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出现,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毫无疑问,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起因就是人们认为收入分配极不公平。很难说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分配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后者已足以使社会主义解体而使转轨萌动。但这在一开始(现在在几个国家仍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放弃一个较为公平的计划社会主义转而倾向一个较不公平的市场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以后出现的,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

一直有人天真地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但会有更高的收入,而且收入分配也会更加公平。人们对市场经济下分配方式的期望被政治家们的宣传和工业国家的示范作用过分地夸大了。连政治家们都相信工业国家之所以富裕不是因为复杂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只是因为它们是市场经济,更不要说普

通百姓了。政治新贵告诉群众说当他们摆脱了旧的体制后，(收入当然是更高)分配就会更合理。因此，在转轨开始之初，普遍流行这样的观点，即这个进程将很快而不是在将来就能带来较高的收入，并能使经济运行的成果分配更为公平。

如果大众的不切实际的心理预期还是可以理解的话，政治领袖们关于转轨将给收入分配方式带来变化的想法就应该批评了。他们认为市场体制的引入会理所当然地使分配以更公平的方式进行：随着价格放开，短缺经济自会消失，并出现更为公平的分配方式。他们还认为支付转移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养老金改革，不会引起分配不公。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并未成为现实。即使在很短时期内改革的结果确实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更加公平(因为价格自由化使以前供给短缺时无法得到的商品随处可见了)，转轨中的其他因素，如通货膨胀蔓延、真实工资的下降或快速增长的失业，都使穷困和不公平的现象增加了。

然而考虑到转轨的复杂性，需要群众支持并推动艰难的结构改革，政治家们及决策者们都热衷于利用大众对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不现实的期望。即在一定意义上的从一个没有成效的起点回到下一个没有成效的起点的政策。俄罗斯的历程在此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虽然这种观点很天真，但现在依旧很有市场，甚至在一些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专家和政治家们中也是如此。1998年当匈牙利的中右派联盟刚刚赢得大选不久，新任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就声称新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将人民的生活提高到与欧盟相同的水平。然而他忘了再加一句，即这最早也得在下一代人才能实现——如果经济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话。

最大的失望——主要是在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和政

治团体中——来自于私有化的结果。开头对大规模私有化将带来的社会公平寄予的期望越高,后来的失望就越大。民粹主义者期望后社会主义能自动地通过将国有资产大规模地无偿分配给人民实现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必然会感觉受挫。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很常见的。然而只要人民没有被政治家们欺骗、市场游戏的规则是透明的、公众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关注及再分配模式的改变有利于长期的健康发展,这种再分配就是无可厚非的。

私有化政策的一个极端是以市场出清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卖给任何一个投资者,另一个极端是类似乌托邦的做法将国有资产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合格的公民。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很困难的。将资产出售给战略投资家的私有化虽然较不公平,但看起来对长期的增长和收入提高是有利的,而在短期内较为注重收入分配公平的分配方式,却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在现实世界中,一般的做法是将两者结合。不过即便是在相邻的国家其做法也大不相同。匈牙利接近于第一种模式,捷克却在努力实践第二种模式;波兰则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较小的爱沙尼亚,外国资本在私有化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大国俄罗斯,大范围的资产重新分配不仅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管理实现,而且是由不透明的内部交易完成的。在所有这些政策中,不但公司治理结构和微观效率的改变程度不同,对长期公平问题的影响也不一样。

民粹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和政治学派认为,通过将股票无偿分配的方法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可以抵消由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困难,尤其是增长的失业和真实收入的下降。这也许是对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对下降了收入的暂时

补偿^①。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工人不是因为反对私有化而罢工,而是为争取私有化而罢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 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狂热支持者,他们确实不是。他们只是想要更多的以半货币形式出现的购买力,即认股权证。因此就出现了失业者得不到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却只有一股两股的股票的奇怪现象。这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人民资本主义,这只能是贫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对而言,俄罗斯的股东比美国多,波兰^②则比德国多,而捷克则比奥地利多,但那儿并没有更多的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只凭“资本家”的数量就可以判断是否属于资本主义,运行资本的质量和制度环境的建设才是关键。现在大部分免费赠送的股票又集中到了机构投资者手中,主要是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公平的私有化(或称之为赠送运动)也不排斥资本的集中。事实上,这使集中成为可能。当然,确实大量的人们免费得到了股票,但他们很快又失去了股票。这显然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但由于继续进行的再分配,股票最终被集中到了少数大投资者手中,而不是由侧重消费的广大群众保存。

人们也期望私有化能缩小地区间差距。在中央计划经济

^① Juhā Honkkila (1997, p.6)指出,对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人来说,给他一定的资产个人所有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他被剥夺了政府提供的铁饭碗和社会福利的痛苦。

^② 1995年以后波兰实施了所谓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账面价值约为国有资产总额10%的500多家国有企业被转移到15家专门成立的所谓的国家投资基金手中,并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众,它只相当于月工资收入的2%。大约97%的人口参加了这次计划。在其余3%中,波兰总理和副总理仅仅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去领股权证。当这些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市后,有人估计大约只有1/3的市民保留了股票,而其他的2/3将股票以5-6倍于一级市场的价格出售了。

下,由于种种原因,地区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异,其中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差距最大。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解体,使得原先存在于贫富差异的共和国(它们现已成为独立国家)之间的地区间冲突趋于缓和,前者如爱沙尼亚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或后者如斯洛文尼亚与马其顿之间。总体来说,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期望。一方面,落后地区希望尽快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希望尽可能多地向国内转移资源;另一方面,较富的地区却想减少资源的向外转移,因为他们担心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下他们将被迫向落后地区转移一部分收入。因此他们不同意这种再分配而使政治气氛变得紧张^①。

在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并不是沿着人们的预期那样发展的。尽管应预见到整个地区的不平等会加剧,但这总是未被预见到。变化的收入——先是下降然后增长——和特定集团所获得部分的改变,都导致了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收入不平均。最激烈的变化发生在转轨的初期,那时人们的真实收入急剧地下降,虽然对于不同的集团程度有所不同。这样,在以后的几年里,收入分配极大地改变了。从这个角度上,米兰诺维奇(Milanovic, 1998)将后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由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组成(共有约1800万人口),按5个收入层次的划分分析收入分配没有很大的改变,各收入层次居民总收入的变化未超过1%,因此收入的改变不是发生在各层次的居民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收入层次的居民中;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为匈牙利的基尼系数仅增长了

^① 在波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西里西亚(Silesia)上游的传统工业中心(主要是煤矿和铁矿)。这个地区要求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在1995年实施的“西里西亚合同”中,它不注重更有利可图的地区间转移,而是将精力放在提高当地的活动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提高投资潜力,增加吸收外资的能力和地区间的更好合作上。这项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政治气氛缓和了。

从休克到治疗。

2点(由21到23),斯洛文尼亚增长了3点(由22至25),而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则更加公平,基尼系数从20降到了19(见表20)。

表20 转轨期间不公平的变化程度
基尼系数(以人均收入计算)

| | 1987—1988年 | 1993—1995年 |
|--------|-----------------|-----------------|
| 吉尔吉斯斯坦 | 26 | 55 ^③ |
| 俄罗斯 | 24 | 48 ^② |
| 乌克兰 | 23 | 47 ^② |
| 立陶宛 | 23 | 37 |
| 摩尔多瓦 | 24 | 36 |
| 土库曼斯坦 | 26 | 36 |
| 爱沙尼亚 | 23 | 35 ^③ |
| 保加利亚 | 23 ^① | 34 |
| 哈萨克斯坦 | 26 | 33 |
| 乌兹别克斯坦 | 28 ^① | 33 |
| 拉脱维亚 | 23 | 31 |
| 罗马尼亚 | 23 ^① | 29 ^② |
| 波兰 | 26 | 28 ^④ |
| 白俄罗斯 | 23 | 28 ^④ |
| 捷克共和国 | 19 | 27 ^② |
| 斯洛文尼亚 | 22 | 25 |
| 匈牙利 | 21 | 23 |
| 斯洛伐克 | 20 | 19 |

注:1993—1995年大部分国家的数据为可支配收入,1987—1988年的数据则为总收入,因为那时个人所得税还很少,总收入与净收入的差别不大。除匈牙利和立陶宛外,1993—1995年的收入都包括实物消费。

①:1989年数据;

②:以每月人均收入计算;

③:以每季度人均收入计算;

④:以每半年人均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及Milanovic(1998)。

第二组包括白俄罗斯、捷克、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它们的人口总数为8400万,收入分配的变动属于中等。收入

下降最多的为 1—2 点并只发生在收入最低的三个层次中。同时,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增加从捷克和拉脱维亚的 6 点到波兰的低于 2 点不等。因此,只有高收入阶层得到了某些好处,而且这仅仅是从相对份额而不是从绝对收入的角度来衡量的。由于严重的经济收缩,各阶层的绝对实际收入都下降了,虽然收入层次越高,下降的速度越慢。在这一组国家里,波兰的基尼系数仅上升了 2 点(从 26 到 28),而捷克则一下子提高了 8 点(从 19 到 27)。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属于第三组国家,这是三组中人数最多的一组,有 22000 万人口。这组国家的收入结构变化是很大的。最底层的收入下降了 4—5 点,而第二和第三阶层也下降了相似的份额。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变化最大,其中第五阶层的收入分别增长了 20、14 和 11 个点。当然,最巨大的收入转移发生在俄罗斯,它最底层的收入份额下降了一半,从 10% 到 5%,而收入最高的阶层从原已很高的 34% 升高到 54%。就基尼系数来说,保加利亚升高了 11 点,俄罗斯和乌克兰则翻了一番,分别由 24 和 23 点升高到 48 和 47 点(表 21)。

表 21 转轨中基尼系数的变化(1987/88 年—1993/95 年)

| | |
|--------|----|
| 斯洛伐克 | -1 |
| 波兰 | 2 |
| 匈牙利 | 2 |
| 斯洛文尼亚 | 3 |
| 白俄罗斯 | 5 |
| 乌兹别克斯坦 | 5 |
| 罗马尼亚 | 6 |
| 捷克共和国 | 8 |
| 拉脱维亚 | 8 |
| 土库曼斯坦 | 10 |

(续表)

| | |
|--------|----|
| 保加利亚 | 11 |
| 爱沙尼亚 | 12 |
| 摩尔多瓦 | 12 |
| 立陶宛 | 14 |
| 俄罗斯 | 24 |
| 乌克兰 | 24 |
| 哈萨克斯坦 | 29 |
| 吉尔吉斯斯坦 | 29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与 Milanovic (1998)的数据计算而来。

在经过这些变化以后,第一组与第二组国家的公平程度仍旧好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在第三组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其公平程度已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这之后,这个过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公平程度仍在加剧(但步伐已减缓),有几个国家已趋于稳定。在最近的几年里,它们大多在早期震动带来的变化所导致的分配结构水平处徘徊。当然,特定居民和职业团体的相对收入仍在波动,但已不像前半个十年那样剧烈。之后,它们便倾向于在本层次之内稍许波动而不是在各个层次之间波动。

然而由于影子经济的广泛存在,对上述的结论都应采取一定的保留态度。影子经济多数是未经注册的经济活动,所以很难弄清它们对收入流动的真实影响。这部分经济确实改变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及其发展。未注册的经济活动有很多特点,这意味着有些必须被禁止并根除,有些则必须加以控制。这是因为影子经济中虽然包含了可以导致有组织犯罪的成分,但主要的是各部门的小规模企业。它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and 就业机会,也为人们提供收入。

人们被建议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大家是很乐于这样做的,但同时他们不愿意正式注册自己的公司以便逃税和逃避社会保障责任。要改变这种态度尚需时日,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经济来源。因此我们必须容忍它并逐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其引导到主流经济中去。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前,影子经济不仅创造了一部分收入,同时也有一部分再分配通过这个渠道完成了。这两者的规模和范围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分配模式使仅凭官方数字作出的分析复杂化了。

一方面,由于很多属于较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从事影子经济,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官方登记的数字,包括从居民预算调查(HBS)得到的数字,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贸易、装修及传统服务等部门。另外,大多数失业人口被统计为收入阶层的最底层,但实际上他们至少属于第二层。考虑到影子经济的规模和估计失业人数方面方法的偏颇,显然失业的大多数人在注册经济之外挣到了钱。这样,他们的真实收入不仅高于官方数字,甚至也高于HBS根据人们的消费而不是收入得来的数字。

另一方面,除了社会上较低收入阶层相对收入的数据,官方的其他数据也可能有所偏差。这是因为新兴企业家的很多活动是隐蔽的,因此由此产生的收入根本没有计算而且未被征税。这些人很善于运用各种方式向税收征管人员隐瞒大部分实际收入。这使另一部分人被不真实地提升到较高的收入层次并提高了DECILE比率。如果考虑到他们从影子经济中取得的收入,一些原属于较高阶层的新贵就会重新被编为最高阶层,而那些原本就属于最高阶层的人就要被升到天上去了。

对整个真实经济而言,情形是很复杂的。在那些持续衰

退的国家,人们力求通过各种途径挣钱,包括从事影子经济,但它们的机会总体来说是小于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当总产出增加时,会有更多登记为失业的人们实际上靠从事影子经济而不是主流经济填饱了肚子。经济团体也从影子经济的繁荣中谋得了好处。同时,薄弱的监管体系又为隐瞒部分真实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的结果是只能通过粗略的估计来了解收入分配的真实情况。不过我们仍旧可以得知,这些影子经济更多地提高了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而对较低收入的人群提高较小。

尽管影子经济提高了整体的平均收入,但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如何影响可支配真实收入的最终分配情况。非主流经济从整体上提高了生产能力和社会福利,但它同时也使收入从一个居民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这些转移的方向是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们的转移路线,因而也就不能总结出任何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或为政策选择提供思路。我们知道的是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影子部门的收入再分配(及它与官方部门之间的再分配)能够提高整体增长能力,因此,从长期来看,它有助于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通过对实际国民收入的贡献以及对再分配过程的影响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转轨国家中的官方收入分配与包括影子经济的实际收入分配间的差异要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差异水平。

9.3 分配机制

在此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转轨的最终结果,还包括转轨进行的方式。转轨持续了这么多年,因此包含了一个涉及几代人的财富和收入的重大的再分配。不但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再

分配很重要,而且在此之后的也同样重要。鉴于再分配的范围是政策选择所决定的,因此这方面的全面调控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的同时,某些事件和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Kolodko 1998b)。这些事件和过程的产生源于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一系列基本特点和游戏规则已被废除了。尽管存在着很多混乱,也无论转轨将会对不公平还是公平以及不平等还是平等这些选择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大范围的变革机制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运作。这一过程远未结束,并将会在转轨进展较慢的国家进一步开展。

首先,大量的补贴和津贴被大幅度取消。这一行动被一些国际组织认为是必要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只支持导致补贴取消的结构调整。国际机构的坚持和国内政治极端团体激烈的争论相呼应。以老左派及新右派——人民党为一方,以自由市场经济的热衷者为另一方,各执一词。由于政治环境和所选择的价格自由化方式的不同,取消补贴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同。政策的改变越倾向于完全取消补贴,转轨初期收入分配向不公平的转变就越深刻。尽管在不少情况下,短缺确实很快消失(商店里摆满商品……),但家庭的实际收入和现金余额减少得更快(因为消费者的口袋几乎是空的)。所以,补贴的急剧减少和价格自由化终将有助于财政状况的改善和市场出清机制的引入,但这些都是以不公平的不断增加为代价的。尽管如此,从长期看这一代价必须付出。自由市场经济准则的透明性,市场出清定价的效率,市场出清对于资源配置和分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影响,所有这

些都有助于经营的改善和竞争力的提高^①。但在出现这些之前,价格自由化和范围广泛的补贴削减造成了高度的纠正性通货膨胀。这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的实际情况,在那里,由于广泛的产品价格调整导致的价格飙升造成了实质上的收入再分配。通常是基础生活用品价格的上升:首先,食品、住房、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贵,因为它们大部分也需要补贴。不久,其他一些重要服务业(包括医疗在内)的市场化也导致生活费用的上升。

第二,再分配的实施有赖于稳定政策中运用的一套指数系统。要想取得稳定就必须使物价的增长比工资的增长更快,从而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但各种预期和政治压力却迫使政府采取较为温和的调整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指数系统常常是政治上的妥协机制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分析合乎逻辑的结果。一些社会团体和行业团体能够通过讨价还价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补偿。比如,工人们(尤其是那些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人们)或服务人员相对于教师或护理人员来说,更容易争取到对上升的生活费用的相对全面的补偿。因为问题远未解决,相对工资的持续变化还会在将来引发政治摩擦,不同团体之间的收入转移还会进一步发生,而不管它们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发生了什么变化(Gregory, 1997)。然而,从分配不公平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不会对早已存在的收入分配模式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而仅会对各收入团体的相对情况作一些修正。

^① 对于处在转轨早期的一些国家,如土库曼斯坦,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最极端的情况中,如1998年春天的白俄罗斯,短缺重新出现,因为政府试图直接控制价格且补贴范围过大。考虑到经济总体状况,尤其是政府的财政状况,这种政策经不起多少考验。

第三,通货膨胀式的再分配关系到家庭的货币余额。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因为短缺,常常有相当一部分可支配收入不能被花掉。尽管存在强制替代和影子市场,家庭仍存在剩余收入。虽然是“可支配”但却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些收入不能被花出去,因此它们被用于强制储蓄。价格自由化并上升到市场出清水平时,货币余额的购买力,包括银行存款的购买力,只能被部分地指数化^①。由于不健康的银行体系和不良公共财政状况的存在,稳定政策不可能做到给予完全的补偿。所以,货币余额贬值了。很多人失去了终生的积蓄,而极少数人把自己的流动资产转化为资本,并在自由化的过程中翻倍增长。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剧了不公平。

第四,早期的经济改革已放松了国有部门的工资设置^②。不管非国有化的第一步是如何展开的,在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部分转轨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在国有部门谋生。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的差异很有限,但在转轨时期,人们可以接受更大的工资差别,并且收入更紧密地同资历、工作经验和绩效联系在一起。转轨使过去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现在报酬的关系更密切,这使得工资差别更大(Cornia, 1996a)。因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人力资本的差别比工资的差别更大,所以后来根据人力资本市场价值进行的工资调整加速了收入不公平。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加速了收入公平化。

① 多年积累的存款严重贬值的后果仍是一些国家(比如立陶宛)着力解决的问题。

② 在一些90年代初开始市场改革的国家,比如前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工资自由化带来了根本的变化。而在其他一些开始改革和工资调整更早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只是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

对于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来说,这都是事实^①。

第五,劳动力从国有部门流向私有部门是造成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私有部门不但收入差距比国有部门大,而且其平均收入比国有部门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私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而国有部门中剩下的只是过时的、缺乏竞争力的工业企业,或是大量经营不善,像教育、卫生及其他公共服务等相对收入较低的服务部门。由于财务状况不佳,这些部门所提供的工资,就不能同其他盈利性商业行业提供的报酬相比。因此,由于迅速扩大的私有部门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更增加了收入的不公平。一般来说,这只不过是市场对劳动力质量的评价意识不断增强的一个反映。尽管如此,在转轨经济中,当劳动力市场形势仍然严峻时,不同职业与不同地区间的工资关系仍然是扭曲的。

第六,综合征税制的引进改变了收入分配机制及其分配结果。转轨国家的财政秩序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很难成为公共财政理论和政策的典范。它常常是统治阶级作出的一个妥协,个人所得税——在一些国家中完全是个新兴事物——是累进的,尽管起征点和征税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并随时会发生变化。因为通常来说,较高的收入总是被征收较多比例的税收,所以税收制度减少了收入较高和收入较低的人们之间净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从而降低了收入的不公平。但是,财政体制和政策并不稳定,所以财政政策促进公平的作用也并不稳定。

第七,在经济体制从国有社会主义制度向市场性的资本

^① 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教授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比率不应高于,比如,5:1,在转轨时期,人们更能容忍——如果市场是这样决定的话——更高的比率,比如,15:1。

主义制度转移时,最革命性和根本性的改变是资产所有权的改变。在社会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初期,其代表性的体制特点是非国有化、私有化、财产重置、外国资本的介入以及伴随着私有部门扩大的金融中介的增加。这些事件对于收入再分配的新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伴随着资产从国家向私人手中转移,资产收益也转移了。在所有的收益中,工资收入所占的份额下降了,而资本收益——主要是利润、红利、利息和租金——的比重提高了。这一过程本身对于不断加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部分资产及其现在带来的资本利得是通过不公平的途径获得的。

当我们考虑到一个困境:是选择不公正和不公平还是选择公正和公平时,问题就更严重。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1989—1998年(尽管对近1/7的人来说,这几年是他们最后的几年)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而是未来收入分配基础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是缺乏监管的急风暴雨般的资产重置政策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当一些人在为他们微薄的收入(也就是现金收入)争取公平的指数化的保护时,另一些人正十分谨慎地致力于取得尽可能多的财产(也就是不断累加的股票和日后的收益)。

如果只考虑现金收入,就无法准确回答出不公平的范围、其扩展的速度及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公平。一个人可以只报告有限的现金收入而实际上因为拥有股票而很富有,另一部分人却可能因为有相对较大的现金收入而要支付很高的所得税,但实际上因为没有股票或累积财富,与前者相比他们却可能是穷人。因此,我们必须分析的不是收入分配给谁,而是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以及非国有化资产的股票是如何分配的。否则,就只得到一个不全面的——如果不是错误的——印象,就像在电影院中只能看到银幕的一部分那样。

9.4 政策制定中的公正问题

转轨的核心问题是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发展能力并在国际环境中竞争。因此,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常常被看作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次要目标或仅仅是更高一层体制转变的副产品。同时,它们可能被看作是更重要的体制转变的工具,也就是说,分配方式的剧变仅仅是服务于进一步财富积累的工具。而这种财富积累可能会创造出新兴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而没有他们,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无论如何,转轨就是一系列的变化直到带来市场经济的建立。如果不是立刻,也会很快得到这样的信息:经济体制将转变为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如果缺少资本和资本家,就无法创造和保持资本主义。而这对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则正是一个挑战,我们目前正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当然,这会造成一系列的不公平。结论无疑是:在转轨时期,不平等的增加是肯定的,而政策应该致力于使这种不平等有利于转轨的目标。

问题是首先制定并设计这一系列政策,然后以可能的方式实施它们。在转轨期间做到这一点比历史上相似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更困难,因为转轨期间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紧缩和极端情况下的持续的衰退。所以,在考虑不公平的问题时,收缩期和增长期必须被区分开来。用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看,即使在强劲增长的时期,允许收入从社会底层转移到顶层都是一个挑战和冒险。当然,在一个产出严重萎缩的时期,这样做就更困难。当平均收入下降而政策倾向于形成新兴中产阶级时,穷困一定会加剧。这是转轨的一个特点,因为在收缩时期再分配机制将会将一部分收入从较穷的社会成员转移到较富

的社会成员。

一般来说,这就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到的景象。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收入分配变化的方式反映了人口中不同的团体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变化。穷人变得更穷,因为他们对于不断萎缩的国民收入的贡献下降得比其他团体要快。极端困难时期结束得越快,产出下降就越快得到控制,情况就会越好。所以,第一条关于政策的结论是,在致力于解决转轨国家的不公平问题时,应尽可能使衰退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得到控制。避免衰退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可以采取措​​施来减缓它。

转轨经济迟早会发展起来,那时处理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则以不同方式进行。在衰退期,问题是怎样分担收入的减少或在衰退中该如何表现;在经济增长期问题则变为怎样对收入的增长进行分配,也就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分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额。即使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会有干预收入分配的政策,因为这个问题不能留给自发的市场力量去解决。在转轨国家,因为市场力量还处于襁褓中,所以更需要政策干预。最恰当的干预是将政府的干预限制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既促成了不同收入团体利益的妥协,又为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以利于日后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Tanzi 和 Chu, 1998)。

那些真正从复苏和发展中受益的团体是那些幸运地重新找到工作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失业,这在他们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在大多数转轨国家,失业率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在另一些转轨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捷克和几个后苏联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失业率还在增加。这是微观经济结构重组滞后的结果,也是采取因为一些社会原因包括害怕对社会保障系统依赖的过快发展而容忍过多就业这一政策的结果。那些已经开始发展的国家,在经历了微观经济的结

构调整和高失业率后,很多人找到了工作,他们及其家庭已经改善了自己的绝对和相对收入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先前存在的收入不公平状况正在减少。因此,第二个关于政策的一般结论是,只有发展才会减少失业并减少不公平。

为了发展,收入政策以及关于资产重新分配的政策必须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当然资本积累主要是那些相对富裕的人的事。在强劲发展的阶段,达到这个目标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的反馈——尽管这在中期和长期内才能反映出来。经济发展有利于资本形成,而资本形成又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能被政策工具以及不动产和金融部门的活动的推动而发展起来,那么这种政策的结果就较容易被社会接受。只要有人越来越富的同时有人越来越穷——这是经济收缩时的情况——就无法说服人们相信他们过得比以前好。但是当一些富裕起来的人正在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人尽管仍很穷但比以前强一些时,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尽管如此,如果一些人财富的增加不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么这种变化也可以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

这种社会态度可以从两个不同转轨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的评价中得到证实。在波兰,认为自己的状况好或很好的家庭比例在稳定地提高,虽然这是比较缓慢的,并存在一定的时滞。这一比例从90年代初的不到1%增加到1995年的12.2%,到1997年更提高到13.1%^①。公众态度的演变说明了两点,一是绝对收入的增加,一是对分配方式改变的接受。因此,不仅现实在变化,而且公众的态度也在转变。

^① 数据由居民预算调查从国家中央统计局(1997a)获得。

在俄罗斯,公众认为到目前为止转轨造成了腐败的盛行和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伴随这种现象的,是持续萧条、严重的不公平和不断扩大的穷困。一方面由于未支付工资和退休金的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内部人私有化形成的财富聚集、金融市场有利可图的交易及有组织犯罪,两者造成了收入的不公平不断加剧。实际情况和人们的情绪都能从人们极度沮丧的态度上得到反映。当社会压倒多数的人都认为财富是靠不诚实获得的而贫困显然是由经济体制造成时,未来就不那么光明了。82%的民众认为引入市场制度是贫困的原因所在,高达88%的人认为财富的来源是通过关系网,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有76%的人认为不诚实是获得财富的关键,此时情况就糟透了。这样,不是高效率和良好的经营,也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和努力工作,而是任人唯亲、拉关系、欺诈和偷窃被认为是新制度的核心。说得更确切些,缺乏前者这些核心(表22)。

表22 俄罗斯:贫困和富足的原因所在

| 贫 困 | | 富 足 | |
|--------|----|------|----|
| 经济体制 | 82 | 关系 | 88 |
| 懒惰和饮酒 | 77 | 经济体制 | 78 |
| 不公平的机会 | 65 | 不诚实 | 76 |
| 歧视 | 47 | 机会好 | 62 |
| 不努力 | 44 | 有才能 | 50 |
| 无才能 | 33 | 运气好 | 42 |
| 运气差 | 31 | 努力工作 | 39 |

注:各数据为回答者选择该项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nterfax-AIF对1585个回答者的调查。莫斯科,1997年11月。

这种消极的意见也是不断加剧的不公平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俄罗斯,不公平增加了一倍并仍在加剧,而在波兰,不公平已经被控制,基尼系数在最近几年稳定下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波兰的基尼系数在从1989年的25升到1994年的接近30后,微降到1995年的29.4(经济合作与

从休克到治疗。

发展组织,1996a)^①。近似评估的结论是基尼系数可能在这个水平停滞,如果考虑到工资的分布情况,可能会稍高一些,而如果考虑人均收入,则增加的幅度可能会小得多(表 23)。

表 23 波兰的基尼系数(1993—1996 年)

| 年 份 | 以工资计算 | 以人均收入计算 |
|------|-------|---------|
| 1993 | 25.7 | — |
| 1994 | 28.1 | 33 |
| 1995 | 28.8 | 32 |
| 1996 | 29.5 | 34 |

—: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以工资计算的基尼系数系根据华沙世界银行地区办公室 Jan Rutkowski 博士的评估。以人均收入计算(四舍五入换成整数)的基尼系数系根据华沙大学 Irena Topinska 博士的估计。

表 24 波兰工资的 Decile 比率(1993—1996 年)

| 年 份 | Decile 比率 |
|------|-----------|
| 1993 | 3.03 |
| 1994 | 3.36 |
| 1995 | 3.38 |
| 1996 | 3.46 |

资料来源:Rutkowski,1997。

并不是所有反映收入分布的变化都朝向同一个方向。当一种评估方法认为不公平在加剧时,另一些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举例来说,在波兰 1994—1995 年的基尼系数(以工资计算)由 28.1 增加到 28.8,而同时 Decile 比率却没有变化,

^① 因为方法的不同,在一些估算间可能存在轻微的差别。至于基尼系数,无论如何定义收入——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以相等的单位表示的收入——总存在至少加、减一位小数点的统计误差。

停滞在 3.4 附近。这很重要,因为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变化,而较少注意到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增加的事实。

考虑到波兰的实践,作为在较先转轨和产出迅速增加时期一个收入分配公平发生变化的例子,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向着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努力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精心选择政策的结果?两种认识都对。一方面,刚刚投入运行的市场力量使分配采取另一种方式(Cornia 和 Popov, 1998)。发展的经济、不断扩大的私有部门及国有工业的重组使得全社会的收入都提高了。就不同的集团而言,他们自 1995 年以来从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得到的回报是颇相称的。另一方面,有一种理论主张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不仅应被作为政策的目标,而且更应被作为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工具。有趣的是,这个理论后来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作解释自己追求世界范围内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的理论依据(Fischer, 1998b)。

最初,劳动力由国有部门转向私有部门加剧了工资收入的不公平,这种趋势由于针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政策而加剧。针对名义工资的严厉的——如果不说是苛刻的话——工资所得税是常见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后来,尤其是在 1991—1993 年,波兰采用了著名的“Popiwiek”——这是一种旨在限制名义工资过快增长的所得税——期望以此推动国有企业更快地实行私有化,但这显然是准备不足的。在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同时,“Popiwiek”也损害了国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并使收入差距拉大。所以,当 1995 年初这项政策被最终废除后,国有企业的产出也开始提高了。结果是,国有部门劳动者工资和私有部门同步增长。因此,关于政策的第三个一般结论是:采用有利于一个部门而牺牲另一个部门的歧视性政策

是不明智的,即使这样做会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同时,这种歧视不利于竞争能力的加强,不仅降低了国有部门的增长率,也会降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通货膨胀盛行的结构调整初期,收入政策还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如果在实行稳定化政策的早期,政府通过降低产业工人的补贴并更多地减少公务员的工资来控制总需求的话,接下来的政策就会致力于相对前者而言更多地增加对公务员的补偿。其依据是这样的补偿不仅是公平的,而且这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加强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而在转轨前和转轨初期这种联系是很弱的。因此,第四个关于政策的一般结论是:商业部门的工资应基本由市场力量来调节,而公务员的收入则应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高于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相应的财政政策也必须以稳定和可预见的方式为这一目标服务。

政策的另一个变化与退休金和残疾人补贴的指数化相联系。在波兰,1990年刚刚开始实施稳定政策的时候,指数政策不是同生活成本挂钩,而是同名义工资挂钩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策失误,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实际的退休金会同工资一同调整。因此,首先它会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大幅度下降。而当工资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退休金也将自动增加,而不管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增加的退休金。相对于工资而言,较小幅度地降低退休金而后又较小幅度地增加退休金可能会更合理一些。结果,修改指数政策成了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虽然政策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成功了。1996年引入的修改允许增加实际退休金,但必须以不引起通货膨胀的财政预算为前提。这使得工资增长与退休金增长之间的关系较为恰当。由于存在着较高的依赖率,这一改

革有利于进一步稳定财政,却没给收入分配带来很多变化。

在转轨中政策还面临其他选择和互换关系。尽管为了提高储蓄倾向应采取宽松的税收政策,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公平却要求相反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政策的选择。如果希望经济尽快恢复并更快地发展,就应采用利于资本收入的财政政策。但麻烦在于,不是因为人民党的势力很强,而只是因为某些做法奇怪,例如失业救济金要被征税,而在股票市场上投机所得的资本利得却不用纳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政策主要是为了提高储蓄倾向。为了鼓励资本积累和提高储蓄倾向,由股票升值带来的资本利得、银行存款的利息和股票的红利都不用纳税或只需交很少的税。当然,这种政策加剧了不公平,但通过储蓄和投资促进了发展,并提高了整体生活水平。

在开始阶段,尤其是在收缩时期,这种政策仅仅有利于比较富裕的人,也就是那些有可支配收入来进行储蓄和投资的人。后来,当经济处于上升期而更多的社会阶层的实际收入上升时,扩大的资本市场和经营更良好的金融中介及倾斜的财政政策等促进其他收入集团的储蓄增加。结果是,中产阶级开始形成,而且相对较穷的社会成员也能提高其收入中储蓄的比例。

这种政策是颇具争议性的。1992年后期和1993年的波兰,由于缺少对股票投机收益的税收和普遍存在的对股票市场的赞辞,最终导致了泡沫的形成。这种情况——对于所有新兴市场都是很典型的,当然也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大众媒体的疯狂炒作而加剧。回报率虽然不是很稳定却是高得惊人。因此政治舞台上的其他活跃分子要求对在整个社会不那么景气时期所取得的高额利润进行征税,看来是合理的。但不幸的是,直到为时已晚才采取措施,1994年初泡沫

便破灭了。结果,股票指数下降了约 2/3,已没有什么理由再征什么资本利得税了——如果还有资本利得的话。因此,仅暂时开征了短期股票交易的中性股票收益周转税(按出售价格的 2%征收)而且也很快就弃之不用了。

由于政府的“2000 年一揽子计划”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所以资本收益至少到 2000 年底之前是免税的。得益于这些措施,国民储蓄率在 1993—1997 年提高了大约国内生产总值的 4%。这些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于提高了的国内储蓄。如果没有这种政策,不公平可能会少一点,但增长不会这样迅猛。所以,这种政策还是获得了回报。这样,关于政策的第五个一般结论是:在较低的不公平和低增长率还是较高的不公平和较快的增长率之间,政策应选择较高的增长率,并接受相对较高的收入不公平。最后,每个人的情况都会变好。

9.5 新的富人和新的穷人

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其数量取决于何时、何地以及根据什么标准来统计。不过,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由于市场转轨造成的结果,几年后这两种人都增加了。贫困和富足可以在相对的和绝对的意义上来衡量。即使有很多致力于贫困人口的研究,我们也无法知道那些被认为相对富裕或绝对富裕的人在人口中到底占到多大的份额,但这个群体的的确确存在着。

东欧和前苏联中贫困的范围在 90 年代大大地扩大了。只要产出的下降同转轨关联在一起,贫困的增加就将继续。只有少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很穷的人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很幸运摆脱了贫困。普遍的趋势是,社会中的贫困人口增加了。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就有可能把

那些国家划分为一些有明显区别的集团。有的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多被认定为贫穷,它们被定性为“很高贫困”,而有的国家只有低于5%的人口被认定为贫穷,它们被定性为“低贫困”^①。(表25)

表25 根据贫困群体划分的收入分配

| | 1987—1988年 | 1993—1994年 |
|---------------------|------------|------------|
| | 基尼系数 | 基尼系数 |
| 低贫困(<5%) | | |
| 捷克共和国 | 19 | 27 |
| 匈牙利 | 21 | 23 |
| 斯洛伐克 | 20 | 20 |
| 斯洛文尼亚 | 24 | 28 |
| 中等贫困(5%—25%) | | |
| 中国 | 35 | 38 |
| 波兰 | 26 | 31 |
| 白俄罗斯 | 23 | 28 |
| 拉脱维亚 | 23 | 27 |
| 高贫困(25%—50%) | | |
| 保加利亚 | 23 | 34 |
| 罗马尼亚 | 23 | 29 |
| 爱沙尼亚 | 23 | 39 |
| 乌克兰 | 23 | 33 |
| 俄罗斯 | 24 | 48 |
| 立陶宛 | 23 | 36 |
| 乌兹别克斯坦 | 28 | 33 |

① 东欧和后苏联各共和国的贫困分类来源于 Milanovic(1996)并以人口年收入少于120美元的标准测算(根据购买力平价)。对于中国和越南,贫困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

(续表)

| | 1987—1988 年 | 1993—1994 年 |
|--------------|-------------|-------------|
| | 基尼系数 | 基尼系数 |
| 很高贫困 (> 50%) | | |
| 哈萨克斯坦 | 26 | 33 |
| 吉尔吉斯斯坦 | 26 | 35 |
| 摩尔多瓦 | 24 | 36 |
| 越南 | — | 36 |

—: 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 Deninger 和 Squire(1996), Honkkila(1997), Milanovic(199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和世界银行(1996)。

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对于贫困的增加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几项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95; Honkkila, 1997; Pomfret 和 Anderson, 1997; Milanovic, 1998)注意到, 在一些国家中, 比如像在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 贫困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造成的, 其影响超过了收入下降本身。这种现象应被视作转轨时期的一项不良副产品(表 26)。

表 26 转轨期间贫困的增加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1987/89 年—1993/94 年)

| | 同本国相比的贫困 ^① (百分比) 平均收入的 21%—27% | | |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的贫困 ^② (百分比) 收入 < 120 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 |
|-------|---|-----------------|------|---|-----------------|-----|
| | 1989— 1990 年 | 1993— 1994 年 | 增加 | 1987— 1988 年 | 1993— 1994 年 | 增加 |
| 阿塞拜疆 | 11.1 | 65.2 | 54.1 | — | — | — |
| 白俄罗斯 | — | — | — | 1 | 23 | 22 |
| 保加利亚 | 2.0 | 32.7 | 30.7 | 2 | 33 | 31 |
| 捷克共和国 | 0.2 | 1.4 | 1.2 | 0 | < 1 | 0—1 |
| 爱沙尼亚 | 1.0 | 27.0 | 26.0 | 1 | 40 | 39 |

(续表)

| | 同本国相比的贫困 ^① (百分比) 平均收入的 21%—27% | | |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的贫困 ^② (百分比) 收入 < 120 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 |
|--------|---|-----------------|------|---|-----------------|-----|
| | 1989— 1990 年 | 1993— 1994 年 | 增加 | 1987— 1988 年 | 1993— 1994 年 | 增加 |
| 匈牙利 | 1.1 | 4.0 | 2.9 | <1 | 3 | 2-3 |
| 哈萨克斯坦 | — | — | — | 5 | 50 | 45 |
|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 | 12 | 84 | 72 |
| 拉脱维亚 | 1.3 | 33.5 | 32.2 | 1 | 25 | 24 |
| 立陶宛 | 1.5 | 39.1 | 37.6 | 1 | 46 | 45 |
| 摩尔多瓦 | 2.4 | 40.6 | 38.2 | 4 | 65 | 61 |
| 波兰 | 5.8 | 10.9 | 5.1 | 6 | 19 | 13 |
| 罗马尼亚 | 7.0 | 25.3 | 18.3 | 6 | 39 | 33 |
| 俄罗斯 | — | — | — | 2 | 45 | 43 |
| 斯洛伐克 | 0.1 | 5.1 | 5.0 | 0 | <1 | 0—1 |
| 斯洛文尼亚 | 4.5 | 6.1 | 1.6 | 0 | <1 | 0—1 |
| 土库曼斯坦 | — | — | — | 12 | 57 | 45 |
| 乌克兰 | — | — | — | 2 | 41 | 39 |
|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 | 24 | 47 | 23 |

—: 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 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5)。各国贫困线; 捷克共和国及斯洛文尼亚采用平均收入的 21%; 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采用平均收入的 24%; 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采用平均收入的 27%。② Milanovic(1996)。

不仅在收缩时期不可能抑制贫困的增加,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进一步的贫困。

首先, 存在地区性的危机和收入再分配因素。尽管经济已经处在上升期, 但还有一些落后地区的情况仍在恶化, 所以贫困仍在增长。不同于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状况, 地区间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由政治决定和行政手段来贯彻的, 在形成中的市场体系中, 通过公共财政体系进行的再分配只有相对微小的意义。市场引导的再分配不会使不同地区的平均收入趋于相等, 也不会使其差别更大。同时, 由于正在进行的

工业能力的重组,有些地区受到较大的收入下降的影响。破产、关闭陈旧的工厂、消除整个没有竞争力的行业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造成一些地区的产出甚至下降了一半,那里的失业率几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些地区中,由于有些城市在早些时候过分依赖于一个大工厂,现在这里的居民处于极端悲惨的境地。而这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确是常有的事。这种类型的情况从前东德到东西伯利亚都可以碰到。在这些地区和老工业中心,贫困程度很可能比平均水平要高。

第二,转轨创造出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所以也就带来失业,并且还会因正在发生的衰退而加剧。失业者仅仅能得到有限的——如果有的话——补助,这样,许多失业者,尤其是那些长期没有工作的人变得更为贫困。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准备好对付失业,尤其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失业。在一些发达市场经济中,比如在美国,只有少于5%的失业者会持续一年没有工作,而在如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超过1/3的失业者至少持续一年以上没有工作。

第三,相当一部分人口,包括只有相当低的退休金的退休者,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缺乏适当的指数修正机制,而使其存款急剧减少。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由于薄弱和无效率的金融中介以及政策的疏忽毁掉了许多家庭的终生积蓄。在私有化导致富有者出现以及贫困迅速增加的同时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这一进程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它削弱了人们对转轨的支持,在上了年纪的几代人中尤其如此^①。

第四,不合理的节约财政支出的动机驱使一些政府推迟

^①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并不是最穷的人。比如,在波兰仅有15%的退休者比工薪阶层的平均水平差或更糟。这样,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取退休金的人属于五档收入层次中的第二或第三档。最穷的人最有可能是家庭人数最多的人。

退休金和公务员工资的发放。他们幻想着这样做会使预算情况好一些。当前的欠账仅仅是隐藏的赤字而不是别的，而且积月累的欠账又恰恰是公共债务的一部分。不断增加的欠账代表了未支付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了生活水平。有趣的是，自由经济政策——包括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界大力支持的政策——下决心主张对逾期贷款给予制裁和罚息，却从不要求为逾期支付工资的退休金给予补偿^①。

第五，农业人口仍占很大比重。在一些转轨国家里，包括其中的最发达者，很大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农村，以务农为生。如果全国有 1/4 或甚至 1/3 的人口依靠务农、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活，那么这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会对全国的生活水平带来冲击。很多分析家无视这一事实而仅把

^① 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或这是否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可以从《金融时报》给本书作者的回信中看出来。针对该报对塞尔维亚经济政策的评论，本书作者给《金融时报》的编辑发去一封信。部分内容是：“评论认为米洛舍维奇先生实行的是灾难性的政策并导致自己的国家走进了死胡同，这一评论有些过分，其实这些政策是合理的。像《金融时报》这样令人尊敬的报纸怎么能轻易断言（见 1998 年 3 月 9 日文章《科索沃的真正意义》）：全部支付拖欠的退休金和其他欠款就意味着失去私有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呢？无论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是来自税收还是如评论中所提到的，来自 Spnska Telekom 的私有化，国家都应履行它的义务。不能支付包括退休金在内的应付账款的国家，是不能被称为市场经济的。这种财政抑制只会造成隐藏的赤字和递增的欠款，以及不断增加的公债。这最终会使经济动荡而妨碍经济转型和增长。这就是数年来俄罗斯经济所遭遇的窘境，其不良后果影响到转轨的进展，造成长期的衰退。相反，按照我的‘波兰的战略’，虽然并非易事，却可以解决早期积累的欠款问题，最终的后果是积极的：稳定，发展，经济开放，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所以，所有的合同都应贯彻，也包括关于应付退休金和其他欠款的那些合同。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最好是称赞政府承诺履行义务而不是对其批评。”虽然编辑回信道：我们其实一直希望能发表您的这封信，仅仅因为版面有限所以至今未能将其刊登在信件专栏。我仍然希望在今后能有机会发表您的来信，但我的评论并未发表。很遗憾，“版面有限”比思想观点更重要。

注意力放在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上。但是,迅速的贸易自由化和从更有竞争力的市场中涌入的进口食品已经使得一些农场——既有曾是国有或合作化经营的大农场也有小的家庭农场——经营困难,农民变得贫困。

这可能是导致新的穷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关键原因。一方面,这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这是政策失误的后果。如果现在不比以前更好的话,至少不应像实际发生的那样糟。产出急剧下降和不断加剧的不公平使贫困面扩大。这又造成了各种不幸。在这些国家中,第一次有无家可归者流浪街头,犯罪率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地区之间因经济原因驱动的人口迁徙大大增加,地下经济繁荣起来。人口寿命下降,社会压力增大导致死亡率的上升(Cornia, 1996b 和 Paniccia, 1997)。

从某种意义上讲,14世纪的黑死病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同转轨萧条时期的最糟糕情况相比,算不上是灾难性的,社会的困难程度也没有这么高。那时,至少人均收入并没有降低。恰恰相反,黑死病流行的直接后果是,劳动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业主的相对地位被削弱了,因为人均收入上升而租金却下降了。在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糟糕情况中,不仅存在衰退,更重要的是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人均收入的萎缩。

虽然没有黑死病,有关政策的执行及其影响却使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如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人口寿命大大缩短(世界银行,1995a)。在1989—1995年间,男子的平均寿命惊人地下降了6岁。有资料宣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4和1995; Cornia, Honkkila, Paniccia 和 Popov, 1997),由于这种转轨时期的危机,大约有300万本应活得更长一些的人离开了人世。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伴随转轨的其他不良影响所造成的极端困境造成了这种情况。由于不良的饮食条件、对水质

监控的不力、劳动安全保障的削弱所造成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由于暴力、自杀、心脏病和压力等原因,1996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高出生率60%。母婴死亡率方面,母亲死亡率比西欧高5—10倍,婴儿死亡率则比西欧高2—4倍,而死于肺结核的人仅在1992—1996年就增加了90%(Nutti, 1997c 和 Twigg, 1997)。

贫困范围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扩大,也包括那些在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中领先的国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经济恢复、增长与提高穷人生活水平之间存在时滞。一般顺序是这样的:首先实际产出恢复,然后失业增多,只有在预算情况得到改善后才能为满足穷人们的社会保障需要提供更多的资金。所以,就会存在经济早已开始增长,贫困程度却仍在加剧的情况。

这种顺序在波兰就很典型。虽然从1992年下半年起,经济已经恢复增长,但直到1995年,贫困的范围并未缩小。失业直到1994年夏天仍在增加,很多领域的工资直到1995年才开始增长。如果按月收入只有家庭平均支出的一半来定义贫困线,那么低于贫困线的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93年的12%,增加到1995年的13.5%和1996年的14.0%(中央统计局,1996和1997a)。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标准,它并不意味着那时有更多的人沦为绝对贫困,事实正相反。几年来,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的人口不断增加,这使得这部分人在评价自己生活水平的变化时比较乐观。认为自己生活状况“差或很差”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从90年代初的超过一半降到1995年的32.5%和1997年的30.3%(中央统计局,1997b)。

因此,虽然你可以说贫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过去就早已发生过,但这种情况的确令未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

决定何种收入的分配方式将在转轨经济中长期执行这一问题,这是决定性的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改正迄今为止所发生的种种错误。目前,不公正在加剧,这就使得改正错误变得很难。后社会主义的天才们留下了问题,自己却不准备解决它们。

转轨也创造了新的富人阶层。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勤奋,不仅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产业和财富,而且还为其他人创造出新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每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企业家阶层都必须存在。他们热衷于承担风险,把自己的收入投资于新的事业,而这些事业正是整个经济发展所依靠的。所以,新的富人阶层的核心是以企业家为基础的。遗憾的是,由于薄弱的制度安排和差强人意的市场文化,新贵中也包括小偷、骗子、恶棍一类的人,所以他们同其他社会弊端一样应受到攻击和摒弃。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致富的途径有很多,但在转轨经济中,这些途径却可以归结为一些很不同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得致富迅速而卓有成效。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都可以见到一条致富途径,虽然不像大家一般认为的那样是一条普遍的途径,却是一种很特别的后社会主义的私有化方法,叫做“自我赠予(*self-enfranchisement*)”。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脱胎于早先的经理和行政官员队伍,他们经营管理着早先由国家、地方和合作社(主要在农村)所有的资产。

在一些国家,比如像在俄罗斯,致富的主要途径不是对原已存在的存货进行重新分配,而是依靠从有利可图的出口交易、出口补贴以及实际利率为负的出口信贷中积累起来的收入。这也是一种大的重新分配。毫无疑问,现在国家承担着债务,而大亨们却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伴随俄罗斯的不是对称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家债务减

少而是不对称的个人致富与公共债务的增加。

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的波动和产出的分配,建立起了某种机制,首先满足较富裕的人们要求,然后才照顾到社会其他部分的生活水平,包括最穷困的人们。在衰退之后,实际经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金融市场狂涨却只需要短得多的时间。股票狂涨,而实际产出却直线下滑(就业也是如此)的情况在刚刚形成的市场条件下并不少见。在急剧投机的状态下,比如,还是在俄罗斯,1996—1997年,股票指数(以美元标价)在短短两年内翻了将近四番,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这种矛盾的趋势是可能出现的,因为在短期和中期,不同的因素导致了两者不同的变化。金融市场可以因为投机和过分的(虽然不是理性预期)乐观而疯狂和暴涨,实际产出却不行。所以,如果平均生活水平因为经济危机和衰退而下降,同富人相比,穷人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要待得时间更长一些。

关于历史性的战略与行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不同阶层在收入与占有财富方面的差距究竟到什么程度。这些战略与行动使得拉丁美洲的分配比东南亚更不公平。美洲发展银行的总裁恩里克·埃格里西亚斯(Enrique Iglesias)解释道,南美大陆的极端不平等源于各种结构的和社会的因素,但也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尽管殖民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Eglesias, 1998)。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一般都在阿根廷的38.4点和巴西的61.4点之间。最近算出的基尼系数在智利是53.0点,在哥伦比亚是53.4,在墨西哥是54.0,在委内瑞拉是47.2(Londono, Spilimbergo 和 Szekely, 1997; 以及 Lustig 和 Deutsch, 1998)。这样,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布,乌克兰和俄罗斯与墨西哥一样的不平等。所有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除去基尼系数为55点的吉尔吉斯斯坦,在收入分

配的公平性方面,都比前述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情况最好的国家——阿根廷还要好。至于亚洲国家,各国的基尼系数有很大的不同。令人吃惊的是,收入分配相对较公平的却是印度(29.7点)和斯里兰卡(30.1点),而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的时间却比拉丁美洲国家还长。所以,同以后实行的战略和政策相比,历史的原因还不足以解释今天的问题。

这样,在转轨过程中推行了很长时间的种种政策,将来可能会阻挠增长和转轨成果地分享。而这些转轨的方法将会决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的最终方式。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国家会走南美洲国家的路,而另一些国家却更像南亚国家。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富人和穷人的社会结构,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存在。

9.6 收入分配和增长

在大规模私有化中允许更大不平等存在的收入政策,可以通过更高的储蓄率和更好的公司管理(不包括加强了国有资产管理)来鼓励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的过程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成为最重要的政策议程。然而,旨在促使经济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政策,也可能对经济发展能力有反面的影响。这取决于一些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这些往往是政策制定者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无法控制的。所以,增长战略和收入政策必须很好地平衡并需要不时地检查。

一方面,如果收入的差异过大而造成社会压力并侵害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力,这种不平等就会减缓发展的步伐(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4)。无论实际收入如何分配,这一因素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实际收入如何分配,绝大多数人口总认为这不公平。实际上,在任何一

个社会中,从社会本身的角度而言,没有什么公平的分配方法,在转轨这一复杂的转变过程中情况更是如此。所以,不仅仅实际的不平等,就连在这个问题上的通常观点都会损害增长的能力。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试图达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往往通过民主程序来贯彻,这会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由于更高的税收和更大的社会转移(Alesina, 1997; Gordon 和 Li, 1997)。这实际上是一些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在那些国家里,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国会更热心于把资源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不是努力扩大资源,即促进储蓄、资本形成、投资及增长。转轨经济中为促进增长的政治活动是这样运作的:以改革为导向的政府一方常常必须同内阁其他成员及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本党成员作斗争,以确保公共开支平衡和经济的大致稳定。实际上,如果没有民主选举的国会的话,通过公共财政系统进行的再分配会更少,政府支出也会更少,这样,储蓄、投资从而经济增长的步伐会更快一些。

尚未成熟的后社会主义民主对于社会和经济形势的波动非常敏感。新政治体制是否能获得支持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活动的转变,有时甚至更取决于收入分配及其运作的方法。因此,对于改革而言,做到如下一点可能非常关键:收入的分配不公不要超出那些采取批评态度的大众的承受限度,这常常有因果关系。只要人们认为伴随转轨的困难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更能让人接受,只要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能抵消对目前状况的失望,人们就会支持转轨。人们因为政治上的自由和文明社会的制度扩展而感到满意,对转轨的支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存在经济的严重收缩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如果政策不能及时改变生活状况,同时,以牺牲贫困人口的利益为代价,一些社会阶层比其他阶层

过得更好,那么,事情可能迅速向坏的方向发展并失去控制。社会压力增大,有利的政治气氛——这是社会进行基本变革所不可或缺的,如果这些基本变革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恶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对体制改革的支持减少了,政治抵触则增加了。

政治不稳定——常常源于不适当的收入分配不为社会所接受——不利于投资和竞争与发展能力的提高(Alesina 和 Perotti, 1996)。政治稳定对于转轨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更加不稳定。当整个国家都处于转轨中时,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和文化、法律及评判法律的能力、国会和政府都在发生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以及人们对政策的预期也在变化。既然这些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避免的,那至少也应该让企业家、投资者和消费者能够预料得到。如果是这样,这些改变不一定会损害经济增长。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所以在评估任何投资时都要事先对政治不稳定作出估计。

这些矛盾的趋势对于增长速度的最终影响在短期内可能是负面的,然而,由于对储蓄和投资倾向的影响,长期来看则可能是正面的(Flemming, 1998; Kolodko, 1998a)。很重要的一点是分配的方式和社会对它的接受。就目前的转轨阶段而言,在大多数国家,分配的方式并不有利于增长。历史经验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和论证表明:尽管生产和消费在持续增长,在一些特殊权力关系作用下,市场力量倾向于改善富人的相对地位,而相应地削弱了穷人的相对地位(Raiser, 1997)。直到今天这的确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同时存在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扩大的贫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严重的萧条持续的时间太长,问题会更严重。因此,对于人民大众——仅仅在俄罗斯和乌克

兰就有接近 2 亿人——来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不但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造成了许多社会压力和冲突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焦点,这不仅是对转轨国家而言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公正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应该被视为一项最重要的长期政策目标。

不论是否存在政策干预,在转轨时期不公平一定会存在,尽管如此,变革相对于公平——也就是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在获得诸如教育、文化、保健、体育锻炼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方面——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在更大的程度上被政策所控制和管理。这些变革的步伐和范围不应交给刚刚释放的市场力量去解决。实际情况是,实现这些目标并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政治和政策就是要反复处理一系列利益冲突的能力。在转轨时期更是如此,尤其是当政策必须设法使稳定转化为增长并努力巩固稳定的时候。

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本国努力追赶更发达国家的时候,如果面临这样的选择:较快的增长伴随较高的不公平(但贫困在减少),还是较慢的增长伴随较少的不公平(但贫困不断扩大),此时他应该感到高兴。他的选择是显然的,因为前一个选择更合理。经济政策应该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因而,收入政策也必须服从于这个最高目标。这样,从长远的观点看,每个人至少都会有机会生活得更好。经过最初的不公平的显著增加,当经济实现了增长以后,就有可能在减少不公平的同时不损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的顺序早已有了正面的例子。在实现公平方面尤其如此,因为发展战略和促进发展的改革会很好地服务于实现公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目标。这样,转轨进展得越快,较快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越牢固,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就更好。

必须记住,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不是仅仅为了改变体

从休克到治疗·

制,而首先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如果不是全部的人、也应该是压倒多数的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否则,转轨就没有多少意义。

IV

到达彼岸

10

市场化和民主化

10.1 市场和民主的相容性

至少在某些时期,在高度集中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也能够有较快发展。20世纪就有许多这样的国家维持了长期的强劲增长,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就是例证。比如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晚期保加利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本世纪50年代以来到70年代中期超过5%,快于同期的西方民主国家,而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最后1/4世纪增长更加迅速,1976—1998年年增长率达到8%左右。但这种情况

并非是个别的。

这只是一种表象,并不意味着独裁和增长、民主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在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取得高速增长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以及不同领袖和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韩国等,它们并不一定是按民主程序取得政权的——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情况。但从长期来看,高度集中无法支撑较长期的增长,而市场化与民主则宜于增长和发展,这些国家已经得出或终将得出这样的结论。

民主体制和实践会对经济行为以及增长能力产生多方位的影响(Nelson等,1994),在这方面至少应考虑以下三类问题:

首先,是自由参与商业活动的权利,这是最重要的。自由进入和退出能够创造一种机制,使企业家加入到生产行列,或者如果不适应可使他们退出。他们不仅要使自身利润实现最大化,而且要增加新的国民产出。这样在民主环境里,各个利益团体都在为自身的扩张而努力,结果使整个经济增长加快。对商业活动的自由参与——买与卖、生产与竞争、储蓄和投资——都构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以促进经济整体增长为目标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因素能够比传统的市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这种被释放的能量和活力能够推动更为有力的企业家精神。

第二,民主能够提供有效率的经济政策框架。即使是最为成熟的市场机制也不能替代有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们是可互补的,而不是相冲突的。民主秩序和市场纪律是有利于持续增长的基本的组合。民主意味着组织和规则,也意味着一种文化和行为。所有这些因素,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促进和

提高经济行为所应该遵循的市场游戏规则的透明度和条件的可预测性。民主保障稳定,而稳定又往往促进增长。但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民主会影响经济金融政策的质量,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呢?

由于民主不能自动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由选举作出的选择都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总会存在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有一些涉及到公共生活中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有时候可能比生产和贸易、消费和投资等问题更具有影响力。像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如堕胎、少数民族的权利、地区冲突、污染、犯罪、学校宗教课程的设置、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等等,在选举时会超过经济上的争论,而不管经济政策多么合理^①。这样结果就可能损害经济政策的质量,并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比自由选举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进行重大决策的机制。最好的例子是预算和税收,这是对稳定和增长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它们由民主程序进行决策,但不幸的是经常缺乏充分的经济上的合理性。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进行讨论,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年的预算决定对增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毕竟,长期的结果总是以年为阶段的。

第三,如果经济不从属于政治的话,民主能增强增长的潜力。经济完全附属于政治,在中央计划国家是很普遍的,在民主国家也不乏其例。当代民主社会的结构就是如此;社会动

^① 最近中欧的两个进展良好的国家的选举结果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997年9月波兰选举中,尽管左倾民主联盟(SLD)和中央农民党(PSL)的联合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上的成就,但还是被迫走向对立。非经济的因素显得比经济业绩更为重要。匈牙利在1998年5月的选举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仍是由新的联合政府接任。

因超出了经济上的合理性。结果,发展策略是由多数派,而不是由那些更清楚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人作出的。当然,双方意见一致是最佳的,但这往往要经过较长期的民主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是衰退而不是民主持续的时间太长,民主建设才刚刚开始。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即掌权者同时可能也是正确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寻求有效妥协的过程就可能对增长是有害的。不仅是那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者到处都存在^①。

然而,对自由和效率或市场和民主的关系的认识,现在作结论还为时太早。有趣的是,即使那些最赞同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人也认为民主涵盖了经济自由,却不能加强经济自由。到今天为止,仍有观点认为民主与自由是不可以和谐共存的,至少,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缺乏好的选择令人失望,发展前景受到干扰^②。这个声明忽略了一点,即选择不是民主与否的问题,而是政策好坏之间的差别。

民主不能自动地保证一定会产生明智的政策和良好的商业环境,而缺乏民主也不一定不会带来这些。民主可能导致好的政策,也可能不是,因此讨论的焦点应集中于民主制度下实施政策所依赖的环境,而不是去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制度,因为在现代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制度。在1960年只有37个政府及国家领导人是按民主程序自由选举的,到1998年就有多达117个国家是通过民主授权的。无疑,在20世纪过去的几十年中巨大的民主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正反馈效应。

① 法国、德国、意大利在1996—1998年为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财政赤字必须低于国内生产总值3%所作的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

② 见附录《经济学家》,1997d“自由的未来”一文所强调的。

因此,不仅理论而且最近的历史事实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民主和运作规范市场之间具有兼容性,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即使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这样,但可以肯定从长期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问题,即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绝大多数国家政权并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可能就不是这样。一般认为民主和市场之间是协调的,但并不意味着在民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总是协调的。

10.2 有关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反馈

由于市场化的概念与市场是不同的,而民主化和民主也不是等同的概念,因此市场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和市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如果说后者是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转轨的最终目的,那么前者是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尽管一般认为引入民主要比引入市场容易一些,但这两个过程都要求制度安排和行为模式进行根本的改变。

必须强调的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一样存在较大的差异。一种是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已经享有一定的分权和自由化。即使在80年代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和“重建”政策时,政治的自由化也有了一些发展。另一种是像前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实施独裁体制的国家。可见,民主化的起点是不同的,在一些国家可能对以后的发展更为有利,就像市场化的发展一样。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具有有限的自由的国家而言,其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也更为有利,这并不奇怪。

虽然民主的法律基础建设可以快一些,而有关的文化和

行为的改变则需要时间。尽管在引入市场的问题上,人们并不认为“休克疗法”是一个好主意,但这与民主建设恰恰是不同的。如果认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总体原则和法律基础,用激烈的方式在短期内加以实施却是可行的。当然,变革要继续进行下去,因为民主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插曲,学会民主运行的机制并应用民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需要时间。

上述的调整进行之后,也就引入了民主化和市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过程对增长的影响可以用类似刚才的方法进行分析。对由转轨引起的衰退和萧条,在商业中引入自由对经济的复苏具有关键的意义,这些变化与民主化和私有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会产生交互的作用。首先它会有负面的影响,然后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资源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改善了配置效率,根本性和有机的私有化与民主化过程一起,与非国有化相比,对经济增长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商业的自由化为社会最有活力的部分参与商业活动创造了机会,结果,一大批经济实体的建立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了很大提高。新的私有部门的企业家成为后社会主义经济复苏的动力。在原来体制下,这样的企业家是受到压制的,但是民主化的发展使他们得到了新生。

对民主和市场不能仅仅从形式和法律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这一领域的进步其实是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光是接受那些长期被否定和被抛弃的思想,并把它们引进到新的法律中是不够的^①。文化、行为和政策的实

^① 在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采用了新的宪法,或至少对旧的宪法进行了根本的修改。这一过程经历1年到7年不等的时问。波兰的情况是很有特点的,虽然是带头进行转型的,但直到1997年才启用了新宪法。

施一样也需要进行改变。新的政治文化和新的法律不同,它是不能强制的,必须有一个吸收的过程。如果要使它能够成功地吸收并且能够符合理性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学习、理解和吸收。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运行良好的原因用文化的因素去解释要比单纯用经济因素去解释更让人信服。按照这种论点,波罗的海国家的企业家能力强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由于这些国家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要短一些,但这并不可信,因为仅仅两到三代的时间不足以构成这么大的差别。确实带来了不同的是越南改革中的 doi moi 政策,越南北方受到富有活力的南方经济的显著影响,在改革之前,南方的市场经济也仅存在了 10 年^①。

也有人认为因为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波兰人要比其他的东欧国家有更多的商业意识和企业家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但其实这种说法忽视了最近这些国家的经济历程。事实上像波兰、匈牙利这样的中欧国家和前苏联的爱沙尼亚主要是因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了较早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只是对旧的体制作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对企业家能力的培养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这对于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是非常有利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文化和行为方面的差异并非是长期以来历史的差异形成的,主要是受近期改革的影响。

经济民主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自由地从事商业活动,它也包括雇员参与企业的决策和成果的分配(Nuti, 1998),以及区

^① 改革的政策出现了中断,严格地说,doi moi 政策实施是在 1986—1989 年期间。后来由于失败,又开始使用其他方法。于是实行了更为激进的稳定政策。从这一意义上讲,doi moi 可与苏联的重建政策相提并论。

域内的分权。它要求从政策上保证最低的工资水平和最低的收入。然而,商业的自由进入对于促进恢复和增长才是最重要的。经济民主不仅使资源配置的方式更为有效、更利于增长,而且也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平衡的因素。因此,民主化和市场化关系中的这些方面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的民主化为最初几年的转轨提供了特殊的持续的动力,直到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

然而,自由从事商业活动作为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的一个新的机会,只能存在一段时期。它只能发生一次,对经济增长的加速作用也只能在这一段时间显现。此后,当新的可利用的机会出现后,就像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这一因素就成为一种正常的因素。这是因为,作为人力资源的特殊组成部分的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从以前的职位到目前职位的角色转化。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之后,长期增长的速度就不会受这一特殊现象的影响,非通常的因素就转为正常的因素了。自由从事商业活动是追赶型增长的催化剂,经过一段时间后,当人力资源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融入私人部门之后,增长的速度注定要慢下来。因为在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部门就不再是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说,由于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自由化,在衰退后的恢复中会带来一段经济的加速增长阶段。随后,尽管会放慢步伐,但仍会保持增长,因为最初由于企业家的大量涌现带来的强劲增长只能出现一次。

我们已经了解,民主能够与有效的经济政策相适应。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文明社会,这一点是长期存在的话,那么,在转轨经济中又是如何呢?结论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有许多例子表明,在民主的初期,并没有采用最佳的政策(尽管也没有比以前的政策更差),但也有引入民主后很

快就制定了正确措施的积极的例子。这些例子而不是那些负面的例子占了多数。从那些市场化和民主化国家第一年的经历看,很明显,民主的程序能够促进经济的合理性,尽管并不都是这样。

议会、民主选举的政府以及国家领导的确有几次是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比如 1989—1991 年波兰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及企业间的大量拖欠。又比如自由选举的第一届总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增加资本积累而提出一项新税收法案。1992—1995 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主选举产生了议会,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银行、金融危机和衰退的持续。又如捷克的股权私有化,引起了行业竞争能力的恶化以及 1997 年以后增长速度的下降。俄罗斯议会和政府作为后社会主义较幼稚的民主的产物,也是一个在 90 年代自由选举的机构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的例子,导致了 1989—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一半的后果。

因此,是不是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转轨经济的情形比较特殊呢?

当然是这样。毕竟在经济转型中的政治斗争要比传统的民主社会激烈得多。有些在西方社会看来是政治极端的東西,在东方却可以起到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这是一个特殊阶段,各种利益集团和代表他们的党派不仅为当前的利益、而且也为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争执。这是历史性、战略性的较量,相伴随的激烈的竞争使政治上的争论更具有侵略性,所以这就好像一级方程式汽车拉力赛的起跑。后社会主义民主兴起时的利益冲突程度要远远高于成熟的文明社会。这是年轻的民主社会的另一特点,在这样的框架下不能保证民主的程序就一定能引导作出最佳的经济选择。实际上,是很少能

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妥协的结果往往是次优的选择，而这如果能正常运转的话，也不能算是太差的选择。

另外，大多数真正的政治决策更多地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相关，而不强调政策所带来的多重效应。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卷入到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和经济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而且民主化也不是以增长为目标的，它有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所以也可能会为了民主而牺牲经济扩张的机会。但是以前受压制不能公开讨论的可行的经济思想和方案在程序上有了革命性的改变，现在它们可以展示给公众并可以引起注意，尽管可能最终没有采取最佳的方案，但至少这些方案已为公众所熟知，因此创造了这些方案在适合的时间可能被采用的机会。

只有当政治领导人知道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并能采用适当的政策时，民主化才会有利于增长。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知道如何去促进增长，还要善于使大多数选举人确信他们是值得信赖，并应选举他们。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的领导人并不常见。转型的历史还不够长，还不足以证明公众的感情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机制是很奏效的。民主的运转是这样的，如果选民在一两年后发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选错了政府或总统（尽管是依据确定的规则选择的），他们也只有再等两年或三年到下一次选举才能改正这一错误。否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在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中，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整个地区都是由不同政党的联合体执政，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更多一些，而独联体国家则少一些。由于这些政党必须依靠相互妥协来工作，因此它们所选择的经济政策经常是不尽合理的，也仍然是要通过民选的政体来加以实施。

如果说在政治超越经济的情况下，民主可能会阻碍经济的生长的话，那么在转轨经济初期民主发展的幼稚阶段，这

种可能性就更大了。政治与经济政策交织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分辨。尤其在多种事物处于经常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在政治让步与经济办法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即使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如在“堕胎法”和所得税之间、预算构成和选举监督之间、银行私有化和军事开支之间、住房补贴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之间,也可能出现间接的联系。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推行某些决议而不断地努力,或为获得对其他一些主张的支持而不停地讨价还价,总是会把不相干的事情搅在一起,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因为受民粹主义以及不现实的期望的影响,政治问题往往放在比经济合理性更优先的位置。在转型能够带来足够的胜利果实之前,就有了迫不及待分享成果的要求。这样政治上的透支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威胁。由于政治上的承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就有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采取某种政策的倾向,而不考虑这种政策得以实施的经济条件。这可能就会遇到挫折,但是由于政府继续存在,政策就会延续。即使政府无法维持,也要持续到下一次议会选举,由于这种制度上的局限性,当不能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的时,一项政策也会执行下去。

在转轨经济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都会受过去很深的影。在一些国家转轨的初期,虽然狂热者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追求自由市场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却仍相信政治权力能够使形势好一些。这种信念是从国家社会主义和命令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政府力量是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的,中央的决定也能够得到广泛的实行。一些政治家仍然相信这一点,但却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是智慧和诚实的、都基于理性行事。在民主的程序下,意志的实施也是毫无问题的。但新的政治阶层高估他们的能力,忽视了首先要生产物资和提供

服务的必要性,其次才是改变他们的习惯。

在以前所谓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施行的经济政策有一种普遍的不适应性,人们认为所选择的政策可以通过政府的意志去实施,尤其在转轨经济这种观点十分流行。对政策本身的把握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仅因为市场和民主的特点决定了在行使过程中有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且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民主和市场与民主化和市场化一样,其作用机制决定了仅有 51% 的选票是不够充分的,社会和经济体不像一个公司,只要控股就足够了。同时需要其决策是正确的,而且其他政策即使也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国会中多数的支持和大众的支持也是不行的。

不同的国际政治势力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影响到国内的决策。有些情况下,就会出现国际政治因素压倒从国内具体情况出发的有理性的经济政策的情况。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所有转轨国家的私有化都广泛地得到外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建议和咨询,无疑它们首先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只有这样它们才会关心并帮助改善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状况。比如,著名的英国“技术 Know-How 基金”和美国的海外发展委员会,为转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就像它们为英国和美国的投资者、出口商、商人所做的那样。

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很清晰。一方面,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实行一些激进的政策是容易的,即便其本身可能是不正确的、并可能导致长时间的衰退。新兴民主社会中的民众尽管渴望民主,他们仍会惊异于周围环境的快速变化。人民已经准备去接受一些严峻的补救措施,因为他们相信新的领导精英以及他们的顾问所说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事实上也不尽然。在单一的政治条件下，传播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是非常容易的：即便所推行的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是对生产有负效应的，也没有更好的政策可以替代它。在民主制度下，也可能会允许不恰当的管理，尽管在后来能够纠正，但也许已经对实体经济构成了伤害：生产的下降超过必要的程度，经济恢复后的快速增长比可能的速度要低一些。

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民主体制下，也可能会实施正确的政策。然而，“可能”并不等于“容易”，因为民主制度不像集权统治，要说服更多的部门认同这些政策。不仅官僚机构和政府，还有议会决策委员会、总统、最高法院、院外集团、民主组织和新闻媒体（只要是真正独立的）以及国际组织（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贸组织），都会参与从好的创意到实践的政策实施过程。

因此，决策的形成（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要按照民主的程序正式通过，尽管也要得到议会同意。所以，决策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这种民主程序。只在转轨的后期阶段，民主才会抵制政治至高无上的倾向、才利于经济的发展。幼稚的民主并不能保证多数派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民主至少为适当的经济政策开创了崭新的前景，毕竟，缺少民主并不能使事物出现任何好转。即使我们掌握了如何进行正确决策的技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我们也仍然需要民主，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的转轨历程和发生的复杂变化来看，很难对民主化过程对整体经济情况的影响作出准确的分析结论。对后者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仅仅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无论如何很难得出积极的评价。因为大多数国家民主的实施，往往带来经济

的萎缩而不是经济的繁荣,更多的是与经济的衰退而不是增长相联系,与萧条而不是与发展相联系。但是也有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积极的变化,首先,市场的形成为未来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从变化的特点、范围和步伐综合来看,民主化促进了市场化,反过来也一样。

从经验来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和补充的。自由社(Freedom House, Shor, 1997a 和 1997b)对 25 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主要包括自由选举、政党竞争以及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等政治改革进程。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则是通过工会的评价、专业组织的自由度以及对民主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来衡量这一过程的。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是要看它们报道的自由程度以及在排除政府及政党干预方面的能力。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并且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立法和行政的透明以及政府的分权,决定于治理和公共管理的能力。

尽管对经济自由化的评价,可以简单地通过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进行判断,但是还应该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的进程来看,应包括产权制度、中央银行独立性、人民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的情况等内容。我们可分为 7 个层次,1 代表程度最高,7 代表程度最低。分值越高,表明情况越好。当然这只能看作是大体上的衡量结果,但也是一种有趣的观察事物的方法(表 27)。

用这些特定的方法衡量经济、政治自由状况,就能够大体上看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根据进展程度打分,可以把转轨经济分成三组:所谓巩固的市场经济(有 7 个国家)、转轨经济(14 个国家)和巩固的国家经济(4 个国家)(表 28)。

表 27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自由社的评级(1997 年)

| 国 家 | 政治 进程 | 社会 民主 | 媒体 独立 | 法律 规则 | GPA ^① | 私有 化 | 经济 状况 | 私人部门占 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 |
|--------|----------|----------|----------|----------|------------------|---------|----------|--------------------------|
| 阿尔巴尼亚 | 4.3 | 4.3 | 4.8 | 4.8 | 4.8 | 3.8 | 4.3 | 75.0 |
| 亚美尼亚 | 5.5 | 3.5 | 5.3 | 4.8 | 4.5 | 4.0 | 4.0 | 50.0 |
| 阿塞拜疆 | 5.8 | 5.0 | 5.5 | 5.5 | 6.3 | 5.3 | 5.0 | 25.0 |
| 白俄罗斯 | 6.0 | 5.3 | 6.3 | 6.0 | 6.0 | 6.0 | 6.0 | 15.0 |
| 保加利亚 | 3.3 | 4.0 | 3.8 | 4.3 | 4.3 | 5.0 | 5.8 | 45.0 |
| 克罗地亚 | 4.0 | 3.5 | 4.8 | 4.8 | 4.0 | 4.0 | 3.8 | 50.0 |
| 捷克共和国 | 1.3 | 1.5 | 1.3 | 1.5 | 2.0 | 2.0 | 1.8 | 75.0 |
| 爱沙尼亚 | 2.0 | 2.3 | 1.8 | 2.3 | 2.3 | 2.3 | 2.0 | 70.0 |
| 格鲁吉亚 | 5.0 | 4.5 | 4.5 | 5.0 | 4.5 | 4.3 | 4.0 | 50.0 |
| 匈牙利 | 1.3 | 1.3 | 1.5 | 1.8 | 1.8 | 1.5 | 1.8 | 70.0 |
| 哈萨克斯坦 | 5.5 | 5.3 | 5.3 | 5.0 | 5.5 | 4.3 | 4.5 | 40.0 |
| 吉尔吉斯斯坦 | 5.0 | 4.5 | 5.0 | 4.5 | 4.3 | 4.0 | 3.5 | 50.0 |
| 拉脱维亚 | 2.0 | 2.3 | 1.8 | 2.3 | 2.5 | 2.5 | 2.5 | 60.0 |
| 立陶宛 | 2.0 | 2.3 | 1.8 | 2.3 | 2.5 | 2.3 | 2.8 | 65.0 |
| 马其顿 | 3.5 | 3.8 | 4.0 | 4.3 | 4.0 | 4.0 | 5.0 | 50.0 |
| 摩尔多瓦 | 3.3 | 3.8 | 4.0 | 4.3 | 4.3 | 4.0 | 4.0 | 40.0 |
| 波兰 | 1.5 | 1.3 | 1.5 | 1.5 | 1.8 | 2.3 | 1.8 | 60.0 |
| 罗马尼亚 | 3.3 | 3.8 | 4.3 | 4.3 | 4.3 | 4.5 | 4.8 | 60.0 |
| 俄罗斯 | 3.5 | 3.8 | 3.8 | 4.0 | 4.0 | 3.0 | 4.0 | 60.0 |
| 斯洛伐克 | 3.8 | 3.8 | 4.3 | 4.0 | 3.8 | 3.3 | 3.5 | 70.0 |
| 斯洛文尼亚 | 2.0 | 2.0 | 1.8 | 1.8 | 2.5 | 2.8 | 2.0 | 45.0 |
| 塔吉克斯坦 | 6.0 | 5.5 | 6.3 | 6.3 | 7.0 | 6.3 | 6.0 | 20.0 |
| 土库曼斯坦 | 7.0 | 7.0 | 7.0 | 6.8 | 6.8 | 6.8 | 6.0 | 20.0 |
| 乌克兰 | 3.3 | 4.0 | 4.5 | 3.8 | 4.5 | 4.3 | 4.3 | 40.0 |
| 乌兹别克斯坦 | 6.3 | 6.5 | 6.5 | 6.5 | 6.0 | 6.3 | 6.3 | 40.0 |

① GPA——政府和公共行政管理。

资料来源:Shor, 1997b。

表 28 对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评级(1997 年)

| 国 家 | 经济评级 | 民主评级 | 总体评级 |
|----------------|------|------|------|
| 巩固的市场经济 | | | |
| 匈牙利 | 1.6 | 1.4 | 1.5 |
| 捷克共和国 | 1.9 | 1.4 | 1.6 |
| 波兰 | 2.0 | 1.4 | 1.7 |
| 爱沙尼亚 | 2.1 | 2.1 | 2.1 |
| 斯洛文尼亚 | 2.4 | 1.9 | 2.1 |
| 立陶宛 | 2.5 | 2.1 | 2.3 |
| 拉脱维亚 | 2.5 | 2.1 | 2.3 |
| 转轨经济 | | | |
| 斯洛伐克 | 3.4 | 3.8 | 3.6 |
| 俄罗斯 | 3.5 | 3.8 | 3.6 |
| 摩尔多瓦 | 4.0 | 3.8 | 3.9 |
| 克罗地亚 | 3.9 | 4.3 | 4.1 |
| 乌克兰 | 4.3 | 3.9 | 4.1 |
| 马其顿 | 4.5 | 3.9 | 4.2 |
| 吉尔吉斯斯坦 | 3.8 | 4.8 | 4.3 |
| 阿尔巴尼亚 | 4.0 | 4.5 | 4.3 |
| 罗马尼亚 | 4.6 | 3.9 | 4.3 |
| 亚美尼亚 | 4.0 | 4.8 | 4.4 |
| 格鲁吉亚 | 4.1 | 4.8 | 4.4 |
| 保加利亚 | 5.4 | 3.8 | 4.6 |
| 哈萨克斯坦 | 4.4 | 5.3 | 4.8 |
| 阿塞拜疆 | 5.1 | 5.4 | 5.3 |
| 巩固的国家经济 | | | |
| 白俄罗斯 | 6.0 | 5.9 | 5.9 |
| 塔吉克斯坦 | 6.1 | 6.0 | 6.1 |
| 乌兹别克斯坦 | 6.3 | 6.4 | 6.3 |
| 土库曼斯坦 | 6.4 | 6.9 | 6.7 |

资料来源:Shor, 1997b 和作者对所提供数据进行的评级。总体评级是经济评级和民主评级的平均值。

与一些专注于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及结构调整的国家不同,如 80 年代的智利,后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民主和市场化两方面的转型。这样的例子往往会引出前面所提到的争论:在特定条件下集权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利于增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即使是民主比独裁更利于实现增长的目的,也不能证明民主化能自动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大量误解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化的概念。如果在民主和市场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的特点,那么民主化和市场绩效及市场扩展之间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有这样一种反馈:市场制度越完善,民主化越容易推行。按这种顺序,市场似乎是民主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基础。但反过来也可能是成立的,民主的发展能够支持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 1993)。

事实上在转轨的初期,民主化起到了缓解经济收缩和萧条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价值,对同时发生的生活水平的恶化起到了替代品的效用。只要人们的其他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暂时的生活贫困也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已经有了接受物质生活水准在短期恶化的准备,以作为对将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的一次性投入。

树立一个好的目标是很重要的。即使遇到严峻的困难,民主也能为社会提供一种经济所无法提供的价值,即可称之为良好的感觉因素。然而,只有短视的政治家会认为这种因素能够发挥永久的效应。实际上,在转型经济中它的作用已经发挥殆尽了,不存在更多的空间让老百姓去接受更进一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了。像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还不能启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承受力就会到极限,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用“玩耍马戏”的方法去稳定形势已经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只有“面包”政策才会管用,因此恢复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十分迫切了。

当经济已经走向增长,民主化和市场化就容易建立起正反馈的关系。在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虽然政策的制定程序历时较长,但一项政策不可能被马上接受且须进行多次辩论,特别是对于特定的团体而言。这些完成以后,就能够实施最困难的改革了。然而当经济处于下降、真实收入处于螺旋下降之中,且储蓄倾向减弱、投资能力下降时,对民主的追求也似乎毫无希望。结果,民主化转而有可能对市场化的发展构成阻力,甚至重新回到集权统治。

在一些国家,相对的倒退以及在低收入水平维护民主政治,虽然也存在这种可能,但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有鉴于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民主建设的重要先决条件(Barro, 1996),相对的收入状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特别是穷国如果收入差距比较大,民主的环境很难接受这一点,并可能导致许多问题。民主在加拿大是很好,可是在危地马拉又如何呢?民主在澳大利亚运转得很不错,可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不行。捷克与马其顿相比、立陶宛与格鲁吉亚相比,表现要好得多。

一些中亚转轨经济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东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就属于低收入国家,它们的民主化进程要明显滞后于其他转型国家。事实上,亚洲只有吉尔吉斯斯坦、蒙古有较实质性进展,虽然在随机调查中除塔吉克斯坦以外都列入了所谓的“转型类”国家,而不是“巩固的市场经济”和滞后的“国家主义经济”。可以看出,经济上越发达和富裕,民主化的发展也越快。

由此看来,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困境并付出了巨大的转型成本,任何转型国家都没有抛弃民主制度。无论在民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出现怎样可怕

的窘境,还没有一例被集权政治所扼杀。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能促进新兴民主发展的重要改革措施被推迟或被耽搁,但是仍在向前推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11

从复苏到持续增长

11.1 市场不完善和危机

有关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从稳定化向增长转变的政策争论持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普遍的但或许并不是真理的观点,即所有这一切的产生必须基于政府合理的参与。在东欧下述情况时常发生:即使是那些还留在政府中的

现代自由主义极端狂热分子,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干预。^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属于言论的世界和理想的范围。在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制定中,自由主义由于无法实行而不存在。市场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机制其实是和政府对金融、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干预的“看得见的手”并行的(Kolodko, 1998c)。

一些研究者在争论中赞成市场的同时,也强调了在此前不久,政府的干预的确对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运行良好,而后却淡忘了其作用。耶金(Yergin)和斯坦尼斯劳(Stanislaw, 1998)对二战后采用的国家政治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能够否认实验的成功?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段时间内,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激发希望和梦想火花的长达30年的繁荣和收入增长期。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并且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危机的70年代末期,一种新的实现方法得到承认,即经济的总体结构而非日常管理使经济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因此,重新审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必要的(p.129)。如果这一观点简单地解释了经济达到顶点的原因,那么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在同一时间放弃了国家主义呢?更令人困惑的是,在这个时间上,不同的国家是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②。

^① 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匈牙利和波兰现在自称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们,也就是那些经历过90年代经济运行的理论者,比左倾政府更喜欢进行市场干预,因为后者更想证明它们不那么“后共产主义”。尽管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是虽然这两派的言论分歧很大,他们的行为差距却较小。实用主义方法更有利于转轨和发展。

^② 这对于前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也同样正确。尽管同属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联盟,这个集团中有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0美元,另外一些国家则达上万美元,如塔吉克斯坦和斯洛文尼亚。

但是世界也同时放弃了其他一些旧习惯。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由示范效应决定的。当领头的国家改变了一些事情时，不久其他国家就会仿效。因为领头的国家已经接受和执行了某项事情，在其他国家就更容易被接受。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仿效就不仅仅局限于金融和经济领域。因此，由于领头国家放弃了一些特征和习惯，全球化所导致的必然是全球范围内的放弃。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在有全球领导的同时必然有区域性的领导。虽然美国毫无疑问在冷战后领导了世界，但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区域性的领导，要求和值得被别人跟随。智利在南美推广了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波兰在东欧传播了其转型管理方式。乌干达试图在中非传播其高增长途径。新加坡在东亚就其工业化政策做了大量宣传。这就意味着，即使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对转型经济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肯定产生了间接影响。在巴拉圭、缅甸和乌克兰等国家推行民主和开放市场经济的最好途径就是分别通过智利、泰国和波兰。这对世界上的领导国家以及后华盛顿舆论政治的合伙者来说是很好理解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除了地域政治以外，我们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例如，美国直到很晚才有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概念。仅仅一代人以前在美国的有些州还有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实施“仅供白人”的规定。因此，60年代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谴责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待遇问题的时机。事实上，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一直好于发达国家的很少数民族。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b, p. 70)写道：我们很难逃避这一历史性的讽刺，在早期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强国使用武力强迫中国打开大门接受毒品，而当前它们却坚定不移地要制止毒品进入自

己的国家。唯有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匮乏才得以使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伪善在程度上有所减轻。然而伪善依旧存在,并且不再具有历史时区的区别。

在经历了几年的贸易自由化之后,当大多数拉美新兴市场接受了这一观点并热衷于此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否决了总统的快速膨胀的权力,由此贸易并没有变得如热衷于市场者所主张的那样自由。再者,对一方面的观点和言论与另一方面的利益和行为进行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牢记虚伪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虚伪通常很不幸地关系到政治以及政治驱动的经济争端。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包括其国际范畴),伙伴中较强的一方通常希望较弱的一方遵循“做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原则。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做了自己对别的国家所说的或所建议的,那么,事情看起来就会不一样。例如,几年前美国通过征收特别税来提高能源价格会使其财政赤字降低,或者欧盟主管农业政策的机构会比目前的实际机构规模小很多。而实际上是美国的能源价格太低,而西欧的农业补贴高于东欧。

因此,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实际上是为什么要放弃国家主义?有人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们已经决定并这样去做了(虽然仅在一定程度上)。并且,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无论如何,如果国家控制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已达到极点(目前还不太肯定是否如此),在转轨经济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还不至如此。有趣的是,在某个最发达国家(如日本)产生严重的结构危机时,即使最伟大的现代自由极端分子也是寻求政府而不是市场来解决问题。

国家放弃(永远不会完全)经济管理有两个标准。第一,必须有一个不受外界小的冲击影响并且可以保持长期发展的

可依赖的机制。第二,如果不幸受到外界冲击的影响产生了危机,必须有一个自我执行机制来纠正扭曲并保证经济在一个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即使在那些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德国和美国,情况也并非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国家了,如经济转轨的俄罗斯。

政府应该在其所执行的职能能够被有合理的制度安排、行为和文化的市场机制所取代的时候退出经济。换句话说,如果在当前发达国家里,政府在过去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经济事务的参与是正确的,那么目前在发展和市场复杂性方面处于不同组别的落后国家,政府的参与也是正确的。如果90年代政府有机会退出经济事务,比如在意大利和比利时,那么对另外一些国家来说却不是这样,如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在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所做的是正确的,对叶利钦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来说就不合适。国家退出经济事务(虽然永远也不是完全退出)的前提是环境必须成熟。

因此,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通过一定方式的对转型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管理使生产力开始提高。首先,必须开始衰退以后的复苏,接着,要推动稳定的增长。前者必须有政府积极的干预来配合,而后者没有政府的干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时仍要保持这些政策,因为增长无论在哪里都不是永久的,对于转轨经济来说更是如此。这样的增长自身不是持续的,必须有合适的政府政策来支持和管理。高速增长持续性(假设它有助于公正并无害于环境)比起初自由化和稳定性的努力目标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换言之,与转轨初期、即转型萧条开始时相比,在转型后期,后社会主义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以及持续增长的努力更需要明智的政府干预。尽管在自由化和稳定占主导的一定时

期内,相对较多的工作可以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但在从稳定向增长转变并寻求持续增长的进程中,政策制定者的“看得见的手”比其看不见的伙伴在促进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政府和市场是合作者。

因此,成功的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政府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参与。尽管有些时候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扩大了已经存在的扭曲并无助于危机的消除,但很多时候还是有助于消除危机。换句话说,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的不完善,并提高市场的优势。这里,问题关键在于干预的方法、方式和形式。有的人也许不喜欢这种干预主义,但又不能没有它。就如同牙医一样:它们必须监测表象,分析危险因素,治疗疾病并且必要时还必须作出决定性的、甚至痛苦的解决方法。即使在现代自由主义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始终比其他因素更具有补充性,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远远不能结束(Rodrik, 1996;世界银行, 1997b;《经济学家》, 1997d)。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更是如此,有很多特殊任务必须完成。自我执行机制还尚未成熟,还不足以创造和推动市场(如果它被期望有效工作并有助于国家福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制度安排。

市场不完善导致了严重的紧张状况甚至是危机,这在历史的进程中曾多次发生。政府也是这样。后者的扩张不能作为前者不足的补充,而前者的自由化更不是后者失灵的补救。市场不完善和政府失灵的补救不是两者之间的对抗,而是两者之间互相协调、互相支持的艺术。对市场不完善的解决不是少一点市场多一点国家主义,而是市场和政府同时起更好和更强的作用。这是一个两者共同协调而非相互对立的问题。如果对立中一方赢了,不仅仅是另一方输了的问题,而且增长的潜力也随之丧失了。

毫无疑问,只要讨论停留在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不完善

这个范围内,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就必然是政府失灵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市场当时并不存在,甚至连雏形也没有。然而,当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起因进行讨论时,这个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当然,最终的答案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失灵,因为两者当时都存在。如果对后社会主义国家1990—1997年的大萧条进行讨论,答案也是相似的,即两者都有过失: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市场也没能解除困境。

由此看来,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在寻求复苏和发展的时期,单凭政府或仅靠市场都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崩溃带来的后果以及随后的萧条问题。转型可以被看作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的寻求(其实永无止境)。市场必须是完善的,而政府应该被看作是实现市场完善的手段。或者政府必须被控制和平衡,而市场是控制的手段。这不太容易,但事实上却是转型过程的核心。

因此,只有由市场和政府所分别领导的两种管理模式的结合,才能够产生可靠的供给反应。当市场应该由政府来进行设计并使其在有效和竞争的方式下运行时,在这一市场环境下的政府必须重新设计自己,使其有能力通过公正和长期的发展战略来纠正市场的不完善。只有这两种机制的结合才能够保证资本的形成和增长。依赖于这种机制和政治基础,才有机会(只此一个机会,但并不能保证)从复苏走向增长。

在转轨的早期,还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头的风险。实际上,这一风险随时随地存在,但很显然,在旧的政治手段的遗留负担仍在、而薄弱的制度建设还不足以支持新的政治手段的条件下,风险会更高。现代自由主义对这一风险采取的措施是政府的退出,其方法是“最好的政策是没有政策”。但是他们也没有创造增长,或者有一点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没有持续性并且不均衡。一些区域的发展比另一些区域快,且很多区

域得到的发展都要比实行另外的政策时小。因此,上述理论早已经被折衷,并且不仅仅是在转型经济中。

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而不是退出。一些经济增长的国家、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后华盛顿舆论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在此,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尽管发展阶段有很大不同,为什么现在同一时间里几乎整个世界都放弃了现代自由倾向并寻求政府的新职能?这一方案的实行尽管在乌克兰、缅甸或巴拉圭比较有效,最好是其他国家,也能够及时理解该方案。

事实是在当代世界由于全球联系的复杂性,国内经济对政府主导政策和干预的需求比以前更大,当然干预的形式必须有所改变。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虽然转型过程的核心是自发的市场自由化,但必须辅助以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发展基础设施、保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引进必要的结构改革和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是政府重构自己而非退出的严肃问题。

11.2 复苏和政府的新职能

在工业化国家,公共支出的比重从1913年的12%和1920年的18%猛升到1960年的28%和1990年的45%。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是有原因的,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刺激政府支出增长的长期和强硬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基础的话,上述变化也不会发生。考虑道德价值的变迁,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明智的考虑的强有力支持,尤其更加确信发展必须是均衡的、且市场无法保证其均衡发展。数十年来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受到

了传统需求(即国防和军备、基础设施以及管理)的影响,而且还被一个人们普遍信任的理论所影响,即政府必须提供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这样,一个新政府,即一个大政府由此产生。

只有在发展的较高阶段,在有充足的私人融资来源以满足合理程度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福利需求,同时有相应的公共机构来管理这些资金而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时,以往的不不断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才会被取消。最近的工业化国家改变其长期实行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趋势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已经有了一种积极的方案以替代过分扩张的政府支出。然而,为了提高竞争力、加强资本形成和支持增长,控制政府开支而不是顺应潮流可能是必要的。正因为这样,几十年来新的大政府已经过时了,而现在是旧的大政府。

这些特征和理论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可能证明是正当的,所以它们同样不适用于转轨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因此这种变化的趋势对于情况迥异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适合的。首先,它们比较贫穷并且不够发达。第二,即使它们中间最发达和相对富裕的国家,虽然对它们而言有着一定的借鉴性,但它们仍然没有合适的机构来代替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近,人们开始以较为现实的方式来审视政府的职能。在对一些地区的长期经验进行分析后发现,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一观点的最深刻体现是将新兴的工业化东南亚国家和落后的非洲相比。尽管在60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相似,30年后的今天前者却有了显著的提高。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参与和政策支持,单靠市场力量是不可能创造出持续的增长的。反论之,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及其蔓延,

是市场的自我执行机制所无法控制的,这使我们更加相信即使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期,政府仍然有更多更好的干预空间,而不是退出舞台。

在体制转轨期(包括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对政府的积极职能必须作重新定义而不是放弃。持续的私有化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新环境要求更多的对管制的重新定义,这里所指的是重新管制而不是放松管制(Stiglitz, 1997)。政府有责任制定合理的竞争政策,并负责与垄断势力作斗争。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的频率更高。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直到建立竞争性因素和产品市场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旧的政府职能才宣告完毕,而新政府的职能就开始发挥作用。

转轨国家不但要改变政府职能范围,而且还要改变政府及公共机构为实现其所选择的战略目标而采用的工具。政府不能把其职能完全让给市场,因为后者不能完全取代政府的职能。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政府的支持,市场自身无法实现生活水平很大范围的提高,因为政府可以建立合理的环境,对变化作出反应,并且可以与市场一道为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而所有这些单靠市场都无法实现。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其服务的实现方式,可能是长期的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Stern 和 Stiglitz, 1997, p. 27)。上述观点由于是由欧洲复兴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提出来而显得尤为重要,大量的从萧条到复苏乃至持续增长的成功转变都依赖于这些机构的金融和技术支持。更进一步说,这一理论似乎可以在其他有影响力的地区传播并对一系列的理论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果首席经济学家如此认为,那么其他经济学家就有可能很乐于加入其行列。他们会

的。

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但奇怪的是人们仍然经常倾向于作出适合所有条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然而,在某些条件下行得通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下也能行得通,所以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政府从危机到复苏所实现的职能也是如此。如果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衰退,即在市场经济下传统商业周期的典型衰退,那么政府就可以不参与而让市场去纠正之。然而,如果是与全面的结构性危机有关的长期萧条,那么政府就必须重新建立与实体经济和制度建设相关的新的经济秩序。新政府必须执行这一职能,从而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和发展经济,也同样适用于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新政府职能对正从倦怠中醒来的非洲和试图取得复苏并重新回到高速增长轨道上的东亚来说,都一样非常重要。其他地区也会从这一理论中有所获益。

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1997b),有五种重要职能由于市场和私人机构无法实现,所以属于政府职能范围。这五种职能如下:

- 法律基础;
- 执行宏观经济的政策框架;
- 基础社会服务、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
- 为社会的薄弱阶层设置的综合安全网;
-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在经历了 90 年代的重大结构和制度改革之后,转轨经济中新政府的新职能有着很多相似的特点(将来会更多)。从这一点来看,由于它们在过去的 10 年间没有大的发展,因此它们都可以被相似地看作是所谓的发展中经济。然而相似并不意味着相同,因此在政策设计和政府职能的发挥方面也不可

能完全相同。

虽然如此,与过去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相比,未来增长的条件和决定因素显得更为重要。人们通常认为在转轨形成的萎缩后实现复苏和增长的最简捷的路径是缩小政府的职能。主流经济学有目的地选取了几个成功的小政府、高增长国家作为理论依据。然而,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并没有明显的两者择一的关系:即大政府和低增长率对应小政府和高增长率。如果这种关系存在,小政府就应该被当作一个较好的选择,即使以转轨使公共服务恶化为代价。在实际社会中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同样经常地会发生相反的关联,即生产增长的步伐和政府的规模正相关。

在转轨国家,所谓的小政府,即相对小规模的通过公共金融机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相对较少的政府及官僚主义对经济事务的干预,通常意味着薄弱的制度和较大规模的影子经济。相应地,所谓的大政府意味着政府较为积极并且通过预算相对较大规模地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政府支出如果用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升级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研究与开发(R&D)和医疗卫生领域,则有助于增长并能加速增长步伐。相反,如果大量的支出被用于官僚主义、国防和对没有竞争力的部门的补贴,那么增长就会受到阻碍。简而言之,有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支出,有对未来消费和当前消费的投资,有有目的的 and 没有目的的支出。在这里,问题的焦点是谁是更好的管理者,是政府还是市场,而管理的质量则与被管理的财富的数量相关。

正统的现代自由经济学认为减少政府的职能有助于增长,然而在转轨初期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对政府职能减少和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之间的实际关联作出准确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政府规模的急

速缩小和产出的急剧萎缩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快速的取消补贴会导致金融紧缩,相应的稳定措施会导致信贷紧缩,因此初期的混乱伴随而来的就是衰退,直到产出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后,才可能看到政府限制的积极效果。但这一效果达到与否更多地依赖于发展政策而不是政府支出下降的步伐和幅度。因此,即便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的一定范围内,小政府确实能比大政府更好地支持长期增长,但问题不是更好与否,而是如何实现增长目标以及到底要历时多久。15年和50年所能产生的差别甚至比一个婚姻中的变化更大。

由此,转轨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支出的全面降低,而是以有助于较高增长和收入公平分配的较高支出比例为目标的结构变化。尽管无法证明公共服务如果少一些便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当政府较小时),然而人们却一直在努力着(《经济学家》,1997d)。当然,政府支出有不同的构成。因为这是一个新型的政府,有新的目标和工具、新的朋友和敌人,并首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所以,有些支出在上升,而另一些支出则在下降。但是,通过简单削减政府开支(通常是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达到的政府规模的缩小,不仅损害了目前的消费和生活水平,而且也不利增长,即未来的生活水平。过分相信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强正相关关系可能会导致不进行政府支出的削减,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压力不仅存在于那些有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乌克兰,而且存在于财政秩序良好的国家,如捷克和波兰。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WIDER)对124个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紧急事件论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紧急事件的数量(包括国内冲突所带来的死亡和难民)从90年代初期的每年20—25例增加到最近的

65—70例^①。坚持要求缩小政府的规模导致了社会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捐助国关于缩小政府规模以取得实际的经济稳定的外部压力更激化了政府资源的竞争并导致了更严重的不稳定(Nafziger, 1998)。尽管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一些由于强制削减政府支出而导致的相似事件最近也在东南亚国家发生。虽然坚持这样做的原因各不相同,其机制和结果却是相同的。

在转轨的早期,通过预算进行再分配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3到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政府及公共机构在国民收入使用的参与方面比例下降了约1/10,在某些时候下降幅度或许更大。冷战结束后,仅由于国防支出的大规模下降,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有了一定的下降。这是合理的政府规模的缩小。在28个进行了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中,只有克罗地亚的国防支出增长了,而其他国家中约有一半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表29)^②。

表 29 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5—1995年)
(按1995年的比率逆序排列)

| 国 家 | 1985年 | 1995年 | 变化 (1995—1985年) |
|-------|-------|-------|--------------------|
| 克罗地亚 | 3.7 | 12.6 | 8.9 |
| 俄罗斯 | 13.1 | 7.4 | -5.7 |
| 塔吉克斯坦 | 13.1 | 6.9 | -6.2 |

① 受到这一不幸影响的转轨经济只有欧洲的波黑和亚洲的柬埔寨。早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属于阿塞拜疆,但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要求将该地区并入亚美尼亚——译者)的冲突,以及格鲁吉亚由于 Abkhazia 的冲突也曾受到影响。

② 不在调研国家之列的波黑和南斯拉夫,其国防支出所占比例是增长的。

(续表)

| 国 家 | 1985 年 | 1995 年 | 变化 (1995—1985 年) |
|--------|--------|--------|---------------------|
| 爱沙尼亚 | 13.1 | 5.3 | -7.8 |
| 阿塞拜疆 | 13.1 | 5.0 | -8.1 |
| 亚美尼亚 | 13.1 | 4.4 | -8.7 |
| 越南 | 19.4 | 4.3 | -15.1 |
| 摩尔多瓦 | 13.1 | 3.7 | -9.4 |
| 马其顿 | 3.7 | 3.7 | 0.0 |
| 乌兹别克斯坦 | 13.1 | 3.6 | -9.5 |
| 吉尔吉斯斯坦 | 13.1 | 3.5 | -9.6 |
| 格鲁吉亚 | 13.1 | 3.4 | -9.7 |
| 保加利亚 | 14.1 | 3.3 | -10.8 |
| 白俄罗斯 | 13.1 | 3.3 | -9.8 |
| 拉脱维亚 | 13.1 | 3.2 | -9.9 |
| 罗马尼亚 | 4.5 | 3.1 | -1.4 |
| 乌克兰 | 13.1 | 3.0 | -10.1 |
| 哈萨克斯坦 | 13.1 | 3.0 | -10.1 |
| 斯洛伐克 | 8.2 | 2.8 | -5.4 |
| 捷克共和国 | 8.2 | 2.8 | -5.4 |
| 阿尔巴尼亚 | 5.3 | 2.8 | -2.5 |
| 波兰 | 8.1 | 2.5 | -5.6 |
| 蒙古 | 9.0 | 2.4 | -6.6 |
| 立陶宛 | 13.1 | 2.4 | -10.7 |
| 土库曼斯坦 | 13.1 | 1.9 | -11.2 |
| 斯洛文尼亚 | 3.7 | 1.5 | -2.2 |
| 匈牙利 | 7.2 | 1.4 | -5.8 |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1985年所有前苏联各共和国国防支出的比例都是前苏联的比例为13.1。

另一个政府开支的主要削减是补贴的减少和取消。这两种措施仅采用过一次,所以没有仿效价值。由于这两种措施实施时采取了激进的做法,从而导致了短期内公共支出结构的巨大变化。补贴和国防的支出在绝对和相对水平上的收缩,导致了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支出所占比例上升,尽管后者的绝对水平也下降了很多。尽管如此,1991年俄罗斯的军备支出仍然超出教育和医疗卫生综合支出32%^①,后来这些有害的比例产生了变化。目前这一经济大国在人力资本支出上比对非生产性的军备支出投入了更多资金。俄罗斯的目前低军备支出反映了一个明显的政策选择:军事现代化现在是附属于改革和转轨的,同时是经济转轨的补充。对于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模式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在现代社会的和平条件下,没有其他类似于国内生产总值再分配比例变化这样的重大变化了。

但是财政平衡的支出方面的快速收缩项目,被其他快速增长项目抵消了。社会保障的迅猛增长形成了一项特别的负担。失业数量迅速上升,养老金制度下的补贴负担也在增长。同时人口压力对财政平衡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尽管社会保障存在无效率的特定特征,但老龄化社会使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在这些客观条件下,支持或削减高水平的政府支出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完成以前的一个必要选择,而且前路还很长。

只有在可供选择的养老金制度背景下,才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政府干预和缩小政府规模的问题。但在某些时间里,老龄社会对公共贴补的依赖不但不可或缺,而且在不断增长。

^① 为有助于读者对比,军备支出占教育和医疗卫生综合支出的比重同年在以色列为106%,在巴基斯坦为125%,在伊拉克为27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因此,政府在这方面所负的责任是非常大的。老龄社会因素使这方面的含义进一步加强并且会导致养老金制度方面压力的进一步加强。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进入一个相对老龄化的阶段(世界银行,1994)。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2030年预期会超过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a)。然而,到那时,社会的这一部分人可能就不会再通过“退休付款”(即政府养老金体制)来供养,这样政府同时就会得到一个继续缩小规模的良机。

对支出的削减可以无视其组成和结构,尤其是当削减发生在紧急情况或因为外部压力影响时。通常人们会忽略政府服务和补贴缺乏替代的可能。至今政府通过预算所提供的,今后可能会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配置来提供。这是整个转轨过程中非常困难的一部分,透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转轨政策和发展战略两者之间的合作是多么重要。只有在增长经济中私人提供一些服务的能力才会提高,并且仅在个人有足够的收入的前提下如此,但很不幸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因此,只有在经济增长时才可以进行体制改革,在可能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时仍坚持体制改革是一种很坏的政策建议。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规模的确定必须量体裁衣。

由此看来,问题是要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有没有一个新的、管理新兴市场经济的后社会主义政府形式?如果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功的话,必须有一种这样的新政府形式。从而使我们再一次意识到,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如果安排得当,那么再分配政策就会更有效率,而与政府规模大小无关。在世界银行所作的一份比较研究中(Commander, Davoodi 和 Lee, 1996)提到,一个小政府配合以良好的制度安排有可能在约20年内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相反一个大政府和不良制度结合而形成沉重负担的国家要实现上述目

标则需要两个半世纪。这看起来更像是算术运算而非经济考虑,听起来也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然而有幸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用 250 年才使其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并且这种事情也不会任何转轨国家发生;由于转轨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所以也不存在实践的机会。转轨国家中的领头者甚至可能在短短 10 年内就实现产出的翻一番^①,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规模可能比一些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相对较大。这一研究的核心在于,政府的规模在一方面与相关的制度建设,而在另一方面与经济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毫无疑问,与欠发达的几个国家相似,后社会主义经济也面临着大政府和低质制度无益结合的严重威胁。这种结合能够扩大官僚对市场的不良干预,从而损害公共支出分配。同时,它也能阻碍新的法律和相应的市场规章制度的颁布和采用^②。这样其实会导致腐败,由此官方经济的资源就会流失。透明的规章制度,尤其是金融和资本市场、银行、私有化和公共采购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应被引入并尽早付诸实施。这些规章制度措施的实行需要政府方面的可靠承诺,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强势地位。但是,这样的地位只适应于那些重新定义和设计过的政府。

关于政府职能争论的根源至少部分是源于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或者是强政府和弱政府之间的存在的困惑。进一步

① 这是世界银行在其他预测(世界银行,1997c)中所提出的,假设转轨经济可能在 20 年的时间内实现每年 7%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样,在 20 年内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翻两番而不是翻一番。

② 如 1998 年在乌克兰,预算修正案作为大规模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夏天才获通过。原因并不是由于这些改革和预算修正案得不到大多数同意,而是因为议会由于没有发言人而停止工作,并且在随后的 11 次努力中也没能选出一个,这个过程很民主,但也很没有效率。

说,很多困惑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大政府便意味着无效率、而小政府则意味着有效率的推测。实际上有很多组合方式:土库曼斯坦有着大而强的政府但却不够有效率,而克罗地亚也有大而强的政府,相比之下却有效得多。同样,拉脱维亚政府小而强并且有效率,而阿尔巴尼亚也有小政府,但却弱而无效。

最好的案例(实际上最坏)是俄罗斯90年代的体制,制度不正规,缺乏健全的规章。尽管政府不时下决心要进行健全的体制改革,但行不通并且很快以失败告终。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于俄罗斯政府太大,而是因为同一时间里看起来总是有太多政府部门在参与。俄罗斯政府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透明度问题,这应该是总统办公室即克里姆林宫的职责,也是议会大多数成员对于执行权的态度(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表现为一些非正式公共机构(包括所谓的金融和工业巨头集团以及它们的新闻媒介)时常作为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在运作着。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呢?是制度设计和战略选择。简而言之,政府首先必须足够强大以行使其新职能,同时这一能力绝不是政府的一项简单功能。在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有效率的国家和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没有效率的国家,真正的选择是在制度条例和预算再分配的范围之间进行的。有效率国家的经验证明,虽然它们不是小政府,但仍有好的制度和明智的政策,由此它们获得了全面而良好的发展并很快进入了复苏。因此,那些落后国家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缩小政府规模,而是细细地检测政府的不足并使其步入正轨。这也许会导致政府规模缩小,也许不会。总之,政府有可能过大或过小,但永远不会过好。

11.3 政府的规模、公平和增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不是降低政府开支,而是改善分配及投资效率。在一些国家里,由于强大的官僚政府的阻力,用于官僚机构的过分开支没有被削减,相反倒是削减了教育和医疗卫生开支。在很多情况下,为了维持一些官僚机构的存在,导致了教师和医生数目的减少以及对他们的薪金拖欠的增加。政府必须严肃对待这一政策对增长和公平的影响。因此问题不是简单地从两个目标当中选择一个,而是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以使其能更好地同时服务于这两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就又回到了对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徒劳的争论中了,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一方同时减少其收入和支出,其支出的削减就能使另一方的需求得到满足,而同时增加另一方的净收入。因此,这是通过财政体制把资源从一些个体和集团再分配到另外一些个体和集团的过程。原则上,这是一个从政府到私有部门的再分配,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服务领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如果支持了(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电影戏剧领域,那么医疗卫生领域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如果支持了报纸流通领域,交响乐和管弦乐领域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如果支持了研究生教育的一些领域,那么中学教育就可能得不到支持。而所有这些前者都可能并且应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条件下存在,而后者如果没有支持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并成长缓慢。如果实行了从政府到私有部门的再分配政策,私有部门就会得到较快的扩张,但以损害集团为代价,这些集团现在就没有能力支付以前由“过大的”政府提供的低价服务了。因此,在产

出最终开始增长以前,不公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了。由对政府的职责和规模进行讨论而引起的这种再分配政策的起因和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经济和金融论题,而是严肃的政治挑战。

如果把大政府经济定义为公共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经济(例如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典和挪威等国家),而把小政府经济定义为公共支出不足国内生产总值 1/3 的经济(例如澳大利亚、日本、瑞士和美国等国家),那么这两类经济其实有着相似的特征。从 1997 年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PPP)进行调整]来看,前一组国家超过了 21,000 美元,而后一组国家大约为 23,000 美元。这两组国家从 1960 年到 1995 年的年均增长率几乎相同,约为 2.5%。固定资本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基本相同,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5% 和 20.7%。两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什么区别,从 1986 年到 1994 年间,前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 3.9%,后组为 3.7%。人均寿命分别为 78 岁和 77.8 岁,婴儿死亡率分别为每千人中 6.7 个和 6.4 个。中学入学率前者为 92.8%,后者为 89.0%^①。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算的所谓综合入学率指标,上述大政府国家不同年龄儿童的人学加权比率为 85%,而小政府国家这一比率为 8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同时,这两类国家的文盲率也差不多一样低。

尽管在人力资本质量和生活水平方面大政府相对更好一些,但还是让我们忽略这些细微的区别罢。这样一来,这两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真正能产生区别的地方,或者说是否所有这些争论都与主题无关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两组国家经济

^① 小政府国家婴儿死亡率和中学入学率的指标取自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 40% 的小政府国家。

之间真正的区别不是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是增长率,而是收入分配机制。较大政府的收入分配相对更公平,小政府则反之,其较大份额的国内生产总值被少数较富的阶层所获取。因此,争论再次集中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不同的理论概念。认为小政府更具效率的经济理论不只是一项纯粹的理论,同时还是保护那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工具。只有这些利益才是以所谓的小政府更能满足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这一错误结论为基础制定的政策的真正目标。不错,这些政策的确更能满足某些人的需求和增长,而这些人就是社会的特权阶层。

如果考虑人口中 40% 的贫困部分,他们所得到的收入在大政府国家的总收入中占 24.1%,而在小政府国家(Tanzi 和 Schuknecht, 1995; Tanzi, 1997b)这一比例仅为 20.8%。以人口中最富和最穷的各 1/5 人口作比较,在小政府国家中,人口中最富的 20% 部分获得了总收入的约 44%,而最穷的 20% 仅获得了 5% 多一点儿;而另一方面在大政府经济中,最穷的 20% 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 7.4% 而最富的 20% 获得了约 37%。由此可见,小政府国家各 1/5 穷富人口的收入比为约 8.3,大政府国家这一比例为约 5.0,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区别。

总的来说,我们无法评论这些比例有什么不妥,只有当它们反映出不同的集团对国民财富所作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时,才可能反映出问题之所在。但这也是无法证明的,因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间,世界范围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明显加大^① 是不公平的分配所导致的结果,并且不一定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然而如果这一不公平有助于长远的增长能力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尽管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圈极

^① 在这一时期,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全世界人口中最富的 20% 和最穷的 20% 的收入之比从 1960 年的 30:1 猛升到 1989 年的 59: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

力散布这种观点,实际却并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大政府和小政府国家的增长速度基本相同,只是在大政府国家较穷社会阶层的情况相对较好,而小政府国家则较富阶层的情况相对较好。因此,最好的组合不是有好的制度的小政府,而是有好的制度和以增长为政策取向的相对较大的政府。好政府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只有如此,生产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强劲的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才能够得到公平的分配。

进一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在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较多的大政府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小政府国家更好一些(Alesina, 1998)。这主要决定于政府的消费结构,也就是基本取决于所选择政策的功能。例如,尽管越南与尼日利亚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政府相对较大,但越南的人均寿命却比尼日利亚长 15 岁,5 岁以下儿童的存活率是后者的两倍,文盲率仅为后者的一半^①。所以虽然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208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其人类发展指数为 0.557,而尼日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353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其人类发展指数仅为 0.393 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前者的人类发展指数名次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名次的差是 26(见表 15),而后者则是 1。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巴西的一半(分别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2604 和 5362 美元),而其人均寿命却比巴西长 4 岁,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名次差分别为 3 和 0。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即像越南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通过公共支出机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较大。

这样看来,政府的规模应该是其服务目标的功能体现,而

^① 根据 1995 年的数据(世界银行,1995c)。

不应跟着决策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决策都会有好坏之分。政府规模的变化取决于很多方面不同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政府支出的组成往往体现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有可能更有利于增长和发展。政府过大也不能维持,因为费用太大,仅为此原因有时就必须缩小其规模,即使这一变化在一段时间内阻碍增长,因为不这样做则甚至可能使增长受到更大的阻碍。看起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相对规模的变化比其绝对规模更重要。换句话说,即相对较小(或较大)的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有助于快速和公平的增长,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采取了错误的措施对其进行了规模缩小(或扩大),则结果可能很坏并因此损害公平和增长。

无论如何,政府的最大规模是有限度的,这与在不损害资本形成、投资和增长的情况下提高税收也是有限度的相似。在一些限度以外,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增长便不再伴随政府服务数量的增长或服务质量的提高了。这一限度被认为应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上下浮动(Tanzi和Schuknecht, 1997)。如果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支出规模(就像在几个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其结果必然是增长的无效率以及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福利毫无助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而在那些发生上述情况的国家里,有以下两个真正的挑战:首先,如何维持进一步的扩张;其次,如何在对目前生活水平和未来发展不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削减非生产性的公共支出。

转轨国家的情况是,在初始的大幅度缩小政府规模以后继续努力实行进一步缩小政府规模的政策。甚至“政府消费”也有了新的含义,即这里的受益者是政府机构而不是社会,这种说法被作为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的政治依

据。如果那些有足够发展空间的真正私有部门能更有效地利用从政府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那么情况就会很好。然而,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如社会服务供给恶化、分配效率得不到必要提高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忽视削弱了长期发展的潜力。与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再分配和紧缩财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对应,不利影响是增长趋势缓慢,或者更精确地说,紧缩会过于严重并且萧条会持续更长时间。

不幸的是,一些政策制定者被诸如小政府建立得越快则市场经济就会越繁荣的错误建议所误导。这样,他们往往忽略自身的政策目标,而是花费大量精力在建立小政府上,尽管后者也很重要。甚至杰弗里·萨克斯还这样认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1993)。因此,他们中很多人离开原位而转向政策制定、商业、影子经济甚至是有组织的犯罪。然而市场并没有繁盛起来。所以问题在于,一方面不仅要看是谁离开了原位而且要看他去了哪里,而另一方面更要看是谁接替了那个空出来的职位。

在废弃中央计划经济和实行自由工业和贸易政策的成熟机构体制下,健康的市场会快速发展。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日本这样的国家(毫无疑问,日本也曾经历过过度官僚和缺乏法规制度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和转轨经济国家,这种市场环境是不存在的。因此,仅仅靠薄弱的机构秩序和与市场相似的行为是不足以保证长期的增长和发展的。在转轨经济国家,无论谁是中央计划机构的终结者,都应该保证新政府能够驾驭经济并进行市场机构安排,而不是立刻清除中央官僚体制。

12

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化

12.1 转轨和全球化：协调问题

尽管转轨主要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整个地区经济变化的问题，但是在整个国际规模的对转轨进行的努力协调中，几个国际组织已经进行了参与并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布雷顿森林组织体系从开始便参与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行动。其他组织——主要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盟、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它们是不同的组织，它们的角色和对转轨的态度也不同，但是对转轨的过程同样十分关心。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这些组织并不是完全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而是作为发达工业国家协助转轨的一种工具。首先是7国集团，由7个巨大的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组成，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盟的情况是，西欧国家特别地致力于促进东欧经济的增长。抛开冷战结束后的政治余波，这些国家不仅渴望快速地推进自由市场体系，而且渴望将转轨国家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时欧盟东向扩展的问题便纳入了日程表，也就是将主要的转轨经济纳入了欧盟一体化的进程。难怪，转轨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特定的关键的变化是按照一些条件进行的，而这些条件受工业发达国家优先权的深刻影响。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结构和制度转型的努力一直缺乏协调。很明显，它们还没建立起任何正式的机制或组织，来处理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和发展政策方面的国际协调问题。而且并非是由于可以完全不考虑对协调的需要，相反这是真正需要的。对东亚危机的政策反映与协调机制也是十分地相似。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它的传播，因此已经有人提议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负责全球范围的政策协调功能，特别针对资本流动和新兴市场的运作。这个机构应该提升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同时参加委员会临时会议的24个国家首脑应举行定期会议以加强它的地位。

忽视在转轨国家中建立一个坚固的协调机制和制度框架的真正原因有两个。第一，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偏见和市场至上主义认为机制和制度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且只会损坏转轨，相反在地区范围内没有任何政策协调会进行得更好，自由化和全球化就已经足够了。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政策协调的制度化与已消逝的社会主义经互会非常相似。然而，经互

会的解散是有许多正确的理由,也是必要的,但转型政策应该进行协调却有着另外的原因。为了整个地区更进一步合作和加强政策指导的目的,建立至少一种由这些国家当局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定期会议,总不会太晚。它很可能会有助于国家政策的效率和促进经验的交流。第二,有一种意见,一直认为这种协调角色可以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布雷顿森林组织体系很好地完成。然而,只有满足其他三个条件,这种方式才是正确的。一是,这些组织所代表的利益与这些转轨经济的利益真正一致。二是,这些经济事实上拥有足够强大的地位,才能使得这些组织的政策是以转轨为目的的。三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它们的各种政策努力能够协调一致。然而,以上这三个条件都不存在。

期望富裕国家不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谋取好处是十分天真的。然而,对快速开放如此有力的支持也应该看作是十分自然的行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迫切自由化以及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被认为是十分适合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在促进转轨,而且也关系到西方的利益。只要与转轨经济的利益相符,就是好的,但是问题并不总是如此。

新兴的中上层阶级直接与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及结果相联系。它们强烈地支持快速“西化”,根本没有充分考虑这是否适应社会的另一极。然而,如果中产阶级的扩大和福利的增长伴随着贫困的扩大,那么,成功的西化——这一概念的积极意义就是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是不可能实行的。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影响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气候既不利于国内的企业家,也不利于外国投资者。

与此同时,如果不公平愈演愈烈,西化的过程被新的贫穷

者认为是其贫穷的根源,那么外国参与推动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环境也将恶化。因此,新的富有者赞成外国参与,而贫穷者反对外国参与是不完全真实的。事实上,正好相反。许多新的富有者持反对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参与,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例如,通过内部交易以及同仍然有权势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密切关系。同样,有许多新的贫穷者赞成越来越多的外国参与,只要他们明白他们现在不用排队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但是没有钱是得不到商品的。结论是:明智的政策应该使转轨社会的广泛阶层支持本国与世界经济加强联系。

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不仅在特定经济和社会之中,而且应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转轨成本与转轨成果之间的平衡。外国资本和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是一致的——应该一方面多提供长期投资和合理技术支持以促进转轨,另一方面也要服务于持续全球化的目的。这种策略代表了所涉及各方的利益,在这种转轨社会之中,即使不是支持了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化,至少也创造了一种中立的环境。这种广泛的向外部世界的开放过程,在一些国家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不仅对前苏联各国如此,对一些东欧国家来说,这也是事实。然而,为了达到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效果,这种开放很明显必须符合参与各方的利益。

然而,如果外国参与者不是致力于长期投资、提高工业产量和帮助劳动力转移,而是为了快速赚取利润,并且主要通过贸易、投机以及同地方腐败官员和新富有者进行不透明的私人交易来赚取利润,那么部分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外国伙伴涉足“他们自己”的事务持怀疑和不情愿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转轨过程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部分——这些经济已难以称为是“他们自己的”了。

全球化再不能以在全球销售可口可乐或者是大众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来衡量。同样,也不再限定于从世界各国向正在开放的经济进行工业机械产品的输入。新型轿车、家用电器、电子配件及其他种类的东西正在威胁到这些国家的贸易平衡,这些国家大多数由于最初贬值导致贸易盈余,而又很快发展到持续增长的贸易赤字,尤其是那些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全球化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发达国家的退休基金或养老基金可能依靠投资于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来得到回报。事实上,对那些财政状况很差的转轨经济来说,要减少对这些养老基金的欠款,必须依靠降低这些基金所持有的转轨经济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利息成本。加利福尼亚的养老金领取者不知道这些事实,西伯利亚的退休人员也不知道这些事实,但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进一步说,新兴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危机显示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相联。正在进行转轨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可能脱离这种相互依赖。

因此,经济对外开放的方式既关系到社会精英也关系到普通老百姓。也许,对于后者,会更为重要;即使他们对于这个事实不很清楚,也是如此。如果外资的进入创造了新的具有更好报酬的工作,其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货物,那么这个形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不必管谁是所有者、谁是生产者。但是,当商店里充斥着外国商品,或是进口的或是外资在本地开设工厂所生产的,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买得起这些商品,那就不能期望外资参与会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有些时候,用于评价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效率的提高,也不是后社会主

义经济国家人民的福利,而是大都市街区的景象^①。多数时候,这些街区越来越好,因为不幸的是在这些国家其他地方街区景象却越来越糟。例如,甚至在一些有名的杂志,也可以读到对俄罗斯初始的资本主义的成就的描述,描述令人难以忘记的商业中心(犹如莫斯科的“麦迪逊”大街),而不去描述其真实的缺点,这些缺点不是体现在商店橱窗里,而是体现在广泛的腐败、工资与退休金的拖欠上。必须认识到,诸如此类的特征,外表好看的豪华商场、贫穷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对外资参与赞成与否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气氛。

12.2 国际组织的作用

就转轨的国际方面而言,转轨国家期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以及欧洲联盟具有特殊的意义。转轨国家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合作(主要在银行监管和规则透明度方面)有了一些进展,虽不十分重要,但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之后。国际清算银行在协助制度建设,特别是在银行重组巩固方面仍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银行在稳定社会和资金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解除之前或之后,国际清算银行的专家及其对银行结构周密规则的协调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或努力,加速了许多国家贸易

^① 1991年,一名波兰政府的顾问被问及波兰的稳定计划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现在在华沙的街上能够买到猕猴桃了。诚然,排队的消失和消费者选择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成就,但问题是应该考虑是否只有少数家庭能够买得起猕猴桃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时是否为取得这些成就花费了不必要的成本。

的自由化。西方7国集团利用世贸组织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及自由化,并推动了体制性的和政策的变动,但是还没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起到这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也未结束。世界贸易组织和7国集团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讨论深入地涉及这两个大国的市场转型问题。有一个贸易自由化深入的问题,也就是它们加入这个组织的问题。

尽管是转轨经济,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得到许多明显的好处。首先,它们进入国际全球市场的方法将更加安全。取消贸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过程会加大全球经济的范围,因此,也可以增强向所有开放经济扩张的能力。其次,因为成员国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它们就能够缓解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有时候,对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国内工业和贸易政策可以用国际义务做借口,是非常有效的。第三,这些国家,甚至于相对弱小的国家,可能期望一种公平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尽管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且有官方政治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也经常发生弱小成员被强大成员歧视和利用的情况,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调会提供一种安全的方式。

谈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4—1996年期间,捷克、匈牙利、波兰加入的谈判为加速自由化做了不少工作,首要的是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规则,由这些国家的政府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本流动和国际交易委员会(CMIT)共同制定,这个委员会负责资本流动自由化以及无形贸易条例的遵照执行。新的成员将采用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鉴于新成员包括东欧国家的情况,具有一些暂时性保留条款和一些特别条款的免除责任,但是,也达成了“到期”后这些国家全部采用的

共识。“到期”的含义一直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谈判问题。资本流动与无形贸易的渐进自由化的发展在其他国家也取得了成效：波罗的海国家、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自由化方面已经超前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永久成员国的必备条件。1997年9月俄罗斯关于承诺申请未来参与合作(虽然目前还不大可能)的声明,也应该被认为将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惯例和标准进行经济的自由化。

事实上,其他几个转轨更快的国家还没有正式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俄罗斯的情况只是另一种政治姿态,而不是正式申请,其他国家(除斯洛伐克外)决定在转轨阶段不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根据3个中欧转轨国家领导人的经验:他们意识到条件和标准是必要的。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谈判,最难的问题是关于资本流动自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定,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政策中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因此,这个组织强调既快又深刻的自由化与放松管制,而这些要求并不能够全部满足。

例如,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些人反对关于取消房地产方面管制、实现自由化的意见,在波罗的海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不愿意放弃它们还在执行的各种禁令或限制。对也好,错也罢,它们知道外国人能够设法取得某些财产,而由于许多的原因(包括政治和感情上的原因),这些财产是这些国家并不急于出售的。事实上确实如此,即使在丹麦,二战后50多年来,同样还禁止将土地出售给外国人;而德国人可能想购买一些土地,哪怕是为了娱乐的目的。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谈判期间,波兰对相似的问题反映强烈。在斯洛文尼亚,你可以听到对意大利人的埋怨,在波罗的海国家可以听到对俄罗斯人的抱怨,当然也有对德国人的抱怨。即使这些限制并不基于任何经济上的理论,但也不能对之忽视,因为它们确

实存在,并且它们的含义已由简单的心理关心上升到了政治上的挑战。

另一个困难的情况是针对银行出于保密而采取的规则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坚决地坚持这个问题的透明管理,原因是这样可以使价格转移避税和非法洗钱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在转轨国家中——如同在许多其他新兴市场一样——存在许多集团,包括与大众传媒和政治团体有密切关系的一些银行和有影响力的金融圈子,这些集团反对这种透明的管理规则。要消除这种对抗是不容易的,首先必须由政治意志来约束。如波兰的情形,如果没有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强大压力,那么充分的法律修正案便不可能得以执行。无论何时提出议题,总是会有来自恶意团体的抵制并予以扼杀,而且也缺乏中央银行冲破所有政治障碍而坚持此项改革的承诺。

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键的挑战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某些国家担心导致金融动荡的巨大风险,使经济受外部冲击太大,因此还不准备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条件。从它们的自身考虑,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此种自由化要求以良好的金融状况和健全的制度架构为基础。有趣的是,捷克和波兰紧随匈牙利谈判了这个问题(匈牙利是第一个加入的),捷克急切地接受了自由化的规则,以此证明它坚决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决心,而没有对在中期可能对经常项目的持续稳定及货币波动所产生的威胁予以足够重视。很快地,在捷克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一年半,捷克发生了货币与经济危机。

相反地,波兰采取了一种渐进自由化的方式,并由此避免了这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中,如墨西哥(自1994年),匈牙利与捷克(自1995年),波

兰(自 1996 年)和韩国(自 1997 年),只有波兰避免了由于资本流动管制过松和银行监管薄弱造成的危机。经济变化的预期不佳与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这足以证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与自由化是好事,但只有在政策和制度建设良好的时候才是如此。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此。

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看起来似乎不愿意很快接收新的国家加入,原因主要是由于新成员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危机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这个组织的未来发展,即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国家,像美国与墨西哥、日本与韩国、德国与波兰,虽然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技术协助与谈判中的灵活操作,这些国家自由化的规则越来越趋同,但是它们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真正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并非易事。

十分重要的是,当一个国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其加入欧盟就会更有自信与说服力。当然,在没有加入前者而加入后者也是可能的(如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但是现在如果一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加入欧盟相对容易得多。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在 1997—1998 年之前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那么在 1997—1998 年间决定欧盟申请国名单时,这些国家被包含在名单之中的可能性会很大。并不是因为更高的声誉,而只是因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过程是加强一国进行制度改革和机制变革的十分重要的催化剂。换句话说,考虑到 3 个已完成的国家,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过程也是加入欧盟过程的一部分。已完成的改革确实对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加入欧盟是十分重要的。

1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特殊使命

后社会主义事务的结构相对地比其他地方——从东亚到非洲再到南美洲——要艰巨，这个工作需要由特定的国际组织加以解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源于私人资本在渗透到这部分经济中的相对微弱地位。转轨国家资金缺乏，然而它们期望的增长速度需要资金的支持。外国政府希望在此看到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快速变化，但出自许多不同的原因，它们并不想直接卷入金融、法律、技术事务。所以，一方缺乏金融资本和市场实践的经验，且另一方可以提供，国际组织应该在双方联系之间尽最大努力。

国际组织的贡献可以认为是重要的和积极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主要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积极参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会更加困难。转轨国家政府往往首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贷款——其次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要贷款给私人部门或提高私有化的项目，但是，它们很快发现它们所获得的款项没有所得到的建议多，这些组织建议它们采取一定的政策以在一定的时间后获得资金。尽管这些国家经常不情愿采用所建议的政策，但是讨价还价和持续的讨论的过程对于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是十分有用的。这是独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对于政府官员和许多公务员，而且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如此。因为职员的快速更替，再加上他们中很多人进入私人部门，国家的管理体系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质量得到了提高。

同样重要的是特别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次由世界银行在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它们对于转轨经济应该制定和执

行结构调整政策的劝告和主张不仅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影响着真正的政策制定。尽管有许多缺陷和障碍,一种通向市场经济的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已在地区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并且持续发展的机会已经来临,尽管来得有些晚但将是永久性的。当然,对于政策成就的赞誉和对于政策失败的责备主要应针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的参与,形势会是截然不同的。具体而言,它可能在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局部都会有所不同,有时会好一些,有时则更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深入影响和参与,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了全面的变化,使体系转轨更加向前并且看起来更利于持续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并没有改变对于转轨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的立场。与这些国家财政和货币权威机构的讨论,如一方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另一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从开始便好像单向交通道路,后者对前者的观点根本没有足够的重视。对转轨经济国家的代表参与布雷顿森林组织选区的具体设计,削弱了这些国家自身的转轨政策与它们对这些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之间的全方位的协调。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建立自己的选区,因此它们的地位相对强大^①。至于其他的国家,它们被分散到不同的组中,有时尽管一组中有一些转轨国家,但它们对政策形成制定的过程没有任何影响力,即使是在政策设计上也是如此。一个组通常由一个工业化国家领导,而其他的国家对整个政策只有极小的影响力,哪怕是针对它们的政策。

最佳的组合是由芬兰领导的选区,因为它按照波罗的海

^① 其他以单个国家建立的选区有: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沙特阿拉伯。

和北欧国家地理区域的联系组建,还包括其他工业化国家如丹麦、冰岛、挪威、瑞典,以及3个波罗的海转轨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是,至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选区的领导国和其他成员间没有这种联系。例如,由瑞士领导的选区,包括波兰和5个前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由比利时领导的选区包括3个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奥地利、卢森堡、土耳其及6个转轨国家:白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由荷兰领导的选区包括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和许多转轨国家如:亚美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然而,将转轨国家按照地缘政治的标准将邻国组合在一起,比将它们分散开来会更加合理。在1990年合理的东西,在2000年并不是必要的解决方法。因此,为什么不建立至少一个强大和有能力的选区,如果不能包括所有的转轨经济,至少可由其中一个国家领导?

这是可行的也是有利的,相关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这样来看待问题。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因为有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合作,而是竞争,甚至是激烈竞争,并错误地假设这是一个能得到政治和金融支持的更合理的方式。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适当的政治合作。自由化正在向前进行、资本流动逐渐自由、经济管制也在放松、私人部门已经膨胀发展,因此,在这种缺少其他足够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之下,服务于政治合作目的的机制可以建立在特别工作组的基础之上,特别工作组在各个国际金融组织内进行工作,促使国际金融组织监督转轨经济的发展并提供政策建议。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美国执行董事按照国会的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中坚持美国的利益和政策是十分自然的话,那么

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用一个组织的方式以更好的合作姿态表达它们的声音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如果它们的经济太小太弱以至于无法独立行动，那么更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联合起来，它们便不再弱小。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 24 个选区是以特别提款权(SDR)的配额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的组成方式不是依据自愿、而是以一个国家对这些组织的财务贡献大小来决定的。然而，还有一些特别的团体，是由转轨国家领导的。例如：莫桑比克现在领导一个由 22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组成的选区，包括比较强大和发达的南非和津巴布韦^①。科威特领导一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选区^②，菲律宾领导了一个由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一群国家组成的选区^③，玻利维亚领导了一个由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选区^④。在后两个例子中，选区的领导可以轮换，因此在菲律宾之前是巴西，在玻利维亚之前是阿根廷。所以，此种特定组成结构不只是金融配额的问题，更是政治上的原因。由此，组织一个选区，由诸如爱沙尼亚、匈牙利或波兰，或捷克、哈萨克斯坦或乌克兰领导，一方面有助于地区的政策合作协调，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布雷顿森林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工作效率。

如果在转轨经济之间，它们的代表之间更加团结、并致力

① 其他 19 个国家是：安哥拉、博茨瓦纳、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② 这个选区包括：巴林、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阿曼、卡塔尔、利比亚、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③ 这一选区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海地、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④ 该选区包括：阿根廷、智利、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

于就它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合作,那么处境会截然不同。但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言,将它们分散开来由其他国家领导比较方便,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没有承诺,加强合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如此,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念:与它们自己的成绩和失败相比,从发达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经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由此,通过实际行动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借助于中介机构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是中介机构,但没有提供有效渠道使得专家与转轨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直接交流。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是也学到了知识和经验。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学习的过程也包括这些国际组织。从这个角度说,布雷顿森林组织不仅是国际金融中介组织,而且还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国际知识交流的中介组织。

然而在它们完全认识到后社会主义经济是如何的特殊之前,按照它们的建议制定的结构调整政策对转轨经济的强制执行已经改变了这种现象。包括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几年来发生了所谓的“经济拉丁化”。结果,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与扭曲的发展中市场经济(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区别已经消失。如果在90年代初,这些差异还很显著,那么在90年代末只是其理论基础不同而已。并不是后者变得更加社会主义,而是前者开始看上去更像扭曲的市场经济。因此,一个循环已经完成:它们从扭曲的集中计划经济阶段进入了扭曲的市场经济阶段。然而,如何消除各种扭曲,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毋庸置疑,90年代末俄罗斯经济比90年代初更像80年代的巴西经济。在90年代初,它们的差异十分显著,然而,现在它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对于其他国家,也可以说出相似的情形。如:捷克与智利、波兰与阿根廷、拉脱维亚与乌拉圭、格鲁吉亚与尼加拉瓜。开始设想的相似性(事实上不是),最

终导致了结果的真正相似,其原因在于建立在它们之间相似性的错误假设基础之上的错误政策的执行。这就是采用根据华盛顿协议设计的政策的执行结果。就好像是用一个固定的药物处方针对不特定的病人一样。同时,一些落后的后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具有了更多的不发达扭曲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它们进行了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是按照华盛顿协议制定的政策来进行的,病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有了疾病的一些特征,尽管在早些时候他根本没有被这种疾病所感染。考虑到这个结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来自拉丁美洲的国家和来自东欧与独联体的国家组合在一个选区是有趣并有好处的。

通常布雷顿森林组织被看作是贷款机构,当然贷款是它们的首要任务。但是因为贷款是有条件的,并且与许多结构改革有关系,所以必须认识到重要的不仅是要借多少钱,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目的去借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看重金融基础条件,如健全的财政状况、平衡的经常项目、稳定的货币、低的通货膨胀率,世界银行更注重工业调整的能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第一个组织关注稳定而第二个组织更关注成长,两者都关注结构改革与制度建设。前者提供短期的贷款,后者提供长期发展所需贷款。因此,认为它们立足点相同是人们经常犯的错误,然而,人们经常这么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对政府预算与经常项目平衡的支持,以及世界银行提供了用于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社会保障改革、改善医疗、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贷款,它们对于转轨经济改革的帮助是巨大的。最初几年是对整个地区、目前是对一些只能得到有限的私人援助的国家,这两个组织都提供了大量的外部融资支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也紧随其后提供了帮助。双边的帮助(尽管对一些特定国家是重要的)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然而,必须牢记所有这些都是贷款,而非赠予。提供的这些信贷是用于支持体制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是必须还本付息的。因此是交易而非慈善。但不仅是交易,也是政治。

贷款的过程,通常是公开的,一般是以资金的连续分次解付的,由布雷顿森林组织提供贷款的条件是严格的。当然,在自由全球经济时代,有能力满足这些严格条件的政府是好政府。如果它是一个好的政府,并越多地被传颂,则它越是好政府。但是运作机制是以另一个方式运行,众所周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标准,也就是对财政、货币状况的评估,也是十分公开的。经常很难满足这些标准,但是由于公众道德的信条,政府在满足这些标准或没有达到时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一种方式都是责备政策的好理由:有时是严格的,有时又不够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贷款的连续分次支付并不是迫切需要的,但是满足运行的标准也是十分重要的,经常联系到财政状况、货币供应量以及外部金融地位。由于三个特别的原因,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在结构调整的困难时期,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很大。如果没有进入私人资本市场,那么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当稳定和结构改革的一些进步实现之后,转轨经济会向评级机构申请对其信用进行评估,这些机构主要是美国穆迪、标准普尔和英国的 IBCA。只有得到合理的评级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才可以发行欧洲债券进行融资。因此,没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美好关系,也就没有和这些市场的良好关系。

第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尤其是成功地履行通常被看作是体面的证明,被看作为审慎政策认可的证据,因此

也是可以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借款的信号。在90年代早期,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预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经济政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主要外国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事实上,这种依赖还存在着。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在赞成或反对政府政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评估是积极的,它可以提高政府的地位及其处理其他事务的能力。相反,如果评估是消极的,则它会削弱政府的地位。运行标准要求的履行不仅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业团体、国际投资者和金融家来监督,这些标准达到了便是令人满意的,而且还有来自政治对手的监督。由此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困难复杂。

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对转轨过程的影响越大,形势会越来越复杂。从这个角度来说,毋庸置疑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后社会主义转轨初期的作用比后期的作用更好。另一方面,它们也有不令人称道的地方,因为缺乏针对不同国家和它们独特的困境进行合理解决的经验。后来,通过不断地在实践中的学习,逐渐地认识到了许多政策建议是不会运行下去并起到作用的,除非提前进行制度建设。然而,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些组织也在进行改善。在转轨进行得好的国家,如匈牙利,这些组织的影响正在减小。而在一些转轨进行得比较差的国家,如乌克兰,这些组织的影响在加大。但是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只要个别国家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形势也发生显著的变化。

在转轨经济的晚期阶段,当结构改革的进展完成得比较好的时候,“软”(容易得到)的技术建议和“硬”(比较而言,难以得到)的融资便没有以前那样需要了。称技术建议为“软”、金融支持为“硬”,是因为只提供前者是容易的。技术建议包括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取消补贴、关闭国有企业和解雇冗员

等,这些建议是容易得到的,而新的投资和融资相对困难。诸如此类的建议是过剩的,而融资的供给则不充分。因此,一个更不平衡的现象出现了:如洪水般的建议期望转轨经济国家采纳执行,而又只有少量的资金流入,难以使这些建议可行。换句话说,在不需要某些帮助的时候,这些帮助是易于得到的。

当然,对此种帮助的需要并不是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变得不十分迫切了,也没有早期那样重要了。这是因为转型的进展和经济的恢复,使得外国私人投资和商业私人贷款加大。在经济增长和转轨进展的同时,官方贷款在下降而私人投资与贷款正在上升。与此同时,私人企业或实体(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和咨询顾问)对经济事务的影响正在加强,而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作用正在下降。然而,马上可能会导致另一种严重危机的出现。私人与官方体系之间力量的对比变化如此之大,从东南亚危机的原因与内涵中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处理其结果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危机主要由私人部门导致,然而又必须由政府和国际组织解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与此相似,经济越来越依靠私人部门而越来越少地依赖于政府。

由此可见,当某个国家的形势恶化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力会加强:事实上就如同失业大军出现时候那样。之所以如此,因为只有在当局被迫——不管愿意与否——求助之时,它们才能被迫听取外界人士的建议,而不去责备外界介入它们的内部事务。此时,这些组织便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决定更多的事情——例如,俄罗斯的情形便如上述,而中国则不明显。在1997—1998年期间,这些组织对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影响力比对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影响力大得多。但也可能是相反的情

况。因为国际组织对后者国家早期的影响更大(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中国除外),而现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比以前改善了。

12.4 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开放的程度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对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越深越广的国家,它的发展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这并不总是好事,因为在其他地区也可能随时发生经济萧条,即使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可能如此。以另一个视角来看,考虑到转轨经济强有力地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才行,渐进的一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同样也是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持。这种现象在世纪之交已经发生(那时转轨经济可能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在东南亚危机、日本衰退及全球受这些事情影响之后。

一体化的基本含义主要是贸易扩展和资本引进。不断增长的出口与进口提供了参与新市场和外来竞争的通道,迫使本国技术和管理的提高。对外开放易于吸引更多的所需资本的流入,必须吸引这些资本以消除国内储蓄与新投资需求的差距。转轨经济对新资本的需求庞大,仅仅在东欧,它们将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再吸引至少1500—2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大部分由私人部门提供,因此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将进一步下降。大量的资金将投资于独联体国家,只要其继续保持经济改革和政局的稳定。全球和地区的一体化过程将有助于对国外投资需要的满足。

转轨领先的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一定比转轨滞后的国

家快。将来,它们中的一些国家会加入欧洲联盟,但这一选择只是针对东欧国家。即使一些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发展得很快,如同 60 年代到 90 年代韩国所发生的变化那样大,它们也不会加入欧盟。但有一种选择,它们中的某些国家加入东南亚国际联盟(东盟),并且它们中的全部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同时,很可能以后会产生一种新的地区组织,其宗旨是为了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

在东欧,中东欧自由贸易协定还在运作,基本上限于贸易上的安排。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瓦解之后不久,也发生了新的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由 4 个前苏联共和国组成的共同市场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这 4 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分属 3 个不同选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处于两个不同的选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与经济的联盟,承诺了最后的货币一体化。所谓的 GUAM 集团也建立起来了,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这 4 个国家属于相同的选区)。

将来,为了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目的,类似的新的亚地区集团还会出现。然而,这不能解决整个地区范围内缺少适当合作与协调的问题。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也就是说,在发展的现阶段,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的国际范围内政策协调问题,而不是这些国家(一些地区或政府已在政策上加强了协调合作)之间的一体化。因为它们有许多可以联合的更重要的伙伴国家,所以,在中欧与中亚新兴市场之间不需要一体化,不需要过多的贸易以及过于紧密的经济纽带,但是在地区内的所有国家之间,转轨和发展方面的政策合作与协调是真正需要的。

在 1997 年 6 月,西方七国集团在丹佛举行的峰会期间,

俄罗斯被邀请参加了世界最强经济国家的会议,首次聚在一起成为了八国集团。在1998年伯明翰峰会期间这个过程又重复出现并且将继续下去。它的发生更多地出于政治的原因,远非经济原因,所以在下一年也可能对中国发出相似的邀请,这样以前的七国集团会成为将来的九国集团。然而,问题产生了,只要过去存在“七国集团”,那么在全球经济游戏规则中“谁是谁”便是透明的。现在,存在八国集团,那么成为九国集团也只是一个时间和政治决定的问题,由这种安排透露出的信号不再是那么透明或明确了。俄罗斯,其在全球经济的相对地位正在下降,中国正在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它们两者与西方七国集团的定式或规则并不相融合。尽管俄罗斯与中国都是大国,但是确切地说它们是不发达的,随后的几十年也仍然会是不发达的。因此,实际上只有旧的七国集团,企图以它的方式和利益来影响全球经济的过程,俄罗斯至多只是一个附加的成分,它在对全球经济问题的影响上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有些国家企图寻求一种模式。首先,它们加入布雷顿森林机构组织^①。后来,它们中几个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进展得比较深入的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32个成员国中有: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还有古巴)。在1998年提交申请的32个国家中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中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南斯拉夫。又一次证

^① 有些国家在转轨前就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了,比如1972年以后的罗马尼亚,1982年以后的匈牙利。

明了以前的市场改革是有价值的。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的国家,有匈牙利和波兰,它们没有任何困难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且斯洛文尼亚也能够容易地加入。

滞后的国家正努力地加入这些组织。只要被接受,前苏联共和国与东欧南部国家马上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与俄罗斯的加入是有条件的,如同早期的社会主义成员国的情况。因为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例子中,政府因素是十分重要的,而不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员时那样。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条件地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接受而成为它的成员国。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条件,而且又提出了政治上的条件。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关系到非经济的问题,如克罗地亚对本地区冲突的解决等。

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也期望加入欧盟。这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Eatwell, Ellman, Karlsson, Nuti 和 Shapiro, 1997)。

毋庸置疑地,加入欧盟的期望是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型的动力之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以选择与欧盟的合作了。到1996年,已有10个转轨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与欧盟进行了合作(见表30、表31)。

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在1998年3月开始了加入欧盟的谈判。它们有可能会在2003—2005年加入欧盟。在1997年夏天,这5个国家被邀请讨论加入欧盟的条件,并且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其他与欧盟合作

表 30 欧洲联盟、与欧盟合作的东欧转轨经济的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 人口 1996 年 (百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96 年 (与欧盟平均值的百分率) | |
|---|-------------------|---------------------------------|---------------------------------|
| 欧盟成员国 | | |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7,300 欧洲货币单位(按购买力平价计)人口 37210 万 | | | |
| 奥地利 | 8.0 | 110.4 | |
| 比利时 | 10.1 | 110.8 | |
| 英国 | 58.1 | 95.6 | |
| 丹麦 | 5.2 | 115.1 | |
| 芬兰 | 5.1 | 95.7 | |
| 法国 | 58.1 | 106.0 | |
| 德国 | 81.6 | 109.0 | |
| 希腊 | 10.4 | 65.4 | |
| 爱尔兰 | 3.5 | 96.6 | |
| 意大利 | 57.2 | 103.3 | |
| 卢森堡 | 0.4 | 166.4 | |
| 荷兰 | 15.5 | 106.6 | |
| 葡萄牙 | 9.8 | 67.3 | |
| 西班牙 | 39.6 | 76.4 | |
| 瑞典 | 8.8 | 99.4 | |
| 与欧盟合作的东欧各国 | | |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500 欧洲货币单位(按购买力平价计)人口 10820 万 | | | |
| |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欧洲货币单位 (按购买力平价计) |
| 保加利亚 | 8.5 | 18.6 | 4,200 |
| 捷克共和国 | 10.3 | 50.9 | 9,100 |
| 爱沙尼亚 | 1.5 | 24.8 | 3,900 |
| 匈牙利 | 10.1 | 32.1 | 6,300 |
| 拉脱维亚 | 2.5 | 16.8 | 3,100 |
| 立陶宛 | 3.7 | 18.1 | 3,900 |
| 波兰 | 38.6 | 32.1 | 5,300 |
| 罗马尼亚 | 22.7 | 23.6 | 4,100 |
| 斯洛伐克 | 5.3 | 39.1 | 7,100 |
| 斯洛文尼亚 | 1.9 | 34.6 | 10,100 |

注:用黑体标出的国家尚在进行加入的谈判。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表 31 与欧盟合作的东欧转轨经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对欧盟农业出口占农业的百分比(1995 年)

| |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对欧盟出口的比重 |
|---------|--------------|----------|
| 保加利亚 | 13.0 | 56.0 |
| 捷克共和国 | 5.0 | 58.1 |
| 爱沙尼亚 | 7.1 | 63.1 |
| 匈牙利 | 6.0 | 39.5 |
| 拉脱维亚 | 8.5 | 59.2 |
| 立陶宛 | 9.5 | 48.7 |
| 波兰 | 6.6 | 62.2 |
| 罗马尼亚 | 20.0 | 48.4 |
| 斯洛伐克 | 5.6 | 40.3 |
| 斯洛文尼亚 | 4.8 | 68.3 |
| 欧盟 15 国 | 2.3 | 65.0 |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

的国家也会紧随其后,这些国家有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欧盟强调第一轮候选国的选择标准是纯粹客观……的,加入的先决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运作、民主制度的存在,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在单一市场的竞争能力,合理的公共事务管理(Barber, 1997)。因此,不仅要求市场化的进展,而且要求民主化进程中各个方面的进步。欧盟向东扩张既是经济上的努力,也是政治上的冒险。

在某些被邀请的国家中存在着一些不令人满意的问题,如在推行人人得以生存的民主社会的一些特定的方面上存在问题,如在爱沙尼亚对境内大量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态度,在捷克对境内一小部分吉卜赛少数民族的态度。另外,以各种方式进行协商会有利于这类问题更快更好地解决。斯洛伐克尽

管走的是一条激进的经济改革道路,并且通常被列在转型最前沿的几个国家之列,竟然也被列于这轮谈判之外(见表14)。类似的还有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排序几乎与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一样前(见表14和表28),只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确实比较落后,尤其在市场化方面更加落后。看来决定是否入选的方式有某些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考虑。

被邀请的5个国家与欧盟国家有共同的边界^①。至于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斯洛伐克与奥地利有共同的边界,而其他3个巴尔干国家,如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与欧盟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希腊、葡萄牙有很短的共同边界。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但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东欧部分国家与欧盟的一体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影响到了欧洲委员会最后的决定,如果谈判和转轨以成功告终,那么未来的欧洲地图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如果像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与爱沙尼亚一样好,那么就没有必要被邀请谈判一体化的条件。

至于爱沙尼亚与斯洛文尼亚,有许多因素导致它们被包括在最早的谈判之中。爱沙尼亚与斯洛文尼亚的经济规模都非常小,各自拥有的人口分别为150万和200万。小国家的转轨与一体化的安排比大国家容易得多,大国如罗马尼亚拥有大约2300万居民,这个因素对于欧盟预算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已经决定“共同农业政策”(即著名的CAP)以及欧盟地区援助计划在东扩发生之前必须进行改革。爱沙尼亚是前苏联的共和国中唯一有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加入欧盟的国家,只要它完成规定的条件。由此,至少这个国家的被包容——它是所有前苏联共和国中最小的国家,意味着这样别人

^① 如芬兰和爱沙尼亚那样,芬兰海湾狭窄的航道就像是边界。

就不能指责它将波罗的海国家仍置于俄罗斯影响范围之下。至于斯洛文尼亚,它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唯一被邀请的国家。它也是南斯拉夫共和国中最小的一个。但是,毕竟这两个小国是它们各自地区中最发达的。爱沙尼亚是前苏联共和国中最发达的,而斯洛文尼亚在所有后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发达的,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超过 10000 美元(表 32)。

表 32 转轨经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 年)

| 国 家 | 人口 (百万)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① (美元) (1995 年)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② (美元) (1995 年) | 国民生产 总值 (百万美元) (1995 年) | 在地区国 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 (百分比) | 占地区人 口的比重 (百分比) |
|--------|------------|---|---|----------------------------------|-------------------------------|-----------------------|
| 阿尔巴尼亚 | 3.3 | — | — | — | — | 0.8 |
| 亚美尼亚 | 3.8 | 2260 | — | 8588 | 0.6 | 0.9 |
| 阿塞拜疆 | 7.5 | 1460 | — | 10950 | 0.7 | 1.9 |
| 白俄罗斯 | 10.3 | 4220 | — | 43466 | 2.8 | 2.6 |
| 保加利亚 | 8.4 | 4480 | 4867 | 37632 | 2.4 | 2.1 |
| 克罗地亚 | 4.8 | — | — | — | — | 1.2 |
| 捷克共和国 | 10.3 | 9770 | — | 100631 | 6.6 | 2.6 |
| 爱沙尼亚 | 1.5 | 4220 | 4053 | 6330 | 0.4 | 0.4 |
| 马其顿 | 2.1 | — | — | — | — | 0.5 |
| 格鲁吉亚 | 5.4 | 1470 | — | 7938 | 0.5 | 1.3 |
| 匈牙利 | 10.2 | 6410 | 6578 | 65382 | 4.3 | 2.5 |
| 哈萨克斯坦 | 16.6 | 3010 | — | 49966 | 3.3 | 4.1 |
| 吉尔吉斯斯坦 | 4.5 | 1800 | — | 8100 | 0.5 | 1.1 |
| 拉脱维亚 | 2.5 | 3370 | 3271 | 8425 | 0.5 | 0.6 |
| 立陶宛 | 3.7 | 4120 | 4021 | 15244 | 1.0 | 0.9 |
| 摩尔多瓦 | 4.3 | — | — | — | — | 1.1 |
| 波兰 | 38.6 | 5400 | 5482 | 208440 | 13.6 | 9.6 |
| 罗马尼亚 | 22.7 | 4360 | 4309 | 98972 | 6.4 | 5.7 |
| 俄罗斯 | 148.2 | 4480 | — | 663936 | 43.2 | 37.0 |
| 斯洛伐克 | 5.3 | 3610 | 7371 | 19133 | 1.2 | 1.3 |

(续表)

| 国 家 | 人口 (百万)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① (美元) (1995年)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② (美元) (1995年) | 国民生产 总值 (百万美元) (1995年) | 在地区国 民生生产 总值的比 重 (百分比) | 占地区人 口的比 重 (百分比) |
|--------|------------|--|--|---------------------------------|------------------------------------|---------------------------|
| 斯洛文尼亚 | 2.0 | — | 10509 | — | — | 0.5 |
| 塔吉克斯坦 | 5.8 | 920 | — | 5336 | 0.3 | 1.4 |
| 土库曼斯坦 | 4.5 | — | — | — | — | 1.1 |
| 乌克兰 | 51.6 | 2400 | — | 123840 | 8.1 | 12.9 |
| 乌兹别克斯坦 | 22.8 | 2370 | — | 54036 | 3.5 | 5.7 |
| 地区总额 | 400.7 | 4060 | | 1536345 | 100.0 | 100.0 |

① 选自 1997 年世界银行统计结果。

② 出自 1997 年 OECD 经济指标。

—: 缺乏资料。

资料来源:《1997 世界银行年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转轨经济短期经济指标 / 1997。其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值均以购买力平价计。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基础评估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方法上会有所不同。在 1997 年由欧盟主席雅克·桑泰(Jaques Santer)向欧洲议会提交的 2000 年日程(Agenda, 2000)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表 32 中的数据有些差异。例如, 对于波兰,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估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400 美元, 而欧盟估计为接近 5300 欧洲货币单位, 相当于 5800—5900 美元。更可靠的估计是, 199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 7000 美元, 主要考虑了 1996—1997 年间 14% 的增长率, 以及本国物价相对国际物价的变化。这是在 1997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为 1.9 的基础上估计的。在 1995 年汇率从 2 降至 1.8 后, 1996 年则在 1.77—1.82 间徘徊, 到 1997 年又复上升至 1.9(《计划经济》, 1997b)。这方面的问题在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中都存在。

欧盟的进一步扩张是可行的,但是,实现起来要比接受最早的5个申请国难得多,尽管其他国家到时候甚至可能会比1998年的第一轮申请国更好地做好加入的各种准备。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欧盟东扩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所有加入的国家到底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可以肯定的是,不依赖于政策的地缘政治,和只依赖于改革与明智政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资格,这两者在一体化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因为从国际经济、贸易、国际组织成员国资格角度看,只有3个转轨经济——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已经成为了“五星国家”(five star performers)(表33)。

表 33 转轨经济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成员国资格
(1998年)

| 国 家 | 组 织 | | | | | |
|--------|-----------|-----------------------|------------|-------------|-------------------|-------------|
| | 以星数 排序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 世界贸易 组织 | 与欧盟进 行合作 |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 织 | 加入欧盟 的邀请 |
| 阿尔巴尼亚 | * | | | | | * |
| 亚美尼亚 | * | | | | | * |
| 阿塞拜疆 | * | | | | | * |
| 白俄罗斯 | * | | | | | * |
| 保加利亚 | * | * | * | | | * * * |
| 克罗地亚 | * | | | | | * |
| 捷克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爱沙尼亚 | * | | * | | * | * * * |
| 马其顿 | * | | | | | * |
| 格鲁吉亚 | * | | | | | * |
| 匈牙利 | * | * | * | * | * | * * * * * |
| 哈萨克斯坦 | * | | | | | * |
|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 | * |
| 拉脱维亚 | * | | * | | | * * |
| 立陶宛 | * | | * | | | * * |
| 摩尔多瓦 | * | | | | | * |

(续表)

| 国 家 | 组 织 | | | | | |
|--------|-----------|-----------------------|------------|-------------|-------------------|-------------|
| | 以星数 排序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 世界贸易 组织 | 与欧盟进 行合作 |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 织 | 加入欧盟 的邀请 |
| 波兰 | * | * | * | * | * | ***** |
| 罗马尼亚 | * | * | * | | | *** |
| 俄罗斯 | * | | | | | * |
| 斯洛伐克 | * | * | * | | | *** |
| 斯洛文尼亚 | * | * | * | | * | ***** |
| 塔吉克斯坦 | * | | | | | * |
| 土库曼斯坦 | * | | | | | * |
| 乌克兰 | * | | | | | * |
|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组织资料整理。

这些国家不仅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而且也加入了北约(NATO)。1997年马德里峰会正式邀请捷克、匈牙利、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重要的关于成员国资格的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作出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与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至于欧盟的成员国资格,一体化必须被看作是欧盟15个老成员国和5个新成员国的伙伴关系。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不仅要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而且要改善基础设施,振兴工业。这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代价

主要由东欧的纳税人负担^①。因此,一体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支付一大笔费用开支。在达到目的之前,有可能导致某些紧张局势。然而,在转轨与一体化的阶段,在调整方面如果没有付出代价,那么在长期过程中的代价会更高。

表 34 东盟各国和柬埔寨的人口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 国 家 | 人口 1996年(百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96年 |
|-------|-----------------|-------------------|
| 印度尼西亚 | 196.9 | 1,150 |
| 越南 | 75.5 | 311 |
| 菲律宾 | 69.8 | 1,200 |
| 泰国 | 61.3 | 2,980 |
| 马来西亚 | 20.6 | 4,260 |
| 新加坡 | 3.0 | 30,860 |
| 文莱 | 0.3 | 16,427 |
| 老挝 | 4.9 | 377 |
| 缅甸 | 45.6 | 107 * |
| 柬埔寨 | 10.7 | 292 |

* :按市场汇率。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情报机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在亚洲东南部,越南在 1995 年成为东盟的成员,老挝则于 1997 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被拖延了,主要因为 1997 年夏天的政治动乱。它迫使东盟将其参加的决定搁置一段时间,不知会有多长。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国家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当然,实际上的差异,如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尽管还是很大,但相对来说要小多了,例如,越南

^① 为东欧提供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支持的是欧洲投资银行(EIB),为东部和中都提供的信贷总量超过了 30 亿欧洲货币单位。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用市场汇率计算得出的结果的4倍,而新加坡则低了25%。因此,如果按照现行交叉汇率计算,两国人均收入比率大约为100:1,而如果考虑了实际购买力,比率便下降为大约20:1(表34)。

唯一可以减小差距的方式是欠发达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式是区域一体化,并随之进行贸易自由化、资本的流动和结构政策的合作协调。尽管1998—1999年的危机发生之后,东盟计划引入“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并实施所谓的2020年远景。这种远景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问题不只是幻想,它对于中亚、俄罗斯和东欧也是需要的。在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的协调,是东南亚经济很长时间之内保持比其他地区更高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最近的深刻危机也无法否定这一结论。在将来这一结论也同样正确。

由此,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亚洲东南部的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经济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① 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东盟中的不发达市场的增长速度快于东盟的发达市场?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

^① 一个有关的问题是在1997年甚至比越南旁的缅甸也加入了东盟。虽然这是与转轨经济不同的情形,但是为了发展,也必须走相似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对第一个回答,此类区域一体化同样有政治的原因,并会影响改革的速度。如果在经济水平达到加入组织的标准之前就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如早些时候的越南和老挝,及晚些时候最有希望加入的柬埔寨——那么接着是渐进的自由化。这是早加入的积极方面,因为从这个角度看永远都不会太早。由于成员国资格很容易地影响到这个国家正在执行的政策,它可以推动结构和制度的变化。早参加的成员国可用作特殊的杠杆来抵制对必要改革的反对——不论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官僚统治的,还是三者的混合。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许多改革必须实行相反,东盟扩张例子的次序正好相反。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的条件,而被认为关键的基础性的条件也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既有时间也有办法来支持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对第二个问题,尽管在1997—1998年期间东南亚发生危机并影响到近邻,成为东盟新成员的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它们的持续增长能力。当然,在和平的相互合作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相信亚洲东南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快。不仅因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和技术转移,而且也因为这些过程向越南、老挝、柬埔寨开放了新的市场。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增加了外资的引入并加大了进入新市场的渠道,可以使得这些经济更好地利用其资源并通过出口增长进一步地促进经济增长。

12.5 新兴市场的两面

这是对“新兴市场”概念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新兴市场的两种意义。第一种意思是

市场体系处于初生状态,其转型是由婴儿期市场经济成长为发达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一系列的政治决定,并把所有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种新的行为和制度类型并使之成熟,以使其能完全地应付“新兴”市场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转轨经济都可以被认为是新兴市场,之所以是新兴市场体系,因为它们是由先前的非市场的集中计划体制逐渐地成为一体化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的。

但是,也有第二种解释,新兴市场是一个经济正在开放的国家的一种新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并且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Mobius, 1996)。这些机会主要被富裕的有多余储蓄的国家敏锐地加以利用,这些国家储蓄太多,超过了其吸引储蓄作为国内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储蓄的财富和资本的生成与现有的国家投资需求相比相对过剩,因此部分储蓄外流以寻求收益。在成熟的市场中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在新兴市场中资本的需求则大于供给。因此,资本由盈余的地方流向了短缺的地方。多余的资本,通常可以在新兴市场上得到高于发达市场的报酬。有这样的机会,盈余资本通常会冒更高的风险投入到新兴市场。

在1997年,新兴股票市场中交易的股票占全球交易量19.3万亿美元中的14%,占全球交易总量1/7,达到了2.7万亿美元。中等和较大的转轨领先国家的股票市场,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交易额高于俄罗斯,中国则在转型国家中占领先地位,它的股票市场交易额是市场资本化的230%,也就是说,平均每支股票换手大于两次,从这一点看中国股票市场是这一年最活跃的新兴市场,在它之后按次序排列为:韩国、波兰、匈牙利,它们的交易额接近市场资本化80%,位于美国和巴西与马来西亚和希腊之间。俄罗斯排在最后,交易额仍为市场资本化的25%,位于以色列与南非之间。

处于发育阶段、刚起步的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在它们为证券投资者提供可观收益的同时,其经济产出严重收缩。也就是对于承担了比投资于其他地方更大风险的投资来说,尽管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交易,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只是意味着一部分国内收入转移给了国外投资者。它们的收益不总是来源于这部分投资使用后的生产力增长,投资收益经常不进行再投资,并很快地转移到国外。

大多数转轨经济能够健康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但某些国家的资本外逃超过了总的外国贷款与投资,包括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金融援助与私人资本的流入。如果及时进行合适的监管的话(不放弃控制资金的流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之所以没有在适当的时候采用管制,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造成的,而是因为缺乏政治的坚定性和足够的勇气去执行必要的改革。尽管通常地,新兴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利用资本的形成和配置促进了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但是一些市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不足为怪。在一段时期,如阿尔巴尼亚和俄罗斯这样不同的国家,其非正式机构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新兴市场被用作实现套利的工具。

克服以上这些不利事情的政策应专注于如何使流入的外资转入长期投资,最好是长期直接投资。进行微观经济重组和增强竞争力,恢复经济和经济增长,这几方面的开支应由投资者和接受者承担。否则,金融的自由化和资本转移可能导致资本的流出。

这类事情的最好例子是俄罗斯的经济。在1996年俄罗斯经济收缩了6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转轨前水平(1989年)的50%。与此同时,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以美元表示)高达113%。这种趋势在1997年还在继续,而国内

从休克到治疗。

生产总值并没有从底部回升,但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仍高达111%。其他新兴市场的收益,包括转轨经济中最主要的市场,并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多数情况下仍大大高于工业国家(表35)。

表 35 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回报率
(以美元表示)

| | 1996年 (1995年12月29日 的变化百分率) | 1997年 (1996年12月31日 的变化百分率) | 1996—1997年 (1995年12月29日 的变化百分率) |
|---------|----------------------------------|----------------------------------|---------------------------------------|
| 新 兴 市 场 | | | |
| 中国 | 77.1 | 30.7 | 131.5 |
| 捷克共和国 | 10.0 | -27.7 | -20.5 |
| 匈牙利 | 121.4 | 53.6 | 240.1 |
| 波兰 | 57.6 | -16.8 | 31.1 |
| 俄罗斯 | 112.6 | 110.2 | 346.9 |
| 平均值* | 75.7 | 30.0 | 128.5 |
| 发 达 国 家 | | | |
| 美国 | 24.0 | 22.8 | 52.3 |
| 德国 | 15.2 | 26.5 | 45.7 |
| 英国 | 17.3 | 20.6 | 41.5 |
| 意大利 | 14.6 | 36.2 | 56.1 |
| 日本 | -8.2 | -29.5 | -35.3 |
| 世界** | 10.0 | 13.8 | 25.2 |

*:没有加权而计算的均值。

** :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包括经合组织市场,希腊、墨西哥、葡萄牙、韩国、土耳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除外,后面三国虽然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但都被包括在新兴市场之内。

资料来源:股票交易所、国家统计数据 and 路透社。

人们终于从梦中醒来。事实是,在东亚危机之后钟摆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投资者的恐慌笼罩了全世界的新兴市场,1998年上半年莫斯科股票指数 RTS 下降了 63.3%;股票的价格

值在半年之内下降了一半还多(以美元表示)。这个市场是如此过度狂热,在6月份的最后一周竟下挫了18.2%;它确实是“赌博经济”。但是,俄罗斯股市崩溃的原因不应归咎于外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而应责备政治上、宏观经济的管理错误和结构改革政策(主要是在私有化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不良作用(Kolodko, 1998d)。

在过去的几年里,资产经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然而,仅在1996—1997年两年里,股市指数大约增长了4.5倍,这是不合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指数的上涨是因为被低估而追赶真实价值的自然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一级市场的名义价格与资产的真实价值和二级市场中长期收益表现之间的差距在减少。但是股指过度的跳跃导致泡沫发生,同时泡沫又被持续的投机吹大,也被一些投资者尤其一些内部交易者有意加以膨胀。因此这是对未来增长的非理性预期。所以,泡沫的破灭——由于实体经济的表现,股市的资本化回落到它应该的位置——必然会到来。经济的真实产出在6年之内减半,而资本市场股票的平均价值仅在6个月之内便减半了。

尽管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处于牛市——华尔街的道琼斯指数上升了14.4%,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包括了那个时期23个最发达国家,上升了17.4%——而新兴市场除了个别都处于熊市。在同样的6个月内,新兴市场的损失很大,从印度尼西亚损失56.9%到委内瑞拉损失49.6%、巴西损失6.2%到韩国损失0.9%不等。在主要的后社会主义市场,匈牙利损失8.6%、捷克损失1.7%。除了希腊(上升50.9%)、以色列(5.2%)和葡萄牙(39.5%)外,在1998年上半年只有两个新兴市场,可以从股票投资中得到正值的回报,一个是中国(11.0%,尽管6月份的最后一周内损失6.1%),另一个是波兰(9.6%),后者是最稳定和持续增长

的资本市场。

这两个例子的发生,是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对坚实的客观经济基础和设计良好的结构调整政策(尽管互相之间有很大不同)。因此,新兴市场避免金融危机是可能的——不论它是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开放经济或是已经开放的后社会主义经济——只要自由化和安定的政策与制度的建设稳定地进行。这就是中国和波兰所显示的,至少到1998年为止是这样,并且其未来的表现也令人乐观。条件是自由化与资本流动的放松监管应从属于国家发展的战略,而非相反。

以俄罗斯为例,证券投资者快速获得高收益的欲望——而无视于脆弱的基础和持续的萧条、金融的不安全、不平等的增长和贫穷的扩散——首先导致泡沫膨胀。而在缺乏管理和稳定政策的制度环境之中,市场的恐慌导致泡沫的破灭。结果将导致真实经济、产出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避免泡沫破灭的唯一方式是避免泡沫,就是首先不让它浮现。但是这样做有悖于金融炒家的利益,它们不支持由政府对资本流动加以监管。前者不同意后者进行这种调整,同样也由于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不同。难怪,泡沫破灭后不久,便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股票的价值迅速地回落到两年前(1996年秋)的水平。同时,在国际范围内股票与资本流动的巨大重新分配发生了,又一次地使极少数人变得富有而更多的人变得贫穷。

评估从新兴市场中获得的收益必须考虑时间跨度,这些收益就是按时间跨度计算的。在某些时段看起来收益很高的投资,如果在另一个不同时期考虑,吸引力就相对很小。例如,即使转轨经济市场资本化规模只是发达股票市场的一小部分,但明确的事实表明仅在1996年,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的真实回报率就是发达市场的7倍多。然而,从较长的时间来观察,由国际金融公司编制的新兴市场(包括转轨经济)的

指数,在1993年底到1997年9月间下降了15%(以美元表示)。同一时期,华尔街的道琼斯指数是以前的两倍多。从1990年到1997年7月止,新兴市场的年收益率平均只有3.5%,而华尔街的收益大约为13%。然而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较高的收益,直到1998年的熊市。

因此,新兴资本市场不仅仅具有高收益,更确切地说是狂热和难以预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建议。当时,华尔街没有谁知道俄罗斯资本市场应该如何起步,莫斯科的监管到底应该如何。更糟糕的是,已有的知识也是被用来在新兴市场赚钱,而不是用来保护新兴市场的发展。许多时候,官方援助——本应该用于对私有化和资本市场建设提供技术支持(Blasi, Kroumova 和 Kruse, 1997)——被利用到其他方面。如 USAID——美国专门负责管理海外援助的机构,其中许多关于俄罗斯私有化项目的美国顾问,利用项目的信息,在俄罗斯证券市场进行私人投资(《经济学家》, 1997a),不幸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事件来揭露这样利用不对外公开信息谋利的行为。实际上,此类内幕交易,包括外国的合作伙伴,在转轨经济中是十分平常的事。由于来自一些国家的有影响的、关系密切的投资者的加入,此类事件不被人所知,因而也得不到应有的谴责。

因此,“新兴市场”应该更被看作一个新的成长的市场经济,而不只是一个新成长的金融市场,经常用于投机的目的,而不对真实经济和人民福利给予足够关注。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该被看成国际投资者的新的时髦市场。这些活动,由于外国储蓄的流入,可以增强资源缺乏国家的融资能力。所有的转轨经济都需要其他资本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长期外国资本对它们的发展是重要的。从这点看,转轨经济的形势发展是积极主动的,也正向正确的方向

变化,因为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资本(不像投机资本)一直在上升。

12.6 经济援助、直接投资和外国资本

在转轨初期,外国资本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但从长期来看,一定会是以私人部门为主。同样,初期的国际援助也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不考虑非生产性的军事援助,这些经济援助确实增加了对一些发生内部冲突国家的援助数字,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而最大的经济受援国是阿尔巴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均接受援助额也相对较高(见表36)。

表 36 1994—1996 年对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援助*
(排序按人均接受援助)

| 国 家 | 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百分比 | 每年人均额(美元) | 开放情况 |
|--------|-----------------|-----------|------|
| 匈牙利 | -0.1 | -3 | 1 |
| 乌兹别克斯坦 | 0.3 | 2 | 0 |
| 哈萨克斯坦 | 0.2 | 3 | 0 |
| 土库曼斯坦 | 0.6 | 6 | 0 |
| 乌克兰 | 0.4 | 6 | 0 |
| 罗马尼亚 | 0.6 | 9 | 1 |
| 俄罗斯 | 0.5 | 11 | 0 |
| 塔吉克斯坦 | 3.2 | 11 | 0 |
| 摩尔多瓦 | 1.5 | 13 | 1 |
| 捷克共和国 | 0.4 | 14 | 1 |
| 白俄罗斯 | 0.8 | 16 | 1 |
| 保加利亚 | 1.3 | 16 | 1 |

(续表)

| 国 家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每年人均额(美元) | 开放情况 |
|--------|-------------|-----------|------|
| 斯洛伐克 | 0.6 | 16 | 1 |
| 阿塞拜疆 | 3.4 | 17 | 0 |
| 拉脱维亚 | 1.0 | 22 | 1 |
| 爱沙尼亚 | 1.2 | 33 | 1 |
| 立陶宛 | 1.8 | 33 | 1 |
| 格鲁吉亚 | 8.2 | 35 | 0 |
| 吉尔吉斯斯坦 | 7.4 | 51 | 1 |
| 阿尔巴尼亚 | 8.5 | 53 | 1 |
| 亚美尼亚 | 8.7 | 54 | 0 |
| 波兰 | 2.6 | 72 | 1 |
| 克罗地亚 | — | — | 1 |
| 斯洛文尼亚 | — | — | 1 |
| 马其顿 | — | — | 1 |

—: 缺乏资料。

*: 援助定义为官方援助额加上贷款,再减去偿还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部分。数据为 1994—1996 的年平均值。

1 表示开放,0 表示封闭经济。

资料来源: Burnside and Dollar, 1997。

对此所作的政治解释是十分简单的。除了波兰之外,其余的所有国家都是小国。在 3 年内向爱沙尼亚人均提供 100 美元,如将其相同的援助总额给乌克兰,则后者所花费用要比前者大 35 倍。换句话说,在 1994—1996 年,向前者每年人均援助 33 美元,总额为 1 亿 5 千万美元,对于后者如果人均援助同样的金额,则援助额为 50 亿美元。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均 50 美元,如果与大得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均 2 或 3 美元相比,则前者令人印象深刻,但按接受人数来看,总数很小。“小的是好的”,外国给小国的援助验

证了这一点。给少数国家多一些美元比给许多国家少一点美元要容易得多。

由于在整个转轨中的先锋作用和快速走出社会主义体系,波兰被削减了大量债务^①。如果后社会主义变革从匈牙利开始,那么匈牙利将被减去债务,而波兰将在几年内背负无法处理的债务负担。然而,是波兰率先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因此在1991年,巴黎俱乐部官方贷款人作出了第一个关于所欠债务削减的决定,并且债务削减在随后的几年里继续进行。1994年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债务大削减,与伦敦俱乐部的贷款人签署了协议,两次共削减债务50%,其条件是进一步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步骤已经完成,而债务也得到削减。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从发达工业经济得到的最大金融援助。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也是在新兴波兰市场的一笔很好的投资。

在某种意义上,一些案例中的“援助”,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至于对转轨经济发放国际援助的经济理论基础,援助主要地针对那些结构性改革更超前的国家,或至少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有好的改革记录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几年来增长得比其他新兴市场快,这不仅仅对它们自己有好处,对提供援助的国家也是如此。同样,对于来自援助国家的投资者也是有好处的。如果提供援助是为了支持制度建设,则市场中的各种组织也对外国商业和投资者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更容易得到用于如下方面的援助

^① 与当时一般的估计相反,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至少对波兰的转轨是有利的。1991年与西方国家政府达成的减免债务协定,是受到西方国家对埃及债务减免一半的影响。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减免埃及的债务而同时对波兰不这么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是外国非直接投资),如金融可行性研究、私有化计划、建立股票交易所、从发达国家购买计算机硬件和培训银行职员;以下几个方面则较难得到外国资金;减少贫穷、减轻失业、支持文化机构、发展自己的计算机工业、培训医务人员等。虽然没有相关的分析,但是民间的证据很清楚地说明了更多的外国援助投向了金融部门的发展,而非用于缓解贫困。因此这些援助不应该被看作是慈善,而事实上更是一项好的投资,经常是人力资本上的投资。由于这种偏好和次序,吸收资本流入的经济更快地恢复并更快地成长,有机会得到这些援助的国家,以后靠自己也可以对后一类型的需求提供支持,尽管时间会晚一些。

援助不仅要申请,而且像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借贷一样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资本的转移需要特定项目的准备,并且依赖于特定改革的完成。这种条件欧盟审查得比较严格,有时会撤销早先安排好的援助计划,如1998年波兰的情形,由PHARE^①提议的34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捐赠被取消,主要因为波兰政府不能按要求提高项目质量。此种条件明显地与结构改革和制度建设相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转轨超前的国家能够得到更大的援助,同时说明了更多的援助使转轨更加平稳、速度更快。

因此,援助对经济政策有积极的影响——即使有限,但由于主要是投资性的而非消费性的——并且能够加快增长(Blustein, 1997)。在1997年其经济崩溃之前,阿尔巴尼亚(欧

^① PHARE是1989年建立的,是对波兰、匈牙利实施改革给予金融和技术援助的工具,是波兰和匈牙利经济改革促进会(Pologne & Hongrie Action par la Reforme Economique)的简称。后来,这一机构扩大范围,现在它的活动伸展到大多数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洲最落后的国家)便是如此。关于这个国家,外国经济上的援助使阿尔巴尼亚成为最大的受援国——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人均接受额——主要因为它在稳定化和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进步。后来它继续接收到了相对大的援助,这次是由于政策的失败,主要是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的失败。良好运行的波罗的海与中亚的后苏联小国,也因为是在制度转型上的进步而得到了较大的援助。这又是一次外国资本流动(包括援助)与全面经济运行之间的积极反馈。

真是历史的巧合,发达工业国家储蓄增长时期正好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过程相平行。这种现象开创了向外投资的一种新天地,如同500年前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特定意义上说,新兴市场也是服务于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目的,与美洲几个世纪前服务于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目的有相似之处。15亿人进行的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新兴市场对市场资本主义扩张的作用很大,这是10年前无法预见的。如果在90年代早期对于主要的投资银行与基金来说,后社会主义地区近乎平淡的话,现在这些基金或银行会很快地渗透到这个地区。

这些投资者多种多样:包括对冲基金,但主要是投资银行以及各种互助和养老基金。不像后社会主义经济的“退休付款”体系,在发达经济中社会保障已经演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基金。据Inter Sec Corp(一家研究公司)的数据,在1991—1996年间世界养老基金资产增长了几近60%,从5.4万亿美元增长到8.5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可能由于1997—1998年所有发达国家(除日本)的股市的泡沫而夸张,但是预计在以后5年中这些资产至少将增加两倍,在2001年超过17万亿美元。转轨国家以及其他的新兴市场,像是一块新发现的大陆,

为这些资金创造了另一个投资机会^①。

这没有什么错。如果形势相反且资本不去寻求外部市场,那么情况便不妙了。而且,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快速变化——首先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还有非洲,尽管变化程度很小——迫使转轨经济为了吸引外资的投入而竞争。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研究所(私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咨询机构)估计,1997年流向主要新兴市场经济的净私人资本从1996年达到较高记录的2810亿美元下降到2610亿美元。这主要由于流向亚洲的投资额下降了350亿美元(从1420亿下降到1070亿),拉丁美洲也下降了10%,而转轨经济的资本流入持续增长。由此可见,后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世界资本市场中进行有效竞争。由于在1998年发生东亚危机,这种竞争力又得到了新提高,目前这一竞争不仅包括争取新资本的流入,还包括如何保留已流人的资本。

这种竞争力的一部分因素是后社会主义经济希望被外国投资者看作是一个新兴市场,的确存在着被这样称呼的愿望。在1995—1996年,波兰成功地被列入美国的所谓“十大新兴市场”(Garten, 1998)^②,而它是唯一入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便可以吸引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对这些地区更高的关注。证券投资者是最积极的,其次是直接投资者,再就是出口商,最后是进口商。如果直接投资者之后是进口商、再次是出口商、最后是证券投资商,那么后一种次序对转轨经济来讲更为有利。由此,经济增长会更加强劲,经常项目赤字更小,而外商投资者的收益由于以更大的基数计算,也会更大。

① 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不用去消灭很多的印第安人。

② 这一类型的其他9个市场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印度、中国、东盟和韩国。俄罗斯还不其中。

转轨经济不仅开始以一个团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外国资本,而且它们内部也存在竞争,以尽可能地得到较大的份额。在90年代后半期的开始,转轨国家的首脑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和其他事务。他们与国际银行家、基金管理者交游,鼓励后者到他们的国家投资。开始,这些活动主要在东欧地区转轨较快的国家举行,但很快地在其他国家举行,包括前苏联的一些比较大的共和国,它们也加入了新兴市场。它们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项目并发行欧洲和全球债券以抵补它们的财政赤字。结果,不仅市场出现了,而且经常项目发生赤字,因为从转轨经济向工业国家的出口增长缓慢,而由证券投资导致的向相反方向的外流却很快。

在90年代,流向东欧和独联体等转轨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扩大,在1997年末达700亿美元,1998年末增长到900—1000亿美元。这个金额中的2/3由东欧地区吸收,1/3由独联体国家吸收。但是,这一数额与这些国家的需要相比,仍然太少了,如果与其他新兴场所吸引的直接投资相比也是如此。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计算,1996年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为3490亿美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直接投资只有150亿美元流向了转轨经济,只占总量的4%。这个资本的大多数流向了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也在增长,尤其在亚洲,包括中国和越南。

中国是新兴市场中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流量和存量来看都是如此,截至1996年累计达1690亿美元^①。仅在1996年,中国吸引了423亿美元的外资,大约是前苏联和东欧整个地区的3倍。然而,因为中国有12亿人口,如此

^① 紧随其后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较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巴西,到1996年末吸引外资额达到1080亿美元。

巨大的资金人均只有 35 美元,与这一年中的转轨经济相似,在 1997 年,转轨经济的平均值为 43 美元,其中东欧国家 86 美元,独联体国家 26 美元。1997 年年底,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2000 亿美元,有多达 23 万家的外资企业,其中 14.5 万家开始运营,外资企业雇佣了 1700 万的人口,缴纳了 1/10 的工商税收^①,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量的 40%。所有这些成就来自于连续而渐进的改革,外国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不同,后者会在任何动荡或激进政策时迅速到来或迅速撤离。

然而,投资于个别国家的资金有时在年度间变化很大,在某些部门的特定的私有化项目可能会改变总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状况。有趣的是,私有化进程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明显。如果对资本投入到新事业和绿色领域项目的支持足够坚定的话,即使私有化进程慢,也会吸引到很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通常与外国资本投向自然资源领域和能源部门的个别较大的投资计划相关。在银行部门、能源与电信部门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改变了某些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排名次序。早些时候,匈牙利在这些国家中排名最前,但是在 1997 年波兰取而代之成为东欧国家中累计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表 37)。

撇开中国不谈,将来俄罗斯将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因为很大数额的资本将投入到将要私有化的能源部门。即使人均的数额很小——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只有 13 美元和 26 美元——但这个国家在这两年里吸引了共 60 亿美元。这个数字仍小于波兰 1997 年一年的数额,但几乎是哈萨克斯坦的两倍,哈萨克斯坦人均引资是俄罗斯的 3 倍多(大约 73 美元和

^① 依据 1997 年 9 月 8 日《解放日报》的数字。

从非居民来。

表 37 外国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流入,百万美元)

| 国 家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估计 | 累计外国 直接投资 1989— 1997年 | 人均累计 外国直接 投资 1989— 1997年 | 人均外国 直接投资 1997年 |
|------------------|-------|-------|-------|-------|-------|-------|-------------|--------------------------------|--------------------------------------|-----------------------|
| | — | 32 | 45 | 65 | 89 | 97 | 33 | | | |
| 阿尔巴尼亚 | — | 32 | 45 | 65 | 89 | 97 | 33 | 369 | 115 | 10 |
| 保加利亚 | 56 | 42 | 40 | 105 | 82 | 100 | 575 | 1000 | 121 | 69 |
| 克罗地亚 | — | 13 | 72 | 95 | 83 | 509 | 500 | 1276 | 267 | 105 |
| 捷克共和国 | 511 | 983 | 517 | 749 | 2526 | 1388 | 1275 | 7473 | 726 | 124 |
| 爱沙尼亚 | — | 58 | 160 | 212 | 199 | 111 | 131 | 809 | 557 | 90 |
| 匈牙利 | 1459 | 1471 | 2339 | 1097 | 4453 | 1986 | 2100 | 13403 | 1519 | 207 |
| 拉脱维亚 | — | 43 | 51 | 155 | 244 | 379 | 415 | 1287 | 515 | 166 |
| 立陶宛 ^① | — | — | 30 | 31 | 72 | 152 | 327 | 612 | 165 | 88 |
| 马其顿 | — | — | — | 24 | 13 | 12 | 16 | 65 | 31 | 8 |
| 波兰 ^② | 117 | 284 | 580 | 542 | 1134 | 2741 | 3044 | 8442 | 218 | 79 |
| 罗马尼亚 | 305 | 662 | 1775 | 1846 | 3617 | 4445 | 6600 | 19250 | 497 | 171 |
| 斯洛伐克 | 37 | 77 | 94 | 347 | 404 | 415 | 998 | 2389 | 106 | 44 |
| 斯洛文尼亚 | — | 100 | 156 | 203 | 183 | 177 | 150 | 912 | 912 | 169 |
| 东欧 | 41 | 113 | 112 | 128 | 176 | 186 | 321 | 1074 | 538 | 161 |
| 亚美尼亚 | 2184 | 3216 | 4196 | 3753 | 9657 | 8252 | 9885 | 41111 | 357 | 85 |
| 阿塞拜疆 | — | — | — | 3 | 19 | 22 | 26 | 70 | 19 | 7 |
| 白俄罗斯 | — | — | 20 | 22 | 284 | 661 | 1006 | 1993 | 262 | 132 |
| | 50 | 7 | 18 | 10 | 7 | 75 | 100 | 267 | 26 | 132 |

(续表)

| 国 家 | 1991年 | 1992年 | 1993年 | 1994年 | 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估计 | 累计外国 直接投资 1989— 1997年 | 人均累计 外国直接 投资 1989— 1997年 | 人均外国 直接投资 1997年 |
|--------|-------|-------|-------|-------|-------|-------|-------------|--------------------------------|--------------------------------------|-----------------------|
| | | | | | | | | | | |
| 格鲁吉亚 | — | — | — | 8 | 6 | 25 | 65 | 104 | 19 | 12 |
| 哈萨克斯坦 | — | — | 473 | 635 | 859 | 1100 | 1200 | 4267 | 272 | 76 |
|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10 | 45 | 96 | 46 | 50 | 247 | 54 | 11 |
| 摩尔多瓦 | — | — | 14 | 18 | 73 | 56 | 71 | 249 | 58 | 17 |
| 俄罗斯 | — | 700 | 400 | 584 | 2021 | 2040 | 3900 | 9743 | 66 | 26 |
| 塔吉克斯坦 | — | 8 | 9 | 12 | 17 | 20 | 20 | 86 | 14 | 3 |
| 土库曼斯坦 | — | 11 | 104 | 103 | 233 | 129 | 108 | 632 | 139 | 23 |
| 乌克兰 | — | 170 | 200 | 100 | 400 | 526 | 700 | 2096 | 41 | 14 |
| 乌兹别克斯坦 | — | 9 | 73 | 73 | -24 | 50 | 60 | 216 | 9 | 3 |
| 独联体 | 50 | 905 | 1321 | 1613 | 3991 | 4750 | 7306 | 19900 | 70 | 26 |
| 总计 | 2234 | 4121 | 5517 | 5365 | 13648 | 13002 | 17191 | 61100 | 153 | 43 |

—: 缺乏资料。

① 文陶克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只有从1993年起的, 1993—1994年的数据只包括股权资本的投资。1995—1996年包括股权投资和再投资收益, 且不包括公司间的债务。

② 第二行的补充数据(黑体)来源于外国企业的一次调查资料(由 PAIZ 提供, PAIZ 是波兰的外国投资管理机构), 数据的不同, 部分地因为投资的种类和再投资收益的不同。

资料来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8年。

从休克到治疗。

76 美元)^①。1997 年底,东欧各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人均余额以匈牙利为最高(1519 美元),其次是捷克(726 美元)和爱沙尼亚(557 美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按人口计算最大的国家,分别为 66 美元和 41 美元。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计算外国直接投资的合适方式不是人均数额,而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以这个标准计算,在亚洲以中国与阿塞拜疆领先。后者在 1997 年被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十分可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4%,在东欧,最多的是拉脱维亚(5.4%)和保加利亚(5.6%),尽管在保加利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紧缩。最少的是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0.4%)和东欧的马其顿(0.5%)(表 38)。

表 38 流入转轨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1989—1997 年)

| 国 家 | 累计额 1989—1997 年 (占总额的百分比)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7 年 |
|-------|------------------------------|-----------------------|
| 匈牙利 | 25.2 | 4.7 |
| 俄罗斯 | 15.9 | 0.8 |
| 波兰 | 13.8 | 2.3 |
| 捷克共和国 | 12.2 | 2.4 |
| 哈萨克斯坦 | 7.0 | 5.7 |
| 罗马尼亚 | 3.9 | 2.9 |
| 乌克兰 | 3.4 | 1.4 |
| 阿塞拜疆 | 3.3 | 24.4 |
| 拉脱维亚 | 2.1 | 7.6 |
| 克罗地亚 | 2.1 | 2.7 |
| 斯洛文尼亚 | 1.8 | 1.8 |
| 保加利亚 | 1.6 | 5.6 |
| 斯洛伐克 | 1.5 | 0.8 |

^① 按照现值统计,1997 年对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是 33 亿美元,是波兰引资 30 亿美元(按同样基础计算)以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最高的(表 37)。

(续表)

| 国 家 | 累计额 1989—1997 年 (占总额的百分比)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7 年 |
|--------|------------------------------|-----------------------|
| 爱沙尼亚 | 1.3 | 2.8 |
| 土库曼斯坦 | 1.1 | 4.7 |
| 立陶宛 | 1.0 | 3.6 |
| 阿尔巴尼亚 | 0.6 | 1.4 |
| 摩尔多瓦 | 0.4 | 3.4 |
| 吉尔吉斯斯坦 | 0.4 | 3.1 |
| 白俄罗斯 | 0.4 | 0.7 |
| 乌兹别克斯坦 | 0.4 | 0.4 |
| 格鲁吉亚 | 0.2 | 1.3 |
| 塔吉克斯坦 | 0.1 | 1.8 |
| 亚美尼亚 | 0.1 | 1.6 |
| 马其顿 | 0.1 | 0.5 |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8 年和经济学家情报机构。

因为外国投资普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早期某些政治阶层对此的恐慌和不情愿已经消退。这种态度也是由于动机的改变,因为政治阶层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属于一种与流入外资紧密相联的集团——也就是一些商人团体、金融中介机构、绿色领域的投资或合资者;进一步地,公众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大多数越来越赞成外资吸引的增长。与以前他们了解的相反,他们的实践告诉他们这些投资并没有害处。这些投资提供了新的产品与服务,并为质量的提高和找到报酬更好的工作提供了机会。因此,这些投资导致了工作环境与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

12.7 开放、资本流动和四个政策难题

各国政府并不准备对外国资本开放所有行业,这是有一

定的理由的。例如,俄罗斯的能源部门、捷克的银行业、匈牙利的旅游业、斯洛文尼亚的房地产业,等等。这其中有许多的问题,如:是什么样的国家,在什么时间,公众的观念以及政治精英的看法。还存在一些确切的政策困境,不仅涉及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含义,而且也涉及到重要的政治、心理与道德的后果。讨论四个这样的困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们是:依赖性资本主义的风险、证券投资的不稳定性、全球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和资本外逃。

第一个困境是关于“依赖性资本主义”的风险。政府在将资产转移给外国人的时候,如何避免导致将转轨经济推入到“依赖性资本主义”的地位,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后社会主义经济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广泛的私有化意味着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获得。一个独特的性质是——不像其他新兴市场——中产阶级、甚至一些新的富有阶层也没有任何海外投资,在其他国家没有任何资产。因此,事实上,其他国家占有一部分转轨经济的资产,而转轨经济并没有拥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财富。如果这种不对称继续发展持续下去,便会成为一种“依赖性资本主义”,并带来一切政治影响。

对于资本流动,也存在一种不对称的风险,一些强大国家带来外国资本,而弱小者寻求资本,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工业和金融机构缺少资金,它们通常是弱小的一方而面临被强大的一方利用的威胁。当然,对付这种可能性的政策是优先形成自己的国家资本,但外国资本的份额仍然会不断增加,然而这些资本必须是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运作。

外国投资者会通过取得私有化的资产而占领某个行业,将其在海外制造的产品打进该市场以取得竞争力;而出卖这些资产的国家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微观经济重组和维护就业。

对冲基金为了投机和收益的目的,经常利用金融的动荡来更快地达到目的,政府通过给予足够高的收益可以较长时间地利用这部分流入的资本,但是收益也不能太高以避免国家财富的转移,所以在利用这些资金时必须注意保持金融的稳定。

虽然国际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稳定和流动性负责,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它也代表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和这些国家政府的期望和利益,而小国家及其政府还必须利用这些组织以服务于各自的政策目的,应该吸收合理的、但并不昂贵和长期的资金。

虽然条件——很明显是任何金融安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常是资本提供方的强处而且也是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方法,但资本接收方必须就此作艰苦的谈判努力。如果投资者要求过多的优惠条件,如:对有竞争力的进口物品予以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或关税减免等,政府一定不能接受这些让步,这会使得其他生产者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或使得预算收入减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应该鼓励争取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种资本流入通常是长期而稳定的。同时,它也受到国家法律和监管的约束,尽管并不直接且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外国直接投资时间较长,且有助于工业重组而增强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反过来支持了竞争力的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定位于国内市场,而且它们更应关心的是利用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进行出口,因此增强了出口导向的增长能力,从更长期来看,这对参与各方都是有利的。

私有化的范围和速度与外国资本在转轨经济中的投资额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和积极的反馈作用。国家资产的私有化越多越快,出卖的价格也越便宜,由于同样的原因,外国投入

该国经济的资金也越多。如果在私有化进行的同时,制度建设和金融稳定有平稳的进步,则此相关性会有力地促进增长。更好的制度和明智的自由化政策,比私有化和外国占有本国资产的非国有化,更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如果这些方面都达到了,那么便不是“依赖性资本主义”风险,而是转轨经济增长加速器开始运作。私有化和自由化吸引外国资本的流入,这些过程——在成熟的制度安排的支持下——又会加速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可以保证大量国内资本的形成,外国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进一步的吸收,又可以加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结果导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即快速、持久和公平的经济增长。从领先国家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这个规则,并且应该应用到其他国家未来的政策上。

自由化、私有化、外国投资与制度建设的这种内在关系,解释了为什么私有部门份额较大且吸引外资相对较多的国家的增长速度(或较高的收缩率)慢于那些私有部门份额较小且吸引外资相对较少的国家。对这两种类型国家的简单比较会支持以上的观点,如东欧的斯洛文尼亚与捷克,独联体中的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在1994—1998年捷克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小于3%,斯洛文尼亚大于4%,在这5年里俄罗斯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收缩,平均达4.2%,乌兹别克斯坦却增长0.7%。但是从私有部门所占的比重看,捷克高于斯洛文尼亚,俄罗斯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到1997年底,从人均外国直接投资的存量看,捷克大约高于斯洛文尼亚一半(分别是726美元与538美元),俄罗斯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7倍多(分别是66美元与9美元)。

第二个困境是证券投资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即使最自由化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都不情愿让外国资本进入所有的部

门。它们的流动性大大高于直接投资,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撤出,就像很容易地进入一样。因此,最好不让它们太容易地进入,因为到后来很难控制其流出。直接投资和所投资地区紧密相连,与此相反,证券投资——由于资本市场的监管是基于自由交易的基础上——实际上在动荡时可以撤离。

进一步地,资本的第二次缺乏,如已经投资并已在经济中运行的资本的撤离造成的资本缺乏,对经济运行的危害远远大于第一次缺乏,如缺乏用于计划项目和改革项目的资本。前者将有损经济的增长,导致国民收入萎缩和贫困的蔓延。而后者,只是工业能力没有增长而已,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萎缩。但是,资本撤离必然导致经济后退。

换句话说,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后果和政策含义,一个是缺乏资本,因为它从未来过,另一个是存在的资本又撤离,到后来资本会回来且经常如此,但是再往后,它还会撤离。这对于资本形成过程的持续与稳定造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并由此危害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个问题由于东亚危机的蔓延更为突出,在东亚这种风险确切地变成了灾难性的现实。原本设想会增进发展,结果资本急切地撤离,外国投资变成了外资大量涌出或外逃的过程。

因此,相关的政策不应仅关注吸引外国投资,而更应侧重于使这些投资尽可能长地保留在国内。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只需通过良好的基础条件、诱人的利差、稳定的金融与政治环境来保留这部分投资。这是必需的条件,但不足以使出于投机目的的投资转为长期的资本。只有这样,增长的储蓄流量才能为持续的增长与发展进行投资。这些投资的收益用于再投资的部分越大,越有利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然而,由于证券投资投机的特性,它们经常会波动;存在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现象。刚起步的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其市场比其他市

场有更大波动,尤其表现为外国证券投资的这种进出的波动。

只要新兴市场依旧包含以下两种含义,即狭义上的开始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广义上的新兴市场的制度秩序和文化,它们与已经建立的发达市场相比,就有着相对较薄弱的基础条件、不健全的监管和不太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如果说坚固的基础和健全的监管可以抵御市场恐慌的说法是正确的(尽管不总是如此,因为即使成熟的资本市场也不时地发生恐慌,如1987年华尔街的例子),那么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不符合这些条件的看法也同样正确。

因此它们应该做的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审慎的结构改革政策并努力保证稳定性。这样才能增强外国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包括证券投资者与直接投资者。一旦投资者发生恐慌,就没有任何重要的经济举措或官方政治声明可以很快地平息这种恐慌。市场的恐慌将导致像雪崩一样的资本外流。由于缺乏一种协调机制,市场自身又不能提供这种机制,投资者就会按“群居本能”行动。可见,一旦发生了危机,市场与政府都无法制止危机的传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能为力。

在墨西哥危机之后产生了“龙舌兰”效应,东亚危机也大范围地蔓延,但还没有发生在俄罗斯市场危机后的“伏特加”效应。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具有相对较好的基础条件、制度和政策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地不受到这种危机的影响。所以,转轨经济应更加注意实行外资自由化的进度与范围,因为只要投机资本有机会冲击一个转轨经济——后社会主义无疑属于这一类——危机就很可能发生,就如同狼袭击没有保护的羊一样,不管牧羊人的呼叫。

然而,从长远来看,在这乌云中也会出现一层银色。在波动市场里寻求收益的同时,对冲基金和许多机构投资者使这些市场增加了流动性,这结果往往会减少波动性并降低未来

投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将对冲基金也一起赶出市场的话,也至少应该消除它们带给新兴市场的风险,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然而,现在就供给和需求而言,都需要这些基金,因此它们也有利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资金的起落波动,也是全球经济和金融游戏的一部分。有人指出:对冲基金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有理由监督较难治的客户,反过来,对冲基金也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清扫队作用(Gotz-Richter, 1997)。对冲基金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现象并没有减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而使其作用更加提高,对转轨经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看,很明显地,自由资本和私人金融机构独自无法对开放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的监管。而且,它们还是许多问题发生的关键;投资者对收益的渴望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市场新的活动形式的出现,而当其中的某些活动成为障碍时,又产生了新的活动形式,结果它们又导致了新的问题,此时一味责备市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应该明智地加以处理,因此人们越来越对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及区域性发展银行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抱有期望。期望这些组织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由于资本进出波动导致的困境。

唯一有效的治疗转轨国家投机冲击的一套方法——这些国家不得不继续开放其经济并由此接受了全球资本的转移——是政府明智政策中良好的基础条件的建设以及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后者说明这些组织的官方和私人中介作用对政府和市场而言同样重要。这种政策将使得有敌意企图的投机更加困难,但是只要处于新兴市场,就不可能完全地避免这些投机。

转轨的讽刺性结果是前中央计划经济体之间发生了完全

没有计划的相互依赖。令人吃惊的是,波兰或匈牙利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两个国家是前苏联的核心共和国。然而,这次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以前已完全不同。相互的联系是通过新兴资本市场进行的,最大的前苏联共和国发生的动荡使其他新兴市场也产生紧张局面。它们对于匈牙利或波兰的作用,与对于阿根廷或巴西的作用是一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在国际舞台上对金融和资本市场没有政策协调,单个国家无法对付市场的压力,即使是那些基础条件好的、政策适当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转轨经济与其他国家区别不大。

第三个困境关系到全球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全球范围的新兴市场可以看作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的缓冲器(Weber, 1997)。与全球化、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先进信息技术和更明智的政府政策(通常由国际组织指导)一起,新兴市场被用来缓和富裕国家的周期性波动。

富裕国家认为新兴市场是它们周期性问题的一种保险杆,而由这种观点得出的政策对转轨经济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转轨国家被看作是圈外的世界,并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工业国家并不考虑其实行的全球经济政策对其他地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影响,那么这些情况对它们而言是次要的事情,它们只关注在新兴市场投资获取回报的高低。结果,在全球互相依赖的环境之中,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会遭受损害。

如果转轨经济可以充当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的缓冲,那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周期的利害关系又是怎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对谁有影响?没有合理的伙伴关系,能使例如捷克在德国经济滑坡时可以被充当经济周期的缓冲,但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如果这是经济具有相关性的逻辑结

果,那么它更应该成为国际上关心的政策问题。这里又一次地看到了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没有它们的支持,转轨经济不可能有效地避免受大多数先进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利用——不管它们是对冲基金、投资银行还是外国政府。

然而,这个问题比成功的或失败的投机者对比索或泰铢、林吉特或克朗、福林或卢布的袭击更加严重。对某些人是行动和政策的目标,而对另一些人则只是工具。对于转轨国家而言这是事实,同样也适应于另外 12 个或 2 个狭义上的新兴市场。如果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和高质量的增长是这些国家政策的目的,那么它们的状况可能正好是另一些国家寻求福利的手段。

新兴资本市场被贫穷的转轨经济看作是吸引外国储蓄和稳定资本形成的手段,也被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和政府看作是由前者向后者转移收益的手段。那么这是一种由新兴市场、转轨经济向发达国家也即富裕国家进行资产存量与收入转移的再分配。最后,原本设想的向贫穷国家的投资输入可能变成资本的净输出。结果使国际范围的不公平加剧。但这次变成了来自全球经济某个地方的古代富翁与来自另一个地方的暴发户之间的游戏。这对于国际范围的政策协调是一次严峻挑战。

第四个困境涉及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在特定环境下发生,制度落后、监管薄弱,加上资本流动性不断增高,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流动性不断上升——如果伴随着薄弱的金融基础和对资本转移的监管不恰当的放松——可能导致资本外逃。不是对投资收益的前景不看好,而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而导致将资金移到国外。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有时是不透明

的,如不正当的资金积累方式——包括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也是资本外逃的一个动力。

尽管几乎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到底有多少数量的资本由转轨经济转移到国外,但是可以肯定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数额真的是非常之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前任执行董事——雅克·德拉罗西埃(Jaques de Larosiere)——在该银行1997年年会上声明说,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仅1996年的资本外流数额就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投资的总额(《金融时报》,1997)。俄罗斯的例子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假如大约600—700亿美元流到国外是可信的话(《经济学家》,1997c)。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个金额可以抵消1990—1997年间在东欧和独联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虽然其他国家也发生此类资本外逃和向外转移的事,但没有到俄罗斯这样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怀疑,资本流出俄罗斯真的是其他地方存在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吗?所有投资者的答案不尽相同,至少某些国内投资者不愿意承受外国投资者投资许多私有化项目所接受的风险,当然,经常的情况是,国内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参与到这个游戏里,而是将资金存入金融中介机构,包括一些金字塔计划,这些储蓄被转移到国外。

另外,外流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不干净的钱,在洗钱到国外去之前不能在国内流通。相反,流入的外国资本的一部分也是不干净的钱,这次是在最大的新兴市场上洗钱得来的。薄弱的监管加上对洗钱打击得不够坚定使得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尽管不知其规模到底有多大。

可以相信,从俄罗斯流出的资本超过流入资本的好几倍,尽管对两种流动规模的估计方法不同。如果说仅仅在1996年,流出资本就达到约220亿美元,10倍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

资(据德意志摩根建富估计)是过分夸大的话,那么,自从转轨开始直到 90 年代中期,每年的资本外逃达到大约 120 亿美元看起来是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一部分以前外逃的资本又被转移回来,当然这笔钱财已经过貌似合法的处理。流入的证券和直接投资(尤其来自瑞士,塞浦路斯和开曼群岛)中不小的一部分,可以相信一定是返回的资本,是在以前外流出去的(Robinson, 1997)。同时资本所有权改变了并且进行了私有化。这些资本由不干净的国内储蓄变为干净的国外投资,而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也改变了。

与俄罗斯资本外逃的积聚是由于不适当的私有化和有组织的犯罪不同,在阿尔巴尼亚是由于有问题的金融金字塔的崩溃直接导致了资本外逃。资金流入一方有一种天真的动机,将储蓄投入到这些有吸引力的金融项目。资金输出一方则企图将资金输出国外。由于缺少足够的监管制度和政府的能力有限,没能有效地制止此类事件,而使得这种金字塔不断膨胀。对此,存在许多不同的估计,但是多数认为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很明显地,这个金额的大部分流出国外。如果没有第三者即外国组织的积极参与,这些金融病症——在俄罗斯、阿尔巴尼亚或其他国家——无法得到解决。

十分糟糕的是,这种不正当的资本积累、集中和转移的方式实际上为许多国际金融界所容忍,或者至少它们没有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法加以反对。国际金融组织、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某些智囊团和顾问没有为避免灾难作出适当的反应,但至少应努力缓解灾难。但在事实上,都做得太少或太晚——而且在没有原因或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是不会去做的。

尽管方法有点不同寻常,但是后社会主义资本的初次积

累及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联系,由于这些不当的金融行为而加速发展。这个问题的影响在将来不会太强,过去的也将成为过去。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现实:加速了新兴企业家的产生,加强了资本的集中以及建立了国际间的联系。但是消极的政治和心理的影响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利于人们对转轨和全球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这对制度安排和市场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某些人可能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已经加快,然而制度建设、行为改变及市场文化的演进却被推迟了。还有一个迷惑是更多的资本通过这样的方式积聚起来了。这种重新分配导致了一些资本集团的产生和资产的过度集中,最终危害了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可能危害性还不止这两方面。

V

展望未來

13

长远的前景

13.1 可选择的路径：停滞、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转轨期最初几年的困难过后，尽管面临着经济衰退引发的挫折，但最近对于未来发展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乐观态度。这种信心所基于的理由是双重的：

首先，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在经历了几年之后，转轨经济已经走出谷底，正在为进一步增长积聚能量。这种观点也适用于那些经过几年复苏后，已经或现在仍在经历第二波经济衰退的国家。1990—1997年间，这种情况已在4个国家发生，即阿尔巴尼

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参见表 13)。复苏和增长的根基是如此脆弱,以致不能可信地预测未来将会怎样。短期的加总就是长期,但屡屡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未能预见到的因素的影响,即使短期的预测也不能实现。

有许多例子说明了这类事态的发展进程。如果在转轨期的最初几年就能够说明,例如在波兰(当时类似波兰的情况有许多),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下降了 4 倍多,而不是错误地预测为仅减少了 3.1%,那么就很难原谅当前的这种缺陷。例如,到 1996 年 12 月,当时预测由于 1996 年减少了 6.0%,保加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6—1998 年间应该从 100% 降至 99%,在 1997 年将增加 0.4%,1998 年将增加 4.8%(PlanEcon, 1996)。但到了 1997 年 10 月,人们认为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到 1995 年已实现水平的 85%,这次是由于 1996 年降低了 10%(而不是 6.0%),1997 年又将降低 7.0%(而不是以前预测的增长 0.4%),1998 年将仅小幅增长 1.5%(而不是以前预测的增长 4.8%)。这样,在短短 10 个月的时间内,3 个有威望的组织——位于华盛顿的 PlanEcon、位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 ING 巴林银行欧洲新兴市场部——把它们对保加利亚 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由 0.4% 降为 -7.0%。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但还可以毫不困难地举出更多的例子。有些预测确实提供了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完整的一系列预计数,即使对一段很短的(以及和平的)时期也是如此,例如对 1997 年的预测(表 39)。

不同的预测之间差别很大。如果说由于政局原因,地区冲突显著的塔吉克斯坦的不可预测性尚可解释,那么对于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和平国家而言,预测的差异就有些奇怪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 1997 年 2 月预测将有 8% 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学家情报机构只保守预测了 3.2% 的增长。在罗

表 39 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的比较(%)

| 国 家 | 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 (1997年 2月) | 联合国调 查组织 (1997年 1月) | 欧盟 (1996年 10月) | PlanEcon (1996年 12月) | 经济学家 情报机构 (1997年 1月) |
|--------------|-------------------------------|------------------------------|----------------------|----------------------------|-------------------------------|
| 东欧 | | | | | |
| 阿尔巴尼亚 | * | 6.0 | — | 7.7 | 6.0 |
| 保加利亚 | -4.0 | 0.0 | -3.1 | 0.4 | -1.0 |
| 克罗地亚 | 5.5 | — | — | 4.9 | 6.0 |
| 捷克共和国 | 4.0 | 5.0 | 5.3 | 4.8 | 4.0 |
| 爱沙尼亚 | 4.0 | 3.0 | 4.5 | 5.4 | 3.5 |
| 匈牙利 | 2.5 | 2.0 | 2.7 | 3.9 | 3.0 |
| 拉脱维亚 | 4.0 | 1.7 | 2.2 | 5.2 | 3.0 |
| 立陶宛 | 4.0 | 1.5 | 2.7 | 5.8 | 3.7 |
| 马其顿 | 5.0 | — | — | 4.5 | 5.0 |
| 波兰 | 5.5 | 5.2 | 5.1 | 5.5 | 5.3 |
| 罗马尼亚 | -2.5 | 4.0 | 4.2 | 5.4 | 4.0 |
| 斯洛伐克 | 5.0 | 5.0 | 4.6 | 5.5 | 4.4 |
| 斯洛文尼亚 | 4.0 | — | 4.1 | 5.2 | 4.0 |
| 平均值 | 3.1 | 3.3 | 3.2 | 4.9 | 3.9 |
| 独联体国家 | | | | | |
| 亚美尼亚 | 7.0 | — | — | 4.7 | 4.5 |
| 阿塞拜疆 | 5.0 | — | — | 7.4 | 4.0 |
| 白俄罗斯 | 0.0 | — | — | -0.5 | 3.0 |
| 格鲁吉亚 | 10.0 | — | — | 8.2 | 6.0 |
| 哈萨克斯坦 | 2.8 | 1.5 | — | 1.2 | 2.5 |
| 吉尔吉斯斯坦 | 8.0 | — | — | 5.2 | 3.0 |
| 摩尔多瓦 | 5.0 | — | — | 6.0 | 5.0 |
| 俄罗斯 | 1.5 | -1.0 | 2.5 | 0.9 | 1.0 |
| 塔吉克斯坦 | -3.0 | — | — | -5.0 | -10.0 |
| 土库曼斯坦 | 5.0 | — | — | 2.2 | 5.0 |
| 乌克兰 | -2.0 | -2.2 | -2.0 | -2.1 | -3.0 |
| 乌兹别克斯坦 | 1.0 | — | — | 4.5 | 1.0 |
| 平均值 | 3.4 | -0.6 | 0.3 | 2.8 | 1.8 |

* : 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十分不稳定,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没有对该国作预测。
—: 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7a。

马尼亚最乐观的预测(PlanEcon 预计有 5.4% 的增长)和最悲观的估计(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预计负增长 2.5%)之间的差异达 8 个百分点。在立陶宛这一差异也超过 4 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该国经济会稍有复苏,增长 1.5%,而 PlanEcon 则认为该国将快速增长 5.8%。如果说在塔吉克斯坦,地区冲突的可能结果能够解释各种预测之间的差别,那么对其他国家而言,唯一的解释是转轨经济的未知性和不可测性。

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是,不应只从这些相互矛盾的预测中得出统计上的平均值,而要对这些预测本身采取保留态度。转轨经济中没有任何永远不变或十分确定的事物,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步伐也是不可预见的,虽然如此,也还是有理由赞成“经济增长能够(这不意味着将会)在长期内加快和持续”这一乐观看法。除白俄罗斯,PlanEcon 预测它在 1998—2002 年的年均增长只有 0.7% 外,对其他 25 个转轨经济国家的预测从斯洛伐克的 3.8% 和乌克兰的 4.0% 到阿塞拜疆的 9.7% 和格鲁吉亚的 9.3% 不等。按照这些估计和预测,东欧 11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4.9% (该预测中省略了波黑),前苏联 15 个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4.3%。因此,所有转轨经济地区未来 4 到 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将处于 4% 到 6% 之间。然而,到 2002 年它们中只有 1/3 能够恢复到转轨前的产量。在这 9 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即乌兹别克斯坦和爱沙尼亚是前苏联共和国(表 40)。

尽管对未来下结论有风险,如果对最近的评估仍然得出许多矛盾结论的话,人们还是能大致预计增长趋势。一方面,根据后社会主义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机制,另一方面根据 1999—2002 年的中期增长预测(见统计附录第二部分),人们能够大致勾勒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发展趋势。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以各种不同方法计算得来)和国内生

表 40 转轨经济 1998—2002 年经济增长预测,按 1998—2002 年年均增长率和 2002 年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89 年为 100)排列

| 国 家 | 国内生产 总值指数 (1989 年 为 100) | 1998 年 | 1999 年 | 2000 年 | 2001 年 | 2002 年 | 1998—2002 年年均增 长率 | 排名 | 2002 年国 内生产总 值指数 (1997 年 为 100) | 2002 年国 内生产总 值指数 (1989 年 为 100) |
|--------|-----------------------------------|--------|--------|--------|--------|--------|-------------------------|----|---|---|
| 波兰 | 111.8 | 6.5 | 5.9 | 5.8 | 5.8 | 6.1 | 6.0 | 7 | 133.9 | 149.8 |
| 斯洛文尼亚 | 99.3 | 4.1 | 4.1 | 4.8 | 4.2 | 4.9 | 4.4 | 20 | 124.1 | 123.3 |
| 阿尔巴尼亚 | 79.1 | 10.2 | 9.7 | 10.6 | 8.6 | 3.7 | 8.6 | 4 | 150.6 | 119.1 |
| 斯洛伐克 | 95.6 | 4.0 | 2.3 | 2.5 | 5.0 | 5.0 | 3.8 | 22 | 120.2 | 114.9 |
| 捷克共和国 | 95.8 | 1.4 | 3.3 | 4.3 | 4.5 | 4.7 | 3.6 | 24 | 119.5 | 114.5 |
| 匈牙利 | 90.4 | 5.4 | 4.6 | 4.5 | 4.8 | 4.5 | 4.8 | 19 | 126.2 | 114.1 |
| 乌兹别克斯坦 | 86.7 | 5.8 | 4.3 | 4.9 | 4.5 | 4.5 | 4.8 | 16 | 126.4 | 109.6 |
| 爱沙尼亚 | 77.9 | 6.4 | 5.5 | 5.9 | 5.6 | 5.9 | 5.9 | 8 | 132.9 | 103.6 |
| 罗马尼亚 | 82.4 | -2.1 | 3.3 | 5.8 | 5.5 | 4.9 | 4.9 | 21 | 118.4 | 97.6 |
| 克罗地亚 | 73.3 | 5.5 | 3.4 | 5.4 | 5.4 | 4.9 | 4.9 | 15 | 127.1 | 93.2 |
| 吉尔吉斯斯坦 | 58.7 | 6.5 | 6.8 | 6.0 | 5.5 | 5.6 | 6.1 | 6 | 134.3 | 78.8 |
| 保加利亚 | 62.8 | 3.5 | 5.4 | 5.7 | 4.4 | 4.0 | 4.6 | 18 | 125.2 | 78.6 |
| 南斯拉夫 | 62.7 | 3.7 | 2.3 | 3.9 | 5.0 | 6.0 | 4.2 | 9 | 122.7 | 76.9 |
| 哈萨克斯坦 | 58.1 | 4.4 | 3.8 | 4.9 | 7.0 | 7.0 | 5.4 | 11 | 130.1 | 75.6 |
| 拉脱维亚 | 56.8 | 6.0 | 3.9 | 4.6 | 5.8 | 5.7 | 5.2 | 12 | 128.8 | 73.2 |
| 白俄罗斯 | 70.8 | -7.1 | -1.5 | 2.7 | 3.7 | 5.5 | 0.7 | 26 | 102.8 | 72.8 |
| 土库曼斯坦 | 48.3 | 4.7 | 12.1 | 16.0 | 3.5 | 4.2 | 8.1 | 3 | 146.8 | 70.9 |

• 资料来源:IMF

(续表)

| 国 家 | 国内生产 总值指数 (1989年 为100) 1997年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8—2002 年年均增 长率 | 排 名 | 2002年国 内生产总 值指数 (1997年 为100) | 2002年国 内生产总 值指数 (1989年 为100) |
|-------|--|-------|-------|-------|-------|-------|-------------------------|-----|--|--|
| 马其顿 | 55.3 | 2.8 | 3.4 | 3.4 | 4.9 | 5.0 | 3.9 | 17 | 121.1 | 66.9 |
| 阿塞拜疆 | 40.5 | 7.1 | 9.0 | 10.7 | 11.2 | 10.7 | 9.7 | 1 | 159.1 | 64.4 |
| 俄罗斯 | 52.2 | -0.4 | 2.7 | 4.2 | 4.8 | 4.7 | 3.2 | 25 | 117.0 | 61.0 |
| 亚美尼亚 | 41.1 | 6.6 | 6.5 | 6.7 | 7.8 | 6.9 | 6.9 | 5 | 139.6 | 57.4 |
| 立陶宛 | 42.8 | 5.0 | 5.0 | 5.7 | 5.1 | 4.9 | 5.1 | 13 | 128.5 | 55.0 |
| 格鲁吉亚 | 34.3 | 10.2 | 10.1 | 9.3 | 9.1 | 7.6 | 9.3 | 2 | 155.7 | 53.4 |
| 塔吉克斯坦 | 40.0 | 4.5 | 5.1 | 5.7 | 6.0 | 6.1 | 5.5 | 10 | 130.6 | 52.2 |
| 乌克兰 | 38.3 | 1.2 | 3.0 | 4.8 | 5.2 | 6.0 | 4.0 | 23 | 121.8 | 46.7 |
| 摩尔多瓦 | 35.1 | 1.2 | 6.6 | 5.0 | 6.3 | 5.8 | 5.0 | 14 | 127.4 | 44.7 |

资料来源:PlanEcon 预测 1998a 和 1998b, 以及作者根据表 13 数据计算得来。

产总值吸收(即私人消费和投资)增长率的不同,人们可以预计一些发展趋势(表 41)。

能够预期到的第一个趋势是进一步自由化和开放的结果,但此时是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就是按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会缩小。这一趋势十分明显,下表中指数 A,即 1999—2002 年按市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之比,就显示了这一点。每个国家的这一比率都大于 1,而且差额是有含义的。如果这一趋势成为现实,市场交易价格将趋近于购买力平价价格,现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处于 1.5 到 2.0 之间,将会逐步降低。

表 41 1999—2002 年增长率 - 结构变动指数

| 国家 | A | B | C | D | E |
|--------|-------|-------|-------|-------|-------|
| 阿尔巴尼亚 | 1.134 | 1.020 | 1.496 | 0.931 | 0.982 |
| 亚美尼亚 | 1.388 | 1.016 | 1.156 | 0.887 | 1.057 |
| 阿塞拜疆 | 1.386 | 1.047 | 1.503 | 0.817 | 0.964 |
| 白俄罗斯 | 1.581 | 1.016 | 1.127 | 0.934 | 1.005 |
| 保加利亚 | 1.411 | 1.011 | 1.181 | 1.009 | 1.000 |
| 克罗地亚 | 1.166 | 0.995 | 1.112 | 0.946 | 0.929 |
| 捷克共和国 | 1.508 | 1.006 | 0.979 | 1.030 | 0.962 |
| 爱沙尼亚 | 1.391 | 1.009 | 1.020 | 0.958 | 0.975 |
| 格鲁吉亚 | 1.346 | 1.022 | 1.367 | 0.839 | 0.897 |
| 匈牙利 | 1.177 | 1.005 | 1.087 | 0.977 | 0.984 |
| 哈萨克斯坦 | 1.188 | 0.998 | 1.236 | 0.998 | 0.963 |
| 吉尔吉斯斯坦 | 1.124 | 1.057 | 1.379 | 0.931 | 0.981 |
| 拉脱维亚 | 1.149 | 0.981 | 1.288 | 0.942 | 0.963 |
| 立陶宛 | 1.195 | 1.003 | 1.067 | 0.965 | 1.000 |
| 马其顿 | 1.092 | 1.027 | 1.138 | 0.955 | 0.981 |
| 摩尔多瓦 | 1.118 | 1.008 | 1.744 | 0.977 | 0.990 |
| 波兰 | 1.240 | 1.004 | 1.021 | 0.977 | 0.904 |
| 罗马尼亚 | 1.237 | 0.991 | 1.157 | 0.970 | 0.981 |

(续表)

| 国家 | A | B | C | D | E |
|--------|-------|-------|-------|-------|-------|
| 俄罗斯 | 1.388 | 0.914 | 1.150 | 0.979 | 0.979 |
| 斯洛伐克 | 1.110 | 1.003 | 0.939 | 0.990 | 1.002 |
| 斯洛文尼亚 | 1.074 | 0.994 | 1.094 | 0.960 | 0.981 |
| 塔吉克斯坦 | 1.460 | 1.083 | 1.155 | 1.057 | 0.963 |
| 土库曼斯坦 | 1.533 | 1.054 | 0.849 | 1.201 | 0.964 |
| 乌克兰 | 1.269 | 0.998 | 1.139 | 0.972 | 0.973 |
| 乌兹别克斯坦 | 1.508 | 1.113 | 0.956 | 0.994 | 0.981 |
| 南斯拉夫 | 1.224 | 1.016 | 1.362 | 0.939 | 0.962 |

A: $\frac{\text{按市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text{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B: $\frac{\text{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text{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C: $\frac{\text{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text{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D: $\frac{\text{私人消费增长率}}{\text{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E: $\frac{\text{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text{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附录第二部分数据计算得来。

第二个趋势由指数 B 表现出来,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的本国货币计算)平均增长率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之比。可以预见到,在许多国家本国货币的升值过程将会持续,从而减小了国民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真实价值与用各国货币按不变价格表示的国民收入值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一指数大于 1,则国际经济运行的效率将发生相对增长,其国际竞争性也会有所提高,反之,如果这一指数小于 1,情况则相反。转轨经济中只有 1/3 的国家这一指数低于 1,这意味着会有相反的情况发生,即本国货币发生一定贬值。只有俄罗斯例外,它的这一指数明显偏低,只有 0.914。这也许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预测在

那段时期有 4.1% (按 1998 年卢布的不变价格计算出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外延而不是内涵增长因素, 其经济将增长更多。这两个趋势都表明, 这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将会是持续的。

由指数 C、D 和 E 表明的第三个趋势说明, 除了少数国家外, 大部分国家将会是增长型的。指数 C, 也就是总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 表明资本形成的过程将会增强。这是由边际储蓄倾向的增长, 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造成的, 这一点也可由指数 D 和 E 表明。如果 D 和 E 的数值小于 1, 则资本形成过程将快于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将给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国内资本的形成始终是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外资的流入虽然重要, 却只能起次要作用。只是在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指数 C 预计会小于 1, 这意味着消费增长将快于投资。如果这一情况果然发生, 那么就会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 最终这一现象将会减缓 2002 年后的增长率。

之所以对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的第二个原因, 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这些转轨经济国家都将经历更快的经济增长。1997 年世界银行预计未来 25 年内这批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将高达 5%—6%, 而发达国家只会增长 2.5% (世界银行, 1997c)。在发展中国家中,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五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每年 5.8%。^① 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因其增长步伐和在世界经济中相对较大且日益增大的比重,

^① 一个有趣而又不幸的巧合是, 在世界银行对这些大型新兴市场表示出浓厚关注后不久, 它们却给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带来大 (比过去更大的) 麻烦。

表 42 1974—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 1992—2020 年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份额(%)

| 国家或组别 | 年均增长率 | | | | | | | | | |
|-------------------------|-----------------------|------------|------------|------------|------------|------------|------------|-------|----------------------------|--|
|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① | | | | 资本存量 | | 总要素生产率 | | 占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份额 ^② | |
| | 1974—1982年 | 1982—1992年 | 1992—1995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年 | 2020年 | |
| 世界 | 2.6 | 3.0 | 2.4 | 2.9 | 3.6 | 0.5 | 100.0 | 100.0 | 100.0 | |
|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 2.3 | 3.1 | 2.2 | 2.5 | 3.3 | 0.3 | 84.2 | 84.2 | 70.9 |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 2.2 | 2.9 | 2.0 | 2.4 | 3.1 | 0.3 | 81.5 | 81.5 | 66.7 | |
|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③ | 8.0 | 8.7 | 7.4 | 4.9 | 6.0 | 1.3 | 2.3 | 2.3 | 3.8 | |
| 香港地区 | 7.7 | 9.3 | 7.8 | 4.0 | 4.0 | 1.1 | 0.3 | 0.3 | 0.4 | |
| 发展中国家 | 3.7 | 2.6 | 3.1 | 5.4 | 6.0 | 1.3 | 15.7 | 15.7 | 29.1 | |
| 五大国 | 4.4 | 2.7 | 3.3 | 5.8 | 7.2 | 1.7 | 7.8 | 7.8 | 16.1 | |
| 中国 | 6.5 | 10.3 | 12.5 | 7.0 | 9.5 | 2.2 | 1.4 | 1.4 | 3.9 | |
| 印度 | 4.4 | 5.4 | 5.5 | 5.8 | 6.7 | 1.9 | 1.0 | 1.0 | 2.1 | |
| 巴西 | 4.3 | 1.8 | 4.8 | 4.6 | 4.6 | 1.1 | 1.7 | 1.7 | 2.5 | |
| 印度尼西亚 | 6.8 | 7.1 | 7.6 | 6.9 | 6.9 | 1.9 | 0.6 | 0.6 | 1.5 | |
| 转轨国家 | 3.8 | -0.7 | -5.4 | 5.5 | 7.0 | 1.7 | 3.2 | 3.2 | 6.0 | |
| 东盟三国 ^④ | 6.3 | 5.6 | 7.7 | 7.1 | 6.7 | 2.0 | 0.8 | 0.8 | 2.4 | |
| 其余南亚国家 | 5.3 | 5.2 | 4.0 | 5.2 | 5.7 | 1.4 | 0.3 | 0.3 | 0.6 | |

(续表)

| 国家或组别 | 年均增长率 | | | | | | | | | |
|---------------|-----------------------|------------|------------|------------|------------|------------|------------|-------|----------------------------|--|
|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① | | | | 资本存量 | | 总要素生产率 | | 占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份额 ^② | |
| | 1974—1982年 | 1982—1992年 | 1992—1995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2020年 | 1992年 | 2020年 | |
| 其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 3.0 | 2.0 | 2.2 | 4.2 | 4.0 | 0.9 | 2.1 | 2.9 | | |
|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 | 2.2 | 2.0 | 2.1 | 4.2 | 3.4 | 0.8 | 1.2 | 1.7 | | |
| 中东和北非国家 | 2.2 | 2.0 | 2.1 | 4.2 | 4.1 | 0.3 | 2.3 | 3.1 | | |
| 世界其他国家 | 3.3 | 2.4 | 2.6 | 5.6 | 5.8 | 1.4 | 1.2 | 2.3 | | |

①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1992年美元不变价格。

②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

③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c。

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五大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预计将从 90 年代中期的 8% 上升到 2020 年的 16% 左右,在出口领域五大国会有更大的进步。它们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将从 9% 上升到 22%,其中一半左右(约 10%)将来自中国(表 42)。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这些预测却都要重新修正了。而且不仅仅这些乐观的预测受到了质疑,连作为这些预测基础的理念和假设也变得毫无道理。一方面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蔓延及其之于全球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持续的经济萧条,到 1998 年人们已不像 1997 年那样乐观。印度因进行核试验而遭到工业化七国集团的经济制裁之后出现了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这一制裁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进行,同时也部分源于世界银行对此的支持。因此看起来五大国中会有最佳经济表现的国家是巴西,然而由于结构原因和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也未能像预期那样增长。因此在这一年中,改变的不仅仅是预期和预测,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策也不得不重新审议并作出变动。

虽然 1997 年人们预计印度尼西亚的强劲增长会持续,但到 1998 年世界银行估计该年度印尼经济会萎缩 15% 左右。据估计,印尼已有 5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小于 1 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约 200 万的失业人口。但如果实行了符合布雷顿森林组织要求的适当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话,1999 年之后印尼经济就会复苏。这一设想的一个前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后果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类似,1994 年 12 月比索贬值后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国内生产总值先是负增长 7%,然后又上升了 7%。但是东亚的经济萎缩持续时间将更长,复苏也将来得更慢,因为危机的扩散没有得到控制,资本流出的数量也前所未有的。和转轨经济相比,东亚经济复苏会更快更早一些,但不会像墨西哥那么快。

至于转轨经济国家,世界银行(1997c)预计1992年至202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5%,这低于印度尼西亚(6.9%)和其他3个东南亚经济联盟国家,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7.1%)。虽然这是长期估计,但一年之后,1998年转轨经济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名单之首。不幸的是,出现这一结果并非由于这些国家能在未来加速其增长从而改变了有关预测,而是由于东盟和五大国在名单上位次下降了。^①

然而,从一开始对转轨经济的预测也显得过于乐观了。考虑到1992—1996年它们的年均增长为-5.1%,1997—1998年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2.0%(参见表8),这表明1999—2020年这些国家的产出将平均增长7.6%。这将使其生产增加4倍以上,并使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翻一番,从目前的3.2%上升到2020年的6.0%。^②但是达到并长期保持这一高速增长,从而使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便翻一番是否真的可行呢?

因为不是所有的转轨经济都能有类似的增长率,所以有些国家的增长率会更高,比如每年接近10%,另一些国家则低些。但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会大于前一种,也就是说,更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比乐观估计值低而不是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曾几度成为自身过分乐观的受害者,这一次它们似乎又夸大了其对未来增长的乐观估计。

乐观是件好事,但过分乐观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在发展政

① 当然,印度尼西亚同时属于两个组别——五大国和东盟,但表42中将其列入五大国,而不是东盟。俄罗斯既属于五大国又属于转轨经济,表42中将其列入转轨经济。

② 必须记住,1990—1996年转轨经济萎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了1/3,使得这一指标从1989年的4.0%下降到7年后的3.2%。

策上。相信 20 多个国家会在 20 多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的确令人欣慰,但这只是一个想法,而且可能会令人沮丧。既然世界会变得如此美好,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使之更加美好?对整个转轨经济的估计实际上至多只会在表现最好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只有少数国家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但即使是对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而言,20 多年保持近 8% 的增长率也几乎是不现实的,这只能在极少数国家实现。预计所有的转轨经济都将出现这种结果不仅仅是又一次的过分乐观,简直就是缺乏现实头脑。

把国家按地缘政治或制度标准进行分类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但从长期观点看,考虑到所有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不能仅从未来增长这个角度把它们看成同质的一组国家。这些国家在 21 世纪将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某些国家会经历持续的停滞,另一些会经历长久的增长,还有一些会持续发展。所有的国家都有政策因素在起作用。

13.2 乐观预测、黯淡前景和明智的政策

除了过分乐观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使人们对未来产生疑虑,在世界银行对世界经济及未来发表了有史以来最为乐观的估计之后不到一年时间,第一届克林顿内阁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就已经有了不同看法。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他虽然和其财政部的同僚一道为布雷顿森林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解决方案而努力,但他曾警告事情可能会朝令人不快的方向发展。赖克 1998 年曾说:“想一想大环境吧:东亚各国货币摇摇欲坠,银行资不抵债;拉美最大的国家失业不断上升,整个地区实际工资不断下降;欧洲经济停滞、失业持续;美国消费者的举债能力已快接近极限。随着全

球经济的放慢,社会动乱威胁着我们。”(Reich, 1998)有趣的是,这一警告却未包含中国发生危机的风险。至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它们不被认为会取得成功,而且由于传统上(而且错误地)认为其在世界经济中意义不大,而在这幅图景中就省略了。

如果世界经济前景黯淡,必然地人们会认为转轨经济也会发生负面情况。如果这真发生的话,将会加重全球经济的减缓趋势,虽然其程度不如东亚危机。尤其是1998年,人们常常提到东亚危机,认为类似情形也会在转轨经济中发生。然而,人们过分重视并夸大了两类国家的相似点,却忽略了它们的不同之处。1998年5月在基辅召开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上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警示。一些发言者提到了亚洲和中欧、东欧及前苏联之间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包括一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腐败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发言者都特别强调本地区国家要尽快完善其金融体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代理总裁查尔斯·弗兰克(Charles Frank)说,这一地区的投资者常常遇到诸如官僚作风、设计和管理都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高度犯罪和腐败等问题。在这一地区的公司中,股东权力受到忽视,缺乏透明度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对利益冲突态度漠然,人们都十分乐意行贿和受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b)。

这些类似之处当然不能忽视,但也不能夸大,必须正确对待。一方面,危机发生前东南亚国家的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情况比转轨经济要好得多。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经历了20年到30年的高速增长,而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则经历了和平时期10年最大的经济滑坡。两组国家有着如此不同的历史,今天却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在东南亚危机得到解决和转轨国家作了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之后,两组国家在长期

增长上将面临更加类似的未来。

当然,转轨国家也会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扩张时进行的自由化不仅给各国带来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也使得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动荡的威胁。20世纪没有任何一类国家像后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快地向开放经济过渡。在经历了10年转轨之后,它们中的许多成员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比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要自由和开放。因此,大多数转轨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仅靠本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存在的话。这就是转轨和全球化同步发展的结果。

自由化和开放的后果是这些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决策不再对某些过程起决定作用。另外必须说明的是,现在这些过程常常令这些国家的当局吃惊。在莫斯科或布拉格,在塔什干或Ljubljana,在布加勒斯特或Biskek的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事,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当地的议会、总统、政府或中央银行,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全球金融市场或某些其他更重要的地方,如伦敦、纽约、法兰克福和东京。如果这些市场不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相对弱小经济的利益的情况下重新管理的话,这些弱经济国将很难迎接挑战,其稳定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后果将不仅仅取决于其影响范围,更取决于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如果危机发生在诸如阿尔巴尼亚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问题将不会太严重,这不仅因为牵涉的国家较小,主要还因为危机根本没有扩散的风险。但如果这一危机发生在波兰、俄罗斯或乌克兰,那么它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问题。危机的后果同时也取决于时间。显然,紧接着东南亚危机之后便在一个转轨经济大国出现的危机,对区域或全球经济的

影响会远远超过平稳时期的危机。然而,从国际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有多少短期外资投入了这些国家,从而这些国家面临的资本外逃风险有多大。

我们知道后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危机,但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发生。但这种认识本身就已经十分重要了。因为人们一旦得知某件不幸事件将要发生,就能更充分地进行预防,以避免或防止其发生。避免黯淡前景变为现实的一种方法是想象有这么一种前景并努力防止它变成现实。这样控制起来就较为容易。在实施“波兰战略”期间,这种黯淡前景就存在并不时被更新。毫无疑问,1994—1997年出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方法的成果。

然而,发生危机并不是因为人们缺乏如何避免危机的理论知识,而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及时解决导致不幸后果发生的利益冲突。这和战争的情形一样。因此,最重要的是就利益冲突、游说集团(尤其是非正式游说集团)的活动方式,以及国内、国际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潜在冲突进行公开辩论。认为人人都站在转轨经济和社会的立场上做事,这并非事实。实际上在国内及国际金融和经济舞台上许多人往往利用这点。因此,转轨经济国家更需要长期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和当前的政策一道实施,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为转轨经济和社会自身的需要服务。

然而,假设东欧或独联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或新一轮金融与生产危机,这也不足以引发世界范围的危机或全球通货紧缩。虽然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营部门不断扩大、证券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不断增加、贸易迅速增长,世界经济受这两个地区影响的程度仍然很小。然而,如果中国受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扩散的影响,或者在没有外部危机的

情况下自己发生危机,那么全球经济受到的影响将大得多。^① 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日益紧密并还在不断增强,这个国家已成为工业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也是这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没有人能无视这个人口占世界 1/5 的新兴市场,也没有人能无视这样一个大国发生潜在危机的后果。

这就是 90 年代末的情形,但在未来 10 年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将发生改变。在最大的前苏联经济体中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2.5 亿人口将参与前所未有的大量的生产和贸易。它们不仅会吸收更多的进口,还会在世界市场上推出更多它们制造的商品。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的注意。对资本的更大需求将促进证券投资 and 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国家可预见的未来使人想起中国和越南不久前的情况,但中亚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变化将相对地比这两个国家快,因此某些相对重要国家的改变会有利于一些后苏联共和国。然而,无论独联体国家的增长步伐如何,在下一代它们仍将是整个地区最大的经济麻烦。但这一代一定会比以往几代做得好得多。

然而,考虑到转轨国家的日益开放,全球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同样像滞胀)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危机,相反的情形却不会出现。毕竟,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退出及巨大的经济滑坡并未引发世界性的衰退,反而更加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并从整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 80 年代

^① 实际上,中国不可能不受到这一危机的影响,因为中国和许多受危机所累的国家之间有贸易往来。1998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只增长了 7.6%,1997 年同期这一数字是 26.2%。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造成的。

末 90 年代初那些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像 90 年代末的中国这样深深融入了世界经济,那么计划经济的解体可能会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衰退。如果是这样,工业国将失去一部分市场以及一小块对外投资的空间。结果,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将减少,最终导致产出和就业下降,资本利得和国际投资者的总利润也会下降。

然而,这却不是现实情况,因为这些市场对西方而言几乎是关闭的。和最近的世纪末淘金热不同,这次是向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发达东部”进军。早期由于缺乏货币可兑换性,以及出于对市场改革过程政治上的担心,外资银行、跨国公司和投资者都不愿和社会主义国家做太多的生意。因此,当那里产出下降时,认为那是别人的产出,是与金融、贸易和生产没有联系的另一部分世界的产出。这些年来向新兴市场销售产品和投资的商业机会有所增加。虽然这些转轨经济的总体需求和产出已连续数年减少,需求结构的变动和普遍的自由化(包括引入货币可兑换)促进了进口增长和整个地区的外资投入。这就是许多西方和远东公司瞄准的机会,因此这里的情况有些特殊,一部分人的危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机会。这样政策似乎成为利用生活所给予的机会的一门艺术,有些政府、组织、商业机构、投资者、游说者和个人能够比其他人更善于利用这个机会。

90 年代末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将走上快速增长之路。人们认为这些国家正处于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长期过程之中。这些国家的起点很低,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000—10000 美元,中亚国家为 1000—3000 美元,它们有机会比世界上其他的高裕地区增长得更快。由于这个原因,转轨经济国家常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中。

把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类是有争议的。实际上,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资料中也常作这样的分类。这两类国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特点,如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上增加投资,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构调整和外资流入等。增长方式和可能的扩张速度是这些特征作用的结果。因此,预测这两组国家 21 世纪头 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在类似水平上也绝非巧合,即发展中国家为 6.0%,转轨经济国家为 7.0%。

作出这些预测的假设前提是,1992—2020 年间资本存量年均增长 7.0%,总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1.7%。世界银行“2020 年远景基本估计”是在假设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曾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会在未来 30 年内继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作出的。假设会有比乌拉圭回合更多的贸易自由化……在这一更加开放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会在广泛的结构和宏观经济改革中持续进步,其结果是到 2020 年这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总增长率会比过去 25 年内高 2—3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 1997c)。

考虑到结构调整的结果,以及储蓄倾向的增强,这一倾向又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所加强,这些趋势看来似乎是可行的,各方的政策也应朝着实现这一积极而困难的宏伟前景而努力。至于总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好的发展。对资金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市场配置以及技术进步应该会加快整体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持续和高速增长的能力会得到加强。然而,这只是转轨经济中表现最好的国家的情况,并非人人都能成功,总会有国家出现经济增长不佳的记录,就像过去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情况那样。

许多有关发展和转轨的研究都强调指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和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的开放应该有助于提高效率、增

加竞争力,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确,至少转轨进行较为深入的国家是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概念基础上制定政策的。国际贸易被视为加快增长的主要手段,并被预期会以比整体产出快得多的速度增长。据估计,出口的长期增长率将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0.7个百分点,高出世界贸易增长率0.8个百分点。至于进口的增长,只会分别高出0.4和0.5个百分点(见表43)。

然而,和前面有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不同,世界银行对于转轨经济贸易扩张的预计显得过于保守了。一些国家的进出口很可能会比近年来增长得快些。转轨经济国家进行调整的顺序使得贸易额会先下降,且幅度大于产出的下降。然后它会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前恢复,并且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快,成为促进其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可以预计,到2020年转轨经济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甚至会比现在出口从3.0%上升到3.6%、进口从3.4%上升到3.9%增加得还要大。

如何将这一信息融入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Model, GTAD,即全球经济长期预测矩阵所基于的模型)就是另外一码事了。看起来贸易扩张对生产增长的影响被低估了,而另一些促进增长的非贸易因素则被高估了,如由于自由化和私有化造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简而言之,世界银行的分析在贸易增长前景上过分悲观,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上则过分乐观了。如果它作出相反的预测,可能情况会好一些。

因此,考虑到所有的地缘政治、金融和文化因素,在作长期预测时预计所有的转轨经济都将遵循同一种发展方式是十分错误的。虽然事先假设哪些国家会成功、哪些国家会失败是十分令人尴尬的,尤其是对国际机构而言,但在模型中应当

表 43 1992—2020 年贸易增长和市场份额(百分比)

| 国家或组别 | 出 口 | | 进 口 | |
|-------------------|--------------------|--------|--------------------|--------|
| | 占世界份额 | | 占世界份额 | |
| | 增长率 1992—2020 年 | 1992 年 | 增长率 1992—2020 年 | 2020 年 |
| 世界 | 5.5 | 100.0 | 5.3 | 100.0 |
|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 4.0 | 76.5 | 4.3 | 74.3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 3.5 | 67.8 | 4.0 | 65.3 |
| 新兴工业化国家 | 6.5 | 7.4 | 6.3 | 7.2 |
| 香港地区 | 6.0 | 1.3 | 5.7 | 1.8 |
| 发展中国家 | 8.1 | 23.5 | 7.3 | 25.7 |
| 五大国 | 8.9 | 9.0 | 8.5 | 8.7 |
| 中国 | 10.0 | 3.0 | 10.2 | 2.8 |
| 印度 | 12.0 | 0.7 | 11.0 | 0.8 |
| 巴西 | 7.2 | 1.2 | 6.8 | 0.9 |
| 印度尼西亚 | 8.8 | 1.1 | 7.8 | 0.9 |
| 转轨国家 | 6.2 | 3.0 | 5.9 | 3.4 |
| 东盟国家 ^① | 9.6 | 2.8 | 8.6 | 3.0 |
| 其余南亚国家 | 8.0 | 0.5 | 6.8 | 0.6 |
| 其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 6.7 | 2.8 | 5.4 | 3.5 |
|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 | 6.7 | 1.7 | 5.3 | 2.1 |
| 中东和北非国家 | 6.4 | 5.2 | 5.4 | 5.9 |
| 世界其他国家 | 9.4 | 1.5 | 8.1 | 1.9 |
| | | 2020 年 | | 2020 年 |
| | | 100.0 | | 100.0 |
| | | 51.6 | | 56.6 |
| | | 40.4 | | 45.3 |
| | | 9.7 | | 9.4 |
| | | 1.5 | | 1.9 |
| | | 48.4 | | 43.3 |
| | | 22.0 | | 20.1 |
| | | 9.8 | | 9.9 |
| | | 3.9 | | 3.2 |
| | | 1.9 | | 1.3 |
| | | 2.7 | | 1.8 |
| | | 3.6 | | 3.9 |
| | | 8.4 | | 7.0 |
| | | 0.9 | | 0.8 |
| | | 3.9 | | 3.5 |
| | | 2.4 | | 2.1 |
| | | 6.6 | | 6.0 |
| | | 4.2 | | 3.9 |

注：进出口按 1992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①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7c。

假设某些转轨国家(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将经历经济停滞,如果不再是衰退的话。会有这样一些年份,某些国家经历着快速增长,但同时另外的国家会为危机所困。和许多国际机构及无数智囊团专家的共同预期相反,捷克 1997—1998 年出现了危机,同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因其他原因出现了类似情况。人们对俄罗斯一再作出过度乐观的估计,该国现在陷入了制度真空中,无法如官方预期那样在 1997—1999 年间出现经济起飞。因此,在其他国家也将出现类似情况,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会发生。

相应地,在现实生活和预测不同,我们将看到许多国家、地区和不同时期的缓慢经济增长。因此到 2020 年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比 90 年代中期高出 4 倍。这根本就不可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平均增长两倍。换言之,对独联体、东欧和蒙古 28 个国家^① 20 年的较为现实的预计是其国内生产总值会翻一番。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这个值——这是可能的,但不确定——那么是件幸事。

但有一点是十分有趣的。如果未来增长的速度和过去萎缩的速度一样快,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会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抵消后者的影响。从转轨前到转轨后的产出变化是一个较为棘手的过程,就和别处因简单的算术法则而引起的情况一样。例如,如果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0—1997 年期间下降 50%,现在要恢复到 198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就必须使产出翻一番。换言之,为了抵消 50% 的下降,需要后来 100% 的增长。这意味着仅仅为了达到从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在整个 10 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就要达到 7.2%。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在 8 年之中(1990—1997 年)以年均

^① 包括波黑和南斯拉夫,在表 8.13.41 和表 42 中未包括在内。

8.3%的速度下降,则国内生产总值一共下降50%,即达到危机前50%的水平。现在,为了从50%回到100%,则在另一个8年内每年增长必须达到9.1%。但如果增长率和衰退率一样(即8.3%),则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即回到100%)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本例中为9年。因此,如果一国经济连续8年以如此之高的比率下降,则当以同样速度上升时需要多年的时间。这和上山和下山时所需的气力也很类似。用同样多的步子,攀登时所花的气力和时间要多于下滑时。例如,如果波兰1990—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滑18%,也就是年均下降9.4%,在后两年以相同速度增长也只能将产出恢复到98%,全部恢复要到数月之后。实际上,在1992年中期经济探底后以5.8%的年均增长率要花3年半才能完全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

当我们回头再看看对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预测,包括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测,对其增长速度的预期应该更合理一些了。如果有人预计在未来1/4世纪中转轨国家能以年均7%—8%的速度增长,充分享受有利的外部条件,并有幸处于明智的政策管理之下,那么人们也就应该能想像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事件也会发生。因此,未来25年内对转轨经济更加现实一些的加权平均增长率估计应为4%—5%,而不是强劲的7%—8%,然而这组国家的增长率仍将超过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因此转轨经济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也将上升,虽然到2020年才能达到约6.0%。然而,越靠近这个数字越好。

和过去一样,当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机构和许多个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不那么准确时,未来也会发生类似情形。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预测毕竟只是一种预测或情景分析,当许多假设和各种条件满足时它才可能变为现实。但在转轨经济中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并不能预先准确得知

增长的方式为什么和在何时会发生变化。要使所有有利于增长的假设都同时实现简直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 1988 年甚至 1996 年预测到东盟四国会发生深刻危机,人们也没有理由对此加以抱怨。毕竟,失败的**不是预测而是政策**。因此,也没人能对 2008 年或 2018 年发生的事件及其对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影响作出预测。实际上,将要发生什么和这些事件对转轨经济的影响并不取决于预测的准确程度,而是取决于政策合适与否。

如果事实比预计的情况要好,这并不是说预测不好,只是说明政策较为合理或比预计的要好。实际增长率并不仅仅取决于初始条件,或可以预测的经济增长条件,而是取决于外部冲击(或缺少外部冲击)以及政府、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的政策。一旦条件有所改变,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会随之改变,政策工具会有进步,从而促进增长速度的变化。预期政策不会失败总能成功是毫无道理的。人们对此应毫不怀疑,即转轨经济国家会出现政策失灵,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促使对预期增长率采取保守态度的原因之一。

就在世界银行预测时段的一开始,即 1997—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大大低于 1992—2020 年间的预测值。这段时期预测的年均增长率为 5.5%,但 1997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计算的 25 国 1997 年加权平均增长率只有 1.6%,1998 年预期为 2.5%(表 8)。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的预测值应该降低一些,就像过去曾多次发生的那样。但计算实际增长率时要从许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情况中得出,虽然有可能会出现长期高速增长的情况,1995—1997 年只有极少数国家达到了像世界银行乐观估计值那么高的增长率。1994—1997 年波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记录是 6.4%,如果这一势头能长时间保持将是很了不起的。但真要达到这一目标同样也是

十分困难的(Kolodko, 1997c)。

转轨经济国家的相对权重是不同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整体贡献,从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它对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仍达43%。其次重要的国家是波兰,它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达14%。由于俄罗斯经济发生严重衰退而波兰正经历快速增长,这两国占整个后社会主义地区经济的相对比例已发生显著变化。如果199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因此,不仅由于这些事件两国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其地缘政治状况也受到了影响。这是战略上的改变,在和平时期这一变化也许比加入北约更为重要。

如果考虑各转轨经济国家的相对地位,其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意义和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是很不一样的。然而,为了完成转轨,即使是在小国中也要注意使转轨过程带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小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它们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如圣保罗或墨西哥城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地区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不能预期将来会发生类似变化。1998年以来整个地区又回到增长轨道上来了,而且各国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大幅波动了。

转轨国家的增长速度很可能随时间而波动。显然,这种波动和先前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周期波动是不同的,这一次的波动和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上下波动相类似。由于需求和供给因素,会有增长的波动。增长周期又会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失业会降低工资率和增加利润,从而促进积累,并通过周期性波动降低失业率(Blanchard,

1997)。因此出于许多原因,有些是外部的、有些是内部的,会交替出现增长加速、减慢甚至停滞(如果不是短期的收缩)等时期。

毫无疑问,后社会主义经济将呈现增长趋势。如果考虑到未来生产率,它们和这些国家过去国民收入的增长数据相似,但其增长质量却有了新的性质。增长率看上去会和50年代或70年代(见表7)相似,而不像90年代的独特情况(见表8和表13)。这儿又会出现快速和慢速增长交替的情况,但这些交替在长期内不会损害竞争和扩张的能力。因此,转轨带来更多的是增长在质量而非数量上的变化。未来如果发生比现在程度更大的周期波动,则主要会由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引起,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继续。然而,增长的根本方式,包括其速度及周期性波动,将主要由国内政策而不是外部世界的事件所引起。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13.3 转轨经济的死胡同和分化

转轨的控制和经济政策是在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预期和对商业社会的要求之间进行平衡的艺术。只有在长期内和控制得当的前提下,这两种趋势才能互补,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但如果人们偏向于不可持续的增长,即相对经济实际潜力过高过快的收入增长速度,那么失衡和动荡将会减缓增长速度。最终它将使生活水平实际增长的机会化为乌有,并使整个社会反对转轨。但如果人们有相反的倾向,即采取过分妥协的态度以取悦国内外的投资者和金融界,这也会对转轨造成威胁并使之停顿。换言之,只有采取调和的方法,既满足本国就业、消费、储蓄和投资方面的需求,又满足国际商界和金融界的预期,才能促进高质量的增长。

然而,控制这些政策也绝非易事,因为人们不仅对转轨战略和政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涉及转轨的各方利益也不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要区分以上两者还真不容易,转轨过程是个多渠道、多维的现象,任何一种道路都有其特定逻辑。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合理结论和尊重这些结论。如果变革的步伐没有协调好(例如,私有化速度应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建立相配套,价格开放的范围要与社会保障相配套,以及贸易自由化和竞争政策的搭配等),就会出现比中央计划时期更难对付的危机。

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是对经济特征的挑战,同时也是管理上的难题之一。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既无需要又无必要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因此,如果经济学家总试图为完整解释这一复杂过程并作出一般性结论或构造某种理论框架,将是风险很大的行为。比较正确的是对于特定的管理人员来说,每天都会遇到新挑战并要回答不同的问题。转轨国家的情况,包括其结构和制度因素方面变化得如此之快又如此频繁,以至于理论总结常常在作出时就已经不适用了。这好比通过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车窗拍摄窗外的风景照片,然后过一会儿来讨论刚才摄到的图像。在照片尚未说出来之前,窗外的风景和原本准确的照片上所看到的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事物发展瞬息万变,就像转轨经济那样,那么即使稍稍晚了一点也许就意味着已经太晚了。

当情况变化很快,而结论作出时已不适用当时的变化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事件发生时刻和作出结论时刻之间的时滞越长,结论就越不适用。例如,由于较容易获得准确的按月数据,在当前的基础上对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率进行总结是可能的,但要考察贫困形成的方式就困难得多。如果通货膨胀每月都增加,那么就能迅速对之作出反应,因为很快便能找

到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如果只有到 1999 年或 2001 年才能正确分析 1995 年或 1997 年出现的社会不均及贫困加剧的原因,那么提出的措施就只能适用于可能与制定政策时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在错误时刻实行的正确政策却成了不好的政策。

另外,还有既成事实的政策。有些事件只发生一次,如果没能好好把握,那么对之作出的理论总结也许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私有化。如果资产已被私有化了,那么完成的不仅仅是金融和经济上的行为,立法上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是无法逆转的。在实际的政治机制中,往往利用这种关系作为推出相互矛盾的措施的理由。当这些措施实施之后,就无法再通过立法、政治或经济途径来恢复此前的状况。假如人们在这之后经过研究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并作出了正确的理论总结,那么想改变政策方针往往是太迟了,因为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基于这种情况,许多经济学家以及听从其建议的政策制定者热衷于转向现有的理论或解决办法,虽然这些理论或解决办法往往也不足以解决政策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研究人员试图寻找到一些标准和一些相关性。专家们试图运用他们从截然不同领域里某一地方获得的认知。然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进程——所有的专家和顾问一直在学——则不按照他处的普遍理论运行,无论是二战后的经验,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还是原华盛顿协议精神,或者还是新旧结合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干预。由于这一原因,转轨时期的政策应该具有创造性、革新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们可以也应该借鉴从其他制度或地区得来的知识、经验和建议,但首先它们必须学会如何更快地从自身的失误及其他转轨国家的成就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错误运用不合适的原则或听从错误的政策建议会对政策形成及其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相应地,不合适的政策和缺乏良好的转轨及发展战略已使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走入死胡同。经过几年的转轨实践后,虽然各国都经历了许多困难,但许多国家仍然没有看到一丝光明,如阿尔巴尼亚、波黑、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南斯拉夫。最大的两个国家,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属于这一类。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等待转轨能出现转机,使它们成为增长型经济。

如果说 1989 年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文化方面的差异就已经很大了,由于波兰进行了许多深刻改革而乌克兰几乎没作什么改革,到 1999 年两国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另一个新出现的差别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如果说波兰 199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是其 1989 年水平的 126%,那么乌克兰则不到 40%。如果波兰 198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东欧和前苏联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约 8%,乌克兰约占 12%—13%,那么 1999 年则分别变成 13.6%和 8.1%。换言之,两国之间的比率从 1989 年乌克兰占优势的 5:3 变为 10 年后波兰占优势的 5:3。这也是战略上的转变。

然而,在顾问们的建议和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下,仍然有国家试图重蹈错误的覆辙。当然,波兰转轨的教训是应当吸取的,但应该吸取的是那些正确的东西。对一些小国而言,它们也应当吸取斯洛文尼亚令人鼓舞的经验。甚至遥远的吉尔吉斯斯坦也应当成为某些小型或中等前苏联共和国借鉴的对象。因为这些国家转轨道路上的变化也正是波兰改变转轨路线的原因。波兰及时地从早期新自由主义有休克却无疗法的错误道路上调转船头,因此不仅恢复了经济,1993 年之后经济便开始增长,到 2000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将比转轨前的水平超出 50% 以上。因此其他正在歧途中的国家必须

及时转向,以避免长期陷入死路的风险。它们不仅不应听从错误的建议,而且也不应遵从外人提出的不合其自身利益目标的条件。1989—1992年期间波兰曾这样做,如果这个国家继续走当时的路线,也会陷入死胡同中。

然而,不管对东欧及前苏联到目前为止所实行的转轨和发展政策提出的正当批评和保留意见有多少——同对中国和越南改革的批评相比,则要少得多——这些国家在实现市场经济和经济恢复中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尽管有许多前面提及的持续衰退和制度混乱的例子,也还是有许多现象包括新组织和行为上的改善,说明一切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的种子已经播下,虽然收获的季节未到。但它迟早会到的。

至于转轨和发展方面的领导人,其进步最近更多地反映在这个方面,即在东欧国家将面临的挑战和欧盟发达国家正面临着的问题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只是说明,转轨只能解决一组问题,即使在转轨成功后也还会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但与此同时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持续失业、老龄化社会的财政政策问题、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资本市场的脆弱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推理必然会成功,或注定要失败的。政策可能会发生作用,也可能会失效。但显然,如果缺乏政府领导的明智政策或政府对转轨及发展事务漠不关心都可能造成转轨的失败。虽然这一结论十分明显,但只是最近人们才普遍并公开地承认,政府的积极政策及对经济事务管理的参与——而不是自由市场力量——是转轨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

只是在1997年之后,这一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国际机构的做法才开始全面改革,显然这是由于转轨国家的持续衰退且反对之声高涨引起的,同时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批评,

如梵蒂冈和耶鲁，穆迪评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金融学院和国际劳工组织。毫无疑问所有大型国际组织都开始重新强调政府政策的重要性(世界银行，1997b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a；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7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a)。以前，人们认为自发的市场力量会使转轨国家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由于这一态度造成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人们的意见就开始像钟摆那样动摇了，这就是原因所在。作为最成功的转轨国家，波兰通过一系列事实表明革新性和创造性的政策能够导致比最乐观的预计还要好的结果。早先自由主义者“走着瞧”的方法所未能带来的成果，后来却被积极和明智的政府参与完成了。^① 和转轨头几年的萎缩和增长的正、负面经验相反，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虽然晚了些)：1996年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成功的转轨离不开可靠而连续的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7a)。

然而，如何作出可靠而连续的政策却仍是问题。虽然有的政府及政策运作良好，另一些国家却不是这样。就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和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情景类似。因此问题不在于政府比市场高明，而是好的政府比坏的政府或坏的市场要好。这也是将来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在定义“好政府”时，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只有能让积极的市场因素合理作用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因而转轨若想取得成功，一种特殊的市场和政府政策的共存才是获得持续发展的药方。事实上一个主要的差别是，明智的政府善于利用市场来达到其经济政策目标，而反过来，市场却无法

^① 这也是另一论据，证明90年代早期对经济迅速复苏和强劲增长的估计并没有错，而是政策用错了。而后来预测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缩小也并不是因为对前者作了修订，而是因为政策走向发生了变化(Kalodko, 1997b, ; PlanEcon, 1997a)。

同样利用政府。只提倡市场或只提倡政府行为的人只对了一半,其实也就是错了。

人们至少可以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如果忽视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制衡而想达到高质量的增长是不可行的。不幸的是,这却正是许多转轨国家的事实,尤其是在转轨初期。因此,后来人们对政府政策在结构改革和增长政策中作用的肯定认识受到了欢迎。然而,与此同时还必须对政府政策加以监控,这种监控是站在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上作出的。既然如此,就必须承认,一些国家转轨方面的不幸与别的因素无关,只与政府政策的失灵有关。因此,任何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真正难题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能还是不能制定好的政策。然而,什么才是好的政策,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一个问题,只要存在冲突的意见或利益,它将永远是一个问题。

13.4 后社会主义转轨会成功吗

无论如何,转轨过程终将结束,这和历史的无穷无尽延续是不同的。^①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将会持续,但从旧的制度安排到新式制度安排的过渡总会终结。因此经济制度可以继续演变,而转轨过程却不能。不过前者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而后者却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转轨只是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但却是一支令人兴奋的插曲。

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20世纪发生了三件改变历史的事件,即第三世界从殖民地地位中的解放,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即“第二世界”的兴起和衰落。不仅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及

^① 作者假设预计于2028年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将擦肩而过,不会击中目标。但如果它击中地球,所带来的苦难也小于转轨所带来的。

其次序,也由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没落会对 21 世纪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除非发生更重要的事件,那么这一现象将会对 1/4 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转轨几乎同时开始,各国结束的时间却早晚不同。人们总能判断哪个国家在转轨(如罗马尼亚),哪个国家没有(如古巴),哪个国家的转轨进程快些(如匈牙利),哪个国家慢些(如亚美尼亚),而作出这些分类必须依照一定的准则。这就和判别美女一样,很难对之作出定义但她一出现就知道她是不是美了。判断转轨进程的一个传统方法是其私营部门的比重,这个标准虽然很重要却并不充分。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重要的标准有开放程度及与世界融合的程度。

有人认为从长期来说,市场化必须和民主化同步进行。这是最有可能也最受欢迎的情况。然而,也许在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市场体制下,也能发生结构性改革以及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变迁,使得这一国家有资格被称为市场经济国家。那时转轨将会结束还是继续?存在这样一些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的政治制度——一种特殊的“民主制”——它们和许多欠发达市场经济的例子类似,而且也使其国家实现了市场体系,虽然还没有实现全面的民主和运行良好的文明社会。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种情况对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尤其是中亚的一些国家是不可想像的——经济转轨就已经完成了,然而政治上的变化却还需要时间。

在转轨过程中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着。虽然转轨的主流方向是变成市场经济,但地缘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具体的转轨过程。转轨的结局也不会一样。一些国家,一开始包括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

兰和斯洛文尼亚,后来又包括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将会向欧盟中的发达市场经济靠近。前南斯拉夫的其他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将试图走同样的道路但显然它们不会加入欧盟。而其他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将会更像今天的土耳其或伊朗。另一些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可能会变成像中东的黎巴嫩或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越南现在已是东盟成员国了,它将遵循类似泰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这些类比也许并不合适,因此适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每次都合适。转轨本身就能创造新型的市场经济,有些会有后社会主义色彩而另一些则有前苏联的色彩。

许多不同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和蒙古,由于共同参加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而有着共同的过去。然而波兰,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中欧成员国,目前正和欧盟协商加入事项,塔吉克斯坦这个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国内正在发生军事冲突,这两个国家曾同属于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现在它们又同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同一选区,从制度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和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它们各自的特点在未来的差异会超过它们过去的差异,因为转轨带来了制度建设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同道路。

在先前的制度下,由于前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俄罗斯对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控制,制度一体化的进程一直在继续。不仅制度安排和政策变得越来越相似,实体经济的结构也越来越相像。只有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南斯拉夫仍试图走一条不同的但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方面,阿尔巴尼亚和某种程度上的罗马尼亚试图保持自我并采取不同方式解决问题。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没有参加经互会和

《华沙条约》，罗马尼亚则两个都参加了，但却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与整个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然而，这并没有使该国能更好地进行转轨。事实上正好相反。

转轨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是又一次出现了合一的趋势。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不再有差别，或者社会主义不会采纳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这些方面所要改变的东西，在以前早已发生过，包括市场资本主义吸收和接纳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和选择。这次，后社会主义国家正朝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而这些在社会主义机制基础上产生的新型经济也为当代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一些固有的价值观。这就和移民一样，他们虽然吸收了新国家的一些特点，但还带有原先的观念。拥护平等，尊重人力资本，忠实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全民团结，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期盼，对民族福利的责任心，这些特点会在整整一代中塑造年轻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一条普遍真理是，转轨期间吸收的特点将越来越趋同于相邻最近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经验和建议，也由于它们强烈的示范效应，转轨国家会从邻国借鉴一些特殊安排和市场文化。最终，这将导致这样一些国家，如蒙古和保加利亚之间，或塔吉克斯坦和立陶宛之间变得日益不同，虽然它们共同经历了几代人的一体化发展。在适当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将更像土耳其而非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则会更像希腊。从许多方面看爱沙尼亚已经更像芬兰而不是阿塞拜疆，而阿塞拜疆和西部的伊朗已没有太大差别了。因此，认为转轨国家正从不同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它们正从共同的过去走向不同的未来。

对俄罗斯和中国而言，它们将发展另一种市场经济并相互保持差别，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区别很大，而且和过去相

比都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两个十分重要的大国会具有某些其他大国,如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近年来所经历的更多特点(因此就更有理由将它们放在五大国一组),但人们可以想象,它们将是新的中国和新的俄罗斯,即使在转轨完成之后。

在过去 10 年中这两个国家在相对经济权重上发生了有利于俄罗斯的变化,虽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俄罗斯首先被邀请加入工业化七国组织。在未来两国都会继续增长,只是中国会领先。两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相对地位会提高,但中国的重要性会比俄罗斯上升得快。创下世纪头 25 年时会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哪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政策更为成功,但即使从今天的角度及当前趋势看,中国已经是这场独一无二竞争的胜利者,因为它采取了更合理的转轨道路。这两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上对峙了 40 年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在建立市场经济上继续对峙的新时期(也许也要持续 40 年)。

至于制度上的变迁,两国将再次经历日益类似的过程。就像半个世纪之前,在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时,两国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政策上紧紧相随,在下半个世纪,它们在走向市场经济会发生类似变化。虽然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两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上会有显著的不同,但其最终的表现将越来越相似。然而这两个大国和新兴市场的制度安排、真实经济的结构、文化因素和地缘政治地位将决定将来仍有足够的机会同时也十分必要对它们继续作比较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不应被列入同一类,就像以前它们也从未被归入同一类。

也许有人会预见到将来人们对转轨是否结束会产生热烈的政治争论,因为这一过程的完成并没有清楚的标准。因此,判断像俄罗斯这么重要的国家是否已成为市场经济时就必须靠主观印象了(Aslund, 1996),虽然实际上它刚刚结束中央计

划体制,目前正处于既非计划又非市场的尴尬境地。最近也越来越多地听人谈到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人们也许会说那不过是个定义的问题,但按照一般的看法,俄罗斯和中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仍远远称不上成熟的市场经济。

一些国际组织在其对全球经济的研究和调查中(也许更重要的,在其政策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区分。也许不久之后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那些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中东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将被归入发达国家,另一些将被归入发展中国家,剩下的一些将被列为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转轨过程已经结束,可能仍被称为处于“转轨中”,因为它们在结构、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上还带有过去制度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97年,经过25年快速经济增长和合理重组后,收入水平很高的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按照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方法,已被称为“发达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但这更多地是因为政治因素,如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相反,直到1998年某些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仍将某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如韩国)甚至欧盟成员国(如希腊和葡萄牙)当作新兴市场处理。因此,问题是新兴市场会持续多长时间?

转轨的结束也有形式上和实际的标准。从形式角度看,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盟成员应该标志着转轨过程的结束,但从实际角度看,即使这些国家加入了这样的组织,在达到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之前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这里尤为重要的是文化的改变。这一改变的性质和意义使之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人们至少要花整整

一代人时间才能看到文化革命的成果。因此看起来,从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至少要一代人的时间。

然而有多少不同种类的中央计划国家,就有多少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十分复杂——因为种类很多——所以必须仔细进行分析和管理的,既要考虑其复杂性又要考虑各国的特点。由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过程并不统一,所以对一些国家有用的政策对别的国家却有可能失效。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历史,面临不同的挑战,转轨目标和可能性也不同,从目前的转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也有所差别,因此当转轨结束时各国所经历的变化也会很不一样。

但市场体制也有很多方面。例如,没人会认为土耳其在转轨,因为它已经是市场经济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的成员国,虽然它尚未加入欧盟。也还有一些人们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它们的公有成分比后社会主义国家更高。还有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500 美元,而转轨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00 美元。

我们必须承认有些转轨国家已十分接近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说它们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十分类似。东欧的一部分国家正在迅速赶上。即使在当前的转轨时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治理可能不比希腊的差,也不比意大利差;其劳动力市场与西班牙一样灵活,其税收制度与比利时一样对就业没有影响。它们学校里学生的成绩高于英国学生的成绩。除了通货膨胀之外,……其公共财政比那些首轮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还要接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波兰的农业是个难题,但出于同样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同法国的一样。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企业将要经历生产力的跃进,但例如在葡萄牙,当它加入欧盟时,情况也是一样(《经济学家》,1997f)。

因此,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是动态的,而决定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还不是市场经济则没那么容易。最终,这将由历史而不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国家的成员国资格并不能证明转轨已经结束,但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则可被视为转轨结束。在这之后,能较为容易地确认转轨过程是否完成,但在这之前,最重要的不是结束转轨过程的形式上的标准,而是朝向预期制度变迁和持续增长的不断进步。事实上,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因此,尽管有关转轨的讨论仍会继续,必须始终记住后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力量被认为会推动持续的发展。要不然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转轨已经结束,但这整个变革也许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简而言之,各国可以作选择。

14

疑问和结论

已经谈了许多,但某些重要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一些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转轨,而且不早不晚就是现在?虽然转轨是从波兰开始的,但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却在别处。当经济学家最后得出政治因素比经济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更具决定性的结论时,这也许会使人十分失望。政治事务确实比经济因素更能影响历史的走向。

虽然有许多缺点,社会主义由于具有不少不应被忽视和忘却的优点,是能持续更长时间的。如果不是因为前苏联的冒险政策,也许还有机会去尝试学会如何能适应变动的情况。过去,有太多精力和大量资源被浪费在不明智的向外扩张而不是在内部

改革和发展上。军事费用,参与远离国境的地区冲突,对外国的政治经济援助,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上有所变化,长期与中国的敌对——这些主要的非经济因素事与愿违地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适应新挑战的能力。

只有在前苏联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逐渐但持续弱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其他状况,包括最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这里短缺通货膨胀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本身其实是结构问题和宏观经济管理失误的结果,但这个问题自身也不足以在整个地区内推翻这一制度,因为在一些国家,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短缺通货膨胀并不十分严重。但来自外部的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政治压力在整个地区内引发了连锁反应。虽然那时像奥地利或瑞士这些国家都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福利这一制度也会垮台。

因此,转轨适时地发生了,同时情况也允许它们发生。要不是1988年夏天当时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所作的一个大胆决定,转轨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当时统治者和反对派(长期来被认为是非法的)之间进行了历史性的所谓圆桌会谈。如果不是这一会谈在1989年春获得成功,也就不会有1990年夏天东德人的外流。秋天时匈牙利政府允许这些人从奥地利逃到西德,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在那时作出了推倒柏林墙的重大决定。因此,紧接而来的冬天成了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一个冬天。

只有将各种事件组合起来时才可能开始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从长期角度看,一方面苏联的扩张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制度统治下的国家也失去了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能力。从短期角度看,转轨是因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的成功和柏林墙的倒塌引发的。前面的长期因素决定了转轨的同时发生,而后面的短期因素则

决定了它何时发生。后来,由于转轨过程已经开始,从地理和制度这两方面来看,这个过程必然会继续扩大开来。

从1989年开始,直到1996—1998年,在转轨过程中产出一一直大幅度下跌。当经济恢复后,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持续增长时期。为了更好地实现持续增长,必须加强国家的作用,因为还要解决一些主要的结构问题,而初生的市场力量还无法独自迎接挑战。因此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否定国家的作用,而是重新定位,如管理上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商业化,促进本国居民的财富增长,等等,这是一些国家在后面阶段中力图要完成的。

和生活十分相似,转轨也不像黑与白那样简单分明。一些策略会起作用,另一些不会,一些政策能成功,另一些却失败。转轨是会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历程。问题是转轨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制度和结构,法律法规,管理和行为,手段和目标。因此,没有现成而足够的办法可以解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政策问题,但是也没有时间去试验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更重要的是要设计出能相互支持的转轨政策和发展战略。

当转轨和发展、制度转轨和市场改革、观念冲突和利益冲突、经济政策的手段和目标之间产生混淆时就会出现更多的困难。这些混淆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可能发生。及时辨别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属于哪一类型,都将增强及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已取得了许多成就,许多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如果转轨的目标是引入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市场因素,那么很明显市场无法自己完成这一过程或者无法独自完成。这一结论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一方面,市场这个目标是不能通过将其自身作为工具而达到的。也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市

场,就不会有转轨,如果有转轨,就还没有市场。另一方面,导向某一目标的工具自身不能成为其目标。因此,政府政策(工具)是转轨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成功的转轨是指均衡、高速而平等的增长(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执行经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第十届世界银行大会上就发展经济所作的专题报告中承认:“长期以来,即使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1年》出版后,我一直相信存在着一种增长的灵药,这一神秘因素在《世界发展报告》所列出一系列政策中是没有的,而如果列入了就有可能创造奇迹——甚至是东亚奇迹。我现在不再相信这一点了。或者换句话说,我已经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了,它就是勤奋的工作。因为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很多人在很多年内坚持做很多正确的事情。”(费希尔,1998a, p. 16)指出缺少的是长期的勤奋工作——按代而不是按年来计算——这一点是很好的,虽然对某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是好的,勤奋的工作是必要的,然而如果缺少合理的政策,任何人的劳动都将白费,无论他们是中国的农民,俄罗斯的教师,波兰的矿工,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政策造就了“奇迹”,政策也引发了危机。除了政策,别无其他因素。

如果看得更仔细些,尤其是对东盟国家、韩国或日本,人们必须承认这些国家多年来都在十分勤奋地工作。东欧在转轨前也是如此。但问题是他们的勤奋工作要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使投机者和投资者,还有那些国外投资者发财。他们的勤奋也不能仅仅提高统治阶级或其国内金融界精英的生活水准,而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辛苦既不能白白浪费,就像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发生的那样,而他们的果实也不应通过复杂的国际金融和资本渠道流向全球经济的

另一些地区。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更多。

市场本身无法管理所有的工作,这也是另一个为什么强烈提倡自由市场却又强烈反对对其严格管制的原因,虽然这也许不是一个主要原因。东欧转轨前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事务的不当干预和错误政策引起的,而近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则主要由市场失灵引发。如果人们想在其他地方避免发生类似的危机的话,必须及时了解这些危机,这当然也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如果取消过去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正确的做法,那么如果忽视重新设计的需要并根据新兴市场的新规则运作将会是错误的。

因此,旨在促进持续增长的一系列政策中真正缺少的要素——增长的灵丹妙药——是政府对于资本形成和分配的明智参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人民,首先政府及这些组织应当更努力地工作。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经济事务中人们已经有了如此多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但是人们必须了解并承认所以成功或失败的根源,而——更为困难的是——应克服不同的利益冲突。如果说前者在学术界及政策制定者的能力范围内是可能做到的,那么后者也许不那么可行,政治家们及金融游说集团要取得永久的共识,他们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自由市场制度(即美国模式)才包容了人性化的灵活性和强劲动力,并能利用不断进步的技术持续提高生活水准(引自《经济学家》,1998a, p.29)。这也许是,也许不是美国的现实。但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又如何呢?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挑战时,这些假设是否仍然有效?当然不。人们不仅应当知道一国经济如今是如何

运作的,更要承认它从哪里或如何到达今天的阶段的。

正如上述意见可能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况,印度前总理尼赫鲁(Nehru)的某些结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没有错误。在格林斯潘赞美自由市场前的几十年内,尼赫鲁曾经说过:现在人们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计划和计划社会(引自Muravchik,1998,p.77)。那时这话是正确的。事实上它仍然是正确的,因为经济舞台上的演员们总在计划着其行动。当然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试图利用中央计划的国家,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印度,计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实际上不仅所有的公司和政府,即使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联邦储备系统也一直在计划,它们都试图根据未来的目标并运用手头可供使用的工具来创造未来。

因此,虽然中央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已随风而逝,作为合理的社会及经济政策手段的战略性和指导性计划却仍然在公司和国家的范围内存在。转轨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自由市场的盲目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完全成熟、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它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它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自由。只要这一点是错误的——它确实是错误的——即自由市场能最好地为自由社会服务,那么政府就必须干预市场运作,使之服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建议人们不要忘记(这始终是个正确的意见),不仅在转轨国家,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以下4个十分重要的比率。其中3个与经济及市场有关,它们是税率、利率和汇率。然而还有第四个,它属于政治领域,即选民率,也许称后者为社会更为适当,即该社会的任何经济——当然也包括正在转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为社会服务。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一个世

纪之后,1948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下了《1984年》。又50年后,在1998年欧洲和亚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已从“休克”走向“治疗”,从经济滑坡走向持续增长,从与世界市场隔绝走向了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然而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会有幸福的结局吗?不,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因为挑战是没完没了的,因此未来会怎么样呢?再过半个世纪,到2048年,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前景将是怎样情况呢?我们并不清楚,但显然它会更好。至于会有多好,有人会在适当的时间把它加以描述的。但到那时一切都得靠下一代的努力了。

附录

1990—1997 年的数据是来自各国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PlanEcon 和国际金融学院的官方估计。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及处理方法上的原因,在个别情况下本书中的数据 and 附录中会有所差异。在某些地方由于缺乏可靠来源而没有给出数据。然而,对本书提供的数据也须有所保留,特别是对前苏联各共和国、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某些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吸收的数据可能和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数据不一致,这是因为时间序列的采集来源不同。上述组织公布的有关同一种类、同一国家和同一年份的数字有时差别也相当大。但本附录提供的乃是能够获得的最可靠的数据。

1997 年的数据都是根据上述来源估计的,1998 年的数据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估计和预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 年),部分估计和预测是根据

上述来源提供的信息。

有记录的失业数据是指年末数字(除非另外标明)。

实际工资的百分比变化数据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8 年, PlanEcon1998a 和 1998b 以及作者本人的计算, 作者的计算采用各国提供的名义工资数据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通货膨胀数据。

政府总体包括国家、地方市政和预算外资金。

贸易余额, 进出口商品数据取自国际收支平衡表。

储备数据反映了货币当局的储备, 不包括黄金。

PPP 代表购买力平价。附录中引用的估计值是按 1995 年的美元及 PlanEcon1997d 的数据计算的, 另有说明的除外。计算这些估计值时, 将一国按当地货币计算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购买力平价, 得出的便是与 1 美元在美国购买同样数量商品和劳务所需的本国货币。

波罗的海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d)作出的, 因为和 PlanEcon 的估计相比, 数据差异太大。

1999—2002 年的预测是在 PlanEcon(1998a 和 1998b)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的, 某些地方关于 1999—2000 年的数据是作者自己的预测。

1.1990—1998 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阿尔巴尼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10.0 | -27.7 | -7.2 | 9.6 | 9.4 | 8.9 | 9.1 | -8.0 | 10.2 |
| 私人消费 | — | — | — | — | 4.2 | 8.2 | -0.6 | -8.9 | 9.5 |
| 公共消费 | — | — | — | — | 6.7 | 8.9 | 2.5 | -18.4 | 6.4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 | — | 22.7 | 21.4 | 3.5 | -31.2 | 32.6 |
| 工业总产出 | -14.2 | -42.0 | -51.2 | -10.0 | -2.0 | 2.0 | 8.7 | -11.5 | 13.0 |
| 农业总产出 | -5.4 | -17.4 | 18.5 | 10.4 | 6.5 | 10.0 | 6.0 | 0.5 | 4.0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工业(按 1990 年不变价格) | 39.8 | 32.1 | 16.9 | 13.9 | 12.4 | 11.5 | — | — | — |
| 农业(按 1990 年不变价格) | 37.0 | 42.5 | 54.2 | 54.6 | 55.1 | 55.9 | — | — | — |
| 失业 | | | | |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失业率 | 9.5 | 9.5 | 27.0 | 22.0 | 18.5 | 13.1 | 12.1 | 14.0 | 13.8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0.0 | 35.5 | 193.1 | 85.0 | 21.5 | 8.0 | 12.7 | 38.0 | 32.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0.0 | 104.1 | 236.6 | 35.6 | 15.0 | 6.0 | 17.4 | 42.1 | 19.0 |
| 平均工资 | — | -15.0 | -14.1 | -1.9 | 26.5 | 8.9 | 10.1 | -5.0 | 9.7 |

1. 1990—1998年与通货膨胀率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20.7 | -17.0 | -9.3 | -11.3 | -6.6 | -11.0 | -10.9 | -7.0 |
| 总政府支出 ^① | 62.1 | 61.9 | 44.0 | 34.9 | 31.2 | 30.8 | 29.0 | 25.7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23.4 | 104.4 | 152.7 | 75.0 | 40.6 | 51.8 | 43.8 | 41.3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100.1 | 68.0 | 27.7 | 16.5 | -22.0 | 39.0 | 38.6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33.0 | 69.1 | 54.1 | 40.2 | 37.7 | 47.8 | 55.0 | 63.2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占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 ^② | — | 5.0-8.0 | 32.0 | 23.0 | 16.5 | 13.8 | 19.1 | 27.5 | — |
| 贷款利率(1年) ^③ | 1.0-2.0 | 8.0-12.0 | 39.0 | 30.0 | 20.0 | 21.0 | 28.8 | 31.0 | — |
| (列克/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10.0 | 24.0 | 102.9 | 102.0 | 94.7 | 93.0 | 104.5 | 148.9 | 152.6 |
| 汇率(年均) | 8.0 | 14.6 | 75.1 | 102.1 | 94.7 | 92.8 | 105.9 | 150.0 | 153.6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122 | -249 | -434 | -365 | -284 | -181 | -249 | -195 | — |
| 贸易余额 | 150 | 208 | 454 | 490 | 460 | 474 | 711 | 497 | 829 |
| 出口 | 231 | 73 | 70 | 112 | 141 | 205 | 210 | 141 | 162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进口 | 381 | 281 | 524 | 602 | 601 | 679 | 921 | 638 | 991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8 | 32 | 45 | 65 | 89 | 97 | 33 | 50 |
| 总储备额 | 199 | 1 | 72 | 147 | 204 | 240 | 280 | 300 | — |
| 外债总额 | 377 | 628 | 769 | 877 | 960 | 667 | 753 | 815 | — |
| 总可用储备额(年末) | 5.9 | 0.0 | 1.4 | 2.3 | 3.2 | 3.7 | 3.3 | 5.1 | — |
| | | |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 债务偿还 | — | 33.0 | 5.6 | 27.7 | 23.7 | 6.6 | 6.1 | 6.7 | — |
| | | |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22.1 | -61.3 | -29.7 | -14.3 | -7.5 | -9.3 | -8.5 | -10.5 |
| 外债/GDP | — | 55.7 | 108.6 | 71.5 | 48.4 | 27.6 | 28.1 | 35.4 | — |
| 外债/出口 | — | 860.3 | 1,098.6 | 783.0 | 680.9 | 325.5 | 329.0 | 447.8 | — |
| 备注项目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人口(百万) | 3.3 | 3.3 | 3.2 | 3.2 | 3.2 | 3.2 | 3.2 | 3.2 | 3.2 |
| GDP(10亿列克) | 17.0 | 16.5 | 53.2 | 125.3 | 187.9 | 224.7 | 281.0 | 345.2 | — |
| 人均GDP(美元) | — | 210 | 330 | 400 | 640 | 800 | 660 | 730 | 1,019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 | 1,179 | 1,062 | 1,153 | 1,241 | 1,340 | 1,441 | 1,321 | 1,449 |

① 1996年数据只含上半年。

② 1995年以前为中央银行制定的界限,之后为12个月存款的平均利率。

③ 1995年之前为中央银行的指导利率,之后为12个月贷款的平均利率。

亚美尼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 -7.4 | -17.1 | -52.6 | -14.8 | 5.4 | 6.9 | 5.8 | 3.3 | 6.0 |
| 私人消费 | — | — | 13.6 | -27.6 | 5.3 | 10.0 | 8.4 | 5.0 | 0.7 |
| 公共消费 | — | — | -11.3 | 7.7 | -3.3 | -8.2 | -2.4 | 3.0 | -1.3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87.2 | -8.7 | 44.8 | -17.3 | 11.1 | 15.0 | 9.1 |
| 工业总产出 | — | — | -52.5 | -5.3 | 13.5 | 1.5 | 1.2 | 0.9 | 6.0 |
| 农业总产出 | — | — | -8.9 | -1.9 | 3.2 | 4.7 | 1.7 | -6.0 | 1.3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 | 46.5 | 36.0 | 25.8 | 29.1 | 24.3 | 23.8 | — | — |
| 农业 | — | 23.6 | 28.4 | 49.1 | 43.5 | 42.8 | 38.3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失业率 | — | — | 3.5 | 6.2 | 5.6 | 8.1 | 9.7 | 11.0 | 10.8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10.3 | 274.1 | 1.346 | 3.732 | 5.273 | 176.7 | 18.7 | 14.0 | 22.5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25.0 | 1.341 | 10.896 | 1.885 | 32.0 | 5.6 | 21.9 | 23.4 |
| 平均工资 | — | — | -48.6 | -53.2 | -50.7 | 9.9 | 7.3 | 4.5 | 5.3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① | - | -1.8 | -16.0 | -11.8 | -6.1 | -4.7 | -4.8 | -2.5 | -5.6 |
| 总政府支出 ^① | - | 7.3 | 12.3 | 59.5 | 28.4 | 23.7 | 19.7 | 24.4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 | 684.0 | 68.7 | 35.1 | 20.6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864.8 | 1,437 | 66.4 | 27.6 | 8.2 | - |
| 汇率 | | | | | | | | | |
| (美元/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 | - | - | 75.0 | 405.5 | 403.3 | 435.1 | 495.6 | 561.9 |
| 汇率(年均) | - | - | - | 75.0 | 288.4 | 405.7 | 419.2 | 490.7 | 592.6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不含赠与) | - | - | -195 | -315 | -231 | -483 | -425 | - | - |
| 贸易余额 | - | -1,382 | -114 | -166 | -192 | -402 | -467 | -559 | - |
| 出口 | - | 2,904 | 220 | 206 | 209 | 271 | 290 | 239 | - |
| 进口 | - | 4,286 | 334 | 372 | 401 | -673 | -727 | -798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 | - | 3 | 19 | 22 | 26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0 | 0 | 0 | 0 | 32 | 107 | 168 | 219 | - |
| 外债总额 | - | - | - | - | 200 | 371 | 614 | 798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 | 0.7 | 1.6 | 2.2 | 2.8 |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 | 3.0 | 20.6 | 18.7 | 22.0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71.2 | -35.5 | -37.6 | -26.6 | -27.0 | -23.1 | |
| 外债/GDP | — | — | — | — | 30.7 | 28.9 | 38.4 | 50.4 |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 | 95.5 | 136.9 | 211.7 | 333.9 |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3.7 | 3.7 | 3.7 | 3.7 | 3.7 | 3.7 | 3.7 | 3.7 | 3.7 | |
| GDP(百万 Dram) | — | 80 | 295 | 3,898 | 187,049 | 522,285 | 660,311 | 778,000 |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 | — | 173 | 343 | 418 | 418 | 438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2,345 | 2,097 | 2,199 | 2,343 | 2,470 | 2,535 | 2,620 | |

① 联合中央政府。

阿塞拜疆: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11.7 | -0.7 | -22.6 | -23.1 | -18.1 | -11.0 | 1.3 | 5.0 | 7.0 |
| 私人消费 | — | — | 11.5 | -24.9 | -22.2 | -0.3 | 8.2 | 0.2 | 2.5 |
| 公共消费 | — | — | 50.5 | 1.2 | -5.6 | -16.6 | 6.2 | -0.3 | 0.5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41.0 | -39.0 | -48.0 | -72.0 | 77.4 | 24.1 | 39.7 |
| 工业总产出 | — | -7.5 | -18.2 | -21.4 | -24.7 | -21.4 | -6.7 | 0.3 | 5.3 |
| 农业总产出 | — | -2.6 | -25.1 | -16.3 | -12.8 | -5.0 | 3.0 | -5.0 | 5.0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 | 22 | 30 | 26 | 25 | 25 | 22 | 23 | — | — |
| 农业 | 26 | 39 | 27 | 30 | 30 | 31 | 30 | — | — |
| 失业率 | — | — | 0.2 | 0.7 | 0.9 | 1.1 | 1.1 | 1.2 | 2.6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7.8 | 106 | 616 | 1,130 | 1,664 | 411.7 | 19.8 | 3.6 | 5.5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26 | 1,395 | 1,294 | 1,788 | 84.5 | 6.7 | 0.5 | 4.5 |
| 平均工资 | — | — | -23.7 | -38.5 | -60.2 | -25.1 | 0.3 | 20.0 | 6.1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 | 2.8 | -12.7 | -11.4 | -4.2 | -2.6 | -2.8 | -3.0 |
| 总政府支出 | - | - | 46.3 | 46.1 | 36.0 | 19.5 | 18.8 | 20.8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685.9 | 486.1 | 122.2 | 25.8 | 14.3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968.6 | 421.6 | 750.7 | 113.5 | 40.0 | 30.0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37.5 | 45.0 | 39.0 | 14.8 | 13.3 | 12.6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个月) | - | - | 22 | 60 | 1,355 | 101 | 26 | 10 | - |
| 贷款利率 ^① | - | - | 75 | 332 | 502 | 147 | 33 | 29 | - |
| (Monnet/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 | - | 45 | 238 | 4,318 | 4,440 | 4,095 | 3,888 | 3,964 |
| 汇率(年均) | - | - | 120 | 1,149 | 1,457 | 4,416 | 4,305 | 3,985 | 3,984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153 | 488 | 2 | -121 | -318 | -811 | -961 | - |
| 贸易余额 | - | 60 | 489 | -5 | -163 | -275 | -549 | -569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出口 | — | 295 | 1,275 | 716 | 682 | 680 | 789 | 825 | — |
| 进口 | — | -336 | -786 | -721 | -845 | -953 | -1,338 | -1,395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 | 20 | 22 | 284 | 661 | 1,006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0 | 0 | 2 | 119 | 214 | 457 | — |
| 外债总额 | — | — | — | — | 89 | 420 | 560 | 567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0 | 0 | 0 | 5 | 8 | 15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 | — | 7.9 | 9.7 | 8.7 | — |
| | | | | | | (占出口商品、劳务百分比) | |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233.3 | 1.2 | -6.6 | -11.5 | -23.6 | -23.4 | -28.6 |
| 外债/GDP | — | — | — | — | 4.8 | 15.1 | 16.3 | 13.8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 | 13.0 | 61.8 | 71.0 | 68.8 | — |
| 备注项目 | |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人口(百万) | — | — | 7.3 | 7.4 | 7.4 | 7.5 | 7.6 | 7.6 | 7.7 |
| GDP(百万 Manat) ^① | 1.5 | 2.1 | 25.1 | 191.0 | 2,685 | 12,264 | 14,807 | 16,399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364.0 | 223.0 | 246.0 | 368.0 | 451.0 | 541.1 | 555.2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IP | — | — | 3,027 | 2,306 | 1,837 | 1,604 | 1,602 | 1,677 | 1,777 |

① 对私营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

② 1990—1991年用卢布表示的GDP按10:1比例折成Manat。

白俄罗斯: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 -3.0 | -1.2 | -9.6 | -7.6 | -12.6 | -10.4 | 2.6 | 10.0 | 2.0 |
| 私人消费 | — | — | -7.9 | -1.5 | -13.4 | -12.8 | 28.5 | 13.3 | — |
| 公共消费 | — | — | -15.3 | -10.5 | -3.0 | -2.9 | — | -13.7 | —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18.1 | -15.4 | -17.2 | -29.6 | -5.0 | 20.0 | — |
| 工业总产出 | — | 1.0 | -5.2 | -10.5 | -18.9 | -10.6 | 3.0 | 17.6 | — |
| 农业总产出 | — | -3.2 | -14.5 | -10.4 | -14.9 | -7.4 | 1.9 | -5.0 | 0.5 |
| 产出构成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工业 | — | 28.6 | 40.4 | 30.9 | 30.8 | 31.4 | 35.3 | 37.4 | — |
| 农业 | — | 18.2 | 23.8 | 18.3 | 15.0 | 17.7 | 15.9 | 15.0 | — |
| 失业率 | — | 0.0 | 0.5 | 1.4 | 2.1 | 2.7 | 3.9 | 2.3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 | 84 | 969 | 1,187 | 2,221 | 709 | 54.1 | 63.9 | 95.3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93 | 1,559 | 1,996 | 1,960 | 244 | 39.2 | 63.1 | 117.7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150 | 2,330 | 1,495 | 2,171 | 499 | 37.8 | 89.7 | 81.0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3,275 | 2,316 | 1,867 | 140 | 32.1 | 90.8 | — |
| 平均工资(总额) | — | — | -12.3 | -6.2 | -30.9 | -5.0 | 4.5 | 14.7 | -14.3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 | 0.0 | -1.9 | -2.5 | -1.9 | -1.6 | -2.7 | -3.3 |
| 总政府支出 | — | — | 46.1 | 56.2 | 50.0 | 44.6 | 43.6 | 44.6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954.0 | 1,818 | 173.7 | 52.4 | 111.4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2,031 | 157.4 | 58.5 | 83.0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34.6 | 36.8 | 15.0 | 15.2 | 17.9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 | — | — | — | 65 | 90 | 101 | 32 | 16 | — |
| 贷款利率(1年) | — | — | — | 72 | 149 | 175 | 64 | 32 | — |
| (白俄罗斯卢布/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 | — | 15 | 699 | 10,600 | 11,500 | 15,500 | 30,700 | — |
| 汇率(年均) | — | — | 17 | 269 | 3,666 | 11,529 | 13,292 | 26,300 |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 | -1,113 | -641 | -254 | -909 | -995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贸易收支 | — | — | 377 | -1,051 | -710 | -528 | -1,335 | -1,497 | — |
| 出口 | — | — | 3,580 | 2,812 | 2,641 | 4,621 | 5,404 | 7,147 | — |
| 进口 | — | — | 3,203 | 3,863 | 3,351 | 5,149 | 6,739 | 8,644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50 | 7 | 18 | 10 | 7 | 75 | 100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91 | 101 | 377 | 469 | 394 | — |
| 外债总额 | — | — | — | 1,014 | 1,251 | 1,513 | 947 | 970 | — |
| | | | | (进口商品和劳务的月数) | |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0.3 | 0.4 | 0.9 | 0.8 | 0.6 | — |
| | | | | (占出口商品和劳务的百分点) | | |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0.5 | 4.5 | 3.9 | 2.1 | 2.0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3.1 | -13.2 | -2.4 | -6.7 | -7.5 | -8.7 |
| 外债/GDP | — | — | — | 2.8 | 25.7 | 14.6 | 7.0 | 7.3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36.1 | 47.4 | 32.7 | 17.5 | 13.6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 | 10.3 | 10.3 | 10.3 | 10.4 | 10.3 | 10.3 | 10.2 | 10.2 | 10.2 |
| GDP(10 亿白俄罗斯卢布) | — | 86 | 914 | 9,776 | 17,815 | 119,813 | 179,820 | 351,043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5,199 | 3,508 | 470 | 1,013 | 1,311 | 1,257 | 1,054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6,845 | 6,081 | 5,304 | 4,762 | 4,903 | 5,407 | 5,007 |

波兰:1990—1998 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实际 GDP | -9 | -20 | - | - | - | 32 | 50 | 30 | 30 |
| 工业总产值 ^① | 112 | 100 | 50 | 4 | 2 | 10 | 19 | 32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价格 | | | | | | | | | |
| 零售价格(年均) | - | 114 | 73,109 | 44,069 | 780 | 4 | -25 | 12 | 10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② | - | - | - | - | - | 33 | 110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汇率(年均) ^③ | - | - | - | - | - | 100 | 100 | 100 | - |
| | (第纳尔/德国马克) | | | | | | |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联合政府收支 ^④ | - | - | - | - | -339 | -9 | -177 | -161 | -150 |
| 联合政府支出 ^⑤ | - | - | - | - | 896 | 1,051 | 2,173 | 2,755 | - |
| | (百万德国马克) | | | | | | |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 | - | -177 | -193 | -748 | -1,046 | - |
| 除去官方转移支付 | - | - | - | - | -492 | -570 | -1,306 | -1,545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出口 ^① | 1,990 | 2,120 | 495 | 7 | 91 | 152 | 336 | 570 | — |
| 进口 ^② | 1,953 | 1,673 | 429 | 60 | 894 | 1,082 | 1,882 | 2,199 | — |
| 其中人道主义援助 | — | — | — | — | 561 | 459 | 260 | 360 | — |
| 总官方储备 ^③ | — | — | — | — | 92 | 213 | 459 | 684 | — |
| | | | | | (进口商品的月数) | | | | |
| 总官方储备 ^④ | — | — | — | — | 1.2 | 2.4 | 2.9 | 3.5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经常项目/GDP ^⑤ | — | — | — | — | -25.1 | -26.4 | -39.3 | -34.7 | — |
| 备注项目 | | | | | | | | | |
| GDP(百万美元) | 10,471 | 8,670 | — | — | 1,964 | 2,157 | 3,327 | 4,455 | — |
| 人口(百万) ^⑥ | 4.4 | 4.4 | 4.2 | 4.1 | 4.1 | 4.1 | 4.0 | 4.0 | 3.9 |
| 人均 GDP(美元) | 2,396 | 1,979 | — | — | 547 | 607 | 815 | — | — |

① 1995年以前主要是波斯尼亚为主地区的数据,之后为联邦地区。

② 1996年的数据为头9个月。

③ 波黑有一个货币委员会,其货币与德国马克相联系。

④ 现金基础,包括赠与。1996年的数据是依据各种来源对头9个月进行的估计,与实际不相符。

⑤ 1992—1993年的数据是在波斯尼亚为主地区海关的有限数据基础上作出的。1994—1996年的数据是对整个波黑地区的粗略估计。

⑥ 1995年以前的数据只包括波斯尼亚为主地区,之后为联邦地区。

⑦ 不包括官方转移支付。

⑧ 数据中包含了国外难民。

保加利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9.1 | -11.7 | -7.3 | -1.5 | 1.8 | 2.1 | -10.9 | -7.4 | 3.5 |
| 私人消费 | 0.3 | -15.3 | -1.0 | -3.6 | -4.5 | -2.9 | -11.9 | -6.5 | 2.0 |
| 公共消费 | 3.2 | -7.8 | -9.3 | -15.0 | -16.9 | -2.2 | -31.8 | 8.1 | -10.4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9.8 | -16.6 | -7.3 | -17.5 | 1.1 | 8.8 | -13.5 | -15.6 | 12.7 |
| 工业总产出 | -12.5 | -21.0 | -6.4 | -6.2 | 6.0 | 1.7 | -8.3 | -13.0 | 3.0 |
| 农业总产出 | -3.7 | 4.3 | -14.8 | -30.2 | 9.5 | 16.3 | -18.1 | 26.2 | 4.1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 | 39.6 | 39.0 | 32.7 | 29.9 | 31.1 | 31.6 | — | — |
| 农业 | — | 15.4 | 11.6 | 9.9 | 11.5 | 12.8 | 11.4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 失业率 | 1.6 | 10.5 | 13.2 | 16.3 | 14.1 | 11.4 | 11.1 | 14.2 | 14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26 | 334 | 85 | 73 | 96 | 62 | 123 | 1,083 | 28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72.5 | 338.9 | 79.4 | 63.9 | 121.9 | 32.9 | 310.8 | 578.6 | 14.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296 | 56 | 27 | 75 | 53 | 138.0 | 887 | 21.0 |
| 平均工资(总额) | 5.3 | -24.7 | 7.2 | -8.8 | -23.8 | -4.6 | -20.3 | -6.9 | 3.5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12.7 | -14.9 | -5.2 | -10.9 | -5.8 | -6.4 | -13.4 | -2.7 | -2.0 |
| 总政府支出 | 65.9 | 45.6 | 43.6 | 48.1 | 45.7 | 43.0 | 47.6 | 34.3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17.0 | 110.0 | 53.6 | 47.6 | 78.6 | 39.6 | 124.5 | 359.3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26.0 | 148.0 | 51.8 | 56.0 | 37.1 | 15.7 | 219.9 | 255.5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76.0 | 79.0 | 78.3 | 79.5 | 67.2 | 78.9 | 35.7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个月) | — | 57.7 | 45.3 | 53.6 | 72.3 | 25.3 | 211.8 | 3.0 | — |
| 贷款利率(小于1年) | — | 83.9 | 64.6 | 83.7 | 117.8 | 51.4 | 480.8 | 6.7 | — |
| (列弗/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2.8 | 21.8 | 24.5 | 32.7 | 66.0 | 70.7 | 487.4 | 1776.5 | 1760.4 |
| 汇率(年均) | 2.6 | 17.9 | 23.3 | 27.6 | 54.2 | 67.2 | 175.8 | 1676.5 | 1802.4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1,180 | -406 | -801 | -1,386 | -203 | -59 | 117 | 184 | 224 |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贸易余额 | — | 404 | -212 | -885 | -17 | 120 | 209 | 311 | 215 | |
| 出口 | 2,534 | 2,734 | 3,956 | 3,727 | 3,935 | 5,345 | 4,890 | 4,974 | 5517 | |
| 进口 | 3,086 | 2,330 | 4,169 | 4,612 | 3,952 | 5,224 | 4,703 | 4,662 | 5302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56 | 42 | 40 | 105 | 82 | 100 | 575 | 300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331 | 935 | 655 | 1,002 | 1,236 | 483 | 2,484 | — | |
| 外债总额 | 10,000 | 11,802 | 12,548 | 13,890 | 11,411 | 10,229 | 9,660 | 9,977 | 9,644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0.8 | 1.9 | 1.2 | 2.1 | 2.2 | 0.9 | 3.5 | — | |
| | | | |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 债务偿还 | 64.8 | 24.1 | 38.1 | 33.7 | 19.3 | 15.4 | 19.3 | 15.5 | — | |
| | | | |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2.8 | -5.4 | -9.3 | -12.8 | -2.1 | -0.5 | 1.3 | 1.8 | 1.7 | |
| 外债/GDP | — | 157.4 | 145.6 | 128.3 | 117.5 | 79.2 | 103.5 | 97.0 | — | |
| 外债/出口 | — | 431.7 | 317.2 | 372.7 | 299.0 | 191.4 | 197.5 | 200.6 |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按各项所示) | | | | | | |
| 人口(百万) | 8.7 | 8.6 | 8.5 | 8.5 | 8.4 | 8.4 | 8.4 | 8.3 | 8.3 | |
| 按市价计算的GDP(10亿列弗) | 45 | 136 | 201 | 299 | 526 | 868 | 1,660 | 16,875 | — | |
| 人均GDP(美元) | 1,939 | 880 | 1,009 | 1,278 | 1,187 | 1,558 | 1,209 | 1,319 | 1,593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4,648 | 4,275 | 4,006 | 3,984 | 4,063 | 4,179 | 3,721 | 3,462 | 3,579 | |

克罗地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6.9 | -20.6 | -11.7 | -0.9 | 0.6 | 1.6 | 4.3 | 5.5 | 5.5 |
| 私人消费 | — | — | -1.1 | -7.0 | 16.4 | 8.9 | 5.7 | 4.8 | 1.0 |
| 公共消费 | — | — | — | -3.2 | 30.5 | 12.4 | 10.5 | 9.7 | 4.4 |
| 总投资 | — | — | — | 0.5 | 6.4 | 8.1 | 18.1 | 9.2 | 9.0 |
| 工业总产出 | -11.3 | -28.5 | -14.6 | -5.9 | -2.7 | 0.3 | 3.1 | 5.4 | 5.0 |
| 农业总产出 | -2.9 | -7.0 | -13.0 | 5.0 | -2.5 | -2.6 | 2.7 | 2.2 | 4.8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26.0 | 23.4 | 22.6 | 21.5 | 20.8 | 20.5 | 20.3 | — | — |
| 农业和渔业 | 8.3 | 9.6 | 9.5 | 10.0 | 9.6 | 9.5 | 9.2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 失业率 | 9.3 | 14.9 | 17.2 | 16.8 | 16.7 | 16.7 | 18.2 | 17.0 | 14.4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零售价格(年均) | 610.0 | 123.0 | 665.5 | 1517.5 | 97.6 | 2.0 | 3.6 | 3.6 | 6.7 |
| 零售价格(年末) | 136.0 | 250.0 | 938.0 | 1149.0 | -3.0 | 3.7 | 3.5 | 3.4 | 7.5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455.0 | 146.0 | 825.2 | 1512.4 | 77.6 | 0.7 | 1.4 | 2.4 | 5.0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412.0 | 1079.0 | 1076.0 | -5.5 | 1.6 | 1.5 | 1.6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1994年以前为总额,之后为净额) | — | -24.2 | -46.6 | -2.7 | 20.0 | 31.4 | 7.2 | 3.1 | 3.5 |
| 政府部门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政府收支 ^① | — | — | -4.0 | -0.8 | 1.7 | -0.9 | -0.5 | -2.7 | -2.9 |
| 政府支出 ^① | — | — | 37.2 | 32.6 | 41.6 | 46.7 | 47.2 | 48.5 | — |
| 货币部门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狭义货币(M1年末) | — | — | — | — | 111.9 | 24.6 | 37.9 | 20.9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9.1 | 10.9 | 1.0 | 15.5 | — |
| 广义货币(M4,年末) | — | — | — | 24.0 | 20.5 | 25.9 | 35.3 | 44.5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平均存款利率 | — | — | 434.5 | 27.4 | 5.0 | 6.1 | 4.2 | 4.4 | — |
| 平均贷款利率 | — | — | 2,333 | 59.0 | 15.4 | 22.3 | 18.5 | 14.1 | — |
| 汇率(年末) | — | — | 0.80 | 6.56 | 5.63 | 5.32 | 5.54 | 6.3 | 6.0 |
| 汇率(年均) | 0.01 | 0.02 | 0.26 | 3.59 | 5.99 | 5.23 | 5.43 | 6.16 | 6.10 |
| 对外部门 ^② | | | | | (10亿美元) | | | | |
| 经常项目 | 1.1 | -0.6 | 0.8 | 0.6 | 0.8 | -1.3 | -0.9 | -1.9 | -2.1 |
| 贸易余额 | -1.2 | -0.5 | -0.3 | -1.0 | -1.3 | -3.2 | -3.7 | -3.1 | -3.3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商品出口 | 4.0 | 3.3 | 3.1 | 3.9 | 4.3 | 4.6 | 4.5 | 4.6 | 5.1 | |
| 商品进口 | 5.2 | 3.8 | 3.4 | 4.9 | 5.6 | 7.9 | 8.2 | 8.7 | 8.6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0.0 | 0.1 | 0.1 | 0.1 | 0.5 | 0.5 | 0.6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0.0 | 0.2 | 0.6 | 1.4 | 1.9 | 2.3 | 2.5 | — | |
| 外债总额(年末) | — | 3.0 | 2.7 | 2.6 | 3.1 | 3.7 | 4.8 | 6.9 | 6.9 | |
| 总国际储备额(年末) | — | 0.0 | 0.4 | 1.2 | 2.5 | 2.5 | 2.8 | 2.8 | — | |
| 债务偿还 | — | 12.3 | 8.9 | 6.5 | 4.2 | 6.2 | 8.3 | 10.1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3.5 | 8.3 | 0.9 | 0.7 | -9.5 | -7.6 | -10.3 | -10.1 | |
| 外债/GDP | — | 17.7 | 27.5 | 22.6 | 21.5 | 20.2 | 25.4 | 34.3 | — | |
| 外债/出口 | — | 90.5 | 87.5 | 67.6 | 72 | 79 | 106.6 | 154.1 |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4.8 | 4.8 | 4.8 | 4.8 | 4.8 | 4.8 | 4.8 | 4.8 | 4.8 | |
| GDP(10亿 Kuna) | 0.3 | 0.4 | 2.6 | 41.8 | 85.3 | 94.6 | 103.6 | 113.2 | — | |
| 人均 GDP(美元) | 5,106 | 3,510 | 2,079 | 2,440 | 2,980 | 3,786 | 3,993 | 3,846 | 4,356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 | 7,064 | 6,245 | 6,193 | 6,235 | 6,342 | 6,614 | 6,957 | 7,349 | |

① 联合中央政府。

② 1990—1992年数据不包括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贸易。

捷克共和国:1990—1998 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1.2 | -11.5 | -3.3 | 0.6 | 3.2 | 6.4 | 3.9 | 1.0 | 1.4 |
| 私人消费 | 6.7 | -28.5 | 15.1 | 2.9 | 5.3 | 6.9 | 7.0 | 1.6 | -0.5 |
| 公共消费 | 0.9 | -9.0 | -3.1 | -0.1 | -2.3 | -2.0 | 4.1 | -2.1 | -1.5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1 | -17.7 | 8.9 | -7.7 | 17.3 | 21.0 | 8.7 | -4.9 | -1.1 |
| 工业总产出 | -3.5 | -22.3 | -7.7 | -5.6 | 2.9 | 8.6 | 6.8 | 4.5 | 6.4 |
| 农业总产出 | — | -8.9 | -12.1 | -2.3 | -6.0 | 5.0 | -1.4 | -5.9 | 1.6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 | — | 40.2 | 34.9 | 33.6 | 34.1 | 33.8 | 34.9 | — |
| 农业 | 8.4 | 6.0 | 6.1 | 6.5 | 3.8 | 5.3 | 5.1 | 5.1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 失业率 | 0.8 | 4.1 | 2.6 | 3.5 | 3.2 | 2.9 | 3.5 | 5.2 | 6.7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10.8 | 56.6 | 11.1 | 20.8 | 10.0 | 9.1 | 8.8 | 8.5 | 11.9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18.4 | 52.0 | 12.7 | 18.2 | 9.7 | 7.9 | 8.6 | 10.0 | 10.8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4.4 | 70.4 | 10.0 | 13.1 | 5.3 | 7.6 | 4.8 | 7.5 | 10.9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9.3 | 11.4 | 5.6 | 7.2 | 4.4 | 5.7 | — |
| 平均工资 | -5.7 | -26.3 | 10.2 | 3.7 | 7.7 | 7.7 | 8.5 | 3.1 | 0.4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1.8 | -1.9 | -3.1 | 0.5 | -1.2 | -1.8 | -1.2 | -2.1 | -0.9 |
| 总政府支出 | — | — | — | 41.9 | 43.3 | 42.8 | 41.8 | 41.6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0.5 | 26.8 | 20.7 | 19.8 | 19.9 | 19.8 | 9.2 | 10.1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14.6 | 18.5 | 15.4 | 6.4 | 8.4 | 5.0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69.4 | 70.3 | 73.9 | 75.6 | 72.2 | 73.8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 | — | — | 6.3 | 7.0 | 6.9 | 6.9 | 6.7 | 8.1 | — |
| 贷款利率 | — | — | 13.3 | 14.1 | 12.8 | 12.7 | 12.5 | 13.9 | 14.4 |
| (克朗/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28.0 | 28.9 | 28.7 | 29.0 | 28.2 | 26.6 | 27.4 | 34.6 | 32.5 |
| 汇率(年均) | 18.0 | 29.5 | 28.3 | 29.2 | 28.8 | 26.6 | 27.1 | 31.7 | 33.3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10亿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1.1 | 0.3 | -0.3 | 0.1 | 0.0 | -1.4 | -4.3 | -3.2 | -2.3 |
| 贸易余额 ^① | -0.8 | -0.5 | -1.9 | -0.3 | -0.9 | -3.7 | -5.9 | -4.6 | -3.3 |
| 出口 ^② | 5.9 | 8.3 | 8.4 | 13.0 | 14.0 | 21.5 | 21.7 | 22.5 | 24.7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进口 ^① | 6.5 | 8.3 | 10.4 | 13.3 | 14.9 | 25.1 | 27.6 | 27.1 | 28.0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0.5 | 1.0 | 0.5 | 0.7 | 2.5 | 1.4 | 1.3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0.2 | 0.7 | 0.8 | 3.9 | 6.2 | 14.0 | 12.4 | 9.8 | — |
| 外债总额(可兑换货币) | 6.0 | 6.7 | 7.1 | 8.5 | 10.7 | 16.5 | 20.8 | 21.4 | 23.5 |
| 总储备额(年末) | 0.3 | 0.8 | 0.8 | 2.7 | 3.9 | 5.6 | 4.2 | 3.6 | — |
| 债务偿还 | — | — | 12.4 | 6.5 | 13.1 | 9.3 | 10.4 | 15.9 | — |
| 经常项目/GDP | -2.9 | 1.2 | -1 | 0.3 | -0.1 | -2.7 | -7.6 | -6.1 | -4.1 |
| 外债/GDP | — | 26.4 | 23.7 | 24.7 | 26.9 | 32.8 | 36.9 | 42.3 | — |
| 外债/出口 | — | 80.8 | 83.8 | 65.4 | 76.3 | 77.1 | 96.1 | 97.6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10.3 | 10.3 | 10.3 | 10.3 | 10.3 | 10.3 | 10.3 | 10.3 | 10.3 |
| GDP(10 亿克朗) | 579 | 750 | 847 | 1,002 | 1,143 | 1,339 | 1,533 | 1,650 | — |
| 人均 GDP(美元) | 3,126 | 2,466 | 2,899 | 3,326 | 3,862 | 4,921 | 5,476 | 5,050 | 5,418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 | 8,856 | 8,554 | 8,596 | 8,873 | 9,447 | 9,826 | 9,933 | 10,056 |

① 1990—1992 年为捷克共和国占捷克斯洛伐克总值的份额。

注：黑体数据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数据。

爱沙尼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8.1 | -7.9 | -14.2 | -8.5 | -1.8 | 4.3 | 4.0 | 10.0 | 5.5 |
| 私人消费 | — | — | -19.6 | -5.5 | 1.5 | 1.4 | 9.5 | 12.5 | 2.0 |
| 公共消费 | — | — | -17.0 | 15.5 | 8.9 | 7.5 | -8.3 | 12.0 | 0.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13.5 | 4.8 | 6.7 | 0.3 | 4.0 | 9.2 | 3.7 |
| 工业总产出 | — | — | -35.6 | -18.7 | -3.0 | 1.9 | 2.9 | 13.4 | 10.5 |
| 农业总产出 | — | — | -18.6 | -7.7 | -14.2 | -1.2 | -3.2 | 6.6 | 4.1 |
| 产出的构成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工业 | — | — | 27.5 | 22.0 | 21.1 | 20.2 | 18.9 | — | — |
| 农业 | — | — | 12.6 | 9.8 | 9.0 | 7.1 | 6.4 | — | — |
| 失业率 | — | — | — | 5.0 | 5.1 | 5.1 | 5.6 | 5.4 | 5.3 |
| 价格和工资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23.0 | 210.5 | 1076.0 | 89.8 | 48.0 | 29.0 | 23.0 | 11.0 | 12.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303.8 | 953.5 | 35.6 | 42.0 | 29.0 | 15.0 | 12.0 | 11.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 | 1208.0 | 75.0 | 36.3 | 25.6 | 14.8 | 8.8 | 6.7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 | — | 32.8 | 22.0 | 9.9 | 7.7 |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额) | — | — | — | 1.8 | 16.4 | 5.2 | 0.4 | 8.9 | 5.9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5.2 | -0.3 | -0.7 | 1.3 | -1.2 | -1.5 | -2.3 | 1.7 |
| 总政府支出 | — | — | 34.9 | 40.3 | 38.3 | 40.8 | 40.4 | —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71.1 | 86.5 | 31.0 | 30.5 | 36.6 | 40.4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29.6 | 61.4 | 40.1 | 63.1 | 100.6 | 87.3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 | 26.2 | 25.0 | 27.0 | 30.7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2个月以上) ^① | — | — | — | — | 10.13 | 7.21 | 7.48 | 10.4 | — |
| 贷款利率(1--3年) | — | — | — | 21.90 | 19.08 | 16.82 | 17.23 | 11.9 | — |
| 汇率(年末) | — | — | 12.9 | 13.9 | 12.4 | 11.5 | 12.4 | 14.2 | 13.6 |
| 汇率(年均) | — | — | — | 13.2 | 13.0 | 11.5 | 12.0 | 13.9 | 13.6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36 | 23 | -166 | -166 | -424 | -610 | — |
| 贸易余额 | — | — | -90 | -145 | -356 | -674 | -1,046 | 1,188 | — |
| 出口 | — | — | 461 | 812 | 1,329 | 1,857 | 1,789 | 2,096 | — |
| 进口 | — | — | 551 | 957 | 1,684 | 2,531 | 2,835 | 3,283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58 | 160 | 212 | 199 | 111 | 131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170 | 386 | 443 | 579 | 679 | 776 | — | |
| 外债总额(年末) | — | — | — | 161 | 187 | 287 | 407 | 563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2.8 | 3.7 | 2.5 | 2.3 | 2.0 | 2.2 |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1.4 | 0.4 | 0.5 | 0.8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1.3 | -7.1 | -4.6 | -9.7 | -13.2 | -9.2 | |
| 外债/GDP | — | — | — | 9.7 | 8.0 | 8.0 | 9.3 | 12.1 |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19.8 | 14.1 | 15.5 | 22.8 | 28.8 |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1.6 | 1.6 | 1.5 | 1.5 | 1.5 | 1.5 | 1.5 | 1.5 | 1.4 | |
| GDP(百万 Krona) | — | — | 13,054 | 21,918 | 30,268 | 41,279 | 52,379 | 64,536 |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663 | 1,101 | 1,563 | 2,439 | 2,996 | 3,203 | 3,728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7,635 | 7,076 | 7,021 | 7,398 | 7,765 | 8,569 | 9,168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② | — | — | 3,957 | 3,785 | 3,842 | 4,138 | 4,431 | — | — | |

① 1994 年和 1995 年为定期存款利率,还包括 3 个月及 3—12 个月期限的存款。

② 按照 OECD 1997d 的估计得出。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3.0 | -25.4 | -26.2 | -7.4 | -4.5 | -4.4 | -3.8 | -3.0 |
| 总政府支出 | — | 33.0 | 35.7 | 35.9 | 24.2 | 12.3 | 13.9 | 13.9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464.0 | 4319.0 | 2229.0 | 146.4 | 41.9 | 29.0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724.0 | 2048.0 | 3448.3 | 84.6 | 59.6 | 54.5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38.5 | 19.2 | 5.3 | 4.9 | 4.5 | 4.9 | — |
| 汇率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 | — | — | 0.10 | 1.28 | 1.24 | 1.28 | 1.30 | 1.33 |
| 汇率(年均) | — | — | — | — | 1.10 | 1.29 | 1.26 | 1.30 | 1.32 |
| | (1.00/美元) | | | | | | |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包括官方转移支付 | — | — | -248 | -354 | -278 | -215 | -220 | -318 | — |
| 不含官方转移支付 | — | — | -319 | -485 | -448 | -404 | -360 | -366 | — |
| 贸易余额 | — | — | -378 | -448 | -365 | -335 | -293 | -379 | — |
| 出口 | — | — | 267 | 457 | 381 | 358 | 417 | 466 | — |
| 进口 | — | — | 645 | 905 | 746 | 693 | 710 | 845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 | — | 8 | 6 | 25 | 65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0.7 | 1 | 41 | 157 | 158 | 150 | — |
| 外债总额 | — | — | 95 | 597 | 1,002 | 1,223 | 1,373 | 1,565 | — |
| | | | | (商品进口的月数) | |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0.0 | 0.0 | 0.7 | 2.7 | 2.7 | 2.1 | — |
| | | | | (占出口商品和劳务的百分比) | | | | | |
| 债务偿还 ^① | — | — | — | — | — | 7.3 | 9.8 | 9.2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 | -22.3 | -7.5 | -4.8 | -6.2 | -6.1 |
| 外债/GDP ^① | — | — | — | — | 80.2 | 42.7 | 30.2 | 30.4 | — |
| 外债/出口 ^① | — | — | 35.6 | 130.6 | 263.1 | 341.6 | 329.3 | 335.8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 | 5.4 | 5.4 | 5.4 | 5.4 | 5.4 | 5.4 | 5.4 | 5.4 | 5.4 |
| GDP(百万 Lant) | — | — | 0.2 | 16.4 | 1373 | 3694 | 5724 | 68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132 | 214 | 245 | 378 | 577 | 669 | 787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2,366 | 1,677 | 1,508 | 1,552 | 1,671 | 1,858 | 2,041 |

① 债务重组之后。

匈牙利: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3.5 | -11.9 | -3.1 | -0.6 | 2.9 | 1.5 | 1.3 | 4.3 | 5.4 |
| 私人消费 | -3.6 | -5.6 | 0.0 | 1.9 | -0.2 | -7.1 | -2.1 | 0.1 | 3.0 |
| 公共消费 | 2.6 | -6.7 | 4.9 | 27.5 | -12.7 | -4.1 | -5.4 | 0.1 | 4.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7.1 | -10.4 | -2.6 | 2.0 | 12.5 | -4.3 | 6.3 | 8.2 | 12.0 |
| 工业总产出 | -9.3 | -18.3 | -9.7 | 4.0 | 9.6 | 4.6 | 3.4 | 11.1 | 12.0 |
| 农业总产出 | -4.7 | -6.2 | -20.0 | -9.7 | 3.2 | 2.6 | 4.9 | -0.6 | -2.0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工业 | 28.8 | 26.7 | 24.4 | 23.2 | 22.8 | 23.9 | — | — | — |
| 农业 | 9.6 | 7.8 | 6.5 | 5.8 | 6.0 | 6.4 | —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失业率 | 1.9 | 7.8 | 13.2 | 12.1 | 10.4 | 10.4 | 10.7 | 10.4 | 8.7 |
| 价值和工资 |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28.9 | 35.0 | 23.0 | 22.5 | 18.8 | 28.2 | 23.6 | 18.3 | 15.6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33.4 | 35.0 | 23.0 | 21.1 | 21.2 | 28.3 | 19.8 | 18.4 | 14.2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22.0 | 32.6 | 12.3 | 10.8 | 11.3 | 28.9 | 21.8 | 19.4 | 13.2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39.3 | 23.5 | 18.8 | 10.3 | 19.9 | 30.2 | 20.1 | 19.5 | — |
| 平均工资 | -1.8 | -1.7 | -4.0 | -5.1 | 5.5 | -12.2 | -5.0 | 4.9 | 6.4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0.4 | -2.9 | -6.8 | -5.5 | -8.4 | -6.7 | -3.5 | -4.6 | -4.0 |
| 总政府支出 | 53.5 | 55.4 | 59.4 | 60.6 | 60.9 | 53.9 | 50.9 | 49.7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29.2 | 35.7 | 27.3 | 15.7 | 13.0 | 20.1 | 22.5 | 19.4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17.6 | 11.4 | 0.5 | 20.9 | 18.0 | 12.7 | 12.1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54.8 | 59.2 | 56.8 | 52.2 | 49.8 | 49.0 | 48.0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 | 28.5 | 29.4 | 16.1 | 16.6 | 22.9 | 24.4 | 18.6 | 16.6 | — |
| 贷款利率(1年) | 32.1 | 35.5 | 28.8 | 25.6 | 29.7 | 32.2 | 24.0 | 20.7 | 18.6 |
| (弗林特/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61.5 | 75.6 | 84.0 | 100.7 | 110.7 | 139.5 | 164.9 | 203.5 | 204.9 |
| 汇率(年均) | 63.2 | 74.7 | 79.0 | 92.0 | 105.4 | 125.7 | 152.6 | 187.6 | 201.7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10亿美元)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0.1 | 0.3 | 0.3 | -3.5 | -3.9 | -2.5 | -1.7 | -1.0 | -1.1 |
| 贸易余额 ^① | 0.3 | 0.2 | 0.0 | -3.2 | -3.6 | -2.4 | -2.7 | -1.7 | -1.7 |
| 出口 ^② | — | 9.3 | 10.0 | 8.1 | 7.6 | 12.8 | 14.2 | 19.6 | 21.4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进口 ^① | — | 9.1 | 10.1 | 11.3 | 11.2 | 15.3 | 16.8 | 21.4 | 23.1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0.3 | 1.5 | 1.5 | 2.3 | 1.1 | 4.5 | 2.0 | 2.1 | 2.1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3.9 | 4.3 | 6.7 | 6.8 | 12.0 | 9.8 | 8.4 | — |
| 外债总额 | — | 22.6 | 21.4 | 24.6 | 28.5 | 31.7 | 27.6 | 26.3 | 27.9 |
| | | | | (经常项目支出月数,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1.3 | 3.8 | 3.6 | 5.2 | 5.1 | 7.0 | 5.3 | 3.6 | — |
| | | | |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债务偿还 ^② | 48.2 | 33.9 | 34.4 | 43.2 | 54.8 | 47.3 | 50.4 | 23.3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0.4 | 0.8 | 0.9 | -8.9 | -9.4 | -5.7 | -3.8 | -2.2 | -3.3 |
| 外债/GDP | — | 67.8 | 57.5 | 63.6 | 68.7 | 72.4 | 61.6 | 54.0 | — |
| 外债/出口 | — | 244.5 | 213.8 | 303.4 | 374.6 | 247.2 | 194.9 | 123.7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 | 10.4 | 10.3 | 10.3 | 10.3 | 10.3 | 10.2 | 10.2 | 10.1 | 10.1 |
| GDP(10亿弗林特) | 2,089 | 2,498 | 2,943 | 3,548 | 4,365 | 5,494 | 6,845 | 8,446 | — |
| 人均GDP(美元) | 3,186 | 3,229 | 3,604 | 3,739 | 4,040 | 4,359 | 4,393 | 4,462 | 5,016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7,612 | 6,719 | 6,522 | 6,500 | 6,710 | 6,831 | 6,943 | 7,275 | 7,695 |

① 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以海关统计为基础,不含自由出口区的贸易,1994年贸易增长很高,1995—1996年较低。

② 1996年的债务偿还数据含有向国际金融组织及商业债权人提供的商支付。

哈萨克斯坦: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0.4 | -13.0 | -2.9 | -10.4 | -17.8 | -8.9 | 1.1 | 1.8 | 2.7 |
| 私人消费 | — | — | -13.3 | -5.2 | -15.9 | -19.6 | 20.2 | 4.0 | 2.5 |
| 公共消费 | — | — | -4.8 | -2.8 | -3.8 | — | 19.2 | 1.0 | 1.5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30.0 | -39.0 | -31.8 | -25.7 | -39.9 | 19.0 | 11.7 |
| 工业总产出 | -1.0 | -1.0 | -14.0 | -14.0 | -27.5 | -8.2 | 0.3 | 4.0 | 6.5 |
| 农业总产出 | 16.0 | -9.0 | 28.7 | -6.9 | -21.0 | -24.4 | -5.0 | -2.0 | 4.0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41.5 | 38.0 | 34.7 | 28.7 | 29.1 | 23.4 | 21.3 | 20.2 | — |
| 农业 | 28.1 | 29.0 | 30.4 | 16.4 | 14.9 | 12.1 | 11.9 | 9.2 | — |
| 失业率 | 0.0 | 0.0 | 0.5 | 0.5 | 8.0 | 11.0 | 13.0 | 13.5 | 14.5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 | 79.0 | 1,381 | 1,662 | 1,892 | 176 | 39.1 | 17.7 | 13.5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105 | 137 | 2,984 | 2,169 | 1,160 | 60.4 | 28.6 | 11.3 | 8.5 |
| 平均工资 | — | — | 11.8 | -11.1 | -31.5 | 0.4 | 2.9 | 7.4 | 3.4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1.4 | -7.9 | -7.3 | -1.3 | -7.2 | -2.0 | -2.5 | -3.4 | -4.5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总政府支出 | 31.4 | 32.9 | 31.8 | 25.2 | 25.9 | 20.7 | 18.5 | 19.9 | — |
| 货币部门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广义货币 | — | 211.0 | 391.0 | 692.0 | 576.0 | 103.8 | 14.7 | 12.9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289.0 | 1343.0 | 653.0 | 710.0 | -22.5 | -12.0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45.0 | 20.9 | 25.9 | 11.5 | 4.4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存款利率(1年) | — | — | — | — | — | 53.3 | 30.0 | 12.6 | — |
| 贷款利率(1年) | — | — | — | — | — | 58.3 | 39.4 | 22.9 | — |
| 汇率(年末) | — | — | 0.8 | 6.1 | 54.3 | 64.0 | 73.3 | 75.8 | 81.4 |
| 汇率(年均) | — | — | 0.4 | 1.9 | 36.0 | 61.0 | 67.3 | 75.6 | 79.9 |
| 对外部门 | | | | | (10亿美元) | | | | |
| 经常项目 | — | -1.3 | -1.9 | -0.4 | -0.9 | -0.7 | -0.7 | -1.0 | — |
| 贸易余额 | — | -3.2 | -1.1 | -0.4 | -0.9 | -0.2 | -0.3 | -0.5 | — |
| 出口 | — | 10.2 | 3.6 | 4.8 | 3.3 | 5.2 | 6.3 | 6.8 | — |
| 进口 | — | -13.4 | -4.7 | -5.2 | -4.2 | -5.4 | -6.6 | -7.3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 | 0.5 | 0.6 | 0.9 | 1.1 | 1.2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0.6 | 1.2 | 1.7 | 2.0 | 2.1 | — |
| 外债总额 | — | — | 1.5 | 1.9 | 2.7 | 3.4 | 3.9 | 4.3 | — |
| 总储备额(年末) ^① | — | — | — | (进口商品、劳务的月数) | | 1.5 | 3.5 | 3.5 | — |
| 债务偿还总额 | — | — | 4.3 | 1.4 | 3.3 | 8.0 | 5.5 | 7.0 | — |
| | | | | (占出口商品和劳务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38.0 | -2.4 | -7.2 | -3.9 | -3.4 | -4.8 | -4.8 |
| 外债/GDP | — | — | 29.6 | 11.0 | 21.8 | 19.3 | 18.7 | 18.7 | — |
| 外债/出口 | — | — | 41.1 | 38.5 | 82.4 | 66.0 | 61.7 | 63.2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年末) | 16.6 | 16.7 | 16.9 | 16.9 | 16.7 | 16.5 | 16.4 | 15.7 | 15.5 |
| GDP(10亿 Tenge) | — | — | 2 | 32 | 450 | 1,086 | 1,416 | 1,7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322 | 981 | 785 | 1,079 | 1,278 | 1,343 | 1,533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3,245 | 2,929 | 2,573 | 2,405 | 2,442 | 2,499 | 2,650 |

① 1995年以前为国家外汇储备占商品进口额的月数。

吉尔吉斯斯坦: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 3.0 | -5.0 | -19.0 | -16.0 | -20.0 | -5.4 | 5.6 | 10.4 | 5.9 |
| 私人消费 | — | — | -40.4 | 17.8 | -30.6 | -1.2 | 15.8 | 7.4 | 3.8 |
| 公共消费 | — | — | -17.3 | -20.7 | -22.0 | -18.8 | -14.1 | 6.4 | 2.8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35.0 | -31.0 | -28.3 | 56.6 | 10.6 | -35.3 | 24.7 |
| 工业总产值 | -0.6 | -0.3 | -26.1 | 2.4 | -28.0 | -17.8 | 8.8 | 46.8 | 12.0 |
| 农业总产值 | 1.3 | -10.0 | -5.0 | -10.0 | -15.0 | -9.0 | 13.1 | 10.7 | 3.4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26 | 27 | 32 | 25 | 20 | 16 | 12 | — | — |
| 农业 | 32 | 35 | 37 | 39 | 38 | 40 | 47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 失业率 | — | 0.0 | 0.1 | 0.2 | 4.1 | 5.7 | 7.8 | 7.5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 | 85.0 | 855.0 | 772.4 | 228.7 | 52.5 | 30.4 | 25.4 | 11.7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70.0 | 1259.0 | 1363.0 | 95.7 | 31.9 | 35.0 | 14.8 | 12.1 |
| 平均工资 | — | — | -36.0 | -25.9 | -11.4 | 9.3 | -3.0 | 0.7 | 5.9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0.3 | 4.6 | -17.4 | -14.2 | -11.6 | -17.2 | -9.6 | -9.2 | -9.0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支出和净贷款 | 38.3 | 30.3 | 33.9 | 39.1 | 28.6 | 30.2 | 23.3 | 22.4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84.0 | 428.0 | 180.0 | 125.0 | 76.7 | 22.4 | 19.9 | — |
| 净国内资产 | — | — | 761.0 | 307.0 | 83.5 | 96.8 | 21.1 | 14.4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3个月,最低/最高利率) | — | — | — | — | — | 20/50 | 15/40 | — | — |
| 贷款利率(最低/最高利率) | — | — | — | — | — | 35/140 | 45/120 | — | — |
| 汇率(年末) ^① | 1.7 | 1.7 | 414.5 | 8.0 | 10.7 | 11.0 | 17.0 | 17.4 | 17.9 |
| 汇率(年均) ^② | 1.8 | 1.8 | 222.0 | 6.0 | 10.8 | 10.8 | 12.1 | 17.2 | 17.6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收支 | — | — | -61 | -162 | -124 | -242 | -418 | -187 | — |
| 贸易余额 | — | -41 | -74 | -166 | -119 | -179 | -363 | -134 | — |
| 出口 | — | 3,845 | 258 | 335 | 340 | 409 | 531 | 671 | — |
| 进口 | — | 3,886 | 332 | 501 | 459 | 588 | 894 | 805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 | 10 | 45 | 96 | 46 | 50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46 | 96 | 123 | 129 | 184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外债总额 | — | — | — | 290 | 414 | 585 | 753 | 934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1.1 | 2.5 | 2.5 | 1.8 | 2.7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0.6 | 5.0 | 19.5 | 12.9 | 6.0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18.3 | -18.5 | -11.3 | -16.2 | -24.0 | -11.5 | -9.5 |
| 外债/GDP | — | — | — | 33.0 | 37.5 | 39.1 | 43.2 | 57.3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86.5 | 121.7 | 143.0 | 141.7 | 139.3 | — |
| 备注 | (单位按各项所示)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4.4 | 4.4 | 4.5 | 4.5 | 4.5 | 4.5 | 4.6 | 4.6 | 4.6 |
| GDP(百万 Som) | 43 | 93 | 741 | 5,355 | 12,019 | 16,145 | 22,468 | 28,7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 | 155 | 199 | 250 | 336 | 413 | 397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3,046 | 2,537 | 1,920 | 1,796 | 1,870 | 2,021 | 2,125 |

① 1992 年以前为卢布/美元,之后为 Som/美元。

拉脱维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2.9 | -10.4 | -34.9 | -14.9 | 0.6 | -0.8 | 2.8 | 6.0 | 6.0 |
| 私人消费 | — | -26.0 | -43.3 | -7.4 | 3.2 | 3.9 | 2.5 | 14.2 | 4.7 |
| 公共消费 | — | -4.9 | 5.6 | 1.6 | -0.9 | 3.1 | 3.5 | 22.7 | 3.7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63.9 | -28.7 | -15.8 | 0.8 | 12.6 | 5.0 | 8.9 | 15.2 |
| 工业总产出 | — | -0.3 | -34.6 | -38.1 | -9.5 | -6.3 | 1.4 | 6.1 | 7.0 |
| 农业总产出 | — | -1.1 | -15.6 | -22.2 | -20.6 | -6.2 | -0.9 | 3.4 | 3.9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工业 | 38.3 | 39.9 | 29.8 | 30.8 | 25.4 | 25.3 | 27.8 | — | — |
| 农业 | 21.9 | 17.6 | 11.8 | 9.5 | 9.8 | 9.8 | 9.1 | — | — |
| 失业率 | — | — | 2.3 | 4.7 | 6.4 | 6.3 | 7.2 | 6.7 | 7.3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10.5 | 172.0 | 951.2 | 108.0 | 35.9 | 25.0 | 17.6 | 8.4 | 6.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262.4 | 959.0 | 35.0 | 26.0 | 23.0 | 13.1 | 7.0 | 5.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 | 1310.0 | 98.1 | 17.0 | 12.0 | 13.8 | 4.3 | 4.7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 | — | — | 5.8 | 10.6 | 1.8 | -4.6 | 11.3 | 4.9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 | -0.8 | 0.6 | -4.1 | -3.5 | -1.4 | 1.3 | -0.4 |
| 总政府支出 | — | — | 28.2 | 35.2 | 38.2 | 40.5 | 40.2 | 38.2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153.0 | 169.9 | 84.1 | 47.7 | -23.1 | 19.9 | 38.7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91.0 | 303.8 | 146.0 | 65.7 | -25.4 | 6.0 | 25.0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31.5 | 33.6 | 22.3 | 22.7 | 25.6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 年期以下) | — | — | — | 28.4 | 18.8 | 15.0 | 10.0 | — | — |
| 贷款利率(1 年期以下) | — | — | — | 70.8 | 36.7 | 31.1 | 20.3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汇率(年末) | — | — | 0.84 | 0.60 | 0.55 | 0.54 | 0.65 | 0.59 | — |
| 汇率(年均) | — | — | 0.67 | 0.67 | 0.56 | 0.53 | 0.55 | 0.58 | — |
| | | | | | (Lata/美元) | | |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25 | 151 | -86 | -159 | -350 | -350 | — |
| 贸易余额 | — | — | -215 | -160 | -378 | -579 | -798 | -887 | — |
| 出口 | — | — | 831 | 998 | 997 | 1,368 | 1,488 | 1,745 | — |
| 进口 | — | — | 1,046 | 1,158 | 1,375 | 1,947 | 2,286 | 2,632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43 | 51 | 155 | 244 | 379 | 415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432 | 545 | 506 | 654 | 691 | — |
| 外债总额(年末) | — | — | 43 | 225 | 362 | 429 | 432 | 486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1.5 | 4.4 | 4.6 | 3 | 2.9 | 2.7 | — |
| | | | | (进口商品和劳务的月数) | | | | | |
| | | | | 2 | 5 | 3 | 5 | — | — |
| | | | | (出口商品和劳务的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
| 债务偿还 | — | — | 0 | 2 | 5 | 3 | 5 |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1.7 | 3.1 | -1.2 | -2.4 | -3.6 | -7.0 | -6.4 |
| 外债/GDP | — | — | 2.9 | 10.3 | 9.9 | 9.6 | 8.6 | 8.9 | — |
| 外债/出口 | — | — | 5.2 | 22.5 | 36.3 | 31.4 | 29.0 | 27.8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按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 | 2.7 | 2.7 | 2.6 | 2.6 | 2.5 | 2.5 | 2.5 | 2.5 | 2.5 |
| GDP(百万 Leds) | 62 | 143 | 1,005 | 1,467 | 2,043 | 2,349 | 2,768 | 3,152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578 | 848 | 1,443 | 1,779 | 2,026 | 2,318 | 2,573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6,062 | 5,242 | 5,348 | 5,365 | 5,629 | 6,076 | 6,491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① | — | — | 3,451 | 3,070 | 3,204 | 3,291 | 3,484 | — | — |

①按 OECD1997d 的估计作出。

立陶宛: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5.0 | -13.4 | -37.7 | -17.1 | -11.3 | 2.3 | 5.1 | 5.7 | 5.5 |
| 私人消费 | — | — | — | -30.6 | 2.1 | 1.0 | 6.4 | 6.7 | 3.2 |
| 公共消费 | — | — | — | -10.5 | 8.4 | 14.2 | -2.2 | 3.7 | 1.2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 | -42.1 | -17.3 | 9.5 | -0.9 | 9.1 | 5.5 |
| 工业总产出 | — | — | -28.6 | -34.4 | -26.6 | 5.5 | 3.6 | -0.9 | 4.9 |
| 农业、林业总产出 | -9.0 | -5.0 | -24.0 | -8.0 | -18.0 | 16.3 | 16.7 | 5.7 | 4.8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32.8 | 55.7 | 39.4 | 30.4 | 25.8 | 29.0 | 28.3 | — | — |
| 农业和林业 | 27.6 | 19.2 | 11.6 | 11.0 | 7.3 | 9.3 | 11.4 | — | — |
| 失业率 | — | 0.3 | 1.3 | 4.2 | 3.8 | 6.1 | 7.1 | 5.9 | 5.8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8.4 | 224.7 | 1020.5 | 410.4 | 72.1 | 39.5 | 24.7 | 8.9 | 6.4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345.0 | 1161.1 | 188.8 | 45.0 | 35.5 | 13.1 | 8.5 | 6.8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148.2 | 1517.4 | 397.7 | 44.7 | 28.3 | 16.5 | 4.0 | 4.4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2407.1 | 131.6 | 33.8 | 20.6 | 12.8 | 0.8 |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 | — | — | -34.8 | 5.8 | 2.5 | 5.1 | 6.0 | 5.0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5.4 | 2.0 | 0.5 | -4.3 | -5.4 | -4.5 | -4.0 | -2.4 | -3.0 |
| 政府支出和净贷款 | 49.1 | 38.7 | 31.7 | 28.3 | 29.4 | 28.8 | 26.0 | 24.6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55.0 | 143.0 | 245.3 | 100.4 | 62.9 | 28.5 | -3.5 | 34.1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 | 16.6 | 2.0 | 37.6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 | |
| | — | — | — | 23.4 | 25.9 | 23.6 | 17.5 | 19.9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 ^① | — | — | — | 39.3 | 8.9 | 8.0 | — | — | — |
| 贷款利率 ^① | — | — | — | 88.3 | 29.8 | 23.9 | 16.0 | 11.5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ra/美元) | | | | | | | | |
| 汇率(年末) ^② | 17.0 | 110.0 | 379.0 | 4.4 | 4.0 | 4.0 | 4.0 | 4.0 | 4.0 |
| 汇率(年均) ^② | — | 38.0 | 177.0 | 3.9 | 4.0 | 4.0 | 4.0 | 4.0 | 4.0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203 | -86 | -94 | -614 | -723 | -945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均 GDP(美元) | — | 265 | 511 | 705 | 1,138 | 1,602 | 2,090 | 2,473 | 2,799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4,879 | 3,407 | 3,447 | 3,556 | 3,710 | 3,935 | 4,135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① | — | — | 5,174 | 4,049 | 4,203 | 4,471 | 4,766 | — | — |

① 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数。

② 1990 年和 1991 年为卢布/美元; 1992 年为 Talonai/美元, 之后为 Litai/美元。

③ 按 OECD 1997d 的估计标出。

马其顿：1990—1998 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9.9 | -12.1 | -21.1 | -8.4 | -4.0 | -1.4 | 1.1 | 1.0 | 2.8 |
| 私人消费 | — | -13.6 | -7.3 | -9.9 | -7.5 | -0.6 | -2.4 | -3.5 | 1.9 |
| 公共消费 | — | 0.6 | -17.2 | -10.9 | -16.4 | -1.6 | -3.4 | -4.8 | 2.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4.4 | 8.4 | -20.2 | -15.1 | -5.0 | -3.0 | 7.5 | 8.0 |
| 工业总产出 | — | -17.2 | -15.6 | -13.8 | -10.5 | -10.7 | 3.2 | 2.0 | 4.0 |
| 农业总产出 | — | 31.3 | -14.7 | -21.5 | 37.0 | 4.0 | -4.0 | 3.0 | 3.5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工业(含矿业) | 48.0 | 45.6 | 44.7 | 44.4 | 42.8 | 39.3 | — | — | — |
| 农业 | 10.3 | 13.8 | 16.8 | 15.8 | 16.5 | 17.8 | — | — | — |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失业率 | — | 19.2 | 19.8 | 18.7 | 20.7 | 23.7 | 24.9 | 30.0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零售价格(年均) | 608.0 | 110.8 | 1511.0 | 362.0 | 128.3 | 15.7 | 3.8 | 4.4 | 5.1 |
| 零售价格(年末) | 121.0 | 229.7 | 1925.2 | 73.3 | 54.2 | 10.3 | -0.6 | 4.0 | 4.5 |
| 工业生产者价格(年均) | 394.0 | 112.0 | 2198.2 | 258.3 | 88.9 | 4.7 | -0.3 | 4.2 | 4.9 |
| 工业生产者价格(年末) | 42.0 | 281.5 | 2148.6 | 176.1 | 28.6 | 2.2 | -0.6 | 8.4 | — |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 | — | -14.9 | -34.9 | 28.6 | -10.2 | -4.3 | 0.5 | 0.2 | 1.8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 | -9.6 | -13.6 | -3.2 | -1.3 | -0.4 | -0.6 | -0.8 |
| 总政府支出 | — | — | 48.2 | 54.5 | 54.2 | 46.5 | 44.7 | 43.0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 | — | 0.3 | 0.5 | 8.0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 | -22.3 | -6.4 | 5.0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25.6 | 17.1 | 16.2 | 16.4 | 16.5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3—6个月) | — | 435—885 | 322—418 | 32—49 | 9—21 | 9—21 | 9—21 | 9—21 | — |
| 贷款利率(1年期) | — | — | 275—368 | 77—81 | 25—30 | 19—30 | 17—27 | 17—27 | — |
| 汇率(年末) | — | — | — | 44.5 | 40.6 | 38.0 | 41.4 | 55.4 | 51.0 |
| (Denar/美元) | | | | | | | | | |
| 汇率(年均) | — | 19.7 | — | 23.6 | 43.3 | 37.9 | 40.0 | 50.0 | 51.3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备注项目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2.1 | 2.2 | 2.2 | 2.2 | 2.1 | 2.1 | 2.1 | 2.1 | 2.0 |
| GDP(百万 Denar) | 507 | 920 | 11,791 | 59,161 | 136,033 | 143,597 | 147,554 | 154,246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1,077 | 911 | 771 | 753 | 1,931 | 1,864 | 1,565 | 1,637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3,328 | 3,038 | 2,750 | 2,867 | 2,808 | 2,807 | 2,823 | 2,886 |

(单位按各项所示)

摩尔多瓦: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2.4 | -17.5 | -29.1 | -1.2 | -31.2 | -3.0 | -8.0 | 1.3 | 1.0 |
| 私人消费 | — | — | -38.4 | -5.5 | -5.8 | -0.9 | 6.9 | 8.5 | 2.5 |
| 公共消费 | — | — | -26.4 | 19.9 | -31.8 | 16.1 | -7.8 | 6.5 | 0.5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26.0 | -44.0 | -51.0 | -17.0 | -15.0 | -6.0 | 10.7 |
| 工业总产出 | — | -21.0 | -27.1 | 0.3 | -27.7 | -3.9 | -6.5 | -2.3 | 0.6 |
| 农业总产出 | — | -28.0 | -15.0 | 5.9 | -22.2 | 3.6 | -10.0 | 9.0 | 1.6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 | 30 | 31 | 29 | 25 | 22 | 25 | — | — |
| 农业 | — | 33 | 38 | 46 | 48 | 49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失业率 | — | — | 0.1 | 0.7 | 1.1 | 1.4 | 1.4 | 1.7 |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4.0 | 98.0 | 1,109 | 1,614 | 486.4 | 29.9 | 23.5 | 11.8 | 11.8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51.0 | 1,670 | 2,706 | 104.6 | 23.8 | 15.1 | 11.1 | 12.2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 | 1,211 | 1,291 | 438.0 | 48.0 | 21.2 | 20.0 | 10.6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 | — | 6,947.0 | 207.0 | 47.0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 | — | -38.7 | -62.3 | -40.8 | 1.7 | 4.5 | 6.5 | 0.9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0.0 | -26.2 | -7.4 | -8.7 | -5.7 | -6.7 | -7.5 | -7.5 |
| 总政府支出 | — | 24.7 | 56.6 | 29.4 | 40.6 | 39.2 | 39.1 | 43.3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361.7 | 320.2 | 115.7 | 65.2 | 15.3 | 25.7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550 | 333.8 | 116.6 | 55.8 | 18.5 | 31.9 | — |
| 广义货币 | — | 69.5 | 43.3 | 15.8 | 13.0 | 16.3 | 16.4 | 18.8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 年期) | — | — | — | — | — | 20.6 | 25.4 | — | — |
| 贷款利率(1 年期) | — | — | — | — | — | 41.6 | 36.7 | — | — |
| 汇率(年末) ^① | — | 0.0 | 0.4 | 3.6 | 4.3 | 4.5 | 4.7 | 4.6 | — |
| 汇率(年均) ^② | — | — | 0.2 | 3.7 | 4.1 | 4.5 | 4.6 | 4.6 | — |
| (Lai/美元) |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39 | -182 | -82 | -149 | -256 | -310 | - |
| 贸易余额 | - | - | -37 | -180 | -54 | -70 | -254 | -275 | - |
| 出口 | - | - | 868 | 451 | 618 | 739 | 802 | 725 | - |
| 进口 | - | - | 905 | 631 | 672 | 809 | 1,056 | 1,000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17 | 14.0 | 18 | 73 | 56 | 71 | - |
| 储备总额(年末) | - | - | - | 89 | 179 | 257 | 315 | 324 | - |
| 外债总额 | - | - | 16 | 255 | 503 | 670 | 795 | 969 | - |
| 储备总额(年末) | | | | (进口商品、劳务的月数) | | | | | |
| | - | - | - | 1.7 | 2.9 | 3.0 | 3.0 | 3.0 | - |
| | | | | (占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2.4 | 9.4 | 6.5 | 22.7 | - |
| 债务偿还 | | | | (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3.0 | -11.9 | -5.8 | -8.9 | -13.5 | -14.9 | -15.5 |
| 外债/GDP | - | - | 1.3 | 16.7 | 35.3 | 40.0 | 41.8 | 46.5 | - |
| 外债/出口 | - | - | 1.9 | 56.4 | 81.3 | 90.7 | 99.2 | 133.6 | - |

(续表)

| 备注项目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口(百万) | 4.4 | 4.4 | 4.4 | 4.3 | 4.4 | 4.3 | 4.3 | 4.3 | 4.3 |
| GDP(百万 Lei) | — | 26 | 192 | 2210 | 5780 | 7636 | 8748 | 9585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232 | 137 | 326 | 391 | 452 | 523 | 560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 | 4,412 | 3,281 | 3,250 | 2,243 | 2,203 | 2,038 | 2,071 | 2,091 |

①1993年8月以前为俄罗斯卢布/美元,1993年11月以前为摩尔多瓦卢布/美元,之后为摩尔多瓦 Lei/美元。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波兰: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11.6 | -7.0 | 2.6 | 3.8 | 5.2 | 7.0 | 6.1 | 6.9 | 6.5 |
| 私人消费 | -15.3 | 6.3 | 2.3 | 5.2 | 4.3 | 4.5 | 8.7 | 7.0 | 4.9 |
| 公共消费 | 0.5 | 10.2 | 6.4 | 3.8 | 2.8 | 2.9 | 3.4 | 1.8 | 1.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10.6 | -4.4 | 2.3 | 2.9 | 9.2 | 18.5 | 20.6 | 21.9 | 16.2 |
| 工业总产出 | -24.2 | -8.0 | 2.8 | 6.4 | 12.1 | 9.7 | 9.2 | 10.2 | 9.0 |
| 农业总产出 | -2.2 | -1.6 | -12.7 | 6.8 | -9.3 | 10.7 | 0.3 | 0.8 | 0.5 |
| 产出构成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工业 | 44.9 | 40.2 | 34.0 | 32.9 | 32.2 | 28.9 | — | — | — |
| 农业 | 7.4 | 6.8 | 6.7 | 6.6 | 6.2 | 6.6 | — | — | — |
| 失业率 | 6.3 | 12.2 | 14.3 | 16.4 | 16.0 | 14.9 | 13.6 | 10.5 | 9.6 |
| 价格和工资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585.8 | 70.3 | 43.0 | 35.3 | 32.2 | 27.8 | 19.8 | 14.5 | 12.2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249.0 | 60.4 | 44.3 | 37.6 | 29.4 | 21.6 | 18.5 | 13.2 | 10.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622.4 | 48.1 | 34.5 | 31.9 | 30.1 | 25.4 | 12.1 | 12.5 | 8.0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192.8 | 35.7 | 31.5 | 37.0 | 27.9 | 18.9 | 11.2 | 11.6 |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31.3 | -0.3 | -2.7 | -2.9 | 0.5 | 3.0 | 5.7 | 6.8 | 5.2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① | 3.1 | -3.8 | -6.0 | -2.8 | -2.7 | -2.6 | -2.5 | -1.4 | -1.0 |
| 总政府支出 | 39.8 | 49.0 | 50.4 | 50.5 | 49.6 | 49.9 | 49.2 | 48.1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160.1 | 37.0 | 57.5 | 36.0 | 38.2 | 35.0 | 29.3 | 29.6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183.5 | 158.7 | 55.6 | 44.2 | 30.1 | 20.1 | 29.7 | 27.5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 广义货币 | 32.2 | 31.6 | 35.8 | 35.9 | 36.7 | 36.5 | 37.5 | 39.5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 | 53.0 | 36.0 | 32.0 | 25.0 | 26.0 | 22.0 | 18.3 | — | — |
| 贷款利率 | 61.0 | 40.0 | 39.0 | 35.0 | 31.0 | 24.0 | 23.3 | 24.5 | 22.0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汇率(年末) ^② | 0.95 | 1.10 | 1.58 | 2.13 | 2.44 | 2.47 | 2.88 | 3.52 | 3.64 |
| 汇率(年均) ^② | 0.95 | 1.06 | 1.36 | 1.81 | 2.27 | 2.43 | 2.70 | 3.28 | 3.56 |
| | | | | (兹罗提/美元)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对外部门 | | | | | (10亿美元) | | | | | |
| 经常项目 | 0.6 | -2.0 | 0.9 | -0.6 | 2.3 | 5.5 | -1.3 | -4.3 | -5.6 | |
| 贸易余额 ^① | 2.2 | 0.1 | 0.5 | -2.3 | -0.8 | -1.8 | -8.2 | -11.3 | -12.4 | |
| 出口 ^② | 10.9 | 12.8 | 14.0 | 13.6 | 17.0 | 22.9 | 24.4 | 27.2 | 30.3 | |
| 进口 ^③ | 8.6 | 12.7 | 13.5 | 15.9 | 17.8 | 24.7 | 32.6 | 38.5 | 42.7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0.0 | 0.3 | 0.7 | 1.8 | 1.8 | 3.6 | 4.4 | 6.6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4.5 | 3.6 | 4.1 | 4.1 | 5.8 | 14.8 | 17.8 | 20.7 | — | |
| 外债总额 | 49.0 | 48.0 | 47.6 | 47.2 | 42.2 | 43.9 | 40.4 | 38.1 | 40.4 | |
| 总储备额(年末) | 3.8 | 2.5 | 2.9 | 2.6 | 3.2 | 6.1 | 5.8 | 5.7 | — | |
| 债务偿还 | 53.7 | 68.9 | 19.3 | 20.1 | 14.3 | 6.7 | 7.6 | 5.7 | — | |
| 经常项目/GDP | 1.2 | -2.6 | 1.1 | -0.7 | 2.5 | 4.6 | -1.0 | -3.2 | -4.7 | |
| 外债/GDP | — | 61.5 | 56.4 | 54.9 | 45.6 | 36.9 | 30.0 | 28.3 | — | |
| 外债/出口 | — | 375.0 | 340.0 | 347.1 | 248.2 | 191.7 | 165.6 | 139.7 | — | |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转移支付除外)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转移支付除外)

(百分比)

(续表)

| 备注项目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口(百万) | 38.2 | 38.3 | 38.4 | 38.5 | 38.6 | 38.6 | 38.6 | 38.7 | 38.8 |
| GDP(10 亿兹罗提) | 59.0 | 82.5 | 114.9 | 155.8 | 210.4 | 288.7 | 362.8 | 44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1,630 | 2,033 | 2,195 | 2,230 | 2,400 | 3,061 | 3,478 | 3,510 | 3,811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4,948 | 5,062 | 5,242 | 5,504 | 5,887 | 6,238 | 6,667 | 7,095 |

(单位如各项所示)

① 不包括私有化收入。

② 1996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数据要以 10,000, 即那天开始使用新的兹罗提。

③ 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是在银行业统计和清算数据基础上作出的。在海关调查基础上得出的出口数据基本上与清算得出的同样, 但进口要高些(1994—1996 年约 20%)。

罗马尼亚: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 -5.6 | -12.9 | -8.7 | 1.5 | 3.9 | 7.1 | 4.1 | -6.6 | -2.1 |
| 私人消费 | — | — | -7.5 | 0.9 | 2.6 | 19.2 | 6.2 | -5.6 | -3.6 |
| 公共消费 | — | — | 5.2 | 2.8 | 10.9 | -9.7 | -8.6 | -11.0 | -4.8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11.0 | 8.3 | 20.7 | 8.6 | 4.5 | -15.9 | 1.7 |
| 工业总产出 | -23.7 | -22.8 | -21.9 | 1.3 | 3.3 | 9.4 | 9.9 | -5.9 | -4.0 |
| 农业总产出 | — | -8.6 | -13.3 | 10.2 | 0.2 | 4.5 | -3.3 | 3.1 | 1.5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工业 | 40.6 | 37.9 | 38.3 | 33.8 | 35.6 | 34.6 | 36.0 | 34.5 | — |
| 农业 | 21.8 | 18.9 | 19.0 | 21.0 | 19.8 | 19.9 | 19.1 | 20.7 | — |
| 失业率 | — | — | 8.2 | 10.4 | 10.9 | 9.5 | 6.4 | 8.8 | 10.5 |
| 价格 | | | | |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5.1 | 161.1 | 210.4 | 256.1 | 137.1 | 32.2 | 38.7 | 154.2 | 57.2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37.7 | 222.8 | 199.2 | 295.5 | 61.7 | 27.8 | 56.9 | 151.4 | 35.4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总政府收支 | 1.0 | 3.3 | -4.6 | -0.4 | -1.9 | -2.6 | -3.9 | -4.5 | -5.0 |
| 总政府支出 | 38.7 | 38.7 | 42.0 | 34.2 | 33.9 | 34.5 | 33.6 | 31.4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22.0 | 101.2 | 79.6 | 141.0 | 138.1 | 71.6 | 66.0 | 48.9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7.5 | 121.8 | 34.9 | 131.3 | 114.4 | 92.4 | 88.0 | 66.3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广义货币 | 59.6 | 46.7 | 28.9 | 9.1 | 21.5 | 25.4 | 28.9 | 24.9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期) | — | — | 38 | 52 | 62 | 38 | 47 | 60 | — |
| 贷款利率(1年期) | — | — | 53 | 129 | 83 | 59 | 71 | 70 | — |
| | (每年平均百分比)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34.7 | 189.0 | 460.0 | 1,276 | 1,767 | 2,578 | 4,035 | 7,850 | 11,290 |
| 汇率(年均) | 22.4 | 76.3 | 308.0 | 760.0 | 1,667 | 2,034 | 3,093 | 7,158 | 10,336 |
| | (lei/美元) | | | | | | |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1,656 | -1,181 | -1,518 | -1,239 | -516 | -1,732 | -2,571 | -2,486 | -2,263 |
| 贸易余额 | -1,743 | -1,254 | -1,373 | -1,130 | -483 | -1,605 | -2,494 | -1,414 | -2,915 |
| 出口 | 3,364 | 3,241 | 4,286 | 4,882 | 6,057 | 7,882 | 8,061 | 8,540 | 8,980 |
| 进口 | -5,107 | -4,495 | -5,659 | -6,012 | -6,550 | -9,487 | -10,555 | -9,875 | -11,894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18 | 37 | 77 | 94 | 347 | 404 | 415 | 998 | 1,500 |
| 总储备(年末) | 524 | 695 | 826 | 995 | 2,086 | 1,579 | 2,103 | 3,436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外债总额 | 1,140 | 2,131 | 3,240 | 4,249 | 5,509 | 6,710 | 8,480 | 9,200 | 9,631 | |
| 总储备额(年末) | 1.0 | 1.5 | 1.5 | 1.7 | 3.6 | 1.9 | 2.2 | 3.6 | — | |
| |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 转移支付除外) | | | | | | | | | |
| 债务偿还 | 0.2 | 2.3 | 8.9 | 6.2 | 8.7 | 11.5 | 14.8 | — | — | |
| |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 转移支付除外) | | |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4.4 | -4.1 | -7.8 | -4.7 | -1.6 | -4.9 | -7.1 | -6.6 | -5.7 | |
| 外债/GDP | — | 7.4 | 16.6 | 16.1 | 17.5 | 18.8 | 23.9 | 30.2 | — | |
| 外债/出口 | — | 65.8 | 75.6 | 87.0 | 90.8 | 85.1 | 105.2 | 121.8 |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按各项所示)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23.2 | 23.2 | 22.8 | 22.7 | 22.6 | 22.6 | 22.6 | 22.6 | 22.5 | |
| GDP(10 亿 Lei) | 858 | 2,204 | 6,029 | 20,036 | 49,768 | 72,560 | 109,515 | 249,750 | — | |
| 人均 GDP(美元) | 1,257 | 1,187 | 859 | 1,159 | 1,314 | 1,573 | 1,567 | 1,671 | 1,753 |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3,220 | 2,939 | 2,988 | 3,108 | 3,336 | 3,485 | 3,262 | 3,201 | |

俄罗斯：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 产出 |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4.0 | -13.0 | -14.5 | -8.7 | -12.6 | 4.0 | -4.9 | 0.4 | -0.4 | |
| 私人消费 | — | — | -3.0 | -13.4 | -7.8 | 7.7 | -1.8 | -1.2 | 0.8 | |
| 公共消费 | — | — | -9.9 | 32.1 | -5.8 | -23.6 | -4.4 | 4.0 | -4.0 |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10.1 | -37.1 | -21.1 | -29.3 | -6.0 | -15.0 | -5.0 | -1.0 | |
| 工业总产出 | -0.1 | -8.0 | -18.1 | -14.1 | -20.9 | -3.3 | -4.0 | 1.9 | -0.5 | |
| 农业总产出 | -4.0 | -3.7 | -9.4 | -4.4 | -12.0 | -8.0 | -7.0 | 0.1 | 1.9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工业 | — | 45.9 | 42.2 | 40.6 | 37.6 | 39.0 | 39.3 | — | — | |
| 农业 | — | 13.8 | 7.3 | 7.5 | 8.7 | 8.6 | 8.6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失业率 ^① | 0.0 | 0.0 | 4.8 | 5.7 | 7.5 | 8.8 | 9.3 | 9.0 | 9.8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5.6 | 93.0 | 1533.0 | 881.0 | 322.0 | 196.0 | 47.8 | 14.7 | 9.0 |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44.0 | 2525.0 | 847.2 | 223.6 | 131.4 | 21.8 | 11.0 | 9.5 |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3.9 | 193.0 | 3916.0 | 1149.0 | 347.0 | 243.0 | 52.2 | 15.0 | 6.7 |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345.0 | 3274.9 | 927.7 | 233.9 | 174.7 | 25.6 | 7.4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 | — | -3.0 | -33.0 | 0.4 | -8.0 | -26.0 | 5.0 | 4.3 | 1.5 |
| 政府部门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总政府收支 ^② | — | — | -21.6 | -7.4 | -10.4 | -5.7 | -8.2 | -7.5 | -6.0 |
| 总政府支出 | — | — | 65.8 | 43.3 | 45.0 | 37.7 | 38.7 | 38.2 | — |
| 货币部门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17.6 | 125.9 | 568.1 | 425.8 | 197.5 | 127.5 | 33.7 | 30.0 | — |
| 净国内资产(年末) | — | — | — | 770.0 | 359.8 | 70.3 | 80.9 | 14.0 | — |
| 广义货币 | 70.1 | 68.4 | 32.3 | 19.1 | 16.0 | 13.6 | 13.1 | 14.4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中央银行再融资利率 | — | 6009 | 80 | 210 | 180 | 160 | 48 | 28 | — |
| 汇率(年末) ^③ | 1.7 | 169 | 415 | 1,247 | 3,550 | 4,640 | 5,560 | 5,958 | 6,578 |
| 汇率(年均) ^④ | 1.7 | 67 | 222 | 933 | 2,205 | 4,557 | 5,123 | 5,785 | 6,360 |

(卢布/美元)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① | — | — | — | 2.6 | 10.4 | 4.5 | 2.2 | 3.9 | — |
| 贸易余额 ^① | — | — | — | 9.5 | 21.1 | 17.4 | 17.0 | 16.6 | — |
| 出口 ^① | — | — | — | 58.3 | 69.6 | 90.2 | 88.8 | — | — |
| 进口 ^① | — | — | — | 44.2 | 48.5 | 64.0 | 73.9 | 72.2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0.7 | 0.4 | 0.6 | 2.0 | 2.0 | 3.9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1.9 | 5.8 | 4.0 | 14.4 | 11.3 | 17.8 | — |
| 外债总额 ^② | 61.1 | 67.0 | 107.7 | 112.7 | 119.9 | 120.4 | 125.0 | 131.9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1.7 | 1.2 | 2.4 | 2.0 | 2.2 | — |
| 应偿付外债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1.4 | 3.8 | 1.3 | 0.5 | 0.8 | -0.4 |
| 外债/GDP | — | 321.1 | 124.6 | 61.3 | 43.3 | 33.7 | 28.4 | 27.8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193.3 | 172.3 | 147.7 | 138.6 | 148.5 | — |

(10亿美元)

(占经常项目支出中进口的月数,转移支付除外)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转移支付除外)

(百分比)

* 1. 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备注项目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148.3 | 148.9 | 148.3 | 148.2 | 149.0 | 148.1 | 147.7 | 147.2 | 147.0 |
| GDP(万亿卢布) | 0.6 | 1.4 | 19.2 | 171.5 | 611 | 1,630 | 2,256 | 2,74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577 | 1,249 | 1,885 | 2,410 | 2,985 | 3,132 | 3,127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6,131 | 5,609 | 4,904 | 4,701 | 4,486 | 4,499 | 4,513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①数值是在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基础上估计的。
- ②总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预算外资金和 1990—1994 年末计入预算的进口补贴。
- ③1998 年后用新卢布计价。
- ④从联合收支平衡表中得到的数据,含与独联体或非独联体国家的交易。
- ⑤1992 年后包含了对前经互会国家的债务。

斯洛伐克: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2.5 | -14.6 | -6.5 | -3.7 | 4.9 | 6.8 | 6.9 | 6.5 | 4.0 |
| 私人消费 | — | -18.5 | -2.3 | -1.5 | 0.0 | 3.4 | 7.2 | 5.7 | 4.7 |
| 公共消费 | — | -23.8 | 23.9 | -2.2 | -10.5 | 1.6 | 24.2 | 3.1 | 3.7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8.6 | -15.7 | -4.2 | -5.1 | 5.8 | 33.3 | 10.2 | -1.2 |
| 工业总产出 | -3.6 | -19.4 | -9.2 | -3.8 | 4.9 | 8.3 | 2.5 | 4.0 | 4.6 |
| 农业总产出 | -7.2 | -7.4 | -13.9 | -8.1 | 4.8 | 2.4 | 2.7 | 5.0 | 2.5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工业 | — | — | 32.0 | 29.2 | 28.7 | 28.6 | 26.3 | — | — |
| 农业 | — | — | 6.2 | 6.6 | 6.6 | 5.6 | 5.2 | — | — |
| 失业率 | — | 11.8 | 11.4 | 12.2 | 13.7 | 13.8 | 12.6 | 13.0 | 13.0 |
| | | | | | (占劳动力百分比)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10.8 | 56.0 | 10.0 | 23.2 | 13.4 | 9.9 | 5.8 | 6.1 | 7.3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18.4 | 58.3 | 9.2 | 25.1 | 11.7 | 7.2 | 5.4 | 6.4 | 7.5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4.4 | 68.6 | 5.3 | 17.2 | 10.0 | 9.0 | 4.1 | 4.5 | —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50.6 | 6.1 | 18.8 | 9.4 | 7.1 | 4.7 | 4.4 | — |

* 1. 1990—1998 年的有关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 | -6.9 | -25.3 | 8.7 | -3.6 | 3.0 | 4.1 | 7.1 | 7.5 | 3.5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 -1.8 | 0.6 | -0.5 | -7.0 | -5.2 | -1.6 | -4.4 | -5.7 | -4.4 |
| 总政府支出 | - | - | - | 51.2 | 47.7 | 46.9 | 48.9 | 45.3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16.8 | 20.1 | 19.2 | 16.5 | 8.9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9.2 | 7.8 | 14.4 | 3.1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68.0 | 73.0 | 64.3 | 67.5 | 67.9 | 69.3 | 71.6 | 70.7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 | | |
| 贴现率 | 8.5 | 9.5 | 9.5 | 12.0 | 12.0 | 9.8 | 8.8 | 8.8 | - |
| 平均贷款利率 ^① | - | - | - | 14.1 | 14.4 | 14.8 | 13.2 | 16.0 | - |
| 平均存款利率 | - | - | - | 8.7 | 9.2 | 8.2 | 6.2 | 9.0 | - |
| 汇率(年末) | 28.0 | 27.8 | 28.9 | 33.1 | 31.3 | 29.7 | 31.7 | 34.5 | 38.6 |
| (克朗/美元) |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汇率(年均) | 18.0 | 29.5 | 28.3 | 30.8 | 32.1 | 29.7 | 30.7 | 33.6 | 35.1 |
| 对外部门 | (10亿美元)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1.1 | 0.3 | -0.3 | -0.6 | 0.7 | 0.4 | -2.1 | -1.3 | -1.7 |
| 贸易余额 | -0.8 | -0.5 | -1.9 | -0.9 | 0.1 | -0.2 | -2.3 | -1.4 | -1.6 |
| 出口 | 5.9 | 8.3 | 8.4 | 5.5 | 6.7 | 8.6 | 8.8 | 8.8 | 10.0 |
| 进口 | 6.5 | 8.3 | 10.4 | 6.4 | 6.6 | 8.8 | 11.1 | 10.2 | 11.6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0.1 | 0.2 | 0.2 | 0.2 | 0.2 | 0.2 | 0.3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 | - | 0.4 | 1.7 | 3.4 | 3.5 | 3.3 | - |
| 外债总额 | - | - | - | 3.4 | 4.7 | 5.7 | 7.7 | 10.7 | 12.0 |
| 总国际储备(年末) | - | - | - | 0.7 | 2.5 | 3.8 | 3.2 | 3.2 | - |
| | (进口商品, 劳务的月数) | | | | | | | | |
| 债务偿还 | - | - | - | 8.6 | 8.7 | 9.3 | 10.8 | 17.4 | - |
| | (占出口商品, 劳务的百分比) | |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2.9 | - | - | -4.8 | 5.2 | 2.3 | -11.1 | -6.7 | -8.2 |
| 外债/GDP | - | - | - | 28.1 | 33.8 | 32.8 | 40.4 | 52.5 | - |
| | (百分比)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外债/出口 | — | — | — | 62 | 69.1 | 66.1 | 86.9 | 113.7 | — |
| 备注项目 | | |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人口(百万) | 5.3 | 5.3 | 5.3 | 5.3 | 5.3 | 5.4 | 5.4 | 5.4 | 5.4 |
| GDP(10 亿克朗) | 258 | 320 | 332 | 370 | 441 | 515 | 581 | 647 | — |
| 人均 GDP(美元) | 2,710 | 1,798 | 2,214 | 2,253 | 2,570 | 3,232 | 3,526 | 3,620 | 3,837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6,965 | 6,568 | 6,290 | 6,574 | 7,013 | 7,486 | 7,958 | 8,259 |

①1995 年之后不包括零息贷款。

②黑体数字为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据。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①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0.5 | 0.1 | 0.9 | 0.2 | 0.6 | 0.0 | 0.0 | 0.0 | -0.1 |
| 贸易余额 | -0.6 | -0.3 | 0.8 | -0.2 | -0.3 | -1.0 | -0.9 | -1.0 | -1.1 |
| 出口 | 4.1 | 3.9 | 6.7 | 6.1 | 6.8 | 8.3 | 8.4 | 8.4 | 9.2 |
| 进口 | 4.7 | 4.1 | 5.9 | 6.2 | 7.2 | 9.3 | 9.2 | 9.4 | 10.3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0.0 | 0.1 | 0.1 | 0.1 | 0.2 | 0.2 | 0.3 | 0.4 |
| 总储备额(年末) | — | 0.1 | 0.7 | 0.8 | 1.5 | 1.8 | 2.3 | 3.3 | — |
| 外债总额 | — | 1.9 | 1.7 | 1.9 | 2.3 | 3.0 | 4.0 | 4.1 | 4.5 |
| | | | | | | | | | |
| 总储备额(年末) | 0.6 | 0.4 | 1.2 | 1.2 | 2.1 | 2.0 | 2.5 | 3.7 | — |
| | | | | | | | | | |
| 偿还债务 | — | 7.0 | 5.2 | 5.5 | 5.4 | 6.9 | 8.6 | 8.5 | — |
| | | |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1.0 | 7.4 | 1.5 | 4.2 | -0.1 | 0.2 | 0.2 | -0.4 |
| 外债/GDP | — | 14.7 | 13.9 | 14.8 | 15.7 | 15.8 | 21.3 | 23.2 | — |
| 外债/出口 | — | 48.2 | 26.1 | 30.8 | 33.1 | 35.6 | 47.9 | 49.7 | — |

(10亿美元)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 转移支付除外)

(占经常项目收入百分比, 转移支付除外)

(百分比)

(续表)

| 备注项目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口(百万)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 名义 GDP ^① | 197 | 349 | 1,018 | 1,435 | 1,853 | 2,221 | 2,553 | 2,873 | — |
| 人均 GDP(美元) | 8,671 | 6,334 | 6,275 | 6,368 | 7,205 | 9,348 | 9,471 | 9,028 | 9,673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12,392 | 11,268 | 10,680 | 11,008 | 11,602 | 12,086 | 12,437 | 12,940 | 13,497 |

(单位如各项所示)

①1991年10月8日以前(引入本币 Tolar 元前)按1美元折多少万第纳尔计算, Tolar 与第纳尔之间按 1:10000 换算。

②1990—1991年的数据中不包含阿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交易。

③1990年为10亿第纳尔,之后为10亿 Tolar。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 | 5.7 | -22.6 | -47.2 | -46.6 | -36.3 | -82.3 | -36.4 | 67.2 | —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国家预算收支 | — | -16.4 | -28.4 | -23.6 | -10.2 | -11.2 | -5.8 | -3.5 | -3.0 |
| 国家预算支出 | — | 49.6 | 55.5 | 50.7 | 54.8 | 26.5 | 17.9 | 15.1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化)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68 | 579 | 1,429 | 159 | 413 | 144 | 112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125 | 393 | 164 | 192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9.1 | 8.6 | 24.5 | 10.7 | 8.5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每年百分比, 年末)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 ^① | — | 30 | 30 | 30 | 30 | 100 | 85 | 118 | — |
| 贷款利率(1年) ^① | — | 30 | 30 | 30 | 30 | 500 | 124 | 136 | — |
| 汇率(年末) ^② | — | 1.8 | 415.0 | 1247.0 | 3550.0 | 284.6 | 320.0 | 747.0 | 781.7 |
| 汇率(年均) ^② | — | 1.7 | 222.0 | 930.0 | 2204.0 | 86.1 | 302.3 | 533.5 | 754.0 |
| (塔吉克卢布/美元) | | | | | | |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百万美元)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53 | -208 | -169 | -54 | -74 | -15 | — |
| 贸易余额 | — | — | -55 | -204 | -148 | -41 | -38 | -5 | — |
| 出口 | — | — | — | 456 | 559 | 839 | 770 | 727 | — |
| 进口 | — | — | — | 660 | 707 | 880 | 808 | 732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8 | 9 | 12 | 17 | 20 | 20 | — |
| 储备总额(年末) | — | — | — | 2 | 1 | 4 | 14 | 41 | — |
| 外债总额 | — | — | 0 | 509 | 760 | 817 | 868 | 893 | — |
| 国际储备总额(年末) | — | — | — | 0.0 | 0.0 | 0.0 | 1.0 | 0.7 | — |
| | | | | (进口商品的月数) | | | | | |
| 偿还债务 | — | — | — | 5.7 | 9.7 | 25.5 | 32.6 | 12.5 | — |
| | | | | (占出口商品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18.1 | -27.4 | -21.0 | -11.2 | -10.1 | -2.8 | -3.3 |
| 外债/GDP | — | — | 0.0 | 66.9 | 93.8 | 170.1 | 83.9 | 82.9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111.6 | 136.0 | 97.4 | 112.7 | 122.8 | —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续表)

| 备注项目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口(百万) | 5.5 | 5.6 | 5.6 | 5.7 | 5.8 | 5.9 | 5.9 | 6.0 | 6.0 |
| 名义 GDP ^① | 5,490 | 10,540 | 64,750 | 707,060 | 1,786,490 | 64,843 | 308,474 | 631,9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52 | 131 | 137 | 130 | 173 | 171 | 219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1,574 | 1,300 | 997 | 861 | 705 | 707 | 727 |

(单位如各项所示)

①1993年6月以前利率由议会制度。

②1994年以前为卢布/美元,之后为塔吉克卢布/美元。

③1994年以前为百万卢布,之后为百万塔吉克卢布。

土库曼斯坦: 1990—1998 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2.0 | -4.7 | 5.3 | -10.0 | -18.8 | -8.2 | -8.0 | -25.0 | 12.0 |
| 私人消费 | — | — | -28.3 | -12.4 | -12.1 | -16.2 | 15.7 | 5.9 | 8.4 |
| 公共消费 | — | — | -31.4 | -13.4 | -13.1 | -17.2 | 14.7 | -2.1 | 4.4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20.0 | 45.0 | -38.2 | -8.4 | -6.1 | -8.8 | -2.7 |
| 工业总产值 | — | 4.8 | -14.9 | 5.4 | -25.0 | -7.0 | 17.9 | -29.2 | 8.3 |
| 农业总产值 | — | — | -8.5 | 15.7 | -17.6 | -17.5 | -32.8 | 5.4 | 2.8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 | — | 20.0 | 59.0 | 55.1 | 73.2 | 52.2 | 50.0 | — | — |
| 农业 | — | 46.0 | 19.0 | 11.5 | 9.0 | 30.3 | 17.5 | — | — |
| | | | | | | | | | |
| 失业率 ^① | 2.0 | 2.0 | — | — | — | 3.0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4.6 | 103 | 493 | 3,102 | 1,748 | 1,005 | 992 | 83.7 | 33.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55 | 644 | 9,750 | 1,328 | 1,262 | 446 | 21.5 | 50.0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 | — | 3.1 | -11.0 | -72.6 | -42.2 | -3.5 | 68.1 | 3.7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政府收支 ^② | 1.2 | 2.5 | 13.2 | -0.5 | -1.4 | -1.6 | -0.2 | -0.5 | -5.0 |
| 总政府支出 | 43.6 | 38.2 | 42.2 | 19.2 | 11.9 | 14.0 | 15.7 | 29.0 | — |

从非居民部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货币部门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续表)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 | 984 | 448 | 429 | 82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 | 915 | 403 | 1,388 | 26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22.0 | 15.8 | 11.4 | 8.6 | 12.0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存款利率(1年期) | — | — | — | 50 | 206 | 80 | 130 | 42 | — |
| 贷款利率(1年期) | — | — | — | 108 | 300 | 70 | 200 | 70 | — |
| 官方汇率(年末) | — | — | — | 2 | 75 | 500 | 5,200 | 5,300 | 8,450 |
| 官方汇率(年均) | — | — | — | — | 17 | 195 | 3,472 | 5,300 | 7,769 |
| 对外部门 | | | | | (Manat/美元) | | | | |
| 经常项目 | — | — | — | 776 | 84 | 23 | 43 | -596 | — |
| 贸易余额 ^① | -249 | 590 | 1,140 | 1,100 | 485 | 441 | 159 | -245 | — |
| 出口 ^② | 151 | 1,238 | 2,149 | 2,693 | 2,176 | 2,084 | 1,691 | 759 | — |
| 进口 ^③ | 400 | 648 | 1,009 | 1,593 | 1,691 | 1,644 | 1,532 | 1,004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11 | 104 | 103 | 233 | 129 | 108 | — |
| 储备总额(年末) | — | — | — | 818 | 927 | 1,170 | 1,172 | 1,285 | — |
| 外债总额 | — | — | — | 168 | 371 | 515 | 668 | 1,248 | — |

(经常项目支出的月数,不含转移支付)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储备总额 ^① | — | — | — | 6.2 | 5.1 | 6.3 | 7.9 | 10.4 | — |
| 偿还债务 | — | — | — | 0 | 1.8 | 12.6 | 16.6 | 24.8 | — |
| | (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不含转移支付。) | | |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16.5 | 3.8 | 0.9 | 2.2 | -33.8 | -15.8 |
| 外债/GDP | — | — | — | 3.6 | 16.6 | 20.5 | 34.5 | 70.7 | — |
| 外债/出口 | — | — | — | 6.2 | 17.0 | 24.7 | 39.5 | 164.4 | — |
| 备注项目 | (单位如各项所示)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3.7 | 3.8 | 4.0 | 4.1 | 4.3 | 4.4 | 4.6 | 4.7 | 4.8 |
| GDP(百万 Baht) | — | — | — | 9.4 | 141 | 1,072 | 7,608 | 9,446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386 | 1,098 | 188 | 193 | 278 | 432 | 399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4,896 | 4,823 | 3,377 | 3,135 | 2,987 | 2,506 | 2,589 |

①没有官方失业率数字,这是在家庭调查基础上作的估计。

②1997年之前大部分部门的准预算支出未包括在预算内有大量预算外资金运作。

③从1996年开始天然气出口按 FOB 报价计算进口品加上运输价格。1993—1996年间以现金为基础的经常项目是赤字(不含拖欠的天然气付款)。

④这只是进口的比率。1996年以前经常项目支出中都含有天然气运输费用,因此和1996年之后的数据不可比。包括运输费用后储备比率约为6.6%。

乌克兰: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3.4 | -11.6 | -13.7 | -14.2 | -23.0 | -12.2 | -10.0 | -3.2 | 1.0 |
| 私人消费 | — | — | -9.0 | -30.1 | -17.1 | -15.1 | -6.0 | -0.4 | 1.0 |
| 公共消费 | — | — | -9.1 | -27.3 | -11.3 | -13.1 | -5.0 | -4.4 | 0.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37.0 | -10.0 | -25.0 | -14.7 | -19.8 | -9.1 | 3.8 |
| 工业总产值 | -0.1 | -4.8 | -6.4 | -8.0 | -27.3 | -12.0 | -5.1 | -1.8 | 2.5 |
| 农业总产值 | -4.0 | -13.0 | -8.3 | 1.5 | -16.5 | -3.6 | -9.5 | -2.0 | 0.4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 | | | | (占 GDP 百分比) | | | | |
| 工业 | 34.7 | 45.8 | 43.5 | 29.9 | 39.0 | 34.6 | 31.0 | 34.0 | — |
| 农业 | 24.4 | 24.4 | 20.3 | 21.6 | 16.0 | 14.9 | 6.7 | 6.0 | — |
| 失业率 | 0.0 | 0.0 | 0.3 | 0.4 | 0.4 | 0.5 | 1.6 | 2.9 | 4.0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4.2 | 91.0 | 1,210 | 4,700 | 891 | 377 | 80.0 | 16.0 | 18.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61 | 2,730 | 10,155 | 401 | 182 | 39.7 | 10.1 | 19.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4.5 | 125 | 2,384 | 2,453 | 1,134 | 593 | 59.0 | 7.5 | —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4.5 | 163 | 3,828 | 9,668 | 774 | 172 | 17.3 | 5.0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工业平均工资(总) | — | — | — | -46.4 | -10.7 | -13.8 | -21.5 | 0.7 | 1.0 |
| 政府部门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总政府收支 | — | — | -25.4 | -16.2 | -7.8 | -4.8 | -3.2 | -5.8 | -4.0 |
| 总政府支出 | — | — | 58.4 | 54.5 | 51.5 | 43.9 | 40.4 | 43.2 | — |
| 货币部门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 | 758 | 573 | 117 | 35 | 28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2,400 | 1,529 | 583 | 166 | 38 | 31 | — |
| 广义货币 | — | — | — | 31.8 | 26.2 | 12.7 | 11.6 | 13.1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每年年末百分比) | | | | |
| 平均存款利率 | — | — | 82 | 216 | 140 | 62 | 26 | 43 | — |
| 平均贷款利率 | — | — | 77 | 295 | 205 | 156 | 76 | 19 | — |
| 汇率(年末) ^① | — | — | 638 | 12,610 | 108,855 | 179,497 | 1,889 | 1,895 | 2,1832 |
| 汇率(年均) ^② | 59 | 174 | 275 | 4,533 | 49,860 | 147,308 | 1,829 | 1,862 | 2,13 |

■ 1. 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

从体克到活丹。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2.9 | -0.6 | -0.8 | -1.4 | -1.2 | -1.1 | -1.5 | - |
| 贸易余额 | -12.7 | -3.4 | -0.6 | -2.5 | -2.6 | -2.7 | -4.3 | -4.8 | - |
| 出口 | 74.6 | 50.0 | 11.3 | 12.8 | 13.9 | 14.2 | 15.5 | 15.3 | - |
| 进口 | 87.3 | 53.4 | 11.9 | 15.3 | 16.5 | 15.9 | 19.8 | 20.1 | - |
| 净外商直接投资 | - | - | 0.2 | 0.2 | 0.1 | 0.4 | 0.5 | 0.7 | - |
| 储备总量(年末) | - | - | 0.5 | 0.2 | 0.6 | 1.1 | 2.0 | 2.2 | - |
| 外债总额 | - | - | 0.5 | 3.7 | 7.7 | 8.1 | 9.2 | 10.2 | - |
| 储备总量(年末) | - | - | 0.5 | 0.1 | 1.8 | 2.3 | 3.7 | 5.2 | 5.6 |
| | | | | (进口商品、劳务周数) | | | | | |
| 偿还债务 | - | - | - | 1.3 | 12.1 | 9.3 | 6.0 | 6.7 | - |
| | | | | (出口商品、劳务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5.8 | -3.8 | -3.2 | -2.5 | -3.0 | -2.4 |
| 外债/GDP | - | - | - | 26.6 | 20.4 | 22.0 | 20.8 | 20.5 | - |
| 外债/出口 | - | - | 4.4 | 28.9 | 55.3 | 57.0 | 59.6 | 68.0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续表)

| 备注项目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人口(百万) | 51.8 | 51.9 | 52.0 | 52.1 | 51.9 | 51.7 | 51.3 | 50.9 | 50.6 |
| GDP(百万 Hryvnia) | 2 | 3 | 51 | 1,483 | 12,038 | 54,516 | 80,510 | 92,5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351 | 627 | 463 | 724 | 870 | 961 | 953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4,652 | 3,984 | 3,073 | 2,751 | 2,500 | 2,426 | 2,462 |

① 拍卖比率, 1991 年以前为卢布/美元, 之后至 1995 年为 Karbovanets/美元, 再之后为 Hryvnia/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 1.6 | -0.5 | -11.1 | -2.3 | -4.2 | -0.9 | 1.6 | 2.4 | 2.0 |
| 私人消费 | — | — | -28.5 | 23.6 | 7.5 | -17.6 | 5.2 | 8.1 | 3.6 |
| 公共消费 | — | — | -14.1 | 19.3 | -17.3 | -2.7 | -22.9 | 7.1 | 2.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 | -32.0 | -5.0 | -0.1 | 25.1 | 1.7 | 8.1 | 3.7 |
| 工业总产值 | — | -3.8 | -6.7 | 3.6 | 1.6 | 0.2 | 6.0 | 6.5 | 7.0 |
| 农业总产值 | — | -0.4 | -6.0 | 1.0 | -8.0 | -3.0 | -5.4 | 3.2 | 3.3 |
| | | | | | (百分比变动) | | | | |
| 产出构成 | | | | | | | | | |
| 工业 | 22.7 | 26.3 | 26.6 | 22.4 | 17.0 | 17.1 | 17.4 | 16.3 | — |
| 农业 | 33.4 | 37.3 | 35.4 | 27.9 | 34.5 | 28.1 | 22.5 | 27.5 | — |
| | | | | | (占GDP百分比) | | | | |
| 失业率 | 0.0 | 0.0 | 0.1 | 0.3 | 0.4 | 0.4 | 0.4 | 0.5 | 0.7 |
| | | | | | | (占劳动力总量百分比)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3.1 | 82.2 | 645 | 534 | 1,568 | 305 | 54.0 | 59.0 | 24.0 |
| 消费品价格(年末) | — | 169.0 | 910 | 885 | 1,281 | 117 | 64.0 | 28.0 | 35.0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7.2 | 147.3 | 3,275 | 2,545 | 1,428 | 499 | 64.0 | — | — |
| 生产者价格(年末) | — | 311.0 | 1,300 | 1,120 | 1,070 | 830 | 57.6 | 45.2 | 23.8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平均工资 | — | -17.1 | -10.2 | 6.7 | -40.0 | 8.5 | 1.1 | 4.8 | 5.3 |
| 政府部门 | | | | | | | | | |
| 联合政府收支 ^① | -1.1 | -3.6 | -18.4 | -10.4 | -6.1 | -4.1 | -7.3 | -2.3 | 3.0 |
| 联合政府支出 | 46.1 | 52.7 | 43.4 | 38.8 | 33.3 | 37.6 | 36.2 | 32.8 | — |
| 货币部门 | | | | | | | | | |
| 广义货币(年末) | — | — | 468.0 | 784.0 | 680.3 | 158.0 | 100.0 | 34.6 | — |
| 国内信贷(年末) | — | — | — | 854.4 | 239.0 | 58.3 | 258.8 | 79.7 | — |
| 广义货币 | — | — | 69.4 | 53.5 | 32.8 | 18.1 | 19.6 | 16.4 | — |
| 利率和汇率 | | | | | | | | | |
| 存款利率(1年期) | — | 7 | 10 | 30 | 60 | 90 | 40 | 39 | — |
| 贷款利率(1年期) | — | — | — | — | 100 | 105 | 60 | 59 | — |
| (年末计算的每年百分比) | | | | | | | | | |
| 汇率(年末) ^② | — | 2.0 | 415.0 | 1,247 | 25.0 | 36.0 | 54.7 | 69.8 | 108.0 |
| 汇率(年均) ^② | 0.6 | 0.6 | 222.0 | 1.0 | 10.0 | 30.5 | 38.0 | 62.3 | 88.9 |
| | | | | | (Sum/美元) | | | | |

• 1. 1990—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7,225 | -238 | -429 | 118 | -49 | -1,075 | -800 | — |
| 贸易余额 | — | 688 | -236 | -378 | 213 | 208 | -931 | -300 | — |
| 出口 | — | 11,829 | 1,424 | 2,877 | 2,940 | 3,806 | 3,781 | 3,700 | — |
| 进口 | — | 11,141 | 1,659 | 3,255 | 2,727 | 3,597 | 4,712 | 4,000 | — |
| 净外国直接投资 | — | — | 9 | 73 | 73 | -24 | 50 | 60 | — |
| 储备总量(年末) ^① | — | — | 1 | 1,273 | 2,917 | 2,013 | 2,221 | 1,200 | — |
| 外债总额 | — | 0 | 65 | 948 | 1,101 | 1,782 | 2,331 | 2,594 | — |
| 储备总量(年末) | | | | | | | | | |
| | — | — | 0.6 | 3.8 | 5.9 | 6.2 | 4.7 | 3.5 | — |
| | | | | (商品、劳务进口的月数) | | | | | |
| 债务偿还 | — | — | 0.4 | 0.7 | 10.5 | 15.8 | 9 | 9.8 | — |
| | | | | (商品、劳务出口的百分比) | | | | | |
| 经常项目/GDP | — | — | — | -8.4 | 2.1 | -0.5 | -7.9 | -5.5 | -3.5 |
| 外债/GDP | — | — | — | 18.6 | 19.3 | 17.8 | 17.1 | 18.0 | — |
| 外债/出口 | — | — | 4.6 | 33.0 | 37.4 | 46.8 | 61.7 | 70.1 | —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备注项目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20.5 | 20.9 | 21.3 | 22.0 | 22.7 | 22.7 | 23.1 | 23.6 | 24.0 |
| GDP(百万 Sam) | 32.4 | 61.5 | 447 | 5,095 | 64,878 | 302,787 | 560,147 | 962,000 | — |
| 人均 GDP(美元) | — | 1,706 | 95 | 254 | 117 | 374 | 446 | 532 | 446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 | 2,746 | 2,621 | 2,455 | 2,384 | 2,368 | 2,430 | 2,504 |

(单位如各项所示)

①包括预算外资金。

②1993 年以前卢布/美元, 1993 年后 Sam/美元。

③包括黄金。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1990—1998年相关经济指标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百分比变化) | | | | | | | | | |
| 产出 | | | | | | | | | |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 — | -8.2 | -26.1 | -27.7 | 6.5 | 6.6 | 5.8 | 8.8 | 3.7 |
| 私人消费 | — | -15.3 | -22.3 | -35.8 | 31.8 | 13.0 | 3.0 | 9.0 | 0.2 |
| 公共消费 | — | -0.8 | -8.5 | -36.8 | 19.0 | 12.0 | 2.0 | 8.0 | -0.8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 | -9.4 | -37.3 | -35.0 | -7.5 | -5.0 | 4.0 | 9.8 | 11.1 |
| 工业总产值 | — | -17.8 | -22.1 | -37.5 | 4.0 | 4.0 | 8.0 | 10.0 | 5.0 |
| 农业总产值 | — | 10.0 | -18.0 | -3.0 | 6.0 | 3.0 | -3.0 | 6.2 | 3.5 |
| 失业率 | — | 21.4 | 22.8 | 23.1 | 23.1 | 24.7 | 26.1 | 25.5 | 24.0 |
| (占劳动力总量百分比) | | | | | | | | | |
| 价格和工资 | | | | | | | | | |
| 消费品价格(年均) | — | 122 | 8,926 | — | 3 | 79 | 93 | 18 | 46 |
| 生产者价格(年均) | — | 124 | 9,093 | — | 8 | 58 | 90 | 20 | 91 |
| 平均工资 | — | -5.0 | -49.0 | -61.1 | 200.9 | 41.7 | -12.4 | 16.9 | 2.7 |
| 汇率 ^① | (新第纳尔/美元) | | | | | | | | |
| 汇率(年末) | — | 19.7 | 750.0 | 1,776 | 1.6 | 4.7 | 5.0 | 5.9 | 11.6 |
| 汇率(年均) | — | 19.6 | 2,467 | — | 1.6 | 2.0 | 5.0 | 5.6 | 10.8 |

(续表)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
| 对外部门 | | | | | | | | | |
| 经常项目 | - | - 536 | - 935 | - | - | - | - 1,863 | - 2,062 | - 1,115 |
| 贸易余额 | - | - 844 | - 1,320 | - | - | - | - 2,266 | - 2,447 | - 1,527 |
| 出口 | - | 4,704 | 2,539 | - | - | - | 1,831 | 2,406 | 2,547 |
| 进口 | - | 5,548 | 3,859 | - | - | - | 4,097 | 4,853 | 4,074 |
| | | | | | | | | | |
| 备注项目 | | | | | | | | | |
| 人口(百万) | - | 10.4 | 10.4 | 10.4 | 10.5 | 10.6 | 10.6 | 10.7 | 10.7 |
| GDP(百万新加坡元) ^① | - | - | - | - | 16,147 | 38,760 | 68,980 | 88,984 | 134,196 |
| 人均 GDP(美元) | - | - | - | - | 952 | 1,856 | 1,299 | 1,479 | 1,164 |
| 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 | 4,919 | 3,619 | 2,607 | 2,769 | 2,938 | 3,093 | 3,352 | 3,462 |

①1993 年以前按新加坡元计算,1993 年以后按新加坡元计算,发行面值最小为 1000。

2. 1999—2002 年的预测

阿尔巴尼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1,581 | 1,741 | 1,881 | 1,941 | 1,786 | 134.0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143 | 1,296 | 1,449 | 1,548 | 1,359 | 151.9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9.7 | 10.6 | 8.6 | 3.7 | 8.2 | 136.6 |
| 私人消费 | 6.9 | 8.1 | 7.4 | 2.5 | 6.2 | 127.2 |
| 公共消费 | 5.9 | 7.1 | 6.4 | 1.5 | 5.2 | 122.5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8.1 | 26.7 | 13.6 | 10.9 | 19.8 | 204.5 |
| 工业产出 | 15.0 | 10.0 | 9.7 | 8.7 | 10.9 | 150.8 |
| 农业 | 4.5 | 5.8 | 6.0 | 5.0 | 5.3 | 123.1 |
| 实际工资 | 9.2 | 10.1 | 8.1 | 3.2 | 7.7 | 134.1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6.6 | 13.5 | 12.2 | 11.0 | 13.3 | 164.8 |
| 失业率 | 12.9 | 12.1 | 11.7 | 11.3 | 12.0 | — |

亚美尼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782 | 2,951 | 3,136 | 3,367 | 3059.0 | 128.5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508 | 584 | 672 | 781 | 636.3 | 178.3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6.6 | 6.5 | 6.7 | 7.8 | 6.9 | 130.6 |
| 私人消费 | 2.9 | 3.0 | 3.4 | 5.7 | 3.8 | 115.8 |
| 公共消费 | 2.9 | 3.0 | 3.4 | 5.7 | 3.8 | 115.8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11.0 | 10.6 | 9.7 | 12.1 | 10.9 | 151.0 |
| 工业产出 | 8.4 | 8.8 | 9.3 | 9.7 | 9.1 | 141.4 |
| 农业 | 3.6 | 3.0 | 3.0 | 3.1 | 3.2 | 113.3 |
| 实际工资 | 8.1 | 8.0 | 8.2 | 9.3 | 8.4 | 138.1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9.4 | 16.5 | 15.2 | 13.9 | 16.3 | 182.5 |
| 失业率 | 10.6 | 10.4 | 10.1 | 9.9 | 10.3 | — |

阿塞拜疆：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1,914 | 2,095 | 2,304 | 2,522 | 2208.8 | 141.9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 661 | 778 | 924 | 1,092 | 863.8 | 196.8 |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GDP | 9.0 | 10.7 | 11.2 | 10.7 | 10.4 | 148.5 |
| 私人消费 | 3.8 | 1.3 | 10.8 | 4.1 | 5.0 | 121.3 |
| 公共消费 | 1.8 | -0.7 | 8.8 | 2.1 | 3.0 | 112.3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33.0 | 34.2 | 15.7 | 8.1 | 22.8 | 223.2 |
| 工业产出 | 10.9 | 14.5 | 13.8 | 13.1 | 13.1 | 163.4 |
| 农业 | 4.8 | 4.6 | 4.5 | 4.4 | 4.6 | 119.6 |
| 实际工资 | 8.0 | 9.7 | 10.2 | 9.7 | 9.4 | 143.2 |
| | | (百分比)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9.4 | 9.9 | 9.0 | 8.0 | 9.1 | 141.5 |
| 失业率 | 3.0 | 3.6 | 4.3 | 5.2 | 4.0 | — |

白俄罗斯: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4,913 | 5,023 | 5,190 | 5,452 | 5144.5 | 108.9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149 | 1,337 | 1,572 | 1,815 | 1468.3 | 172.2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1.5 | 2.7 | 3.7 | 5.5 | 2.6 | 110.7 |
| 私人消费 | -6.6 | 2.5 | 3.5 | 4.3 | 0.9 | 103.3 |
| 公共消费 | -6.6 | 2.5 | 3.5 | 4.3 | 0.9 | 103.3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2 | 7.1 | 8.0 | 10.3 | 5.8 | 124.8 |
| 工业产出 | -4.2 | 1.6 | 4.3 | 7.0 | 2.2 | 108.6 |
| 农业 | 6.7 | 3.1 | 1.9 | 2.4 | 3.5 | 114.8 |
| 实际工资 | -3.1 | 5.4 | 3.5 | 5.2 | 2.8 | 111.2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59.9 | 36.2 | 32.6 | 29.3 | 39.5 | 373.4 |
| 失业率 | 8.0 | 10.0 | 9.0 | 8.6 | 8.9 | — |

保加利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3,769 | 3,982 | 4,137 | 4,282 | 4,043 | 119.6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2,009 | 2,344 | 2,541 | 2,689 | 2,396 | 168.8 |
| | (美元) | | | | | |
| GDP | 5.4 | 5.7 | 4.4 | 4.0 | 4.9 | 121.1 |
| 私人消费 | 5.8 | 5.9 | 4.4 | 4.3 | 5.1 | 122.0 |
| 公共消费 | 1.2 | -3.3 | -4.2 | -3.0 | -2.3 | 90.9 |
| 总固定投资 | 11.3 | 10.8 | 9.2 | 6.1 | 9.4 | 142.9 |
| 工业产出 | 5.7 | 6.3 | 4.7 | 4.0 | 5.2 | 122.3 |
| 农业 | 3.6 | 2.1 | 2.5 | 2.5 | 2.7 | 111.1 |
| 实际工资 | 5.4 | 5.7 | 4.4 | 4.0 | 4.9 | 121.0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6.0 | 14.0 | 14.0 | 12.0 | 14.0 | 168.8 |
| 失业率 | 13.0 | 12.0 | 10.0 | 8.7 | 10.9 | — |

• 2. 1999—2002年的预测

克罗地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7,610 | 8,030 | 8,473 | 8,898 | 8252.8 | 121.1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 4,970 | 5,388 | 5,798 | 6,151 | 5576.8 | 141.2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3.4 | 5.4 | 5.4 | 4.9 | 4.8 | 120.5 |
| 私人消费 | 1.0 | 4.5 | 4.2 | 3.7 | 3.4 | 114.0 |
| 公共消费 | 0.6 | 4.0 | 3.7 | 3.3 | 2.9 | 112.1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0.6 | 10.0 | 11.1 | 10.3 | 7.7 | 134.0 |
| 工业产出 | 4.0 | 6.0 | 6.3 | 6.1 | 5.6 | 124.3 |
| 农业 | 3.2 | 3.1 | 3.0 | 2.2 | 2.9 | 112.0 |
| 实际工资 | 1.4 | 3.4 | 3.8 | 2.9 | 2.9 | 112.0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7.3 | 5.8 | 4.8 | 3.5 | 5.4 | 123.1 |
| 失业率 | 11.9 | 9.3 | 8.9 | 8.5 | 9.7 | — |

捷克共和国:1999—2002 年的预测

| | 1999 年 | 2000 年 | 2001 年 | 2002 年 | 1999—2002 年 (平均) | 2002 年指数 (1998 年为 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10,369 | 10,800 | 11,271 | 11,786 | 11,057 | 117.2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6,316 | 7,364 | 8,473 | 9,575 | 7,932 | 176.7 |
| | (美元) | | | | | |
| GDP | 3.3 | 4.3 | 4.5 | 4.7 | 4.2 | 117.9 |
| 私人消费 | 5.3 | 6.7 | 4.3 | 3.6 | 5.0 | 121.4 |
| 公共消费 | 1.2 | 5.0 | 5.2 | 3.4 | 3.7 | 115.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3.2 | 4.6 | 3.2 | 3.6 | 3.7 | 115.4 |
| 工业产出 | 5.2 | 5.5 | 5.7 | 6.1 | 5.6 | 124.5 |
| 农业 | 1.5 | 2.5 | 2.4 | 2.3 | 2.2 | 109.0 |
| 实际工资 | 2.3 | 3.3 | 3.5 | 3.7 | 3.2 | 113.4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9.8 | 8.9 | 8.3 | 7.9 | 8.7 | 139.7 |
| 失业率 | 7.0 | 6.8 | 6.5 | 6.3 | 6.7 | — |

爱沙尼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9,695 | 10,282 | 10,876 | 11,352 | 10551.3 | 123.8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4,457 | 5,086 | 5,752 | 6,422 | 5429.3 | 172.3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5.5 | 5.9 | 5.6 | 5.9 | 5.7 | 124.9 |
| 私人消费 | 2.3 | 3.8 | 5.3 | 7.1 | 4.6 | 119.8 |
| 公共消费 | 0.3 | 2.8 | 4.3 | 6.1 | 3.4 | 114.1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4.8 | 7.2 | 5.6 | 7.4 | 6.3 | 127.4 |
| 工业产出 | 9.5 | 9.0 | 8.6 | 8.1 | 8.8 | 140.1 |
| 农业 | 1.4 | 1.3 | 0.8 | 0.7 | 1.1 | 104.3 |
| 实际工资 | 4.8 | 5.4 | 5.1 | 4.9 | 5.1 | 121.8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8.6 | 7.7 | 6.9 | 6.2 | 7.4 | 132.8 |
| 失业率 | 3.8 | 3.7 | 3.6 | 5.0 | 4.0 | — |

格鲁吉亚：1999—2002 年的预测

| | 1999 年 | 2000 年 | 2001 年 | 2002 年 | 1999—2002 年 (平均) | 2002 年指数 (1998 年为 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338 | 2,440 | 2,643 | 2,822 | 2560.8 | 138.3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927 | 1,087 | 1,271 | 1,465 | 1187.5 | 186.1 |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GDP | 10.1 | 9.3 | 9.1 | 7.6 | 9.0 | 141.3 |
| 私人消费 | 7.1 | 6.2 | 2.3 | 1.9 | 4.4 | 118.6 |
| 公共消费 | 7.1 | 6.2 | 2.3 | 1.9 | 4.4 | 118.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4.3 | 24.1 | 12.5 | 11.3 | 18.1 | 193.1 |
| 工业产出 | 12.0 | 11.4 | 10.8 | 10.3 | 11.1 | 152.5 |
| 农业 | 8.4 | 8.0 | 7.2 | 6.7 | 7.6 | 133.9 |
| 实际工资 | 8.9 | 8.3 | 3.9 | 3.4 | 6.1 | 126.7 |
| | | (百分比)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0.1 | 8.4 | 8.3 | 8.1 | 8.7 | 139.7 |
| 失业率 | — | — | — | — | — | — |

匈牙利: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8,043 | 8,430 | 8,818 | 9,170 | 8,615 | 119.2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5,493 | 5,986 | 6,509 | 7,037 | 6,256 | 140.3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4.6 | 4.5 | 4.8 | 4.5 | 3.9 | 119.7 |
| 私人消费 | 5.0 | 4.5 | 4.0 | 2.5 | 4.0 | 117.0 |
| 公共消费 | 3.8 | 3.9 | 3.4 | 1.9 | 3.3 | 113.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9.5 | 6.9 | 6.2 | 4.7 | 6.8 | 130.2 |
| 工业产出 | 7.0 | 6.0 | 5.0 | 4.7 | 5.7 | 124.7 |
| 农业 | 1.9 | 3.5 | 2.4 | 2.0 | 2.5 | 110.2 |
| 实际工资 | 4.0 | 4.3 | 4.5 | 3.9 | 4.2 | 117.8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1.8 | 10.4 | 9.4 | 8.9 | 10.1 | 147.0 |
| 失业率 | 8.1 | 7.6 | 7.0 | 6.8 | 7.4 | — |

哈萨克斯坦: 1999—2002 年的预测

| | 1999 年 | 2000 年 | 2001 年 | 2002 年 | 1999—2002 年 (平均) | 2002 年指数 (1998 年为 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766 | 2,899 | 3,098 | 3,311 | 3018.5 | 124.9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669 | 1,826 | 2,038 | 2,275 | 1952.0 | 148.4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3.8 | 4.9 | 7.0 | 7.0 | 5.7 | 124.7 |
| 私人消费 | 1.1 | 2.0 | 4.6 | 5.6 | 3.3 | 113.9 |
| 公共消费 | 0.1 | 1.0 | 3.6 | 4.6 | 2.3 | 109.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9.8 | 10.3 | 12.6 | 13.0 | 11.4 | 154.1 |
| 工业产出 | 5.0 | 6.0 | 8.0 | 7.5 | 6.6 | 129.2 |
| 农业 | 8.8 | 9.3 | 11.6 | 12.0 | 10.4 | 148.6 |
| 实际工资 | 2.8 | 3.9 | 6.0 | 6.0 | 4.7 | 120.0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8.6 | 6.8 | 6.7 | 6.6 | 7.2 | 131.9 |
| 失业率 | 15.5 | 14.6 | 13.8 | 13.0 | 14.2 | — |

吉尔吉斯斯坦：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239 | 2,342 | 2,437 | 2,535 | 2388.3 | 119.3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509 | 543 | 578 | 614 | 561.0 | 134.1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GDP | 6.8 | 6.0 | 5.5 | 5.6 | 6.0 | 126.1 |
| 私人消费 | 4.2 | 3.4 | 4.4 | 4.4 | 4.1 | 117.4 |
| 公共消费 | 3.2 | 2.4 | 3.4 | 3.4 | 3.1 | 113.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2.5 | 19.6 | 9.0 | 8.9 | 15.0 | 173.9 |
| 工业产出 | 10.8 | 8.1 | 8.9 | 9.0 | 9.2 | 142.2 |
| 农业 | 3.3 | 3.2 | 3.0 | 2.9 | 3.1 | 113.0 |
| 实际工资 | 6.3 | 5.6 | 5.0 | 5.0 | 5.5 | 123.8 |
| | | (百分比)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1.4 | 10.2 | 9.1 | 8.2 | 9.7 | 144.9 |
| 失业率 | — | — | — | — | — | — |

拉脱维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6,783 | 7,128 | 7,574 | 8,039 | 7381.0 | 123.8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2,642 | 2,928 | 3,277 | 3,660 | 3126.8 | 142.2 |
| GDP | 3.9 | 4.6 | 5.8 | 5.7 | 5.0 | 121.5 |
| 私人消费 | 3.5 | 2.7 | 2.1 | 5.5 | 3.5 | 114.5 |
| 公共消费 | 2.5 | 1.7 | 1.1 | 4.5 | 2.5 | 110.1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0.5 | 12.6 | 25.0 | 11.8 | 12.2 | 156.6 |
| 工业产出 | 6.0 | 6.0 | 7.0 | 6.7 | 6.4 | 128.3 |
| 农业 | 2.8 | 2.7 | 2.3 | 1.9 | 2.4 | 110.1 |
| 实际工资 | 2.9 | 3.6 | 4.8 | 4.8 | 4.0 | 117.1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0.4 | 9.4 | 8.4 | 6.9 | 8.8 | 140.0 |
| 失业率 | 7.0 | 6.5 | 6.5 | 6.5 | 6.6 | — |

立陶宛：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4,339 | 4,583 | 4,813 | 5,047 | 4695.5 | 122.1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3,093 | 3,433 | 3,781 | 4,082 | 3597.3 | 145.8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5.0 | 5.7 | 5.1 | 4.9 | 5.2 | 122.4 |
| 私人消费 | 2.9 | 5.0 | 5.1 | 4.0 | 4.3 | 118.1 |
| 公共消费 | 0.9 | 3.0 | 3.1 | 3.0 | 2.5 | 110.4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7.3 | 5.2 | 5.9 | 9.2 | 6.9 | 130.5 |
| 工业产出 | 6.6 | 7.4 | 6.7 | 6.7 | 6.9 | 130.3 |
| 农业 | 4.1 | 3.9 | 1.9 | 1.2 | 2.8 | 111.5 |
| 实际工资 | 5.0 | 5.7 | 5.1 | 4.9 | 5.2 | 122.4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5.6 | 5.2 | 5.0 | 3.8 | 4.9 | 121.1 |
| 失业率 | 5.7 | 5.7 | 5.6 | 5.5 | 5.6 | — |

马其顿：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966 | 3,046 | 3,173 | 3,310 | 3,124 | 114.7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774 | 1,854 | 1,951 | 2,051 | 1,908 | 125.3 |
| | (美元) | | | | | |
| GDP | 3.4 | 3.4 | 4.9 | 5.0 | 4.2 | 117.8 |
| 私人消费 | 2.2 | 1.5 | 4.0 | 4.2 | 3.0 | 112.4 |
| 公共消费 | 2.5 | 2.5 | 2.0 | 2.0 | 2.3 | 109.3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8.1 | 7.4 | 7.4 | 7.5 | 7.6 | 134.0 |
| 工业产出 | 5.0 | 6.0 | 7.0 | 7.0 | 6.3 | 127.4 |
| 农业 | 3.5 | 3.0 | 3.0 | 3.0 | 3.1 | 113.1 |
| 实际工资 | 2.9 | 2.9 | 4.4 | 4.5 | 3.7 | 115.5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指数) | 4.1 | 3.6 | 3.4 | 3.3 | 3.6 | 115.2 |
| 失业率 | — | — | — | — | — | — |

摩尔多瓦：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224 | 2,330 | 2,473 | 2,611 | 2409.5 | 124.9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612 | 656 | 718 | 782 | 692.0 | 139.6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6.6 | 5.0 | 6.3 | 5.8 | 5.9 | 125.9 |
| 私人消费 | 5.7 | 3.6 | 6.3 | 5.7 | 5.3 | 123.0 |
| 公共消费 | 3.7 | 1.6 | 4.3 | 3.7 | 3.3 | 114.0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31.5 | 31.8 | 12.8 | 12.3 | 22.1 | 219.5 |
| 工业产出 | 5.3 | 3.5 | 5.5 | 5.3 | 4.9 | 121.1 |
| 农业 | 6.3 | 4.5 | 4.5 | 4.3 | 4.9 | 121.1 |
| 实际工资 | 6.3 | 4.7 | 6.1 | 5.5 | 5.7 | 124.6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0.7 | 8.5 | 8.2 | 7.8 | 8.8 | 140.1 |
| 失业率 | — | — | — | — | — | — |

波兰: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7,508 | 7,939 | 8,396 | 8,889 | 8,183 | 125.3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4,198 | 4,638 | 5,238 | 5,922 | 4,999 | 155.4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GDP | 5.9 | 5.8 | 5.8 | 6.1 | 5.9 | 125.8 |
| 私人消费 | 4.8 | 4.9 | 5.1 | 6.4 | 5.3 | 122.9 |
| 公共消费 | 2.4 | 3.4 | 3.5 | 3.7 | 3.3 | 113.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6.6 | 6.5 | 6.1 | 6.6 | 6.5 | 128.4 |
| 工业产出 | 7.4 | 6.8 | 7.5 | 7.0 | 7.2 | 131.9 |
| 农业 | 0.1 | 0.3 | 1.2 | 1.2 | 0.7 | 102.8 |
| 实际工资 | 3.0 | 3.8 | 2.2 | 4.0 | 3.3 | 113.6 |
| | | (百分比)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9.1 | 7.4 | 6.2 | 5.0 | 6.9 | 130.7 |
| 失业率 | 9.0 | 8.5 | 8.0 | 7.1 | 8.2 | 136.8 |

罗马尼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3,315 | 3,515 | 3,717 | 3,908 | 3,614 | 122.1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907 | 2,131 | 2,379 | 2,648 | 2,266 | 151.1 |
| | (美元) | | | | | |
| GDP | 3.3 | 5.8 | 5.5 | 4.9 | 4.9 | 121.0 |
| 私人消费 | -0.3 | 5.8 | 6.4 | 4.5 | 4.1 | 117.3 |
| 公共消费 | -1.4 | 4.7 | 5.8 | 3.4 | 3.1 | 112.9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5.1 | 11.4 | 11.8 | 6.9 | 8.8 | 139.9 |
| 工业产出 | 5.0 | 7.2 | 6.5 | 6.4 | 6.3 | 127.5 |
| 农业 | 1.8 | 1.7 | 1.6 | 1.2 | 1.6 | 106.4 |
| 实际工资 | 2.8 | 5.3 | 5.0 | 4.4 | 4.4 | 118.7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33.4 | 24.7 | 19.4 | 16.5 | 23.5 | 231.4 |
| 失业率 | 10.5 | 10.0 | 9.4 | 9.2 | 9.8 | — |

俄罗斯：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782 | 2,951 | 3,136 | 3,367 | 3059.0 | 128.5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508 | 584 | 672 | 781 | 636.3 | 178.3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2.7 | 4.2 | 4.8 | 4.7 | 4.1 | 117.4 |
| 私人消费 | 1.2 | 2.5 | 4.7 | 5.8 | 3.6 | 114.9 |
| 公共消费 | 1.5 | 2.5 | 4.2 | 5.3 | 3.4 | 114.2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5.2 | 6.4 | 11.0 | 8.7 | 7.8 | 135.1 |
| 工业产出 | 3.2 | 4.2 | 5.3 | 5.6 | 4.6 | 119.6 |
| 农业 | 1.8 | 1.6 | 1.9 | 1.7 | 1.8 | 107.2 |
| 实际工资 | 1.8 | 3.2 | 4.2 | 5.0 | 3.6 | 114.9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0.6 | 11.2 | 10.3 | 9.7 | 10.5 | 148.8 |
| 失业率 | 8.3 | 8.0 | 7.8 | 7.6 | 7.9 | — |

斯洛伐克：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8,435 | 8,638 | 9,062 | 9,522 | 8,914 | 115.3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 3,814 | 4,133 | 4,498 | 4,912 | 4,339 | 128.0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2.3 | 2.5 | 5.0 | 5.0 | 3.7 | 115.6 |
| 私人消费 | 2.7 | -1.1 | 6.0 | 6.3 | 3.5 | 114.4 |
| 公共消费 | -0.2 | -2.6 | 4.6 | 4.8 | 1.7 | 106.6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6.4 | 4.4 | 5.3 | 5.5 | 2.2 | 108.6 |
| 工业产出 | 3.0 | 6.0 | 4.8 | 4.5 | 4.6 | 119.6 |
| 农业 | 3.2 | 3.4 | 3.0 | 3.1 | 3.2 | 113.3 |
| 实际工资 | 2.8 | 2.4 | 4.9 | 4.9 | 3.8 | 115.8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0.7 | 8.2 | 7.4 | 5.9 | 8.1 | 136.2 |
| 失业率 | 12.4 | 11.7 | 11.3 | 10.9 | 11.6 | — |

斯洛文尼亚：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14,085 | 14,299 | 15,465 | 16,200 | 15,012 | 120.0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0,659 | 11,779 | 13,066 | 12,472 | 11,994 | 128.9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4.1 | 4.8 | 4.2 | 4.9 | 4.5 | 119.2 |
| 私人消费 | 3.0 | 4.6 | 2.8 | 3.4 | 3.5 | 114.5 |
| 公共消费 | 2.0 | 3.6 | 1.8 | 2.4 | 2.5 | 110.2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8.1 | 8.7 | 5.5 | 5.2 | 6.9 | 130.4 |
| 工业产出 | 4.0 | 5.0 | 4.5 | 5.5 | 4.8 | 120.4 |
| 农业 | 3.7 | 4.6 | 4.1 | 5.1 | 4.4 | 118.7 |
| 实际工资 | 3.6 | 4.3 | 3.7 | 4.4 | 4.0 | 117.0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7.6 | 6.8 | 6.1 | 5.5 | 6.5 | 128.6 |
| 失业率 | 13.2 | 12.5 | 11.8 | 11.1 | 12.2 | 158.2 |

从领先到滞后。

塔吉克斯坦：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749 | 776 | 806 | 839 | 792.5 | 115.4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284 | 314 | 340 | 369 | 326.8 | 168.5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5.1 | 5.7 | 6.0 | 6.1 | 5.7 | 124.9 |
| 私人消费 | 6.6 | 7.1 | 7.6 | 7.5 | 7.2 | 132.1 |
| 公共消费 | 5.5 | 6.0 | 6.5 | 6.4 | 6.1 | 126.7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10.5 | 10.7 | 8.7 | 8.5 | 9.6 | 144.3 |
| 工业产出 | 4.0 | 4.5 | 5.2 | 5.7 | 4.9 | 120.8 |
| 农业 | 3.9 | 4.8 | 5.0 | 4.2 | 4.5 | 119.1 |
| 实际工资 | 4.1 | 4.7 | 5.0 | 5.1 | 4.7 | 120.3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36.2 | 24.5 | 18.3 | 16.4 | 23.9 | 233.5 |
| 失业率 | 6.7 | 6.8 | 7.0 | 7.1 | 6.9 | — |

土库曼斯坦：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2,865 | 3,279 | 3,350 | 3,445 | 3234.8 | 133.1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 524 | 713 | 759 | 814 | 702.5 | 204.0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12.1 | 16.0 | 3.5 | 4.2 | 9.0 | 140.2 |
| 私人消费 | 18.4 | 23.9 | 6.7 | 7.6 | 14.2 | 168.4 |
| 公共消费 | 13.4 | 15.9 | 3.7 | 5.1 | 9.5 | 143.2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5.5 | 9.6 | 1.0 | 1.9 | 4.5 | 119.0 |
| 工业产出 | 32.3 | 44.7 | 2.1 | 2.9 | 20.5 | 201.1 |
| 农业 | 3.7 | 2.1 | 2.5 | 3.0 | 2.8 | 111.8 |
| 实际工资 | 11.1 | 15.0 | 2.5 | 3.2 | 8.0 | 135.1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9.4 | 16.5 | 15.2 | 13.9 | 16.3 | 182.5 |
| 失业率 | 10.6 | 10.4 | 10.1 | 9.9 | 10.3 | — |

乌克兰: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 2,542 | 2,665 | 2,810 | 2,969 | 2746.5 | 120.6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 1,057 | 1,169 | 1,304 | 1,458 | 1247.0 | 153.0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3.0 | 4.8 | 5.2 | 6.0 | 4.8 | 120.4 |
| 私人消费 | 2.2 | 4.5 | 4.7 | 4.6 | 4.0 | 117.0 |
| 公共消费 | 1.2 | 3.5 | 4.3 | 3.6 | 3.2 | 113.2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6.9 | 7.4 | 7.7 | 10.9 | 8.2 | 137.1 |
| 工业产出 | 3.5 | 6.0 | 7.2 | 8.0 | 6.2 | 127.0 |
| 农业 | 2.6 | 2.9 | 2.1 | 3.0 | 2.7 | 111.0 |
| 实际工资 | 2.4 | 4.3 | 4.8 | 4.6 | 4.0 | 117.1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12.8 | 11.0 | 9.0 | 7.7 | 10.1 | 147.0 |
| 失业率 | 6.0 | 8.0 | 8.0 | 7.5 | 7.4 | — |

乌兹别克斯坦: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2,544 | 2,597 | 2,641 | 2,688 | 2617.5 | 107.3 |
| 按市场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483 | 523 | 631 | 722 | 589.8 | 161.9 |
| | (美元) | | | | | |
| GDP | 4.3 | 4.9 | 4.5 | 4.5 | 4.6 | 119.5 |
| 私人消费 | 2.4 | 4.3 | 6.3 | 4.6 | 4.4 | 118.8 |
| 公共消费 | 1.4 | 3.3 | 5.3 | 3.6 | 3.4 | 114.3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2.5 | 5.9 | 0.8 | 4.4 | 3.4 | 114.2 |
| 工业产出 | 6.0 | 6.3 | 6.0 | 5.7 | 6.0 | 126.2 |
| 农业 | 3.0 | 2.7 | 2.9 | 3.1 | 2.9 | 112.2 |
| 实际工资 | 3.8 | 4.4 | 4.0 | 4.0 | 4.1 | 117.2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34.2 | 28.2 | 25.1 | 22.6 | 27.5 | 263.9 |
| 失业率 | — | — | — | — | — | — |

南斯拉夫:1999—2002年的预测

|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1999—2002年 (平均) | 2002年指数 (1998年为100) |
|------------------|-----------|-------|-------|-------|--------------------|------------------------|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 3,528 | 3,651 | 3,817 | 4,030 | 3,757 | 116.4 |
| 按市价交换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 1,333 | 1,420 | 1,525 | 1,658 | 1,484 | 142.4 |
| | (美元) | | | | | |
| | (年均增长百分比) | | | | | |
| GDP | 2.3 | 3.9 | 5.0 | 6.0 | 4.3 | 118.3 |
| 私人消费 | -0.2 | 1.2 | 4.4 | 5.4 | 2.7 | 111.1 |
| 公共消费 | -1.2 | 0.2 | 3.4 | 4.4 | 1.7 | 106.9 |
| 总固定资产投资 | 9.8 | 19.3 | 10.5 | 11.3 | 12.7 | 161.1 |
| 工业产出 | 2.5 | 4.0 | 5.0 | 6.0 | 4.4 | 118.6 |
| 农业 | 4.1 | 2.5 | 2.9 | 2.4 | 3.0 | 112.4 |
| 实际工资 | 1.3 | 2.9 | 4.0 | 5.0 | 3.3 | 113.8 |
| | (百分比) | | | | | |
| 通货膨胀率(消费品价格指数) | 36.4 | 29.1 | 23.3 | 18.6 | 26.9 | 257.5 |
| 失业率 | 21.0 | 18.0 | 15.0 | 14.0 | 17.0 | 187.2 |

文 献

- Akerlof, G., A. Rose, J. Yellin, and H. Hestius. "East Germany in from the Col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1 - 87.
- Alesina, Alberto.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 and Low Growth".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Alesina, Alberto. 1998. "Too Large and Too Small Governments". Conference paper. *Economic Policy and Equ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 C., June 8-9.
- Alesina, Alberto and Roberto Perotti.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No. 40:1203-1228.
- Andrews, Emily and Mansoor Rashid. 1996. "The Financing of Pension System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echnical Paper 339.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October.
- Aslund, Anders. 1995.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Aslund, Anders. 1996. "The Russian Economy; Where it is Headed?" The Ernest Sore Memorial Lecture. Washington, D. C.: 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从休克到治疗·

-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ovember 7).
- Atkinson Anthony B. and John Micklewright (1992).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nthony B., Lee Rainwater, and Timothy Smeeding (1995).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orking Paper*, No. 12. Luxembourg;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 Balcerowicz, Leszek. 1992. *800 Dni: Szok kontrolowany*. Warsaw: BGW.
- Barber, Lionel. 1997. EU may widen membership talks. EC says Estonia and Slovenia should be included in enlargement negotiations. *Financial Times*. 8 July.
- Barro, Robert.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 - 27.
- Bauer, Tamas. 1978. Investment Cycles in Planned Economies. *Acta Economica*, Vol. 21 (March): 243 - 260.
- Berg, Andrew and Jeffrey Sachs. 1992.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Economic Policy* 14 (April) 117 - 155.
- Bernstam, Michael S. and A. Rabushka (1998). *Fixing Russia's Banks. A Proposal for Growth*.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 Blanchard, Olivier. 1997. *The 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si, Joseph R., Maya Kroumova and Douglas Kruse. 1997. *Kremlin Capitalism. Privatizing the Russian Econom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lejer, Mario I. and Marko Skreb. 1997.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ejer, Mario I. and Teresa Ter-Minassian. 1997a.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Essays in honour of Vito Tanz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lejer, Mario I. and Teresa Ter-Minassian. 1997b. *Macroeconomic Dimensions of Public Fin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Vito Tanz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lustein, Paul. 1997. Foreign Aid That Doesn't Seem to Persuade. *Washington Post*. 22 May.
- Boland, Vincent. 1997. Czech PM's cliffhanger victory fails to dispel survival fears. *Financial Times*. 12 June.
- Branco, Marta de Castello. 1998. "Pension Reform in the Baltics, Russia, and Other

-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MF Working Paper 98/11.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 Brother Ty, Christopher Buckley and John Tierney. 1998. *God Is My Broker. A Monk-Tycoon Reveals the 7 1/2 Laws of Spiritual and Financial Grow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runo, Michael. 1992. "Stabilization and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IMF Working Paper 92/30.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 Brus, Włodzimierz.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s*. In Marer, Paul and Władysław Siwinski (eds.), *Creditworthiness and Reform in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rus, Włodzimierz and Kazimierz Laski. 1989. *From Marx to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nside, Craig and David Dollar. 1997. "Good Policies are Needed to Make Aid Effective". *Transition*. June.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 Buiter, Willem H., Ricardo Lago and Nicholas Stern. 1996. *Promoting an effective market economy in a changing world*.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468.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October.
- Calvo, Guillermo and Fabrizio Coricelli. 1992. Stabilizing a Previous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Poland 1990. *Economic Policy* 14 (April) 175 - 211.
- Cassidy, John. 1997. "The Next Thinker. The Return of Karl Marx".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0 & 27.
- Charlesworth, H. K. 1955. *The Economics of Repressed Inflati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ommander, S., H. Davoodi and V. Lee. 1996.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for Growth and Well - Being". Background paper fo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 Cornia, Giovanni Andrea (1996a). Transi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Initial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in Progress*, 1 (March).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Helsinki.
- Cornia, Giovanni Andrea (1996b). Labour Market Shock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 Transition's Mortality Crisis. *Research in Progress*, 4 (October). The United Nations

从休克到治疗

-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Helsinki.
- Cornia, Giovanni Andrea. 1997. "In Search of a Transition Theory".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 Cornia, Giovanni Andrea, Juha Honkkila, Renato Panizza and Vladimir Popov. 1996. *Long-Term Growth and Welfar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Policy Changes*. WIDER Working Papers No. 122. Helsinki;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December.
- Cornia, Giovanni Andrea and Vladimir Popov. 1998. "Transition Strategies, Growth and Poverty". Conference paper. The critical author's meeting for the UNDP report on "Poverty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0 January.
- Cottrell, Robert. 1997. Russia: The New Oligarchy. *The New York Review*, March 27.
- Csaba, László. 1995.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ystemic Change*.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 Czyżewski, Adam B., Witold M. Orłowski and Leszek Zienkowski. 1996. "Country Study for Po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uses of output declin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ird Workshop on Output Decline in Eastern Europe. Prague. April 12 - 13.
- Deininger, Klaus and Lyn Squire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0, No. 3: 565-591.
- De Melo, Martha, Cevdet Denizler and Alan Gelb.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patterns of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Dodsworth, John R., Ajai Ch Gupta, Chi D. Pham, and Hisanobu Shishido. 1996. *Macroeconomic Experiences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Indochina*. IMF Working Paper WP/96/112. October.
- Eatwell, John, Michael Ellman, Mats Karlsson, D. Mario Nuti and Judith Shapiro. 1995.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Eatwell, John, Michael Ellman, Mats Karlsson, D. Mario Nuti and Judith Shapiro. 1997. *Not "Just Another Access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 Enlargement to the East*.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EBRD. 1996. *Transition Report 1996. Infrastructure and Saving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EBRD. 1997a. *Transition Report 1997 Update*.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pril.
- EBRD. 1997b. *Transition Repor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growth*.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EBRD. 1998. *Transition Report Update*.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pril.
- EC. 1990. *Stabi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Devolution: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Reform Process in the Soviet Union*.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 Economist. 1997a. Foreign aid. Profits in a pickle. *The Economist*. May 24th.
- Economist. 1997b. Cheer up, Europe. *The Economist*. June 21st.
- Economist. 1997c. Russia. The Survey. *The Economist*. July 12th.
- Economist. 1997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A survey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0th.
- Economist. 1997e. European Industry and Its Press. *The Economist*. October 11th.
- Economist. 1997f. Recasts itself. A survey of business in Eastern Europ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2d.
- Economist. 1998a. Too triumphalist by half. *The Economist*. April 25th.
- Economist. 1998b. Left turn? *The Economist*. June 13th.
- Edwards, Sebastian. 1992. *Stabi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Latin American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In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C. Clague and G. C. Rauseer.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UK: Blackwell.
- Eichengreen, B. and M. Uzan. 1992. "The Marshall Plan; Economic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USSR". *Economic Policy*. April: 13 - 75.
- Ellman, Mark. 1986.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62(3): 423 - 442.
- Ellman, Mark.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3(2): 23 - 32.
- Estrin, Saul. 1996. "How to privatize". London; London Business School (mimeo).
- Estrin, Saul and Giovanni Urga. 1997. "Convergence in Outpu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从休克到治疗。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70 - 1995." Discussion Paper No. DP 09 - 97 (March). London; London Business School, Centre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
- Fan, Gang. 1997. "Growing into the Marke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 Feuchtwang, S. and Hussain, A., (eds.). 1983.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inancial Times. 1997. Investors give E Europe a miss. *Financial Times*. 15 April.
- Fischer, Stanley. 1998a. "ABCDE: Tenth Conference Address." Conference paper.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April 20 and 21.
- Fischer, Stanley. 1998b. "Opening Remarks."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Policy and Equity*. Washington, D. C.;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8 - 9.
- Fischer, Stanley, Ratna Sahay and Carlos A. Vegh. 1995.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arly Experiences".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Flemming, John. 1998. Equitabl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Growth*. Edited by Vito Tanzi and Ke-young Chu. Op. cit.
- Freeland, Christia. 1997a. Ukraine parliament backs draft civil code. *Financial Times*. 6 June.
- Freeland, Christia. 1997b. Bleak answer to Russia's riddle. *Financial Times*. 19 June.
- Freeland, Christia. 1998. Testing times for investors in Russia. *Financial Times*. 25 May.
- Freeland, Christia and Robert Corzine. 1997. Yeltsin changes Gazprom share rules. *Financial Times*. 29 May.
- Fry, Maxwell. 1993. *The fiscal abuse of central banks*. IMF Working Paper 93/58.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Frydman, Roman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1. Privatiz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Eastern Europe; Can a Market Economy Be Designed? In Georg Winckler (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oads to Growth*. Vienn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Austrian National Bank.
- Frydman, Roman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4. Is privatisation working? *Open Society*

- News*. New York, Summer.
- Frydman, Roman, Andrzej Rapaczynski, John S. Earle et al. 1993.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Pragu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Gallup, John Luke and Jeffrey Sachs. 1998. "Ge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Conference paper.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April 20 and 21.
- Gavrilenkov, Evgeny and Vincent Koen. 1994. *How Large Was the Output Collapse in Russia?* IMF Working Paper WP/94/154. December.
- Gardner, Stephen. 1998.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Fort Worth-Philadelphia: The Dryden Press.
- Carten, Jeffrey. 1998. *The Big Ten : The Big Emerging Markets and How They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rnilka, Stanislaw. 1991. The Causes of Recession Following Stabilizat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No 2: 71 - 89.
- Gornilka, Stanislaw. 1996. "Causes of output decline, sources of recovery and prospects for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December (mimeo).
- Goodhue, Rachael E., Gordon C. Rauser and Leo K. Simon. 1996. *Privat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Learn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May.
- Gordon, Roger H. and David D. Li. 1997. *Government Distributional Concerns and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662.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June.
- Gora, Marek and Michal Rutkowski. 1998. "The Polish Pension Reform. In Pursuit of Security through Diversi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June (mimeo).
- Gorski, Marian and Dariusz Jasaczynski. 1991. *Inflat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ly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The Polish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s, No. 14. Warsaw;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 Grant, Jeremy. 1997. Vietnam reforms run into heavy weather. *Financial Times*. 9 June.
- Gregory, Paul R. 1997. *Transition Economie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ransition*. Paper prepared for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Houston, Houston

从休克到治疗。

(November).

Gregory, Paul and Robert Stuart. 1992.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Gregory, Paul and Robert Stuart. 1994. *Soviet and Post-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

Gruszczynski Marek and Grzegorz W. Kolodko. 1976. "Regularność wahań tempa wzrostu gospodarczego." *Gospodarka Planowa*. Vol. 30, No. 7 - 8 (July - August): 421 - 430.

GUS (1996). *Ubóstwo w świetle badań budżetów gospodarstw domowych (Poverty In View of Household Budget Surveys)*. Warszawa: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GUS (1997a). *Monitoring warunków życia ludności (Monitoring of the population living conditions)*. Warszawa: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15 September.

GUS (1997b). *Wskaźniki ubóstwa w świetle badań budżetów gospodarstw domowych (Poverty indicators in view of household budget surveys)*. Warszawa: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Harding, H. and Ed A. Hewett. 1988.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3 - 19.

Hausner, Jerzy.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cialism's Transformation".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Heilbroner, Robert and William Milberg. 1995.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mming, Richard. 1998. "Should Public Pensions Be Funded." IMF Working Paper 98/35.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Hirschleifer, Jack. 1987. *Economic Behaviour in Adversity*. Brighton-Sussex: Wheatsbeaf Books.

Honkkila, Juhana (1997). Privatization, Asset Distribution and Equ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Working Papers*, No. 125 (February).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Helsinki.

Iglesias, Enrique. 1998.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Growth*. Edited by Vito Tanzi and Ke-young Chu. Op. cit.

IMF. 199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May.
- IMF. 199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 IMF. 1996.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Global Growth*. Interim Committee Declara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29.
- IMF. 199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iz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 IMF. 1998a.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Crises. Causes and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 IMF. 1998b. "Asia's Financial Crisis Loomed Large over the EBRD Annual Meeting." *Morning Press*.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ter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May 14.
- Johnston, Michael. 1997. "What Can Be Done about Entrenched Corruption?"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Kaufmann, Daniel. 1997a. "Why Is Ukrainian Economy – and Russia's – Not Growing?" *Transition*. April.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Kaufmann, Daniel. 1997b. "Corruption: The Facts". *Foreign Policy Summer*. No. 107: 114 – 131.
- Kaufmann, Daniel and Daniel Kaliberda. 1995. "Integrating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to the Dynamic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and Evidence." Conference paper.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Kiev. August 16.
- Kiyoto, K. 1992. "Post-war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A Brief Economic Perspective." Conference paper. "Industrial Polic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MITI) and Japanese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Vienna. May 25 – 26.
- Konings, Jozef, Herbert Lehmann and Mark E. Schaffer. 1996.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ownership, firm size and gross job flows in Polish manufacturing 1988 – 1991". *Labour Economics* 3: 299 – 317.
- Kolodko, Grzegorz W. 1976. *Economic Growth Cycle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he Case of Poland*. Working Paper. Warsaw;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SGPiS).

- Kolodko, Grzegorz W. 1979. "Fazy wzrostu gospodarczego"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Gospodarka Planowa*. March; 137 - 143.
- Kolodko, Grzegorz W. 1986a. *The Repressed Inflation and Inflationary Overhang under Socialism*. Faculty Working Paper 1224. Urbana-Champaign: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ebruary.
- Kolodko, Grzegorz W. 1986b. *Economic Growth Cycles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 Hypothesis of the "Long Cycle"*. Faculty Working Paper 1280. Urbana-Champaign: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eptember.
- Kolodko, Grzegorz W. 1987.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croeconomic Proportions".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5(3): 72 - 85.
- Kolodko, Grzegorz W. 1989a. "Economic Reforms and Inflation in Socialism: Determinants, Mutual Relationships and Prospects". *Communist Economics*, Vol. 1, No. 2: 167 - 182.
- Kolodko, Grzegorz W. 1989b. *Reform, Stabilization Policies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in Poland*. WIDER Working Papers WP 51. Helsinki: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January.
- Kolodko, Grzegorz W. 1991. "Inflation Stabilization in Poland: A Year After".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No. 6 (June): 289 - 330.
- Kolodko, Grzegorz W. 1992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hortageflation to Stagflation: The Case of Poland*. In Armand Glesse and Rudolf Tökes (eds.) *Preventing a New East-West Divid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eratives of the Future Europe*.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 Kolodko, Grzegorz W. 1992b. "From output collapse to sustainable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the fiscal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ember.
- Kolodko, Grzegorz W. 1992c. *Stabilization, Recession and Growth in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IF Working Paper 29. Warsaw: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 Kolodko, Grzegorz W. 1993a.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Mosk*, Vol. 4. No. 1: 1 - 25.
- Kolodko, Grzegorz W. 1993b. "From Recession to Growth in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6, No. 2: 123 - 143.
- Kolodko, Grzegorz W. 1996. *Poland 2000. The New Economic Strategy*. Warsaw: Poltext.
- Kolodko, Grzegorz W. 1997a. "Albania pays a heavy price". *The European*. 6 - 12 March.
- Kolodko, Grzegorz W. 1997b. "Poland's path to a strong economy".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May 9th.
- Kolodko, Grzegorz W. 1997c. "Change of government will not hurt Polish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6th.
- Kolodko, Grzegorz W. 1997d. "Exchange rate liberalisation policy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Policy Seminar on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World Bank. Tashkent, December 4 - 6 (reprinted in IF Working Paper 57. Warsaw: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 Kolodko, Grzegorz W. 1998a. *Comments on John Flemming "Equitabl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Growth*. Edited by Vito Tanzi and Ke-young Chu. Cambridge, Mass.-London: The MIT Press.
- Kolodko, Grzegorz W. 1998b. "Equity issues in policymak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Economic Policy and Equ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June 8 - 9.
- Kolodko, Grzegorz W. 1998c. "Economic Neoliberalism Became Almost Irrelevant..." *Transition*. Vol. 9, No 3. June; 1 - 6. Washington, D.C. : The World Bank.
- Kolodko, Grzegorz W. 1998d. "Russia Should Put Its People Fir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 Kolodko, Grzegorz W. and Walter W. McMahon. 1987. "Stagflation and Shortagefl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yklos* Vol. 40, Fasc. 2; 176 - 197.
- Kolodko, Grzegorz W., Danuta Gotz-Kozierkiewicz and Elzbieta Skrzyszewska-Paczek. 1992.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Boston-Dordrecht-London: Kluwer.
- Kolodko, Grzegorz W. and D. Mario Nuti. 1997. *The Polish Alternative. Old Myths, Hard Facts and New Strategies in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Economy*. WIDER Research for Action 33. Helsinki: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 Komarek, Valtr. 1992. "Shock Therapy and Its Victi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 Kornai, Ja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Kornai, Janos.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1687 - 1737.
- Kornai, Janos. 1993.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 *Economic Applique*. Vol. 46, No. 2: 181-227.
- Kosta, Jiri. 1987.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pproaches, Results and Prospects*. In *Crisis and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dited by Gey, Peter, Jiri Kosta and Wolfgang Quaisser.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 Laski, Kazimierz. 1990. "The Stabilization Plan for Poland".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5: 444 - 458.
- Larrain, Felipe and Marcelo Selowsky (eds.). 1991.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Latin American Crisis*.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 Lavigne, Marie. 1995.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Chatham, Kent: Macmillan Press Ltd.
- Lee, Kum. 1997. "The Road to the Market in North Korea: Projec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 Londrigo, J., A. Spilimbergo and M. Szekely. 1997. *Income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s and Trade Openn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356.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Lastig, Nora and Ruthanne Deutch. 1998.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 Overview*.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Mauro, Paolo. 1997.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Growth,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In *Corru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Kimberley Ann Elliot.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McKinnon Ronald. 1991. "Foreign Trade, Protection, and Negative Value-Added in a Liberalizing Socialist Economy". In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Edited by Ronald McKinn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ichaels, Daniel. 1998. "Poland's Strong Economic Turnaround Raises Challenges of Managing

- Grow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 Michalopoulos, Constantine. 1997.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nd the WTO".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July; 22 - 24.
- Milanovic, Branko. 1996.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ransition. *Research Paper*, No. 11. Transition Economics Division,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Milanovic, Branko. 1998.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Mobius, J. Mark. 1996. *On Emerging Markets*. London: Pitman Publishing.
- Montes, Manuel. 1997. "Vietnam: Is There a Socialist Road to the Market?"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 Mundell, Robert A. 1995. "Great contrac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First Dubrovnik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Dubrovnik. 8 - 9 June.
- Muravchik, Joshua. 1998. "Why Lenin? Why Stalin?" *The American Spectator*. May; 77 - 78.
- Nafziger, E. Wayne. 1998. "Root of human suffering". *Financial Times*. 21 January.
- Nelson, Joan M., Jacek Kochanowicz, Kalman Mizsei and Oscar Munoz. 1994. *Intricate Links: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New Brunswick (USA) and Oxford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Nelson, Lynn D. and Irina Y. Kuzes. 1995. *Radical Reform in Yeltsin's Russi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 North, Douglass C. 199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IDER Annual Lectures 1.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March.
- Novo, Alex. 199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6th and final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Nuti, D. Mario. 1989. "Hidden and Repressed Inflation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s and Stabilization".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 Davis and Wojciech Charemza. London and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从休克到治疗。

- Nuti, D. Mario. 1990. *Crisis, Reform and Stabilization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Prospects and Western Response*. In *La Grande Europa, La Nuova Europa: Opportunita e Rischi*. Siena: Monti Dei Paschi Di Siena. November.
- Nuti, D. Mario. 1992a. Market socialism; the system that might have been but never was. In *Market Socialism or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Anders Åsl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ti, D. Mario. 1992b. *Lessons from Stabilisation and Reform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EC Working Paper, 92. Brussels: Council of European Community. May.
- Nuti, D. Mario. 1993. "Teaching Materials on Comparative Economics Systems". R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di Roma La Sapienza.
- Nuti, D. Mario. 1996. "Exchange Rate and Monetary Policy in Poland 1994 - 1996, or the Case for Privitising the National Bank of Poland". Conference paper. Helsinki: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15 - 17 May.
- Nuti, D. Mario. 1997a. Employee ownership in Polish privatizations. In *Privatization surpris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Employee ownershi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Milica Uvalic and Daniel Vaughan-Whitehea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Nuti, D. Mario. 1997b. "On Russi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Lecture presented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on April 13th. Cambridge (mimeo).
- Nuti, D. Mario. 1997c. "Farewell Welfare?" Background note for the Stockholm meetings on Social Welfare in the Transition. Stockholm, of 5 - 6 September (mimeo).
- Nuti, D. Mario. 1997d. "Comparative Economics after the Transition".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IESSEC XI Bi-annual Meeting. Rome: Universiti di Roma "La Sapienza", 25 - 26 September (mimeo).
- Nuti, D. Mario. 1998. "Stocks and Stakes: the case for protecting stakeholders' interests". *Economic Analysis*, Vol. 1, No. 1: 7 - 16.
- NYT. 1998. "Moscow Statisticians Accused of Aiding Tax Evas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 OECD. 1996a. *Poland 1997. OECD Economic Survey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996b. *Czechoslovakia 1996. OECD Economic Survey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997a. *OECD Economic Outlook 61*.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June.
- OECD. 1997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ECD Policy Approach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997c. *Russia 1997. OECD Economic Survey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997d. *Short-Term Indicators. Transition Economies*. 3.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Paniccia, Renato. 1997. Short-and Long-term Determinants of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An Econometric Assessment of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in Russia, 1965 - 1995. *Research in Progress*, 14 (June). Helsinki: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 Pastor, Manuel. 1997. "The Coming Cuban Transition? Possibilities and Prospects for a Postsocialist Cuba".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 Perkins, Dwight H.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2): 601 - 645.
-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3): 600 - 621.
- Pinto, Brian, Marek Belka and Stefan Krajewski. 1992. "Microeconomics of Transformation in Poland: A Survey of State Enterprise Response". Conference paper. The 2d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ransforming Economies*. September 24 - 26. Groningen.
- Pitelis, Christos and Thomas Clarke.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lanEcon. 1996. *Review and Outlook for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 PlanEcon, Inc. December.
- PlanEcon. 1997a. *Polish Economic Monitor. Key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Decisions Could Assure the Polish Economy a Smooth Ride*. Vol. XIII, No. 19 - 20. July 9.
- PlanEcon. 1997b. *Review and Outlook fo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 C. : PlanEcon, Inc. March.

从休克到治疗。

- PlanEcon. 1997c. *Review and Outlook fo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 C.: PlanEcon, Inc. September.
- PlanEcon. 1997d. *Review and Outlook for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PlanEcon, Inc. December.
- PlanEcon. 1998a. *Review and Outlook fo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 C.; PlanEcon, Inc. March.
- PlanEcon. 1998b. *Review and Outlook for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PlanEcon, Inc. July.
- Pohl, Gehrardt, Gregory T. Jedrzejczak and Robert E. Anderson. 1995. "Creating Capital Marke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295.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ugust.
- Pohl, Gehrardt, Simeon Djankov and Robert E. Anderson. 1996. "Restructuring Large Industrial Firm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332.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ugust.
- Pohorille, Maksymilian (ed.). 1982. *Tendencje rozwoju konsumpcji. Postulaty i warunki*.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Ekonomiczne.
- Pomfret, Richard. 1997. "Reform Paths in Central Asia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Helsinki: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15 - 17 May.
- Pomfret, Richard and Kathryn H. Anderson (1997). Uzbekistan: Welfare Impact of Slow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s*, No. 135 (June). Helsinki: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DER.
- Popov, Vladimir. 1998a. Is Russia's Economy Likely to Get on the Fast Growth Track?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orthcoming).
- Popov, Vladimir. 1998b.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Factors of Change and 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forthcoming).
- Popov, Vladimir and Nikolai Stanelev. 1990. *The Turning Point: Reboot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 Moscow; Doubleday.
- Portes, R. 1981. "Macroeconomic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irbeck College Discussion Paper* 161. London: Birbeck College.
- Poznanski, Kazimierz. 1993. Poland's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Shock and Therapy. In

Stabi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Poland. Edited by K. Poznanski.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oznanski, Kazimierz. 1996. *Poland's Protracted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znanski, Kazimierz. 1997. "Comparative Transition Theory: Recession and Recovery in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UNU/WIDER Project Meet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Alternatives and Outcomes*. Helsinki 15 - 17 May.

Programne. 1988. "Program realizacyjny drugiego etapu reformy gospodarczej" ("Program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Stage of Economic Reform"). Warszawa; Wydawnictwo "Rzeczpospolita". February.

Quassier, Wolfgang. 1987. *The New Agricultural Re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ople's Communes to Peasant Agriculture*. In *Crisis and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Op. cit.

Raisex, Martin. 1997. "Destruction, Diversity, Dialogue: Notes on 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9, No. 1; 39 - 57.

Ravallion, Martin. 1997. "Good and Bad Growth;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5; 631 - 638.

Ravi, N. 1998. Opening up gradually to global finance. *The Hindu* (New Delhi). January 10.

Reich, Robert. 1998. Deflation: the real enem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5.

Richter, Stephan - Götz. 1997. "Blood Brothers. What Do George Soro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und Have in Common?" *Weekly Wire*. Washington - Frankfurt - Brussels; Trans Atlantic Futures. No. 33, September 8.

Robinson, Anthony. 1997. Surge in capital flight from Russia. *Financial Times*. 21 March.

Roca, Sergio G. 1988. *Socialist Cuba. Past Interpreta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Rodrik, Dani. 1990. "Premature Liberalization, Incomplete Stabilization: the Ozal Decade in Turkey".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00.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rch.

Rodrik, Dani. 1996.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IV (March); 9 - 41.

Roland, Gerard and Thierry Verdier. 1997. *Transition and the Output Fall*.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636.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May.

从休克到治疗。

- Rosati, Dariusz. 1994. "Output Decline during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2 No. 4; 419 – 442.
- Rose – Ackerman, Susan. 1997.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 Roubini, Nouriel and Paul Wachtel. 1997. "Current Account Sustainabilit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Third Dubrovnik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Dubrovnik. June 1997.
- Rutkowski, Jan. 1997. "Labor Markets,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Poland.", World Bank Field Office, Warsaw, October 15 (mimeo).
- Sachs, Jeffrey. 1989. "My Plan for Pol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No. 3 (December 1989 – January 1990): 24 – 29.
- Sachs, Jeffrey. 1993. *Poland's Jump to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 Security. 1997. "Security through Diversity. Reform of the Pension System in Poland". Warsaw;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Plenipotentiary for Social Security Reform. June.
- Selowsky, Marcelo. 1991. "Comments on Policies to Move from Stabilization to Growth, by Dornbusch".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0*. Washington D.C. : The World Bank.
- Selowsky, Marcelo and Mathew Vogel. 1995. "Enterprise Credit and Stabilization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Present Experiences and Stabil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 paper. First Dubrovnik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Dubrovnik. June.
- Sen, Amarty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 Shatalin, Stanislav, et al. (1990). *Perekhod k Ryнку. Kontsepsiya i Programma*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Concept and Program). Working group created by a joint decision of Michail S. Gorbachev and Boris N. Yeltsin. Moscow.
- Shelly, Louise I. 1997. "The Price Tag of Russia's Organized Crime." *Transition*. February. Washington, D.C. : The World Bank.
- Shevtsova, Lilia. 1995. "The Two Sides of the New Russia".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3 (July); 25 – 40.

- Shor, Boris (ed.). 1997a. "Nations in Transit 1997 -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Market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Shor, Boris (ed.). 1997b. "Nations in Transit 1997. Freedom House Rankings." *Transition*. Vol 7, No. 3. Jun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Simoniia, Nodari. 1997. "The Lessons of the Chinese and South-Korean Reforms for Russia".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AS.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udai University. September (mimeo).
- Soros, George. 1997. "The capitalist threat".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 Stein, H. 1993.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Africa". Conference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LSE. *The Relevance of Public Policy Choice Theory for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September (mimeo).
- Stern, Nicholas. 1996.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ome strategic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25 countries over 6 years". Conference paper. OECD/CCET Colloquium. Paris. 29 - 30 May.
- Stern, Nicholas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7. *A framework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 market economy: objectives, scope,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EBRD Working paper 20.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pril.
- Stiglitz, Joseph E. 1995. *Whe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1 No. 2: 151 - 177.
- Stiglitz, Joseph E. 1997.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Stiglitz, Joseph E. 1998a.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IDER Annual Lectures 2.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January.
- Stiglitz, Joseph E. 1998b. "Economic Science, Economic Policy, and Economic Advice". Conference paper.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April 20 and 21.
- Strauss, Robert. 1997. Quoted in; Observer. *Financial Times*, 28 May.

从休克到治疗。

- Summers, Lawrence H. 1998. "Equity in a Global Economy". Remarks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Policy and Equity*.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8 - 9.
- Tanzi, Vito. 1991. *Tax Reform and the Move to a Market Economy: Overview of the Issues*. In *The Role of Tax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Tanzi, Vito. 1992. *Fiscal Issue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Tanzi, Vito. 1997a. "The Fiscal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Conference paper. Third Dubrovnik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Dubrovnik. 25 - 27 June.
- Tanzi, Vito. 1997b. "Reconsidering the Fiscal Role of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May): 164 - 168.
- Tanzi, Vito. (ed.). 1999. *Economic Policy and Equity*. Cambridge, Mass.-London: The MIT Press (forthcoming).
- Tanzi, Vito and Ke-young Chu (eds.). 1998.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Growth*. Cambridge, Mass.-London: The MIT Press.
- Tanzi, Vito and Hamid Davoodi. 1997. *Corrupt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97/139.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 Tanzi, Vito and Ludger Schuknecht. 1995.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95/130.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Twigg, Judith L. 1997. "Russian Health C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Transition* Vol. 4 No. 3 (Augus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UNDP. 199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199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199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199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New York - Oxfor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ECE. 1998.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Bulletin*, No. 47. Geneva; United Nations –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March).
- UNICEF. 1994.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 Crisis in Mortality, Health and Nutritio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 No. 2. Florenc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
- UNICEF. 1995. "Poverty, children and policy: respo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 No. 3. Florenc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
- Uvalic, Milica and Daniel Vaughan-Whitehead (eds.). 1997. *Privatization Surpris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mployee-Ownershi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eltenham, UK-Lyme, US: Edward Elgar.
- van Brabant, Josef. 1990. *Remaking Eastern Europe-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Boston-Dordrecht-London; Kluwer.
- Walker, Tony. 1997. Unbinding China. *Financial Times*, 11 September.
- Wang, Shan. 1994. *The Third Eye*. Beijing; Shanxi People's Press.
- Weber, Steven. 1997.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cy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6: 65 – 82. July-August.
- Wilczynski, Jan. 1972.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London: Macmillan.
- Wiles, Peter. J. 1977. *Economic Institution Compar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illiamson, Joh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itor,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illiamson, John. 1993. "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 No. 8: 1329 – 1336.
- Williamson, John. 1997.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In Louis Ezmerij, edit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Winiiecki, Jan. 1991. "Costs of Transition That Are Not Costs; On Non-Welfare-Reducing Output Fall".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No. VI: 85 – 88. June.
- Wolf, Halger C. 1992. "Miracle Prescriptions –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ition in the 1990s". I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从休克到治疗。

Research.

- Wolf, Holger C. 1997. "Transitions Strategies: Choic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Stern Business School. December (mimeo).
- Wolf, Martin. 1998. "Ins and Outs of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Times*, June 16.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4. *Ad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5a. *Poverty in Russia. An Assessment*. Report prepared by the Human Resource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Country Department III,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5b.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5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5d. *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Polan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b.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c.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d.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8.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Zhang, Yuan. 1989.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 China*. WIDER Working Papers WP 55. Helsinki;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March.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

美元与日元

〔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著

《美元与日元》从汇率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作者反对贸易失衡应通过美元贬值加以校正这一流行观点，认为用汇率来调整是无效的，并且代价高昂。他们摒弃了仅仅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方面的传统方法，将日元从1971年到1985年年中的大幅度升值与美国施加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两国应建立商业协作关系以实现双边贸易的自由化，同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以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通过这样的途径缓和两国紧张的商业关系，防止将来经济继续滑坡。

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私有化

〔美〕约瑟夫·R·布拉西 等著

《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私有化》以迄今仅有的一次对1992—1996年期间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所做的连续的全国范围的研究为基础。作者追溯了俄罗斯80个地区中50个地区的转型经过，并融入了1996年大选后的最新进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转移的最新报告，所进行的是对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转型的分析。书中考察了俄罗斯最大企业的现行所有权情况，也用失业、工资、工会力量和工人作为雇员股东的种种资料，刻划了俄罗斯经济中工人的地位，并指出了公司治理和俄罗斯新型私有化企业重组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强管理者 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

〔美〕马克·J·洛 著

美国公司的显著特征——强大、集中的管理层，顺从的董事会

从律见到治疗。

和疏远的股东——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和技术因素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本书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J·洛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作者在书中重新诠释了美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起源和演变,指出美国公司的这些特点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和技术因素,也同样取决于政治政策——通过立法使某种组织形式代价高昂,甚至对其加以禁止。而后者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地区优势:硅谷和 128 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

〔美〕安纳利·萨克森宁 著

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的著作对造成美国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 1994 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 128 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作者认为,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正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司财务的理性与非理性

〔美〕路易斯·洛温斯坦 著

被《哈佛商业评论》誉为“华尔街最杰出的观察家和批评家”的路易斯·洛温斯坦,试图通过此书,提醒人们关注公司财务管理中基本的、永恒的和理性的部分,而摒弃那些短暂的、非理性的“神话”。书中涉及了资金运作的各种领域,如,怎样应付破产;何时与是否支付股息;如何撰写年报,等等。同时,作者透视了美国一些企业在公司财务运作上的实例。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Copyright © 2000, Grzegorz W. Kolodko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作者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著 者/ [波兰]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译 者/ 刘晓勇 应春子 纪志宏 王卫华 陈慧玲

特约编辑/ 徐晗笑

装帧设计/ 戚亮轩

责任出版/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吴明泉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3) 中国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

发 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排 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516 千字

印 张/ 19

插 页/ 4

印 数/ 1 - 3100

图字:09-2000-042 号

ISBN 7-80613-983-4

F·334 定价: 25.00 元

FROM SHOCK TO THERAPY

从休克到治疗

在《从休克到治疗》中，作者用几个生动的案例讲述了长达十年，他作为一位经济领域的调查记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观察。作者通过企业家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调研，揭示了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人们思考从休克到治疗这条道路提供了启示。《从休克到治疗》不仅是一本关于经济转型的著作，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之作。

——编者—— 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复杂性。作者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实地调研，揭示了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人们思考从休克到治疗这条道路提供了启示。作者的观点和案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值得读者深入思考和借鉴。

——作者——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

作者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作者的观点和案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值得读者深入思考和借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经济转型的著作，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之作。

——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经济转型的著作，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之作。作者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作者的观点和案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值得读者深入思考和借鉴。

——译者——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

ISBN 7-80643-983-4



9 787806 139837 >

ISBN 7-80643-983-4

F · 334 定价：25.00元